

第十二辑

辛任日记
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
汪穰卿先生传记
陶庐老人随年录
林白水传

近代稗海

样初署



责任编辑：刘运勇

封面设计：邱云松

技术设计：盛寄萍

近代稗海（第十二辑）

章伯锋 顾 亚 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7.6 插页 6 字数 390千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0221—0/K·32

印数 1—1200 册

定价：4.90 元（平装本）

近代稗海序

《近代稗海》是中国近代稗史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是编辑室的成员，应先说一说编辑这部书的缘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史学会主编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人民出版社重印了许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报刊和资料，其他机关、团体、学校也编印了各种专题史料，成绩是很大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1954年创办《近代史资料》杂志，陆续刊载了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史料，有著作稿本，罕见书报和档案、函电、日记等等，期刊外并出专刊。一面保存、流传孤本，一面作为已刊的资料之补充。惟期刊篇幅有限，专刊虽不拘限篇幅却限于专题。历史科学要求详细地占有资料，而孤本秘笈也需早日印行流传，以供各方面利用。因此，编辑《近代稗海》。

稗史的名称来源于《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汉时所谓小说，并非近代文艺作品中的小说。据如淳说：“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段玉裁注《说文解字》说：“野史小说异于正史，犹野生之稗别于禾，故谓之稗官矣。”《隋书·经籍志》把《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七十多部史籍，编为别史类。这些书是作者“各记闻见，以备遗忘。”“盖率尔而作，非史乘之正

也。”“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总观史部丛书有：小史、逸史、别史、野史、杂史、稗史许多名称，目录学家早已慨叹这些史书名称难分，相互重复。我们也就不必再详分，今仿明商濬《稗海》前例，收集原始文献和私家著述，编为史料丛书，就叫做《近代稗海》。

历史科学工作，“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中国近代史资料浩如烟海，可称十分丰富；只是编印成册广泛流传者并不算太多。大量的档案、报刊、图书等等编印或重印，各有主管机关进行。近代史资料编辑室力量有限，不能承担较大的工作，只是选辑一些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政治、文化史等有参考价值的史料，以供史学工作者之参考。从内容来说，它是某一历史事件的有用材料，尽管零碎不全，可是它足为已刊的专题史料的补充，使某一专题材料更为完备。

中国近代史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每一次对外战争和革命运动都影响着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变化。以前讲中国近代史主要是讲民主主义革命史，根据当时条件是有道理的，今天还是需要讲革命史。革命史不象通史那样贯通百多年的历史变化，横通各方面的变化，所涉及的范围较窄。今后研究通史和深入研究革命史都需要补充：各种制度的变化，各种事件的具体情况 and 过去所不曾接触的各种问题的资料；并补充各外国侵略者之间，国内反动统治者之间，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及买办阶级之间各种错综复杂关系的资料。《近代稗海》正是为了这些补充史料而编辑。

“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面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历史科学工作就是根据这个原则来研究历史和编辑史料。但是也有不同的意见，认为革命史还没有研究好，不要研究反动统治；军阀就是军阀，无可研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者言行不堪，不能传播；前人说话和我们不同，不能印行；引用反革命统治者的材料，立场有问题。这些话使人害怕，却不能使人心服。不研究反动统治，怎么能说清革命的起因、任务、动力和路线是否正确。不研究各个军阀的特点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怎能理解“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不揭露反革命阶级的残忍、贪婪、荒淫、卑鄙等具体事实，怎能说明他们是社会发展的障碍。清朝、北洋军阀政府和蒋家王朝的语言各有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同情革命者语言各有不同，如果要求他们语言相同，岂不是取消了历史。不要反革命统治者的文献，又怎能了解他们的情况。只突出革命者如何活动，不谈反革命如何活动，这样的革命史绝不能说清楚问题，更说不到把革命史研究好。因此，我们还是依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敌友我三方面的材料。《近代稗海》广泛收集近代通史和革命史的资料，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史料，至于中国共产党党内问题的资料，有党史研究机关来承担，这里一概不收，也须事前申明。

史料既要十分丰富，还要合于实际。“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实事求是地研究各种不同的记载，和军事

家制定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方法相同，“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关系，因而构成判断，下定决心，作出计划。”史料工作依据这个原则要做三件事：一鉴别史料的真伪，二考订记事的虚实，三校勘文字的外误。《近代稗海》选材都经过鉴别，不收伪品；尽力在各篇资料之前说明其来源、版本、阶级性及可注意之处。力求多收版本会校，以所能找到者为准。至于考订记事，一因编辑能力有限，二因资料书中难容考订的文字，所以还须等待史学研究和史料整理者另写文章，这里一般只是提供资料。

《近代稗海》酝酿多年，今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承担出版，才得以实现。资料来源和整理工作多靠各地收藏机关和关心历史科学的同志们的大力支持。今乘出版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辑室谨向帮助和关心本书出版的单位和同志们致谢，并请读者指教批评、帮助我们改进工作。

荣孟源

1982年12月9日

编辑凡例

一，选辑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百多年间，有关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料，供历史科学工作者参考。

二，所选资料作为已刊行的各种专题史料的补充，向前可述民主主义革命的背景——白莲教农民起义；向后可述及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土地革命；中间补述一些过去很少触及的宗教、会道门和各种历史事件或各种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况等等。

三，收集资料以原始文献和属于稗史著作为主，内容大致为：一是原件稿本、抄本和孤本；二是罕见的印本；三是除几处大图书馆外一般难找的刊本。凡空论文章，低级趣味的琐谈，太大部头的书，均不收。至于建国三十多年间已刊行的资料，亦不再收入。

四，编辑资料有删节或选录，但所选部分不作内容或文字上的改动，以存其真。编辑时以一种或数种内容相近者为一辑。每辑约四十至五十万字。每种资料之前，编者就所知加以按语或说明，指出材料来源、版本、内容要点、作者情况以及应注意之处。

五，资料中编者略加简注：一纪事异同，二文字有特殊含义者，三技术性校注。至于一般知识性的解释，阴阳历对照，人人皆知的故实和尚待考订的问题等等，均不注。

六，认真校勘。凡发现明显错误者，可以径行改正；其有可疑者则保存原文用符号标明或校注。校勘符号是：残缺字以□代替；错字、别字、颠倒、衍文均在正文后加〔 〕号，拟改字以注说明；佚文增补，外加【 】号。

七，原书无分段和标点者，编者加以分段和标点，力求简明。

八，原书中之公文、函札等格式，除少数保存其原来行款外，一般都用今天通行文章格式，取消抬头、空格等。

九，文字凡能用简体者均改简体，因用简体可能引起误会者则仍用繁体。

十，原书或稿本中，有“发匪”、“拳匪”、“胡清”、“满清”、“贼”、“逆”……之类称谓，为了说明原作者的立场和观点，我们均未作更改，特此申明。

近代稗海第十二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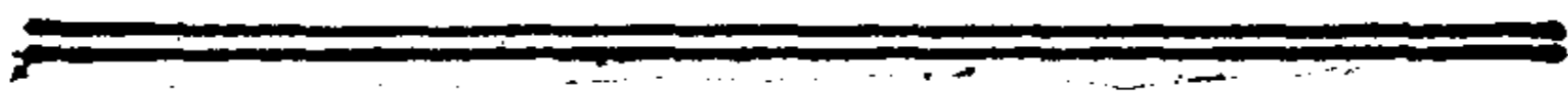
- 辛壬日记（选录）……………宗方小太郎（ 1 ）
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宗方小太郎（ 54 ）
汪穰卿先生传记……………汪诒年纂辑（ 167 ）
陶庐老人随年录……………王树枏（ 345 ）
林白水传……………林慰君（ 425 ）



辛壬日记

(选录)

宋方小太郎



说 明

宗方小太郎（1864—1923），日本熊本县人。早年曾就学于当时汉学家日本维新志士佐佐克堂。1884年（明治十七年）中法战争爆发，他随同佐佐来华搜集情报，战后宗方留在中国继续活动。从1890年起受日本海军大臣西乡从道的委托，开始向海军军令部提供有关中国政治、军事各方面的情报。中日甲午战争时，宗方潜入芝罘和威海卫，刺探北洋舰队的情报，为日本击败中国北洋海军起了重要作用。为此，1894年10月4日受到明治天皇的表彰。嗣后他即长期在华从事间谍活动，直至1923年2月3日于上海病死。宗方在华活动了近四十年，足迹遍及我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经常化名“宗大亮”、“宗北平”，乔装打扮，刺探情报。他精通汉语，且能吟诗作赋，平时与清朝士大夫阶层人士交往，并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人有联系。在华创办《汉报》（在汉口）、《闽报》（在福州）、日清贸易研究所，参与同文书院的创立和经营，以此为掩护，搜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革命党人活动等各方面的情报，绘制我国军港炮台设施、市区布局、道路桥梁地图，为日本侵华战争、制定对华方针政策提供参考。宗方在华活动主要是在中国中部、南部，所以其情报涉及较多的也是关于湖北、江苏、福建、广东等省的情况，他给日本军部的报告共有六百二十八篇，另有号外报告六十篇。这些报告原件珍藏在日本内阁图书馆，被视作“文化国

宝”。1975年日本原书房以《宗方小太郎文书》（正编）为题出版了这批报告，后又于1977年出版了《续编》。《宗方小太郎文书》正续编，被日本学术界视为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的重要史料，引起了学者的广泛注意。

但宗方小太郎所遗留下的资料不止已出版的这两册，日本尚存有大量的宗方函件未印行。另有部分遗留在中国，估计是他的助手波多野为了编写宗方的传记所搜集保存的部分，传记完成后，即一直保留在中国未运回日本。这其中有宗方本人连续三十多年之久的日记。这部日记从1887年4月10日起，至1923年1月临死前二十天为止，基本上逐日记载他每天的活动。本文即是摘译其1911年和1912年的日记，日记中记载了这一时期大批日本在华和来华的各方人士的活动线索，为研究武昌起义前后，日本对华活动提供不少可供参考的史料。日记原稿中有关涉及私生活的记载，翻译时一般均予删略。译文经由吴绳海同志校阅订正。

辛壬日记

宗方小太郎 冯正宝译

一九一一年

【在上海】

一月一日 接东京中岛真雄报告，谓中西正树在北满旅行中，十二月十九日自百草沟出发，于宁古塔附近遭马贼之难，从者一名被害，中西负重伤。

一月二日 向中西发出慰问函，另致函中岛。

一月三日 苏州姚文藻来信。复函宫崎民藏^①，嘱其将五十日元转交给津野。此为宫崎归国时向余所借之款，现嘱其交给津野，以应其急需。午饭后至车站，乘一点〇五分快车赴苏州，二点四十五分抵达。高田九郎来迎，乘马车至西门外，又乘小船，四点到横塘，傍晚猎鸪，获五只，即至上方山下投宿。与高田谈话，十点就寝。

一月五日 下午一时至西门外，与高田分手，驱车至车站，休息饮茶，乘三时火车，五时十五分到达上海，回寓所。

一月七日 本日因减低房租运动，英租界各街皆闭门罢市。

一月八日 下午二时送中根齐赴华南，归途访岛田数雄。夜

^① 宫崎民藏为宫崎寅藏之兄，1911—1928年间曾多次来中国活动。

北京松本菊雄来访，畅谈至十时始去，为当代难得之人物也。

一月十日 北京青木少将来函征求关于中国各种事件之意见，即复之。

一月十一日 向海军发出报告，又向奉天中西正树发出慰问函。

一月十二日 向海军发出报告。

一月十七日 终日在家起草政况报告。

一月十八日 军令部来信。向海军发出报告。覆函姚赋秋。

一月二十日 终日写政况报告。

一月廿一日 上午至邮政局领取海军汇来之五百五十日元，因汇率差额关系，为中国货币六百二十七元，此款即存入正金银行。长春中西正树来函，谓伤已略愈，可喜。

一月廿二日 嘉悦敏自缅甸、云南、四川旅行归来，与之谈论。

一月廿四日 终日在家起草政况报告。

一月廿六日 本日政况报告脱稿。时报馆送来去年五月至十二月全部报酬四百元。

一月廿八日 午饭后出席同文书院之演讲会，演讲关于中国之政况达二小时以上。南新吾、松本菊雄亦各有演讲。

一月廿九日 向北京李盛铎、汪康年、良弼、苏州姚文藻发出贺年函。

一月三十日 本日为阴历一月一日，九时赴狄平处贺年。

一月三十一日 自清晨起抄写报告，至下午抄毕，总计有三十五页，下午二时至邮局，以挂号函寄往海军。

二月十四日 致函外务省伊集院公使，……向公使提议在上

海设立言论机关。

二月十五日 下午姚文藻、加藤壮太郎、松本菊雄来访。姚今日自苏州来。

二月十七日 松本菊雄、加藤壮太郎来访。松本于今晚返北京。

二月十八日 十二时至税关码头送加藤赴云南。

二月十九日 上午至西本省三寓送其赴浙江，已启程云。

三月二日 苏州王至愚、石裕生二人携姚文藻之介绍信来访。

三月四日 向海军发出报告。

三月九日 海军送来四、五、六三个月津贴。晚至俱乐部出席伏见号军舰溯航四川之欢送会，九时归。重庆宜昌间最初开辟轮船航线，始于明治三十年（即1897年——译者），由居住重庆之立德试航。三十二年英国小军舰伍德柯克号、伍德拉克号二艘溯航成功；其后法、德两国军舰争相进入四川；四十二年四川人组织之轮船公司成立，以蜀通号航行于宜昌、重庆之间。帝国军舰之入蜀以伏见号为嚆矢。

三月十日 寄出致海军报告及津贴收条。

三月十一日 石、陈二人持姚文藻信来访。夜姚文藻来谈，联名致函村山正隆。

三月十三日 往访领事，商量以西本名义在苏州发行报纸事。归途访姚文藻于蓬路三号，小谈后归家。

三月十七日 上午抚顺横川安三郎来访，以中西正树所托带之其本人遭难后之照片见赠。

三月廿二日 远藤留吉来谈，彼系由四川来者。晚佐佐木、

合原来访，合原系昨日由浙江内地归来者。

三月廿四日 向海军发出报告，并邮寄设置调查部费用预算书（创立费二百五十日元，每月经费三百五十日元，旅费每年一千二百日元）。至时报馆访狄楚青，狄不在。北京波多送来官员录。

三月廿五日 致函狄平。

三月廿八日 下午至邮政局领取海军汇来之款，存入正金银行。

三月三十日 向海军军令部发出普通信。向《九州日报》社发出通讯。

三月三十一日 至《上海日报》社。下午六时与中岛至西摩路领事官邸，与时报馆狄平、陈景韩、瞿绍伊、西田、浮田、中岛等人会餐，十时归家。

四月五日 旅行云南之加藤壮太郎归来，来访。

四月九日 苏州陈、石二人来访。

四月十日 堀田少佐来访，商量军令部交来之要件。

四月十一日 向海军发出报告。下午狄楚青来访。

四月十二日 上午西本来访，昨日自浙江归来云。

四月十三日 狄楚青送来十五日招宴请帖。

四月十五日 约中岛乘电车至清和坊怡情别墅，出席时报馆之宴会，主人为狄平、狄南士二人及记者叶昌焘、杨景森、瞿绍尹等，来宾为有吉领事、浮田、西田、中岛、广田及余。九时散。

四月廿五日 下午访姚文藻、《上海日报》。

四月廿八日 海军送来余之政况报告之印刷品。

五月二日 向海军发出私函。

五月五日 向海军发信并致函川内。

五月十日 向海军军令部发出报告。

五月十二日 中午至领事馆面会有吉，去年在北京与伊集院公使商量之事已告成立，设根据地于上海，由余主持，内定自九月起实行。

五月十三日 致函军令部吉田大佐，告知余与外务省之关系。致函北京波多博，嘱其九月来沪。

五月十六日 晚与加藤壮太郎至南阳丸木下处晚餐，平冈小太郎在座，本日自湖南归来云。

五月廿二日 向海军发出报告。访隅田号舰长于丰阳馆，话别，该舰将于明日赴长沙。

五月廿四日 晚，白岩招宴于六三亭，到蔡乃煌、叶德辉、叶德煌、刘馨宜、陈某及其他一人，有吉、西田、木幡及余，十时半散。

五月廿八日 晚，狄平来访。

五月廿九日 上午往访领事，商量〈时报〉与两江总督冲突事件后归家。

六月二日 西本愿寺、木村常谛、吉川小一郎来访，吉川将赴新疆云。致函海军。

六月三日 夜坂田、狄南士来访。

六月四日 上午访问同文书院根津一、安河内、真岛。因西本愿寺派吉川小一郎赴伊犁发掘古迹，余致函汉口波多野养作，介绍吉川。

六月五日 八时访有吉于其官邸，畅谈后同车返寓。狄平来访，同至领事馆，归途访西本愿寺。

六月六日 根津一、河野久太郎先后来访。高桥义恭自汉口归来。向汉口发出报告。军令部吉田大佐来函，告知自七月份起津贴增为二千四百日元。军令部寄来七、八、九三个月津贴，即寄出收条。

六月十一日 上午，中泽将赴汉口，送至车站。

六月十七日 外务省来电报，催促余于二十日前后返回东京，但以七月一日出发之日期不能变更，回电告知。下午往大安栈访黎宗嶽。

六月十九日 下午往访狄、加藤，佐原，夜狄南士来访。

六月二十日 时报馆送来一月至五月份报酬二百五十元。

六月廿一日 致函孙文及熊本家中。

六月廿六日 七时出席宸虹园中国新闻记者之招待会，到会者有浮田、西田、佐原、中岛、冈本、平田及画家竹垞氏，中国人方面有《时报》狄南士、《神州日报》经理张寅（号无尘，安徽人）、《民立报》朱葆康（号少屏）、《中外日报》总理兼总编辑章保世（号佩乙）、《中国商务日报》总理俞礼（号达夫）等，十二时散。

六月廿八日 整理行李，到邮船公司买来回船票。嘉来生来访，明日赴苏州云。晚访司令官于丰阳馆，畅谈。访加藤、井手辞行。

六月三十日 向军令部发出政况报告及普通信。

七月一日 本日自上海出发返熊本。上午佐原、本愿寺森、岛田数、白岩来访，下午二时离东和洋行，登弘济丸，二时半启航。浮田、冈本、桂及东条两舰长、加藤中佐……等人来送行，根津一、美代清彦、松本幸次郎、赤谷由助等同船。

【在东京】

七月三十一日 九时至军令部，会见竹下、吉田、田中三大佐，伊集院、大井、堀田等人，畅谈后辞出，至参谋本部访福岛中将，宇都宫少将、松井少佐等。

八月二日 晨乘电车至军令部访藤井中将，谈话移时；至斋藤海军大臣处稍谈，又与竹下、吉田两大佐，大井、堀田两少佐小叙。至外务省访仓地政务局长，十一时半归。

八月三日 八时访有吉于对山馆，商量各事。至东洋协会访门田正经，小谈，又至海军军令部访大井及军令部副官。下午二时至外务省，会见石井次官，与有吉三人有所商量。大井少佐来访，彼因将赴广东有所商量。

八月五日 晨往访有吉，领取在上海之设备费及其他费用五百日元。到海军访竹下、吉田两大佐，田中耕太郎、大井等。五时半赴上野精养轩出席东洋协会之招待宴会，主要来宾为朝鲜基督教传教士二十九人，进西餐。会见小松前文部大臣，柴田家门、古市公威、大仓喜八郎等宾主共六十余人。九时半散。

【在熊本】

八月廿二日 接美国孙逸仙，上海井手、北京波多博、唐津中绎等来信。

八月廿四日 上午访中岛为喜，送其赴奉天。将孙文来信邮寄至海军军令部。

八月三十一日 上午将松崎鹤雄旅费七十五日元邮寄至长沙。

【在上海】

九月二十日 军令部副官送来十月至十二月津贴。

九月廿三日 上午九时根津一来访，白岩、迎英辅来告别。午与松崎至领事馆，介绍给各人。送白岩，迎至博爱丸。

九月廿六日 佐久间桢来访，〈每日新闻〉社之南京通讯员也。向海军发出成都事件之报告。

九月廿七日 订正致海军报告中之错字后发出。下午四时半迁出东和洋行，与松崎移居至北山西路三号旧居。回顾自去年一月三十一日夜十一时与家族迁出此寓至东和洋行以来，约十七个月，今日又成为余之寓所。室内陈设及仆役与旧时无大差别，不禁发生怀旧之念。

九月廿八日 下午至新马路登贤里访姚文藻，赠以土产，谈话移时，归。九时至丰阳馆访越太郎，改变姓名，秘密赴湖南调查物资者也。

九月廿九日 出席新建领事馆落成典礼，到国内外人约七百人。

十月二日 向海军吉田大佐发出平信。

十月四日 增补政况秘报，邮寄军令部。

十月六日 下午至正金银行领取三百五十元。

十月七日 本日爱尔近路十六号租屋之设备完成，松崎、西本移居该处。

十月十日 至江天号轮送本庄繁旅行浙江，五时归。

十月十一日 晨送加藤壮太郎赴华北旅行，至税关码头，加藤来告曰，出帆延期至明晨。正午迎河野久太郎返沪。有电报称

昨日武昌兵变，张统制被杀，总督避难江上，督署被烧云。

十月十二日 今晚将乘南阳丸赴汉口，视察武昌变乱，收拾行李。向海军军令部及熊本家中报告将赴汉口。

武昌兵变起因于十月九日，爆发于十月十日。总督衙门、布政司衙门、兵营被烧毁。瑞总督逃至军舰，第八镇统制张彪避难于日本租界。叛徒以革命党为主，官兵中之特科兵全部及步兵两营叛变，与官兵交战。官兵之数仅步兵四营。（以上张彪谈）

寺西中佐之报告谓：叛徒有步兵两团、炮兵一团、工兵一团，官兵之作战者仅有骑兵一团云。

三井会社来电谓：叛军有炮兵一团、步兵一团、工兵一团。

叛徒推举第八镇二十一旅长黎元洪为主将，在城门及山上布置排炮，正在炮击官兵。

叛徒占领汉阳制铁所及枪炮局，武器充实。

叛徒使用黄帝纪元四千六百〇九年年号，发行中华银行纸币，因此各外国银行受到挤兑。

对外国人尽量表示敬意，纪律严明。

有报告谓北京禁卫军南下。

长沙亦有发生事变之说。

张彪部下有两营自武昌渡江，在汉口日本租界之下游登陆，等待开封来援之兵，准备会师。

又，由武昌开赴沙市之兵五百人，将乘大吉丸下航以救武昌之急。

晚加藤、神崎来访，狄平亦来访。十时与狄同乘马车至邮政局，发出致海军及小早川、熊本家中信件。登上南阳丸，加藤、佐原、木幡、神崎、河野、狄、井手友、松崎、西本、岛田、副

岛，以及日清汽船会社四人，〈上海日报〉全体人员来送行。

【在由上海赴武汉途中】

十月十四日 晨八时到南京。正金银行最上，加美山、古河公司上岛清藏同来乘船赴汉口。九时从南京开船，江上仅有英国小炮舰一艘、中国水雷艇一艘。

据昨日上午在上海接到之电报，叛军在大别山布置排炮，与江上之中国炮舰交火。又称汉口之官军尽行叛变，投降革党。

下午三时抵芜湖。见昨日下午汉口开来之大利丸到达，乃与木下船长等往访宫田船长，询问汉口情况。记录谈话概要，报告海军。四时半从芜湖出发，托大利丸带去致海军吉田大佐函二通，上海加藤中佐函一通。

十月十五日 上午六时过安庆，下午三时过湖口县，四时抵九江，会见御园生、柴田、山口等。岳阳丸自汉口开来，往访船长。托岳阳丸带去致海军第三、第四号函，以及致熊本家中、上海有吉、加藤函。五时开船。

长江水师提督程允和奉命应援武昌，十四日自安徽太平府根据地出发，乘长龙舢板，由炮舰江亨拖带，并另随小舢板三艘，开赴汉口。因速力缓慢，到达汉口当在十七日上午。

招商局之江永号与日清之岳阳丸均满载难民。

南昌之第二十七协五十四标已全部召集至九江，使之赴援汉口，因有内应叛军之虞，又被命令返回南昌。现九江有中国炮舰一艘。驻在九江之五十五标之一部分正被派至武穴。

九江之铁路现开通二十三哩，有客车四辆。

据岳阳丸船长之谈曰：京汉铁路现往返无阻，革命军纪律严

明，秋毫不犯。其为患闾阎、放火掠夺者，土匪盗贼之徒也。

革命军通知侨居外人曰：若对外人有危险发生之虞时，可于二十四小时前报告。

【在武汉】

十月十六日 上午十时半抵汉口，桔来迎。辞别木下，下船，至领事馆访松村、来栖，稍谈后辞出，投桔氏处。向司令官报告途中要闻一二。寺西中佐、最上国藏、加美山、冈、中知来访。向海军报告概况。另致函熊本家中、加藤壮太郎。往访冈。晚访司令官于领事馆，与寺西、增田等会谈，九时归。

叛军之兵力为步兵一镇半、炮兵三标，每日正在陆续募集新兵。有步枪一万八千支、大炮六十门、枪弹一千六百万发，并有炮弹。被服、粮食仓库亦被占领，并在官钱局铸造银币、铜币，且以中华银行名义发行纸币。

叛军司令部自十五日起发行《大汉报》，自十六日起又发行《中华民国报》。总司令部设于武昌咨议局，都督等均由选举产生。汉阳、武昌之知府亦已依选举法任命，行使民政。咨议局长汤化龙已被推举为总参议。

瑞澂总督蛰伏于军舰中，张统制彪隐藏于日本租界。北京政府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并命荫昌率北洋第二镇之半数及第六镇之半数南下汉口。

开封之援军一千二百名已到达江岸车站附近，与武昌残兵五百人会合（残兵有步兵二百、工防兵二百）。南下之援兵可能设根据地于信阳州。

在岳州、沙市之二营鄂军皆属黎元洪部下，正在岳、沙两地

规视从四川返回之鄂军之形势。

萨镇冰于十五日夜抵汉口，虽以楚有号为旗舰，然似无交战之意。

叛军频频劝说张彪参加，其次子在黎元洪部下，请求其父来投不已。张决心等待北洋军到达后即交代军务，放弃军事；并向黎明告不反抗革命军，又誓言不阻止其部下归向革军云。

前九日汉口、武昌革命党二十余人被捕，五六名被斩首。十日晚八时兵变，攻击督署、藩署。总督逃亡。十一日张彪逃亡。十二日汉阳、汉口全被占领。

现中国军舰在当地者为楚豫、建威、楚有等六艘，另有水雷艇四艘。外国军舰为英国五艘、美国三艘、德国二艘、日本二艘。

十月十七日 上午视察中国市街，归途访长安、茂木、福岛等于菱华公司，又访最上于正金银行后返寓。下午到军舰隅田号访问舰长，同至旗舰对马号，与增田参谋长畅谈，五时归。小林和介、最上来访，渡边邮政局长、古闲次郎、冈幸七等来访。

革党左腕缠白布，旗为红地十曜花纹，在市内竖立“兴汉招兵”之旗，应募者甚多。

陆军大臣荫昌率兵约四千名于本日上午十一时抵江岸车站。本日官军之兵力约六千五百至七千名（驻永平之兵及先到之河南兵），其主力似驻在度支部造纸厂。

十月十八日 上午七时半起床，洗面完了时，闻枪声，即换衣至领事馆。途中遇对马号舰长町田，相携登测候所高楼。两军枪声甚盛，官军据刘家庙村庄及铁路线；革命军在赛马场北角柳树下列炮四门，炮击敌人，其步兵则占领刘家庙与赛马场之间村

庄，互以步枪交火。革军之兵数约一千五百名。九时两军交绥。返寓早餐后即至铁路线，遇见第八镇统制张彪率兵三千名，乘货车，侦察敌情。

下午隅田舰长来谈，三时与舰长及桔同至赛马场，登展望台观察形势。革命军之骑兵来告曰：将以炮兵二队出击敌人，恐有危险，请下台云云。因下台至赛马场休息，时三时半也。片刻后炮声起于近傍，革命军约七百人散开于赛马场入口之道路上，以炮二门轰击前面之村庄。余辈入其阵地观战，继至测候所。官军据刘家庙不出，革军一队沿线路来至铁路交叉点，拉来炮二门，频频向刘家庙炮击。其步兵大部队据赛马场，一支出场外，于北角展开，但不进击。在右翼线路上者，有白衣队官率领，始终立于先头，勇悍无匹，进行各种指挥。四时四十分江上之六艘军舰向革命军大行炮击，革军始退却。五时七分炮击中止，五时三十分再行炮击。铁路沿线村庄起火，终于有八处火势甚盛，光景惨淡。五时四十分交战完全终止。革军兵数与上午无大差异。

由赛马场至刘家庙约三千米，自铁路交叉点起距离一千五百米。

张彪之次子张学骞在叛军中。

汉口与上海间之电报，因叛军已占领电报局，不许发密码电。

武昌设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黎元洪为都督，统率军务，汤化龙为总参议，担当民政。汉口设立军政分府（在原江汉关道衙门旧址），以《大江报》主笔詹大悲任军政司。

武汉三地自革命党施行军政后，秩序渐次恢复。

岑春煊逃至上海，端方在四川涪州。

官军缺乏粮食，勉强由九江购来米三万石。

革命军现有军资三百万元，正在铜元局、官钱局铸造货币。

十月十九日 上午六时起床。八时四十分闻枪声，驰登测候台。十二时叛军入赛马场，布置排炮，向刘家庙发炮，炮弹不能达到其距离之一半。少焉，步兵大部约二千五百人以赛马场为中心，分为左右两翼，携炮前进，沿道村庄多被焚毁。尖兵至刘家庙时，官军已退却，一兵不留。叛军运回帐篷六十个及粮食作为战利品。初，叛军密集行进时，六艘军舰虽位于炮击最有利之位置，但一炮不发向下游而去，不知何意。本日湖北军有投降叛军者。

黎元洪本日告日本人曰：昨日之战，革命军方面死伤八十人。子弹在武昌有二千万发，尚在汉阳制造二千万发。机关枪有四门。现有兵力三万人，步枪二万支。粮食、衣服、军资均无不足。本日战斗中准备之兵力四千名。

本日之战叛军在刘家庙所获之战利品为货车三辆、山炮、子弹、米、被服、鞋、帐篷等。入夜，汉口叛军将士到处举行庆贺战胜宴会，树立“庆贺全胜”之旗，气势高扬。

汉口有中国军舰八艘、雷艇四艘：楚有（萨提督旗舰）、建威、楚同、楚泰、建安、江元、江亨、楚豫（瑞总督在此舰）。

致函上海有吉、加藤、熊本小早川。据重庆十六日达宜昌之电报，下列各府县匪乱猖獗云：新津县、温江县、大邑县、嘉定府、雅州、叙州、犍为县及岷江一带，几及四川全省之半。另一电曰：上列各州县贼与良民难以区别云云。又，宜昌、沙市一带人心动摇，事变之发生不可预测。

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安徽、江苏、浙江七省联合起事

之密码电报在宜昌电报局发现，此为向四川发出之电报。

十月二十日 向时报馆寄出战况通讯。致函西本、松崎。上午制铁所总办李维格来访。上午与桔往访王孝绳，十余年不相见，谈话移时归。王曰：陆军大臣荫昌昨晚到达孝感县。北军之动员为第一、第二、第六三镇，各出兵半数，总数约一万六千名。第二镇之二十二协与第六镇之半数先到，第六镇中马玉崑之旧部与新军混合编制，新军似无战意。

北军一万六千名中计划以二千名留于黄河铁桥，其他在黄河以南沿路要地配置若干，以备后路。

革命党黄兴虽于十七日至汉口，但无与黎元洪共事之意云。

至北京之电报自十八日夜起不通。

昨十九日之役，叛军以何锡蕃为将，将精兵五百名混于新兵之中，备炮十一门进攻。自十八日以来战于刘家庙之官军为河南兵六百名及湖南兵三百名，合张彪部下之兵，共一千名左右。

下午访领事。二时半与角田、桔等拟乘小蒸汽船至沙口，通过江岸车站前时，叛军要求停止下航，盖恐以煤炭供给在下游之中国军舰故也。因此登岸至江岸车站，视察叛军之占领情况。有兵四百许驻此。四时半归。神崎正助来访，本日自上海到此云。晚往访冈、神崎，九时至司令官处，谈至十一时半归。

本日五时左右叛军约六百名以炮二门（山炮，五生的七）攻击在七里河之官军，并驱逐之。官军之数约七百名，并见在背后之山上驻有大部队云。

十月廿一日 晨往访冈，又至领事馆。发出致《上海日报》通讯。上海加藤、佐原来信，复之。致函有吉领事。

据沙市电报，宜昌不用一兵即落入叛军之手，沙市亦有旦夕

难保之势。

长沙爆发之机亦迫在目前，外国人皆避难于水陆洲云。

本日由宜昌下航之沅江号中有鄂军一百〇六名到达汉口，但在到达时即以白布缠于左臂，变为叛军。

晚赴冈氏处晚餐。隅田舰长、上岛清造来访。隅田明日赴下游警备大冶云。九时闻炮声五六响，与冈奔赴领事馆，登瞭望楼，炮声全停。似系由江岸车站对岸攻击襄阳丸云。与司令谈话，十一时半归。

本日叛军二千五百人进至七里河，以炮七门自上午十一时半起至下午三时止开炮轰击。官军亦遥遥开炮应战云。叛徒之指挥官为何锡蕃，参谋为张福麟云。

十月廿二日 上午九时半与冈、波多野、神尾等徒步至刘家庙，再赁小舟至七里河上岸，遇外国人二名及日本人四五人慌张前来。一外国人右掌负微伤，衣服破裂，其状不堪入目。彼曰：在滢口附近为官军所射击。日本人亦在第二铁桥与第三铁桥之间为前方丘山之兵所射击，受惊逃来者也。前进至第二桥以望远镜观看官军阵地，只见丘陵之上人影出没而已。叛军在江岸车站，主力正向滢口侧面大迂回而进云。五时乘小舟归。军舰龙田号来汉。《大阪朝日》社小池信美到来，以鸭及罐头赠余。晚往访小池、冈，访司令官于领事馆，遇高洲太助，本日到此云。

十月廿三日 上午访小池于松之家，稍谈后归。高洲太助来访。发出致海军函，报告概况。下午访角田、冈。夜十一时送李维格至对马号军舰，十二时归。李因革命党急于找他，避难遁往上海者也。

东和洋行辻源助送来罐头等。

十月廿四日 下午土佐孝太郎、丸岩及其他一名来访。十一时借日清会社之小汽船渡江，至武昌汉阳门，遇叛军一队八百人赴援七里河铁桥之战。今晨七时起第一铁桥与第三桥相对展开炮战，官军以野炮二门发射榴弹，击退叛军。叛军在战线上者约一千人，在江岸驻有兵三千以上。此役叛军死伤达四十名云。

与桔自汉阳门赁车至设立于蛇山下咨议局之叛军本部军政府，访都督黎元洪，因军务繁忙不得见。至外交科面会刘凤书及其他二人，彼等曰：现叛军总数三万五千人。军政府之参谋长为杨开甲，革命党员在本部任要职者不少，日本留学生甚多，有帝国大学、同文书院、高等农林学校等在校学生。各种事务采取合议制，并无特别杰出之人物。军务以外之事，似决定于革命党之留学生之手。黄兴尚未到达云。

正午辞出军政府，返至日清之小汽船。往访司令官、寺西中佐、冈，香月梅外、神崎正助、迎英辅来访。

武昌军政府之门柱上有对联，其一曰：“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斯其时矣。”

武昌城内每户悬挂“欢迎得胜”、“汉军百战百胜”等红旗。

湖南长沙府二十二日落于革党之手。巡抚余诚格逃亡，黄忠浩被害。岳州二十三日不战归叛徒所有。宜昌二十日被三十二标、四十一标一部分叛军占领，与岳州相同，不曾用兵。宜昌之叛徒悬挂“复汉排满保教安民”之旗帜。

前自鄂省派至襄阳之马队四百人，抛弃马匹，陆续下汉水，归入武昌之叛军。自岳州归还之鄂军一百〇六人抵达汉口后立即左臂缠白布变为叛徒。

汉口招商局之快利号为叛徒所扣留，撤去龙旗，悬挂占领

旗。招商局遂不得已停止上海、汉口间之航业。

在汉口，汉阳铁政局总办李一琴、交通银行卢鸿章、洋务局委员吴凯元等皆因受革命党压迫而逃避他方。

北京可送来之援军似为第二、第六两镇之半数及第四镇之全部。

备考：三营为一标，二标为一协，二协为一镇。一标之兵数为一千五百人。北洋第一镇为禁卫军，二、六两镇在保定，四镇在天津，五镇在山东，三镇及第二十混成协在满洲。

十月廿五日 晨山口昇、角田隆郎来访。下午出外理发，归途访寺西中佐。归，香月来访。晚出席日本人俱乐部之招待会。鬼头玉如持大连田冈、森之介绍信来访。

九江二十三日不战而归入叛徒之手，四民相庆。命令江上之军舰退去，军舰听命。

安庆、南昌亦于日内可归叛军所有，芜湖、南京一带旦夕不保，若镇江、甯山、江阴等要塞相继投降，则足以制长江之死命，舰队将完全无用，长江以南亦非现政府所有矣。形势如此，武汉之根据地已牢不可动。

叛军着手募集五分利息额面五元之军事公债二千万元。

沙市之形势可危，朝不保夕，驻荆州之旗兵仅五百人。

被调遣至四川之鄂军三十一标一千二百人及三十二标一部分二百五十人，由曾广大率领，在返回武昌途中，或以此兵往屠荆州亦未可知。

叛军虽有日本造野炮三十一门、山炮十一门，但炮弹不充分。五生的七山炮有六十门以上。

汉阳枪炮局之步枪制造数，一般每日三十支，稍添工人可造

五十支至七十支。

北京二、六两镇各半数及四镇全部于十五、十六、十七三日中约略输送完毕，官军之前进部队在祁家湾约驻五千名；在淝口约驻五千名云。

援军中良弼、冯国璋两人亦在内云。

本日下午二时官军五百人以野炮四门前进至第一铁桥，与叛军对峙。

十月廿六日 晨，土佐来访。叛军退至江岸车站，以与第一铁桥之官军对峙。本日虽预定赴下游，但以明日有决战之势，故延期。致函海军吉田大佐、上海加藤、松崎、西本。晚往访司令官畅谈，继与领事夫人稍谈后归。

十月廿七日 六时半炮声起，与香月出登瞭望台。官军自第一铁桥向刘家庙江岸车站一带之叛军发射榴散弹。九时半江上军舰四艘亦开炮攻击江岸。自八时起炮声、枪声与机关枪声相和，有惊天动地之势。叛军以野炮四门排列于车站北侧，与官军应战。十时半叛军败退，官军进占刘家庙一带。叛徒之野炮、山炮皆归北军所有。下午一时半与香月、神崎、土佐、小池等至大智门视察叛军情况。二时刘家庙官军行动，叛徒进兵至赛马场。三时开战，官军布置排炮于刘家庙，叛军据赛马场与铁路线交战。官军乱射机关枪，向左右翼扩展前进。兵数为第四镇之一部分约五千余人，叛军不过二千人。四时半叛军一队迂回至赛马场之西北，官军突进占领赛马场之东北廓，左翼之一队携机关枪猛进，驱逐敌兵，远射迂回部队。叛军大乱，向汉口市街溃逃。六时十分官军完全占领赛马场，炮声始停，叫喊声大起。本日萨提督照会列国舰队司令官，通知自明日下午三时起舰队炮击武昌、汉

阳。本日之战叛军死伤六百名云。

十月廿八日 上午六时武昌方面炮台轰击江上军舰，发炮数十响，军舰三艘应战。七时大智门附近枪声大起，立即登上商团之瞭望楼观战。官军布排炮于万家庙及赛马场东侧，大轰敌军。步兵以赛马场为右翼，左翼沿铁路线以对大智门之敌。叛军据大智门车站与高尔夫球俱乐部一带防线。十时官军一队再自赛马场之西南迂回，拟包围高尔夫球俱乐部及大智门，枪炮之声甚密。万家庙村庄之官军炮兵排列野炮六门（以后为四门）频频向大智门一带及汉口市街发射榴弹。叛军大窘。十一时炮声渐衰。是日枪炮子弹飞来日本租界，毁屋伤人，甚为危险。下午与桔、冈往视在同仁医院之叛徒负伤者。现入院者达五十余名，惨状可怜。三时至湘江丸，与土佐、神崎、角田等饮茶休息。三时二十分军舰海容、海琛、海筹三艘来至日本租界下游，向对岸之炮台开战。叛军以野炮六七门轰击军舰，炮声隆隆，壮观之极，至四时半停止。自炮台发出之炮弹命中军舰者虽有七八发之多，但因系小口径之野炮，不至给与大损害。

晚往访川岛司令官、高洲太助于领事馆告别，归途访冈、鬼头，十一时归。官军已占领大智门，前方一百米处已出现前哨。

【自汉返沪途中】

十月廿九日 本日将乘南阳丸赴上海，收拾行李送至南阳丸。香月来访。十时辞出桔宅，与香月至六码头，登南阳丸。长安、小池、角田、渡边、土佐、宝妻、中地、福岛等来送。大智门西方枪声断续，十一时花楼北方枪炮之声大起，烟焰蔽天，官军频频以榴弹向汉口市街及汉阳乱射，光景惨淡，逃难者络绎于

途。叛军亦据市街及线路防守。官军似自大智门一带，右翼迂回乔口，压迫市街。

下午一时开船。

军舰有海容、海筹、海琛、楚同、江利、江贞、建安七艘，与水雷艇湖鹞合计大小八艘，碇泊于七里河至青山之间。海琛烟囱上有弹痕，为昨日之战所受者也。江岸车站沿江排列有山炮八门、机关枪一挺，以防叛军渡江。江岸与亚细亚油库间之线路下横有叛军尸体二十馀具，毙于二十七日之役者也。回顾汉口，烟焰迷濛。

与神崎、香月、中西淳亮同船，上船后邂逅末永节，本日到此者也。

据同船意大利传教士之谈，昨日自湖南有兵三千名到达武昌云。官军之数为一万五千名，二千名留于孝感。野战医院在孝感及驻马店。官军之师长为王遇甲、马龙标二人。

湖北蕲州、应山一带哥老会员甚多。

孙逸仙之弟在武昌。

夜十一时半抵九江。今晚八时怡和洋行之太生号轮自上海进港时被误认为中国军舰，受炮击三四发，招商局之江孚号亦于自上海进港时，被革命党没收现金三万两云。

当地自二十三日下午十时归革命党占领后，于旧道台衙门设置司令部，团长马姓为之首领，炮台司令官徐某副之。

有谣言谓革命党之军舰若干艘将自新加坡驶来云。

致函川岛司令官、冈幸七郎，又致函熊本家中、《九州日报》社。上午二时半就寝。

十月三十日 上午八时半自九江出发。

炮台二座，备炮八门。

九时四十分过湖口县。炮台、兵营尽悬革命军之白旗。九江地方舟子负贩之徒多以白布缠左臂，标榜为革命党员。

上午十时半过大姑山前，枫林浓淡，秋色可掬。下午三时半抵安庆，我驱逐舰如月号泊于此。中国军舰仅有飞鹰号一艘。

此地亦有革命党约百人潜入，正在煽动军队。巡抚朱家宝为避不虞之变起见，不宿于衙门内。兵士各藏白布一条于衣袋中，事起则即用以缠于左臂，以备变为革命党。人心恐慌，轮船每次下航时，向上海地方避难者甚多。

上午一时抵芜湖，此地稳静如恒。我驱逐舰神风号及中国小炮舰一艘停泊于此。

十月三十一日 上午八时芜湖开船，正午到达南京。神尾义来访。我军舰秋津洲号碇泊于此。神崎、中西在此上岸，乘火车返上海。一时开船。

南京之新军第九镇全部与特科兵昨日奉命移驻南门外秣陵关，统制徐绍桢等及司令部亦移于此。城内以旧式之驻防军及八旗兵警戒，子弹全部保管于将军铁良之手。新军不发子弹。总督张人骏借演习之名，拟将新军送至对岸浦口。新军要求发给演习用之子弹，亦不许。统制徐绍桢以其妻子送至总督衙门作为人质，乞求发给子弹，亦不应。总督曰：新军为用于对外作战者，内乱则可用驻防兵云云。在待遇上，以前厚于新军而薄于驻防兵，今日则完全改变其地位，优待驻防兵而疏远新军。新军之不满虽然达于极点，然以无子弹无资金，不能举事。今似已失其时机矣。若汉口之败讯传来，自然可屏息不动。

南京如一旦动摇，镇江、甯山、江阴三地即可响应，现正

在观望南京之形势。一般人心大为动摇，避难者甚多，商业完全停止，有十室九空之概。

总督张人骏虽然命其他大官巨室将家属尽行避难远地，然其态度仍极为镇静，与平时无异。城门在夜间亦照旧开放。

此地有中国炮舰二艘，旗兵千人。

由南京至镇江途中，遇我军舰最上号溯江而去。四时半抵镇江，町田武次郎来访。

镇江与南京相同，人心恐慌，城内居民十分之七已避难各地，商贾皆罢市，动摇殊甚。新军将士虽欲响应武昌举事，然以无军资、子弹，正密切观望南京之形势。

当地之兵力为第十八协之三十五、三十六两标及驻防队一千、旗兵一千、炮台兵三百，共约五千五六百人。协统杜某，三十五标统敖某，三十六标统陶某。

武昌事变以来，长江沿岸一带成为无政府状态。如镇江亦因盐梟跳梁、避难者中途被要击，掠夺杀伤案件相继发生，人心浮动。八时由镇江开船。

据在镇江所闻，盛宣怀在北京遇炸弹之厄，幸免于死。政府因资政院对盛攻击，同时又拟缓和四川、武昌之事变，因将盛革职永不叙用。其邮传部后任已推唐绍怡。泽公称病，已请假。

广州将军凤山于赴任广东之日死于炸弹。

政府发出速开国会及湖南、湖北两省减租之上谕，努力抚慰民心。

【在上海】

十一月一日 正午抵上海。井手、岛田、西本、松崎、木

幡、列来迎。访有吉于领事馆，稍谈后归。内人前月二十八日到达上海云。发出致海军报告。致《九州日报》社及熊本家中书函。下午访加藤于丰阳馆。陆军大尉丸山丰、木村恒夫以及若林龙雄、谷舞福松、铃木真一、副岛、佐原先后来访。

十一月二日 上午上野真正、冈来访。往访河野久太郎，交付桔委托兑换之银一百元，归途访本庄于东和洋行。下午河野、香月来访，共出往访佐原不在。往访本庄，又访加藤。发出致海军电报。与春日号舰长谈话后归寓。晚篠崎、佐佐布、水上来访，至领事馆会见本庄、丸山。

黄兴之子黄一欧为主谋与会员二千人昨日议决于一星期内占领江南机器局及吴淞炮台。武器有手枪二百五十支、炸弹一百枚。

黄兴已于二十九日抵达汉口。宋教仁亦在汉口。

十一月三日 天长节，晨至领事馆参拜天皇玉照。向海军发函件。致函北京伊集院公使、石川半山。致函川岛司令官。

据闻革命党将于下午六时以黄一欧为首举事，先占领高昌庙之江南制造局，再占吴淞炮台。五时派西本前往侦察实况。六时半^①西本来电话谓七时^②占领全局，已推李平书为该局总办，并树立革命旗帜，揭贴告示云。

道台衙门及城内各衙门亦被占领，道台衙门已被焚毁。

木幡、副岛、本庄、井手友等来访。

十一月四日 上午访本庄，北某在座。午饭后三人乘马车至江南机器局，视察革命党占领之状况，又至龙华火药局一览后归。

①② 原文如此，二者当有一误。

上海商团、巡警、巡防兵之来投革党者门庭若市。安达隆成持森井国雄之介绍信来访。下午往访加藤。发出致海军信。夜香月、河野来谈。

十一月五日 上午村上、松元势藏、加藤、安达隆成来访。因安达事、致函汉口第三舰队增田参谋。下午往访加藤、冈本柳之助、浮田等。于丰阳馆邂逅桔三郎，本日到达上海云。神崎来访。

机器局之步枪一万支、子弹三百万发、哈乞开斯重机关枪三十挺被革命党掳获。该局制造步枪能力每日三十支、步枪弹二万发。

福州、苏州、杭州、松江等地于昨今两日投降革命军。

十一月六日 上午会见上海革命党首领黄一欧于松崎洋行，年二十岁，有胆量。下午相良、岛田数，井手友来访。下午访有吉于领事馆，归途访加藤、《上海日报》社。晚香月、河野、志保井，佐佐布、川本彭夫及同文书院学生二人来访。

十一月七日 正午至博爱丸迎接绪方二三、小早川秀雄、平山岩彦、古庄稻至丰阳馆，稍谈。下午访北辉次郎后返寓。绪方、古庄、平山，小早川来访。六时应井手邀请与诸人同至杏花楼，九时半归丰阳馆。访加藤，与绪方、列稍谈后返寓。神崎、藤井等曾来访云。

十一月八日 早餐后与本庄等三人至小东门内旧海防分府之革命党军分府，会见都督陈其美（英士）、参谋黄膺白（黄郛）。陈，湖州人，年三十七岁，温厚之人也。

沪军都督 陈其美（英士），湖州人，三十七岁。

军政总理司令官参谋 李燮和

军政副理参谋 陈汉钦（决死队长）

参谋 黄膺白、章 梓、李显谟、杨谱笙、钮建章、沈 虬、

叶惠筠、王熙普

军政府民政部长 李平书

军政府外交部长 伍廷芳

军政府财政部长 沈缙云

满洲朝廷有迁至蒙古张家口之说。

十一月九日 由正金银行取来存款一百元。访土井市之进于东和洋行，彼本日趋福州。

十一月十一日 向海军军令部发出报告。

十一月十二日 上午本庄繁、平井德藏、甲斐靖先后来访，平井谓将赴厦门云。

十一月十三日 向海军发出时局报告。晚访加藤、平井。至南阳丸送甲斐、桔等赴汉口，十一时归。海军送来赴汉口旅费四百日元。

十一月十四日 访平井德藏、有吉、本庄、〈上海日报〉社。送出致外务省之〈对时局意见书〉。

十一月十五日 上午姚文藻来访。

今晚上海革命党派兵三千名进攻南京。

南京有张勋部下七营、铁良之旗兵一千二百名、张会鹏部下七营及其他合计约二十营。

滦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似与革命党声气相通，并与赵尔巽、岑春煊等有联络，与袁成对峙之势。梁启超之赴奉天，系与赵督会商对抗袁氏之策者也。

十一月十七日 向海军发出报告。

南京张勋之兵力以江防营七千人为精锐。官军有江、浙两省之兵力一万人、野炮十八门、山炮四十门。

下午往访有吉、加藤。六时赴本庄少佐宅宴会，来会者井户川辰三、黄一欧及其他两大尉。九时散。

十一月十八日 送出致《九州日报》社通讯。本庄少佐、原口新吉来访。发出致川岛司令官、军令部报告。派安达隆成至碇泊于南京之军舰秋津川号任翻译。晚学习谣曲《钵木》，归途访问北于松崎，本日与宋教仁一同自南京到达云。

十一月十九日 下午二时乘三井会社之小汽船至满洲丸，面会舰长向井弥一大佐，并迎接自安庆避难来沪之巡抚朱家宝及自汉口避难来沪之汉阳制铁所总办李维格，二人均旧友也。五时与向井、森山两舰长及加藤一同返寓。

十一月廿日 四时与井户川、本庄、北三人会见宋教仁。宋，湖南人，年三十四五岁，为革命党中次于黄兴之人物，有才略。五时半散。六时访前岛彪于松崎洋行，本日从福州归来者也。

十一月廿一日 上午写报告送海军省。田添夫妇、李维格、高木陆郎、山井格太郎来访。午送前岛真归国，给以致外务大臣内田康哉之介绍信。

十一月廿二日 下午访瞿鸿禛于东和洋行，昨日自湖南到此者也。

十一月廿三日 上午至邮政局，寄二百日元至熊本家中。至领事馆访古谷、有吉，领取九月至十月经费及十一月部分经费，以十一月份津贴交给西本、松崎两人。下午访加藤、中井喜太郎于丰阳馆，归途留名刺于李维格寓。汉口岩田来信。桔送来前月

廿九日大智门之战中革命军所发射之炮弹壳。晚赴北河南路陈公馆出席李维格之宴会，同席有春日号舰长、加藤中佐、高木陆郎、陈荫明（止澜）、王勋、陈焕文及另一人。

本日经美国传教士之手以银十七万元贷与上海革命军军政府。该款所有人为美国某律师云。

九时辞出陈公馆，森山舰长、加藤中佐来谈。

十一月廿四日 发出致海军函件。近藤、竹下来访。中久喜信周来访，自华北归来者也。

十一月廿五日 致函海军吉田大佐。

十一月廿六日 下午古庄韬、安河内弘来访，古庄今日自汉口归来者也。晚加藤壮太郎来访，六时与加藤同赴六三亭之会，有对马、春日、津轻、敷波四舰舰长等二十余人。

十一月廿八日 有电报谓：昨日汉阳革命军大败，汉阳全部归官军所有。叛徒溃乱，逃至武昌，死伤甚多云。溃败之原因为湖北、湖南两军不和，总司令黄兴已向上海逃亡。又一电曰：武昌叛军亦不战而溃，黎元洪有逃走之说，但武昌尚未陷落云。

上午往访加藤，发出致东京电报。归途至松崎访北后归。下午致函海军。访有吉、本庄于领事馆，归途访加藤。昨日收到安河内交来四月至九月利息二百七十日元。

十一月廿九日 上午往访邮政局、本庄后归。下午河野、井手来访。松仓、军令部来信。晚狄葆贤来访。

十一月三十日 上午往访加藤，发出致海军电报。

革命党之计划决定攻下南京作为根据地，推宋教仁为总理、黄兴为元帅。武昌黎元洪与官军停战妥协之事，革命党不予承认云。

十二月二日 晨六时半至弘济丸，发出致海军报告，并与五百木告别。

黄兴昨日下午自汉口到达，投宿于胜田馆。上午到三井访山田纯三郎，到河野访大仓，归寓后收到本田清人、今村直夫来信，并收到海军送来本年临时津贴三百日元。

南京城本日上午十时半陷落，总督张人骏、将军铁良逃至碇泊于下关之军舰秋津洲号云。张勋及其部下均逃往浦口。

十二月三日 访浮田、冈本、本庄于领事馆，又往访加藤、小越平陆，归寓途中遇绪方二三、平山岩彦自汉口归来，即同至东和洋行，与绪方等谈至四时归。六时半与内人同赴春日丸出席伊东米治郎之宴会，同席者有浮田、藤濑、儿玉、本庄、村上、江崎、黑川等，十时散。姚文藻、汪甘卿、松元势藏，山根倬三等曾来访云。

天津镇总兵张怀芝率兵六千（混成协）南下赴援南京，本月一日在浦口至六合间与革命军冲突，击破革命军，掳获山炮二门云。

十二月四日 上午往访姚文藻，十一时至东和洋行，又至《上海日报》社、领事馆。

十二月五日 致函海军。致函军令部牛田副官、吉田大佐。

十二月六日 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于南京陷落后逃至我军舰秋津洲号，将先乘明日之西京丸赴大连，然后至北京，因此派西本省三送至大连。交旅费一百五十元给西本。

十二月七日 六日发出上谕谓摄政王退位，世续、徐世昌二人为太保，辅弼皇帝，行政之责任由国务大臣担负云。

十二月八日 海军送来明年一月至三月津贴六百日元，即寄出津贴收据。

十二月九日 送出致海军报告。下午西本来电报谓平安到达大连。往访领事馆、加藤、小越、鬼头玉如等。六时半赴有吉领事邀宴，同席有竹越与三郎、井户川辰三、本庄繁、浮田、冈本、西田等，十时散。

十二月十一日 上午至篠崎（医院）诊查眼睛，并看望入院中之宫崎寅藏，稍谈后往访加藤、有吉。

十二月十二日 下午发出致海军报告，归途访井户川辰三于礼查饭店，又到东和洋行访平山、绪方后归寓。晚河野、香月来谈。军令部牛田少将、吉田大佐、野满、波多来信，西本有三自大连来信。

十二月十三日 古庄弘来访。正午有吉领事邀至新六三午餐，井上雅二在座，彼本日到达，将赴新加坡者也。访平山、绪方、郡岛等于东和洋行，谈话后归寓。晚出席新六三之会，同座有井户川、前岛真、河野、香月、绪方、泽本、冈田晋、土井、吉原洋三郎等，竹越与三郎、宫崎寅藏、小池信美等亦来会，十一时散。

十二月十四日 上午至领事馆访有吉，归途又访加藤后归寓。下午访绪方、平山。绪方将赴香港，交其带去致孙逸仙之介绍信，因孙将于二十二日到达香港。又至领事馆，领取十一月份之经费。送绪方至税关码头后归寓。

十二月十六日 上午六时至邮船会社，投交致海军之报告。

日一

十二月十七日 三时访平山、大原武庆。至胜田馆访木村丑

德、小泽德平、户牧等，木村、小泽为二十余年之旧交，即将赴南京、四川者也。

本日下午二时半北京之媾和使唐绍怡、杨士琦一行七十余人（其中各省代表二十二名）自汉口乘洞庭号到达。伦敦《泰晤士报》北京通讯员玛理逊博士亦同路到达。

十二月十九日 晨加藤、木村两中佐来访，平山、小越来谈。午波多自北京抵达，二时与波多至领事馆，介绍波多。访加藤中佐。晚加藤为东道主，与最上号舰长武田、高洲太助、佐原笃介、前田彪等会餐于新六三，九时散。

十二月廿日 关于媾和谈判，本日商妥自二十四日起各地延长停战一星期。

十二月廿一日 上午辻武雄来访。下午四时赴六三亭之会。以自武昌来此之媾和谈判代表胡瑛（湖南桃源人）与黄国康（晋夫，长沙人）、余长辅为主要宾客，以及犬养毅、寺尾亨、副岛仪一、井户川辰三、末永节、吉田某、平山岩彦等，十时散。出门时逢增田高赖、加藤壮太郎，畅谈至十一时归。

十二月廿二日 井手友喜来访，交来本年份利息。致函北京高尾亨、奈良一雄，介绍辻武雄。下年邮寄三百日元至熊本家中。在有吉领事处与外务省参事官松井略谈，归途访本庄、加藤、增田，五时归。晚访井手、辻。

十二月廿三日 上午姚文藻、辻武雄来访。十时半至春日丸送竹越与三郎、增田高赖等归国。发出致海军报告。至《上海日报》社访辻。在加藤处午餐。至东和洋行访平山岩彦。与胡瑛、黄国康等稍谈后归。

十二月廿五日 晨闻绪方自香港归，往访之。至领事馆与有

吉、松井稍谈。访加藤，拍电报至军令部。与宫崎寅藏晤谈后归。合原金作、渡边某来访。访绪方于丰阳馆。六时半赴月迺家出席胡瑛邀宴。宾客有犬养、寺尾、副岛及其他六十余人。九时半乘河野之马车归。孙逸仙本日抵达。

十二月廿六日 上午绪方、平山、宫崎寅藏、山田纯来访。下午发出致海军报告。往访领事、本庄、加藤后归。晚北来访。

十二月廿七日 上午众议员福冈精一、北先后来访。至东和洋行与绪方、平山赁马车至法大马路四〇八号访孙逸仙。彼二十五日自美国归来，不相见已十二年，谈话少时握别。归途访头山满于丰阳馆、尚未抵达，遂返东和。

十二月廿八日 上午合原金八、水上喜代人、冈田晋、崎元大尉等来访。崎元自北京携松本菊雄之介绍来访。下午至正金银行领取存款。至丰阳馆访加藤中佐、头山满、犬养毅等。

十二月三十日 四时半赴孙逸仙、黄兴等主持之茶会，出席者张继等三四人及日本人五十人，黄、孙二人迟到约二小时。

一九一二年

【在上海】

一月二日 七时半至邮船会社送出致海军之报告两件。九时至弘济丸迎接小川平吉。海军送来去年临时津贴二百日元。

一月三日 六时半赴六三亭出席正金银行儿玉之邀宴，同席有西洋人一名及有吉、松井敬四郎、佐原、井手等。九时半辞出，

往访加藤。

唐绍怡辞去媾和使之职，以后由袁世凯自身以电报与伍廷芳进行交涉。

直隶滦州第四十镇之四十旅叛变，奉天北京间火车不通。

一月六日 发出致海军报告。下午发出致海军报告。下午访小川于东和洋行，又至领事馆访加藤后归。时报馆送来去年六月至十二月报酬三百元。

一月八日 午后至领事馆领取十二月份经费。归途访加藤、小川。六时赴领事馆出席有吉领事邀宴，来宾有头山满、冈本柳之助、柴五郎、冈崎国助、小川平吉、寺尾亨以及当地重要人物二十余人，十时散。发出致海军报告。

一月九日 晨送小川平吉、波多博赴南京。

一月十日 发出致海军书函。

一月十四日 吉田来访，日内将与北伐军同赴山东云。

广东兵二千名由刘某率领，乘军舰三艘，运输船三艘在芝罘上陆，计划先使山东取消独立，再进而由济南攻击在徐州之张勋之背后，一周以后，胡瑛将赴山东任都督云。又称：一月初有机关枪五十四挺运到，以三十挺送南京，二十四挺送武昌。日内将有价值三百万日元之武器、弹药输入云。

一月十五日 上午崎元、兴津来访。下午往访有吉、本庄、加藤。六时至新六三赴加藤邀宴，出席者有由西安避难来沪之教员铃木直三郎等五六人以及最上号舰长武部、浮田及余，十一时散。

一月十七日 晨，至邮船码头迎接外波海军少将一行。至丰阳馆访外波、加藤。头山满来访。

一月十八日 晨送外波少将一行赴南京。下午一时送井户川赴南京。六时赴新六三出席本庄邀宴，十一时归。波多自南京归来。

一月十九日 下午访头山满于北四川路，正午归。下午至新马路登贤里访姚文藻，四时归寓。桔三郎、高田先后来访。

一月二十日 发出致海军信函，上午送町田大佐归国。

一月二十一日 下午至新高号军舰，访川岛司令官。晚赴新六三出席枋内海军军务局长之邀宴，同座有川岛司令官、谷口参谋、外波少将、吉田大佐以及新高、龙田、满洲三舰舰长，十时半归。佐佐布自南京来电报。

一月廿二日 上午九时与加藤至满洲号访枋内少将、吉田大佐畅谈，共进午餐。乘下午三时便船归寓。

一月廿三日 下午送秦长三郎归国，归途访有吉、本庄，至东和访柴五郎、冈田晋太郎。晚至六三亭赴有吉领事邀宴，以川岛司令官、柴少将、枋内少将、外波少将等为主要来宾，以及吉田增次郎大佐，新高、满洲两舰舰长，谷口、寺岛、加藤、本庄、权屋、佐藤安之助等海陆军人，各会社分行长约三十人，九时半归。

一月廿四日 七时四十分送枋内少将、吉田大佐赴南京。

一月廿六日 姚文藻来访。致函村山正隆、山口升、海军。郑永昌、绪方二三来访。下午至丰阳馆与川岛司令官、谷口参谋、加藤中佐会餐，九时半归。

一月廿七日 下午至东和洋行访郑永昌、冈田、郡岛，又访河野后归寓。

一月三十一日 下午至领事馆领取一月份经费，归途访加藤、

〈上海日报〉社。姚文藻来访。

二月二日 发出致北京川岛电报。访加藤、外波。至南阳丸迎接枒内少将、吉田大佐，至丰阳馆，共进午餐。六时至六三亭赴外波少将邀宴，来会者三十四人，十时归。

二月三日 上午送枒内少将至筑前丸归国。又至华德路访井户川、绪方，午餐后与绪方一同出外后归寓。晚赴丰阳馆出席吉田大佐邀宴，十一时归。北京松本来电，译电至上午二时就寝。

二月四日 晨，吉田大佐归国，送至税关码头，归途访加藤。

二月五日 发出〈九州日报〉通讯。下午访加藤。

二月六日 下午送荻野元太郎归国，归途访加藤、井出，到东和访冈田，归寓后神尾茂来访。高桥谦自北京来信。

二月七日 终日在家写报告。

二月九日 发出致海军报告。晚送井手友喜归国。

二月十二日 上午自同文书院领取至去年十二月为止之利息。

本日清朝皇帝退位，改为共和政体。发出上谕命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军妥协，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二百六十七年之君主国亡于本日。

二月十五日 致函海军及熊本平山岩彦等。下午若林来访，至〈上海日报〉社会见杨绍寅。姚文藻来访。

二月十六日 致函海军。送出致东洋协会门田正经之报告书。

二月十七日 十一时参加海军主办之射击赛，得二十四分，在郊外午餐，四时散。

二月十八日 下午村山正隆来访，同出往狄平、姚文藻处贺年。

二月十九日 晨八时半乘小汽船至军舰满洲号，与舰长畅谈，午餐，归途往访旗舰新高号谷口参谋，三时辞出，往访加藤、龟井。

二月二十日 上午田锅安之助来访，本日自大连抵此云。

二月廿一日 晨，副岛八十六来访，本日抵此云。上午往访加藤、龟井、田锅、七里于丰阳馆，一时归。

本日南京临时政府以蔡元培为正使（教育部总长），由外交部次长魏宸组、参谋次长钮永建、前议和参赞汪兆铭、法制局长宋教仁、海军部员刘冠雄、陆军部员黄可凯、陆军军需局长曾昭文、武昌外交司长王正廷等人随行，唐绍怡以民国外交全权代表名义参加，同赴北京进行交涉，将迎袁世凯来南京云。

二月廿四日 发出致海军信。下午真岛次郎及熊本县学生八九人来访。至东和洋行访副岛八十六。

二月廿五日 晨与香月乘电车至徐家汇，访古庄弘于制革公司。猎于近郊，一无所获。六时乘电车归。致函福州前岛真、南京绪方二三。

二月廿九日 上午田锅来访。下午访原口博士于东和，又往访有吉，至丰阳馆访加藤、桔等。

三月一日 下午井手三郎、松村辰喜、船津辰一郎来访，船津本日自香港到此，明日归国云。六时发出致海军报告。在领事馆会见有吉、浮田、藤濑、伊东、外波、加藤等。赴军舰新高号出席川岛司令官邀宴，十时散。

三月二日 晨，井手、松村赴汉口，送至车站。

三月三日 上午送龟井陆良赴满洲，外波少将、西本赴福建。下午安河内来访。晚香月、河野、佐佐布、波多来谈，共进晚餐，十二时散。

三月四日 发出致海军报告。

三月五日 上午送门野至船上。自正金银行领取三百元，访加藤后归寓。

三月六日 下午访领事馆、加藤、冈田、柴，归寓。发出致海军函件。邀请佐佐布、波多晚餐。

三月七日 海军送来四月至六月津贴，寄出收据。

三月九日 晨，冈田晋太郎赴北京，送至盛京号轮。归途访《上海日报》社、加藤。推荐井上男也为军舰鸟羽号翻译，以介绍信致谷口参谋。访村山，会见姚文藻、汪甘卿。

三月十一日 上午访领事，领取二月份经费六百二十日元，归寓。本庄少佐、井上男也来访。

三月十二日 自正金银行领取津贴四百日元后归寓。下午访加藤、井出、七里，四时送七里、副岛、原口至春日丸后归寓。晚出席佐原邀宴，同席有川岛司令官、新高号舰长、谷口参谋、桂少佐、加藤中佐等。

三月十六日 上午发出致海军报告。

三月十七日 下午至丰阳馆访练习舰队司令官加藤少将、船越参谋等，一时半对海军候补生一百五十余人讲演中国情势一小时余。加藤、川岛两司令官及各舰长、参谋均出席，四时终了。

三月十九日 昨夜城内有兵士暴动，原因为不发饷，本日又有报告谓吴淞有兵七千人亦因不发饷而在吴淞市镇内掠夺。

上午至弘济丸送田锅安之助归国，又至加藤处稍谈后归寓。

三月二十日 正午至大庆楼出席海军候补生欢迎会，二时散，至《上海日报》社访井手三郎，本日自汉口归来者也。京都大学石川一来访，携有狩野直喜之介绍信。练习舰队司令官加藤送来香烟五箱。晚出席海陆军联欢会，有加藤、川岛两司令官，柴少将、各舰长以及士官等合计七十余人，九时归。

三月廿一日 晚至六三亭赴头山满邀宴，到者约四十人，九时半归。

三月廿六日 上午起草致海军函件。下午送犬养毅归国。

三月廿七日 上午访头山满。白岩龙平本日到达。下午历访加藤、桔、市原、松岛、白岩等。晚至新六三出席头山满之送别会，到会者有井手、白岩、河野、香月、古庄、秦、青木、泽本、郡岛等，九时半归。

三月廿八日 下午至丰阳馆访竹下勇大佐一行，六时至新六三出席加藤邀宴，同座有竹下大佐、川岛司令官、谷口参谋、山川参谋、中村少佐、井手、井出、佐原、有吉等，十一时散。

三月廿九日 晨访白岩、村山，又往访竹下大佐，畅谈时事。正午宴请竹下大佐一行及加藤中佐于杏花楼。

三月三十一日 下午河野来访，往约井手后三人同至新高号军舰，晤川岛司令官、谷口参谋、榊原舰长，五时辞归。六时与井手、佐原乘电车至有吉领事官邸晚餐，同席有川岛司令官、竹下大佐、榊原大佐、满洲号舰长奥田大佐、谷口参谋、寺岛、井出两少佐、中村少佐、山川参事官、浮田、冈本、井手、佐原等，九时半散，乘电车归。

四月一日 晨七时半送竹下大佐一行至车站，波多同路至南京，一行将经由汉口、长沙赴北京。下午访加藤、有吉，自领事

馆领取三月份经费六百二十日元后归寓。

四月三日 唐绍怡于南京组织共和内阁，临时大总统孙文辞职。本日下午唐、孙两人自南京到达上海。

四月四日 井手三郎、秦、川内先后来访。井手友来访。晚香月、河野、桔、波多、川内来访，长谈至半夜始散。

四月五日 宫崎寅藏、山田纯、菊池某来访。下午宫崎民藏、井手三郎来访。

四月六日 加藤壮太郎来访。发出致海军报告。下午送井手三郎、井出少佐、板谷大尉、小山田剑南等归国。

四月八日 访外波少将于丰阳馆，本日自福州归来者也。西本自福州归来。

四月九日 下午至〈上海日报〉社，三时半至弘济丸送伊东米次郎归国，彼将至英国伦敦任职。

四月十日 下午访领事馆、加藤。发出致海军报告。

四月十二日 发出致海军报告。下午访领事馆、加藤。

四月十六日 送小越平陆归国，归途访外波少将、桔三郎。本庄少将来访。

四月二十日 上午访有吉，送木幡恭三夫妇归国。至丰阳馆访加藤、外波后归寓。推荐村松虎雄为军舰翻译，以致谷口参谋之介绍函交与村松。

四月廿三日 长春川口市之助来电报，谓商业失败，求代筹三千元，即复电并另函戒饬其将来。

四月廿五日 下午加藤、秋元来访，秋元少佐到此继任井出之职。晚东和主人来访，谓昨日有日本人三四人在其旅馆二十二号室内共谋骗取宝石，绞死一中国人云。

四月廿九日 上午至领事馆领取四月份经费六百四十日元，归途访松崎，交付本月津贴，又以津贴交付西本、波多。

四月三十日 发出致海军报告。下午佐原、安河内、村松来访，安河内送来本年一月至三月底为止之利息一百三十五元。

本日北京电报：为回避四国公使之强硬抗议，已誓言取消比利时借款之前约，但向六国财团要求先供给三千五百万两，以救燃眉之急。财团提出贷款之条件为在中央设立财政监督官及管理盐税与海关均归外人掌握，并由公使馆武官调查军队供给之实况以为监督。

五月一日 上午访波多、姚文藻，稍谈后至静安寺路访村山正隆，午餐后归寓。

五月二日 译稿送海军。

五月三日 译稿送海军。

五月六日 发出致海军报告。

五月七日 译稿送军令部。

五月八日 晨，往迎新司令官名和，因轮船迟到，在加藤处早餐后归寓。板屋清宽来访。下午至筑后丸欢迎名和少将，在丰阳馆稍谈后归寓。

五月九日 五时访加藤，同赴军舰新高号之宴会，主人为名和新司令官、川岛少将，十时散。

五月十一日 九时至新六三赴名和、川岛两少将邀宴。中国前南北洋水师总统^①萨镇冰亦在座，十二时归寓。

五月十二日 下午有留重利及第三舰队司令官名和、新高号舰长榊原、加藤中佐来访。

^① 原文如此。

五月十四日 下午访宫崎民藏，不在，与尾崎、宫崎寅藏、白岩等略谈。何天炯、熊越山亦来会。在加藤处与名和司令官、谷口参谋、榊原舰长等交谈，五时归寓。

五月十七日 致函海军。

五月十九日 五时至丰阳馆赴名和司令官晚宴，与加藤中佐三人长谈，九时归寓。柴少将来访。

五月廿一日 下午欢迎侍从武官长中村中将，归途访村山，不在。同文书院山本熊一及另一人来访，请于星期六该院之演讲会上发表演讲。

五月廿二日 致函海军。

五月廿四日 致函军令部。

五月廿五日 下午一时丰岛捨松返北京，送至车站。在佐原处与辜鸿铭三人会餐，又往访本庄、宫崎，至丰阳馆与加藤略谈后归寓。

由我东亚兴业会社向江西铁路贷款五百万日元，订立草约。

五月廿七日 译稿送往海军。

五月廿九日 致函军令部。下午至领事馆，领取本月份经费六百四十日元，其中二百日元邮寄至熊本家中，波多、松崎、西本三人之津贴交给波多。

五月三十一日 晨送鸟巢少佐、伊东米二郎赴欧洲。发出致海军通信。

六月二日 译稿送海军。

六月三日 六时赴山田宅，出席宫崎寅藏晚宴，同座者为宫崎、山田、本庄、岩本千纲等，十时半归。

六月五日 晨，山本少佐赴汉口，送至车站。吉田大佐、增

田中佐来信，增田将继加藤之后常驻上海，即复函增田。并将译稿送致吉田大佐。

本日下午高昌庙谭人凤之兵与第九旅之兵发生小冲突。

六月七日 译稿送海军。至《上海日报》社，五时半归。

六月八日 下午访佐原、加藤。五时半至新六三出席加藤、浮田之送别会，同席有白岩、河野、村上、篠崎、神崎、远藤、井手、佐原等，十一时半散。

六月十日 至邮政局领取本日送来之七、八、九三个月津贴。李泉溪自南京来信。

六月十四日 昨日时报馆送来去年十二月至今年四月之报酬二百五十元。

六月十五日 黄兴于十四日将留守府事务移交给程德全，废除留守府。本日留守于南京之黄兴辞职来上海。

六月十六日 上午加藤中佐来访。下午与加藤一同往访龙田号军舰原舰长，畅谈至四时归。加藤明日出发归国。

六月十八日 晨，根津一来访，长谈至午。

六月廿二日 正午赴杏花楼出席山田纯三郎之宴会，同座有同盟会重要干部徐绍桢、吕志伊、曾昭文、何天炯、戴天仇、陶铸、廖国仁、姚志强、王夏、陈方度等三十余人，二时半散。归途至篠崎处诊病。与津田武、波多、西本会餐，九时送津田后归寓。津田自云南归来者也。

六月廿三日 上午与加藤中佐至新高号旗舰访名和司令官。

六月廿四日 上午宫崎民藏来访。廖国仁来请帖今晚邀宴于雪花亭，六时前往，同席有何、邓、邝、李、吕等十余人。甚热，八时归。

六月廿六日 海军送来本年度第一次机密费三百日元。

六月廿九日 上午加藤壮太郎、角田隆部归国，送至春日丸。领事馆送来本月份经费六百四十日元。岛田数雄来访，下午有留重利来访，推荐其为新高号军舰之中国语教师。船津辰一郎来访。致函安藤新太郎。候补领事官冈本武来访，彼将转任至长沙。晚赴六三亭出席本庄少佐邀宴，来客有黄兴、何天炯、曾昭文、杨某以及与仓大佐、增田、板谷、林、有吉、宫崎、山田、白岩、根津等，十一时半归。

六月三十日 盐谷温、松崎、秋元先后来访。下午二时乘马车往同文书院参加第九届毕业式，六时半归。七时赴六三亭出席汉口驻屯队与仓司令官邀宴，十一时归。

七月一日 领取本年度机密费三百日元之收据寄交近藤副官。发出致军令部通信。

七月二日 七时至东和访与仓大佐、板谷大尉，又自邮船码头乘八时半小汽船至新高号军舰，与名和司令官、谷口参谋、榊原舰长交谈，十一时归。访有吉，稍谈。复函川口市之助、阿南镇民、姚文藻。

七月三日 下午至邮船会社购买长崎来回船票，四十五日元。

七月五日 向海军发出关于中国政党之调查报告。归途访有吉、古谷、西田、增田、高仓等告别。六时赴宸虹园出席河野邀宴，来宾有黄兴、徐绍楨、李平书等中日人三十余人，九时半辞归。访佐原稍谈后归寓。

七月六日 正午将行李送至船上，二时半登筑后丸，与根津一同室，同船者有黑川新次郎、匝嵯少佐。三时十五分开船，五

时出吴淞口。

【在日本】

七月八日 上午十时入长崎港，检查后与根津分别。在税关与黑川、匝瑳握别，检查完毕后至土佐屋旅舍，时下午零时半也。致函宫崎寅藏、波多、松崎、西本、小早川等。

七月九日 十二时二十分到达上熊本，河口、田中、龟雄等来迎，一时归至新屋。

七月十一日 上午至肥后银行分行存入八百日元。

七月廿七日 下午二时应东亚同志会邀请，至物产馆会议室与上田仙太郎各发表一场演讲，听众四百余人，五时終了。

七月三十日 本日零时四十三分天皇薨。

七月三十一日 本日起改元大正。

八月六日 上海波多来信并送来七月份一百三十日元。

八月十六日 上午二时上海增田中佐来电谓村松虎雄病死于大治。

九月三日 上海西本省三，有留重利来信。西本自外务省津贴中寄来一百五十日元。

九月四日 海军军令部近藤副官送来十月至十二月份津贴六百日元。

九月十日 增田高赖来信，将溯航四川云。小山逸平、最上国藏、军令部来信。

九月十六日 上午至坪井邮政局领取上海寄来之一百五十日元。

九月二十日 上午六时乘车至上熊本车站，送上田仙太郎赴

俄国。

十月三日 下午二时离土佐屋乘车至税关埠头，乘小汽船至开往上海之近江丸。四时开船。

【在上海】

十月五日 上午八时抵上海，驱车归寓。十时往访有吉、金方、村上、古谷、本庄、岛田数等，又至丰阳馆访秋元少佐，在秋元处午餐后归寓。松崎、西本、有留、佐佐布等来访。发出致海军函，提出对岑春煊赴福建始末之意见。本庄少佐来访。夜佐佐布来访，十一时半归。

十月六日 上午佐佐布来访，桔三郎来谈。十时访村上夫人，稍谈后归寓。午访河野久太郎，又历访岛田数雄、宫崎寅藏、尾崎行昌、远藤等。

十月七日 晨，河野久郎、宫崎寅藏、尾崎行昌来访，松崎、迎英辅、甲斐靖等来访。下午一时青木少将返北京，送至车站。

十月九日 上午十时乘电车至徐家汇路访孙逸仙，畅谈至正午始归。下午访有吉、《上海日报》社、桔三郎。晚宫崎寅藏病愈，被邀至其寓所祝贺，同座有村井启太郎、秋元少佐、中野熊五、甲斐靖、末永节、西田畔一、山田纯、尾崎行昌及主治医师二人，饱食甲鱼火锅，十时归。

十月十二日 发出致海军报告。晚赴六三亭出席三菱会社中岛之邀宴，以孙逸仙、黄兴为主宾，同座有日本人七八人，十时散。孙文将于十七日赴南昌云。

十月十五日 译稿寄送海军。

十月十六日 致函海军。

十月十七日 致函汉口山座圆次郎，告以在长沙与黄兴会见时应注意事项。

十月十八日 写报告，晚至邮政局投寄。送宫崎寅藏归国。

十月十九日 下午姚文藻来访，畅谈移时归。

十月二十日 下午名和司令官来访，长谈后约司令官乘电车至雅叙园晚餐，八时步行归。姚文藻来访。

十月廿一日 致函清浦奎吾、岛居赫雄、根津一，告以孙逸仙将赴日本事。下午访本庄，遇中野二郎，昔年之同志也。姚文藻来请帖。

十月廿二日 上午外出访秋元少佐时，姚文藻曾来访。下午访姚文藻长谈，晚赴汇中饭店出席姚之宴会，同席为郑孝胥、沈耕莘、西本三人。

十月廿三日 外债表送海军。海军来信。

十月廿九日 上午送名和司令官归国。自领事馆领来本月份经费。

十一月三日 上午与河野、桔同车至领事官邸访山座圆次郎稍谈，访孙逸仙后归寓。三菱送来日前与孙文、黄兴等共摄之照片。

十一月四日 发出致海军函。

十一月五日 下午一时宫坂九郎赴重庆，送至车站。

十一月八日 三时冒雨乘电车至宝昌路访孙逸仙，稍谈后归。

十一月九日 六时访尾崎，又至领事馆出席议员招待会，众议院议员有守屋此助、三土忠造等十余人，中国人方面有孙逸仙、张謇、熊希龄、陈其美、虞洽卿、李云书^①、周廷弼、朱某

^① 疑为“李平书”之笔误。

等中日人共约五十人，十时半散。

十一月十一日 今晚孙逸仙招宴于惠中饭店，国民、共和、民主三党之代表及新闻记者等，中外人合计共一百四五十人，散席后一同摄影。

十一月十六日 下午一时出席同文书院之演讲会，就中国之政治情况演讲达一小时以上，六时归。

十一月廿一日 上午与井手乘电车至宝昌路访孙逸仙，不在；归途访姚文藻于新马路，稍谈后，正午与井手午餐于雅叙园。

十一月廿八日 姚文藻伴恽毓昌来访，谈话移时辞去。

十一月廿九日 民国陆军大将王芝祥送来明晚招宴之请帖。

十一月三十日 上午自领事馆领取经费，至《上海日报》社，正午归。下午四时与井手出席姚文藻之招宴，同座有恽毓昌、胡二梅、巢某。七时辞别姚氏，至静安寺路一一一号王芝祥寓所出席王氏招宴，同席为有吉、榊原、谷口、增田、儿玉、石井、河野、金万、村上、张继、本庄等七八人，九时散。

十二月二日 访孙逸仙于五马路，稍谈后归。

十二月七日 正午恽祖祁及其子恽毓昌、姚文藻来访。恽，常州阳湖人，年七十一岁，号心耘，又号莱叟，有志之士也。海军送来一月至三月份津贴六百日元（其中二百元送熊本）。

十二月十日 发出致海军报告。中午送堀田舰长、和田大尉归国。发出致东洋协会报告。下午对马号舰长平贺德太郎、秋津洲号舰长西尾雄次郎、海军参谋谷口尚真、海军中佐增田高赖、海军大尉津田静枝来访。陆军少佐本庄、陆军少佐斋藤恒来访；斋藤自北京来，将接任本庄之职。

十二月十一日 起草报告完稿。晚赴二马路华庆园出席栗生洋行之招宴，到中日两国来宾一百五十人，盛会也，九时归。

十二月十二日 自台湾银行领取海军汇款四百日元。晚誊清报告。

十二月十三日 抄写报告。

十二月十四日 一时送谷口、山冈至春日丸，托谷口将政况报告送往军令部。

十二月十八日 下午甲斐靖、中久喜信周来访，以致孙文之介绍函交给中久喜。海军送来第二次临时津贴三百日元。

十二月二十日 上午至正金银行存款六百元。

十二月廿一日 下午自领事馆领来本月份经费。同文书院和田连次郎来访，交付本年四月至十二月份利息四百〇五元。起草报告。

十二月廿二日 上午发出致海军报告及私函。

十二月廿四日 四时至〈上海日报〉社将款项存入。

十二月三十日 下午自〈上海日报〉社至正金银行，存款四百元，又至邮政局存款三百五十日元。



一九一二年中国
之政党结社

宗方小太郎





说 明

本文系1912年7月宗方小太郎对民国初年中国各政党会社的调查报告，原载于1977年日本原书房出版的《宗方小太郎文书》（续编）。

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解体，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扫清了道路，各种思潮勃然兴起，各色政党社团，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名目繁多。它们代表不同的阶级、阶层和政治势力，拥上了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其中有的社团，昙花一现，遂即消失；有的政党在民国初年的政局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这些都是研究民国史值得注意的问题。1949年以前，我国学者对此虽撰有多种专著，如谢彬《民国政党史》、印维廉《中国政党史》、杨幼炯《中国政党史》，多成书于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且所记均为当时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一些政党，此外皆略而不详或不见记载。《中国之政党结社》一文写成于1912年，是作者根据当时的实地调查撰写的，它较为完整地记录和保留了民国初年政党社团的真实情况，其中很多社团，为已出版的各种政党史所未见，亦很少见于其他记载，是研究民国政党发展史极为珍贵的原始记录，也可以说这是有关民国政党史最早的一本专著。今特译出供读者参考。

译文经由吴绳海同志校阅订正。有关宗方小太郎的情况，已见本辑《辛壬日记》说明，故从略不赘述。

一九一二年中国 之政党结社

(1912年7月上旬)

海军军令部 宗方小太郎著 冯正宝译

序 言

中国在政治上觉醒，有志于采纳东西方先进各国之制度、文化，有志于实行所谓变法自强之宪政，迄今不过十余年。盖中国人民之政治思想极为幼稚，一般人不仅不了解宪政为何物，即政府当局亦处于不充分理解宪政意义之状态之中。故有如伴随宪政发达而产生之政党组织亦属于最近之事。在形式上之出现系于光绪三十二年预备宪政之上谕颁布后，以江苏、浙江、福建之官绅为核心之预备立宪会（光绪三十三年成立）为嚆矢，以前虽有康有为等之保皇党（光绪二十四年间成立）及杨度等组织之宪政公会（光绪三十二、三年成立）与梁启超之政闻社，但有如同盟会、光复会，带有秘密结社性质，故仍应以预备立宪公会为嚆矢。

至宣统元年，时运一转，各省设立咨议局，继而以预备立宪公会为中心，国会速开请愿运动开始后，各省响应，遂于北京组织各省联合同志会。但该会尚无作为政党之一定之主义纲领，亦

不存何等之制约。

一俟宣统二年第一届资政院开会，达到速开国会运动之目的，提早至宣统五年，各种政党组织便竞相出现如帝国统一党、宪政实进会、宪友会、辛亥俱乐部等。而宣统三年上半年为此等政党之组织活动期，下半年爆发武汉革命之乱，全国动摇，待第二届资政会开会，政府各员、该院议员及政党成员等均散居各地，中央仅留宪政实进会之骨干，此外均自然消亡。

再看，当时南方之形势，由于北京政府讨伐革命军方策迟缓，骚乱遂愈蔓延，掩有十余省，遂于南京成立临时政府。于是以共和为主义之政党结社勃然兴起，由旧革命党即章炳麟一派所率领之光复会改组为中华民国联合会开始，孙逸仙一派之同盟会亦一变以往秘密结社性质为同盟会大政党。其他尚有共和统一会、国民协会、国民共进会、自由党、民社、共和促进会、共和宪政会、社会党、工党、华侨联合会、大同民党、青白社、民生党、进步党、共和统一党、女子同盟会等不遑枚举。而工、农、商各依其主义组织合党，大小党社林立各省。加之北京政府纲纪日益不振，故一俟开始媾和谈判，京城之内又出现共和促进会、共和急进会、共和进行会、北方共和会、蒙古联合会等，且一俟清帝逊位、南北合一后，组成各种政党颇多。例如北方有国民协进会、汉蒙联合会、五族共和联合会、五族国民合进会、南北共和宪政统一会、政群社、中央集贤会、纯粹共和社友会、民权监督会、国群铸一通俗讲演社、满族同进会、回教联合会、藏卫团等，南方除原有诸党外，又出现民国公会、国民公党、共和建设讨论会、中华民族大同会、五族少年保国会、东亚大同社、政见商榷会等，其他各省自立之政党亦有层出不穷之概。

南北已形合一，一俟首都奠定北京、内阁成立、参议院开会后，此等政党均拟将其本部迁往北京竞相接近政权，政党通弊之党争已开其端，现大致可分为保守、稳和、急进三派重新组合。即由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国民公会、国民党组成之共和党（章炳麟所率之统一党之一部分后分立，参照后章）与同盟会之全国联合进行会合并；国民协会、国民公党、共和建设讨论会及统一共和党合并将组成国民党（正在协议中）；又如五族共和联合会将与中华民族大同会合并等。但党争依然激烈，各种党社又介在其间呼应纷扰至于极点。正苦于内政外交多难之政府又为操纵政党而煞费苦心，终于怂恿共和党、同盟会及共和统一党合并组织政友俱乐部。

如斯，大党并立割据，小党星罗棋布，中国之政界将愈益多事，盖以自由平等之共和特权赋与该国程度卑浅之人民，使之干预政事，将来之混乱不难逆料也。事实上中国之政党即建于此等基础之上。其盛衰消长在政治上有甚大关系，实乃眼前之大患。故为阐明中国政党之状况起见，现略为追溯既往自清代之会党开始，简略叙述现时政党之状况如下。

第一篇 清朝之政党结社

清朝祖先鉴于历代治乱之迹，建国之初便多方预防弊政，防止祸乱于未萌状态，其中如甚至以法令严禁组织会党，故在三百年之治世中党祸颇少者即系此故。从而带有政治性之会党至光绪末年前亦不多见。但经过甲午之战、戊戌政变，政府纪纲弛废实力暴露后，人民议论政事之得失者渐多，以至有人组织政治性会党。及至日俄战争后颁布宪政预备上谕，两宫驾崩，宣统继位，成立咨议局、资政院等以后，便公然组织政党，遂启官民交争之端。

第一章 保皇会（附宪政会、政闻社、宪政公会）

本会为康有为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奉光绪帝之密诏后，纠合同志组织之戴皇拥帝进行革命之秘密结社式之团体，实为清朝会党之嚆矢。现为有助于了解当时之形势起见，抄录光绪帝密诏及保皇会会例如下。

光绪帝之密诏：（上略）朕以为非变法不能救中国，然太后却不以为然。今朕之位难保，望速密筹相救之法。（下略）

保皇会之会例如下：（略）

共有二十八条会规，以谋进行会务，但康有为、梁启超之辈

亡命在外后，其与党多在日本、美国、南洋等海外各地，带有纯为秘密结社之性质。对革命党亦互为反目。其后会员徐勤、方子节等设立华益公司等金融机构，一面积蓄其党实力，一面在实业界扶植其党势，且与内地互通气息以谋首尾相应之计，但半途受挫。光绪二十九年，康等至美国有所策划。光绪三十二年预备立宪之上谕下达，即改保皇会为帝国宪政会，梁启超与蒋观云、徐公勉等共组政闻社，杨度、熊范兴（贵州苗族出身，曾留学早稻田大学，有候补知县衔，现为贵州省选出之参议员）等则组织宪政公会、政法调查会，保护当时之政府，主张改造立宪君主政治。然而，政闻社不为政府所容而瓦解，宪政公会则因杨度被以四品京堂衔收买，不视会务并产生内讧，遂趋于自然消灭。政党虽一时受挫，但中国人民之政治思想却有显著进步，以后中国内地又出现各种政治性团体。

第二章 预备立宪公会

本会为中国内地最早组织之政治性团体。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政党之滥觞，创立于光绪三十三年。其宗旨为按照预备立宪之谕旨，使绅民通达国务，为预备立宪准备基础，就宪政展开种种研究，共图进步。确切言之，该会尚非政党，但其组织、入会之手续、会员之职务等已大略具备政党之实质。该会有会长一人、副会长二人、干事十二人、名誉干事若干人，并且设置常驻事务员、书记、会计等职员。当时之会长为张謇，副会长为郑孝胥、张元济。干事有朱福说、孟昭常、汤寿潜、雷奋、许鼎霖、周延

弼、陶保霜等二十四人。会员主要网罗东南各省即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朝野名士计二百七十四人（现该会尚存，但已不如当初统一）。兹试举其主要人物如下。

张謇：前农工商部大臣、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

郑孝胥：前湖南布政使。

汤寿潜：前江西提学使，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总长。

张元济：前学部副大臣。

赵凤昌：现大总统顾问。

伍光健：前学部咨议官。

温宗尧：前西藏参赞大臣，前驻沪交涉使。

周延弼：前农工商部顾问。

陈宝琛：内阁学士，皇帝师傅。

高而谦：前云南布政使。

孟昭常：前资政院议员。

沈林一：前宪政馆统计科长。

瑞澂：前湖广总督。

沈懋昭：信成银行协理。

谢远涵：前江西咨议局议长。

章宗元：翰林院编修。

庆山：吉林咨议局议长。

以上通过各阶级罗致有力人士一事，形成当时预备宪政时期一大势力，同时又成为行将出现之政党源泉。盖以各会员均为中国智识比较发达之东南各省之著名人士故也。

本会之主义最为稳健，少急进破坏分子。平素主张君主立宪。然而今日帝政没落，确定民主共和，标榜此一主义者有趋于

自然消灭之概，但该国各种事业恐有不得不俟该会会员之力者也。征诸既往例如提倡并发起速开国会请愿运动；在东三省总督锡良幕下计划锦爱铁路，以及筹建连山湾港口者均为该会会员郑孝胥。又如提倡移民实边计划时参与枢机者乃汤寿潜。计划开办美华银行、美华航业公司及东三省拓殖银行者乃张謇，致力于铁路国有者又非郑孝胥乎？该会于各方面确颇有坚实之根基，而且共和政府成立之后，南京、北京均有不少该会会员参与枢务。汤寿潜由浙江都督调任南京政府交通总长，后辞职前往南洋向华侨募捐，在共和党内占有重要地位。张謇由南京实业总长下野后，现任共和党理事，执该党之牛耳。赵凤昌现任大总统之顾问，章宗元参加帷幄，此外在中央、地方、政党、实业中无不有该会会员，大有掌握新政府要害部门之概。兹再列举该会所派生之政治团体如下：

1、国会请愿同志会

宣统元年第一届咨议局开会后，有速开国会请愿之举，组成国会请愿同志会。本会原为预备立宪公会会员所提倡，以张謇、孟森、孟昭常、赵凤昌、方还、雷奋等为主角，由江苏咨议局发起，联络全国咨议局及政、商、学界人士推派代表到达北京，着手速开国会运动。本会之主义仅在于“以请求政府速开国会为目的”，故虽不能立即视为政党，但各省推派代表，组织团体，从事政治运动，乃以此为嚆矢。该会制定规约十六条。设总部干事、支部干事，并将总部置于北京，采取统一行动。其主要成员如下：

孙洪伊、杨廷栋、罗杰、陈登山、刘崇佑、朱承恩、李素、

邓孝可、蒲殿臣、萧湘、罗纶、李芳等，均为地方之俊杰。（彼等现时在各种政党内活动，参照后章〈中华民国之三大政党〉部分。）据云本会与康、梁之宪政会，及预备立宪公会联络，着手实行政治革命。由此观之，本会之变种共和建设讨论会主张招致梁启超，决非无故。参照后章第三节国民党部分。

2. 咨议局议员联合会

本会于宣统二年成立，由各省咨议局中有代表性之议员聚会于北京组成。本会比之国会请愿同志会，颇有进步，殆可称为政党。当时该会议长汤化龙在宣言中曰：

一俟联合会汇集北京，朝野上下均视为我国政党之嚆矢。虽然联合会尚无政党之实，但东西各国政党在国会发表政见、而联合会则讨论向资政院提出之所有议案，因此具有同一性质。

名义上为咨议局议员之联合会，但其实质乃与政党之性质相近。本会有六章三十六条会则。本会之议事范围如下。

一、有关各省咨议局共同利害之事。

二、向资政院提出之预备议案。

三、讨论本会规章及其他各种规章。

其主要成员如下：

直隶：阎凤阁、王振尧、谷芝瑞、张凤瑞、于邦华、陈树楷、孙洪伊、高俊澎、王法勤。

江苏：孟森、杨廷栋、雷奋、孟昭常、方还。

安徽：高炳麟。

江西：汪龙光。

浙江：沈钧儒。

福建：刘崇佑、椿安、康咏。
广东：陈寿崇。
广西：吴赐龄、蒙经、朱景辉、古济勋。
贵州：张光炜。
云南：张之霖。
四川：蒲殿俊、李文熙、高凌霄、张政。
湖南：左学谦、曹作弼、罗杰、席绶。
湖北：汤化龙、张国溶、陈登山。
山西：梁善济、李素。
陕西：胡坪。
河南：王佩箴、杨治清。
山东：朱承恩、周树标、蒋鸿斌。
奉天：孙百斛。
吉林：福裕。
黑龙江：战殿臣

如该会议决之速开国会案以及修改咨议局规章、教育案等，均经资政院赞同获得通过，成为当时之有力团体。（上述各代表今在共和党、统一共和党、同盟会及其他政党内活动。）

第三章 帝国统一党

宣统二年十月第一届资政院开会，议员大别为官选与民选二派，各自主张其利之所在，纠纷不已，不意在院内形成具体党派。即资政院在讨论新刑律时，对刑律中之无夫奸发生为维护礼

教而主张有罪之蓝票派，及主张无罪之白票派（因投票纸之颜色区别而得名）。由于两派之争执日益激烈，该院预备立宪会会派之议员及部分民选，官选议员为求融合起见，发起组织政党，终于组成帝国统一党。但白、蓝两派终不能融合，不久便解散。至去年春成为下列各团体出现。

第四章 帝国宪政实进会

实进会乃所谓资政院之蓝票派之变种，系资政院议员陈宝琛、陶葆廉、沈林一、赵炳麟、于邦华、陈树楷、毓善、康咏等所提倡，邀请院内外信仰帝国政治之稳健同志，组成名符其实之政党，依照下列政纲行动。

- 一、尊重君主立宪政体，注重上下感情，保持宪政精神。
- 二、发展地方自治能力，增进人民事业，巩固宪政基础。
- 三、斟酌现状，筹划改良政治社会。
- 四、按事业以图完善机关法律。
- 五、注重普通教育，制定教育方针。
- 六、提倡移民事业，以达拓殖之目的。
- 七、整理财政，以图经济前途之稳固。
- 八、振兴实业，以图人民生计之发达。
- 九、研究外交政策，以加强国际交涉之权力。
- 十、期望充实军备。

该会有党则十二章三十一条，主要会员如下（划有“○”者为资政院议员）：

八旗：庄亲王、铠公、寿公、溥公、善将军、希公、全公、文斌、庆恕、毓善、荣晋、乐泰、荣厚、文溥、文哲挥、定秀、恩华、奎祥、景安。

奉天：陈瀛洲、王均堂、闵万田。

顺直：张锡光、梁建章、李搢荣、王振尧、魏王邦、郭家骥、刘培极、齐树楷、刘春霖、梁建邦、刘焰、王其相、张毓书、张凤瑞、姚翼唐、蒋式惺、袁励准、赵云书、史履晋、凭恕、张兰、李士珍、李士钰、吴德镇、云诏、仇翰垣、张肇隆、王宗佑、王海铸、刘燮骏、于振宗、白堃、陈树楷、于邦华、苏芸林。

江苏：许鼎霖、曹元忠、沈林一、夏寅官、顾栋臣、马士杰、王荣官、王仁俊、姚锡光、俞庆涛、田步蟾、陶世凤、陈露华、杨廷栋、何宾笙、胡国臣、杨寿柑、赵椿年、许廷琛、方还、周廷弼、王季烈、潘鸿鼎。

安徽：李经畬、龚心铭、孙多嘏、窦以珏、江获、张鸿鼎、许承尧、阮忠枢、吴和泮、江谦。

江西：汪龙光、高臣瑗、杨荫乔、马鯤、汪汝梅、邹国玮、张元通、张掾、邹日恂、毛玉麟、杨祖惠、余宗惺、刘芭、刘熙庸。

浙江：劳乃宣、张祖廉、陶葆廉、蔡玮、吴士鉴、吴纬炳、喻长霖、钱宝书、陶文瀛、金兆丰、杜炳勋。

福建：陈宝琛、康咏、黄肇河、杨树璜、邹含英、项朝钦、张选青、林炳章、陈蓉光、李兆年、李慕韩、杨廷纶。

湖北：傅嶽棻、谈钺、贺良朴、彭祖龄、叶开宾、陈国瓚、郑潢、胡柏年。

湖南：黄瑞麒、李长祿、胡祖荫、徐景涛、郭间茅。

山东：郑熙嘏、王佐长、柯劭忞、尹祚章。

山西：王式通、吴新源、刘兴训、刘志詹。

河南：王绍勋、陶毓瑞、魏联奎、陈善同、马耀宗。

陕西：梁守典、卢润瀛。

甘肃：宋振声、杨锡田、罗其光、王曜南。

四川：高凌霄、万慎、张政、李锡嘏、杜德舆、宋育仁、张罗澄、罗迪楚、马图、李景、冯精忠、袁朝佐、张绍勋、吴桐林、刘宣、张康龄、马忠、甘应泉、施愚、董清峻、赵增彝、杨光湛、李时品、李湛阳。

广东：罗乃馨、梁宓、曾习经。

广西：赵炳麟、唐庚。

云南：张之霖、王鸿图。

贵州：胡祖同、牟琳、何曾峇、黄宝森、李伟

吉林：徐穆山、庆山。

该会似从各阶级网罗稳健之士，发起人主要属于官僚系统。会长推陈宝琛，副会长举于邦华、姚锡光二氏，其他有常任议员、调查编辑、审议等各科。据云该会从泽公处接受不少基金。故昨秋革命乱起，该会会员不轻易依附革军。如陈宝琛至今仍作为师傅担当辅育幼帝之职；陈树楷、于邦华等直至最后仍主张君主立宪等，决非无故。若将该会与下列之宪友会辛亥俱乐部比较，即可发现颇为有趣之对照。该会在天津有支部。

第五章 宪友会

本会由部分国会速开联合同志会及大部分帝国统一党成员组

成，与辛亥俱乐部同为资政院之白票派。以去春第二届全国咨议局联合会开会为动机，由各代表中之有力人士组成。

江西咨议局议长谢远涵、江西咨议局议长梁善济、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四川咨议局议长李文熙、直隶咨议局议员孙洪伊等为发起人，其政纲如下：

目的：以民权之发达和宪政之完成为目的。

政纲：

一、尊重君主立宪政体。二、督促责任内阁。三、整理各省政务。四、开发社会经济。五、讲究国民外交。六、提倡尚武教育。

尚有会则七章二十五条、支部纪律十五条该会乃一政党组织。成立当时主要会员如下。

直隶：李。榘、籍。忠寅、齐。树楷、李。长生、高。俊澎、张。铭勋、刘。春霖、王。法勤、孙。洪伊。

安徽：李。国松、窦。以珏、陶。冠禹、康。达。

吉林：何。印川。

湖南：谭。延闿、徐。佛苏、欧。阳辨元。

浙江：汤。尔和、马。叙伦、陈。馥宸、邵。羲、陈。敬弟、胡。钟翰、刘。绍宽、蔡。汝霖。

四川：蒲。殿俊、何。耀光、杨。庸章、萧。湘、罗。纶、李。新展、刘。登朝、李。文熙。

陕西：李。良材、郭。忠清。

河南：方。贞、王。敬芳、方。子杰。

福建：高。登鲤、刘。崇佑、林。长民、林。志钧。

江西：邹。树声、宋。名璋、叶。先圻、罗。家衡、郭。志仁、谢。远

涵、黄为基。

山东：周树标。

奉天：袁金铠。

山西：梁善济、李庆芳、李华炳、王用霖、李素。

湖北：汤化龙、张国溶、郑万瞻、胡瑞霖。

广西：甘德蕃、蒙经、吴赐龄。

贵州：杨寿箴。

广东：伦明、姚梓芳、黄一郎。

江苏：马良、沈恩孚、黄炎培、汪秉忠、雷奋。

八旗：垣钧、文耀。

（有“○”者为资政院议员）

该会不设会长，有共和色彩，设常务干事三人。其他有文书、会计、庶务、调查、编辑、外交等各部员。当时之常务干事为雷奋、徐佛苏、孙洪伊三人。由此观之，宪友会乃所谓民党之急进派，不少会员在此次革命军起事中占有相当之地位。如汤化龙、梁善济、李素（山西）、萧湘（四川）、谭延闿（湖南）等，与宪政实进会会员相比，足以相见其平等主义之异同所产生之显著结果，以及当时革命分子多人深入北京之甚。该会在天津、福建、山西、江西、湖北、湖南均有支部。

第六章 辛亥俱乐部

在宪政实进会（保守官僚党）及宪友会（进步民党）二政党成立后，政界划分为二大派别相互角逐之时，由部分资政院官吏

议员及民选议员与民间有志之士组成辛亥俱乐部。该俱乐部系宗室长福（外务部郎中、资政院议员）、罗杰（湖南选出之资政院议员）、易宗夔（同上）、胡骏（四川选出之资政院议员）、黎尚雯等所提倡，一时虽有纯官党之说，但其后随其会员之增加，公然亮出民党旗帜向政界号召。该俱乐部亦设党规九章三十一条，在湖南、奉天等地均有支部，其政纲如下：

- 一、阐扬立宪帝国之精神。
- 二、提倡军国民教育。
- 三、发展地方自治能力。
- 四、主张保护政策，振兴实业。
- 五、整理财政，增进富力。
- 六、审度公私经济能力，谋求交通之发展。
- 七、整理军备，充实国力。
- 八、调查内外之情况，确定外交之方针。

该会以两湖人士为中心，可以想像乃杨度之辈在背后执其牛耳。

其会员如下：

常议员：长福、郑际平、程明超、刘道仁、赵椿年、魏思具、刘颂虞、何藻翔、陈明官、王璟芳、陈馘宸、顾视高。

评议员：罗杰、汪龙光、牟琳、席绶、胡骏、张竞仁、刘冕执、杨悌、漆运钧、顾澄、易宗夔、陈懋鼎。

庶务员及其他：刘诚、张友栋、褚家猷、张东荪、袁本贵、宁调元、左宗树、田桐、刘泽熙、严启衡。

共有会员二百七十名。

（有“○”者均为资政院议员）

该俱乐部中因有资政院议员较多，故被视为官僚党，殊不知职员中之宁调元、程明超及会员田桐、魏宸组、严启衡等皆为著名之革命党员，在革命动乱爆发以前，该党党员如何潜居各地，仅此一端即可推想而知也。因此与党员增加之同时，该俱乐部遂变为纯粹之民党。

第七章 八旗宪政急进会

该会由宗室资政院议员希公、景安、志公、毓善等主倡，六十一名年少气锐之八旗人士为发起人，以八旗之相互联络、研究八旗将来之问题以及国会开设后之准备等为纲领。但在党势尚未伸张之时便遭革命之难，陷于萎靡不振之状态，故无需特笔阐述其为何种政党也。

总而言之，此等政党实处于创设混沌状态之中，故其主义纲领所标榜者虽比较明确，但各党成员间之区别不甚明瞭。各党均无公认之领袖，加之党员均无何等阅历训练，不能成为政党有终之美，陷于支离破碎之状态。一俟革命爆发，必然无所作为，随时唯有解散而已。呜呼！能成立于帝国宪政之下之上列各政党，今日随帝政之没落便不见踪迹。鄙人已在前数页中叙述政党创建时代之概要，现再将共和政府时代各政党团体叙述如下。

第二篇 中华民国之会党

中华民国时创建组织之会党有数千百个，现择要按其性质分为政治、风教、实业等类列述如下。

第一章 政治性会党

第一节 同盟会

该会乃往昔孙、黄所率领之纯革命党机关——秘密结社，此次革命成功后本部已迁往南京，新成为政党组织，公然宣布政纲。

同盟会乃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孙文数次革命失败后出逃由欧美来日本时，在东京之革命党为谋革命党员之联络及统一起见由胡汉民、宋教仁、汪兆铭、陈天华、刘揆一、张继、田桐等组织而成立统一之革命党机关，推孙文为首领，黄兴副之。其宗旨如下。

- 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
- 二、建设共和政体。
- 三、维护世界真正之和平。
- 四、土地国有。
- 五、主张中日两国之国民联合。

六、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

该组织分外交部、内政部、军政部、联络部、言论部及暗杀团之五部一团。（据云，暗杀团系张继主张提议成立。）机关刊物有杂志《民报》、《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时事画报》等，此外有上海之《神州日报》，广东之《国民报》，新加坡之《中兴报》、《星洲晨报》、《南洋报》，仰光之《中华新报》，夏威夷之《自由新报》，旧金山之《大同报》，温哥华之《大汉日报》等。其支部遍布中国各省、欧美各地及非洲、澳洲、安南、暹罗、南洋群岛，其标榜由所谓民族、民权、民生三项产生之共和主义，已往数年间均在鼓吹其革命主义，或实行革命或致力于暗杀活动。

此次革命成功，孙文于南京任临时大总统，该党本部遂迁往南京，三月三日召开组织政党大会，公布党章及政纲。

该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主义，其政纲如下：

- 一、完成行政统一，促进地方自治。
- 二、实行种族同化。
- 三、采用国家社会政策。
- 四、普及义务教育。
- 五、主张男女平权。
- 六、励行征兵制度。
- 七、整理财政，厘定税制。
- 八、力图国际平等。
- 九、注重移民（垦殖事业）。

党章共七章三十二条。其职员如下：

总理：孙文。

协理：黄兴、黎元洪（后辞职）。

干事：平刚、刘揆一、宋教仁、马和、李肇甫、胡汉民、张继、汪兆铭、居正、田桐。

同时在下列各地设立支部

支部名称	所在地	支部名称	所在地
广东支部	广州	江西支部	南昌
重庆支部	重庆	闽支部	福州
云南支部	云南	湖北支部	武昌
陕西支部	西安	贵州支部	贵阳
山东支部	芝罘	湖州支部	浙江湖州
皖支部	安庆	山西支部	太原
蜀支部	成都	京津同盟会	天津
		湖南支部	长沙

主要支部代表如下（三月三日选定）：

安庆：赵宗卿、段云。

北京、天津：黄复生。

湖州：许唯心、陈少白。

南昌：钟震川。

杭州：张伯岐、黄骥、张浩、朱价人、周珏。

广东：冯自由、林直勉。

福州：陈子范、史家麟。

嘉兴：陈以义、吴文禧。

绍兴：余冠洁、童白时。

处州：吴逢樵、关麟书。

宁波：胡朝阳。

武昌：田桐、丁仁洁。

金华：陈豪。

上海：张同伯。

湖州：蒋介石。

南北合一首都定于北京后，各处之会党均将总部迁至北京。同盟会亦于五月上旬将总部迁至北京前门内及兵部窪，南京仅设支部。

北京总部之临时组织及人员如下：

总务部：田桐、张大义、曾蹇、伊赐龄、严侗、周仲良。

理财部：陈策、曾鲁光。

交际部：张继、熊傅弟、胡国樑。

文事课：任鸿隽。

其他重要会员有国务总理唐绍怡、宋教仁，以下有参议院之李肇甫、熊成章、杜潜、彭元、邓家彦及《国风日报》总理景耀月、于佑任等二十余人。彼等均致力于扩大党势。

南京支部之现状如下。

总务科科长：熊傅弟。

交际科科长：陈文海。

政事科科长：胡肇安。

理财科科长：巴泽宪。

文事科科长：方培良。

另有评议科及评议员若干名。

总部虽已北迁，但南省之事仍有不可忽视者！故特在五月上旬于上海设立该会总部驻沪机构。事实上唯有上海方为同盟会总部之所在地。现举驻沪机构职员名单如下：

正部长：姚勇忱。副部长：吕志伊。

总务长：褚民谊。理财长：王一亭。

政事长：戴天仇。文事长：徐血儿。

交际长：陈汉元。评议长：吴稚晖。

评议员：赵林士、陈基明、沈漫云、钮有恒、载连叔、周浩、周柏年、梁龙、庞青城、张公威、王夏、李徵五、张弁群、李怀霜、邬俊卿、五汉强、周佩箴、吴仲革。

干事：金铁军、徐幼三、解子和。

至此同盟会于南方之地盘大体已告巩固，现锐意向北方扩张势力。

首先，可视为其第一着手者即为合并全国联合进行会。而所谓全国联合进行会究为何物乎？

第一项 全国联合进行会

该会系由李万铨、李安陆等提倡组织，今年四月成立。以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人士为核心，南方数处均有其支部。据云会员约二千人，该会之主义乃建设强有力之中央政府，统一全国。其政纲有下列十二条。

- 一、采用法国之制度。二、整理全国之财政。
 - 三、促进同化蒙古、西藏。四、确定教育方针。
 - 五、提倡征兵制度。六、振兴海陆军备。
 - 七、发展农工商业。八、速谋交通之便利。
 - 九、励行开垦事业。十、维护国际和平。
 - 十一、改良社会习惯。十二、筹划八旗生计之途。
- 另有会章八章三十四条，规定如何进行会务。

五月中旬，因其主义政纲与同盟会有相似之处故商议合并。同盟会交涉委员文群、李肇甫与进行会之代表议定合并条款十二条。现全国联合会进行会合并于同盟，使用盟会名义。此事对同盟会而言乃一次大膨胀。

同盟会在上海有《民立报》、《天铎报》、《民权报》、《太平洋报》、《民强报》等准机关报。并计划将原在南京创办之《中华民报》移至上海，以及发行纯机关报《民国新闻》（据云该报资本五十万元，由汪兆铭主持）。在北京有《国风日报》、《国事新报》、《中央新闻》、《守真日报》，在天津有《民意报》、《国风日报》、《民约报》、《民国报》、《天民报》，在香港、广州有《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国事报》，此外尚有中华书局等机关书店。

第二项 中华书局

该书局乃同盟会为求树立革命长远利益之计而开设，经营灌输民国精神之学校教科书及一切书籍之出版事业。其主义如下：

一、培养中华共和国国民。二、并用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主义。三、注重实际教育。四、融和国粹使之欧化。

其施設可说已告齐备，但同盟会在北方势力却反有萎靡不振之概。余以为此乃轻佻激烈之南方势力遭到北方朴实坚韧势力之反击，实属同盟、共和两党之倾轧。如斯同盟会不仅于北方，而且渐次于中部各省均开始有颓废之势。而同盟会所网罗之重要人物除孙、黄、唐、宋以外，不过有如下列诸人：胡汉民、邓家彦、刘揆一、张继、熊克武、陈其美、陈炯明、胡瑛、张伯纯、赵百光、陈雄州、柳亚卢、龚练白、廖炎、黄藻、张炽章、戴天

仇、任鸿隽、雷铁臣、石瑛、仇亮、耿觐文、王鸿猷、李骏、张通典、蒋作宾、章勤士、唐文夏、于佑任、杜次珊、陈少白、刘思复、陈景华、吴鼎昌、杜潜、吴荣世、段宇清、李肇甫、文崇高、平刚、景耀月、张耀曾、刘星楠、熊成章、彭占元、顾视高、王芝祥、沈秉堃。

以上可能多少有所遗漏，但该会之中枢人物不外上列诸人。彼等有新学新知识、略通世界大势，有进取心，但毕竟大多为年少血气方刚之徒，对前朝旧官界有经验及有政历者却不为彼等所重视。今该会之柱石孙、黄二人与著名之党员均集居上海，策划扩张党势，该会号称有会员五十万之众，隐然为资力丰实之大政党。

第二节 共和党

共和党乃中国为防止小党分裂之弊，便于进行政务并实现共和政治为主旨，而谋求多数政党联合首先成立之政党。

该党由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国民党等五政团合并而成，本年五月九日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该党之政纲如下：

一、保持全国之统一，采用国家主义。二、以国家之权力扶持国民之进步。三、适应世界之大势以和平实利为立国之主义。另有党章十五条及支部规则九项。本部设在北京前门内化石桥专门学堂内。

成立大会中选举该党干部如下：

理事长：黎元洪

理事：张謇、章炳麟、伍廷芳、那彦图（章炳麟后脱党）

该党不设党首。程德全、蓝天蔚、李经羲位于理事之次，在党中占有重要地位。由合并各团体推举之该党干事共有如下五十四名：林长民、叶景葵、杨廷栋、王印川、龚焕辰、汤化龙、陆大坊、黄云鹏、孟森、刘莹泽、唐文治、童学琦、邓实、汪德渊、刘成禺、时功玖、陈绍唐、项骧、胡钧、汪彭年、张伯烈、张大沂、孙发绪、吴景濂、王赓、籍忠寅、李榘、陈懋鼎、刘颂虞、邵羲、范源濂、蹇念益、周大烈、长福、林志钧、沈彭年、朱寿明、姚文枬、潘鸿鼎、叶鸿积、张毓英、沈周、贾丰臻、张一鹏、王戈、沈钧叶、黄群、李祖虞、袁毓麟、汪希、陈敬弟、高凌霄、蔡元康、王家襄。

该党在各地有支部，在上海有驻沪机关部，如温州、杭州、上海、长沙（湖南）、合肥（安徽）、无锡（江苏）、贵阳（贵州）、云南、江靖支部（江苏江阴、靖江）、南汇（江苏）、滁盱支部（安徽）、瑞安（浙江）、如皋（江苏）、武昌、乐清（浙江）、宣城（安徽）、平阳（浙江）、泰顺（浙江）、海宁、玉环（浙江）、常州（江苏）、太仓、宜兴（江苏）、和州（安徽）、东台（江苏）、平湖（浙江）、广东支部、漳州（福建）、嘉兴（浙江）、山东支部、直隶支部（天津）、宝山（江苏）、芜湖（安徽）、苏州支部、金山（江苏）、南京支部、松江（江苏）、太平（安徽）、开封（河南）、仪徵（江苏）、南陵、六安、青阳（安徽）、南昌（江西）、永嘉（浙江）、崇明（江苏）、东三省支部、黑龙江支部、常熟（江苏）、楚雄（云南）、南通、金坛。

其它预定在内外蒙古、青海、西藏设立支部。以上支部多至五十余处，且附设政务研究会。另置交际员如下：

吴鼎昌、汪振声、方咸五、吴乃琛、曲卓新、陈福颐、稽镜、彦德、江瀚、王文豹、章宗元、常瑄璋、陈篆、牛淇、贡桑诺尔布、朱联沅、张竞仁、王家驹、王治昌、陈宗蕃、梁志宸、胡源汇、马英俊、顾德邻、蓝公武、张厚璟、王璟芳、熊范兴、陈威、陆鸿逵、金汉支、苏珠克巴图尔、艾知命、曾述繁、棍楚克苏隆、王曷坤、郑沅、宝熙、陆建章、舒鸿贻、翟文选、梁建章、陈时利、金秉燧、曾鉴、张元奇、唐在礼、冒广生、张派、赵椿年、薛大可、郭则沅、吕铸、黄濬、乌泽生、傅良佐、梅光莪、唐浩镇、吴延燮、祝瀛元、恩倍、覃师范、杨承谋、申钟岳、荣勋、廖芥尘、魏国铨、王朴、周应熙、康宝忠、金城、颜韵伯、刘家佳、邵章、饶汉祥、罗虔、董鸿祎、范熙壬、方德齐、孙宝藻、邝汉卿、张栩、陈介、刘辅周、张孝移、祝椿年、傅疆、东彝进、钟朴臣、胡汝麟、石小川、王鸿年、孙培、刘培极、叶澜、余大鸿、徐季卿、应德闳、项兰生、施今墨、蒋柳之、余紫昌、石龙川、樊时勋、丁立中、宋伟臣、林大间、李凌、杜海王、江华本、陈二庵、张昉、刘一清、陈锦章、阮毓崧、雷保康、石志泉、叶于澜、澎又岩、黎少本、邢端、张恩寿、唐肯、邓毓怡、贺良朴、廖炎。

附：共和党政务研究会

该会乃共和党为预备发表政见起见，由党员组成，以研究各种政治问题为目的。

该会研究事项为三科，每科又分数课。

一、法政科：

甲课：宪法议员选举法。乙课：官制官规。丙课：刑法。丁课：民商法。戊课：法院编制法、诉讼法。

二、财政课

甲课：预算、决算。乙课：租税。丙课：公债。丁课：币制、银行。戊课：会计制度。

三、行政部

甲课：外交。乙课：内务。丙课：军事。丁课：教育。戊课：实业。己课：交通。庚课：地方。

该会研究问题之范围如下：

一、政府向议院提出之议案。二、议员向议院提出之议案。三、本党可向议院提出之预备议案。

该党在人物方面及政党机构之完备方面，可谓已具备大政党之性质。其言论机关，在北京有〈中国日报〉（旧〈帝国日报〉）、〈亚细亚日报〉、〈北京日日新闻〉（现改名为〈新纪元报〉成为章炳麟主持下之统一党机关报），准机关报或同情该党之报刊有〈国民公报〉、〈中国报〉、〈北京日报〉、〈大同报〉、〈京津时报〉、〈民视报〉、〈政报〉等，天津有〈民兴报〉、〈北方日报〉、〈大公报〉等，上海有〈时事新报〉、〈民声日报〉、〈神州日报〉等。〈大共和日报〉虽因章炳麟分离而不能视为该党之机关报，但该报对该党颇为同情乃是事实。此外在上海除属于同盟会派之报纸外各报几乎均同情本党。

以上数页介绍共和党之概况，兹再就组成共和党之各政团之情况顺次大略介绍如下：

第一项 统一党

该党由去冬改组之章炳麟、程德全、张謇等之中华民国联合会与共和协会、国民共济会等合并组成（关于政党当时之情况参

照报告三百七十六号)。该党公布党规九章三十八条及政纲十一条，其总纲曰：本党以统一全国，建设坚强之中央政府，促进完美之共和政治为主义。

其政纲曰：

一、团结全国之领土，厘定行政区域。二、完成责任内阁制度。三、融和民族，统一文化。四、注意人民生活问题，采取社会政策。五、整理财政，平均人民负担。六、整顿金融机关，发展国民经济。七、扩张海陆军备，提倡征兵制度。八、普及义务教育，兴办专业学术。九、迅速铺设铁路干线，力谋全国交通。十、励行移民开垦殖民事业。十一、维护国际和平，保全国家权利。

该党成立时之职员如下：

理事：章炳麟、程德全、张謇、熊希龄。

参事：汤寿潜、蒋尊簋、唐绍怡、庄蕴宽、赵凤昌、汤化龙、应德闳、叶景葵、王清穆、温宗尧、邓实、陈荣昌。

干事：

总务科：黄云鹏、孟森。

书记科：康宝忠、刘莹泽，王朴、马质、钱芥尘、易宗周。

会计科：黄理中、张弧。

交际科：王印川、林长民、王观铭、龚焕辰、杨择、王绍鏊。

庶务科：章驾时、王季琳、基金监、赵凤昌。

评议员：

江苏：陈则民、赵鸿藻。浙江：陈毓楠、宋熊述。安徽：汪德渊、刘慎贻。湖南：章驾时、许邓起枢。广西：周应熙、汪凤

翔。河南：张远善。四川：熊小岩、皮祖珩。江西：李约。贵州：杨华、宁士楨。陕西：康宝忠。直隶：纪文翰。甘肃：田骏丰。

该党本部四月下旬迁往北京，上海仅留一机关。章炳麟率唐文治、李联珪、龚焕辰、陆其昌、朱清华、王绍鏊、孙肇圻、易宗周等要员北上。先是，总务科之王印川、刘莹泽二人已在北京以图扩张党势。统一党北京本部之人员名单如下：

参事：阿穆尔灵圭、赵秉钧、赵尔巽、萨镇冰、曾鉴、那彦图、贡桑诺尔布、荣勋、张元奇、宝熙、郑沅、王庚、唐在礼、孙毓筠、金还、曾述繁、陆建章、张锡銮、阮忠枢、贺良朴、陆大坊。

本部干事表：

总务科：刘莹泽。

书记科：易宗周、孙肇圻、四明善、黄濬。

会计科：张弧，黄子通、黄农。

交际科：张一麀、吴景濂、谋诚武、祝瀛元、宾图王、奈曼王^①、吴廷燮、张厚璟、舒鸿胎、傅良佐、敖汉贝子、沿格、汪莹宝、景定成、黄大遯、许存绶、乌泽声、吕铸、薛大可、梅光义、恩培、王丙坤 李联珪、申钟岳、冒广生、博公、梁建章、唐浩镇、丁世峰、刘盥训、覃师范、王印川、田骏丰、龚焕辰、王绍鏊、朱清华、朱德裳、魏国铨、陈时利、孙希彭、陶镛、王观铭、朱家磐、周肇祥、蒋邦彦。

庶务科：贺尹东。

该党支部有：

^①宾图王、奈曼王均系内蒙王公。

直隶：天津支部。

江苏：上海支部、苏州支部、常州分部、无锡分部、江北分部、南通分部、常熟分部、扬州分部、山阳分部、太仓分部。

浙江：杭州支部、嘉兴分部、宁波分部、平湖分部。

安徽：安庆支部、合肥分部、庐州分部、婺源分部。

南昌支部。福建支部。山西支部。山东支部（济南）、烟台分部（芝罘）。广东支部。广西支部、梧州分部。云南支部。贵州支部。湖南支部。四川支部、开县分部。奉天支部。吉林支部。

该会如斯网罗有力人士，在全国设立支部，庞大之政党基础得告确立。至于该党之内情及关系等如参照其前身中华民国联合会之情况便可明了。现附记中华民国联合会之情况如下：

附：中华民国联合会

本会系去年十一月章炳麟、程德全等为求统一独立各省而组织之中华民国联合会加以改进而成。其骨干乃章炳麟所率领之光复会。该会网罗旧官吏地方及主要绅士于今年一月三日举行成立大会，制定会则七章二十三条、支部规则，发表政纲十条，以联合全国，辅助确立完全之共和政府为主义。其政纲与前述统一党之政纲大同小异，此处从略。

光绪二十八年正当俄国对满洲问题甚嚣尘上之时，章炳麟、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龚国元等认为趁俄国问题之机会有利于革命运动，遂表面上组织对俄同志会。光绪三十年日俄战争爆发后，便改名为纯粹之革命党秘密结社光复会。以蔡元培为会长，会员多属浙江、安徽人。当时因北京政府对革命颇为注意，故将根据地移往南洋群岛，专于海外谋求扩张党势。又当时

光绪三十四年，革命党之另一派因云南河口之役失败，多人至南洋诸群岛避难，但不久因党人中分为同盟会派与光复会派，发生倾轧。今日同盟会与光复会系统之共和党、统一党互不相容，已于此时开始。翌年宣统元年九月左右在爪哇企图联络李燮和、沈钧业、王人钦等党人，为缓和两派之倾轧起见组织光复总会，以章炳麟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志在发展党势实行革命，以至去年秋天爆发革命之乱。该会之宗旨由于继承所谓“内诸夏、外类狄”之中国传统学说，标榜恢复国权、发扬国粹等固有之民族主义精神，故读书人及官吏抱有革命主义者均属此派，其根基颇为坚固。昨秋革命之乱波及江浙一带后，该会员卒先起事，占领上海、苏州、镇江、南京、杭州等江浙两省之首要都市。据云光复军司令李燮和、苏军司令刘之絮、浙江司令朱瑞等均为该会会员。

该联合会之发起人如下：

章炳麟、程德全、赵凤昌、张謇、唐文治、陈三立、黄云鹏、应德闳、埜珍、汪德渊、章驾时、张通典、钟正懋、林长民、邓实、贺孝胥、景耀月、杨若堃等。

该会之主要职员如下：

会长：章炳麟。副会长：程德全。

江苏：唐文治、张謇。浙江：蔡元培、应德闳。湖南：熊希龄、张通典。湖北：黄侃。安徽：汪德渊、程承泽。四川：黄云鹏、贺孝胥。江西：刘树堂、邹凌元。广西：陈郁璠。云南：陈荣昌。广东：邓实。甘肃：牛载坤。贵州：符诗谿、王朴。

以上为代表各省本会参议员。现再举其主要会员如下：

蒋尊簋、庄思缄、朱瑞、李燮和、柏文蔚、洪承点、刘之絮、诸辅成、夏曾佑、朱文劼、姚桐予、董公复、陈振民、吴锡

齐、赵文衡、陈庆安等。在当时可谓已包众多之人材被作为主要政党而受到重视决非偶然。该会因其成员多为缙绅官吏，故比较稳健。当时该会已与袁氏接近（将《大共和日报》作为其言论机关）。

第二项 民社

该会由两湖人士倡导组织，作为政党以卢梭《民约论》为其根本主义，注重民论，统一舆论，谋求国民联合以组织完全之共和国为目的。该社之主义如下：

该社对共和统一政治持进步主义，以谋求国利民福为其大纲。

政纲有如下四项。

一、提倡军国民教育。二、采用保护贸易政策。三、扩张海陆军军备。四、主张铁路国有。（未决定）

该会于今年一月十六日在武昌成立。该社订有社则六章十七条及支部章程七章十三条。该社发起人有如下诸人：

黎元洪、蓝天蔚、谭延闿、王正廷、王鸿猷、李登辉、孙武、朱端、张振武、吴敬恒、杨曾蔚、刘成禺、项骧、宁调元、孙发绪、周恢、张伯烈、汪彭年、高正中、朱立刚、徐伟、高澎墀、郭健霄、何雯等。现正在网罗两湖政军两界人士。另一方面，彼等根据在武昌发动革命变乱时之初衷并加以贯彻起见，欲在纷起各党中出人头地（该社主张首都置于武昌）。一俟该社成立后，便将总社迁往上海，又于北京设京津支部，俨然为民国政治之中心。当时不设社长，本部组织如下：

总干事：吴敬恒。秘书科：何雯。庶务科：汪彭年。主计

科：张伯烈。招待科：宁调元。评议员：李登辉、王正廷、周恢、张振武、项骧、张伯烈、孙发绪。

京津民社设在前门外李铁拐斜街，其职员与社员有：

干事：陈绍唐、张伯烈、孙培、陆鸿逵。

评议员：张大昕、方咸五、郑万瞻、马林、屈映光、王文庆、阮毓崧、李庆芳、饶凤璜。

招待员：徐协贞、曹赤霞、马林、陈梁。

主要社员如下：

朱家宝、汪荣宝、谭学衡、黄为基、时功玖、刘一清、胡大勋、王赓、缪庆善、张栩、恒钧、胡作宾、张文、刘远驹、陆鸿墀、吕铸、熊范舆、彭介石、雷寿荣、周景墀、方咸五、张鸿翼、王邦屏、陈宦、罗虔、张昉、黄敦悻、吴景濂、李獫龙、应龙翔、彭方傅。

该社于南京及武昌亦有支部，但主要人材均集中于上海与北京，在各地之支部情况如下。

黑龙江支部：爱国两等学堂。临淮支部：第四师团司令部。漳州支部：漳州司令部。绍兴支部：绍兴《民兴日报》馆。奉天支部：奉天小西边门外。安庆支部：荣陞街。长沙支部：《黄汉湘报》馆。南昌支部：《江西民报》馆。杭州支部：吉祥巷。开封支部：东聚奎巷。徽州支部：屯溪徽州军政处。大通支部：和悦州永吉里。芜湖支部：《皖江日报》馆。镇江支部。

该社以《民声日报》为其机关报，在上海发行，鼓吹其主义。何宇尘为该报总理主持工作，宁调元专司总编纂之事。

该社多为比较稳健之分子，事实上为黎元洪之与党，故按其政纲行事而无偏激之举动。该党与袁世凯接近，又与统一党联

络，最后或将与其他政团合并而成立共和党乎？

第三项 国民协进会

该社系北方人士严修、籍忠寅等提倡组织，本年三月成立，总部设在北京（前门内化石桥专门学堂尚志学会）。该会之宗旨为宣达民意监督政府。于成立大会上制定会则十三条，颁布政纲如下：

一、巩固共和政治。二、确立统一主义。三、发展社会实力。

另行附设由法制、财政、行政三科，组成政治讨论部以谋研究政治问题。该会常务干事有：

严修、范源濂、吴鼎昌、籍忠寅、梁志宸、曲卓新、那彦图、刘泽熙、陈懋鼎、周大烈、刘颀虞、蹇念益、邵羲、王振圭、黄为基、林志钧、李榘、王璟芳等。

通观此等干事几乎无一不属于袁氏幕下或其系统者，如严修为袁氏之股肱，籍忠寅为北洋法政学堂监督、资政院民选议员，常接受袁氏之意旨，致使舆论沸腾。那彦图为庆王之姻戚，曾与袁氏结合。陈懋鼎以前在外务部乃由于袁氏之推挽，刘泽熙联合杨度组织共和促进会，要求清帝退位，实则刘为袁之徒弟，秉承其意行事。而周大烈、邵羲、蹇念益、曲卓新之流均为刘之与党。至于范源濂乃袁氏幕下之有力者，先被派往南方，现任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学部次长。以上无一人与袁氏无关系。既有如此之因缘，则其与共和党合并从事政治活动决非偶然。

第四项 民国公会

该会仍以浙江人为核心之政党，由前浙江选出之资政院议员

陈敬第及关心者袁文蕤、黄群、诸翔九等倡议组成，今年四月上旬成立。该会制定会则十四条，发表政纲如下：

一、保持中华民国之统一。二、建设巩固之中央政府，顺应世界大势、促进民国进步。三、兴起健全之舆论，保证民国之民权，以期由此永无障碍。四、期望国民经济之发展。

该会成立时总部虽设在上海，但后根据其会则第二条规定，迁往中央政府所在地。该会成立后因时日尚浅，缺乏有力之会员，遂与具有相同政纲之各政党合并，组成共和党，且与国民协进会合作，在上海收买中文报纸《时事新报》改为纯粹之共和党机关报。

第五项 国民党

该党乃亲美派朱寿朋、汤一鹗、潘昌煦、陆鸿仪等所倡导，得伍廷芳等之赞助，于本年二月二十七日成立之政党。党员少，党势不振。该党之主义为“在全国统一政治下，以人民为国家之主体，充分保护一切固有之权利，发扬共和之精神。

其纲领如下：

一、养成共和精神。二、采取美国之共和制，根据杰克逊之学说，以国民民政为行政基础。三、外交以亲美为主义。四、尊重国民之权利、义务。五、制定完全之宪法。六、期望召开国会。

该党原与统一党有密切关系，最近合并为共和党，仅为自然之趋势而已。

有如上述共和党在该国系包括多数较有力之政党合成一党者。该党成员中纵然有众多之前朝遗臣及有旧思想之学究，然彼

等通晓该国实情，对政、商、军、学各方面有阅历之人极多，故态度稳健，能孚輿情，使党势兴隆，固有其理由也；且其背后又有袁氏巧妙操纵。但该国人猜忌权势之念极甚，现各挟其势力合成大党，将来不能无分裂之虞也。果然不出所料，成立后不到旬日已出现内讧。即章炳麟不满意合并方案，率旧统一党部分党员脱离共和党。程德全又愤慨章炳麟之偏狭而脱党，但在章脱党后又复归共和党。据云章所率之统一党在人员方面有多少变动，但其组织政纲与旧时无所不同。

今两者虽仍有多少纠纷，但共和党自章炳麟分立后，目下似正进行巩固党基工作。余认为该党与同盟会居然同为大党，将来对该国内治外交之作用盖不可侮，故该党之盛衰消长必须予以密切注意。

第三节 国民党（未成立）

共和党成立后政党合并之风大起。盖大势所趋，对多数政党纷然并立已不堪其烦扰故也。如该国民党亦系企图合并而尚未完成之大政党。该党将由国民协会、统一共和党、共和建设党及国民公党四政党合并而成，由各方推派代表，目下正在上海、北京商议。各代表在北京商议情况如下：

国民协会代表：张国淦、张鹤第、张嘉森。

统一共和党代表：吴景濂、殷汝骊、欧阳振声。

共和建设讨论会代表：汤化龙。

国民公党代表：虞熙正、江孔殷。

各代表经数次商议后，由张嘉森执笔就该党组织方面规定三条。

一、定党名为国民党。

二、党义有如下四点。

甲、巩固中央权力、维护国家统一。乙、培植自治能力，奠定共和基础。丙、同化种族，谋求共同进化。丁、采用社会政策，重视国民生计。

三、本党实行上列四点党义。

又根据中国政治、财政、社会上各种事情，在国会议员选举及国会开会时发表政纲，实行本党之政见。

如斯该党虽以国民党之名义发表政纲，但尚未见其联合成立，依然为一悬案。余问一中国人，彼曰：国民党之所以不见成立，由于共和建设讨论与国民协会坚持推举梁启超为国民党副理事，而国民党与统一共和党尚未同意，故难以合并。真伪一时很难断定，仅作为说法之一附记于此而已。处此政纲既已发表、代表正在协商，岂非应在互相谅解之基础上妥为解决乎？兹就可视作组织上一分子之政党叙述如下。

第一项 统一共和党

该党由国民共进会、共和统一会、政治谈话会等三团体合并而成，本年二月二十八日成立。以后国民共进会与之分离，将总部北迁。（参照下一章）

该党之主义乃巩固全国之统一，建设完美之共和政治，顺应世界趋势，发展国力，以求进步。

其政纲如下：

一、整理行政区域，以统一于中央。二、调整税利，以期负担公平。三、关心人民生计，采纳社会政策。四、确保国民生

计，采用保护贸易政策。五、划一币制，采用虚金本位。六、整顿金融机关，采用国家银行制度。七、建设铁路干线，谋求充实其他交通机关。八、实行军国民教育，促进专门学术。九、振兴海陆军备，采用征兵制度。十、保护海外移民，奖励开垦边地。十一、普及文化，融和国内民族。十二、注重邦交，保持国家对等权利。

见其政纲可知该党与统一党有同样志趣。但该党别有党则八章二十七条。总部：前南京，现已迁往北京。

该会职员如下。

总务干事：蔡锷（云南都督）、孙毓筠（前安徽都督）、张凤翥（陕西都督）、王芝祥（广西军司令官）、沈秉堃（前广西巡抚及都督）。

常务干事：殷汝骊、张树林、袁家普、陈陶怡、彭允彝。

参事：萧堃、李载赓、马邻翼、黄序鹗、贺国昌、沈钧儒、刘馥、阮性存、席聘臣、赵世钰、景耀月、许燊、吴景濂、王葆真、李素、欧阳振声、刘彦、张蔚森、陈景南、周珏。

其所网罗者以湖南、山西人士为主，大抵介于同盟、共和二党之间，保持中立之态度。该党在人材方面与其他党相比毫无逊色。若就党员之阅历及政纲而言，概系与昔日宪政党（保皇会）色彩之人物相合并，其意在于实行纯粹之立宪共和制。（另一说为：该党因四党合并困难，故单独改称国民党。）

第一款 共和统一会

该会系去年十二月二十日成立，从其政纲（意见书）与发起人观之，便可知该党处于当时混沌状态之中企图统一纷乱之舆论及党派，组织完全之政党，以确立共和政府并统一全国。其纲领

与发起人如下：

一、以推翻满洲政府为目的。二、期望恢复战后秩序。三、谋求确立国体与增进人民程度。四、鼓舞国民士气，以达到健全之政治希望。五、注意外交，防止干涉之端。六、崇尚人道主义，尊重人民之生命财产。七、完成南北统一，成就民主共和。八、排斥组织联邦政府，奠定国是，督促制定宪法。九、维护领土完整，确立五族（满、汉、蒙、回、藏）联络。十、统一各省之舆论与行动，建设健全之大共和国。

其发起人如下：

伍廷芳、张謇、唐文治、温宗尧、胡瑛、王宠惠、赵凤昌、陈其美、钮永建、汪兆铭、马君武、于右任、朱葆唐、景耀月。

该会以后不见任何政党活动，可以认为在创设之际为求国内之统一，由同盟会与联合会之赞同者提倡，加以一时之利用而已。

第二款 国民共进会

该会虽属于统一共和党组成者之一，但最近独立，在北京设总部，在上海置总机关部，有关本会详细情况在下一章述说。

第二项 国民协会

该协会于去年十一月六日成立，当时温宗尧、伍光健、张嘉璈等感到革命目的尚未达到，南方诸省即有动摇反抗之兆，忧虑有使民国分裂之虞，因此谋求融合统一，和衷协济，努力达革命之目的。当时发表宣言政纲如下。

一、处此列强角逐之时，尚能苟且偷安乎？本会目的为打破历来存于各省间之割据宿弊，与全国志士同心戮力，建设坚固不

拔之政府以达到我国民最后之目的。

二、破坏时代已成过去，今乃万事建设时代。今之重要问题在于组织政府、议会，制定宪法，统一军政与统一财政，网罗人材探究其得失。

三、自各省响应设立军政府以来，地方治安虽得以维持，但于建设之际最须注意者为不流于武断。本会之方针在于使国民保持其各自之自卫权，监理行政。

四、发表政见，促进当局改革，指导舆论，以期确定人心之归向。

至该年一月二十三日于上海召开成立大会确定各种部署。以唐文治为名誉会长，举温宗尧为干事总长。温氏在该会上演说该协会之主义。又发表如下三点政纲。

一、统一国权。二、培养国民之元气。三、谋求民力之发达。

当时该协会职员名单如下：

名誉会长：唐文治。干事总长：温宗尧（温辞去后由王人文代替，但两人均辞去加入国民公党）。总务部长：张嘉璈，部员四名。调查部长：夏廷桢，部员七名。交际部长：沈作廷，部员七名。研究部长：稽荃孙，部员十三名。评议部长：伍光健，部员二十名。名誉赞成员：伍廷芳、李钟珏、周晋鑣、哈磨、陈其美、黄郛、虞和德、高云麟、朱佩珍、唐元湛，胡瑛、纪芹生、沈敦和及其他共三百余人。

该协会主义稳健，会员亦多为旧官吏地方绅士。本年四月初旬更迭该会干部，唐文治、温宗尧、王人文等人离去，唐绍怡加入，任名誉总理，杨士琦，袁树勋为协理。四月七日召开大会，发表如下政见：

一、实行厘定行政区域。二、提倡实行地方自治。三、奖励移民实边。四、期望整顿并充实陆海军备。五、促进整理财政及刷新经济政策。六、保护农林、矿产者予以奖励。七、谋求振兴实业教育。八、注重国民外交。九、期望司法权独立。

该会之参议员如下：

诸翔、向瑞琨、袁思永、赵从藩、沈祚远、汪秉忠、张国溶、张浚、杨景赋、高彤墀、陈明善、凌文渊、李国祿、向瑞彝、彭继洵、李国琮、吴鼎昌、陈时夏、卢初璜、施绍常、蒋汝藻。

观其组成人员，便可知与其称为民党，不如称为政府党。何况如唐绍怡、杨士琦、袁树勋等袁氏股肱之徒在主宰该会。

第三项 共和建设讨论会

该会为旧宪友会人员所组织，以谢远涵、刘崇佑、汤化龙、孙洪伊、林长民、李文熙、萧湘等为核心，参照第一编第五章，多为所谓旧咨议局联合会残党。该年四月中旬在上海置总部。

该会职员如下：

编辑干事：汤化龙。

文书干事：谢远涵、林长民、萧湘、杨增萃。

会计干事：陈元佐、陈兆瑞、陆乃翔。

庶务干事：余绍宋、李文熙、刘树森。

交际干事：胡瑞霖、陈焕章、孙洪伊、李芳、窦以珏、吴景濂、梅光远、李素、黄可权、向瑞琨、赵熙、杨兆麟、许炳榛、陈登山、马中骥、刘崇佑、余庆龄、钟紫垣、陶懋鑫、吴璆、李缙云、高松如、陈廷冒、张嘉森、欧阳烈之、黄耀宗、蒋士宜、

三继贞、梁祖禄、夏瑞芳、刘世珩、潘澄波、陈元灿、王丰镐、陈官一、郑官应、郑业臣、谷钟秀、黄中垠、饶孟任、马仕纯、梁应锦、胡仁源、陵士钧等。

其中有多人作为议员在中央及地方已累积相当之经验，又有不少旧宪政会派（康梁一派）人物。当此四政团合并之际，主张招致梁启超为副理事，决非偶然也。

该会因尚未成立为政党，故不见其发表政纲，但据云其以稳健进步为宗旨，志在创立坚强之政党。试观该会之组成分子，将来被认为其极有希望。

备考：或曰该会有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结合，并与康、梁一派联络，而与同盟、共和二党对峙之倾向。

第四项 国民公党

该党原称中国共和研究会（本年年初成立），乃一政治团体。本年三月它改称国民公党。据说先前王人文、温宗尧等脱离国民协会，推戴岑春煊、程德全等，改中国共和研究会为国民公党云。该会首脑如下：

名誉总理：岑春煊、伍廷芳、程德全。总理：王人文。协理：温宗尧。

其政纲如下：

一、实行平民政治。二、整理地租厘金，减除苛税。三、尊重法律，拥护人权。四、调济国用，休养民力。五、提倡国民外交。

又制定党规八章二十七条。目下会员号称四百余名。有人或以该会之主宰者为岑春煊之故。彼于南方之輿望及政界阅历，预

料其或可对袁政府起而反抗，但观岑氏之现状与党员及党之政纲。盖可思过半矣。余以为该党有如前述志趣相同，若不与有力之政党合并，决不能希望获预期之活动。然而，该党就历来之借款问题及其他财政问题、政治问题对政府提出忠告。

第五项 政友俱乐部

现时中国具备所谓政党素质者，以上述三党为最，从而在中央政界活动者亦限于此三党。现彼等已启党争之端，各以争夺权势为事。中央政府固不待言，全国亦不堪其纷扰。政友会则政府授意为减少此弊而组织之融和党争之机构也。

该俱乐部于五月下旬发起，开始时称三党俱乐部，后改称现名。其主旨曰：为消除共和党、同盟会、统一共和党相互之误解，融洽彼此之感情，辅佐现时正在建设中之政府而组织政友会。

五月二十日，共和党代表汤化龙、李肇甫、陈鸿钧与统一共和党代表谷钟秀、张树森、章勤士进行协商，成立该会。会内另设政谈会，其大要如下：

政谈会规约

一、本会以联络感情、交换政见为目的。

二、本会由以下各员组成。

甲、各政党参议员及干事。乙、各政党之国务员。丙、各政党之新闻记者（每社一人）。丁、各政党委员五名。

三、该会由各政党推派干事一名，共同经理会务。

四、本会在每月之第一个星期日召开常务会，会议由干事在三天前通知。若有紧要事件可由干事商议后召开临时会议。

五、本会之经费由各党负担。

六、本规约经各政党职员会议决议认可后施行。

至此政友俱乐部成立。但上述三政党之争愈演愈烈，不易获得融和党争之实效，终将流于有名无实。

第四节 设在上海之团体

目前在中央政界活动之政党有前三节中所述之同盟会，共和党及国民党（统一共和党）。至于其他团体，大多与上述三党无关联，不过区区小党而已。但各有其主义政纲，亦不能忽视。现将南北政治之中心分为上海与北京二处叙说。先述上海，因上海政党之出现先于北京，北京之党派大多脱胎于上海之政党。

第一项 共和宪政党

该党原为共和宪政会（本年三月下旬改称为党），党势不振，但为一稳健之政党，现先叙其前身共和宪政会，然后再述及现状。

共和宪政会于去年十二月三十日成立，由李平书、朱绳光、潘镜登、沈练石等为主导，根据自由平等即三大自由之说，以共和宪政为大纲，期望完全达到战后之统一。其当时之宣言曰：参酌欧美共和各国之宪法，制定适合中国国情之宪法，确立纯粹之共和政体，绝对反对君主政体，享受自由平等之幸福，督促实行共和政体云云。

孙文及陈沪军都督等在其成立时曾派委员参加开幕式。成立后尚不满二个月，即有会员三百名。且在杭州、嘉兴、嘉善、海盐、绍兴、宁波（以上为浙江省）、南京、镇江、扬州、泰州、

淮安、兴化（以上为江苏省）及福建、广东等地设立支部。当时发表之政纲如下：

一、振兴实业。二、整理财政。三、与德国、美国联盟。四、普及教育。五、缩减军备。六、谋求社会之进步。

其职员如下：

会长：李平书。副会长：伍廷芳。总务部长：郑允恭。文牒长：苏平甫。庶务长：唐小澜。会计长：郑子庚。交通部长：费璞庵。研究部长：杨春若。编译部长：李藻臣。宣讲部长：企徐文，部员五人。

该会计划发行共和宪政杂志作为其机关刊物。其宣讲部则巡回各地致力于宣讲该会主旨，扩张党势，宣扬共和宪政。

该会成立时，因国民对日、英两国之感情最好，故其政纲之一乃声言其外交政策为联合日、英两国，但以后因借款问题等对日本舆论不佳时，即改为与德、美联盟云云，作为拟定政纲发表。无论其有无一定之主义，但可谓此乃充分暴露反复无常之中国人之性情。

如此顺从舆论以图扩张党势为该国民间所欢迎。至三月下旬遂改为正式之政党，称为宪政党。其结果党之机关部亦改为如下形式。

正首领：伍廷芳。副首领：李平书。

总务部长：郑允恭。交通部长：赞元煜。编译部长：陈福民。宣讲部长：戈鹏云。

该党附设南洋法政学校，致力于培养学生，以图扩张党势。然而因政党实力尚小，难于在中央政界单独活动。

第二项 自由党

该党由《天铎报》主笔李怀霜及留学生王钺、赵钤章等发起组织，其主义乃维护社会自由，驱除共和之障碍，故鼓吹绝对之自由，带有社会主义色彩，主角大抵为少壮留学生或新闻记者等。有声望与阅历者少，兹试列举如下。

蔡之韶、谢树华、林兴乐、杨兴春，徐麟寰、高冠吾、梁舜传、梁炳麟、罗传、王钺等。当时在下列各地设有支部：

苏州：汪绍芳。常州：丁锡龄。镇江：许公武、郑权、胡义宪。广东、香港：黄温初、方丽泉。浙江：罗传。四川：何观光、贾尚甫。福建：陈毓祺、刘崇彝。云南：赵铨章。

该党在本年二月三日于上海举行成立大会。是日美国传教士即曾在中国组织万国改良会并与政治及其他各种事件有关系之丁义华（Twing）亦出席该成立会，引起各方注意。继而于本年三月下旬该党例会上发表如下政见：

一、注意民生与民权之关系。二、研究公理中之平等、法律上之自由。三、提倡人道主义。四、使一般知晓自由平等之国家关系。五、明确地方自治与自由之关系。六、使黄帝子孙之汉族知晓数千年来尚未能获得自由，指示必须尊崇自由，维护完全之自由。

该党推戴孙逸仙为正主裁，黄兴为副主裁，李怀霜主持党务。该会性质近似同盟会，以《天铎报》及《民权报》作为言论机关（虽一度因纠纷曾与该党断绝关系，但以后仍维持多少关系）。唯以该党主张社会主义，党内多为年少不逞之徒，故尚未获得社会信任，但因与同盟会、社会党同一宗旨，不顺从现政府，将来势必为成人难以驾御之党派。

第三项 社会党

该党系浙江人江亢虎（《天铎报》记者）所提倡，以欧美社会主义为准则，掺杂中国固有习俗观念，主张绝对自由平等，争取女子参政权。去年于上海召开第一次社会主义研究会。本年一月十日召开成立大会，以后竭力扩张党势。该党首领除上述江亢虎外，有李怀霜（自由党临时主裁）、张继（革命党中著名人物，直隶天津府沧州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曾在法国首都巴黎出版《新世纪报》，热心宣传其主义。今作为同盟会之重要人物在北方活动）等热心之倡导者，故势力日趋壮大。目下本部设在上海，各地有其支部。其主要支部及人员如下：

苏州：陈翼龙、詹天雁、李静吾（女）、斐桂珍（女）。南京：高观潮。扬州：季志云、冯叔鸾。淮安：陈少侯、汤钤。镇江：赵钦汉、吴豹卿、陶德源、马凤池。常熟：王冀如。平湖：沈懋学。常州：刘荣昌、杨游。广东：谭民三、叶夏声、易侠。绍兴：杨无我。嘉兴：朱铭勋。

其他支部所在如下：

长沙、南昌、泰县、芜湖、宁波、杭州、海盐、武昌、汉口、汉阳、台州、海安镇、嘉应州、福州、中洲镇、余杭、无锡、江阴、清江、大通、萧山、崑山、长安镇、泉州、大安、南通州、高邮、六合、梅州、庐州、荡口镇、新市、十二圩、黟县、嘉善、邵武、兴化、天津、汕头、海门、浦口、安庆、崇明、宿迁、重庆、厦门、丹阳、松江、沙市、嵯县、乌青镇、景德镇、滁州、雋阳、右门、新篁镇、路桥、太仓、宁国、南陵、镇海、湖州、浦东、钱江、蕲水、临海、蒲圻、岳州、江陵、普

陀、菱湖等八十余处，党员号称五千人。发行机关报《社会日报》（夹入《天铎报》发送，但现借《民立报》之一部分为社会党之发言机关）。该党如其名称所示，带有破坏因素，议论偏激，行动多无节制，因此不能普及于上流社会而成为一种野心家或下层社会所欢迎。如今该党党势之扩张恰如燎原之势正向全国蔓延。该党与主义相似之同盟会接近，常对现政府持反对态度。

据闻该党内急激之无政府主义派与温和之民生主义派有分裂之倾向。

附一 仁党

该党系社会党党员所发起，主张博爱、人道、平等主义，以实行大同主义为其目的。其党纲如下：

一、泯灭种族之别。二、筹措平民之生活。三、破除社会阶级。四、主张土地国有。五、力谋资产平等。六、实行义务教育。七、提倡农工商。八、改良社会习惯。

当时本部设立在南京，但以后不与社会党采取一致行动。

附二 万国统一天民党

该党与社会党虽无直接关系，但由旨趣相同之闻天裔、冯复苏等发起。其设立之宗旨曰：扶持人道主义，增长道德，提倡民主，以谋社会上之最大福利为目的；斥责破坏社会秩序、妨碍公共利益者；对他党予以道义上之支持；在国界中不设种族之界限，一视同仁，以博爱为起点，以统一五大洲为最后目的。

其盟约曰：

一、以道德为君主。二、人人以天民对待自身。三、不作消

极行为。四、对本党应表示恳挚之情。五、对党则应表精神上之同意情。六、入党后应终身为党员。

且党员贫富平等、法律平等、有福共享、有苦同当，系一种在党规极严之下的社会党。据云该党发行《天民杂志》为机关刊物。该党于今年四月成立，无任何势力。

以上两党因与社会党有同一宗旨，故收在同一项内。



第四项 共和促进会

该会以沙淦、厉明度、张明远等军政两界有志之士为中坚。去年底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以伍廷芳为名誉会长，陈其美为名誉副会长，会员号称数千人。该会按以下主旨从事活动。

一、确立民主国体，政治组织应采取法国制度。二、主张国民会议采取两院制。三、确立本会作为政党之基础。四、萃集广泛人材从事政治活动。五、与各政党团体及各省政治机关联络、谋求扶植本会势力。六、辅导共和政府、确定施政方针。

当时南北和议尚未达成，时局前途混沌，故该会仅为一促进确立共和政体之团体，缺乏作为政党活动之素质。但至今年奠定基础后，已发表政纲，带有政党色彩。

其政纲如下：

一、促进共和、建立单一制国家，设内阁总理。二、持急进主义，实行国家主义。三、主持中央集权，改良行政区划。四、采用五权分立说（所谓五权为立法、司法、行政、教育、纠察）。五、国会根据两院制，采用普通选举法。六、谋求宪法及各种法律之改良。七、委托专家整理财政。八、依照改良社会主义，以图经济之发达。九、改革通货，发展金融机关。十、采用农商并

重主义。十一、全国励行征兵制度，扩张军备。十二、实行移民开荒，巩固边境。十三、注意国际竞争、国际间或社会之事件。十四、实行强制教育。

以上政纲虽然气势堂皇，但其实有无实力乃属疑问。该会成立虽已半年，但一无所闻。近时以会员陈介石为干事长，计划振兴会务，但因首脑不得其人以及财政困难，呈现尾大不掉之状。如不与主义相同之大党联络，毕竟不可能在政界角逐也。

第五项 大同民党

该党系光绪二十七年前后为襄、陕、潼尚字革命团所发起。本年春间在上海纠合同志改造为政党。发起人名单如下：

陈天华、张震亚、何观莲、杨牲之、梁牺、倪学宽、陈英培、姜坤、毛祥澍、魏彦龙、章俊、宁亥靖、章水天、焦桐、张烈裔、张笠阶、李荃、丁宜中、章时瑾、陈言、章汉廷、娄善箴、萧汉、邹光汉、李本汉、叶惠钧、胡宗楨、伍廷芳、成济汉、许纶。

赞成人有如下数人：

黄兴、李登辉、蒋汉民、李平书、黄云台、刘复汉。

该党宗旨在于将消除畛域，联合同胞，实行共和等各要素组织成为一体。

该党之性质为清除满人专制之余毒，振兴汉族。故视全国如一人，视天下如一家。我国同胞尽天职天分，立于公平无我之立场，共同一致享受共和之福。

另设党规十条，由下列职员管理党务。

会长：章水天。第一支会长（苏州）卢振声。第二支会长

(镇江) 娄善箴。第三支会长(扬州) 陈天华。第四支会长(南汇) 顾藩。第五支会长(荡口镇) 李本汉。第六支会长(平望镇) 黄洛同。太平县支部: 张崇直、林俊。此外有支部七十余所。

该党之主旨为联合五大民族, 谋求融和, 将来之重点置于实业政策及社会政策之上, 计划创办银行、学校及医院。该党本月将《民强报》作为其机关刊物。原来该党与同盟会有密切关系, 在所有问题上现与同盟会采取一致步调, 与自由党、社会党及促进会均成为同盟会之有力后援。

备考: 会长章水天因近时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等之党争加剧, 故发起组织三党联合会。

第六项 中华进步党

该政党于今年二月底成立, 在上海设总部。主要由少壮留学生发起。日本、新加坡、青岛、香港、汕头等地均有支部。其主义为尊崇道德, 改良社会, 促进实业发达, 增进人类幸福。其重要发起人如下:

苏筠尚、杨岷庄、郑鉴守、郑正秋、刘惠人、叶惠钧、洪炳甲、周复生。

三月下旬发表政纲如下:

一、巩固国是, 伸张国权。二、普及平民教育。三、尊崇道德, 改革宗教, 拥进世运。四、改良社会, 尊重人权。五、振兴实业, 救济贫民。六、致力农业开垦, 提倡奖励劳动者。七、力谋交通殖民事业之发达。八、平均地权, 实行削减地价主义。九、修改法律, 破除阶级。十、监督行政, 力谋国际平等。

十一、鼓吹弭兵，增进人类福祉。

上列政纲之主旨与社会党相仿。四月十七日在上海万国改良会事务所召开职员选举会，决定如下：

正主裁：谭人凤，湖南哥老会头目北面招讨使，现任粤汉铁路督办。

副主裁：李经羲，前云南总督。

名誉主裁：苏本炎。

临时评议部长：刘集贤。临时干事部长：李光瀛。临时文牍部长：杨震瀛。临时交通部长：庞光志。临时纠察部长：柳大年。临时调查部长：郝儒林。临时庶务部长：李洽。临时财政部长：翟师彝。

名誉赞成员：李怀霜（自由党临时主裁）、丁义华（美国人）、林檀浦。

该会虽尚未作政党行动，但其政纲类似自由党、社会党，且党员多与二党有关系，将来联络该党，并与同盟会结合在政界发挥重大作用亦未可知。

备考：值得注意之事为万国改良会会长美国人丁义华，与社会性之政党有关系。丁义华先在京津地方以万国改良会名义鼓吹禁烟，大为满洲政府所悦。后在天津一面蒐集有关时事问题之各种消息，无偿寄与中国各家报社，常报导与日、英、俄三国不利之消息，鼓吹排日、排俄风潮，灌输亲美主义（彼为此事业通过天津美国领事、北京公使从美国政府领取活动津贴。革命爆发后，他在南北各地奔波，利用中国人之亲美热，进行各种政治活动。先以一外国人身份要求清帝逊位，后又议论各国承认中国共和国问题等。其所为无不如此。）日前出席自由党成立大会，今

又为进步党名誉赞成员。作为在中国从事亲美排日之主动者，与此辈隐蔽在宗教下之传教士之尽力大有关系。

第七项 公民急进党

该党系今年三月上旬成立，其设立之主旨为“灭亡清朝南北合一，国民负有责任。若党派纷争，公私不分，必启全国分裂之端。而政事有方针，若不与人民以刺激，则民国难以成立，我公民急进党为而生”云云。

其宗旨为扶正锄非，化私就公，拥护民权，发展民意，使全国人民各尽公民之天职，造就完全之共和国家。

发起人有下列诸人。

周福鹏、郑铁如、徐千、查士端、罗鸣举、邹东山、鄢江如、田颂尧、陈鹏云、高集生、沈剑侯、梁炳麟。

本年五月上旬召开临时会议，选举职员，并议决以四个月为期在全国已预定支部设立二分之一时，便可召开正式大会。

掌理：沈剑侯、许九畹、陈飞公。

参事：查士端、郑铁如、刘强夫、张觉民、唐端夫、孙寄尘、周俊人、陈根香、谭经纬、王甦民、顾允中、丁毓青、彭治齐、陈汝舟、张馨谷。

监察：沈剑侯。理财：孙采丞、许绶臣。总务：查士端。文牒：张觉民、唐端甫、黄芬团、王生一。交际：孙寄尘、郑仲诚、王伯祥、刘共山。会计：王梦生、袁秀身。庶务：郭秉孚、周仲华。

该党尚未为重要政党。若不与大党合并或附随大党，难以驰驱政界。

第八项 中华国民自竞党

该党系本年四月初成立，其主义为提倡公义，遏止私争，发扬国家精神，增进国民幸福，兼与列国为伍，发挥国家价值。又本党联络各省主要志士，开通民智，促进自治机关之发达，期待民国之完全。

一、着重教育。二、提倡实业。三、振兴尚武风气。该党特别规定凡中国人民有自治能力者，不问男女均可成为该党党员。

发起人如下：汪子静、徐蕴玉、庄子湘、李寿耆、钮荫芝、胡志平、陆汉生。

第九项 竞进会

该党系本年四月中旬上海绅士陈梈、陈华等发起组织。以竞争进步为主，重视道德，注意实业，谋求民国之发达。该会以注重民国成立后的国民生计，联合大多数国民，不问男女共同研究民生主义，讲究自治道德，养成营业之品格，去除依赖心，言行一致，振刷国民独立之精神为目的。其主要职员如下：

名誉会长：徐绍楨、沈勇楨。协理：陆树范。正会长：陈梈。副会长：陈华

本年五月初旬举行欢迎上列职员大会，名誉会长徐绍楨对该会活动提出希望，承诺支出补助金。美国人丁义华亦列席当时之成立大会。

第十项 政益会

该会系江苏人恽毓龄等发起组织，会员大抵为前清官吏或道

学派人物，坚决反对革命，为维持该国名教，主张君主立宪。今因急进派势盛故表面上蛰伏，但暗中却在网罗满汉有志之士。目下总部设在上海英租界白克路，正在谋扩张党势（上海有二百余名会员），但无起色。如欲进行政治活动而不与同一主义之政党联络或不与大政党合并，则不能贯彻其主义也。

恽毓龄江苏常州人，前安徽官钱局总办，年五十六岁，属道学派，与陆润庠、荣庆等友善。

第十一项 华侨联合会

该会由海外侨民中回国者组织，其主义如下：

该会联合海外侨民，共同一致协助祖国政治、经济、外交之活动，研究侨民之利害，其成员以广东、福建、浙江等省人为中心，发起者如下：

南洋代表：吴荣世、汪兆铭。美国代表：冯自由。夏威夷代表：温雄飞。日本代表：马联三、黄卓三。爪哇泗水代表：曹育文、王少文、亚齐、谢碧田。新加坡代表：吴应培、蒋玉田、何剑飞、张永福、张仁南、林文庆。马尼拉代表：卢治三。爪哇三宝瓏代表：蒋逸波。仰光代表：陈钟灵。爪哇巴塔维亚代表：李竹舫、白蘋洲。暹罗代表：吴金发、陈载之。槟榔屿代表：徐瑞霖。

几乎均为同盟会会员。为参考计，其主要赞成人及名誉赞成员主要如下：

名誉赞成员：黄兴、蒋作宾、黄钟瑛、居正、魏宸组、胡汉民、伍廷芳、蔡元培、张謇、汤寿潜、唐绍怡、陈锦涛、徐绍楨、温宗元、陈其美、宋教仁、吴志伊等六十名。彼等均为与民国有关系之重要人物。

现由下列职员处理会务。

评议长：林文庆。评议员：陈载之、张永福、冯自由、王少文、吴金发、蒋玉田、李锦堂、方迺三、缪安光、何剑飞。

庶务科：马聘三、吴应培。会计科：庄啸国、徐瑞霖。书记科：谢碧田、白蘋洲。调查科：蒋逸波、卢治三、曹育文。

该会于本年二月初旬举行成立大会，同时发表宣言性政纲如下：

一、谋求联合统一广大在外侨胞。二、主张并尊重华侨之权利。三、促使政府确定将来对华侨之政策。四、实行殖民政策，谋求保护海外移民。五、着重收回权利，发展海外贸易。

该会非纯然政党，系海外侨民之保护团体，但将来必与同盟会联合在政界活动。

第十二项 上海社会联合会

该会之目的为谋革命战后之社会改良，希望生活于完全共和政治之下，以联合上海各团体进行政治上之共同研究为目的。该会由当时上海勃兴之公余学社、学商公会、西北城地方协赞会、舆论折衷会、东南城地方协赞会、公益研究会、农人公会等组织。主要除干预地方上社会性事件外，不进行政治活动。

第十三项 五族少年同志保国会

该会于本年五月下旬成立，为年少之徒团体。以《民权报》记者戴天仇为会长。该会设志士团、辩护士、探访团、童子团及敢死团，以鼓舞国民元气，培养法律知识，灌输尚武精神为主义。发起者有：雷振、张治国、金石志、陆联魁等二十八人。赞成者有：

岑春煊、王人文、姚文栋、高崇礼、梅竹庐、胡康等名士。该会之主体为年少轻佻之徒，其言行诡激，早早欲涉政治。如在北京参议院反对借款条件，发电强求承认国民捐等。颇似孙逸仙在海外组织之少年中国党，目下号称会员二千余人，乃同盟会之宠儿。

第十四项 统一国民党

该会系本年六月下旬成立，由郑浩然等留学生组织。彼等慨叹今日时事多难，党争日甚，诉诸国民爱国之精神，澄清民气，以期完全之统一为目的。其政纲如下：

一、厘正行政军民分治之区域。二、保全国家权利，维护国际和平。三、整顿金融机关，发展国民经济。四、励行征兵制度，巩固国防。五、兴振实业，采用保护贸易政策。六、普及教育，培养专门人材。七、从速敷设铁路干线，以谋交通之便利。八、励行移民垦殖，促进边荒之同化。九、整顿盐政，改革税法。十、实行男女平等教育。

由此观之，该党之性质毋宁说是近于旧统一党，将来可望发达，唯以正在创设之时，尚无可观之实力。

第十五项 少年中国党

该党乃孙逸仙等为扩张革命党在海外各地之组织（以美国旧金山为根据地），有如秘密结社，内容不明。主张以国民捐款作为减借外债之手段。彼等与孙、黄一派关系甚密。

第十六项 政见商榷会

该会为挽救政党林立、党同伐异之弊，融合各党之感情为目

的。发起人有如下诸人：

黎元洪、黄兴、唐绍怡、伍廷芳、汪兆铭、王人文、蔡元培、宋教仁、于右任、赵凤昌、熊希龄、程德全。

以上诸人乃当时民社、同盟会、统一党、国民公党（今之共和党、同盟会、国民党）之首领，在融合各党，进行研究政治问题之最适当之机关，但实际上完全为一有名无实之团体。

第十七项 国民公会

本会虽称江苏省国民公会支部（总部在苏州），但实质上执行总部之事务。为江苏省有志之士陆蔚臣、李伯增、江确生、梁幹臣等所组织。设立之主旨为鉴于现时国内党会林立，会员复杂，互相竞争，与社会之实际相违背，故“本会以纯正为主，监督政府，保护人民利益，结成团体，实行社会政策。”其职员如下：

正会长：姚子梁。副会长：江确生、李伯增。会计长：何伯勤。文牍长：蔡芝庭。庶务长：梁幹臣。

另设医业部。该会与其称作注重政治，不如称之为注重社会政策。

第十八项 救亡会

该会系由所谓伶界联合会发起，以潘月樵等为主角，成立于本年五月下旬。仅主张反对借款及反对财政监督。乃好事之少壮不逞之团体。仅当时该会主席戴无仇为同盟会会员一事，可说明该会与同盟会之关系而已。

第十九项 国民捐会

该会以所谓募集国民捐为手段，推孙逸仙为总理，王人文、沈秉堃为干事长，以拒绝外债为目的的同盟会外围组织。

第二十项 其他团体

上海之政党结社层出不穷，实难一一枚举。而其主要者大抵已尽述其概要如上。至于其他团体未必重要，仅列举其名称如下：

一、共和建设会。二、国民总会。三、商团共和会。四、律师会。五、中华国民鼓舞社。六、伶界联合会。七、民生国计会。八、东社（该社以融和新旧各社团为目的而组织者，同时指导国民，监督政府。由黄钟、郑仲诚、吴兆桓、潘望成等发起，计划发行机关刊物《齐民日报》）。

第二十一项 与妇女有关之会党

该国革命使女子在政治军事上崛起，其团体如下：

一、中华女子竞进会。二、女子参政同志会。三、中华女子共和促进会。四、神州女界共和协济会。五、中华民国女子同盟会。

彼等组织女子北伐队，热中于获得参政权运动，颇为引人注目。但中国女子其知识程度大抵幼稚，不足挂齿。然彼等与社会主义之一派联系，在搅乱该国之风教上亦有几分势力。

第五节 设在北京之团体

首都奠定于北京后，大小政党便集于此，瞬间成为政党之总

汇。兹叙述自南北合一以前迄至今日之情况如下：

备考：南北和议开始之前，北京处于混沌状况之中，故无组织政党之事，仅有君主立宪、同志会等二三团体而已。

第一项 共和促进会

正当南北和议纷纭、清廷犹豫不决之时，袁世凯授意杨度、刘泽熙等在鞏毅之下主张共和，组织该会作为威吓清廷之手段，而非真有所谓主义政见。当时该会主要人物有如下诸人：杨度、王瘠、刘泽熙、邵羲、曲作新、蹇念益、薛大可、陆鸿逵、刘鼎和、乌泽声、舒鸿胎、梅光羲、周大烈、籍忠浜^①等，均为袁派之铮铮者。

第二项 北方共和会

该会亦是杨度一流之群小辈组织，与前者无异。其发起人如下：

黄仁、刘珏、林宗汉、李一得、存竟、赵祈、许球、宋体乾、何士元、朱思诚、文郁、绍先、杨杰、伍道明、承明、李用民、徐竞平、刘彤民、孙仰琴、王志元。

第三项 共和进行会

该会系在京蒙古王公及上流社会之汉人认为若长久不解决满汉之争，将有碍于组织新国家之成立。该会鼓吹共和，欲使清帝早退位。主角为蒙古那彦图等袁派一伙党徒。

以上之会均在清帝退位前即本年一月至二月初旬时设立，其

^①疑为籍忠寅。

他则有共和弭兵会、八旗和兵会等，但均不过当时袁氏实行其野心之机关，不备政党之实质，故此等会党至南北统一后，或解散或与各政党合并。

第四项 蒙古联合会

该会期望革命政变，谋求改良蒙古之风气、政治，保存蒙古之权利，联络全蒙古，以谋蒙古独立之机关。由蒙古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札萨克、台吉、旗员等组织，系喀喇沁王等所提倡，其后该会为控制蒙古之利权提出各种要求，然而在中央政界，其政治活动似无希望。

第五项 共和政体研究会

清帝退位，南北合一，共和政体日愈确定，旧北京政府之官绅有志者，便于二月底组织该会。该会以研究共和之原理，组成完备之政体为目的，虽未能立刻称为政党，但可将其列于政治团体。其发起人如下：

王牧、楼思诰、王承吉、沈承熙、王榆、汪张黻、李绮青、胜柏、李升培、王燮、张湘林、张曾启、徐士瀛、张启熙、黄良弼。

第六项 南北共和宪政会

该会之主义在于联络南北政党及志士，化除畛域，发表政见，讨论共和新政府之建设问题，巩固全国统一机关，且联合军界统一联合会、共和促进会、民社、国民协会，切实贯彻其主义。其发起人如下：

丁乃杨、陆建章、张绍曾、杜潜、傅良佐、唐在礼、姚锡

光、白逾植、李季直、俞长麓、刘思源、刘基炎、蔡儒楷、冷公剑、欧阳萼、韩德铭、李士锐、毛继成、张鸿逵、孔庆塘、方咸五、相治初、睦锦、丁惟忠、丁沙彪、胡海门、华世中、华学冻、刘任秋、张宗楷、苏至元、曾广为、夏清贻、韩云骏、吴烈辉、宗发祥、汪莹、汪树璧、尹渔村、陈维成、郑鸿、王忠荫、蒋耀奎、崔庆钧、刘秉堃、朱纶、靳云鹏、史久力、崔季友、程度、马肇群、廖宇春等，大多为政界较重要人物。该会主义稳健，会员中有与共和党、统一共和党有关系者。将来可能与此二党共同行动。

第七项 共和急进会

该会乃本年二月下旬成立，以永远泯除私见联络各阶级组织一大团体，扶持现在共和政体之成立为主义。其政纲如下：

一、施行民生政策。二、筹划平均地权。三、整理中国财政。四、普及军国民教育。五、振兴实业。六、充实国民经济。七、谋求扩充国际贸易。八、扩张陆海军备。九、实行殖民政策。

据云当时总部设在武昌，待首都奠定后迁移。发起人如下：

黎元洪、黄兴、蒋翊武、蔡济民、刘公、时功璧、郡玉麟、王守箴、马伯援、徐祝平、孙武、潘江、王安澜、曾尚武、许伯华、冯光翼、江华本、张翼。

该会以后与民社争取同一步调。

第八项 纯粹共和社友会

该会之主义在于联络满、汉、回、蒙、藏五大民族及各宗

教，以清除专制之余习，扶助共和国之进化，制造大国民，同时监督国内之行政为主义。不问男女均可以成为该会会员。内设文治部、武备部、教育部、实业部，各部均应为本会尽瘁。其发起人及赞成员如下：

姚珍贤、旷达、戴亦秋、承志、王俊、刘昌、释道阶、刘绍文、彭仲垣、袁祖恩、释来振、徐思谦、周敬廷、沈钟琳、周春廷、胡义、詹道太、何承拴、向华、陶镇民、盛年、骆松林、惠敏、海秋。

第九项 中央集贤会

该会于本年三月下旬成立，志在联合有才德志士，组织纯粹政党，研究治理方法，制定政策。该会目的在于使中央政府之行政机关得其人才，以巩固共和之基础，受共和之福，兼培养人才以备政府采访，条陈利弊，研究时政，以谋国利民富。将下列各项作为其党纲研究：内政、外交、法律、财政、教育、实业、交通、军备、边务。

其发起人如下：

齐忠甲、甲钟岳、郭星五、王志卿、高汝清、李文肇、冯绍唐、杨书升、陈嘉乐、秦玉权、徐谦、马体乾、于定一、文徵、杨乃赓、王太卿、赵振熙、刘述尧、张著谦。

第十项 政群社

该会系本年四月成立，其主义为融化种族界限，增进国民智能，维护领土统一，建成巩固之共和国。其政纲如下：

甲、政治方面：（一）统一中央政权。（二）厘订行政区

域。(三)采用国家社会主义。

乙、经济方面：一、振兴实业。二、拓展交通。三、厘定租税，平均人民负担。四、统一币制，整顿金融机关。

丙、军政方面：一、提倡征兵制度。二、推行屯垦政策。三、巩固海陆边防。

丁、教育方面：一、致力维持国学。二、通晓文言。三、注重小学教育。

戊，外交方面：一、维持国际和平。二、保护侨民权利。

其发起人如下：

胡大勋、刘远驹、王葆心、王人杰、张玉麟、沈乃诚、王璟芳、朱国桢、李盛和、王佑、丁承濂、李学仁、徐大中、李良骏、王树梅、俞之昆、石耀翔、冯汝珍、王正铭、曹敬修等八十余人。不少人均属同盟会之流。因其社员在政治上有阅历者少，故尚未受到政界重视。

第十一项 国群铸一通俗讲演社

该社系在北京之各省有志人士为统一全国思想，扶持共和宪政，稳固进行而组成。主要致力于讲演。

第十二项 民生促进会

据闻该会系同盟会一派与社会党人组成，志在促进民生主义。其政纲如下。

甲、平均地权：一、变革地主契约。二、实行地价税则。三、改良印契税则。

乙、资本问题：一、招募外资，经营生产事业。二、着重劳

动时间问题。

丙、国有问题：一、采用德国铁路国有制。二、尚未经民间修筑者收归国有。三、已修筑者三十年后国家收回。四、矿山为国家所有者，租与民间开采。

此政策虽为稳健之社会政策，但不可能立即实行，将来若不依附同盟会等经营，其效果甚微。

第十三项 民权监督党

该党以伸张民权，监督议院之议案及政府之行政，积极谋划共和政体之进行为主义。其政纲如下：

一、巩固中央集权，建设稳健美满之共和政体。二、监察行政机构，筹划救济对策之手续。三、审查议案之得失，确定维持补助之方针。四、提倡国家社会主义，注重民生问题。五、借外债时本党得质问其理由，得监督支配。六、实行财政整理之策，得查核中央及各省收支是否适当。七、力求国际均势，主张公正外交之策。八、组织演说团，主张强迫教育，讲求急进式齐民之法。九、着重道德教育，积极发达国民之自制心。十、勉励垦殖边荒，巩固国防，实行军事经济性移民政策。十一、改良水利，振兴实业，开发富源，以谋国民生计。十二、发起国民捐，募集爱国公债，劝国民承担责任。十三、采用军国民制，全国振兴尚武精神。十四、剔除专制积弊，改良社会恶习。

其发起人如下：

魏文仲、冯自由、马宗林、李廷辅、崔嵩严、苗士铭、王希贤、李兴中、周振华、郑连陞、戴峻鹏、周夔鄱、周心泉、叶梦元。

此外有同盟会派人士四十余名为谋求扩大民生民权之机构，将来似将与同盟会联合振兴党势，欲在北方巩固其基础。

第十四项 国民共进会

该会于本年二月初旬在上海发起组织。不久首都北迁，即将总部定于北京。彼等原为统一共和党成员，后脱离该党（参照第二节，统一共和党部分）。该会以为国家应以民为本，共策进行。其政纲如下：

一、灌输国家思想。二、维持地方秩序。三、改良社会习惯。四、增进国民道德。五、主张世界和平。六、筹备平民生计。七、振兴工商实业。八、提倡尚武精神。

其职员如下：

会长：伍廷芳。副会长：王宠惠。

会员：徐谦、沈其昌、许世英、马德润、陆定、徐巽、马振宪、沈宝昌、姚箴、舒鸿贻、陈锦涛、罗文庄、罗文幹、顾祝高、陈策、林志钧、王世徵、陈启辉、朱神思、潘敬、张庆桐、胡云程、邓家让、杨观东、牟琳、王廷杨、江辛、胡骏、陈命官、岳昭燊、将履福、李增、金在鎔、张之霖、金兆丰、章兰孙、朱有濂、刘曜垣、郭文徹、萧堪炜、沈元鼎、贾其桓、左坊、王熾昌、舒良弼、胡镛、舒翎、舒继芬、汪培源、何宝权、程炎、陈秉瑜、徐晋、胡凤起、项致中。

该会又在上海设置驻沪机构，由陈其美、应夔丞、张绍曾、宋贻平、周维山、陈锡恩、李厚初等人发起。该会会员多人与旧宪政实进会及共和党有关。将来可能与共和党及统一共和党联络。（其与统一共和党、共和党之关系在第二、第三节有所记

载。)

第十五项 平民党

该党鉴于提倡共和以来党会林立，或专事政争，或成为社会党，有倾向无政府主义危及国基之虞，故欲结合上述二种主义为一种组织。其目的在于发达个人能力，培养自立精神，辅佐改良政治。目前虽尚未发表政纲党章，但实行稳健之国家社会政策。发起人为江西某人，党员不过四十人。据云本部置在北京，计划渐次扩张云。

第十六项 满族同进会

该会志在联合全国旗人，使京外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人士互相砥砺一致进行，以享大同之幸福。征求全国各旗人之意见，筹划旗民之生计，帮助政治之进行，增进自治能力，以使同胞享有共和事权之利益为主义。

其职员及主要人物如下：

正会长：熙彦。副会长：魁斌。评议长：荣勋。

评议员：毓善、徐致善、宝熙、李多文、景褰、达寿、白常文、崇林、崇欢、巴哈布、张德彝、萨德贺、陈松珍、奕寿、邵常斌、端绪、爱绅、祺光、治格、三多、班吉本、福启、荣厚、恒钧、庆宽、董六铨、惠铭、春秀、诚璋、董文庆。

预备评议员：文耀、铨林、降彬、瑞清、文斌。

以上诸人均均为发起人，其赞成人如下：

寿耆、达寿、瑞丰、治格、诚璋、文斌、董玉麟、荣源、铨林、宝熙、荣桂、毓善、荣顺、铁林、成奎、熙玉、崇彝、荣

肇、祥桂、春秀、张荣骥、福启、和尔谨、惠英、永宝、班吉本、耆祥、成堦、李植、祺龄。

名誉赞成人：

那彦图、阿穆尔灵圭、赵秉钧、陆大坊、达赉、祺诚武、祺克坦、沈国钧、祝瀛元、陈时利、汪善荃等。

可谓已蒐集其同族之人材，彼等作为满人，对于现时之趋势无疑不能有何等政治行动，但应注目其将来。

第十七项 救国团

该会乃彼等愤于近时国势之危迫，故募集在京有志之士以救国为目的而组织之团体，但至今尚未正式成立。

第十八项 回教促进会

本年五月北京之回教有志之士为确定对共和政府之方针，谋教徒之自卫发达而组织之团体，目下尚未实行其政治性行动。

第十九项 宗社党

该党乃清帝退位以前，以清朝之皇族宗室及旗人为其核心，以及食清朝之禄之勇士为挽救宗社而组织之政治团体，后因其首领良弼死于炸弹，袁等压迫加剧，遂无所活动，有为之辈大多分散或隐居不出，现已无宗社党实体。近来各地所为谓之宗社党，概为借此名义以打倒对手之手段也。

第二章 为适应全国统一大计 而产生之团体

革命党起事之手段，为号召全国叛离清政府，其鼓吹革命热潮之唯一口实乃种族主义。但满洲朝廷灭亡后，若在包含多种民族之该国中仍谈论种族主义，反而危及其统一之基础。故彼等立即高呼消除种族界限，鼓吹种族团结。为此最好为组织与各民族联合之团体，以示共同处事，消除畛域，促使此一目的之实现。于是各种种族联合之团体应运而生，并暂称之为“为适应全国统一大计而产生之团体”。

第一节 汉蒙联合会

此会乃适应统一大计而最先组织之汉蒙两族联合之团体，成立于本年三月上旬。其目的为联合汉蒙志士一致为消除畛域而努力。发起人均为汉蒙两族著名人士。（以下各节所举团体及发起人会员，均不出此范围。）

发起人：科尔沁王、阿穆尔灵圭、张庆桐、袁克定、吴廷燮、唐在礼、梅光羲、金还，陆大坊、常瑋璋、陈毅、蔡树楷。

赞成人：那彦图、帕勤塔（土尔扈图王）、棍楚克苏隆、贡桑诺尔布、苏珠克图巴图尔、博迪苏、梁士诒、阮忠枢、伍廷芳、张謇、程德全、严修、王宠惠、张一麀、沈思孚、袁希涛、汪荣宝、叶恭绰、周自齐、华世奎、曹如霖、施愚、曹汝英、王劭廉、张寿椿、毕桂芳、余建侯、曾文玉、吴燕绍、沈兆社、金邦平、

阮惟和、陆定、谢永灯、张庆桂等。

可谓已网罗汉蒙之名士。袁氏首先说服蒙古王公中棘手之人物那彦图、博迪苏等。当然此举反对其蒙古政策有利，似不能希望该会作为有力之政党而活跃于政界也。

第二节 中华民族大同会

当时孙逸仙等之南京政府，亦注意致力于招抚统一藩部民族。北方政府组织汉蒙联合会之后，更在南京组织使中国五大民族联合之民族大同会，继又将其总部迁往北京。

其发起人如下：

黄兴、刘揆一、吴景濂、沈秉堃、景耀月、王芝祥、谭延闿、李瑞清、马邻翼、孙毓筠、张继、胡瑛、恩华、张通典、吕志伊、尹昌衡、李鳌、赵士北、蒋彬、范源濂、谷钟秀、王正廷、姚雨平、时功玖、李素、刘星楠、章勤士、赵士钰、王有兰、文群、平刚、彭占元、熊成章、汤漪、黄树忠、程子楷、德启、仇鳌、王宽、温世珍等九十六人。

该会网罗同盟会、共和党（当时之统一党）之著名人物，有助于全国统一（当时该会总理为黄兴），其后于上海设立支部以推广其事业，现列举上海支部之职员名单如下：

支部长：徐绍桢。副长：王人文、沈秉堃。

实业部：叶惠钧、王一亭、桑实、沈缙云。教育部：李端青、吕志伊。调查部：蓝天蔚、温宗尧、陶铸、王夏、邓恢宇、徐肃、姚勇忱、蓝宗鲁。编辑部：洪翼昇、邵元冲、张照汉、王禹称。文牍：陈泉卿。庶务会计：旷若谷。

第三节 五大族共和联合会

该会于本年四月初旬在北京成立。其主义为联合五大族之感情，振兴汉、满、蒙、回、藏之一切新兴事业，协助共和，辅佐政府，以达富强之目的，巩固中华民国之邦基。其实该会乃秉承袁氏之意，代替赵秉钧及袁氏发起组织该会。其政纲如下：

一、融和五族，建立坚固之国家。二、改良社会，求共和之实质。三、振兴实业，先谋八旗之生计。四、普及教育，促进人民程度之进步。五、提倡婚姻自由。六、提倡移民事业，谋求言语之统一。七、规定宗教。八、提倡国民外交。九、注重军事教育。

总理：赵秉钧。协理：陆建章。

主要会员如下：

段芝贵、乌珍、治格、李觉生。

该会逐渐在各地建立支部，似拟以该会谋求种族统一。

第四节 五族国民合进会

该会系本年四月下旬组织，其性质与前数者相同，为谋求统一之团体。其主义如下：

一、本会志在集合五族国民之才识智能，一致建设共和政体，以巩固邦基，确保国土。

二、本会依法理与国情与政府人民共同奠定共和政体之基础。

三、本会要融合东方学理，保全固有道德，使我五大族人民具有自治能力，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

四、在共和国内，五族之宗教语言不同，但各族均有使用其语言、信仰其宗教之自由，因此通晓各种语言之人可进行研究，疏通道德之涵源，培植政见之根底。

五、教育、营业二项事业乃国民发达之根本，本会将负责为五族民族赢得同等教育与营业而奔走。

六、融通五族人民之财富，使之互相往来营业互相提携支持。

七、除五族人民以外，西北有哈萨克族，西南有苗族、瑶族等。此等民族之主要人物随时都可要求入会。

其发起人如下：

姚锡光、载功、志钧、松椿、德寿、熙彦、实熙、赵秉钧、段祺瑞、蔡元培、黄兴、严修、袁克定、温世霖、徐绍楨、张锡銓、王树、那彦图、希凌阿、双林那木凯、章禅巴图苏隆、马安良、马福祥等五十余人。

赞成人如下：

黎元洪、阿穆尔灵圭、梁士诒、都凌阿、卓凌阿等十余人。

以下为五月二十六日选定之职员。

会长：姚锡光。副会长：汉族 赵秉钧、满族 志钧、蒙古族 熙凌阿、回族 王宽、藏族 萨伦。

常务员：宝熙、双林、志崇、刘思需、许长春、丁梦刹、金抡元、德齐特、刘若曾、郑沅、周正朝、陆钟岱、吴士英、黄震、谭汝鼎、董元春、屠振鹏、沈钧。

调查科：张士钰。编辑科：云书。讨论科：何宾生。交际科：吴桐林。庶务科：海宽。会计科：增昆。

起草员：张恩寿、吴秉钊、何宾生、曹英。

第五节 五族合进会、民族大同会、 及五大族共和联合会之合并

政党合并之风终至使此等诸会合并，此乃必然之结果。以上三会均属同一性质，有如一人。对全国统一之重大问题分为各家势力，实非上策，故有合并之议。北京安庆会馆之五族联合会之代表在民族大同会之代表刘揆一、乌邻翼、朱德裳、谷钟秀等在欢迎会上发表合并演说，其次五族国民合进会代表亦表示同意。该会会长姚锡光致电大同会会长黄兴进行交涉，初步达成协议。此一合并如果成功，则将予政界以重大影响。但彼等原均依附于共和、同盟诸党，故此等大党之离合势将直接影响该会之消长，盖作为独立之团体其势力均极为薄弱也。

第六节 回教联合会

该会为住在南京之回教徒金峙生、马德甫、艾峻齐等所发起，其目的在于联络各省回人，振兴宗教，兼而促进共和。当时南京留守府对该会之设立予以保护，以谋融化回教徒。该会奉以下为大纲。

一、崇仰宗教，尊重道德。二、兴教育，求人材。三、务实业，广生计。

另有会则十条，但带有宗教机关色彩，未曾在政界活动。

第七节 藏卫团

该团为招抚统一西藏之机关，于本年五月中旬成立。其目的在于集合有各种学说经验之同志赴西藏联络，共同从事西藏之实

业、教育及一切有利于西藏之事业。其宗旨如下：

一、垦荒种植。二、振兴畜牧事业。三、调查气候地质，将最适宜发展之事业报告中央政府。四、测量西藏山川要阨及边界，报告中央政府。五、调查矿藏，若有发现，将与藏人共同开发。六、设立宣讲团，说明五族平等之旨。

此外为完备各种必要之机构。其发起人如下：

李新琪、熊兆谓、周代本、何旺限登、吴山、罗桑、彭错朗结、熊兆南、代锡九、石连城、廖贍、张萼华、伍贞恭、刘汉、何英、成治安、王锡恩、郭湘、曾敦、邹泽宣、周璧阶、陈驿、范蓁、刘德言、余昂等九十余人，欲以此救济处于累卵之西藏，不得不使人有鞭长不及马腹之感。

第八节 融洽汉满禁书会

该会顾名思义原非政党，其宗旨在于融合满汉两族人之感情，促进共和，泯灭种族之界线，敦睦昆季之谊，共同协力以谋彻底之统一。其发起人如下：

陈其美、王人文、陈荣昌、丁槐、吴照、盛先觉、何锡康、刘显治、黄鲁连、张寿龄、顾视高、段宇清、何畏、陈时铨、杨生梯、江祖蒺、邹钊、林爱岚、张步瀛、吕世涛、贺时雍、朱英、朱鸿基、章澎、刘世骏、由宗龙、明增材、周增爽、李文鑫、李文森、黄守义、蔡福昌、傅竞陆、张仁溥、傅琦、张述尧。

第三章 有关风教之团体

革命事变以来各种以矫正社会风气为目的之团体相继出现。

此等团体志在剔除中国历来之积弊，改良恶习，助长文明风尚。

第一节 设在上海之团体

第一项 进德会

汪兆铭、李爆瀛、张继、吴敬恒等为矫正社会风气，今春于上海组织进德会。该会会员必需严守一夫一妻制，且禁吸鸦片等，入会申请处在《民立报》社。据云目下会员已达千余名。

第二项 佛教会

中华佛教总会于四月十一日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选举僧敬安为会长，僧道兴、清海为副会长。该会之主旨为改良振兴中国佛教。以熊希龄为会长之佛学会亦同属一类。

第三项 昌明礼教社

该会设立之目的为维持礼法，改良风俗，普及教育，开通民智，培养完全之人格。该会以杨士崎为中心，社内设置政治、筹备、言论三团，以期将来之发展。

第四项 青白社

该社之成立是为防杜有人藉口革命，胡作非分，于是纠合同志，以达共和之目的。其发起人未详。

第五项 侠义党

大体与上一组织旨趣相同，其发起人名单不详。在上海设立事务所，制定规则，招募党员。

第六项 空无党

据说该组织在上海，但其所在地与发起人未能详知。其主义空洞难以捉摸。总之与上述之侠义党相同，共和后彼等多数趋于名利，不过提倡一种精神革命而已。

第七项 世界宗教会

该会系王人文、沈曾植、李瑞清、姚文栋、释谛闲、李提摩太、梅殿华、陈治镛、哈磨、狄葆贤、陈作霖、钱宝钧、释应乾、黎炳南等所主唱组织，联合各教，研究至理，以资道德之涵养、生民之利济。会员不问国籍，凡有宗教智识信仰者均可入会。

第八项 通俗教育研究会

该会由于右任、王正廷等三十七人发起组成，志在研究通俗教育设施方法，以向人民灌输常识，培养公德，启发有关社会教育事宜。其事务所设在江苏教育总会内。

第九项 中华民国世界语会

该学会以研究世界语为其目的，分讲习部与通信教授部二部分，似由中国社会党人士所主唱。

第十项 随营宣讲团

该团以尊重人道主义、传布文明教化填补军队缺点，维护军人名誉，增加人民幸福为其宗旨。

第十一项 中国学报社

该社系谭延闿、刘揆一、谭人凤等二十七人主倡成立，志在振兴国学，以王闿运为主裁。

第二节 设在北京之团体

第一项 国民开明会

该会系马体乾等所发起，以求社会开明，奠定国家富强之基础为主义，蒋式理、张毓书、马体乾三人为临时干事。计划召开演说会，开办报纸阅览所、职业介绍所、图书馆、孤儿院、养老院、法政经济讲习会等。

第二项 中央牖民统一会

该会以增进国利民福，致力爱群保种、改良社会、改善风俗为主义。由周錡民、李挹卿等十八人发起，得京津报界及多数志士之赞成。

第三项 教育统一会

该会系刘莹泽、裴梓青等三十二人发起，联合全国教育家以谋教育上之彻底改革，并以监督教育行政，培养共和精神为主旨。该会之主要事业为期望完成有关各种教育之改良振兴普及，言语之统一及有关全国学会等事。

第四项 我爱我会

该会由李升培、丁开嶂等六十四人发起。其目的在于劝导国

民爱惜土物以谋生计，开拓利权，将总会设于北京，各省设有分会，各府厅州县设有支会。

第五项 孔子戒会

该会之目的在于思慕古圣人以振作世教，发起人为姜兰亭、邵树华、于梓生、唐贤一、王汉辅、王汉章六人。

第六项 明道会

该会由陈懋治、章宗元、汪荣宝、马体乾等赞成创立，以基督舍己求公益为模范，声称实行救世主义。该会会员负有遵守戒约之义务，可视为纯粹之基督教信徒之团体。

第四章 军事性团体

共和国成立之后，该国人民政治思想发生狂热，遂至军人社会亦组织政治团体。彼等军人目睹以武力建立共和，意气盛极一时，组织团体之事势所难免。而政府当局则显然企图加以利用以达到军事统一之目的。兹略述如下：

第一节 陆军团体

第一项 军界统一会、海军偕行社

该会于本年三月成立，目的在于扫除民国成立以来南北军队杂然林立之弊，认为此乃军事进步方面极为有碍之弊。

组织该会之代表由全国选出。即：

湖北全省代表：应显翔、赵均腾、张昉、彭方传。沪军代表：唐之道。南京卫戍总督：柯森、黄旭。奉天全省代表：李际春、赵宗谟、马凯、易兆霖、郝福田。武卫左军：张殿如、刘朝仰。彰德学务处：庐香亭、王子甄。山东全省代表：张树、郑士琦。甘肃全省代表：常推楷、临淮关、段景炎、缪庆善、阎梦松。浙江全省代表：屈映光、张栩。江苏全省代表：刘之洁、张一麟。军諮府：章通骏、李祖植。河南全省代表：刘承恩、张锡元。江北第二军：华元云。安庆都督府：陈扬中、姚任文、吴介璘。汤河四十协：徐廷荣、张炳贤。广东全省代表：宁尚武、陈国强。安徽军政府：范厚泽。广西全省代表：翟干华、陈裕时。黑龙江全省代表：德权、寿庆。吉林全省代表：元陞 穆、恩堂。禁卫军：赵瑞龙、吴中央。陆军部：吴经明、雷炳焜。江南江防营：吴起恒、李廷玉。山西军政府：井介福、王人杰、孔庚。江西参谋部：方清、秦国鏞、钱桐。湖南全省代表：黄本璞、张翼鹏、蒋国经。南京粤军：张文。江北军政府：栾如霖。第二镇：孙传芳、何佩瑢。第一镇察哈尔：褚其祥。大通军政府：曹赤霞、马林。蒙古：那彦图、阿穆尔灵圭。第一军：徐树铮、靳云鹏。直隶全省代表：才宝琛、孙国英。

（该名单乃本年三月成立时之情况）但该会不曾有何等活动，现今改称为陆军偕行社。

第二项 全国将校团

该团与军界统一会同于本年三月成立，其目的在于使军队完全统一。其主义曰：本团联合全国将校，极力维持共和国家之统

一、研究种种实行之方法。

该团主要以北方军队将校为核心，故将总部置于北京。

第三项 南京陆军将校联合会

该会于本年四月上旬成立，其组织如下：

正会长：黄兴。副会长：陈蔚。名誉会长：黎元洪、段祺瑞、姜桂题、冯国璋、蒋作宾、徐绍楨。协理：陈懋修、林调元。

评议部长：史久光。调查课长：周视。审定课长：钱桐。纠察部长：瞿钧。纠正课长：蓝任大。

其他有干事部、会计科等，此处从略。该会因黄兴等之主张在军界统一会改为偕行社之同时，与偕行社合并。

第四项 军事研究社

该会系作为不使军人干涉政治之手段而组织之团体，专门致力于研究军事。最初由留德之参谋部科长周凝修发起组织，连络留学东西两洋之军人，根据以下主义进行行动。

一、研究军事问题。二、灌输外国学术。三、培养军人道德。四、联络感情，交换智识。

绝对不干预行政方面之事务。

其职员如下：

名誉社长：黎元洪、段祺瑞、黄兴、陈宦、蒋作宾、冯国璋、钮永健。总干事：林摄。

庶务部长：朱和中。研究部长：史久光。编辑部长：段学汉。调查部长：史久光、朱和中、秦国镛、段学汉、周凝修、陈虹、李祖植、雷炳焜、吴经明、陈晋、王鸷、方清、钱桐、王风清等。

可谓已集中当时军界之精粹。该社必成为将来军界最有力之团体无疑。于本年五月中旬成立。

第五项 其他团体

其他尚有陆军学生联合会及江苏海陆军将校进行社等，但均非重要团体，此处从略。

第二节 海军团体

第一项 海军协会

该会系本年三月上旬成立。目的在于改良以前之海军，计划重建，并研究世界海军之趋势，以确保民国之海权。其会员主要为海军军官与朝野知名人士。凡对该会表示同情者可成为该会之名誉赞成者。主要使海军团结一致以对政府。该会发起人如下：

朱声岗、刘勋名、丁士芬、姚蔡常、奚定谟、刘永谦、刘华式、夏孙鹏、温树德、王传炯、陈复、李石文、汤芑铭、朱天森、唐伯勋、吴振南、吕德元、李毓麟、宋文翹、郁邦彦、凌霄、余振兴、谢刚哲、朱伟、林国瘠、王统、王时泽、任光宇、沙训麟、萧举规。

北京组织新内阁、内阁人员纷争发生后，该会即率先就海军部事务进行干涉。

第二项 中华民国战舰会

该会系南方诸省尤其为同盟会人士所提倡组织，其主义乃制作军舰、扩张海军经费，以海外华侨捐款所得为主要财源。据云南

洋新加坡等地设立该会捐款募集总处，又进而在各省以及海外各地设立支部以便募款云。但因该会系由原海军阅历之人物组成，终于有名无实，一无结果。

第五章 与外国有关之团体

新共和国建设之际，各国策划建立有特殊关系之团体者，其中最先设立此种机构者为法、德两国，现举其概要如下：

第一节 华法联进会（中法协会）

该会以联络中国、法兰西两国国民之感情，研究两国之政治、实业、科学之大问题，扩大两国人民相互之利权为主义。政治方面以保守和平，实业方面以开发固有之利源，科学方面以交换知识为宗旨。进行之方法不定，凡有益之事业均将进行，以期易于解决中、法两国之各种问题，使两国之邦交日益亲睦。该会之总会设于法国巴黎之豆腐公司内（前年由中国人组织之公司），在中法两国之都市中设立支部。其会员中国方面主要有陆徵祥（外交总长）、吴景濂（驻意公使）、蓝天蔚。法国方面亦有著名人士。上述豆腐公司工业部总理李煜瀛在法国京城任执行部会长，副会长由豆腐公司商务总理韩汝甲担任。

在中国本土有上海支部，由韩汝庚负责。该会之主旨在于宣扬法、美两国均为共和国，中国人一再对两国怀有好感，若与两国同盟，可保证世界和平云云。七月四日为美国独立纪念日，据云三国将在法国京城联合举行共和纪念活动。

第二节 中德协会

该会之主旨与前朝之华德交通社（中德交通社）具有同样性质，志在使中、德两国互相接近，联络两国国民之感情。该协会经德国驻上海副领事西摩及中国人王庆道、邱仁坚等之努力，于五月上旬成立。在上海之活动虽以谋求两国感情之融和，但据传以致力于斡旋小额借款为主云。

第三节 德文学社

该社以传入德国文字语言为目的，以便使其成为联系中、德两国之纽带。该协会由中国人发起，设在上海。有关人员如下：

发起人：白觐圭、潘季玉、李人铎。赞成人：伍廷芳、吴绍璘、陈其美、温宗尧、王朴、杜元、徐绍楨、王人文、夏廷楨。

第六章 与实业有关之团体

革命战争后，伴随新国家之建设，除现政治性事件之外，则为整理并充实紊乱枯竭之财政以及回收利权之经济性现象。该国除借外债外，必须振兴实业以应此需，于是社会各种实业团体应运而生，不胜枚举。兹记其概要如下。

第一节 中华民国实业协会

该会为具有实业专门知识之留学生为救国家之急起见，以振兴实业、救济国民生计以及回收利权为目的而组织之团体，正在全

国广泛募集会员，制定会则，以谋发展。今首都北迁，该会总部迁至北京，由于组织该会之会员均为新进气锐之留学生，将来或将成为政党亦未可知，但目前尚无任何政治活动。

第二节 中华民国实业联合会

该会由程定夷等提倡，本年三月得孙逸仙等赞同。其目的在于实行全国各类实业家之大联合。会则如下：

一、陈请政府制定实业保护法。二、谋求实业相互之联合融和。三、谋求实业界之改良。四、创办实业新闻，组织实业宣讲社，增强实业知识。五、创办实业学堂、实验所以及陈列所，以促成实业之进步。六、设立实业银行，以便利实业界之金融。七、组织律师团，以维护实业界之秩序与权利。有名无实，现尚未达到实施其抱负之地步。

第三节 上海总商会

该会乃上海商业界之机关，由历来之商务总会改称。该会本年五月改选其工作人员，变更如下：

总理：贝润生、王一亭。

议董：朱葆三、杨信之、陈润夫、苏筠尚、李云书、郁屏翰、顾馨一、周舜卿、丁钦斋、叶鸿英、叶明斋、胡陆芑、沈练芳、沈缦云、唐露图、朱吟江、夏粹芳、庞莱臣、印锡璋、施善哇、洪念祖、张乐、傅筱庵、朱衡斋、劳敬修、陈子琴。

第四节 农业促进会

该会以民主主义为重点，志在振兴农业，于本年四月成立。

其职员如下：

临时会长：杨叶侯。临时干事长：丁辛垞。临时书记长：张养儒、贺庆徵。临时会计员：孙功甫。

其经营方针如下：

一、翻译各国有关农业方面之书籍。二、编辑农业方面杂志。三、创办农业学校。四、设立农业试验场。五、设立农产品陈列所。六、提倡牧畜开垦事业。七、经营林业。八、生产肥料及防虫除虫药。九、制造与贩卖新式农具。十、提倡改良农产品。十一、举办有关农业博览会。十二、组织农业银行。十三、发展拓殖事业。十四、设立农团。

第五节 中华民国盐业协会

该会志在集合所谓与盐业有利害关系人士，研究盐业之改良，以谋盐业经济之发达为目的，组织完备，发起人如下：

熊希龄、吴稚晖、金鼎、曹文澜、伍正名、钟衡臧、陈非、孙敏之、林元良、吴宗慈、徐宗彦、张镛、高穰、胡濬泰、倪学宽、王文泰、孙英、何恢禹、李襄。

名誉赞成人：伍廷芳、张謇、蔡元培、钟光。

第六节 中华民国工党

即所谓劳动党，以上海为中心之工业界人士之组织。该党之主义如下：

一、促进工业之发达。二、开通劳动者之知识。三、讲求救济劳动者之方法。四、鼓吹劳动者之尚武精神。五、勉力主持普通工业界人士之参政权

该党已制定党规，决定各项部署，以谋发展党务，将来难保不联络工业界在政界崛起。

第七节 工商勇进党

该党乃所谓上海少壮实业家，现联络在外国之本国实业家，谋求通商方面之发展，调和实业界，以发展实业之一派也。

第八节 工业建设会

该会志在谋求工业之发达，招致工业专家讨论研究工业，设立模范工场，协调新旧工业，培养技师振兴该国幼稚之工业。钟衡臧为其会长。讲求推广之途。

第九节 工党共进社

该社以疏通工人感情，振兴事业，劝诱工界之出品，补助国家为目的。该社于本年五月成立。由以下人员经营。

总代表：梁炳农。副代表：李志公。会计员：李颀田、林理邦。

第十节 工界同盟会

该会系与上海制造工团有关之人士组成，尚未有何等实力。职员如下：

临时主裁：俞惠民。会务担任者：徐其相、王调孙、徐志励。

第十一节 农工商业共进会

该会系北京之有志人士杨以俭等发起组织，于本年三月成

立。该会以建设农工商业机关，提倡进行农工商业为主义。其本部设在北京。

虽有完备之会章，但会势尚未发达。

第十二节 中华民国商学会

该会以设立商业图书馆、商品陈列所、商务调查所、商学研究会等，谋求商界之觉醒进步为目的。其本部设于上海。

第十三节 国货维持会

该会旨在振兴中国商业，维持国货，促进商品之改良发达以抵制外货之侵入。其成员以江浙一带商人为主。职员如下：

正会长：姚涤源。副会长：张紫阴。会员：戈朋云、叶惠钧、黄膺白、刘芸舟、朱子尧、陆治天、陈竞生、梅竹庐等。

排斥外货等似系由彼等所造成，以投合现时该国之思潮。

第十四节 铁道工会

该会于本年四月一日在南京成立，旨在谋求全国铁路之发达及改良铁路工程。现时总会在汉口。其职员如下：

正会长：史青。副会长：虞愚、苏建勋。

编辑员：谢学瀛、沈楨、马传秦。书记员：周志钟、赵鸿济。会计员：蔡声、徐遂良。常议员：万树芳、陈青州、陈恕、冯雨苍、张宴清等二十余人。

名誉会长：唐绍怡、汤寿潜、于右任。

该会尚未进行具体活动。

第十五节 中华民国铁道协会

该协会系本年五月上旬北方人士在北京组织，其主旨与上述铁路工会相似。发起人为：

魏武英、王芸芳、方殿华、陈策、金超、陈廷颺、李壮怀、张大义、张复汉、马国桢、沈尚涛、汪华陆、杨若、万树芳、陈青州等四十余名。因创立不久，尚未发挥重要作用。

第十六节 中华民国铁路协会

该会主旨与前二项无异，仅在其成员方面由有阅历经验者组成。发起人如下：

詹天佑、冯元鼎、黄仲良、钟文耀、丁平澜、权量、朱启铃、王恭绰、施肇曾、孙多钰、郑鸿谋等，集中北方之大员。该会主旨如下：

一、协助本国路政之进行。二、维持铁道工业之发达。三、保护本国铁道之权利。四、融合铁路同事间之情谊。

该会最为踏实而素质较高，系铁道方面各会中最有希望者。

第十七节 中华物产研究会

该会为振兴该国对外贸易起见，以研究及改良自国产品为目的。由林步随、杨儒、杨伯罗等与外贸有关之有志人士组成。

第十八节 中华实业共济会

该会之目的在于集合五大民族，共筹实业之振兴，开拓国家之富源以谋民生及经济之发展。本部设在北京。机构完备。由以

下数人发起。

计世英、乔保衡、李士钊、马振宪、刘彭年、李春湘、李镇桐、章渠、王善荃、孙树勋、宝熙、舒鸿贻。

第十九节 中国实业会

该会于本年五月下旬在北方成立，系全国性实业会。因感慨革命乱事以来该国实业之萎靡不振，欲谋有所振兴。

正会长：沈云沛。副会长：唐文治。

总务科干事：唐浩镇、饶风璜、丁乃杨、朱启钤。文牍科：贺良朴、夏仁虎等八人。交际科：吴善培、俞人凤等十二人。庶务科：吴敏、刘浚等四人。

该会会员以主义稳健著称，多为有阅历实力者。如获得农村部之批准，可能在实业界称霸，同时又随附于其他政党（与共和党接近），难保其不在政界活动。

第二十节 民国矿政研究社

该社系南方人士所提倡成立，其目的为发达该国矿业，研究矿产开采之要政，尤为注重四川、云南等西南边省之矿产区。尚未开始大规模活动。

第二十一节 国计维持会

该会之目的在于联合同志，研究国家经济问题。会址设在北京。主要发起人如下：

陆建章、杨震华、李尧勋、田尚志、方观涛、李义铨、刘湛霖等。主要系共和党参议院议员所提倡，前途有望。

第二十二节 航业党

该党于本年六月上旬在镇江成立，旨在联络全国同志谋求航业之发达，以期收回利权，系蓝浩吾、倪逢伯所发起组织。本部设在上海。

第二十三节 国际贸易协会

该会系本年五月中旬黄遵阶等提倡，但尚未见成立。

第二十四节 民生团

该团旨以使一般人民均有一定职业，培养高等国民为目的。该团以国家社会政策为其主义。经常重视民生，创立于南京。

第二十五节 中华民国协济会

该会于革命乱事之际，获得临时政府之许可，作为筹措军资之机关而设置，战事终熄后带有实业性质。

第二十六节 蒙藏交通公司

该公司于本年四月成立。随着蒙古、西藏两地之开发及对中国本部之交通机关之完备，为加强两地政治联系，开发两地未开发之资源，振兴实业而设立该公司，其性质与前朝蒙古各王发起之蒙古实业公司相似。该公司之事业主要如下：

- 一、将总公司设在北京或上海，全国各地设立支部，以资本公司事业之进行。
- 二、测定铁道线路及行驶汽车，以便利交通。
- 三、增设旅舍以便利行旅。
- 四、开办学堂培养人材。
- 五、奖励游

历，推荐留学。六、推广实业，增设工厂。

其职员有如下诸人：

总理：伍廷芳。协理：温宗尧、王人文。

总务部长：于右任。交涉部长、陈英士。

据云再由其他满、汉、蒙、回、藏各族中推选名誉总理，以推广公司之事业。

第二十七节 垦殖协会

该会与蒙藏交通公司相同，立足于对边疆各省之边防政策之上，其目的虽在开垦边荒，殖产兴业，但为拟对付日本经营满州，俄国经营蒙古、新疆，英国经营西藏而实施之国防政策，故在某种意义上为一种对外机关。该会于本年二月中旬在南京成立。开始称为拓殖协会，后改称现名。该会发表之事业纲领如下。

一、调查实地情况。二、筹商进行之方法。三、调查各种有关事项，发行杂志。四、筹划充实本协会一切附设事业。

该会职员如下

会长：黄兴。名誉会长：陈锦涛、王芝祥、徐绍楨。名誉干事：吕志伊、王鸿猷、陶昌。

总务部：钟毓琦。交际部：吴应培。编辑部：黄家本。调查部：邱心容。

其他赞成人有：

熊希龄、蔡元培、胡汉民、宋教仁、范源濂、张继、李燮和、马君武、景耀月、黄复生、吴景濂、朱瑞、刘揆一、邓家彦、陈雄州等四十余人。

全部为同盟会会员。该会事业首先从满洲着手，然后依次及于新疆、西藏。

第二十八节 其他会党

有江浙之改革漕粮之革漕团、计划垦殖江北安徽地方水利之江皖垦殖水利协会、民国农圃公会、通国临业联合会、女子实业进行会等，均从略。

第七章 北京、上海之同乡会团体

中国人历来在习惯上邻里乡党之观念甚厚，各省到处无不设有同乡团体之会馆公所。由于该国政治机关不完备，无法保障各人之生命财产，不能主张其利权，仅能借同乡团结之力，养成习惯，故各地古来均有设立会馆公所之必要。当革命后秩序破坏、新国家建设之时，为适应时代之风潮，组织新同乡团体乃必然之势。现列举主要之同乡组织之新团体如下：

第一节 上海方面

一、四川公会：旧名四川共和助进会。该会系在上海之四川人所组织。会长程德全。副会长赵熙。

二、江西建设讨论会：系当时在上海之江西人组织。会员中有陈三立、谢远涵、梅光远等江西名士。

三、奉直鲁协会上海支部：由奉天、直隶、山东三省在沪人士组成。何万波为会长，高凌霄等其他要员为干事。

四、两湖联合会：不久前于南京成立，系湖南、湖北两省人士组成。黄兴为总会长。刘崧衡为湖南省会长，黄之根为湖北会长。

五、广西共和公会：系在沪广西人之组织，旧称广西共和协进会。

六、福建同乡会：会长，高而谦。副会长，蓝建枢。全皖旅沪同乡会。徽州公民会。云南同乡会。豫秦陇协会（河南、陕西、山西、甘肃协会），其他不遑枚举。

第二节 北京方面

一、陕西同乡会：系在京陕西人所组织。会长：薛宝辰。副会长：余宝龄、钟降鉴。

二、西北实业协会：系甘肃、陕西、山西三省人士所组织，旨在发展西北诸省之实业。

三、西北协进会：该会之成立旨在促进西北诸省之文化，巩固共和。会址设在北京。会长：于右任。

四、陕甘同乡会：会长，于右任。副会长，张赞元。

五、甘肃共和实进会：会址由上海移至北京。

六、四川协会：该会系在京四川人所组织，以图联络四川与中央，建议政府及参议院恢复四川之秩序，增进福利。由施愚、顾鳌等发起。

其他各省之团体多在北京。各省各会馆公所又组织新团体，对其自身利害休戚各有主张不休，在政府统治上成为难题。

第八章 各省之团体

有如中央政府所在地及要冲地区之政社组织，各省亦有类似情形，现分别略述如下：

第一节 北方各省之团体

第一项 七省联合会

该会为联合北方七省人士在北京组织之团体，目的在于使七省步调一致，对国政有所贡献。七省代表如下：

直隶：阎凤阁、王振尧、高俊澎、丁宗峰、梁庭华。奉天：刘与甲、李心曾。吉林：沈景佳、谷嘉荫。黑龙江：战殿臣、文铎。山东：丁惟鲁、丁维沛。河南：王佩箴。山西：刘盥训。

第二项 直隶公益会

该会系直隶同乡人士所组织之团体，旨在联合该省在各省州县之公正绅士，维持省内各地之秩序，谋求农人耕作之安全，享受共和之利益，本年三月下旬成立，组织完备。

会长：冯国璋。副会长：史履晋、刘若曾。

此外有协赞人员八人，评议员八人，常务员十人，调查干事十人，文牍干事六人，庶务干事四人，共谋推进会务。

第三项 新直隶会

该会成立之目的在于使直隶作为所谓新国家之新直隶省、而

进行刷新政治活动之组织，由直隶新进气锐之少壮所组成，共有同志五十余名，主要成员如下：

王法勤、张铭勋、温世霖、张务本、张书元、张仲山、王鸿敏、何凤华、朱佩实、李成章、郭月访、顾德保。

第四项 直隶维持会

直隶咨议局解散后，临时省会议员就选举法发生争议，梁式堂等发起组织该会以谋调停之策。

第五项 热河共和进行会

共和国成立后，清朝离宫所在地热河亦组成共和进行会。该会由热河志士沈鼎新、孙品璋等提倡。其政纲如下：

一、实行种族融和，享受平等之利权。二、为各族贫民谋生计，杜绝盗源。三、考查现状，谋政治法律之完备。四、整理财政，行开源节流之策。五、扩张国民之公权，发展自治之能力。六、注意国民教育，筹划文化普及。七、研究外交政策，巩固国际权力。八、铸成军国，发扬尚武精神。

第六项 东三省共和进行会

该会于本年三月成立，其目的在联合东三省人士，组织政党以巩固共和国体，筹划各种进行事项，补救官治自治之不足，敦促社会之发展。

该会有齐耀琳、世荣、冯绍唐、育凯、齐忠甲、杨乃赓、于定一、王赤卿、郭星五、王桢廷、世培、高汝清、那文裕、文徽、承者等四十余人。

第七项 奉天共和促进会

该会于本年四月成立，与上述进行会同一性质。齐耀琳、孙百斛为会长，其组织如下：

评议部长：袁金铠。评议员五十余人。干事部长：曾有异。会计科员：宝堃等六名。调查科员：王富春等十四人。编辑科员：海清等九人。

另有书记科、庶务科、招待科等各员。

第八项 吉林省之团体

有该省人士组织之政友社及统一共和党之支部，彼等虽谋扩张党势，但风气未开，颇难有实效。

第九项 山西司法急进会

该会之成立旨在联络法曹界，根据司法独立之精神，创造完美之司法机构。由山西人士仇元洽、刘志学、许喆、施金墨、王子敬等组成。

第十项 河南省之团体

1. 教育革新社，2. 共和筹进会，3. 共和政治进行社，4. 民社河南支部，5. 共和急进会，6. 同盟会支部，7. 统一党支部，8. 司法筹进会，9. 军事急进会，10. 警务促进会，11. 祥符议事会。

第二节 南方各省之团体

南方各省之团体，大多组织规模颇小，多为北京、上海之大

党之分支，重要者甚少。今摘其要者之党名如下。

第一项 湖北之团体

一、东亚大同社：该社系黎元洪所发起，旨在统一融洽汉、满、蒙、回、藏五族。总部设在武昌，机关部置于上海，且计划在各地设立支部。创立之日虽浅，但日下颇有威望。此外有民社之总部。

第二项 湖南之团体

1. 共和统一促进会，2. 东亚联合会，3. 民主立宪急进会，4. 铁路维持会，5. 社会党湖南支部，6. 同盟会支部，7. 共和党支部。

第三项 福建之团体

1. 恳亲共济会，2. 盐业研究会，3. 留学联合会，4. 共和国民会，5. 国民集益会。

第四项 苏州之团体

1. 国民资格研究会，2. 公权研究会，3. 社会党支部，4. 自由党支部，5. 中华国民公会，6. 民党进行社，7. 实业协会，8. 苏州工业会，9. 学生宣讲社，10. 共和促进会，11. 工党，12. 教育会，13. 女子教育研究会。

第五项 南京之团体

1. 南京团队联合会，2. 同盟改进党。

其他从略。

第六项 广东之团体

1. 同盟会支部, 2. 进步党支部, 3. 民主政党, 4. 共和社, 5. 振武社, 6. 议政会, 7. 社会团, 8. 同志会, 9. 维持公安会, 10. 共进社, 11. 广东自治会, 12. 广东自治社, 13. 警察团, 14. 公民协赞会, 15. 翼政会, 16. 进步同盟会, 17. 法政团, 18. 民国演说会, 19. 汉武社, 20. 人道扶正社, 21. 军国协会, 22. 民军共和会, 23. 三合会自治会, 24. 广东国民团, 25. 舌战决死队, 26. 中华并进会, 27. 国家商业会, 28. 商务商会, 29. 银行研究会, 30. 报界公会, 31. 天民社, 32. 孔圣会, 33. 机器研究会, 34. 轮船公司, 35. 实业进行社, 36. 农务总会, 37. 教育团, 38. 博爱团。

其他从略。

第七项 其他各省之会党

浙江绍兴府：中国政治俱进会。宁波：社会公益促进会。湖北：民社、鄂州共和急进会。云南：共和国民会、国民演说会。

其他不胜枚举，今从略。

第九章 主要政党之现况

该国政党结社之数实已百余种以上。试观此类团体如何划分势力范围及割据政界，颇为有趣，兹述其概要如下：

备考 全国之政党结社虽有百余种，但有关成败之数者，唯有同盟会，共和党及统一共和党（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

国民公党等亦包括在内)之政党,其他只是彼等之分支。现以上述各党为基础,记述如下。

第一节 中央政府中各党之现况

袁世凯:虽不直接参加党派,但与共和党或统一共和党接近。

陆徵祥:无党派关系。

赵秉钧:加入共和党,又为同盟会会员,但对同盟会无好感。

熊希龄:共和党领袖。

段祺瑞:无党派关系,对同盟会亦不同情。

刘冠雄:属于同盟会。

蔡元培:前与统一党有关系,今属同盟会。

王宠惠:属于同盟会。

宋教仁:属于同盟会。

陈其美:属于同盟会。

施肇基:无党派关系。

第二节 地方各政党之现况

直隶都督张锡銮:系袁氏之股肱,无党派关系。

奉天都督赵尔巽:共和党党员。

吉林都督陈昭常:党派旗帜虽不鲜明,但似同情共和党。

黑龙江都督宋小濂:与赵尔巽有深交,由道员一跃为都督,对同盟会无同情心。

山东都督周自齐:袁氏股肱之一。

山西都督阎锡山：同盟会会员，旧八十六协协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身。

河南都督张镇芳：袁氏部下，长期任天津盐法道。

陕西都督张凤翥：同盟会会员，旧混成协参谋长，日本留学生，曾在保定军官学堂。

甘肃都督赵维熙：前任该省布政使，长庚辞任后被袁氏提拔。

新疆都督杨增新：前都督袁鸿佑被杀后，由袁氏提拔为都督，久居新疆。

江苏都督程德全：属共和党。

安徽都督柏文蔚：似与共和党、同盟会均有关系。

江西都督李烈钧：同盟会会员。

湖北都督黎元洪：共和党。

湖南都督谭延闿：属于同盟会派但又与共和讨论会有关系，前湖南咨议局议长。

四川都督尹昌衡：同盟会会员，日本留学出身，前四川陆军小学堂监督。

云南都督蔡锷：统一共和党总干事，日本士官学校出身，湖南人。

浙江都督蒋尊簋：日本留学生，前广东混成协统，同盟会会员。

福建都督孙道仁：前第十镇统制，同盟会派。

广东都督胡汉民：同盟会会员。

广西都督陆荣廷：旧广西提督，党派关系不明。

沪军都督陈其美：同盟会会员。

此中旧官吏八人，旧军人十一人，纯革命派二人，法政出身一人。而军人中如张凤翥、蔡锷、尹昌衡等均带有革命气质。作为党派而论，以同盟会会员居多，但旧官吏大多同情共和党，故将来各党派间之势力消长将颇为可观。

第三节 参议院中政党之现况

现时政党势力之消长以中央参议院最为明显，有如下列：

1. 同盟会

四川：贡树中、李肇甫、熊成章。

湖南：覃振、孙钟、欧阳振声、彭允彝、刘彦。

山东：刘星南、彭占元。

云南：张耀曾、顾视高、段宇清、席聘臣。

陕西：景志傅、李述膺、赵世钰、茹欲可。

广西：曾彦。

山西：刘盥训、宋汝梅。

江苏：杜潜、王嘉宾。

河南：阮庆澜、刘绩学、陈景南。

广东：卢信、司徒颖、徐傅霖。

安徽：江辛、俞道暄、曹玉德。

江西：陈鸿钧、卢士模。

甘肃：王鑫润。

以上王鑫润、欧阳振声、彭允彝、刘彦、陈景南、赵世钰等六人兼统一共和党员。纯同盟会会员二十九人。

2. 共和党派

湖北：时功玖、汤化龙、张伯烈、刘成禺、郑万瞻。

江苏：杨廷栋、秦瑞玠、张鹤第、汪荣宝。

江西：李国珍、曾有澜、郭同。

蒙古：博迪苏、达赉、唐古色、熙凌阿、那彦图、阿穆尔灵圭、琪诚武、鄂多台。

直隶：李渠、籍忠寅、谷芝瑞、王振尧。

浙江：王文庆、王家襄、陈时夏。

甘肃：秦望澜、宋振声、吴钧、田骏丰。

山东：周树标、侯延爽、姚华、丁世峰。

黑龙江：关文铎、高家骥。

安徽：胡璧臣。

贵州：陈国祥、陈廷策、刘显治。

奉天：吴景濂。

计四十二人，上列关文铎、高家骥、胡璧臣、吴景濂四人又属统一共和党，故纯共和党员为三十八名。

3. 统一共和党派

直隶：谷钟秀。

湖南：欧阳振声、彭允彝、刘彦。

吉林：王树声、金鼎勋、何裕康、李芳、杨策。

山西：张联冠、李素。

河南：陈景南。

奉天：孙孝宗、吴景濂、李秉恕、刘兴甲、曾有翼。

浙江：殷汝骊、周钰。

黑龙江：高家骥、王赤卿、关文铎、战殿臣。

安徽：胡璧臣。

陕西：赵世钰。

甘肃：王鑫润。

计二十六人，其中欧阳振声、彭允彝、刘彦、赵世钰、陈景南、王鑫润等六人与同盟会有关系，而吴景濂、关文铎、高家骥、胡璧臣等四人与共和党有关系，纯属该党党员不过十六人。

4. 无所属议员：

刘曾佑、陈同熙、连贤基、林翰、周翰等五人均为福建省议员。

以上所记均为六月二十二日之实况，参议院中似以共和党占多数，故统一共和党之向背最为同盟、共和两党所注意。今各党之间频繁进行外交谈判。若统一共和党与共和建设会、国民协会、国民公党等结成一团，呼号政界，使将真正形成三党鼎立之势，使政争愈加剧烈。

第四节 北京、上海两地之报纸与政党之关系

数年来伴随民气之开发，产生以言论指导事件之风气，于是新报纸相继创刊。尤其共和政府成立以来，更见增加，在数量上已不逊于东西洋先进国家。此等新报纸均以有力之个人或政府以及各团体为后盾，作为所谓机关报经营。该国人在进行一事时，均重视发动之机关。该国之报纸因地位关系，北京及上海两地之报业最为发达。北京为政治之中心，上海则不仅为南方政治、经济界之中心，且人才集中，办报之沿革悠久，具有代表性。故各政党竞相在此两地创办机关报，以谋党势之扩张。

同盟会、共和党等大党在该两地发行之主要机关报如下列。

甲、北京报纸与党派关系

1. 同盟会派报纸：

国风日报：该报系前年安徽人吴友石所创办。当初议论诡激，鼓吹革命。吴本为安徽之革命党党员。现作为同盟会之机关报进行活动。

国事新闻：系革命党党员田桐所创，旧名〈国光新闻〉，于前年底创刊。

中央新闻：系事变后创刊，先前攻击赵秉钧、马珍，因其主持人被某军队逮捕而出名。

守真日报：系同盟会派之报纸，最近发行。北京凡同盟会派之机关报均颇为有力，其中以此四报为最。

2. 共和党派及统一共和党派之报纸

中国日报：旧名〈帝国日报〉，系杨度等所创办。今为有力之共和党机关报。

亚细亚日报：系事变后创刊，与杨度等有关系。

中国公报：亦为事变后所创立。

北京时报：最近发刊，为共和党之机关报。

中国报：以前系黎宗岳所主宰，为安徽人之机关报，曾一度停刊，近来又继续发行。

国民公报：系旧咨议局联合会之机关报，主笔为梁启超之友人湖南人徐佛苏（旧名公勉），极力反对同盟会派。该报似为共和党之机关刊物，与统一共和党、共和建设讨论会等关系不浅。

北京日报：为袁氏之机关报，属旧有报纸之一，主笔为袁等之走狗广东人朱淇。旗帜虽不鲜明，但似同情共和党。

民视报：由旧君主立宪党之于邦华、陈树楷等主持，对共和党有好感。

大同报：对旗人特别有好感，似系旧〈帝京新闻〉之改名。

京津时报：为《上海时报》之化身，似接近共和党及统一共和党。

3. 统一党之机关报：

系章炳麟所主持，近来该党将《北京日日新闻》改题为《新纪元报》出版。

此外，天津有属同盟会派系之《国民日报》、《民意报》、《中华民报》、《天民报》。属共和派系之《民兴报》、《大公报》、《北方日报》、《经纬报》等，兹从略。

乙、上海报纸与党派之关系

1. 同盟会派之新闻

民立报：历来为同盟会之机关报，标榜共和主义。

天铎报：向来标榜自由社会主义，近来成为自由党之机关报，同时又成为同盟会之准机关报。主笔李怀霜。

民权报：本年四月发刊，标榜自由民权，为同盟会之机关报。主笔周浩、戴天仇等。

太平洋报：本年四月发刊，似由海外华侨集资，干部为四川人，主笔朱少屏，为同盟会派系之机关报。

民强报：本年五月发刊。大同民党之机关报亦为同盟会之准机关报。

民国新闻：预定来年七月初旬发刊，以汪兆铭为主笔，纯为同盟会之机关报，将成为南方有力之言论机关。

中华民报：先前在南京发行，临时政府及留守政府相继撤消后，于去年六月移至上海发行。

2. 共和党派之新闻

时事新报：本年五月被民国公会及国民协进会收买，完全成为共和党之机关报，主笔张云搏。

神州日报：前为安徽人之机关报，今为共和党之机关报，主笔汪允中。

民声日报：本年发刊，为民社之机关报，纯属共和党。

时报：不卷入党派之争，标榜立宪共和，对同盟会无好意，似与共和党接近。

申报：无党派关系，不讴歌现政府。

新闻报：与〈申报〉相同，无党派关系，然赞成现政府，反对同盟会，主笔金世和。

民报：与〈时报〉相同，对同盟会派无善意。

3. 统一党之新闻

大共和日报：章炳麟之机关报。

此外有二三家报纸，但不甚重要，从略。各党各机关报各自提出主张，论难攻击，喧闹不已。中国之政局将有被言论机关破坏之虞。

附：中国报界俱进会。

该会为新闻社团，旨在联合全国新闻界。前年该会以上海、北京、天津、汉口、东三省等新闻社为核心，于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当时正在开博览会）。去年秋又于北京开会。但革命爆发后解散，停止活动。此次为求共和政府确立，本年六月于上海开会，议定规则十五条，其重点如下：

一、有关全国新闻界之共同利害问题。二、应以本会全体名义进行之对外事务。三、对政治上、外交上之言论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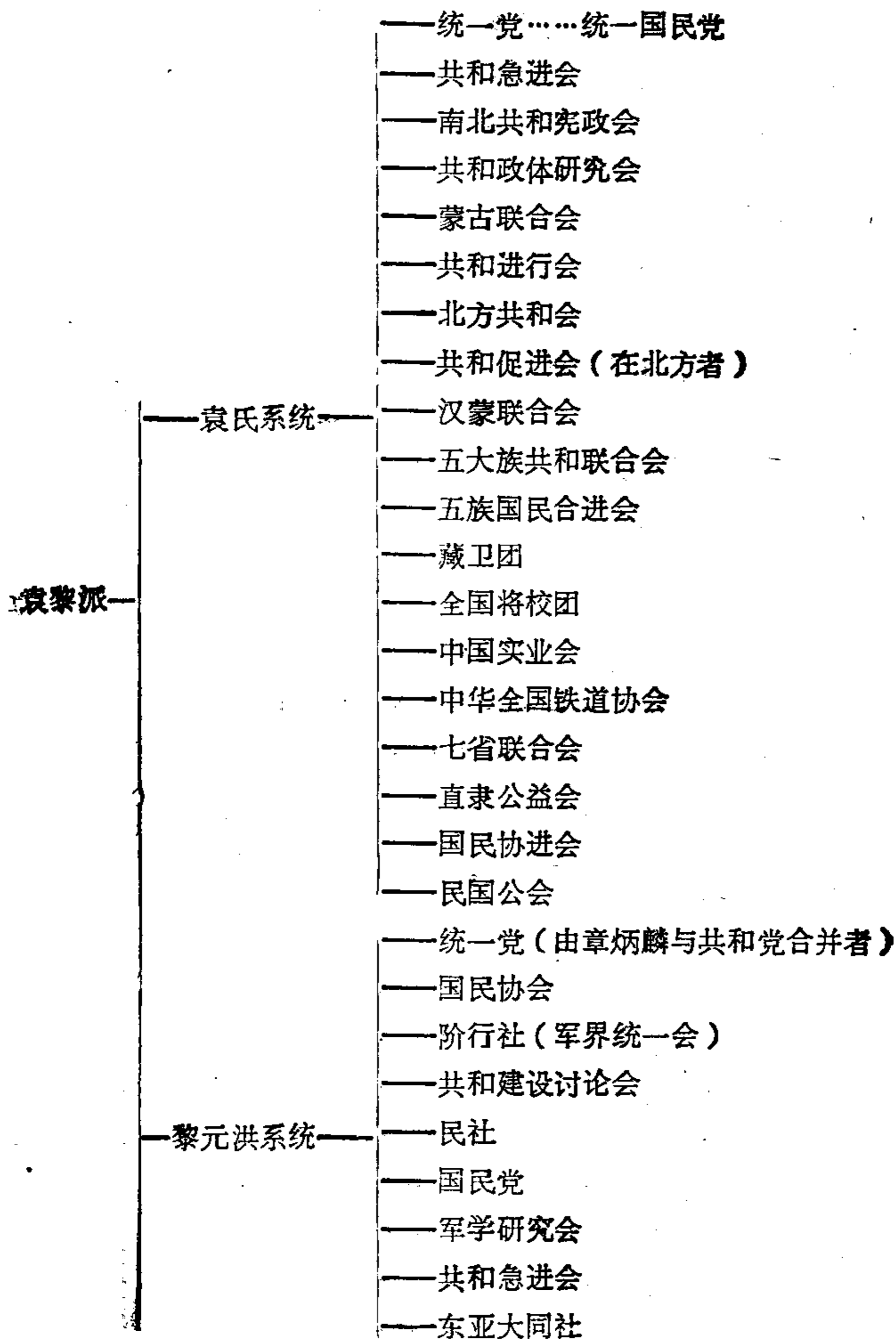
据云，该会拟逐次在上海、南京、北京、天津、奉天、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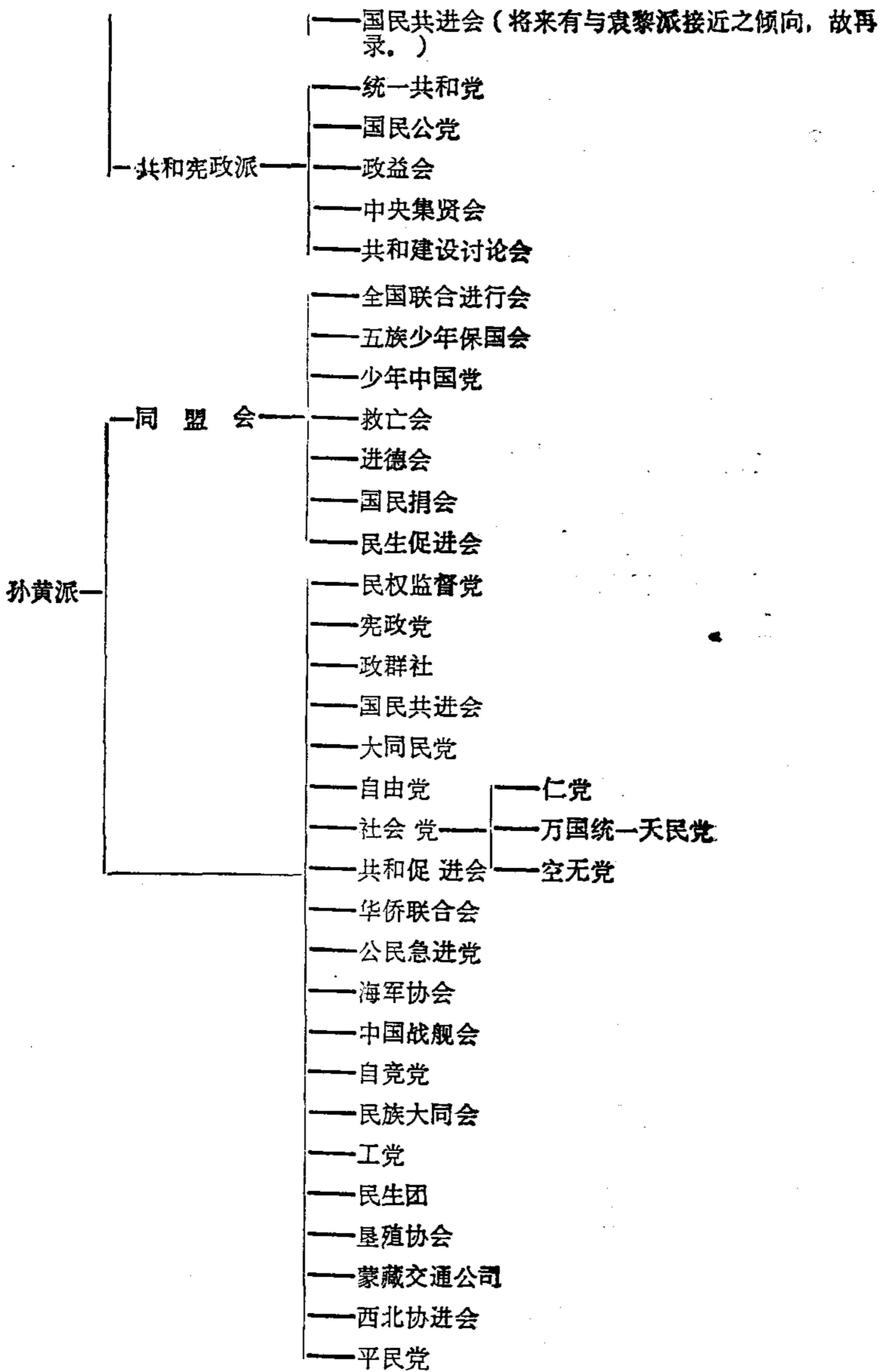
林、汉口、广州、香港等地召开会议，以期全国新闻界之完全团结，成为拥护言论之机关。余认为有如此代表性言论机关之团体，对该国政治上外交上将具有重大关系及势力，其言行不能不予以极大注意。

备考：据近时所传，唐绍怡一派将创立《东大陆报》作为其机关报，在上海、北京、汉口发行。容待以后报告。

第五节 党派系统分类表

本表根据各政党之组成、主要人物及政纲暂加分类，难以期望正确，当俟他日更正。





结 论

共和国成立后政党林立。通观全国新政党之数不下一百余种，然而彼等并非为革命开发民智，增进政治思想，而系完全依仗权势、利害及地理关系。各党政纲几乎完全相同，处于混乱庞杂状态之中。且各党既无优秀党魁，党员又无何等训练，故政治节操缺乏，以致酿成政界混乱。该国之形势早已不堪多数政党对峙，终于产生政党合并之现象。然而研究成立此种政党之各种要因，即知纯为弥缝一时而已，终至成为互相猜疑排挤，争权夺利。新政府成立至今不到三月，已开始瓦解，举国将成为党争之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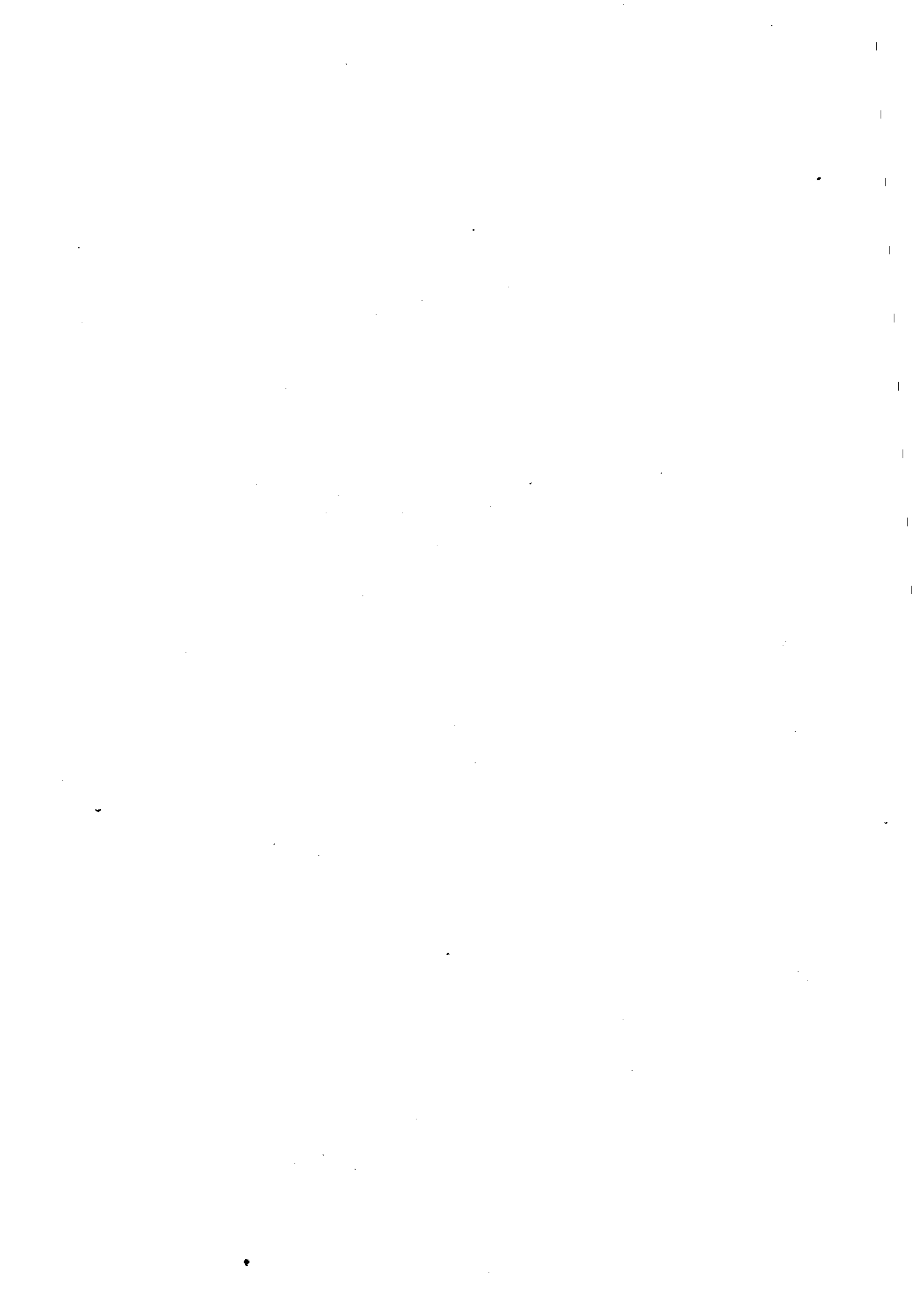
如此腐败堕落之国民，欲收政党政治之实绩，终属不可能之事。由此观之，中国政党结社之勃兴适足以阻碍其国政之发展，而启官民交争之端，其结果徒成为扰乱天下之工具而已。



汪穰卿先生传记

汪诒年纂辑





说 明

本书为汪康年年谱，其弟汪诒年编纂。

汪康年（1860—1911）浙江钱塘人，字穰卿，中年自号毅伯，晚又自号恢伯。光绪二十年进士，为清末资产阶级维新派之著名人士。早年曾在张之洞幕，执教两湖书院。中日甲午战争后，愤国是日非，昌言变法图存。1896年在上海创立《时务报》，延梁启超为主编，宣传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力言中国宜伸民权、重公理，尚创作而贱安闲，尚改革而贱守常。1898年创办《时务日报》，旋易名为《中外日报》，以记载中外大事，评议时政得失为主旨，拥护清政府实行“新政”。《时务》、《中外》两报，均为戊戌变法期间资产阶级维新派所办之重要报纸。1907年汪康年又在北京办《京报》，1910年又办《刍言报》，目的均是为了匡正时弊，以供朝廷“听采之益”；认为“如是则朝廷之势不孤，而国事亦能有所倚矣”。汪康年当时是从维护清朝统治的立场出发，主张维新改革，实行新政，对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主张和行动，则取反对态度。如对义和团运动，主张“乱民必宜剿，必不宜抚”，并积极支持所谓“东南互保”，而对四川保路运动则力主以抚为主，致免激成暴动。这些均反映了他的改良主义的思想。

汪康年是清末主张维新变法重要人物之一，其主要的活动是办报、兴学、传播新思想，于清末颇具影响。《传记》在这方面

收录原始文电颇多，对研究汪康年其人及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报刊史，提供不少有价值的资料。“传记”中所录1907年丁巳政潮前后经过，及袁世凯致端方密札，揭露了袁世凯勾结奕劻，把持朝政，以及瞿鸿禛、岑春煊与袁世凯、奕劻的矛盾和斗争，均有可供参考之处。

本书系汪诒年于1938年10月刊行，线装铅印，书口印有“杭州汪氏铸版”。卷一〈自传〉为汪康年自订年谱，然仅记至光绪十年（1884年）二十岁止。自第二卷以下为其弟诒年所撰。原书无句逗，今于整理时分段标点，并订正个别讹误之处。书前原载有叶尔恺、瞿宣颖两篇序及汪康年影相等，均删而未录。

汪穰卿先生传记

汪诒年纂辑

序 例

先生卒于宣统三年辛亥九月，越九年庚申九月，诒年乃有汪穰卿遗著之刊行，又哀集先生之事实，为年谱一卷，冠于遗著之首。维时诒年服务于商务印书馆，入夜始篝灯握管从事于年谱之修纂，疏漏舛误，在所不免。近年始有志于重修，因循久之，卒未下笔，甚惧来日苦短，日复一日，更无属草之时，将使先生之行谊，亦随岁月以俱逝，不获昭示来许，此则诒年所夙夜不安者也。

至二十四年某月，忽得犹子师陶德侃自杭来书，言于书篋中觅得先生所作自传，诒年大喜过望，急令寄阅，并得亡弟鸥客洛年所书副本。此稿撰于何时，已无可考，惟稿中有述及支次筠先生事，即今浙提学使支恒荣之封翁一语。考支君于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奉旨补授浙江提学使，至宣统元年九月奉旨准其开缺，是先生之自传，当属稿于丙午至己酉之间，时年四十七岁至五十岁也。顾何以只纪至光绪十年时年二十五岁为止，遽搁笔不复继续，则莫名其妙矣。诒年既得此传稿，乃奋意以续修自励，以自传为第一卷，原稿有所未及者，则为之缀补，期于无所遗漏。

至光绪十一年以后，用编年体，按年排次，所采事实言论，

以《时务报》及庚子年《中外日报》其余诸年之报多方征求，均未觅得。《京报》、《刍言报》为根据，益之以先生所撰笔记及书札稿本，而尤以各地友人所来书札为最重要之资料，几于字字皆有来历，无徵不信之讥，窃知免矣。以篇幅较繁，故分为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四卷。

先生于办《时务报》时，最注重于社会之事业，不以为劳，也不苦其烦，抱舍身救死之志，为兼营并进之举，稽其成绩，昔人所谓风行草偃者，不是过矣。使无中途之蹉跌，则吾国之前途，固未可知也。特将当时所办之事，辑为第六卷，先生之志事，可于此见其大略云。

第七卷为杂述，凡先生一生之言行，不列于前数卷中者悉萃焉。

先生所值之时世，一内江外衅更迭无已之时世也；所处环境，一憔悴悲伤永无休止之环境也。百年后，人若知先生所值之时世如何，所处环境如何，则于先生何以有此怀抱，何以发此言论，可洞如观火矣。故年谱中有自光绪十一年后，特将重要之内政外交，分系于每年之下，论世知人，识者或有取焉。自传内原无大事记，今从咸丰元年起，择要补入。

古今谱传之作，义取谨严，故于本人事实外，鲜或旁及他人。论年则略为变通，于先生之挚友，其言论及行事，有足信今而传后者，辄为随宜列入，传诸人亦所以传先生也。阅者幸毋以喧宾夺主为嫌。

论年修纂既竣，有敢举以为世人告者，先生壮年盖甚欲有所作为，初非欲以报纸自显也，以无所凭藉之故，乃欲藉报章以发纾其意见。凡所欲行者，悉于报纸发之，其见诸论议者，率可见诸

实行。其立志甚弘毅，其规画也极远大，是书所纪载，尚未能尽其什一也。或仅以言论家目先生，抑未足以尽先生矣。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弟诒年谨志。

附 言

诒年纂辑此传记，第一当感谢亡弟鸥客，将先兄自传草稿什袭珍藏，复附以手自缮录之副本一通，全体作工楷，经犹子师陶从遗篋检出，寄与诒年，遂以引起编辑之情绪，此最当感念者也。复次则全编脱稿后，承善化瞿兑之君将全稿自首至末核阅一过，复经犹子师陶复加校勘，匡正增改，获益良多。馀若同里关承孙表兄，以所藏光绪二十六年〈中外日报〉全份见假，犹子幼敌以所藏〈时务报〉全份见假，皆为编辑时绝好之资料。此外则誊写清稿由族妹馥园女士任之，校对样本由上虞许善斋、同里张子成两君任之，有助于诒年，实非浅鲜。并述于此，永志勿谖。

汪穰卿先生墓志铭

闽县林纾撰

呜呼！吾友钱塘汪穰卿先生歿六年矣。丙辰夏，其弟诒年以书至京师，请余铭其墓，余感先生慷慨大节，不竟其志事，为可悲也，因为志之。先生讳康年，穰卿其字也，晚年复自号为恢伯，谓灰心时事也。父养云公，母关夫人，大母关太夫人，晚年得先生甚喜，顾生甫涉月，洪杨兵入杭州，遂辟地于湖州之新市。逮长英博，惊其长老。养云公以知县需次卒于岭南，先生已补博士弟子员，除丧以优行第第一为优贡生。明年中式，主试者为顺德李公文田，^① 诧为奇才，将置第一，以第三篇为离骚体，梗于众议，抑置第六。庚寅应南皮张文襄公^② 聘教授其二孙。壬辰捷南宫，甲午补应廷试，列三甲。时我师燿于大东沟，先生大愤，计非变法，不足图全，乃立《时务报》于沪上，招梁任公主编辑，议论一出，举国倾靡，以为得未曾有。先生著自强三策，弁其端，力言中国宜申民权，重公理，尚创作而贱安闲，尚改革而贱安常，开利源求新学，宣达民性振奋士气，欲化愚弱为明强，非立议院选议员不可。时执政大老，恶言民权，而先生仍侃侃力持之无辍。旋改为《中外日报》，益风行海内，西人争译述其说，诧为

^① 李文田字若农，广东顺德人，官至礼部右侍郎，光绪十五年（1889年）为浙江乡试主考官。

^② 即张之洞，时任湖广总督。

公允故。四明公所事起，旅沪之甬人争出与外人撓亢，而无抵冒殊扞之举，因先生言用公理以自胜也。庚子乱稔，中外骚然，先生著论归咎政府，言排外之举，其怨毒盖出于有所激咎，不尽在国民，西人颇韪其语。拳乱既弭，俄师久驻陪京，^①先生合同志力争于政府，虽不效然，西士咸叹异以为中国固有人在也。甲辰母关夫人服闋，入都授内阁中书。丁未复设《京报》于都下，时老奸擅国，某某饰名姝杨翠喜以媚其子，媵金巨万遂得黑龙江巡抚。先生恶其无耻，于报中抉摘其丑，经言官论列，某遂罢斥，于是权贵憾入骨髓，嗾某部封禁其馆。先生终不以是自馁，复设《刍言报》，持论益严正，顾终莫救，而辛亥九月，武昌事起矣。时先生已病膈徙居天津，闻朝议起用项城，嘿然就枕，夜半患作，迟明大渐，时为九月十三日。先生卒年五十又二岁。生平建议不主激烈，一一中于时病，忧国之心，至死无变，顾乃摧剝，不能一展其意。歿之日，余曾一临其丧。配王夫人前卒，续取陈夫人，均无子，以弟子德蔚嗣。诒年书来，言既葬于西湖之桃源岭，余因为补其铭曰：翹清以澄浊，而曹者胡觉，朋挺恣丑日斫斫，特立不辅身焉托。鯁讐务以遏过，乃莫抵乎群蠹，纯节弗遂，而国以不药。呜呼！城可烧，金可烁，万禩弗瞑此忠魄。

^① 指盛京，即今辽宁沈阳。

同年汪穰卿先生传

太仓唐文治撰

呜呼！士君子丁末造不能展其经纶，以大用于世，徒抱磊落之才，坎坷以终，岂不悲哉！然而命随改玉，目不见挠攘之祸，又岂不幸哉！余传同年汪穰卿先生，感怀弥至焉。先生讳康年，穰卿其字，晚年别号恢伯，浙江钱塘人，生而岐嶷，幼学不厌。父养云公，需次粤省，囊橐萧然。先生事父孝，待弟友，处天伦之际，人无间言。岁戊寅补博士弟子员，戊子考取优行贡生。己丑登贤书，顺德李公文田本拔置第一，以孟艺用离骚体，抑第六。壬辰捷南宫，甲辰补应朝考，授内阁中书。当甲午之后，士大夫争谈时务，臆诀唱声，先生以为民气之郁久矣，宜重民权、浚民智，用以明目而达聪。岁丙申设《时务报》于上海，戊戌复设《时务日报》，旋易名《中外日报》。丁未设《京报》于京师，庚戌复设《刍言报》，常欲以言论机关大声疾呼，发聋振聩。辛丑和议告成，俄人驻兵奉天，不允撤退。先生愤然腾电中外，慷慨力争，西报互相译述，以为中国有人。当此之时，先生名闻天下，顾以直言故，数忤权贵，屡挫折之。先生外维世变，内审国情，身世之感，益悲从中来矣。辛亥秋，武昌事起，全国骚然，先生不主过激，怒焉重以为忧。会九月十二日夜，友人密函告起用项城，先生阅毕嘿然遽就枕，夜半家人闻呻吟声，则先生已疾革不能言，明日遂瞑。呜呼！是所谓忧能伤生者，非耶，抑其先几之智

邪？余于先生为同年交，旅京过从，相得甚欢。丁未四月，余营葬先妣事毕返京，遇先生于轮船中，相与言朝政之日非，祸至之愈亟，先生洒涕沾襟。余兼痛家国之沧桑，亦不觉泣数行下。维时天风浪浪，若与悲怨声吞吐相和；海山苍苍，亦如变色有无穷之恨。远方羁旅，聚观惊诧，以为若何为者，两人始敛容退。自是不通音问者数年，而先生竟死矣。戊午先生弟颂阁，以其遗籍捐置上海工业学校之图书馆，复寄先生之年谱、墓志来乞传。余读之，幽光毕阐，无遗憾矣。第尚有阙者，辛亥之夏，学部广征名流开教育会，综核同异。维时废经之说已盛行，先生力持正议，谓读经关系世道人心，决不可废。又以高等小学已上，男女同学，中国尚非其时，援据内则，侃侃争辩，众人非之而不顾。迄于今世，群经之大义，孔孟之微言，先民之礼法，扫地殆尽矣。论者谓吾清之亡，亡于废经，追思先生之言，能无痛心而疾首与！余故复为之传，俾后之同志，得以考鉴焉。

论曰：孟子言，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而庄周则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盖治世之是非公而一，乱世之是非私而歧，后起之心术，因世而异矣。余主工业校，庚戌岁以事黜某生，某生遽摭拾细故，列报章丑诋余。先生大恚，移书报馆，谓是非宜明，何颠倒若是；然不令余知也。呜呼！凡国之否，先兆于无是非。今兹是非尚有存焉者乎！余于先生之歿，所以累叹歎歎历久而不忘者，非仅为一人之私痛而已，痛乎是非之公之遂亡也。

汪穰卿先生传记卷一

自传

弟诒年校补

诒年按：先生以咸丰十年庚申正月初三日生，故小字初官。初名灏年字梁卿，年十九更名康年字穰卿，中年自号毅伯，晚又自号恢伯。

余家世居安徽黟县之宏村，至八十二世文宇公讳元台为余十二世祖，于明万历间，以业鹺至杭，遂家于杭，居普宁里，盖即今之谢麻子巷也。至孙育青公讳时英，为余本生十世祖，以盐务习气重，遂弃盐而以当业资生。其后子孙蕃衍分支十数，至介思公讳光豫，为余七世祖，始卜居荐桥之馆驿，后始名振绮堂。余家自迁杭至此，时垂百数年，以历代勤俭积累，颇以富著，有关、汪、孙、赵之称，而科名则未显。至介思公长子鱼亭公讳宪，为余本生六世祖生于康熙六十年，卒于乾隆卅六年，乾隆甲子科中式举人，乙丑科成进士，始以科名著称，而鱼亭公联捷后即南归，后于戊寅入都补刑部陕西司员外郎，次年即请终养假回杭，不久居京也。

余家世以藏书为事，至鱼亭公益加搜罗，于是振绮堂藏书之名始著。介思公二子，长即鱼亭公，次容谷公讳宽为余六世祖。

鱼亭公有四子：长为涤源公讳汝璫，亦居馆驿，后堂名燕绥，余高伯祖也；次即春园公讳璐，堂名振绮，余高祖也；三为复岩公

玮玮，堂名怀新；四为天潜公^{玮瑜}，堂名纪宜，均余高叔祖也。江苏书局所刻自然好学斋诗集及明三十家诗选初二集，为女史端选撰，夙为诗家称述，即天潜公女也。容谷公无子，鱼亭公以春园公嗣之。嘉庆初年，滌源公以己年已老，天潜公将移居苏州，春园公平素嗜书、即举藏书畀之，以保守之责相属。故春园公于兄弟行虽居次，而袭振绮之名。

治年按：乾隆间诏开四库馆，征求海内遗书，余家进呈善本书百十种，因滌源公居长，故由公具名。今《四库书目提要》中各书目之下，有注曰汪汝璫藏本者皆是也。当时藏书家浙东称范氏天一阁，浙西称汪氏振绮堂，此外又有吴氏瓶花斋、赵氏小山堂，然不久皆散佚不存。

治年又按：振绮堂藏书，自咸丰庚申、辛酉两次兵焚后，已散佚殆尽，惟藏书目录则尚幸存留四种。一为最初本，何人所辑，辑于何时，无明文可考，以经、史、子、集四部为次，每部复分若干门，凡御制、御纂、钦定、御选、御刊各书，皆立于各门之首；四部内惟经类书间注卷数及撰人姓名，余则但著其册数而已，此目前为吾杭丁氏所藏，后归江南图书馆。次为朱明斋先生文藻所辑之振绮堂书录，凡各书之序跋与原书有关系者，率全行载入，间或详叙其内容。每书之后，必标明为刊本为钞本，凡曾经名人校勘者，其评论及跋文以及收藏家之印记，悉详载无遗；于各本之异同及原书之真伪，亦间有考证，实为讲求目录学者不可少之书。惜前三册及末一册均已失去，仅存六册耳。其次为先高祖春园公^{玮璐}之藏书题识，盖即朱书之节本，择各珍帙之评跋写录成书，时则嘉庆九年甲子，距今一百三十三年也；惜后三卷已失去，仅存前二卷而已。又其次则为嘉庆二十四年，先曾祖十村公

讳诚所编之书目五册，首冠以乾隆三十九年颁赐书籍之上谕，次以进呈书一百十种之目录，其下则分四部编次，于撰人之仕履，全书之内容，版本或抄本之源流，亦间有叙述。又次则为先祖少洪公讳迈孙，先叔祖蓉垞公讳通孙合编之简明书目二册，曾经长洲陈硕甫先生奂订定，盖依书厨编次。前三厨为圣训及御制、御纂、御批、钦定、御选各书；第四、五厨为宋元版书籍；第六厨为先代稿本、校本、批本及家刻各书；第七至十三厨为抄本经、史、子、集四部书；第十四厨至二十三厨为刻本书。编辑年月无可考，大约在道光二十七年后咸丰纪元前矣。以上题识一种、书目三种尚存余家。

春园公子一，为十村公讳诚，余曾祖也。有子六人，长为大伯祖小米公讳远孙，好学，著书甚富，多接海内名流，声誉最著；次为二伯祖又村公讳适孙；三即余祖少洪公讳迈深；四为四叔祖蓉垞公讳通孙；五为五叔祖子惠公讳迪孙；六为六叔祖幼能公讳述孙。当十村公时，家资不及十万，十村公以子息蕃衍，乃艰难经营，至易簪时，家资可得四十万。故小米公内办婚嫁，外接宾友，尚得支持，惟时吾家富名大著，号称百万云。

治年按：小米公所著书有《国语三君注辑存》、《国语韦注发正》、《国语明道本考异》、《汉书地理志校本》、《借闲生诗词》五种，版今尚在。又有《诗考补遗一种》，则版已不存。又有《借闲随笔》一卷、《经典释文补续偶存》一卷，则由先生于宣统二年编入振绮堂丛书内。公原配梁孺人讳端字无非，著《列女传校读本》；继配汤孺人讳漱玉字德媛，著《玉台画史》，半为公所订正云。

治年又按：小米公又好刻书，其书版今尚存者计有《尚书古

文疏证》阎若璩著、《左通补释》梁履绳学、《咸淳临安志》仿宋本、《北隅掌录》黄士珣撰、《湖船录》厉鹗辑、《道古堂全集》杭世骏撰、《沧江虹月词》汪初撰、《莲子居词话》吴衡照撰、《瓶笙馆脩箫谱》舒位撰等。此外尚有《御题曲洧旧闻》、《御题书苑菁华》、《诗毛氏传疏》陈奂学、《辽史拾遗》厉鹗撰、《辽史拾遗补》杨复吉撰、《水经注释》赵一清录、《水经注笺刊误》赵一清撰、《三祠志》汪家禧撰、《东城杂记》厉鹗撰、《两般秋雨庵笔记》梁绍壬纂、《太上感应篇笺注》惠栋注、《元赵待制遗稿》赵雍撰、《松声池馆诗存》先高祖讳璐撰、《自然好学斋诗集》汪端著、《东里生烬余集》汪家禧撰、《辛卯生诗》吴衡照撰、《冬荣草堂诗集》李堂撰、《明三十家诗选初二集》汪端辑、《词综》朱彝尊辑，则版片已无存。

诒年又按：小米公性甚好客，尝集江浙名流，结吟社于所居之东轩，预社者先后凡七十六人，每月一集，命题赋诗，其后乌程费晓楼先生丹旭为作东轩吟社图长卷，须眉如生，时推名笔，今尚保存。公歿后伯祖又村公乃取社中积存之诗及文词，编为《清尊集》十六卷，精刊印行云。

小米公于道光十六年下世，惟时房分众多，振绮之屋不复能容。于是二房卜居贺衙巷，为俭永堂；余祖购得振绮堂隔壁之屋，名道福堂；四房迁居冯山人巷，六房迁居嘉兴，惟大房、五房仍居振绮老屋。

余家自十村公捐馆后（嘉庆二十四年）至二伯祖又村公及余祖少洪公捐馆时又村公卒于道光二十三年，少洪公卒于咸丰三年相距三十余年，家用日渐繁费，且资产以分而见少，计彼时每房所得产业不过数万字画古玩等不在内，至书籍则不分。余三房仅与大、五两房分

得当业两处，一在临平，一为大方伯里之文泰当。少洪公下世后，临平当忽被劫，时家中计议，拟将文泰当让与他人，即以所得之貲，供临平当之赔款。詎料文泰管事韩姓，久将当本亏蚀，每年吾家虽派人往查，然韩千方弥缝，查者率为所蒙蔽，至此不复能隐，则至吾家长揖漫云，所有架本已代为捐充善举矣，语毕遂扬长而去。吾家仓卒无策，乃将道福堂屋典与吴姓，议价六千串，先收三千串为弥补临平当之需。是时家中景况已非昔比，即大乱不起，亦不能支矣。

少洪公四子，长子望二伯讳曾立，为孙太君所出，馀皆关太宜人出，次即先府君养云公讳曾本，三为子义八叔讳曾学，四为子行十四叔讳曾笃。先府君于咸丰元年辛亥恩科中试举人。二年壬子，随外祖关东培公讳福章入京会试，已而东培公在京捐馆，先府君为经纪身后事，即扶柩回杭。咸丰三年癸丑丁外艰。五年乙卯服阕，后报捐教谕。是时江宁失陷已数年，烽烟之警，时有所闻。九年己未冬，先府君与余母关宜人奉祖母关太宜人避居于三角荡外祖家中，挈之同往者为余之大姊、二姊，尚有余一兄后殁于江西。十年庚申正月，关宜人产余于三角荡。

附大事记 咸丰元年闰八月，洪秀全立国于广西永安州，号曰太平天国。三年，南京为太平天国所占领，建为天京。

是年二月，粤军至杭，由凤山门入，三日即退。余家老少，暂避近地，未受损害。外房之居故屋者，大率殉难。粤军虽退而恶耗仍时至，适先府君奉署景宁教谕之檄，私冀地僻左可避兵祸，遂全家赴任。不意彼处为浙闽、江西来往便道，加以知县为江宁人李立峰，贪酷不恤民隐，去任时被乡人篙沉诸河。继之者为管念先，则迂驽，惟惧亏空，寇警不设侦探，故两年余粤军

三至，先府君皆奉关太宜人避乡间。幸先府君平日待诸生诚笃，有所问谆谆相告，或飧以酒食，故诸生感先府君亦甚厚，颠沛之际，争先迎致，食宿不致缺失，然已极艰困矣。

附大事记 咸丰七年十二月，英军袭占广州，拘两广总督叶名琛，囚诸印度。十年七月，英法联军又由津入京，清帝避往热河。十一年七月，清帝崩于热河行在，皇长子即位，下诏明年改元祺祥，旋命改为同治。十一月，太平天国占领杭州，官民死者以亿万计。

先君念景宁非可久居，同治元年壬戌之冬，乃作避地之举。时有杭人吴锡侯先生晋元者，管大令挈之至县，使办书启，其兄艾生先生恒元避难踵至。管既去任，锡侯得江西余干县之馆，于是先府君乃属吴氏兄弟护眷至江西，居余干县之社洪镇。

治年按：先生是年三岁，初读《尔雅》，由先府君口授，日数十字，琅琅成诵。关太宜人在羁旅无聊中，时为之破颜焉。

二年癸亥，先府君入都会试，报罢乃纳貲为盐大使，指分广东候补。时轮船未行，乘夹板船由海道往。家中得信，即邀吴氏兄弟结伴同行，度梅岭至粤时，先府君亦属八叔父至社洪相迎，除夕方至，则全眷已先期行，乃废然独返。惟时先府君既无先业可守，而试又不利，遂不得不倚官为生矣。

治年按：先生自始至四岁，无日不在奔走流离中，至是始获宁居。及长而身体羸弱，大半盖因此。

先府君至粤，初无可恃之人，惟时子用三伯讳曾唯，于燹前之官湖北，子常四伯讳曾守，后改守正，亦燹前之官河南，子复九叔讳曾复，燹前之官湖南，子栗十叔讳曾事，于庚申避乱后之官江西。先府君以至山曾叔祖讳阜为，涑源公之长子及小逸叔祖讳秉健，为至

山公之侄，两代宦粤，情形熟悉，宜可依恃。到粤始居三多坊，屋圯乃移居净慈街；已而又将圯，全家仓皇避于学宫街。小逸二叔祖遂卜居白薇巷，是皆同治三年甲子、四年乙丑余五六岁事也。

附大事记 同治三年三月，清军收复杭州。六月清军收复南京，太平天国于此告终。

余六岁时，关太宜人五十七岁，先府君及关宜人均三十四岁。是年余第三妹生后适高氏，先后雇两乳媪，咸不终事去，故后来二弟、三弟咸关孺人自乳。先府君初涉官场，谨守书生本色，故不能得志，辄与关宜人计议，斥卖金珠数千金，加捐花样，冀早补一缺，积数年所入，仍返家园，得免官场挤轧之苦。詎料事出意外，经手之人辄拐物逃去。由是遂浮沈宦海，日处愁城。先府君郁郁终身，半亦坐此。

五年丙寅余七岁。移家光塔街。是年二弟诒年生。先府君得□^①庙缉私差，六月期满谢归。

六年丁卯余八岁。正月移家大市街。二月小逸叔祖下世。是年先府君得芦苞缉私差。余少时皆在家中读书，先府君自课，有时由关宜人或吴艾生先生督课。是年始延沈先生授余读，而沈先生有所不满，端节后辞去。先府君乃自差次归，携余至芦苞读书。八月差满，挈余旋省。

余家至粤省，八叔父先已携家在粤，前后数年，咸馆于南雄等处。余八岁时，八叔父乃携伯宇大兄玉年至省，即居余家。其后二年，八叔父无事，即授余读，伯宇大兄亦同学。

八年己巳秋，八叔回杭，时伯宇大兄年十三岁，余年十岁，一时无读书所。适杭之周麟趾先生设馆天香街，先府君拟使余及

^① 原文如此。

伯字大兄从之游，乃于是冬移至天香街，屋极逼窄，顾无如何也。

先府君自卸芦苞后，直至是年，绝无薪水之入，家用自借贷而外，辄从事质当。余自幼年，常闻长者忧叹，时复泪盈于睫。每见关宜人时时手质券与先府君议，若者不能不赎，若者只得暂缓，若者只得听其满去。维时有支次筠先生即今浙提学使支恒荣之封翁，附居余家指大市街，彼初至粤，遇事须先府君为导，无能为助也。直至是年始得□□^①差，涸辙之鱼，稍有生机矣。

九年庚午，余年十一岁，仍从周师读。是年九月，伯字大兄回杭。十月大姐适同县楼笙谐先生凤清长子师韩绛。十二月三弟洛年生，时先府君已差竣回省。子周大伯讳清冕，为小逸公之长子署大洲场期满回省，与先府君皆有得盐务公所差使消息，乃僦屋豪贤街同居。子周大伯及子彪二叔讳清宇，为小逸公之次子及三婶母居前一重，余家居后园旁一重。

十年辛未，余年十二岁，时子周大伯延秀水汪鲈秋先生熙苑授二子伯唐大燮、仲虞大钧昆弟读，余与二弟亦从之读。先府君与子周大伯同至公所，理职务甚勤瘁，顾月所受俸杂以他款，不过五十金，故虽差事冲要，而家仍拮据。九月长甥楼思诒生。

十一年壬申，余年十三岁。时子周大伯赴瞰白场署任，先府君以欲近公所，乃卜居南门外之东横街，而延鲈秋先生授余兄弟读，子彪二叔之内姪金氏兄弟来附读。如是者二年，子周大伯则延无锡秦颂丹先生凤墀同赴任，课伯唐、仲虞二人读。

十三年甲戌，余年十五岁。先府君始以劳绩得小淡水盘查厅事，名为缺实差也。然是年所入最优，大约可得四五千金。先府

^① 原文如此。

君偿宿债之余，稍稍购买书籍，时时与余指说之。是年改延吴锡侯先生于家专课余兄弟二人。吴师循循善诱，后以他事辞去。

光绪元年乙亥，余年十六岁。延萧山韩砚庄先生亦潮为师，周麟趾先生所荐也。是年三弟始上学，韩先生已耄七十五岁，不复能尽心馆事。

二年丙子，余年十七岁。乃于每月三、八日至子周大伯家从秦颂丹先生习作八股文，而延桐城姚兆南先生丽泽授两弟一甥读。

三年丁丑，余年十八岁。先府君欲余专心学业，乃令余寄宿子周大伯家从秦师习业。姚至秋间以恶疾辞去。

附大事记 光绪元年正月，英员马嘉利在云南蛮允地方被戕。二月派李瀚章往云南查办。二年七月，命李鸿章与英使威妥马在烟台订立条约，了结滇案。

自元年乙亥，先府君卸小淡水盘查厅后，复闲居无事。其冬闻有得补大洲场之说大洲为广东盐务第四缺，乃藉京饷差之便，入京探之，顾不能得。先府君念盐大使补缺无期，而得差之途亦窄，拟捐升知县，乃以小淡水余款为捐资，而假贷以足之，遂于三年丁丑之冬入京引见，四年戊寅正月回粤。二月值关太宜人七十生辰，时八叔父在福建学使孙子授先生治经幕，亦先期自福州来为太宜人称觞上寿。

是年余十九岁，先府君即遣余回杭小试，时以两次入京，耗费不支，故行时除船资外，惟得二十元为资用而已，别与通志堂经解一部，令售去为进学后之用。与余同行者为伯唐族兄及王子良表弟为幹、许清如□□^①、朱季良承瑗诸君，至上海仅停一日即

① 原文如此。

行。

余到杭后，即与伯唐大兄住二伯父家中，盖燹后各房之官于外者，家中之屋率托二伯父照管，如子栗十叔父振绮之屋五房与大房本共分得振绮屋，而十叔之子鼎年又嗣于大房，故归十叔一人，并其余市房子周大伯父燕绥之屋皆然。二伯父所住即燕绥堂正屋旁之花厅。至道福之屋，为先府君与二伯父共有者，燹前典于吴氏，仅收半价，故仍归余家管理，出租于人，而以月租三之一归吴，亦由二伯父管理。余与伯唐兄到杭后，展谒祖坟，拜候尊长，仍从邓莲裳先生读，附膳于程氏之家在九曲巷。迭应分司、运司两试，皆不得高列，而均得终场。故事，分运各试四场，每场必汰若干，有不被汰四场均得入场者，谓之终场。五月院试，蒙学使善化黄恕皆先生俾取入钱塘县学伯唐第八，余第十。然需用浩繁，余绝无可筹措，幸所携通志堂经解，承丁松生丈丙为售诸某君，得墨银九十元，得为入学后一切用度。秋间回粤，尚向伯宇大兄假银数元，始得成行。

是年秋，先府君得九龙厘厂差厂设香港，时关太宜人年高，精力已不如前，十月初忽得疾，日下痢十数次，势极危殆。先府君急自差次回省侍疾，延胡楚材先生诊治，始得转危为安，然元气已大损。冬徙居大市街以东横街屋第一进之右间，房主须圈去自用故。

附大事记：是年二月，左宗棠奏报收复新疆全境。

五年己卯，余年二十岁。夏初关太宜人痢疾复作，重以年老气衰，遂于五月弃养。家故屡空，猝遭大故，尤束手无策。先府君既丁忧，依例当辞差。幸主者知府君清贫，乃展延二月始别委人，使吾家得数月之薪水为资用。当关太宜人病时，先府君已急函召八叔父回杭。八叔父自杭之申，复自申之粤，关太宜人已辞世数日矣。

七月初，先府君与八叔父扶柩回籍，令余随行即赴乡试，子周大伯亦令伯唐族兄扶小逸二伯祖柩同行，时附伴回杭乡试者尚有王子良表弟、朱韵松姊丈承琳为伯唐之胞姊丈及张雨生景羲诸人。子彪二叔别趁船至港相送。到杭后，乃住二伯父处数日，余即与伯唐兄及朱、张二君僦居贯巷考寓，取入场近便，且家中实不能容也。余是科场作文字甚不惬意，然先府君以属望之深，颇奖许之，余意益不宁。榜发果报罢，余与伯唐兄均随先府君返粤。

家中延师，自三年丁丑姚先生辞去后，四年戊寅延嘉兴沈伯铨先生申锡，不半年辞去。其间由关宜人及余督课。五年己卯，始延番禺陈兰甫先生之姪月湖先生为师，课二弟、三弟及楼甥读。

附大事记 是年三月，琉球为日本所灭。我国藩属被人侵夺，实于此役开始。

六年庚辰，余年二十一岁，家中不复延师，即由余课二弟一甥读。时二姊已许字归安陈氏姊丈陈季园其梁，为归安陈容叔先生第三子，幼病暗。容叔先生官于鄂与子用三伯父相得，三伯父以二人同病，当相宜，遂为作伐。是冬陈姻丈遣次子骏生其毓送季园姊丈至粤就姻。先府君权宜许之，乃暂僦对门秦宅前进之屋为成婚之地，而新房仍设于家，交拜既毕，新郎新人即迎至余家，以归简便。不匝月，余承严命，送二姊等至鄂之嘉鱼时陈姻丈署嘉鱼县，余始得见三伯父于河口厘局中。冬间余复以间，省觐笙谱母舅受均于河南之大胜关土名仙花店。

七年辛巳，余年二十二岁。正月自湖北返粤，时家已自大市街复迁于东横街，仍居故宅。余仍课二弟一甥读。至秋冬间，二弟乃从秦颂丹先生习作八股文，直至次年夏秦师往南京应乡试始止。

诒年按：先生是年始从番禺石星巢先生炳枢，后改名德芬习举业，石先生为广东名孝廉，与先生甚相契，师弟之谊至笃。

先府君自五年己卯秋自杭返粤后，怅怅无所之，幸其时楼次园年丈震方任肇庆府知府，延先府君司帐务。六年庚辰，楼年丈卒于官，其时沈廉仲姻丈宗济总办临全大江局局设广西梧州，延先府君佐其事。时子常四伯，蒙曾忠襄保举，入京诊慈禧太后疾，声气稍通。先府君因是得海关事，月约得八十金，时已将服阕矣。已而归安姚彦侍方伯觐元任广东藩司。姚之先世，与小米大伯祖雅有交谊，颇器重先府君，故七年辛巳，先府君服阕后，官场中均谓将可得志云。

附大事记 是年正月，曾纪泽与俄国订立交收伊犁条约二十款，又陆路通商章程十七条，将五年八月崇厚擅立之新约完全改正。

八年壬午，余年二十三岁。家中延苏乐川先生课三弟及楼甥读，余仍从石师游。入夏，先府君忽得疾，继乃成症，先延归安凌初平世丈绂曾诊视，以用药不适宜，久勿效，已而改请本地吕姓医生，稍见轻减。先府君甚以康年试事为意，病中犹筹川资，使康年偕伯唐大兄回杭乡试。先府君病旋稍愈。适七月考帘，凡各省乡试，前期由藩司调取正途出身之州县先行考试一次，谓之考帘。考后分为内帘、外帘。在内阅卷者为同考官，谓之内帘；充场中各种差务者，谓之外帘；调充内帘者实任、署任、候补皆有之，得内帘后，候补者往往可因劳绩得差缺。先府君考后疾复发，乃告假不入场，久之愈，而以饮食稍失宜，病又发。时康年在杭试既不售，而资用乏绝，苦不能成行。幸丁松生丈属带刻书资百元，朱茗笙年丈智属带购木器资百元，得资挹注。逮至粤家，又由东横街移桂香街，先府君已缠绵床第，于十一月十一

日长逝矣。呜呼痛哉！盖先府君自幼即以文学优长见重于乡党，举于乡时，年才弱冠，声誉甚盛。迨及壮年，迭遭变故，亲老家贫，入貲为吏，已非本怀。顾仍不能得志，抑郁寡欢者几二十年。元气本虚，痰疾乘之，遂一瞑而不视矣。呜呼痛哉！临终初无所言，惟病中谆谆训康年兄弟不可废书不读而已。

诒年按：先府君弃养时，诒年年十七岁，三弟洛年年十三岁，诸姊妹中惟适陈氏仲姊在湖北，适楼氏长姊挈子思诰居余家，三姊未字年十八岁。

是时家中骤遭大故，四顾无可依倚，家中绝无蓄积，而遗债至五千金，中有必须归还者可二千金，略有价值之物，悉付质库，其未质者又于己卯年十一月被贼窃去，遂益虚罄，举家皇皇无可为计。幸赖子周大伯、子彪二叔照料殓敛，诸务仅得如礼，而日后之计，乃全无把握。幸此时曾忠襄方任粤督，与姚方伯皆垂念吾家，乃设法以一盐务例差委大伯，以一地方例差委二叔，咸令以所得为我家行资。此等差事，官场甚多，名为公事，实用为调剂也。计二差可合得千余金。

九年癸未，余年二十四岁。关宜人深恐归计尚不易，就令余至京师见子常四伯父谋之。时石星巢师将赴京会使，余乃附伴同行。四伯与以致曾忠襄及粤海关监督某两书，并属以速设法回杭为正办。余得书即遄回粤，时九年二月杪也。后二差所得，以渐齐集，关宜人乃奉柩并率全家附轮舟动身，计余兄弟三人，大姐及楼甥思诰，并三妹，计亲丁七人，仅携一老仆妇同行，家具虽不多，而极累坠〔贲〕，除衣箱书箱约二十口外，尚有代朱茗笙年丈所购红木器具，而自复带二号红木公式椅一堂，拟卖之为葬资也。至上海停二日，雇满江红船一艘，以前舱安奉灵柩，中

舱及后舱居眷属。又雇乌山船一艘，装笨重器具，向杭州进发。不意行未数日，舟忽破漏水，灌入舱中，书物半被淹浸，至石门停舟晾衣书，则至杭以十元托扶雅堂为之收拾，虽尚可翻阅，而已多污损矣。

先时，余预计到杭后，若停舟觅宅，为时过缓，乃函托某君属其代觅数宅，俟余等到杭后择用。及至时，以途中被水，急欲入屋休憩，亟往询之，乃直言未觅。异而询之，则云热甚，孰耐为此。时仲虞族弟先已在杭，乃为代定延定巷，屋〔房〕屋极低下，同居猥杂。盖租楼厅五开间之半，而同居连房东共约四家，惟月租仅二千八百文耳。顾无奈何，遂移入之。府君之柩，则于船到次日奉厝于桃源岭相近之攒基。

时余家甫至杭，而资已垂尽，幸朱茗笙年丈为觅得书局分校事，月得薪水十六元，藉以支持日用。延定巷屋既不堪，而房东尤恶劣，每夕必醉，醉则夫妇二人诟谯不休，声震一室，余家咸不得安睡。时宿舟河下胡宅适有空屋，伯宇大兄来言，乃即迁往，虽亦止租半进，而地段房屋及同居之人胜于延定巷多矣。先时拟售所携红木椅为葬资，乃竟不能售，而关宜人则以为葬事不宜久延，乃以残余之饰物质得百余元为葬资。余得吴氏馆生徒二人。长名源字子蕃，为王夔石年丈文韶之嗣甥；次名灏字子琴。是冬，余即往汉口吴宅在汉口石马头就馆。二弟遥从伯宇大兄习举业，兼课楼甥读。三弟则入宗文义塾，盖一番风浪之余，此时始略定矣。

十年甲申，余年二十五岁。三月自汉回杭，时关宜人以家中人少，乃为余缔姻金坛王氏简庭先生希曾长女。是年冬腊，子用三伯全家回杭，适陈氏之二姊随之归宁。

诒年按：是年夏，关宜人患病甚剧，水浆不入口，昏迷不醒

者数日。先生先后延请同里王保和太守及余杭仲茆亭先生诊治，亲侍汤药，忘寝废食，昼夜不懈，卒得转危为安，至秋病乃大愈，人咸以为孝思所感云。

又按：先生是年仍馆于吴氏时吴氏亦由汉回杭，居里堂巷。至十五年己丑入京，始辞馆，月得脩金八元，并书局薪水，计之才得二十四元。一家数口仰赖于是，米盐凌杂，时虞不给。关宜人因是常郁郁。先生先意承旨，所需辄预为之备，不使关宜人忧虑。每自外归，辄举里巷琐谈宾朋轶事，娓娓陈述，以娱亲心，关宜人闻为之解颜云。

附大事记 自去年至本年，法国侵略安南，迭陷诸要地，旋又侵入我国台湾及福建，继又攻陷安南之谅山，此后和战始末，均详见卷二年谱第一页。

汪穰卿先生传记卷二

年谱一

弟诒年纂辑

光绪十一年乙酉 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五年

四月与法国订立媾和条约十款，承认法国在越南之政权。按前二年即光绪九年，法国侵略越南，连陷越南各地，复进攻谅山，为我军所败。旋又攻陷台湾基隆炮台，据澎湖岛，封锁台湾海口。又攻毁福建南台船政局，击沉扬武等兵舰七艘，既而又攻陷谅山。至是年二月，我军始将谅山克复，至四月，遂与法议和订约。十一月缅甸为英国所灭。

先生年二十六岁，元配王宜人来归，是年应浙江乡试，荐而未售。

光绪十二年丙戌 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六年。

六月，与英国订立条约五款，确认缅甸为英之属地。

先生年二十七岁，浙江学政善化瞿子玖学士鸿祺按试杭州，先生应岁试列第一名。诒年亦以第一名入钱塘县学。

是年三妹适仁和高友苏先生德麟嗣子经笙人俊，住绍兴前梅。

光绪十三年丁亥 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七年

正月慈禧皇太后归政，仍训政数年。

先生年二十八岁，应科试仍列第一，是冬补县学廩膳生。

光绪十四年戊子 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八年

先生年二十九岁，乡试报罢，学政瞿学士考试浙江优行生员，选取六人，先生列第二，馀五人为黄岩王玫伯舟瑶、鄞县袁姚臣尧年、诸暨蔡耀客启盛、黄岩管德舆世骏、瑞安孙伯陶诒钧。旋因管君于是科中式，因易以备取第一名上虞王葆堂恩元。

是年典得金洞桥施氏屋一进，即从宿舟河下迁入。先是馆驿后屋经于燹，前典与吴氏见卷一自传第四页，燹后某年，子望二伯父以需用故，复押与候补【知】府李采田太守审言。余家回杭后，未几时，李太守因押限已满，本银无着，令首县将屋发封召卖。吴氏此时也以本利无着，起而争执，先生不得已，出而理处，左枝右梧，备极困难。如是者约两年之久，至是乃觅得受主，将所得屋价归还吴氏、李氏两款，所余已无多，除酌留若干为次年北行川资外，即以馀款典得施氏屋，奉母居住。

光绪十五年己丑 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九年

先生年三十岁，是春入京应优贡朝考列第三等，旋考取八旗官学教习。秋复回杭应浙江己丑恩科乡试，中式第六名。同考官为广东周□□^①大令学基，主试为顺德李若农少詹事文田、衡山陈伯商编修鼎。首题：“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②次题：“日月星辰繫焉。”^③先生以吸力解繫字，罗列最新天文家言，原原本本如数家珍。三题“由孔子而来”^④一节，诗题：“赋得与君约略说杭州，得州字五言八韵。”李詹事得先生卷，深为赏异，谓于新旧学均有根底，非一

① 原文如此。

② 见《论语·子张》。

③ 见《礼记·中庸》。

④ 见《孟子·尽心》。

时流辈所及，欲拔以冠多士，寻格于众议，谓第三艺作骚体，不合科场程式，乃改立第六。是科伯唐兄大燮，伟斋从弟鹏年同榜中式。

治年按：余家自本生六世祖鱼亭公讳宪于乾隆甲子、乙丑科联捷成进士，高祖春园公讳璐于乾隆丙午科乡试中式，曾伯祖觉所公讳阜，为伯唐族兄之曾祖于乾隆壬子科乡试中式，曾祖十村公讳减于乾隆甲寅恩科乡试中式，大伯祖小米公讳远孙于嘉庆丙子科乡试中式，先君养云公讳曾本于咸丰辛亥恩科乡试中式，嗣后亘三十九年，无继起者。至是乃有三人同时登科，人咸以为佳话。

光绪十六年庚寅 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年

先生年三十一岁，会试报罢，应两湖总督张孝达尚书之洞之招，课其孙刚孙、道孙兄弟，旋在自强书院任编辑事，又充任两湖书院史学斋分教，一时名流之在张尚书幕中及官于武昌者，先生皆与纳交。时则有若武进屠敬山寄，所著书有蒙兀儿史记、黑龙江会典舆图、中学中国地理教科书、结一宦骈文。又有黑龙江道里驿程记、洛阳伽蓝记考证、结一宦诗文集尚未刊行。无锡华若溪世芳，著有恒河沙馆算草谢钟英钟英，著有三国疆域志补注，□□□^①遗集，徐仲虎建寅，著有欧游杂录，兵法新书，译有德国议院章程，丹徒姚石泉锡光，著有东方兵事记略、各国兵制考，江阴缪筱珊荃孙，著有艺风堂藏金石目^②，又印有云自在龕丛书，归安钱念劬恂，著有韵目表，史目表、唐韵表、光绪通商综核表、中外交涉类要表，帕米尔图说、中俄界约校注、财政四纲、日本政要十二种、二二五五疏、金盖樵话、有清进书表、清骈体文录赋类、同上典纶类，瑞安黄仲韬绍箕，著有中国教育史，石埭杨仁山文会，义宁陈伯严三立，著有散源精舍诗，宜都杨惺吾守敬，著有禹贡本义、汉书地理志补校、三国郡县志补正、隋书地理志考证、水经注图、水经注疏要删、又要删补遗、又要删续补、历代舆地全图、古印林、钟鼎彝器拓本、钟鼎拓本，

① 原文如此。

② 应作“《艺风堂藏考金石文字目》”。

望堂金石初集二集、寰宇贞石图、晦明轩稿、日本访书志、留真谱初编续编、楷法溯源、邻苏老人手书题跋（此书为杨君身后其孙先梅、先桔所辑印），又有水经注疏、三续寰宇访碑录，书学述言在待刊中，新化邹沅帆代钧，著有西征纪程，已刊行，又有乘桴日记、五洲地志，直隶水道记、湖北水道记、测绘记要及诗文集各一卷在待刊中，又译印西文地图，详见第六卷，绵竹杨叔峤锐，有说经堂诗草，系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所辑印，达县吴筱村德浦及其子铁樵樵，厦门蔡毅若锡勇，著有传音快字、连环帐谱，番禺梁星海鼎芬，有节庵先生遗诗，系梁君卒后龙游余绍宋所辑印，归善江孝通逢辰，□□^①辜鸿铭汤生，著有幕府纪闻。诸君皆先生之至好也。

治年按：右条所列杨惺吾君所著书籍二十三种，又历代舆地全图二十四册，皆据观海堂书目列入，著述之富，盖甲于同时诸流辈。然据杨君自著年谱所载，则尚有论语事实录、补汉书古今人表、汉书二十四家遗注、古地志、补古文存、古诗存、丛书举要、集帖目录、邻苏园帖九种。

是年三弟洛年入仁和县学。

光绪十七年辛卯 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一年

先生年三十二岁在湖北

光绪十八年壬辰 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二年

先生年三十三岁，入京应会试中式第二十七名。总裁为常熟翁叔平尚书同龢、寿阳祁子禾尚书世长、宗室慎斋学士霍穆欢、贵筑李蕊园学士瑞棻。首题为：“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次题为：“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三题为：“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诗题为：“赋得柳拂旌旗露未乾，得旗

^① 原文如此。辜鸿铭，福建厦门人。

字五言八韵。”榜后因足疾骤发，行走不便，故未应殿试，仍回湖北。

诒年按：是科同榜中式者有李亦园希圣、叶焕彬德辉、汤螫仙寿潜、屠敬山寄、吴炯斋士鉴、张菊生元济、赵芷孙启霖、熊秉三希龄、叶柏皋尔恺、张筱浦鹤龄、蒋性甫式惺诸君，后来皆有名于时上列诸人之姓氏以榜上所载为次。

光绪十九年癸巳 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三年

先生年三十四岁，仍在湖北。

光绪二十年甲午 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四年

四月，朝鲜东学党起事，派叶志超、聂士成率大军前往剿办，屯于牙山。同时日本也派兵往仁川入汉城。六月，日本截我军于丰岛，将我运兵船高升号击沉。七月降旨宣战。是月，我驻牙山之军为日本所败，退驻平壤，旋又为所败，退回鸭绿江。八月，日本败我军于大东沟，军舰被击沉者二艘，焚没者二艘。九月，日本又败我军于鸭绿江，进陷九连城、安东县，复由貔子窝登岸，迳逼旅顺。十月，陷凤凰城、金州、大连湾、岫岩州，攻陷旅顺口。十一月，陷海城县、析木城、复州。是月派张荫桓、邵友濂往日本议和，为日本所拒。十二月，陷盖平县，别一军突入山东荣成县，进逼威海卫。

先生年三十五岁，入京补应殿试，列三甲第六十一^①名，旋即出京回湖北，自六月后，中日衅起，我军失律，先生与京外诸同志书札往还，探访军情，冀得实在消息。顾军前奏报，既讳败为胜，恣为欺罔，而上海报纸，复又迎合时趣，附会神怪，妄诞不经，无一可信，既足淆惑听闻，复且腾笑海外。先生私忧窃

^① “六十一”原空，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补。

叹，以为关系至巨，后来有志于新闻事业，此亦其一原因也。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 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五年

正月，日本陷威海卫，夺据刘公岛，我北洋海军余舰尽降于日本。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往日本议和。二月，日本陷营口，进陷田庄台。又派兵舰陷台湾之澎湖岛。三月，李鸿章与日本伊藤博文在马关议定和约十一款，又附约三款。四月，派李经芳往台湾与日本商办割让台湾事。五月，台湾民人自立为民主国，公推唐景崧、刘永福为正、副总统。唐景崧、刘永福旋先后弃台内渡，台湾遂为日本所有。九月，日本因俄、法、德之干涉，允以奉天省南边地方交还中国，由中国以银三千万两为酬，订立条约七款。十月，准杨崇伊奏，封禁康有为设立之强学书局，其上海之强学会亦同时停办。

先生年三十六岁，仍在湖北。吾国自甲午一战败于日本后，洞明时事之流，已全知非变法不足以图存，非将教育政治一切经国家治人民之大经大法，改弦易辙，不足以言变法。顾尚未有起而昌言者，先生乃有创设中国公会之议，期于联合同志，共同研究，草拟章程。先在湖北与诸同人商议，又特至上海与诸名流集议，兹特将公会章程，照录如次：

公会者，所以保吾华之圣教，使不至日渐渐灭也；所以保吾华之种族，使不至日渐沦胥也。盖抚念时事，追咎既往，自上下之分判，而形势始睽隔，自党会之禁严，而人心愈散涣。兹立此会，务欲使天下人之心，联为一心，天下人之气，联为一气，将拯衰弱，俾臻富强。呜呼！厉怜溺笑化碧之事已虚，而石烂海枯衔石之心不改，凡我同人，幸鉴斯意，勿相疑阻，则甚盼焉。

一、中国历代虽严禁朋党，然一是小人之阿党，一是匪类之

党会。盖中国向以各行其是，各顾身家为主，是以小人有党而君子反无党，匪类有会而正业反无会。汉之党锢，宋之党人，虽均是君子，然初意本不相符，惟金壬欲为一网打尽之计，始并为一谈耳。惟明末之复社、几社，往往以布衣而议国是，稍与泰西之法相近，然彼尚以文字为名，犹未敢以兼利天下谋裨国是之心，明为标目。今当否剥已极之时，倘仍蹈故习，不特虚抱此救焚拯溺之心，且何以使衰弱之中国渐渐振起。兹故不避嫌疑，特立斯会，以齐天下之心，以作天下之气。

一、论语一书，于持躬涉世齐家治国之道，最为切实。曰敏事慎言，曰言忠信行笃敬，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言理财，则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于治军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称弟子曰果，曰达，曰艺；称弟子之才曰治赋，曰足民，曰与宾客言。盖圣门无无用之学，故无不可用世之人。自汉宋以后，浸失其本，始以阴阳五行之端乱之，继以佛老之说乱之，渐成迂怪虚谬之谈。今本会务须讲明孔圣之教本旨，一以实事求是为主，庶处可为有用之学，出亦为有用之才。

一、中国之贫弱，由于政法之不明，政法之不明，由于学术之不讲。本会应专讲求中国之所以贫弱，西国之所以富强，深思熟究，俾共明晓。

一、学问当分为三段：一政法，一艺学，一中国各省之利弊，而皆以端心术、守圣教为主。凡人会之人，须自认讲何种学问，如有新得之学，新得之理，或新考出之利弊，即函知总会，以便登报。

一、创办之始，措手綦难，兹拟先以讲求实用为主，立总会

于上海，次及于燕、苏、川、粤、浙、鄂，又次及于各省。立会之后，即登报通知，务由本会之人，互相援引，以期愈推愈广。

一、凡人会者，须自将姓名年籍及何处，寄函书于纸，以交于总会。总会当以章程一分送之，其由他人转邀亦可，托其人转交总会以后，凡遇有会中之事，皆当一律知照，是为入会之制。

一、凡会中人，既有劝人之事，尤须平时互相规勉，互相考察，凡自得之新理，新考之利弊，并同人之志学奋怠若何，皆宜函告于总会，是为会中之事。

一、中国近十余年来，非无有志绩学之士，然苦于彼此不相闻问，不特无由观摩，无由增长，则己之学问，亦无人能知。且平素无相交之雅，一旦相遇，则妒忌伎害之心随在而发。本会务使海内有志之士，声气相通，庶无隔碍之弊，是为入会之利益。

凡小人之阿党，以相互援引为利益，匪入党会，以小小资给为利益。今本会但讲求学问，而于资生之事，则全不相涉。凡事业去就，名宦隐显及讼狱等事，均不敢与闻。然入会以后，则学识可益滋长，渐成有用之才，名誉亦日流播，其为益大矣。

一、中国现在风气未开，如讲求之人，但知独善而不知兼善，于事何补。本会各友，务须遇有中人以上之质，即当力劝其舍无用，以就有用，转辗相引，庶几越聚越多，风气既开，人才自出，实为自强之基。

一、凡人会者，可随时将己之志趣、识学，函告总会，遇有疑难，亦可函询总会。总会应将所知者函答，不知者也当转询通人，随时函答。

一、中国习气，文武与士商均相隔绝，致成睽隔。本会力反斯弊，凡武侠商贾无不可入斯会。

一、会中人稍多，当即设立会报，附刊于译报之后，如款项稍充，则会报宜别行，专报会中事务。

一、本会中以平等为念，无论学之深浅，名位之崇卑，其相见皆行平等之礼。且总会中但有总理、分理名目，断无自处于贤智之事。

一、会中人皆以开风气为志，贵者效其权，富者效其财，贤者效其心力，凡自总理以下，皆情愿乐为，不取薪资。惟将来会务兴盛，须请专人办理，不能复兼他事，则始量给薪水。至办理会中之琐务此亦须俟会务殷盛后，方设此席，及会中专派往各处查勘游历之人，均须给予薪水。

一、会中应办之事甚多，俟稍集有款项，即当次第举行。首派游历之人。一、成才之人，派往西国，或在中国各处考求矿务；一、心思精细能耐劳苦之人，派往内地考察利弊。又次设借书处，又次设教会仿西人教堂之法，以兴儒教，又次开学堂此近日最要紧之事。以上各条，别有章程，不得付之空言。

一、入会之后，当以直抒己意为主，凡已有所见，或规人所失，均宜直言，不得复存阿徇嫌忌避就之心。

一、会中人宜融同异之见，庶不自生彼此。盖在会者，虽同以振兴中国为主，而意见或有不同，性质亦复互异。须知天下之理，千条万绪，何必固执己见总以不出圣教规范为主，此须求相融相容之法，不可因此致成隔碍。

一、此会既设，凡天下之人，皆应共谅斯志。其有未达苦衷，致生疑阻，本会中人，但当谦和容忍，徐言而缓导之，毋傲睨，毋操切，致启局外人之论议。

一、凡会中之人，于权力所得为之事，无不勉力为之，总须

海内同人共谅斯志，各量力捐助，以资办理。其款无论由总会劝捐，或由分会敦劝，均宜迳汇交总会掣取收条。每年终当将收款、用款、存款核实登报，其存款必存中西有名字号，并登报详之，以昭信实。此不特较之造庙宇助僧道有天壤之殊，即比之各种善举及修造桥梁等，亦迥不同。

一、本会创始，凡愿入会者，无不一概延纳，有规勉而无责成，有考校而无去留，故品业不复过问，即小节出入，亦必容忍。惟有与圣教宗旨大背者，方登报斥出。

一、本会筹款，何处最多，即何处设学堂，选有学问及谙教法人为经理，其银钱及训蒙师就地选择。

一、收到各款及用款，均交上海素为海内信服之办赈诸君经理，庶更妥善。

以上二十三条，会中条目大略具此。如有未备，请同志诸君随时增改。盖本会痛吾国之衰弱，欲思挽回，以求复振。敢告同人，无中怠，无内馁，无嚣张，无颓丧，无相嫉妒，无相隐蔽，庶几合亿万人之沉思苦虑，统千百年之坚心毅力，延坠绪于将绝，起痼疾于已衰，则本会幸甚，天下幸甚。

治年按：当时章程虽经拟就，然公会仍未成立，顾此举实为后来设立时务报之前驱，故特将全文照录如右。

治年又按：就今日观之，此章程颇有可议之处，然大轱椎轮，其势实不得不然。凡事最难于创始，非身处于其中者不能知也。

治年又按：彼时钱塘夏穗卿曾佑、新化邹沅帆代钧二君，均有书致先生详论此事，兹亦为移录如次：

夏穗卿君来书：公会之事，闻以为可行者多，以为不必可行

者亦多。鄙意天下事，只有可言不可言，无所谓可行不可行。其可言者，我行其迹，而不必告以所以然之故。其不可言者，我不言而行之，以徐收其效，诸君之疑可以释矣。

邹沅帆君来书：学会（即公会）有极难处，所讲之学，门径甚多，我辈数人，自问所有，似不足以答天下之问难。且泰西学会，无非专门，如舆地会等类是也。今欲合诸西学为会，而先树一学会之的，甚不容易。若能先译西报，以立根基，渐广置书籍，劝人分门用功，互相切磋，以报馆为名，译报亦当分数类，而先以时政为主，其他专门之学，译之亦不易也。缘中国习西文者，大抵讲求公事而已，专门未尝及也。且专门一人仅能译一门，万无兼译之理，非资本充拓多招译者不可，而寓学会于其中较妥。沪上英才甚多，祈博采而熟商之。

诒年按：当时公会未能仓猝成立，乃议先设报馆，以为声应气求，集合同人之枢纽。邹君之言，约可为彼时主此议者之代表矣。

是年先生又以故乡尚无讲求实学之校舍，会闻某僧寺以事没入官，乃冒暑回杭，亲谒各绅，议改某寺为学堂，命名崇实，草拟章程，事为某某二绅所尼，不果行。然先生不为所阻，仍时时游说于官绅间。其后巡抚廖毅似中丞寿丰、杭府林迪臣太守启黉其议，二十三年丁酉，遂有求是书院之设，延聘英文、算术诸名流为教习，杭州有讲习实学之所，盖自此时始。当局之意，欲以管理之事相属，先生力辞不就，荐某君以自代，其功成不居如此。是院设立未久，二十七年更名求是大学堂，后又改为浙江高等学堂，数年之间，人材之出于此中者，颇不少。及民国成立，部令废除省立高等学校，此校遂裁去，校舍亦改为官署，人咸惜之。

附录廖中丞奏折（上略）^①：臣迭与司道筹议，并饬杭州府知府会商绅董，就普慈寺后现有群屋，量加修治，专设一院，名曰求是书院。即委该府知府林启为总办，延一西人为正教习，教授各种西学；华教习二人副之，一授西文，一授算学。委监院一人，管理院中一切事宜，一面购置仪器图籍。由地方绅士保送年二十以内之举贡生，监饬据该总办考取复试，接见询问，择其行谊笃实，文理优长，并平日究心时务，而无嗜好习气者，于本年四月二十日送院肄业，但予奖赏，不给膏火，学以五年为限。并明定规约，妥立课程，每日肄业之暇，令泛览经史、国朝掌故及中外报纸，务期明体达用，以孔、孟、程、朱为宗旨，将有得之处，撰为日记，按旬汇送查考。每月教习，以朔日课西学，总办以望日课西学疑应作中学，年终由臣通校各艺，分别等第，勤者奖，惰者罚，不率教者斥，优异者存记。另选翻译之人，译述各种有用之书，为振兴学校之助。（中略）。臣当随时督察，冀收实效。将来该书院学生学业成就，如有才能超异者，由臣咨送总理衙门考试，以备器使。（下略）。

附录廖中丞来书：杭州建设学堂一事，屢于佩葱谓吴品珩、晁济谓陆懋勛书中得闻竝论，诸荷助于，感佩感佩。延师筹款，现幸差有端倪，浙为才藪，时局需贤，百年树人，固为先务。若译印西学各图籍，可使有志之士，省却言语文字一层工夫，获益较宏。观成差速，此邦人士持此议者颇多，拟于其中附设繙书处一所，俟译述有成，次第刊布，卓见当以为然也。

又书：尊论小学堂各节，具审一一。东瀛学制，原本西洋，

^① 原文中括号内之“上略”、“中略”、“下略”等字样，均为原文，以下不另注出。

伦理、汉文独仍旧贯，历史舆地，本国为先，得要从宜，可谓善变。综其大指，不外由浅而深，由近而远二语，与古人循序前进之旨吻合。今拟广设小学，为振起人才始基，首当遵奉。此次明发以四书五经为范围。日本地属同州，其课程课书大可以备参考，所示代译一层，自较核实，容即飭筹议，乞将译书章程，先寄一观。

求是书院设立之次年，浙省当道又拟振兴蚕业，乃就西湖花港观鱼设立蚕学馆，凡购书器、延教习、派生至日本习蚕学之事，先生均力助其成。其后先生又商诸浙省当道，筹拨的款，就大方伯设藏书馆，举杨君见心主其事。

附录林太守来书：蚕学之设，由于康发达一书。农学会诸君，既为觅书，又为代觅江姓，此间始有创局之议。既信康氏之书，即不能不用江姓，且康书极称江姓，尚只如此，其他可知。故续有东洋派人之议。若以江姓而言，分方验种，尚为合用，此局以验种为最要，故明年决归江姓主之。究竟办事之难，用人之难，弟知之二十年矣。不可知其难而不慎，又不能因其难而不办。蚕屋之建，虽江姓有言，实因官屋甚少。书院则主者为难，禅寺则和尚难驱，故起造比修造虽多数千，不能不用，其中经弟与幕友商量核实，节省已近数千。（下略）

又书：派生往东洋学蚕，前孙实翁淦云，三人一起，只费千元。弟仍托其到时再查。兹尊函云，每名须五百，弟本拟只派两人，半则经费为难，半则外间之论蚕学，均云法胜于日本。今农会第十四册东洋论蚕，亦自言不如意、法、支那，此虽精益求精之意，要其不如法国则西人公言之，故只拟添派一人，与嵇生同学。弟同乡亲友及浙垣门生，求去者多，均不敢假借，暗中觅得

德清沈秀才锡爵，养蚕甚熟，人似明静，但相知未久，正在斟酌间，得尊函举有一人。汤蛰翁^一谓汤寿潜，字蛰仙，亦拟为代觅一人，蛰翁贤名，弟早闻诸何太守与足下，皆深顾大局者，实为信佩。但鄙意只添派一人，烦足下与蛰翁商酌，谁为可派之人，即行派往东洋。治游之地，须择聪明而笃静者方好。已否学蚕，尚为不拘。二君均为蚕学觅人，非为人觅入蚕学也。添派一人，择定后，尽可前发，不必函商迟滞。

附录高啸桐先生来书：吾乡迪臣太守在此极以蚕学为念，此间议论以为外国新法不如中国老法，华丝柔而能韧，决非洋丝所及。浙中守旧之病，已成痼疾；编户饲蚕，种种忌讳，即创学堂，万万难以转移。太守以考究蚕瘟、蚕子，东西洋显有成效，此事不可以已。续得二十三册，贵报有日员来华讲求育蚕制丝云云，众口以此益哗，未知日本系广咨博采以济其新法否，或报内节译其辞辞不尽意否，此中有无别义，究竟中日蚕业优劣如何，乞详察详举以告闻。张季迪修撰创有蚕务学堂，已由农学会抄取章程到沪。穰公兼综会事，可否转抄一份以来，想先生素以中国为己任，必不怒其琐琐也。太守遇事必求精实，于新法尤不肯孟浪，此亦不为未见。各省之号为洋务，皆以兴会一时，一遇洋人或出洋学生之佞于口者，不问其人之好歹，学之虚实，一为所动，即属以大事，其究则败坏无成，反为新法之累。今之浙中学堂，又其一事耳。

是年先生以将在上海设立报馆，诒年与三弟洛年方就馆于上海、武昌。为朝夕定省计，仍以金洞桥屋转让与他人，即取回典价，在上海静安寺路味蕤园前面购地一区，筑屋三间，奉关宜人居住。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 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

二月，御史杨崇伊奏劾文廷式不孚众望，请予罢斥。奉旨：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并驱逐回籍。

诒年按：当时政局实分帝后两党。文芸阁学士廷式，为帝党之领袖，致被杨御史崇伊诬劾，立受严谴，实为二十四年四月放逐翁尚书同龢及是年八月政变先兆，非寻常处分可比。

诒年又按：二十年中东战役，李相国鸿章实不得辞其咎。彼时主持清议者，多集矢于李相，而李相亦遂嫉视诸人，日嗾其党寻衅报复，此亦为文学士被逐之原因。

九月，与俄人订立新约十二款，以为索还辽东之报酬。约内许俄人将西伯利亚铁道分两路接造至吉林、黑龙江两省城，又许俄人在吉、黑两省长白山等处开采五金矿。又许俄人有军务时得租胶州湾及屯驻旅顺口、大连湾等处。

先生年三十七岁。七月设时务报于上海，先生既已决计设立报馆，则以为非广译东西文各报，无以通彼己之邮；非指陈利病，辨别同异，无以酌新旧之中。又见时机急迫，非急起直追不可。时方为两湖书院分教，乃亟向张尚书告辞，欲自至商埠集资设报社。尚书力尼其行，先生坚不从，比至上海，与嘉应黄公度观察，遵宪相遇，谈及创办报社事，意见相同。时达县吴筱村大令德肃，自京谒选南下，将至浙赴任，道经上海，吴大令固先生至交也。高安邹殿书部郎凌翰，亦自江西至上海。诸人商榷多次，而时务报馆遂成立。时新会梁卓如君启超方在京师，先生乃招之至馆，以撰述属之，而以筹款事自任，己亦时有所撰述，率以变法图存为宗旨。盖至是而吾国始有论政之杂志，通国士流，

①指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

渐知改革政体之不可缓，争言变法矣。

附录梁卓如君自北京来第一书：兄在沪能创办报馆甚善，此吾兄数年之志，而中国一线之路，特天之所废，恐未必能有成也。若能成之，弟当惟命所遵。（下略）。二月二十日。

又第二书：此事甚善，中国命脉所系也。弟初十间当到沪商略一切，望君必待我。

又第三书：前承书告以译报事将成，命即来沪，当即覆书，期以月之十日相见，谅早收矣。顷因此间颇有新政一、二同志，又有所整顿，苦被相留，是以迟迟。顷拟在都设一新闻馆，略有端绪，度其情形可有成也。弟思沪中有君主持，且同志不鲜，今拟独留此间，少俟此事之成否，若能开办，与沪局声气联贯，尤有补益也。此间亦欲开学会，颇有应者，然其数甚微，度欲开会，非由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已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君以为如何？（下略）。

时务报初开时，先生为总理，梁卓如君为主笔应称总撰述员，此沿俗称。其后梁君因事繁不能按期撰文，乃延顺德麦孺博君孟华为辅佐。其后则三水徐君勉君勤继之，归善欧云樵君集甲又继之。先时亦尝延余杭章太炎君炳麟，后以与梁君意见不合，遂自行告退。英文报译员先为桐乡张少堂君坤德，后张君改就担文律师之聘，不能兼顾，乃改延吴县李一琴君维格专任英文报译事，未几李君应湖南时务学堂之聘，与梁君同时去馆，先生意甚惜之。曾与人书云，湘中绅士连电延请卓如、一琴为时务学堂中西教习，卓如初已力辞，而湘人坚延不已，康长素适自鄂来，又力劝之，而允兼撰报中文字。至一琴精于英文，尤为报馆所倚赖，而湘中指名延请，旬日之间函电十数次，业于日前订定。此二事本

非康年所愿，惟窃意中国各省，惟湘省地处腹里，士气振奋，苟及早修饬，或可自固，私心冀望，实在于兹，因辄曲意从之云云。先生委曲迁就之意，盖可见矣。李君既辞职，乃延湘乡曾敬贻君广铨继其任云。此外则尝延宛平郭秋坪君家骥任法文报译事，大兴刘荔生君崇惠、上海李兰舟君家鳌任俄文报译事，三君皆为馆外译员，不能常有译稿，最后乃延上海潘士裘君彦专译法文报焉。东文报译事，则自始即延日本古城坦堂君贞吉专任。盖馆中诸人，始终其事者，特古城君一人而已。

诒年按：此上所记，皆非本年一年内之事，盖终言之。

时务报创始于是年七月初一日，月出三册，年出三十三册，终止于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先后两年间，先生所著论凡十有三篇，对于朝野上下，苦口危言，日以救亡图存之策相劝告。故其思致多噍以杀其辞，语多不加藻饰，实皆极有关系之文字，亦即先生发表政见之文字也。使当时政府及社会能稍稍采用其言，则吾国大势或未至如今日之不可救药未可知也。兹特将其篇目，附列于下，亦睹指知归之意云尔。

中国自强策上、中国自强策中、中国自强策下、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论今日中国当以知惧知耻为本、为人为己不分为二事说、以爱力转国运说、论中国求富强宜筹易行之法、商战论、论华民宜速筹自相保护之法、论胶州被占事、论将来必至之势、论宜令全国讲求武事。

诒年按：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一篇，刊于时务报第九册，为先生特别发表意见之作，报之言民权，益自此册始。先生之提倡民权，亦自此时始矣。兹将全文照录如左：

中国之言治者曰，以君治民而已，至泰西而有民主之国，又

有君民共主之国，中国之儒者，莫不骇且怪之。虽然何足怪哉，古之言治者，莫不下及于民，是以《尚书·洪范》曰：谋及庶人。《吕刑》曰：皇帝请问下民。《周礼·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朝士》：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吏【士】在其后；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州长众庶在其后。孟子曰：国人皆曰贤，然后用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去之；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其他见于经典者不可俚指数，是古之为国，未尝不欲与民共治也。顾或患权之下移，不知君民共主之国，凡国有大事，下诸议院，议院议之，断之君而行之。官、君有不同，可使复议，议不能定，可更置议员，是大权仍操之君。或曰用民权则桀黠得志，豪强横行，乱且未已。不知民但能举俊秀以入议院，而不能肆行己志；议员但能议其事，而不能必其行，何肆横之有？或曰权在上则聚，在下则散，散不可以为国。不知议员人虽多，必精其选，议虽杂必择其多。选精则少谬误之论，择多则愿行者众。是三者皆非足置虑者也。且夫居今日而参用民权，有三大善焉。盖从前泰西君权过重，故民权伸而君权稍替，中国君权渐失，必民权复而君权始能行。何则？中国虽法制禁令号出于君，顾前代为君者，深恐后世子孙不知事体，或有恣肆暴横之事，故再三申之凡事必以先代为法，毋得专擅改易，故举措一断之例，大臣皆奉行文书。百官有司，咸依故事为断，而熟谙则例之吏，乃得阴持其短长。故国之大柄，上不在君，中不在官，下不在民，而独操之吏。吏志在得财传子孙，初无大志，故觊利营私，丛弊如毛，良法美意，泯焉渐灭。且不特此也，君独立于百官兆民之上，则聪察不能下逮，而力亦有所不及，是以会计隐没上勿知也，刑狱过差上勿察也，工作窳敝上勿

闻也。屡戒徇私，而下之用情如故，屡饬洁己而下之贪贿如故，屡饬守法而下之作弊如故。诏书严切，官吏貌若悚惶，而卒之无纤毫之悛改，犹得谓之君有权乎？惟参用民权，则千耳万目，无可蒙蔽，千夫所指，无可趋避，令行禁止，惟上之从。虽曰参用民权，而君权之行莫此若矣。且夫民无权，则不知国为民所共有，而与上相睽。民有权则民知以国为事，而与上相亲。盖人所以相亲者，事相谋，情相接，志相通也。若夫，君隆然若天，人民茆然如草芥，民以为天下四海皆君之物，我辈但为君之奴仆而已，平日政事举措，漠不相闻，一旦变故起，相率委而去之，但知咎君不能保护己，而不知纤毫尽心力于君。惟与民共治之国，民之与君声气相接，亲爱之心油然而生。故西国之民，见君则免冠为礼，每饮酒必为君祝福。国有大事，则群起而谋其故。盖必使民共乐，民然后乐其乐，与民共忧，民然后忧其忧，必然之理也。

若夫处今日之国势，则民权之行，尤有宜亟者。盖以君权与外人相敌，力单则为所挟，以民权与外人相持，力厚易于措辞。西人与我国互市，动辄挟我国君之权力，以制我之民。中国欲拒之，则我之权不足，欲以民为辞，则中国久无民权之说，无可措语。是以增订条约，不谋之民而辄许之；索租界索赔款，亦不谋之民而辄与之；其他一切有损于国有损于民之事，皆惟西人所欲应之，如乡有司，奉令承教为之，惟恐不速。于是民仇视西人之馀，转而仇视有司。夫天下之权势出于一则弱，出于亿兆人则强，此理之断断然者。且夫群各行省之人，而使谋事，则气聚，否则散。使士商氓庶皆得虑国之危难，则民智，否则愚。然则反散为聚，反愚为智，非用民权不可，夫岂有妨害哉。吾见古制复，则主权尊，国势固也。（见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时

务报》)。

右文发表后，阅者咸相顾眙愕、谓不意谨厚如汪某，乃能作此大胆文字也。梁星海君与先生为至好，视先生如弟，也作书责先生，顾不欲拂先生之意，乃特以诙谐出之。钱塘江夏穗卿君曾佑不以言民权为非，是而以为此时提倡民权尚属太早。其后曾致书先生有云：民权之说，众以为民权立而后民智开，我则以为民智开而后民权立耳。中国而言，民权大约三百年内所绝不必提及之事云云。然先生亦未尝不见及此，特意在救时以为欲振兴国是，实非提倡民权不可，所谓言岂一端，夫各有当者矣。

当《时务报》初出时，先生主持其事，极为艰困。盖彼时吾国新败于日本，吾国之贫弱，已无可讳言。顾以习于自尊之故，一言及各国之若何富，若何强，口虽不能争，心实不谓然。若进而言各国何以能富，何以能强，则尤为人所不愿闻。若再进而言吾国宜痛革旧习，师法邻邦，以期驯致于富强，则更掩耳疾避，惟恐不及矣。故报纸初出，谤言日至，诃斥百端，殆难忍受。同人书札往还，咸以戒慎恐惧相勸，抑亦鉴于警世骇俗之论，不可以持久，惧其将一蹶而不可复振也。诸人之意，殷拳可感，而先生处境之危险，亦可见其百一矣。兹将当时诸名流来书摘录数则于后，以志梗概（诸人来书以姓之笔画为次）：

达县吴铁樵先生书：南皮谓张孝达尚书，后同阅第五册报有讥南京自强军语，及称满州为彼族，颇不怿。此层却是卓如大意处，樵知必力阻之。吾辈议论，当思非其时非其人不可发也。此时此人，当受之以渐，声闻不可以菩萨行告之，况佛法耶。以后此种吹求，恐天下发之者尚多，我辈羽翼未丰，断不宜犯此大阵。倘樵在申，必力阻之。卓论诚快刀砍阵，而此间讥之者亦不少。

治年按：梁君所著变法通议三之一总论篇，有“金陵自强军所聘西人，半属彼中兵役，而攘我员弁之厚薪”等语，以是颇忤张尚书之意。

钱塘汪伯唐先生书：此事（按此指报言）譬如慈母之保赤子，当令其亲爱，不可使有疑畏；当生吸力，不可生阻力。否则成之甚难，败之甚易。稍稍站不住，则后之人，更无所措手矣。二十二年六月初九日。

又书：奉劝诸公不必作无谓之讥评，于一切犯忌之事，尤望检点，勿以牛毛细故，致令依违不定之新政，自我而扫除净尽也。二十二年八月初四日。

又书：前屡函请诸君格外留心慎言，实以当时条奏，大率议准，颇有欲动之机。诚恐言之不慎，一滋物议，则各事停摆，无成事之功，转得败事之咎。故特为诸君尽力言之。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

长乐高梦旦先生书：贵报民权一篇，及翻译美总统出身、欧洲党人提倡民主各事，用意甚为深远。惟风气初开，民智未出，且中国以愚黔首为常，一旦骤闻此事，或生忌惮之心，而守旧之徒，更得所藉口，以惑上听。大之将强遏民权，束缚驰骤，而不敢稍纵；小之亦足为报馆之累。鄙意此等事可以暂缓论议，出之以渐，庶不至倾骇天下之耳目也。

又书：中国之患在于事权无属，故百事废弛，非伸民权即君权亦无所寄。惟此等议论，措辞不可过激。即如足下所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麦君所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等篇，出之以委婉，便足动听。辟韩一篇，鄙意大不以为然。所论君臣一节，尤不宜说破。变法之事，久为人所不喜，内有顾瑗、杨崇伊，外有

李秉衡、谭钟麟^①，皆以排斥异学为己任。君臣可废之语，既为人上所不乐闻，则守旧之徒，将持此以谮于上。不独报馆大受其害，即一切自新之机，且由此而窒。贵报风行至广，关系至大，举措不可不慎也。

又书：《辟韩篇》夙谦非以其言之不轨于正也，所以云云者，以中国民智未开，既不足与陈高深之义，君权太重，更不能容无忌讳之言。无益于事，徒为报馆之累，且并变法之可言者，亦将不得言矣。

治年按：《辟韩篇》系侯官严几道先生所撰。

番禺梁星海先生书：弟处华夷纷杂之区，耳目已淆，品类尤夥。望坚守初心，常存君国之念，勿惑于邪说，勿误于迷途。此时神气清明，幸时时以此自警，岂独吾党之幸哉！

长沙张伯纯先生书：报中论政一节，更求斟酌。中国向不讲道理，诸公袞袞，吠声吠影，是其长技，危行言孙，尚望三思，否则恐蹈强学会之覆辙也。

仁和叶浩吾先生书：此间因第四期报，《中国自强策》三篇，颇有警论。弟之劝兄多译实事，少抒伟论，亦略有先见，然此中亦大有分别。大约南皮是鉴于强学前车，恐若斯美举，再遭中折，而旁观附和增甚之言，与无识浮议之腾，遂成市虎。在吾兄救时心切，历数病情，其意甚仁。然近日时彦之见，尚只见及有病当延名医选良药，而未切见其病系何巨症险候也。乃公竟向其家人妇子，明言其若何决死，若何难痊，则群詈为不祥矣。故弟欲兄之多译报章，是犹医家方论不妨直告，而家人则尚不欲明言也。南皮劝阻之意，其情极厚，似亦不可过却。在弟为此议，

^①李秉衡时任山东巡抚，谭钟麟时任两广总督，皆反对变法维新。

一望兄少为委蛇，无令大局中裂。又望兄多采方论，则病家或一旦发“死马当活马医”之想，事转有济，亦不可知。总之，与其决裂于旦夕，不如求全于未然之为得计，而吾党存心则仍百折不挠，共济大局。他人不足惧，而过拂他人，则又有可虑。行事固欲坚，又欲能忍，坚而不忍，则折断无存矣。

无锡裘葆良先生书：颇闻长安士大夫不以《时务报》为然，蚍蜉之撼，正自无恐。但昨阅第四十册，麦君论及梁君放流云云，非常之言，似难与俗人道也。倘复有虞山之徒，蹈间抵隙，文致锻炼，将如之何？方今庙堂之上，支支节节仿行西法，有识之士，预决其不效。惟报馆大声疾呼，能收无形之益。万一再蹈京师强学之辙，则黄种一线之生机绝矣。鄙人私甚忧之。

治年按：所谓第四十册麦君论，盖指麦孺博君所著论中国会匪宜设法安置篇也。梁君放流云云，则指梁卓如君所著知耻学会叙内，有使易其地居殷周之世，则放巢流彘之事，兴不旋踵等语也。

新化邹沅帆先生书：此事愿公兢兢业业为之，不愿公轰轰烈烈为之，轰轰烈烈必有阻之者，甚或招祸，某某是也。身且不保，又何有于开风气？兢兢业业，由小而大，由约而博，必可收暗然日彰之效。怀精卫之心则可，奋螳螂之臂则不可也。公近来进学甚猛，十二、十三两册之论甚佳，可不虞炸弹矣。此后议论，一切忌讳须加审慎，非不欲尽言也，虑炸弹之伤我报馆也。

治年按：所谓十二、十三两册之论，盖谓先生所作以《爱力转国运说》及《论中国求富强宜筹易行之法》也。

善化瞿子玖^①侍郎书（时为江苏学政）：大馆之设，意在觉世，孤怀闳识，极用佩仰，破一孔之陋习，开横览之远模，将使

^① 瞿鸿机字子玖，官至军机大臣。

鄙儒皆知世务，收效良非浅。近惟有时议论恢张，不能无矫枉过正之弊，如所列知耻学会前序，直斥至尊，心何以安，授人口实，大率在此。尚愿少加谨慎，留意选收，即保令名，亦全盛举。

治年按：梁卓如君所撰知耻学会前序内有：“越惟无耻，故安于城下之辱”。（中略）^①“托虎穴以自庇，求为小朝廷以乞旦夕之命”等。故瞿侍郎指谓直斥至尊也。

附录鄂督张尚书牌示：示谕两湖江汉、经心书院诸生知。上海《时务报》，前经本督部堂飭发院生阅看，以广见闻，但其中议论不尽出于一人手笔，纯驳未能一致，是在阅者择善而从。近日惟屠梅君侍御驳《辟韩》书一篇最好，正大谨严，与本督部堂意见相合，诸生务须细看，奉为准绳。切切特谕。

治年按：是时更有一事足述者，《时务报》第八册梁卓如君所著论变法通议三之二，《论科举》有云：“昔同治初叶，恭亲王等曾请选编检、庶常并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之京外各官，及举人五贡等入同文馆学习西艺，给以廪俸，予以升途。（中略）。“乃彼时倭文端^②方以理学名臣主持清议，一时不及平心详究，遂以用夷变夏之说，抗疏力争，遽尼成议。（中略）。文端之言，其误人家国讵有涯耶！”又第十册梁君所著论变法通议三之十三《论学会》有云：“学会之亡，起于何也。曰国朝汉学家之罪而纪昀为之魁也。（中略）。纪昀之言曰：汉亡于党锢，宋亡于伪学，明亡于东林。呜呼！此何言耶？（中略）。吾不知小人无忌惮之纪昀，果何恶于李膺、范滂诸贤，而甘心为十常侍、蔡京、韩侂胄、

① 原文如此。

② 倭仁字良峰，蒙正红旗人，同治时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卒谥文端。时与曾国藩等讲求宋儒之学，为清末顽固派代表之一。

魏忠贤、阮大铖之奴隶也”。此二文发表后，颇膺众怒。盖倭文端固彼时清流所推崇，纪文达则自乾嘉以后久为汉学之领袖，而纪之后人香馥先生矩维，又适在张尚书幕中也。梁星海君及吴铁樵君曾举以告先生，梁君并咎先生之不加检点云。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 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七年

十月，德国因曹州天主堂之教士二人被杀，派军舰三艘突入胶州湾，夺据炮台。

先生年三十八岁。四月与同人设立务农会，发行农会报。六月，与同志诸人创办戒缠足会，暂设于时务报馆内。十一月，与同人设立蒙学公会，发行蒙会学报。

诒年按：以上三会，事实均详著于卷六事业汇录内。

是冬，德国有藉口教案夺占胶湾之举，先生闻警，知此事关系至巨，近之则为前年代索辽东之果，远之又为将来瓜分中国之因。故秘密探访，不遗余力，详记其始末于笔记中，兹为移录如次，亦吾国交涉史中至可羞忿之一巨案也。

东省教案，系十月初六日鉅野盗杀两教士，十三日德使海靖由汉口电告总署，次日许侍郎^①又由柏灵电询，时东抚犹未报也。十五日乃来一电，谓此案已勒限严拿，悬赏通缉，朝廷责其轻忽，旋派毓贤、锡良二人驰往查办。

二十夜，北洋忽来一电，谓德兵已在胶湾登岸，逼我驻防章高元于四十八点钟内退出，过期即当敌军办理。有人谓，是夜合肥即往俄使署晤商，其故可想见矣。东抚电亦至，并请调兵募勇。朝议允之，次日即止之，但谓不可轻开衅端。

于是警电迭至，人心惶惶，电令许侍郎促外部退兵，催海靖

^① 许景澄时任驻俄德兼奥、荷出使大臣。

返京婉商。又电令北洋俟海过津时，邀与理论。诿海归而不欲与北洋见也。坚辞之时，章已退至沧口，德则驻兵青岛。相距有数十里云。

海至京二日，即来总署。未来之先，许已电复，谓德主已给全权与海，一切当由海为之，在德无可议论。

海旋送一照会来，索办六款：一、东抚革职，永不叙用；二、偿济宁教堂银闻系旧案，并赏匾额；三、惩凶给恤；四、应许嗣后永无此等情事；五、山东如有制造铁路矿务，先准德国承办；六、德国办理此案，由中国偿费。

正在将照会传观，而海使已到，众皆谓我国并无失和之意，已饬疆吏约束兵勇，因责其退兵。海谓此时正是机会；又谓事由外部主持，然许电固云外部无权也。

于是又电许速商外部，并电各驻使告各国无信新报浮言。法乃曰：宜速了结，免生枝节。日本亦曰德久据胶，大局攸关，众皆不利，其他无所言。然俄则兵舰十六艘已赴胶州矣。

海一去不复来，而德兵又逼，章远退，威之不移乃辱之，辱之不动乃困之。询诸海未复也。

许电至，云外务部传德相言，中国朝廷之所允行，外省大吏多不奉命，此次须驻兵防护，以观后效。北洋又电告，章已被德牵至青岛，留之不返。

时德兵已入胶城旋退去，遍张告示，谓海口税务彼当经理。又言将往高密，又向高牧索大车二千辆。东抚电民心惶惧，众兵忿激，恐变生意外。

于是又询诸海，海复文至，千有余言，大意谓李秉衡与洋人不睦，各国共知，此事由来，盖非朝夕，因历举教堂之被劫，教

士之受侮，与夫州县之漠视，官绅之污蔑，而总之曰，事非偶然，实由唆使，东省大局损坏，中国无力整顿，故不能不自行办理云云。十月初十日至十一月初二日之情形如此。

附录德国统兵大员告示：管辖东方海面德国兵船水师提督棣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本大臣钦遵本国大皇帝谕旨，领兵上岸，将胶州湾一地并海岸左近群岛等处全行驻守，钦遵照办，所应驻守界址，开列于左：

计开：西边直线自海岸起，至东山止，离胶州湾水涨时水面十八里之处，从此往北，至大坡屯儿税卡纬线后，至胶河、大德二河汇流之处往东，至海岸及劳山湾中央之处。

东边一线，自北边至劳山湾中央往南，至加帝庙岛岸以及炸连岛等处。

南边一线，自炸连岛至笛罗山岛之南首，从北至海岸西边二处相连之处。

以上等处，该归德国驻守。兹因山东省有德国教士被杀之事，应向中国昭雪。案本国所欲昭雪，当收该地为质，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青岛口等处地方各色商民人等知悉，尔等仍照常安分营生，不得轻听匪徒煽惑谣言。

查德国与中国睦谊素敦，前日中失和之时，德国曾极力增援，以示邻好之心，现兵上岸，并非与中国为仇，尔不必猜疑，且德国官民自应保护善良，俾得承平无事。所有滋事匪徒，必照中国律例从严惩办，倘有凶徒敢将该处德人谋害者，即归德国军法严切审办。是以本大臣再三劝勉尔等，须知凡事归德保护，不得抗拒，倘不自量力，故意抗违，不但无益，从兹招祸。但德国驻守之处，凡中国一切官员，仍以循分供职，认真办理；向后如有

禀报等事及不便自定之案，该员等应呈德国巡抚住军门衙门总兵官察核办理。至买地卖地等事，非德国巡抚允准不行，凡此务宜凛遵。切切特示。

大德国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大清国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二十六日德兵五六百由塔埠口上岸，直抵胶州署索地，并贴示胶湾各口关税应归彼征收。二十七日仍回青岛。

又德使索款六条：一、须革东抚永不叙用；二、淮安教主在济宁设教，赐与匾额；三、严办教匪，并赏恤银；四、自后中国不许有此等事；五、东省如开铁路矿，务尽德人承办；六、此案办结，所费由中国赔偿云。译署已电许使切实辩论。章镇围困在岛，拟托俄提督转请释放，并恳俄出为调停。十月二十九日报告。

初四日，德又贴示，限我军一点钟内退出女姑口七十五里。又有德兵数百人至即墨，不知何事。

昨夔帅（接谓北洋大臣王文韶）请旨作何办理。奉旨著章营退扎烟台，归东抚调遣。

又闻德向禅臣洋行汇银三十万至胶为买地用。

合肥电许使告克虏伯出为调停。十一月初八日报告。

俄许德占胶州，德许俄权韩事。十一月初九日报告。

巴兰德密告许使，已代商外部，请速照允六款，否则恐酿大祸。同上。

至二十四年中德胶澳租约既订立，先生乃论列此事之始末，痛斥大臣之误国。其全文如次：

丁酉之冬，我山东胶州之盗戕杀德国二教士于途，中朝诸大

臣方聚谋所以弭变之策，俄而德水师提督遽以兵船闯入胶州湾，胁夺胶州而据之。我与德使臣往返商办，卒许德租胶州九十九年为期，赔恤教士二十万。盖因盗杀教士而割地，又未尝一战而即割地，皆始于此。辱未有如此甚者，痛亦未有如此甚者。前衅未已，后患方滋。然而我国士大夫咸曰自乙未与日本订约以来，我国势愈为外人所窥，而地方官又不善先事预防，匪盗内起，强敌外乘，其运数使然欤。汪子曰：呜呼！是我治外交之大臣相与拱手而奉之也，又糜日积月迁延酝酿以成之也。何以言之？德之甘于首祸也，其果因教士之役而始然欤？抑其先已有见端欤？夫德与俄、法为我争辽东于日本也，俄、法咸得大利于我，而德无闻焉。然则德之不能释然于我，抑可知矣。吾闻德使臣尝以是请于我译署王、大臣，王、大臣不能对，但权词谢遣之。已而德又请福建之三沙于我。当是时王、大臣苟知失计于俄、法，则必思所以处德。夫德之不可以术羁而说给也，岂待智者而始知哉。而我王、大臣咸蓄缩不即为计，如是者累数月，使德积怒蓄怨于我，致釀成胶州之巨祸。此不能不为治外交之大臣咎一也。山东巡抚李公，清正有余，才识不足，平时措论以不谈洋务为要术，以得罪外人为至计。迨祸机猝发，李公无术抵御，但云如有兵祸，请自任之而已。前西人久为我虑之见《万国公报》，而当事不察，方倚为柱石，使久处海疆。此不能不为治外交之大臣咎二也。我之兵力微不足御德国也，抑思德之兵船可过印度洋者仅三数艘，德之兵船来至我国，须两阅月。夫德人乘此小隙，遽发大难，其欺藐中国，实已至极。我如毅然绝彼使臣，宣其无礼之状于各国，且告以必不得已之故，以示将举国致死于彼，则与我同福祸之国，必将起而助我。或谓我积弱如是，何足给西人，不知惟新创

之后，正宜竭力自张，以示不测。且民惟无用，用则上下张奋，九败犹冀一胜。不用则气日馁，心日弛，必日割以至于亡。是则必战之故，一言可决，即不能然，不如听其自占，而不遽与订约也。盖战而割，犹胜于不战而与，不订约犹胜于订约而与，而王、大臣漫不加省，事事听从，如响应声，但顾偷目前之安，不考虑贻日后之戚。此不能不为治外交之大臣咎三也。今德事未已，英、俄诸国继起迭至，大祸之来，未有穷极。我王、大臣弭患无术，善后无方。而当事者身当大咎，惟自叹遭逢之不幸，苦规避之无策，其所以报国恩谢天下者，惟涕泪数行而已，岂不哀哉。

其尤可骇怪者又有四端焉。夫询谋佥同，古有明训。今纵不能开议院，集众长，然外讯疆吏，内咨贤达，旁及使臣，亦岂不可。乃当事者守讳莫如深之谬说，凡外人需索之端及交涉中变幻情形，咸秘不使人知。维时我新简使德大臣吕公^①停驂沪上，迴翔未去。然则和战之机宜，岂不当使彼参与乎！而所有消息，绝不相告，惟日催其进发而已。甚至疆吏数千言之电奏，亦置不复。方谓耆臣硕辅，必有深谋妙算，足以雪国耻而解敌氛者，已而租地赔款，仍寻曩辙，斯可骇怪一矣。当兹主忧臣辱之时，宜有卧薪尝胆之象，虽在与国，犹靡唇亡齿寒之忧。即兹黎庶，亦怀栋折榱崩之惧，以草野窃窥，必有日不再食忧形于色者。乃闻中朝显达，唯诺如恒，乌豢不撤，忧患积中，而趋跄无改，外侮迭至，而钟鼓犹悬。不知者惊其度量之过人，其知者识其家国之无意。其可骇怪二矣。夫天下纵有不治之症，为人臣子者断无坐视之理。前车既覆，则更端可也。自忖不能，则避贤可也。乃当事诸臣，惟思诿过于从前，不思弥缝于事后，上者以互相诿卸为工，

^① 吕海寰，1897年6月被任命为驻德、荷出使大臣。

下者以仰窥意色为事。推原其意，盖谓独建一策，而身执其咎，不如与众上下而共分其谤，非以自祈速死为智，即以获援大国为忠。其可骇怪三矣。以德之要求如彼，以我之允从如此，主其事者即幸逃大责，亦宜引为深耻。乃风闻中朝诸臣，互相容恕，方且谓论辩之尚工，欣调停之有术，盖不能转祸为福，而尚欲讳过为功，是非心术之尽丧，即疑狂惑之失度。其可骇怪四矣。由是观之，今日之患，不在外侮，而在内治，不在草野，而在政府。内之则持禄养交传为秘诀，外之则从舆迎合习为固然，聚数千百庸琐之徒，而一二人之为魁，将使吾四万万之生灵，数十万方里之幅员，日澌月灭，以至于尽，我民闻之，能不深痛乎！

或曰胶事既定，辱国丧地，貽后来之口实，启无穷之窥伺。且风闻德人，以我国未尽允从，尚有挑剔，然则我当国之人，茹痛如此，其必尽改旧辙聿新百度乎。曰奚其然，奚其然。夫柄国之人，治外交则甚拙，欺明主则甚巧，问一心则不足，遏众口则有余。夫所谓辱国丧地云云者，自吾侪观之，则如是耳。若彼所闻于上者，岂如是乎。彼不曰辱国也。必曰我之待德本当同于英、俄。然则德既求所应求，我自允所当允矣。彼不曰丧地也，必曰租界届期即可还。然则固可以久假不归之虚券，作为到期归还之实事矣。明知此案一定，必永为规式，而犹必曰以外不得援例，而不知日后各国之援例自若也。不能获各国之公议，则必曰不愿别国干预，而试问从前之许人干预者何故也。且向来奏此数事，虽事已破裂，必言久经料及，以见其明言，再三辨驳以见其力。于所驳之小节，则张皇词语，以示尽力。于所允之大端，则迁就字面，以期掩饰。并当言取旨于上，以示事非由己。遂使国事百败，而藏身甚固，心术尽丧，而文则周密。以虚词示谋国之

忠，以美言作文过之具。使在上无可责之罪，旁观无可指之疵，且于办结本事而外，再奏行一二小事，即足以告无罪于天下矣。曰如是不将见恶于外人，而何以未尝为外人所瑕疵乎！曰外人何肯然。夫外人者固将同心协力以安彼，而使己长执权于亚东也。见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一日《时务报》。

十二月先生与湘乡曾敬贻君广铨游日本，遍历东京、横滨、大阪、神户、长崎等处，匝月而归。

诒年按：先生此行用意至远，于采访政治风俗而外，兼寓有与其国之朝野名流联络声气之意义，非寻常游历之比。事前曾与梁卓如君往返商酌（时梁君在湖南），兹将梁君来书列后：

东行事，弟亦刻不能忘，惟前往之人，必须极老成慎密镇静者，乃可意中之人实无几。兄自往，则弟以为不可，因不可轻于一掷也。然今日实到山穷水尽之时，更雍容一刻，不知又作何了结，此惟兄相时而动。若此信到时，而德事尚未了，则往后之变，殆不可问。兄或以春初姑往一观，亦未为不可，惟切须慎密，无待多属。

汪穰卿先生传记卷三 年谱二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

二月，与德国订立胶澳租界条约，许以胶澳租与德国，又许德国建筑胶济铁路，又许德国在铁路三十里内开采煤矿，又许山东省内如欲招致外人开办各事，应先尽德国承办。三月，与俄国订立旅顺、大连湾租界条约，许以旅顺、大连湾租与俄国，并许俄国由二十二年准许建造之干路某一站起，至大连湾或至营口、鸭绿江中间沿海较便地方筑一支路。四月与英国订立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许以九龙租与英国。五月，与英国订立租用威海卫专条，许英国在华北得有水师合宜之处。降诏将变法自强之意宣示中外大小诸臣，令自王公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七月，谕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降诏将改行新法之意，布告天下，上下同心，以成新政。

治年按：本年自四月以来，除旧布新之谕旨几于史不绝书，然自八月以后，则已一例推翻，其间有未停办者，亦复有名无实，在若存若亡之间，故不复详记。

治年又按：是年所推翻之新政，或停搁之新政，至二十七年以后，复又以次施行，详见后文。

八月，帝称疾，慈禧太后重行听政。谕飭各省名捕康有为、梁启超，杀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六人，此外革职者二人，永不叙用者八人，发往新疆者二人，永远监禁者一人，名捕并籍没家产者一人。

治年按：三十年五月，太后降旨，戊戌案内各员曾经革职者俱著开复原衔，其通飭缉拿并现在监禁及交地方官员管束者，一体开释。十月降谕，翁同龢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治年按：翁尚书先于是年四月奉旨开缺回籍。

是年 月，法国一兵官为广州附近游匪所戕，法国因派兵舰入据广州湾。

先生年三十九岁。正月，与同人创设东文学社于上海之新闻路梅福里。三月，复设《时务日报》馆于上海。时《时务报》已风行一时，然月只三册，又专以提倡变法为主，于时政鲜所论列，因复纠合同志，集资创办日报，以记载中外大事，评论时政得失为主，畅所欲言，无所避忌。初时经费支绌，规画撰述皆先生一人任之，日则出外咨访，夕则篝灯握管，忘其劳瘁，然以纪载详核，议论平正，渐为士大夫所重视，销行日广，规模亦日拓矣。

治年按：《时务日报》第一号之论说题，为论设立《时务日报》宗旨，先生所自撰也。为移录如下，藉以想见先生之怀抱。

呜呼！上下之壅蔽，人心之顽固，有如吾国者乎。去年胶事亟，国事安危在呼吸，时东友某君特航海来吾国。至上海则诧曰：德踞胶州，吾国上下议论若沸，而处其国者，声色如故，酬燕如故，问胶事或不知，或知之又不悉，又若不相关，何若是欤？至胶州则又诧曰：吾以为胶民晏然若处乐土，何又若是欤？

嗚呼！吾人心之不動，患在無以動之也。今若是，豈有冀于后欤？日報之制，仿于中國之邸抄，而后盛行于泰西，又大變其制，能通消息，聯氣類，宣上德，達下情。內之情形暴之外，外之情形告之內。在事者得愬艱苦于人，僻處之士，不出戶庭而知全球之事。顧其利、或全、或偏、或有利，不能無弊，然要之利勝于弊，于撤壅蔽辟頑固，力甚大而效甚捷。譬之隆冬始春，百草枯槁，蟄蟲咸俛，震雷一擊，而蟄者起，枯者茁。兩國交綏，戰士懈怠。鼓聲一振，而士皆奮發，悉力致死。然則處今之世，而欲使吾壅蔽頑固之俗一變，而洞徹，而憤厲，惟日報宜也。顧或謂今上海已有申、滬、新聞、大公、蘇五報，而天津有直報、國聞報，漢口有漢報，長沙有湘報，福州有福報，廣州有中西博聞報，香港有循環、維新、華字、環球四報，意事無不舉，論無不周，何用贅為。不知聞見患其不博，論說患其不參。博則虛實可相核，參則是非可相校，固不以復出為嫌也。夫如是，故海上同志復集款設立《時務日報》，出其所得告當途，并陳其一得之愚，海內賢人君子，其亦矜其志而許之欤。若夫市利之消，不潔之嫌，吾知免夫，吾知免夫。

附《時務日報》章程：本館糾集同人，創建茲舉，一切體例章程，較他報稍異，茲特申明于左，愿海宇君子鑒之。

（一）本館之意在轉圜時務，廣牖見聞，論說之文，務取遠大精確，篇章但求簡賅，毋取冗長。即所登新聞，均擇緊要有徵之事，凡郢燕市虎之詞，概為嚴刪。（二）本館重在采譯西報，凡緊要新聞及有益之論說章程，悉行摘錄。（三）現在風氣大開，公司局廠林列，惟辦理情形，局外無從窺測，本館擬逐細探求，以餉究心時務之人。（四）本報另立專件一門，凡奏疏、章

程、条陈等件之关于时务者，无不广为搜录，以资考证。（五）各处如有异常紧要之事，均令访友即行电告，俾阅者先睹为快。（六）报纸分为三层，俾阅者少省目力，句读加点，以清眉目。（七）首页开明目录告白，分别门类，以便检览。（八）各处访友，虽已订定，惟处事不厌精详，凡沿江沿海各埠及各都会，有才学识兼优之人，愿襄助为理者，请将新闻随时寄示，如能入格，即可添订。（九）事贵集思广益，倘有挂漏未妥之处，尚幸诸贤匡其不逮，如有崇论伟议见示者，本馆亦为采登。（余略）。

讨论（一）如有仿制或创制之物，请即函告，本馆即可托人前往试验，如确，当代登报表扬。（二）如有新撰新译书籍，亦请送至本馆，当酌为登报。（三）如有已开译书籍及创意欲撰之书，亦可告知本馆登报，以免重复。（四）如报中登事错误，请随时指正。（五）如有不惬意于报中所言者，请随时函示。（六）（从略）。

治年按：《时务日报》初时由先生与湘乡曾敬贻君广铨及族兄仲虞君大钧集资设立，出报未久，仲虞君即退出，不复与闻报事。又其后，则敬贻君因置身政界，南北往来无定，于报事亦不常过问。故先生实始终其事，中间虽曾一度退出，终以主持无人，遂仍引为己任云。其销路则初时不过三千份，及四明公所事起，骤增至数千几及一万。至八月政变后，又缩至数千，直至庚子夏秋间，北方拳匪肇衅，始复增至万余云。

治年又按：是时上海之报纸，最流行者为《申报》及《新闻报》，皆用微带黄色之薄洋纸印刷，俗所谓有光纸也。其纸颇薄，止能一面印，故一面有字，一面无字。其行款仍用书册式，每行由首至末，均一直到底，约计四十字左右，无有觉其不便。

者。先生创办《时务日报》，乃仿照东西文报格式，两面印字，每面划分四版，每版分作二栏，每栏计三十六行，每行计十八字。行短而字不多，不致伤阅者之目力，其便利实为不少。

然阅报者习于申、新二报，反以《时务日报》为不便，即馆中人亦多异议。先生与曾敬貽君毅然不为动，久之习惯如自然，遂又以此式为便利，后来之报纸，大都沿用此式。又逾多年，申、新二报亦遂改用此式矣。然当其初则众口讙然，不以为是也。改革之难，即此可见一斑。

四月，经君联珊创办女学堂于上海之高昌庙桂墅里，先生力助其成。

治年按：此与东文学社之事实，亦均详著于事业汇录内。

五月，居上海之法人有强夺四明公所义冢事，甬人之旅沪者大愤，起而与之抗。先生始则指导之，使表示不可夺之义；继则裁制之，使勿有逾分之举，一于报纸发表其意见。以是甬人虽全体一致与法相争，而自始至终未尝逾越范围，法人亦曲意让步，皆报纸之力为多。事后先生以为此事之起，实由中外情谊隔阂所致，惩前毖后，谓宜于法租界公董局中增设华董，庶足必通彼此之邮，而销患于未萌。因上书江海关道蔡和甫观察论其事，全文已刊入书牘辑存内，兹不录。

治年按：先生当时虽建公董局中宜增设华董之议，然迄未实行。直至民国三年，法人要求推广新马路区域，上海交涉使因以增设华董相要，遂于公董局中增设华董三人，十八年又加二人，合为五人。公共租界亦自十七年起于工部局内增设华董三人，二十年又增二人。

治年又按：上列先生致书上海道蔡观察事，其书之底稿，今

尚留存，故据以入谱。以后所列上各省督抚及政府之函电，亦皆以存稿为根据；其无稿可据者，则虽知有其事，亦概付诸盖阙，特发其凡于此。

六月，奉旨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先生奉谕后，以《时务报》既奉旨改为官报，则《时务报》名目自非草野所敢擅用，因即改为《昌言报》，一切体例均与《时务报》一律。其后八月，又奉谕时务官报无裨治体，徒惑人心，著即行裁撤，《昌言报》亦以销路锐减，经费支绌，出至第十期即行停办。《时务日报》亦同时改为《中外日报》。

治年按：先生彼时于报端刊一广告，表明将《时务报》改名《昌言报》之故，有“康年于丙申秋创办《时务报》，延请新会梁卓如孝廉为主笔”之语，不意因是忤梁君之意，遽作一长文痛加驳诘，腾布远近。盖由梁君壮年气盛，不暇思索所致。其后梁君盖亦有悔于厥心，故自戊戌八月出亡后，尝屡致书先生通殷勤修旧好。兹为选录二通如次，亦可见先生与梁君交谊之经过也。

梁卓如先生来书：到檀后得第二书，领悉一切。兄之相爱，语语肺腑，读之犹恍忆南怀仁里，夜雨一灯，兀兀对坐时也。所示做事，不可太高兴一语，诚中弟之病根，当日三复之。比年以来，屡经挫折，于世途上勾当，阅历日深，自问颇较前者略有增长，若得与兄他时相见，或亦许其非吴下阿蒙也。废立诏下，举国震动，而上海一隅，义声尤烈，逆谋稍敛，皆赖此举，兄与诸公提倡之功不在禹下。但此后我辈责任日益加重，非片纸空文可以谢天下也。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由檀岛发。

又书：天道无知，人事无常，戊戌别后，岂料其合并之难至

此哉。嗟夫！走非木石，能不神驰哉。回銮后，泄沓如前，想前途大业，必非可以望诸老朽之辈。吾侪虽屡试屡挫，但历岁寒勿衰其志而已。想兄近亦深精进，《中外日报》之婞，直实可惊服，前者清议论说尚当退避三舍也。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在日本发。

治年按：以上所列，已成陈迹，今因近人所著书尚有引用梁君之文以为资料者，故为追述其大略。

九月，元配王宜人以肺疾卒。先生伉俪至笃，悲不自胜，然常日治事如故，不以是而废弛也。

是年，湖南巡抚陈右铭中丞宝箴，举先生经济特科，先生未应。八月政变后，是科亦停罢。

治年按：陈中丞举先生事，未知在何月，故纪于是年之末。

治年又按：检阅先生遗存之书札稿内，见有是年六月致高梦旦、汤蛰仙二君书，均有“现开维新总会，诸事冗集，益无暇时”之语，知当时有创办维新总会之举。惜此会章程已无可考，故宗旨如何，办法如何，不得而知，只可付诸盖阙之列。

又续于遗稿中见有致日本近卫笃磨、大隈重信、犬养毅三君公函，内言某等闻大名久矣，辄以未获躬侍左右，畅聆伟论为憾。敝国人游贵国归者，咸述从者眷怀时局，慨然以振兴东亚自任，凡在同洲，罔不仰企。某等不敏，常以交邻之道，互相质证，金谓欲联日清为团体，必从学会入手。前闻从者于亚东协会事宜，殷殷提倡，不遗余力，感佩同深。某等近亦熟思互商立一学会，名曰正气，本以友辅仁之旨，寓人贵自立之思。立会以后，来者颇多，伏思从者于日清交谊素抱热肠，因特奉上章程□册，敬乞俯赐览观，并恳有以教之云云。

阅此书稿，知当时有正气会之设立，为与日人联合声气之机关，惜章程已不存，年月亦无可考，特为附志于此。

附录 纠正《南海康先生传》诸书

汪诒年撰

近见东莞张伯桢所著《南海康先生传》（以下简称康传）内有云：其时适上海《时务报》汪康年亏款甚巨云云。张氏此语，不知何所根据。考当时原有一种谣言，谓先生亏空八千金，先生视为不根之谈，置之不辨。及至二十四年戊戌夏，则言者愈多，京城尤甚，几于众口铄金，视为实然。先生乃撰一广告，布告远近士大夫，兹将其中重要一段，节录如次：

（上略）。馆中所收之经费，以捐款、报资二者为大宗，其余均为数甚微。捐款除随时登报致谢外，又于每六个月所开之收支清册，将实收之数，详细开列，试问助资诸君，有已付款而未登报者否？使此八千金之款，康年取为己用，匿不以报，则彼助资诸君何为默然不一言？至于所收报资，亦已两次开列寄报收款清单表，供人检核。大约除所托非人，被其乾没；或其人不善经理，以致报费无著；又或相距较远，尚未收到外，其余即已尽数列入表内。使康年所侵匿之八千金，或取之报费，则必有曾付八千金而未获列入表内者矣，盍亦就代派诸君而一问之乎。收款之凿凿可指，既已如是，则必支用之帐或有不实，而后此八千金之数，乃可融入其中，而使人不觉然。自丙申初秋至今夏（指戊戌言），计共用七万二千余元又二百两，其用之也，有其时有其

人，并有其藉。且旧年以前，姑不置论，今岁上半年，计共用一万八千余元，内除薪资、印报费、寄报费暨还代派处各款共一万四千八百余元外，其余房租饭金各项零用，都共三千二百余元，以半岁七月除之，计月用四百五十余元，其为款归实用确凿可知，更何处容此八千金之虚数乎。（下略）。

观于上列广告所言，则亏款甚巨之说，其为当时挟有嫌隙，凭虚臆造之谣言，不辨而自明。乃康传犹从而述之，毋亦有未合者欤！

康传中有一语尤为奇突。据言先生许于上海县引捕役赴大同译书局及梁先生家逮捕云云。夫先生彼时与康、梁诸君诚有意见，然以先生之风谊而论，则乘危下石之举，决然不为，此固可断言者。康传于叙述政变亡命千端万绪之中，忽插入此语，不知何意。且张氏亦不思尔矣大同译书局是否一僻陋之书肆，梁君所居是否在荒僻之乡镇，乃待人引导耶？又如果有此事，则梁君事后方当视为贸首之仇，切齿腐心之不暇顾。二十五年夏间，章太炎君东游访梁君于东京，梁问章曰，穰卿果何如人？章曰：洛蜀交讧，而终不倾人，章、蔡视木居士何如耶。此章君特作书以告先生者。而二十六年二月，梁君至檀香山，二十八年二月梁君在日本，均有书与先生通款曲，使先生所为果有如康传所言，梁君非健忘者，肯作尔许殷勤耶？则康传之为诬辞，可不待言而明。所不解者，张氏撰康传义在信今而传后，顾乃摭拾谰言，不加刊削，岂以为先生脱离尘世亦已有年，可以称心而言，不惧驳诘耶？《史通》有言：秦人不死，知符生之厚诬；蜀老犹存，识诸葛之多枉。振古如兹，匪今斯今矣。

迨年复又见常熟钱仲联君所撰《黄公度先生年谱》（以下简称

黄谱),亦根据康传有汪穰亏款甚巨之语,复又继之曰,穰卿乃私改为《昌言报》,抗旨不交云云。按当时御史宋伯鲁奏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按:据张撰康传,则言由康君草折交宋伯鲁上之,并请飭梁启超专办此事。)奉旨令总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议奏。旋于六月 日奉谕,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先生见电传上谕后,即将《时务报》停办,一面电催康君来沪主持,正是遵旨办理,何云抗旨不交。一面即另办一报,因谕中有各报体例,(中略),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之语,故定名《昌言报》。是将《时务报》交出为一事,另设《昌言报》又为一事,何云私改,此不可解者也。戈公振氏《中国报学史》纪载此事,备录先生呈两江总督之全文,以明此事之原委。而黄谱乃断章取义,仅载呈文之首段,以为抗旨私改之佐证,而于后半段辨正之语,则置而不录,未详其故。

诒年又按:私改为《昌言报》及抗旨不交二语,盖发于康君。康既以此二语电告江督,并有望禁发报等语,江督即据以电奏,奉旨令黄遵宪于道经上海时查明原委,秉公核议,是其事尚在听候核议之中。顾康君则已编电各督抚,请为禁发。各省颇有奉行者,江西藩司翁方伯即已札飭德化县传谕派报处福康轮船公司,有不准发售《昌言报》,倘有抗违,立即究办之语。然江督批先生之呈文,则有该进士遵即就原办报馆,另拟《昌言报》刊印发售,尚无不合,应准照办之语。则先生之是否抗旨,是否私改,当可不待辨而自明矣。康君又电致苏松太道,有:“商孙中堂令请禁发《昌言报》”,并有“无干参办”之语。先生乃请命于孙中堂。旋接复函有:弟意康水部处此,必有一情至义尽办法。接来电,水部电致上海道,有奏参封禁之语。此水部之

言，弟并无此语，宜分别观之云云。据此则抗旨不交，私改为《昌言报》之语，全出自康君之口，即原奏之孙中堂亦不以为然矣。

上列亏款甚巨及抗旨不交二点，黄谱中业经改正，然未改之本散出者已不少，恐后人不察，信为实然，故复详辨之如右。

此外更有当附带纠正者，当《时务报》奉旨改为官办时，梁卓如君曾撰《创办时务报〔馆〕原委记》一篇，几及三千言，戈氏《中国报学史》中曾全行录入。黄谱遂有道经上海，因主张《时务报》举董事几与汪穰卿决裂之语，亦节录梁文，以为佐证。按梁君此文，系一时称心而言之作，本不可为典要。先生彼时不欲尽情指摘，有伤雅道，又不欲彼此辨驳，貽笑外人，故仅作《创办时务报原委记书后》一文，寥寥数百字，登诸各日报，兹照录如次：

昨日读本埠各报，有吾友新会梁卓如孝廉所撰创办《时务报馆原委记》，洋洋数千言，于康年办事立言之错谬，针砭备至。康与卓如订交于庚寅年，两人交若兄弟，自开报馆以后，尤觉亲密。但以学术不同，加以搆间，致渐乖异。此记所言，是非得失，尚待公论。康年既不欲毛举细故，以滋笔舌之烦，尤不敢力争大端，以酿朋党之祸，盖恐貽外人之诮，兼惧寒来者之心。良以同志无多，要在善相勉而失相宥，外患方棘，必须恶相避而好相援，此则窃愿与卓如共相劝勉者也。窃意卓如素讲合群之谊，其所撰文字，于中国之自相胡越，自相鱼肉，皆疾首蹙额而道之，似不至以一时不合，遽尔形诸笔墨，见诸报章。又此记中节外生枝，离题殊远，其所言皆与从前实在之情形，卓如历来之信札，诸多不符。姑以近事言之，康年六月十三日即电致康工部

云：“电悉。公办报甚善，乞速来”。十九日又发一电云：“《时务报》奉旨归官，康不敢擅拟，请公速来。”二十二日接康工部信后，当时即发一回信去，备陈一切。卓如在京，断无不知之理，何以告白中竟有既无回电，又无复信之语。则此告白是否出卓如之手，尚不可知，是以暂置诸不辨之列，庶于我两人平日相待之交情，相许之志愿，不致乖违。特附书数语于此，以释群疑。

右文发表后，梁君并不答复。是则梁君原文之不足据固可知矣。后人不当更引其说也。

诒年按：右文所述之事，至今已四十年，后死者诚不宜激已靖之波，扬久烬之焰，然戈氏书颇有名于时，黄谱冠于《人境庐诗草笺注》之首，流传必广，诚恐阅者误信其言，或致疑于先生，实不可以不辨。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 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

四月，派刚毅南下搜括财赋。十月，与法国订立广州湾租约七条，许法国得将广州湾租为停船趸煤之所，并许法国得在广州湾地方建造铁路电线等。十二月，立载漪之子溥儒为大阿哥。

先生年四十岁，在上海主持中外日报馆事。

十二月，立大阿哥之诏既下，中外哗然，虑将有不测之变，时惟江督刘峴庄制军坤一致电荣禄力争，有：“君臣之分久定，中外之口难防，坤之所以报国者在是，所以报公者亦在是”等语。先生维时特于报中发抒意见，更窃语人曰：不去庆父、鲁难未已，恐尚有大祸接踵而至也。至次年不幸而言中矣。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西历一千九百年

五月，以拳匪滋事，戕杀武员，烧毁电杆铁路，谕饬严拿匪

首，解散胁从。

治年按：拳匪一役，盖由多数昏庸谬妄之人集合而成，其初本只十百无赖，迎合群众心理，以扶清灭洋为号召，博取无识者之拥附，求遂其掠夺之大欲。不幸而有与教民有宿怨之多数人，信其实有降神附体之能力，欲藉以泄忿而报怨。又不幸而上至宫廷王、大臣，下至士大夫，平时不嫌于外人，或有积隙于外人者，忽思藉若辈之力，欲一举而芟夷之以为快。其始尚冀其事之成，又恐其事之不成，故为实与而文不与之计，迭下张皇声势之诏，称之为拳民，而以持械寻仇杀人放火等等诱诸奸民会匪。迨至外使被戕，巨衅已成，则亦公言不讳，而崇奖奸回之语，且迭见诸皇皇谕旨中矣，其事既不足纪述。而是年十二月，复降谕言夏间所颁谕旨，皆由首祸诸人乘间矫擅，著令提出消除，故除第一次严拿匪首解散胁从之谕旨外，其余一概不录。

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被戕。各国联军攻据大沽炮台。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戕。六月，各国联军占据天津。七月杀许景澄、袁昶，又杀徐用仪、立山、联元。授李鸿章为全权大臣，电商各国外部先行停战。各国联军入京，皇太后与皇上出京。复谕准李鸿章便宜行事，不为遥制。湖北破获在汉口预备起事之自立会。八月，太后与皇上至山西。俄军占领黑龙江省城。闰八月，授奕劻为全权大臣会同李鸿章妥商应议事宜。九月，太后与皇上至陕西。直隶藩司廷雍被联军统帅枪毙。

先生年四十一岁，在上海主持中外日报馆事。

是年拳乱骤起，京津间既已戕公使攻使馆，而京外焚教堂杀教士之举，迭起环生，直有铜山西鸣，洛钟东应之势，外论哗然，对于吾国几无恕词。先生独著论力斥邪民之酿变，政府之祸

国，然推本于人民信拳之心理，排外之缘由，以百十无赖之猖狂，而能于不崇朝之顷，使从之者如归市，其岂曰无因，以见其咎不尽在吾国。西人之晓华事又通华文者，见先生此论，甚以为然，转相传译，公论始稍出焉。先生复又力属译员，凡西文报内所载西人持平之论，必须译出，以徵症结之所在。故《中外日报》此类之言论，时有译载，特为摘录数则如次：

（一）英相沙候，于某日在英国传教会大会中言曰：外务省深不惬意于传教之人，详观往事，传教者往往以身殉教，从未闻一遇艰难，即请领事干预，或请炮船保护。此次中国之事，确系传教者所致。（中略）。故我劝诸君，以后传教，不必过于踊跃，总以谨慎为主云云。译《字林西报》所录伦敦二月二十二日来书。

（二）前驻印度总督古尔逊所著教士论云：华人之从教，于涉讼等事每得分外之益，以致民教更积不相能，一如南印度之人教即可谋生。又云：遇地方有所举行，教民皆不出公费，则平民出费益重，亦积仇启衅之一端。又云：国政之交涉，几尽在教案中，凡足以启衅者，首宜力除之，否则亦必多方裁抑之。（中略）。然仇怨日深，即恐有全败之一日。至于教士遇害，以钱抵偿，交际之道，一至于此，亦可怜矣。又云：教士之品行，为祸福之所倚，最关紧要，奋发有为，非传教者之所宜，慎选教士系英美教会之责也。教士亦必自爱，兢业从事，以防后患，则庶可矣。

（三）西历八月十日《字林西报》载奥京某报云：近日中国北方之事，实因欧洲各国往往无理干预，且有意蚕食中国疆土，中国忍受折磨，为日已久，故一旦起而为难也。（中略）。中国

之痛恨教士，隐忍有四十余年矣，即以近六年而论，亦无日不觉洋人之渐食其肉也。又何怪其乘机滋事，思有以脱去洋人压制之痛哉。乱平之后，各国其慎思所以待华人之法，而勿蹈前四十年中之所为，则庶几乎可矣。

（四）法人包和尔君在比斯大会场中言曰：此次中国拳匪之乱，其故厥有三端：一因教士中不免有狂妄者，而各国使臣复助之向中国为难；二因欧人在中国者虐待华人；三因欧美两洲富商在中国专利为华人所忌云云。译十一月十四日《字林西报》转载西十月十四日英《泰晤士报》。

治年按：以上皆庚子年欧洲人之言也。再等而上之，则同治十一年法国驻北京天主堂副主教樊国梁曾有言云：天主教之在中国，犹中国之有喇嘛，专行其教，并不干预国政。即法国现行事例亦是。主教者管教，地方官办公事，两不相侵。又云：教中规矩，凡涉讼及不守本分之徒，向来斥绝不收。（中略）于不守法之人，随时驱逐出教云云。（见孙竹堂《书牘辑要》）是知西士之传教，原有一定准绳，徒以后来教士意在揽权，地方官意在省事，遂致愈趋愈下，不可收拾耳。然自庚子以来，民教相争之事，遂觉日渐减少，教案二字，几可成为交涉史中之名辞。实由拳乱后，教士既迭被指摘，亦自知曩昔所为，徒以结平民之忿怨，为传教之不利，由是下复为莠民所利用。又渐知转变计划，从上级社会下手。于是以向来著名排外之省区，全国仰望之华胄，亦且毁家以资助教堂，舍身而为教服务。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教民与非教民，渐觉鲜所齟齬，识者于此，可以知世变矣。

治年又按：我国自通商以来，教案层见叠出，国民之因而被

杀戮者不知凡几，国币之耗于赔偿者，又不知凡几。至于拳乱一役，遂为最大之牺牲，亦为几于最后之决裂。而考其乱源，则可以三言蔽之：曰教民恣横而已，曰教士庇护而已（按教士亦有公平者，教民亦有安分守己者，此特就大概言之耳），曰平民积忿而已。初不意星星之火，遂致燎原也。当时夏穗卿君在祁门县任内，迭有书致先生评论此事，以身任地方官之人，述身所经历之事，其所言自属忠实。凡教案之起源，源盖不出二书范围，亦可知历来各省疆吏及地方官，于镇安及消弭之方法，固实有所未尽也。特为照录如次：

教案之起，绝非由民智不开，说者谓愚民疑教堂中有采生折割等事，因而起衅云云。不知吾民从来不因公愤而自冒险，疑则有之，而闹事断不因此。大约起事之由，总由词讼而起，先有无赖之人，自知不容于众，归教以求庇护。既已归教，则种种作恶，逾于平日，亦不必果有大事，但同一买物，而教民可以减价，同一借债，而欠教民者不得不完，教民欠者不能索取，此等事甚多，不能悉数。乡愚无知，此等细事，无不计较，积久遂成衅隙。迨既有意见，则寻常一打架口角之事，若民与民为之，事过即忘，若偶为民与教，则分外认真，及讼之于官，而教士未有不横身干预（亦不得以此罪教士，因教士若不干预词讼，则可以无一教民也。教士何以对教会乎！），若州县欲持平，则事必闻于上官，上官无不奉教士之语者，即使其理甚明，万难倒置，则压搁不批（此习峴帅^①最甚）。中国之地方官，岂有为国为民之义，既见上官风旨如此，自然袒教抑民不遗余力矣。彼小民者怨愤无可伸，自不得不自行报复，而又有无数穷极之人，欲抢教堂

^①指两江总督刘坤一。

以自救，两者合而教祸成矣。教祸既成，其后终归大加杀戮，如此则仇怨愈积，而归教者日多。盖幸而民智未开，尚疑受教后有奸污挖割之事，尚在徘徊耳。若知教堂中无此事，则必至无一不归教者也。说者又谓，教虽外国之教，民仍中国之民，此语非也。盖教民绝无一信其宗教而归之者，皆为词讼起见耳。既已归教，有教士庇护，可以不服国权，则一国而有二种民矣。夫今遍地球之国家，一国之中可以任民信用何宗教，不能任民信用何律法也（以上均就至平和之情事而论，尚有大非情理者，不在此数）。设总教务处一事，不啻奉内政之全权归于罗马教皇之掌上，其弊大矣（耶稣教不甚有弊）。然其他竟无办法，即使设立专条，不过好看语耳，断不能实施。盖教祸一端，乃我灭种千万因中之一大因也。

又书 敝地按谓祁门六月间，西邻景德镇闹教隔百里，东邻屯溪，又忽来难民千人，于是祁人亦有跃跃欲试之势。先是此间无教民，三年前有人廖姓于县试场外获传递之人，送官办之，而诸官则以欲办此人，已先有关防不严之失，遂坐廖姓以诬告而重办之。廖自狱中逸出，逃至屯溪，不知所向，遇人劝以入教，遂入教焉，此为邑人归教之始。去年又有典当失火，照例典当自己失火，照赔十成，被人延烧，则赔半，而此当实自己失火，当赔十成。行贿于官，乃令赔半，而此当中所质物，皆穷人之物，不能吃此大亏，乃聚众讼之。官则大怒，严办来讼之人，众无奈又逃往入教。近日教民积至四百余人。此二役，教谕曹笙南实主张之。以故教民均与曹不合，当西东邻之告警也，曹欲藉此以绝教之根株，将伪谕传播分送，并伪造北电，谓西军如何败绩云云，乃逼鄙人以严办教民。鄙人谢不能。曹乃上言于各上官，言鄙人之纵教，又怂恿百姓以

杀教为言，土人皆以为然。数日之间，讹言四起，大书揭帖云：“奉旨仇教”等。鄙人观其情势，不可强为，乃阴遣教中人挈眷遁去，度其去远，乃声其罪而责之，于是民气始泄，教民始全，近日可无事矣。惟曹公尚在，则地方终不安也。

治年又按：先生后来于《乌言报》及所著之笔记中，曾各有一则，办理教案最有关系，并为移录如次，亦以见先生之最注意此事也。

议员中有言及民教之事者，此今日内政中一要务也。按庚子之役，非特吾国憬然以为大戚，即各国亦深知酿患之所在，而为惩前毖后之思。闻英公使特饬各处教士，不得干与公事。法使亦饬天主教士，不得用前时中国所定教士亦得以等级与中国官场相对待之礼。然此二事，吾国官场乃多未知能设法广播之，使知两教教士之地位，于事亦有益也。见宣统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乌言报》。

某年（在辛丑之后），英国公使特行文各处领事，由领事转饬各教士，略谓教士干预词讼，本于例禁，今特重行申告，以后有民教讼案，教士不得再投函地方官，属托抑勒。倘有此等情事，一为本公使查知，即当驱逐回国。又某年（在庚子以前），总署以法教士之运动，奏定教士名位与中国地方官署对待阶级。是年（亦在辛丑之后），法公使亦饬各教士将此例废除。此二事吾国外交界或有未知，故特著于此。按庚子之祸本于民教不和者大半，各国亦深知其故。故英、法公使均有此等公文，如此则官吏办事可稍自如矣。惟是民教失和之故，官吏逼勒，教民肆横，民人误会皆有之，各地方官得此机会，正当以公平从事，绝不可有偏袒之见。平民与教民，亦彼此坦怀相与，勿稍挟猜疑欺压之

心，斯可矣。见《汪穰卿笔记》第二卷。

五月，北方拳乱既盛，南方也岌岌可危，先生甚忧之。特至湖北以剿拳匪劾政府之说上诸张孝达制军。又至江宁托人将其说上诸刘岷庄制军，既而李少荃傅相至上海，复联合同志，上书傅相，请即率兵入都，以剿匪为讲和之根本。惜均未见采用。

诒年按：七月中，先生复又至江宁，欲与同志上书刘制军，力陈宜即举兵入都护卫两宫，因以弹压西兵，主持和议。旋因为时已迟，不及上达而止。其详见书牍辑存所载上刘制军书内，特附记于此。

是月，闻英与诸国将遣兵轮入长江保护侨民，先生以为此时欲靖北方，非先保南方不可，欲保南方，非先与各国切实订约，使中外相安不可。遂有赞助上海各官绅，商请两江、两湖总督委派江海关道与驻沪各国领事订约互保东南之举。约款共九条，为照录如次：

一、上海道台余、现奉南洋大臣刘、两湖督宪张电示，与各国驻沪领事官会商办法：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二、上海租界共同保护章程，已另列条款。三、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两湖总督宪张允认切实保护，并移知各省督抚及严飭各该文武官员，一体认真保护，现已出示禁止谣言，严拿匪徒。四、长江内地，中国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静，各口岸已有各国兵轮者，仍照常停泊，惟须约束水手等不可登岸。五、各国以后如不待中国督抚商允，竟自多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藉端起衅，毁坏洋商教士人命产业，事后中国不认赔偿。六、吴淞及长江各炮台各国兵

轮，切不可近台停泊及紧对炮台之处，兵轮水手亦不可在炮台附近操练，彼此免致误犯。七、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兵轮勿往游弋驻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扰。此局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设有督抚提用，各国毋庸惊疑。八、内地如有各国洋教士及游历各洋人，遇偏僻未经设防地方，切勿冒险前往。九、凡租界内一切设法防护之事，均须安静办理，切勿张皇，以摇人心。

治年按：王蘧常君所著沈寐叟先生曾植字子培，晚号寐叟年谱有云：公痛北事不可救，以长江为虑，与督办商约大臣盛杏荪府丞宣怀、沈涛园中丞瑜庆、汪穰卿中书康年密商中外互保之策，力疾走金陵，首决大计于两江总督刘峴庄坤一，来往武昌就议于两湖总督张香涛之洞，而两广总督李少荃相国实主其成云云。观此可知当时立约互保之原委。

治年又按：其时北方固已糜烂不堪，即南方各地，亦蠢蠢然有乘机窃发之势，即就省会及商埠言，市民之传说，大都表同情于拳匪，思起而效其尤。假使各国军舰麇集长江，各地风声四起，讹言繁兴，莠民从而和之，则大祸可以立作，全国将无一片干净土，不可为国矣。故立约互保，实为不得已之举。先生参预此事，不欲为人所知，故《中外日报》直至约款订定后始行宣布云。

六月，浙江西安县暴民聚众滋事，知县吴筱村大令德瀚正在团防局筹议防务，忽被暴民指为通匪，缚送道署，囚诸签押房。旋又拖至大堂外群刃交下，置之死地，眷属幕友家丁等被害者三十余人，仅其母某太夫人及其继室冉夫人并一幼子幸免于难。先生与吴君为至好，闻信大恸，急遣人至衢密访其遗族。其后吴夫

人奉姑扶柩回川，过上海时，先生特为之尽力迎护云。

治年按：土匪作乱，事所恒有，至如西安之祸官，非独夫民固乌合，乃至仓卒被害，阖署并命，斯真千古之奇惨，当世所希闻者矣。事后吴君之夫人曾详述始末，向浙抚呈诉，以吴君与先生交谊至深，而受祸又至酷，故特将呈文全录如左：

窃氏夫西安县知县吴德沛，于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中旬，因邻邑江山县属土匪起事，衢州郡城闻警，镇、道、本府皆深居不出，氏夫以责司守土，竭力筹防。是月十九日，县属南乡民团送匪二名到县，氏夫讯得确供，面禀道府请立予正法，以遏乱萌。道府拘泥不允，氏夫以匪氛逼近，再三禀白，始准惩办一匪。二十日早间，民团复送匪三名，晚间又送匪十一名，起有火药一担，刀枪、铁标、暗号、竹牌及红黄布旗各一面，上有太极图，并“中和归一”印文。氏夫立即研审，内有刘开元等数人，确系匪党头目，直供不讳，当录供面呈道、府，请将首要正法。道、府仍以专擅为嫌。其时警报迫切，氏夫虑久稽生变，反复陈请，尚尔游移。直至二十四日傍晚，得江山县失守之信，氏夫又复力陈，若再不将首要正法，必酿大患，日后专擅之罪，情愿一人承担。道、府慎重人命，始准正法三匪，即于是夜会营将准杀之三匪捆出县署，经城守营都司周之德在县署照墙边处斩讫，此实氏夫力请办匪之确据。

不知周都司因何挟嫌，且欲矜己长，以炫于众。于斩犯后，忽在街市扬言：这几名匪犯县官本不肯办，是我强要杀的。县官原欲在城外杀，使匪徒来劫法场，所以我押出县衙门口就杀了。又说：今日我亦甚险，县中家丁亲兵都带有刀，我若随从兵少，几乎亦被杀矣。当时街市人人听闻，致启团营诬疑之渐。此道、府

拘牵例文、优柔寡断、都司妾言酿祸之根由也。

先是二十一日晚间，西门地保鸣锣，声言江山土匪已至南门，人心异常惊惶，团绅仓卒登陴。氏夫即速上城查看，城外安静无事。该地保旋送一奸细，当讯系本城染店伙计，立传该店主认识取保释放，以地保造谣惊众，贪功妄拿，将其笞责。又面告团绅，嗣后城垣则各守各段，街市则各清各段，不得错乱惊扰，以专责成而便稽查。此氏夫责斥地保实为平谣靖乱力筹防守起见。詎该团董等不明是非，不察真伪，往见道、府，捏禀惑听，反以氏夫为非。氏夫是时仍以守土为念，因复独任其难，电勉部署。及二十四日晚间，会营诛匪之际，先即一面督团上城防守，并饬将附郭房屋拆去，坚壁清野，勤劳终夜。甫至二十五日黎明，即赴府稟商，集绅筹防。詎家丁李升及上街买菜之厨夫朱元，先后为水亭街周王庙团勇捆绑，指为放火奸细。该地保即鸣锣集众，沿街吆喝“县官通匪，已将县署放火奸细拿获”等语，顷刻合城传遍，因是民人莫由别白。氏夫适由府到城隍庙团防局，团绅群集，本府亦到，尚未筹议，忽报称获有奸细李升、朱元均系县署丁役，氏夫吩咐我即随同道、府审讯，如果通匪，定即严办，断不回护等语。话未说完，突拥入团营多人，各执刀械，将氏夫捆绑，当有跟丁高福上前护卫，立被该团营乱刀将高福戳死。洪本府目睹乱情，一言不发，乘轿赴道署。团营亦将氏夫抬送道署。道、府情急，闻系向乱党磕头求情，始将氏夫释缚送道署签押房内。道台即请镇台议事，当喻镇到道署时，乱党各散，乃喻镇片刻即行，乱党复聚，鲍道台遂以西安县办理不善，贻误地方，着即撤任牌示并委员到县摘印。旋将拿去之县署亲兵四人，连捆之家丁李升一名，道、府俱不问供，即令周之德由道

署捆出处斩，内有亲兵游三奎，系周之德所荐，由周之德临斩释放，其厨夫宋元仍在道署捆押。于时城中大乱，道、府任听团营肆行无忌，镇台亦不发一兵弹压。乱至酉时，该团营复拥入道署，径将氏夫拖至大堂外乱刀攒死。此氏夫吴德涛被团营乱党诬以通匪，惨遭杀害之实在情形也。

当二十五日黎明，氏夫赴府后，突有无数身穿号衣乱党及本署书差，闯入县署，将氏夫子以桀、以东，次孙恕昌并幕友七人、官亲二人、家丁八名，凡二十人，捆捉分送道、府，仅有征席洪翰臣系本府堂侄，先期经府署接去，毫未受惊。该乱党复拥入上房，将氏姑今年七十八岁，竟敢从床上拖下，书差说是老人，杀之无益，始得释放，犹将金钗拔去。氏姑年老，经此惨变，现已人事不知。氏及女眷，幸身换破衣，躲入厕所等处得免辱戮。署中帐房、上房公私银物，抄抢一空，暨将氏子以桀、以东、次孙恕昌，幕友萧欣园、张熙农、章墨臣、鲁宝斋、余子威，官亲汪伯华、张少连，家丁江福等二名，共十二人交道署。章墨臣、鲁宝斋越道署墙壁逃脱外，至二十七日，鲍道台将以桀等十人及前拿之厨夫宋元计共十一人，送交团防局，一并杀害。其送府之幕友金倬夫、何勉斋及家丁葛升等五名，计共七人，业经钉镣收禁，于二十八日洪本府复送交团防局，即在府署前乱刀戳死。尚有家丁李钧闻乱赴府探信，被门役推出潜匿，幸存活口。其余被团营搜杀者复有家丁七名，以及二十五日被杀之亲兵三名，家丁高福、李升，统计印官被戕之外，先后屠杀至三十命之多，并是无辜，全遭惨毒，人数确凿，无理难容。此又氏子及孙并合署惨被杀害、署中被抢之实在情形也。逮氏夫被害后，道府连日派人来搜火药，典史将签押房等处地板撬开，搜无火药等物。周之德大儿子

复将书房物件掳掠罄尽，其余各房无不搜到。物件系一穿蓝开气袍人吩咐，挑往府署。至此署中一物不存矣。旋复有人用本府封条，将氏等封禁上房，不准出入。此又事后抄掠封禁之实在情形也。（下略）

治年又按：吴夫人未具呈之前，钱塘县沈剑芙大令先已代为呈诉，其呈首叙述吴大令疾恶如仇，见怒群小之情状，阅之令人悲愤，并为节录于下，以补吴夫人呈文所未及。

（上略）。近十数年来积习相沿，风气日薄，城乡各处，以敲诈为生者，名曰辣腿，随在皆有。家主嫉恶如仇，密派拿获，从严惩处，虽于地方有裨，而无赖棍徒不无忿恨。西邑民间好讼，实由胥役从中舞弄，借端需索，以至积案甚多。家主力除积弊，随到随审随结，使胥役无可施其伎俩，偶有需索，立予严惩，胥役亦不无怨怼。余如劝办积谷，讲求农务，创兴樗茧，稽查保甲等事，无不实心实力，认真举办，初不料以此贾祸也。（下略）

闰八月，先生因事至南京，江督刘岷庄制军忽误信蜚语，疑先生有异图，遣一武员率兵至先生寓所之客栈，闭门大索。幸先生先已得讯，急微服出通济门，附内河航船，由句容、丹阳经常州达苏州，改附小汽船至上海。事后始知刘制军既索先生不得，复派数十人至下关，遇有登汽船之旅客，均加以穷诘，期于必获云。先生后致书刘制军，辨明其诬。刘制军亦知为人所误，其事乃已。

治年按：此事至奇，先生后亦知蜚语所由来，以不欲多取怨于人，故不复请当道究治。尝举以告人谓，生平所值倾险排挤之事，不一而足，惟此事则绝无踪影，止可谓之笑语云。后又有人

劝先生作避地之举，免受危害者，先生以死生有命辞之。

治年又按：先生致刘制军书，已列入书牘辑存内，兹不录。

十一月，母关宜人卒。宜人自甲申年大病获愈后，精神康强，视听不衰。先生常日在外治事，而晨昏定省，凡所以娱母者无不至。至是以微疾卒。先生哀痛尽礼，一如壬午居忧之时。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西历一千九百〇一年

正月，降谕惩治首祸诸王、大臣，计正法者三人，赐自尽者三人，斩监候，发往新疆永远监禁者二人。斩监候业经病故或自尽免再置议者三人。

治年按：去年闰八月，即已降谕惩治首祸诸人，然不能满外人之意，故十二月及此月，复行降谕二次，将罪名递次加重，始将此案结束。

四月，谕开经济特科。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往德国谢罪。停止戕害外人之恤天、太原地方乡试五年，府县城镇均停止文武小试五年。五月，派那桐为钦差专使大臣，往日本谢罪。六月，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派亲王为总理，设会办大臣一员，尚书兼会办大臣一员，侍郎二员。七月，定考试改用策论及四书义、五经义，废除八股文，停止武科乡会试及生童考试。八月，谕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七月，奕劻、李鸿章与十一国公使订立和约十二款：一、派醇亲王至德表示惋惜之意，并在被害处所建立牌坊一座；二、惩办首祸诸臣，又昭雪被害诸臣，并将滋事地方停止文武考试各五年；三、派那桐至日本表示惋惜之意；四、诸国被污渎及挖掘各坟莹，建立涤垢雪侮之碑；五、禁止军火进口二年；六、偿款四百五十兆两；七、划定使馆

专界；八、允将大沽炮台及由北京至海滨有妨交通之各炮台一律削平；九、允诸国留兵驻守由北京至海滨之通道；十、将警戒人民、惩办罪人、停止考试、戒饬官员之上谕依次张贴。十一、修改通商行船条约，并改善北河、黄浦两水路；十二、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并变通各国使臣觐见礼节。十月，谕撤去溥儒大阿哥名号，立即出宫。十一月，皇太后与皇上回京。

先生年四十二岁，仍在上海主持《中外日报》事。

是年春初，北京全权大臣方与各国公使磋商和约条款，而俄国忽迳自开出归还东三省约款十二条，交与我国驻使杨儒，随后又移至北京，逼我全权克期画押。第一款云：将满州全行交还中国，吏治一切照旧。而于兵权财权则隐而不言。第二款云：留兵一股，至地方平靖为止。则是还地而不撤兵，较之不还地其害更甚。第三款云：如遇变急，留驻之兵全力助中国弹压。阳为示惠于中国，阴实恢张其兵力，中国须听其压迫。第四款云：中国允于路工未竣及开行以前，不设军队，他日设兵，与俄国商定数目；后改云：中国应与俄商定满州兵数及驻兵地方。如是则中国之军政，须听命于俄国。第五款云：凡将军大员办事不合邦交，经俄声【申】诉，即予革职后；改云：即予调离满州。如是则吾国守土大员须仰承俄国之意旨。第八款云：连界各处，如满蒙及新疆各处矿路及他项利益，非俄允许，不得让他国或他国人，非俄允许，中国不得自行造路；后改云：中国在满洲全境内，如未与俄先行商明，不允他国或他国人造路开矿及一切利益。如是则东三省之铁路矿，将为俄国所垄断。第十一款云：关于铁路之赔款，可与公司商定，将全数或分出若干，以他项利益作抵。如是则又为异时要索额外利益之张本。

约稿传至上海，有识之士，咸知此约一立，必兆瓜分之祸，立致无穷之后患，然无有起而争之者。先生独与蒋性斋智由召集同志，开会演说，力陈俄人之无理，此约之断不可许，激昂慷慨，闻者动容。既复腾电中外，苦口相争。又于报端畅陈其义，西报亦争相转载。其时江督刘制军、鄂督张制军亦发电力争。英、日诸国亦啧有烦言，俄约遂暂时延搁。

治年按：同时先生又上书两江刘制军、两湖张制军、两广陶子方制军模请为力争，其全文已刊入书牍辑存内，兹不录。

治年又按：维时族兄佰唐先生大燮，方以户部郎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供职陕西行在，亦代桂大臣春草奏上陈，于俄人要求各款，痛加驳斥，力陈其不当允许、不必允许之故。当国者即据以电告议约大臣，令与俄使力争云。两先生之所见，盖大致相同也。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西历一千九百〇二年

正月，谕飭裁撤河东河道总督。又谕，飭裁撤詹事府、通政司。

三月，与俄国订立交收东三省条约四款：第一款，为允将东三省各地归还中国，一如俄国未经占据以前；第二款，为中国允极力保护铁路及在路办事各人，并允保护在东三省之俄国各人并各人之事业，俄人即允将在东三省所驻之军，陆续撤退。第一次撤退盛京西南段至辽河所驻各军，并将各铁路交还中国；第二次撤退盛京其余各段及吉林省内外俄军；第三次撤退黑龙江之俄军。第三款，为俄兵未退之际，中国驻兵之数目及其处所，允与俄国兵官筹定兵数，应添应减随时知照俄国。第四款，俄允将前所占据并保护之山海关、营口、新民厅各路交还中国。中国允：一、此路专由中国保护，无庸请他国保护修养，并不可准他国占

据俄国所退各地。二、此路修养，必确照俄与英国前所定约及与铁路公司所立合同办理，公司不得占据或藉端经理此路。三、日后在东三省南段续修铁路或修枝路，并在营口建造桥梁，迁移铁路尽头等事，应彼此商办。四、俄交还此路，所有重修及其养路各费，由中国与俄国商酌赔偿。八月，与英国订立通商行船条约。

先生年四十三岁，仍在上海主持《中外日报》事。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西历一千九百〇三年

七月，设立商部，置尚书一员、侍郎二员。八月，与美国订立通商行船条约十七款。又与日本订立通商行船条约十三款。两江总督魏光燾奏上海爱国会社提倡革命，已饬拿禁，谕飭沿江沿海各督抚，严密查拿惩办。十二月，以日俄失和开战，颁行局外中立条规。

先生年四十四岁，仍在上海主持《中外日报》事。

三月续娶陈宜人。宜人为溧阳陈介人先生翰女，年逾三十未嫁，有巾帼丈夫之誉。先生闻其名娶焉。某月遂偕陈宜人往日本游历。

五月，上海有《苏报》之狱，既将报馆封闭，又拘获章太炎君炳麟、邹丹凤君容诸人，将解入城中归华官自办，而租界诸领事执保护政治犯之例，坚不允从，遂就英租界会审衙门内设特别法庭，而由江宁奉委来上海拘人之道员某君，遂与被拘之章、邹诸人同受审于英领事及会审委员之前。先生以为辱国丧权，莫此为甚。遂致电枢府，密陈转圜之策略。言此事先误颛预，继误操切，竟闹成公堂对质，失权受侮，流弊无穷，且恐被告状师，必将百端指斥，不久且腾播全球，为辱已甚。窃谓宜由朝廷托辞宽

大，诏予轻减，不复根讯，仅命暂禁租界，庶稍冠冕云云。惜政府未能从也。先生复作书上诸吕镜字尚书海寰，时方以会议商约事驻上海，申论其事，全文见书牍辑存内，兹不复录。

光绪三十年甲辰 西历一千九百〇四年

五月，裁撤粤海、淮安两关监督及江宁织造。十月，与葡萄牙国续定通商条约二十款。十一月，裁撤云南、湖北两巡抚。十二月，裁撤漕运总督改设江淮巡抚。

先生年四十五岁，入京补应朝考，授职内阁中书。

治年按：先生自光绪二十年后，久已绝意仕进，至是拟设报馆于京师，将以救亡图存之计，效昔贤之强聒不舍，为政府作忠告，又以无因至前，恐被人疑议，故有补应朝考之举。先生前时曾有书致邹沅帆君，略言北行非弟所愿，以漠然不动之大臣，难与言事也。然此等事尚不尽心，何者方应尽心乎！故千回百转，仍有欲去之势云云。此时盖犹此志也。

治年又按：先生自是年起，时往来北京上海之间，以无大关系，故不琐述。

三月，有德国商人荣华洋行，欲由上海浦东至浙江乍浦海口，再由乍浦至杭州湖墅造一铁路，私与浙江巨绅之子弟立合办之约，具名者为钱锦孙、朱燮、徐文翰、顾浩、袁荣叟、许宝枢诸人，举沈守廉为总理，预备筹款五百万两，中外各半，已在部具呈。然列名诸人皆承袭祖父馀荫，并非从事实业之人，安能与德人合资兴办大工。且由湖墅至浦东，一水可达，又无大宗出产需铁路为之转输，德商欲造此无利可牟之铁路，其意何居？先生时在京得张菊生君书，极言其不便，乃言诸在京同乡诸巨公，告诸部中，力陈其不可行，其事始已。

是年，杭州水陆寺住持僧因故弃寺远颺，杭绅方议将寺改为两浙寻常师范学校。寺僧闻讯，遽纠合白衣寺僧松峰、理安寺僧灯裕，潜恳日本本愿寺僧人，将寺外匾额改名为日本释氏学堂。先生以水陆寺为地方公产，今以可废之寺院，改为有用之学堂，若听其托庇于日本本愿寺，在日本既可借教以伸权，将来杭城内外六百余寺屋寺产，必渐为日本所有，而各寺僧徒亦必渐为日本人之教徒。主权既失，交涉更繁，不能不防其渐，因特联合京官，具文呈部，请为照会浙抚，咨明日本领事，杭中寺院，系地方公费建设，不得为日僧占有，藉遏刁风兼弭祸萌云云。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 西历一千九百〇五年

三月，裁撤江淮巡抚，改设江北提督。四川巴塘番人，戕毙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六月，假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裁撤广东巡抚。七月，续派绍英出洋考察政治。谕自丙午科为始，乡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试亦即停止。裁撤奉天府尹兼巡抚事，又裁撤奉天府丞。八月，考察政治大臣乘火车出京，炸弹猝发，载泽、绍英受微伤。九月，设巡警部，置尚书一员，左右侍郎各一员。派尚其亨、李盛铎前往各国考察政治。十月，设立考察政治馆，谕飭严禁革命排满之说，如有造言惑众，即悬赏密拿，尽法惩治。十一月，设立学部，置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与日本订立新约，承认日俄和约内俄国让与日本关涉中国各事；又订立附约十一款。

先生年四十六岁。是春有美国之倍次忽有承办全浙铁路之创议。在上海一部分之浙人，颇有冀其运动为之尽力者。经在日本之留学生及在京在申之官绅合力抵拒，其事始已。旋公同商议，谓浙江商埠繁盛，非急起直追，筹款筑路，不足以保利权。时先

生适在京，各京官遂公举先生及沈淇泉^卫、张菊生^{元济}、孙霭人^{问清}三君为代表，由先生持公函至上海会同沈、张、孙三君邀集上海诸绅商，聚议多次，共同推举汤蛰仙^{运使寿潜}为浙江铁路总理，刘澄如^{京卿锦藻}为副总理。复由浙省京官具呈商部，请旨允行，是为商办浙江铁路成立之始。

九月，忽有杭人连文^{激横}散发传单，诬先生与张菊生^{元济}、夏穗卿^{曾佑}、叶浩吾^瀚三君借用外款，办理浙路。经先生具呈商部，请电飭苏松太道查究。其后复又呈请催究。略言康年等前于九月间因连横妄出传单，捏词诬蔑，贻害铁路大局，呈请澈究反坐在案。业蒙钧部电致苏松太道查究，詎料连横辗转推托，既不将实在凭据交出，又不肯自认诬捏，致令局外之人，咸不能知曲直所在。惟是连横此等举动，实系有意损害浙江铁路大局，若听其含混，必谓康年等心虚畏惧发露，故不敢呈请传伊至公堂审究，而仅以劝解了事，如此则益得逞其煽惑伎俩，且使全浙之人，咸怀疑阻。不特康年等心迹不能明白，且于招股等事大有妨碍。夫天下之事莫患于是非不明、曲直不分，尤莫患于主持者徒怀苟且调停之见，不肯着实剖晰。使凡事皆堕于昏暗之中，致有理者以诬蔑而不得自白，而无理者转以躲闪而得以自道。此事关系实非浅鲜，敢恳钧部再电致苏松太道，立传连横即连文澄至道署与元济面质虚实。如果实有凭据，则康年等万不敢逃宪典。倘系虚诬，连横亦不能不任其责云云。旋奉批云：此案如果连横有诬捏情事，实与浙省铁路名誉大有关系，虚实均应切究。除再电催沪道迅即飭传审质外，仰即遵照云云。然其后连横迄避不到案，冀避免诬捏之咎，此事遂未能澈究。

汪穰卿先生传记卷四

年谱三

汪诒年纂辑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西历一千九百〇六年

正月，江西南昌县知县江召棠在天主堂自刎，致激动公愤；二月，法国教堂三处被毁，死教士六人，又误毁英国教堂一处，死教士夫妇二人。三月，宣布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事。四月，裁撤各省学政，改设提学使司。与英国订立藏印正约，并将西藏与英国前订之约列入约后，作为附约。七月，降旨仿行宪政，先从更张官制厘定法律入手。又广兴教育、清厘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为预备立宪基础。八月，降旨厉行禁烟，限十年以内革除净尽。并令政务处妥议禁吸禁种章程。九月，更定官制；军机处、外务部、吏部均照旧。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户部改为度支部，以财政处、税务处并入。礼部以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并入。学部仍旧。兵部改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其海军部及军咨府未设前，暂归陆军部办理。刑部改为法部。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工部并入商部，改为农工商部。轮船、铁路、电线、邮政应设专司，名为邮传部。理藩院改为理藩部。除外务部堂官员缺照旧外，各部均改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都察院改为都御史一员，副都御史二员。又增设资政、审计

二院。日本归我营口，订立交收条款。

先生年四十七岁。八月，学部奏派一等咨议官八人，二等咨议官二十五人，先生预焉。兹将名单及照会附列于下：

名单：太常寺卿刘若曾、前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陈宝琛、三品卿衔翰林院修撰张謇、候补四品京堂郑孝胥、四品卿衔汤寿潜、新疆布政使王树枏、湖北按察史梁鼎芬、直隶候补道严复、翰林院侍讲丁仁长、河南道监察御史赵启霖、翰林院编修王同愈、翰林院编修缪荃孙、翰林院编修胡峻、翰林院庶吉士谭延闿、内阁中书汪康年、分部员外郎陶葆廉、候选郎中蒋黼、吏部主事陈三立、户部主事谷如墉、刑部主事孙诒让、光禄寺署正罗振玉、河南候补道韩国钧、黑龙江候补道宋小濂、湖北候补道钱恂、候补道熊希龄、直隶天津府知府罗正钧、陕西凤翔府知府尹昌龄、湖南候补知府叶景葵、候选知府伍光建、浙江醇安县知县屠寄、前安徽祁门县知县夏曾佑、直隶候补知县张一麀、湖北试用知县胡玉缙。

照会。学部会照会事：总务司案呈。八月十二日本部奏派一等、二等咨议官一折，奉旨：“依议。钦此。”查各省士习民风，所在不同，而学务之得失，利病因之。本部耳目心思，诚有不能周遍者，若欲抉其病根，去其壅塞，咨议官其枢纽也。此次奉派咨议，各官才识久著，其于地方学务情形，尚希据实直陈，毋少容隐。曩者风气未开，办理学堂种种棘手，迁就实多。今科举已停，钦奉明诏，为宪政之预备。薄海喁喁，从风鼓舞，教育之趋向，亦当随之而转移。其从前学章有无窒碍，应如何审察中外情势，变通尽利之处，务望详细条议，以裨损益折衷，说议忠言，固本部所愿敬闻也。相应恭录谕旨，钞黏原奏，请烦钦遵查

照办理。须至照会者。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 西历一千九百〇七年

三月，谕将盛京将军改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东三省将军事务。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巡抚一缺。旋谕三省巡抚各加副都统衔。五月，安徽巡抚恩铭被徐锡麟枪毙。七月，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八月，命汪大燮使英，于式枚使德，达寿使日本，均充考察宪政大臣。谕仿设立资政院。九月，谕仿各省速设咨议局。

先生年四十八岁。先生自光绪三十年后，即往来于北京、上海之间，以《中外日报》事委托他人摄理。至是年乃复设京报馆于北京。先生之意，以为报馆与政府距离既近，则见闻自较确实，不致有捕风捉影之弊。而遇有应匡救应警告之事，报纸甫经刊登，易一时即闻于政府，冀可收从谏如流之效，不致有坐失时机之叹。较之设在外省之报纸，虽言之力竭声嘶，而政府仍不闻不见者，其效力实有大小之殊。故毅然有京报馆之设。兹将先生所撰《京报》发刊献言，移录如次：

《京报》发刊之首期，不佞谨弁言其首日：吾国自古无有以一人之言而得传布于天下者，天子之言尊矣，所播远矣，然犹仅达于各部之长官而止。惟本朝之誊黄，乃克遍于直省人人之目，然犹有官吏之阻格，淹滞弗能究也。至于匹士大夫之意见，欲藉笔札以流布于上下远近，匪惟前无此例，抑亦形势不便也。海通以还，林文忠、魏默深先生时译西书西报以饷海内，于是吾国人始知各国日报。同治间香港始出《循环日报》，同光之间上海始有《汇报》，已而又有《申报》，顾或开自外人，或吾国人以日报为商业之一种，姑试为之，固无正当之主意也。旨趣既浅，

力亦薄弱。甲午大创于日，于时上下颇知自危，报界精神亦由之一振。海上旬报、日报先后出版者十余家，其余则惟广州、杭州、汉口、天津有之，然有力之报，犹多假名于外人，且无敢设于都城之中。庚子联军入京，国家受奇辱，于是日人始设《顺天时报》，已而《北京报》、《京华报》、《中华报》先后成立，其余白话报及汇录各报者，都凡二十余家，或起或仆，不可殚详。顾报章虽多，然于时事多未敢深论论之，或辄致殃咎。士之欲以言救人国如是难也。虽然苟以己身为与国无预则已耳，苟尚自知其身为本国之人也，则死且不可避，奚有于殃咎！

夫今日时局之危，灾患之繁，举国皆用为忧念，而稍有知识者，乃怠逸之是务，祸害之是惧，虽于计为得，如本心何？古语有之曰：“堂上不粪，郊草不芸，白刃在前，不救流矢。”处今之时，合同志结团体，力纠政府之过失，以弭目前之祸，犹惧晚也，遑恤其他。然则假发言论之权，以尽己之天职，抑亦无恶于天下欤？若夫以昭昭白日之心，发慷慨激昂之气，言之急，无邻于诡言之平；无近于阿通上下之意。平彼此之情理。所与者必以言助之，虽百訾不馁。理所否者，必以言阻之，虽疆御不避。固将奉以始终，勿致失坠。谨志数语，用审知者。见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五日《京报》。

读先生之献言，而先生特于鞏毅之下，官僚威权极盛之地，设立报馆之深意，昭然若揭矣。其后盖时时于报首阐发此意，至于再至于三，不以为繁也。例如论报馆挂洋牌之不可有云：（上略）。诸君以为吾国今日处若何地位乎？盖累卵不足喻其危，而沸釜不足比其惨矣。吾意政府及社会速警醒、速改革，扫尽旧态，力建新基，犹惧晚也。且东西各国人士咸其国事，争走中央

触禁网捐糜而不悔者，几恒河沙数，而吾国志士之于京师，乃疏之甚。吾意政府惕然于是，宜诱使来尽聚京师，共谋所以存吾国者。若吾报之偶发一直言，讦一秽迹，抨一宵人，乃一极细微不足指数之事，而吾若遽引为大惧，皇皇然将托之外人，不独自示畏缩，且适表明政府必无容直言奖气节之美德，又示各省及海外诸同志必不可复至京师。吾虽懦，敢为是乎。且如是则永与政府相抗相隔，而远于吾所欲为愈远，而上下新旧满汉之间，相离亦益愈甚，吾故毋宁兢懍以俟之也。不然，吾岂不知吾国报馆，进无法律之保护，退无社会之后盾，敌之劲而得援，与我之孤而无助，盖相去万万然，度政府之必不如是而自怯之转以阻人志意也。吾故期期不敢。假使政府不顾一切，而毅然托辞焉以殄灭一报馆，以昭示政府无顾虑祸难之思，无实欲振兴之意，无欲亲天下人士之心，是则自欲斩刈新机，歼划国脉。呜呼！既如是矣，则一报馆之存灭，一人之生命，实可在不足计数之列，则又何必屑屑为此乎。吾故谨书之，以告力能封报馆者。节录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京报》。

又如《论朝廷宜激励国民多设报馆于京师》有云：正言至则邪言日远，邪言至则正言亦日远。政府者宜多方罗致，使四方之有怀欲陈者，悉趋而麇聚于京师，而上之于朝廷，使全国人心皆以京师为依归，而朝廷亦得听采之益。孟子所谓：“夫苟好善，则人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是也。（中略）。今使四方之奇人杰士，莫欲至京师而散处于山巅水涯，或远适异国，而各为其所欲为，如是则京师谓之空无人焉可也。不特此也，奇人杰士之踪迹，不向于京师，则必背于京师，踪迹之向背，即心迹向背之符也。语曰：“日亲日近，日疏日远，于人有之，于地亦然。”

疏远则关系少，关系少则隔碍生，隔碍生则疑虑积，疑虑积则谗慝滋长，怨讟繁兴，一切非意之事，皆由此而起，此必然之效也。（中略）

今骤而欲使国之雄杰尽萃于鞶鞶之下，势实有所不及，若以富贵为招，则来者皆志在禄糈，而于国家无与。今士之至都者，不为官，则为学堂教习，否则以考试无袍言约也。然则不如纵令静整宏达之士，以报馆之名，使首建论议于都中，而布之四方，使都城与各省互相开引，而妄谬欺蠹之官吏，亦有所惮，而不敢肆。以士招士则士至，以言招言则言亦至。士至言至，则天下之人心皆至，如是则朝廷之势不孤，而国事亦有所倚矣。

今纵观天下未有敢以都城为事者也，而偶有一二人焉，不顾一切而欲以所愤懑发为论议，贡之朝廷。语之切直，未及海内外各报十之一也，其揭发奸弊，未及实际千百之一也。然未及二三月，已上下震怒，诬谤繁兴。倾危之士，方欲以术中而去之，而金壬劾奏，大臣亦辄用此为说，务使躬履正直之士，皆将固絀其口不敢复投足于此。夫人之情，处安乐甚易，履危苦极难，人何为不舍危苦就安乐，虽然窃为吾国之前途伤也。

千金买骨则骏马至，毁卵杀胎则凤骥不集。故有国者必慎其所以招也。今天下方睽离怨疾，而政府乃犹大示恶怒于一二依恋未言之人，使之惊慑骇怖，使观望之徒，益用此为戒。吾不知政府所以为国者果何如也。纵言论释群疑，亲附天下之士，是在今日之政府。节录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二日《京报》。

治年按：先生尝上书于瞿子玖相国，略言近来风气趋变，宜速定报律，令准民间开设报馆，如有不协，皆以报律从事。一面知照各国公使，无论何国人在我国界内办报，皆照律办理。如此则

报馆多，多则彼此相角，而是非以辨晰而愈明。又凡欲设日报者，可不必挂洋牌，而忠于国家之论，可日益多。否则麇集于京师者，皆各国之报，皆各国之议论，貽害伊于胡底。此书上于何年，无可稽考，与前数论之意义，大致相同。特附录于此。

又如《闻奉天通报停闭感言》有云：吾今请以数语告奉天官场曰，与其使外人之报陆梁于吾国中也，与其使反对政府之报跋扈于海外也，则无宁使吾国人之报，敢侃侃正言于吾国中之为愈也。（中略）。

诸公亦知今所处何时乎？今所为何事乎？以时局之迫如彼，以事势之难如此，奖励敢言，鼓动民气，为已后援，犹惧晚也。何为必摧折之剿绝之，使吾国人噤缩，而他国人转得大放厥辞乎？

诸公固甚患昌言革命之报猖狂于海外矣，以为近年来，患气之张，实由于此，然何为不速鼓国内之民气，使得以正理自伸，则彼狂怪之论，自无由而入。乃于稍敢言之人，动加疑忌，或思治以罪，如是岂非驱使入于彼党乎？若夫外人设报吾国之大病，度诸公尚未之觉。盖报者全国人之指南，若吾国无足为人信仰之报，而外人乃入而主之，则日浸月灌，吾国之耳目，将尽为外人所移易，其力实甚于火炮百倍。诸公乃纵任之，而于吾国人之报，则频加震怒焉何也？

夫吾国今日之空然觉无人焉者何也？上无名贤硕德以表率朝右，下无端人直士以风厉末俗也。夫国之有士，如山之有虎豹，望而使人畏之，而吾国士气萎靡，无有能发扬志节者。上之人苟知以是为患，而从而扶植之，许各自发其言论，采其可用，而宽其过失，夫亦所以养成士气也。（下略）节录光绪三十三年六

月十九日《京报》。

读以上诸文，而先生尽力报纸之志愿，亦可见一斑矣。

《京报》出版后，先生所著论说，盖日以救亡图存之计，略向政府及国民灌灌而道，其最切实之诸篇如曰《论吾国为无政府之国》、曰《偷安为贫弱之原因》、曰《论吾国今日人心之大病》、曰《书越南人巢南子海外血书后》、曰《日法协约之深意警告政府》、曰《论西报之言警告政府与国民》、曰《论高丽告中国》、曰《再论高丽告中国》、曰《三论高丽告中国》。是数篇者，大声疾呼，冀于中国前途或有万一之挽救，而惜乎其言之不见用也。

《京报》成立未久，即以伉直敢言之故，撻政府要人之怒。盖是时当国者庆王奕劻，以宗亲领袖枢府，握权既久，政以贿成，渎货无厌。光绪三十年御史蒋式惺发其曾以私财一百二十万金存诸汇丰银行，旋派员查办，坐蒋以奏事不实，令回原衙门行走（按前朝故事，枢府政事决于领班王、大臣，汉大臣中虽有不直其所为者，亦不能事事与争，台谏偶有弹章，亦终获咎而去）。是年，则有段芝贵献歌妓杨翠喜于其子载振之事。而奕劻亦于其生辰收受段芝贵寿礼十万两，段遂得以道员躡署黑龙江巡抚。枢臣中如瞿相国、如林侍郎^①，皆力争其不可，而不能得。先生首于报纸发其覆，御史赵启霖旋亦具折纠劾。奕劻自知不容于众论，遂降旨追停段芝贵署抚，又曲从载振之请，开去各项差缺，以掩耳目，而赵卒以污蔑亲贵重臣得革职之严谴。先生迭于报端论其事，一论朱宝奎、段芝贵之罢斥，再论赵启霖之革职，三论载振之开除差缺。言之不足，又长言之。诸宵小遂衔恨刻骨，咸

^① 林绍年，1906年11月入军机处任职。

欲泄忿于先生矣。

事机遘会，一日慈禧太后以奕劻病假偶以继任之人询及瞿相国，此语辗转传说为英国《伦敦时报》访员某所闻，遽发电告知时报，即日发表。顾驻京英使，反无所闻，遂探诸外部，且问奕劻所由黜退之故。英使非有所爱于奕劻，特幸其昏庸贪黷足供彼之利用而已。事闻于慈禧，遂又以漏言之故，不嫌于瞿相。其时直督袁世凯与奕劻素相比附，世凯之党皆因奕劻以进，得遍布朝列。闻奕劻有被黜之讯大惧，遂斥重金贿言事者，乘隙倾陷瞿相以图自固，其弹章举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为瞿相罪。所谓暗通报馆，即指《京报》言，授意言官，即指赵启霖言，阴结外援即指《伦敦时报》言也。疏入，奉旨令孙家鼐、铁良查明具奏。顾又不俟奏覆，即下谕令瞿相开缺回藉。次日奕劻内不自安，复具疏乞休，以掩观听。果降温谕慰留焉。旋孙家鼐、铁良奏遵查各节，请无庸置议，报闻而已。

治年按：近见《国闻周报》第十四卷第五、六期纪光绪丁未政潮事甚详，足与上文所言互相发明，特为移录如左：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政潮，亦清季一大事也。庆亲王奕劻，自继荣禄而为军机领袖，直隶总督袁世凯深与结纳为其谋主，于是北洋遥制朝政，其权力之伟，更远过于李鸿章。时瞿鸿禨以才敏受知，且有清望，帘眷亦隆，与奕劻同直枢垣，遇事每有争持，对北洋则时主裁抑。由是奕劻与之积不相能，世凯尤憾之，而清议以奕劻贪庸，世凯跋扈，多右鸿禨，此为丁未政潮之张本。

三十二年丙午，议改官制，世凯奉命参与，欲乘机行责任内阁制，俾奕劻以总理大臣握行政全权。鸿禨知其意，隐沮之，言路亦陈其不便，孝钦采鸿禨之议，仍用军机处制。世凯大失望，

益衔鸿机。

翌年丁未三月，东三省设督抚，以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并授为钦差大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班居各督之首。奉、吉、黑三巡抚则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也。四人之膺简，庆、袁之力，北洋势力愈伸张。而芝贵以直隶候补道骤署黑龙江巡抚，速化尤可惊，舆论为之大哗。初奕劻子贝子衔镇国将军载振，以按事东三省过天津，芝贵购歌妓杨翠喜以献，至是其事哄传焉。新授四川总督岑春煊入觐，道出汉口，突于是时入觐。孝钦念西行护驾之功，温慰备至，留京补邮传部尚书。未到任即面参邮传部左侍郎朱宝奎革职，党于庆、袁者也。并屡为孝钦痛言奕劻贪黷误国，请予罢黜。庆、袁已大震，而御史赵启霖复抗章严劾段芝贵献妓载振，并十万金贿奕劻诸状。命罢芝贵署抚，派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按其事。以世凯等巧为弥缝，载沣等亦惧开罪奕劻等，未肯深究。四月，以所参不实入告，奉谕革启霖职（当尚未复奏，御史江春霖亦上章谕列，案结后，又劾王、大臣查案疑窦颇多。都御史陆宝忠、御史赵炳麟均论救启霖）。载振不自安乞罢，遂准其开去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农工商部尚书等缺及一切差使。孝钦盖亦不能无疑于奕劻父子也。

庆、袁以瞿、岑相合，林绍年助之，均为清议所归，非去之不能自全，力谋排去之道。乃由奕劻以独对施其技。是月春煊首外简两广总督（广西人例不补授两广总督，春煊前曾署理，今乃补授此缺，非故事也。），擢出国门。绍年继奉补授度支部右侍郎之命，俾罢枢直（绍年曾署邮传部尚书，系临时性质，此次补授度支侍郎，当解机务，故即奏请开去军机要差）。鸿机于孝钦前力请留绍年于军机，以资赞襄。孝钦可之，降谕无庸到度支部

任，仍直枢垣。而春煊以粤督之简，大出意外，引疾恳辞。奉谕：岑春煊病尚未痊，朝廷亦甚廑念，惟广东地方紧要，非得威望素著、情形熟悉之人，不足以资镇慑。该督向来办事认真，不辞劳怨、前在该省筹防，一切深合机宜，是以特加简畀，务当迅速赴任，通筹布置，安良除暴，消患未萌。该督世受国恩，当兹时事艰难，自应力图报称，勉副朝廷倦怀南服绥靖岩疆之意，毋得再行固辞云云。始怏怏出京，陛辞时犹以朝政为言。孝钦意亦尚惓惓云。

五月，鸿机突以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奏劾罢斥。上谕云：“恽毓鼎奏参瞿鸿机暗通报馆，授意言官各节，著交孙家鼐、铁良秉公查明，据实覆奏。钦此。”同日朱谕云：“恽毓鼎奏参枢臣，怀私挟诈，请予罢斥一折，据称：协办大学士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瞿鸿机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余肇康于刑律素未娴习，因案降调未久，与该大臣儿女亲家，托法部保授丞参等语。瞿鸿机久任枢垣，应如何竭忠报称，频年屡被参劾，朝廷曲予宽容，犹复不知戒慎。所称窃权结党，保守禄位各节，姑免深究。余肇康前在江西按察使任内，因案获咎，为时未久，虽经法部补授丞参，该大臣身任枢臣，并未据实奏陈，显系有心回护，实属徇私溺职。法部左参议余肇康著即行革职，瞿鸿机著开缺回籍，以示薄惩。钦此。”语意殊牵强支离，盖不过藉毓鼎一参而行其处分耳（孙家鼐等旋奏遵查各节，请毋庸置议报闻）。奕劻之所以施其媒孽者，据闻乃以戊戌旧案动孝钦也。至七月罢春煊两广总督，同日出绍年为河南巡抚，政潮乃告一结束矣。

丁未政潮之经过，大致如上述。近发见世凯是年四月致两江

总督端方亲笔密札一通，为关于此次政潮极可珍之史料。其文如次：

治年按：袁世凯致端方密札，已用西法摄影铸版附印于后，故不重录。

袁世凯致端方密札^①

午桥四弟大人阁下：上中两旬间奉读三月廿五日、四月初八日并抄件两次惠函，拜聆种切。大谋此来，有某枢暗许引进，预为布置台谏。大谋发端，群伏响应，大老被困，情形甚险。幸大老平时厚道，颇得多助，得出此内外夹攻之厄。伯轩、菊人甚出力，上怒乃解，而联合防堵，果泉亦有力焉。十六日大老独对，始定议遣出。上先拟遣，次日即发表。公举苏龢本意，大老亦在上前说明，颇以为然，但大谋既去，位置苏公必将又松一步。为苏计，大可趁此北来，在部浮沉数月，明此心迹，为将来大用地步。大谋不肯去，十六日亦曾议及，当有对待之术继之。伊眷渐轻，势大衰，无能为矣，不如不来为愈也。举武进、郑、张，上均不以为然，人得藉口谓其推翻大老，排斥北洋为归政计，因而大中伤，武进供给，亦有人言及，恐从此黄鹤一去矣。兄久有去志，甚愿大谋，或武进来代，但大局攸关，受国厚恩，何敢任其败坏也。育公始颇受疑，此次全开差缺，由于某枢耍弄，现已释然。默揣情形，大老决不能动，同班中或不甚稳耳。人心太险，真可怕也！大老心地厚道，事理明白，阅历深久，声望远著，想

^① 原书仅附密札影印件，因系行草，今据原文摘抄，密札影印件删去。

推翻之，何人替代？当今实无第二。两宫圣明，必可鉴及；若辈何不自量耶！匆匆此复。敬请台安。祈即付丙。

如小弟名心顿首四月十九日

孙道建林已晤谈，极干练，甚佩！甚佩！

治年按：右密札五页，中多隐语，非个中人不能解阅者。须详阅下文，庶于彼时内外勾结之情状，可以了然。

此札由端方家流出，现藏章行严君士钊所。观此，奕劻以危词耸听，即谓瞿、岑辈谋重翻戊戌旧案，请太后归政颇显然矣。人得藉口云云，盖不啻自道耳。此最为孝钦所惊心动魂者。瞿、岑眷隆，动摇匪易，以归政为说，实排挤之妙诀也。瞿、岑戊戌前皆尝与康有为、梁启超款曲，鸿机于辛丑间犹力举康、梁，并请解党禁。孝钦虽不恠，而未疑有他，不之罪也。及是，京沪及海外报纸斥奕劻者，与言官所论，若出一口，奕劻辈遂持以耸动孝钦，大抵以瞿、岑外结党人报馆主谋在归政为词，浸润既行，乃借题以发之矣。

札中所云某枢指鸿机，大谋谓春煊，大老谓奕劻，则隐语也。伯轩为世续，菊人为徐世昌，果泉为诚勋，苏盦为郑孝胥，张盖张謇，育公谓载振（字育周），武进谓盛宣怀。

春煊四月十七日授两广总督，与札中所叙十六日奕劻独对事正相吻合。（绍年十八日授度支部右侍郎，十九日命毋庸到任，仍直枢垣。）至云“同班中或不甚稳”，盖微示鸿机将去矣。（世传孝钦曾于鸿机独对时甚露不满奕劻之意，鸿机因请解其机

务，俾保晚节。孝钦颌之。鸿机门人汪康年闻其事。旋外报载奕劻即将罢直消息，孝钦怒鸿机泄漏，奕劻诤知，于是鸿机被参罢斥矣。此说颇盛传也。奕劻于鸿机罢后，即自请罢直，盖试探之意，虽懿旨慰留，而命载沣入军机以分其势。载沣分较亲，惟庸懦不能与抗衡耳。）

方段芝贵暨奕劻父子之被弹也，道路沸然，多谓奕劻宜出军机，春煊宜代世凯督畿辅。世凯所谓：“兄久有去志，甚愿大谋或武进来代”云云，盖得意语，亦痛定思痛之语耳。盛宣怀与世凯交恶，世凯对之亦甚有虞心也。至谓：“大老心地厚道，事理明白，声望远著，当今实无第二”云云。则庆、袁交谊深固，奕劻甘为傀儡，世凯利用之，其作此言，自无足怪。赵启霖辈直声震一时，而谓预为布置，“群伏响应”云云，亦见政敌口吻。

春煊入覲时，面恳开四川总督之缺，并微示愿留京之意。孝钦即曰：“你的事总好办。”又指德宗而语春煊曰：“我常和皇上说，当年若无岑春煊，我母子安有今日！”遂授邮传部尚书。其承眷如是。迨动于奕劻之危词，屏而远之，而犹有念旧之意。春煊行至上海，闻鸿机出政府，意颇迟回，因称疾不遽赴镇，其后决仍莅粤矣，而开缺之谕骤下，盖又被中伤也。庆、袁以春煊虽“眷渐轻，势大衰”，而身膺兼圻重任，岩疆开府，势犹足虑，且东朝对之并未决绝，宜更为斩草除根之计。据闻系遣其党伪为梁启超（一说康有为）与之同在上海时务报馆摄影（或谓即端方承旨所为，一说蔡乃煌），由奕劻呈诸孝钦，以为佐验。孝钦果大恚，遂罢春煊，且谓“彼负我，我不负彼也”。

〈国闻周报〉又附录林步随此札跋文，可资参证，兹移录于次：

西林^①之入都也，面劾庆王贪黷，词甚激切，台官江春霖、赵启霖又先后抗章弹其父子，而汪舍人康年主《京报》讥诋尤力，士论哗然和之，上亦颇为之动。一日庆王以疾乞假，文慎承旨，太后慨然谓奕劻年老，设遂不起，尔试思谁可继其任者。文慎请依故事用近支宗亲，因举醇王，太后颔焉。此事为庆王及袁督所闻。袁、庆素相结，朝士趋炎以图自贵者，京津之间，交午无虚日，闻之大恐。西林掌邮部未履任，即劾罢侍郎朱某，到部以后，又严汰冗滥旗员。赵侍御弹贝子载振，虽获罪而载振卒不敢恋栈。初北洋候补道段芝贵进女伶杨翠喜于载振，秽德彰闻，袁实阴主之，遂得骤简黑龙江巡抚。文慎、文直皆侃侃以为不可，而庆王已纳其贿，悍然不顾也。诂意卒为台垣所论劾而罢，若辈既自危，追求其故，以西林素为文慎所厚，汉大臣中两公皆得太后旨，非两公联翩去位，若辈不能安枕。又以江侍御、汪舍人为文慎门人，赵侍御为邑子，疑弹章必文慎授意，于是密为倾陷之谋，以事报复。首以文慎与西林意在复翻戊戌前案，排去北洋，谋归政为词，其词危耸，且依约附会，颇有迹象，最足中太

① 林步随跋文于“西林之入都也”之前，尚有一段重要文字，本书略而未录，现据《国闻周报》第十四卷第六期补录如下：“光绪壬寅以后，两宫岁常以春夏园居。三十三年丁未，西林入都授邮传部尚书，余时方以词曹兼部属。一日西林幕客高君啸林走告曰：“闻昨日召见军机之后，庆王单起，此事何也？故事，枢廷独对，必有非常处，君常在瞿相邸中，宁有所闻邪？”，余愕然无以对。高君谓：“此事关系至巨，宜急往淀园面叩其详”。余诺之。次晨驰往，文慎（瞿鸿禨卒谥文慎——编者）方退食。余如高言以叩。文慎喟然曰：“为赞帅耳！”（林绍年字赞虞，时任军机大臣，卒谥文直——编者）。盖林文直在枢廷以方鯁取庆同列非一日，上意亦不悦，庆王独对，即为承旨摈文直出军机也。旨下，授文直度支部右侍郎。故事，军机大臣本秩已跻二品，出授卿贰，显为左降，大骇听闻。文直以边省巡抚骤入政地，实文慎左右之。及是，文慎为之力请，乃收回退出军机之命，更降旨不必到部。不知者以为文直危而获安，为文慎得君未替之证，而不知非也。”

后之忌。文慎尝自恃得君密，请赦还康、梁，至于再三，积前后事，遂颇有疏疑之意矣。是日庆王之独对，盖即密陈此说，先去西林，使复督粤。文慎忠而忘危，竟未之觉也。事后朝士始知之。今观袁与端手札中，果有大老独对，遣出西林及“某枢不稳”之言，并所进“排斥北洋”谋归政之说亦具在焉，不啻俯首自承。此事本出密谋，外间虽能揣知其情，初无佐验，及见此函和盘托出，遂成千古信谏矣。

说者多云汪舍人泄漏文慎奏对之语以致祸，其实当丁未春夏之交，庆王眷已稍衰，观西林之留京，载振之开缺，朝士已微知之，无待于泄漏。此盖若辈中伤之计已售，特假某词臣一疏，摭暗通报馆一事，以为发难之端耳。文慎忠谨素著，得君最专，岂有倚信七年之久，忽因漏一言而获罪。况文慎之与庆王不协，上意亦非不知之耶。某词臣此疏出侍郎杨某手笔，先欲贿台臣上之，皆惮清议无应者，继重赂某，始得上焉。其事宣传，鞏毅士庶无不知者。文慎罢相出都之日，由部备专车，朝士赴车站送行者甚众，而杨某亦与焉。趋跄之际，忽悚然却行数武，见者愕然称异云。

袁督初求媚于文慎，无所不至，尝自言当修门生之敬。文慎拒之。继又请为昆弟交，亦不纳。是时京师权贵家有婚丧，辄由北洋公所委员供应帐饮之费，已成事例。乙巳文慎为次子授室，援例以请复进贺仪八百金，皆谢却之。袁既绝意于结纳，不得不谋排挤矣。

丙午议改官制，袁入京主张最多，全案几皆其一手起草。文慎与司核定，隐操可否之权。袁亦知之，曾密请先示意旨。文慎阳为推让，袁不疑也。及奏上，竟用文慎言，不用内阁总理制，

而令军机大臣不兼部务，于是鹿传霖、荣庆、铁良、徐世昌一日并罢。文慎与庆王独留，袁大惊愕失所望，而朝列亦自此多侧目，不及一年，遂不克安其位矣。文慎与袁齟齬，一在北洋创办印花税，一在北洋新兵归陆军部直辖，而官制亦其一，皆意在削袁之权也。七年之中，虽未尝大行其志，而献替实多，《清史稿》本传云：“持躬清刻，以儒臣骤登政地，锐于任事。”颇得其实也。

治年按：先生设《京报》于京师，意以为害马不去，则良政治不得而建立，故对于奕劻搏击最力，固谓巨慙既去，而依之以为奥援者，将无所恃以藏身，庶几朝列清明，时局犹有可为也。不意后来适得其反，奕劻之禄位，既自此愈固，无人敢与为敌。袁世凯之势力，亦自此愈咨横，大有举天下莫余毒之意。时事固已无可言，而先生之希望亦遂无丝毫之存在矣。此事关系至巨，故特详叙其始末，并援引《国闻周报》所载以为佐证。

是时有识之士，咸为《京报》危，且为先生惧。然先生初不为所慑，时则奕劻诸人，方嗾使其所谓机关报者，颠倒是非，大肆其邪说，以与先生为难。其言曰：政界诸公，馈仪物赠婢妾，不过个人交际之常，何为纷纷论说，攻讦个人之私事，至再至三而不惮烦也。先生则作论以斥之曰：报施者个人交际之常，然即以个人而对于社会，亦有报施之道。政界诸公，乃以己之禄位，为在上者之私以施己，即不得不私以报在上者，利其私以报也。于是不问其职守之尽不尽，而惟较其所报之厚不厚。在下者既识其用意之所在，于是先图报而后望施，使其所施之从而加厚，遂致国家之禄位成为报施之品物，社会公共之政府，成为个人交际之私界矣。夫人未有不好利者也，一人倡之而所获甚厚，则必有十

百千万人焉，以则效之，且必后胜于前，以博上之所欢，此优于彼以投上之所好，千方百计以搜罗之，乘间投隙以献纳之。金银也，珍宝也，均可以仪物概之；美妓也，女伶也，均可以婢妾概之。而所费之资，亦层递而加增。始则一献纳仅数千百金焉，已而数十万金矣。然试问此馈赠之资，从何而出乎？则曰举债。从何而偿乎？则曰得官。得官之后，应得之禄入必不足以取偿也，则惟有亏蚀国家之帑项，敲吸小民之脂膏耳。且近更有举及外债者矣，外债之取偿，必许以特别之权利，是直卖国耳，则其贻祸于社会岂浅鲜哉！即曰或有斥己财以为此者，然投本必计利，吾决其效果必与举债者等。

至就收受者一方面言之，似专系个人之私事矣。然既收受之，则始也不能问其能胜职守与否，继也不得问其能尽职守与否，终也明知其放弃职守甚至贪赃罔法，亦必设法包庇，以留彼我余地。是馈赠者之贻祸于社会，皆收受者之有以纵之焉。且即谓无损于社会，而就个人私德言之，则政界诸公，亦不得有馈赠收受之行为焉。夫既投身政界，则皆有执行政法以治人之权者也。治人者必先自治，治人而不自治，不但无以服受治者之心，且恐其识力瞽乱，倒行逆施，而有所不顾。故非政界人而有私德之失，则实为个人之关系。报章可不必干涉政界诸公，而有私德之失，则已为社会之关系，报章万不能不为纠正。以其与社会有间接之利害，不得混合者，然亦不能割分焉。按之法律有个人得为之事，而为政界诸公所不得为者，职是故耳。既就自由而论，个人未入社会，则可为适意之自由，既入社会，即当为守法之自由。守法之自由，而可以国家禄位为人己报施，竟与与受同科之定律显相违背也哉。矧政界诸公既有执行政法之权，必先有辨

明法律之识，知法犯法，律有明训，故一有馈赠收受之事，台谏必具折揭参，朝廷必委人查办，而犯法者必运动查办之人，为之弥缝掩覆。如子所言，则竟可愒置而不问，直认而不辞焉。用此纷纷，为乃必使报章于此绝口不道，方称为完美，则报德何在？报识何在？监督政府者何在？谋社会公益者何在？鄙人不敏，所不敢知已。（下略）节录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五日《京报》。

又论政界之趋势，谓社会当舍私意持公论，其言曰：（上略）。今之屑屑焉颦蹙相告以政界风潮为言者，其果出之何意乎？为其所党耶？悯其见败耶？为一己地位之变动耶？为政界运动之易方耶？吾甚叹吾国人对此往往舍是非得失之正，而本于一己之好恶，或由于一人之利害，断言之曰，非为己之私，即为人之私耳。夫既已私矣，则必造作种种言说，以簧鼓上下之人心，使朝廷之赏罚，社会之毁誉，皆失其正而后快。于厥心慷慨直陈者，可谓之密承意旨；立身为国者，可谓之自谋优地。甚至不斥宵小之乘机窃位，而反斥据实纠劾者为紊乱国是；不斥奸蠹之坏法乱制，而反指举直措枉者为用舍靡定。不特形之口舌也，且有报章为发表焉。欺朝廷欺社会，而社会于此亦大率吠影吠声，各于其党，各从所好，于是一事而论者且二三其说焉。呜呼！如是而欲定立宪之基础得乎！

吾故谓政界趋势之所定，关于朝廷者半，关于社会者亦半。吾甚愿继自今吾社会中有志于是者，先舍其利害之私，继舍其意见之私，终则舍其好恶之私，而一切朋友情谊之私，皆不与焉。宗旨正矣，则博其听采，精其审察，公其评判，然后虑其方法，立宪之基础，其在是乎。往者已矣，吾不能不冀夫来者。节录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十日《京报》。

又作论以直斥某报曰：（上略）。报者监督政府者也，监督社会者也。其立志至尊，其处地至崇，其握权至高，其力之所至，至普遍迅疾。虽然报馆则独可无监督乎？报馆而无监督，则凡奸慝金壬，皆得借以济其所欲，将以其倾邪不正之言，诬惑社会，簧鼓人心。不特此也，又将借社会之力，以成己之所志，而去己之所忌，则报之为物，乃反以祸人家国矣。

国家何谓治、何谓乱？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是之谓治。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是之谓乱。有道之时，是非明，公私辨，人无回曲，直道常存，邪枉之言不足以惑众，不敢肆然出诸口，不敢宣诸大庭；有敢于冒不韪者，将为社会所排斥，不得齿于士君子之列。无道之时则反，是其最甚者，莠言敢公然布于众，而一时所谓正直人者，反切切私语于室中，其区别乃判断若是。

今日之事，亦可戚之甚矣。处监督政府监督社会之重任，辄明目张胆敢为回邪之说，指鹿为马，反黑为白，以大乱万众之听闻，方且磨牙砺爪，鸣其得意。魑魅现白日，而豺虎号通衢，务使人心剔除是非二字然后快。盖其阴有所倚，而亦揣无人敢为反对，故如是也。

呜呼！纍然孤立于群枉之中，而欲厉其百折不回之气，矢其至死不变之心，使是非正而公私辨，以徐伸其作民气、振民心、定民志之大愿。其何以自存立乎？呜呼！是在不死之人心，是在长伸之士气。节录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一日《京报》。

右文数篇陆续发表后，仇视《京报》者乃愈甚，必欲倾覆之而后快。先生亦知其然，故有：“上下震怒，诬谤繁兴，倾危之士，方欲以术中而去之，而金壬劾奏大臣，亦辄用此为说”之语，然终不以是自馁，发言伉直如故。七月十七日，外城巡警总

厅忽以一纸公文勒令停闭，文中亦不言其理由，但言“奉民政部谕，〈京报〉馆著于本月十八日起停止出版”云云。于是，〈京报〉遂告终矣。海内志士咸为悼叹。梁星海君时在湖北，作书唁先生有“发指皆裂，心伤涕零”之语。则当日正人之重视此报，盖可知也。

先生是时于中外骯法营利诸人，亦列举其非，抨击不少。今可考见者如曰〈论粤督限制报馆〉、如曰〈论驻使固请仍用旧制之非〉、如曰〈论札派黄开文为东三省森林总办事〉、如曰〈敬问东三省借外债四千万之理由〉。是数篇者，皆足使被论诸巨公切齿腐心不已。或有以恶直丑正实繁有徒为先生讽者，先生悉不之顾。此亦〈京报〉早被倾覆不能持久之一端也。

是年五月，皖抚恩铭被人刺死。先生盖甚不以为然，作论以非之。其文如次：“取不适之事，不深虑其难，贸然此劝彼勉，以为有如是之事，则国顿兴，否则亡。呜乎！是何所见而遽操如是之论欤。吾国政府暗于时势，钝于机宜，拙于应付，吾民之起争之，争之不得，而固争之，宜也。若夫出于暴动，成于流血，甘为戎首，而使乱机由是而发，祸患由是而滋，且也无有要求之目的，无有仇杀之主名。若曰是有权者，是有责者吾杀之，则足以震动全局，且以成己之名。是其所为有如欧洲无政府党者，徒乱秩序扰治安，是在欧洲且不可，而吾国少年欣欣然慕之。前日遂演此惨剧于皖省。呜乎！吾国在位之人，方病疲软畏葸，矜而导之，强而就之，犹可也。急言怖之，则反而却走，深闭固拒，而不敢复与天下有志之士通问讯。则必愈隔绝愈废弛，愈衰頹，而国事愈无可希冀。自戊戌以来，朝廷之于国民，方近而遽远，欲前而忽却者屡矣。而考其故，则大率由新党急于自用，不

肯稍忍须臾，引之过甚，而遂至相绝。呜呼！吾国所处之地至危，而可如是欤！（中略）且如是，则上下愈相疑，疑则上下不敢用。度外之人，行度外之事，采度外之策，必至人才无一登用，新政无一举行，上下坐以待亡，而莫或拯之也。呜呼！是岂为之者所及料欤！是不明于中外异情，彼此异宜，而贸然为之，以召祸于当时，遗憾于后世，如是亦何为欤！节录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京报》。

先生自始即提倡游学日本之说，其论政治亦时时以效法日本为言。盖以为日本相去较近，本为同文之国，往彼就学，自属便利。且日本以变法而自强，尤为吾国所宜取法也。故时咸以先生为亲日派。然先生于中日之交涉，凡有损于中国者，必随事指摘，不稍宽假。如曰《论日本要求在奉吉内地杂居之误》、如曰《日本公使复外务部言抚顺煤矿事驳议》、如曰《论日本僧人至中国传教之非》，固于中日交涉甚有关系之文字也。

治年按：《京报》创始于是年二月十五日，迄于七月十八日，始终仅五阅月，然先生于此报用力至劬，且影响亦至巨。故特为详记之。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西历一千九百〇八年

七月，谕飭查禁政闻社，拿办社员。八月，宪政编查馆、资政院奏呈宪法大纲。又奏呈议院未开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十月，帝崩，慈禧太后崩。授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以醇亲王之子溥仪为嗣皇帝。十二月，袁世凯开缺回籍。

先生年四十九岁，在上海主持《中外日报》事。是年夏，江苏新兵有在崑山夏驾桥捉赌枪毙平民之事。事后地方绅士二三十人具呈为新兵辨诬，中有前山东沂州府知府丁立钧。然先生固与

丁君相识稔，知其逝世已久，遂于报端发其覆。未几有电致报馆谓，为丁之兄立鍈之误，然人名容可误书，顾以逝者之头衔，加诸生人，则实为旷古奇闻。未几而丁立鍈有亲笔信致报馆，则谓乡居多年，从不闻外事。新兵捉赌事固不知，夏驾桥在何处亦不知，更无列名公呈迭发电报之举云。先生更于报端发其覆，以为丁君之名，既出于假托，则他人之名，能否免于假托，殆不言可知。而新军之枪毙平民，应否予以辩护亦不言可知。而主持新军者遂怒矣。至六月，有某君以论稿投报馆，题为《金陵十日记》，极言南京军政警政之腐败。某君固先生所素稔，其文亦剴切动人，先生遂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之例，为之刊于报端。于是南京军界、警界咸大怒，遂激怒江督端午桥制军方，电致苏松太道蔡伯浩观察乃煌，盛气诘责。蔡君与先生本旧交，且于报馆亦向有股份，至是乃以股东及行政长官之资格，手具一稿，属曾敬貽君交与先生，属为照式缮写。其稿约分三款：一、承认前所登之论说实系错误；二、此后报中不得有讥评南北洋之论说；三、报中记事如有损及南北洋之处，须先将稿交彼阅看。先生坚不允，曰此腕可断，此稿不能照缮也。纷纭许久，蔡乃属曾君向先生声言，欲即飭租界会审委员，将报馆发封，并以已用印之公文相示。继又言，欲先生将报馆让出，交彼派人办理。先生不得已，遂于七月中旬将报馆让出，于是竭群策群力辛苦支持几及十年之报馆，遂于此终了矣。蔡自攫得报馆后，接办者非其人，成一非官非商之报，销数遂一落千丈，敷衍三年，至辛亥年终遂停版。

宣统元年己酉 西历一千九百〇九年

二月，降谕明白宣示，一定实行预备立宪、维新图治之宗

旨。闰二月，特设各省清理财政监理官。三月，谕将庚子年被罪之立山、徐用仪、许景澄、联元、袁昶予谥。五月，开复翁同龢原官。降谕皇帝自为统率海陆军大元帅，未亲政前，由摄政王代理。七月，与日本订立吉长铁路借款合同，又订立安奉铁路合同，又订立东三省五案条款。颐和园八品苑副永麟绝粒自尽，预缮遗疏上摄政王。九月，各省咨议局开幕。日本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韩人刺死。十一月，设督办盐政大臣衔，其产盐省分，各督抚均授为会办盐政大臣，行盐省分，各督抚均兼会办盐政大臣衔。十二月，各省咨议局议员，呈请速开国会。奉谕不准。

先生年五十岁，某月与湖北王侃叔君慕陶合力创设海外通讯社。先生在京主其事，其欧洲方面之事，则王君主之（时在比国使署）。

治年按：吾国自海通后，从无向各国宣传之举，亦不知有所谓宣传，与各国报馆并鲜有联络。故各国报纸所载中国之事，非得诸教士之通函，即采自各类人之报告，于吾国例多丑辞。一旦有事发生，无论大小，他人之腾布于各国者，若宣告、若电讯，率皆直彼而曲我，是彼而非我，而我乃无所凭藉以宣布其实在情形。是他人有喉舌，而我无喉舌也。事实上之失败，固不待言，即欲得舆论之扶助，亦不可得。先生深悉其症结，谓当力挽其弊。王君亦甚表同情。于是有海外通讯社之设，凡朝中政治、国际交涉之应向国外宣布及申说者，率由先生具稿，寄与王君。最重者即发电相告。王君得讯，即转达各国报社，亦深得各报社之重视，争相登载，暗中获益，实非浅鲜。兹将先生致各督抚之公函，照录于下，藉可知此事之原委。

窃维各国办理外交，所以能应变不穷鲜有败事者，非特其见

识之远，制裁之精，布置之密也，于各方面，尤必布设机关，既以考察各国之趋向，亦使本国与外国交涉之事，先以其事实宣之于各国，使各国瞭然于两国是非曲直之所在。如此，则万一事有变动，于各国剖断上，犹可占一胜着，而我亦有执以辨白之根据。其法或托之本国之报，或托之外国著名之报，要以能使多人信服为主。我国初未计及于此，故遇交涉之事，各国无有知其真相者，或反据反对者之报告以为评论。于是有我直而人以为曲，我是而人以为非。即各国报章，载我国政务，大率道听途说，甚且肆意诬蔑。今年有比国使馆随员王君慕陶，创设通信社于北京。通信社者亦欧洲报馆之一类，而实握各报之枢机，大率社中不自出报，而专探重要消息，售之于各报，既得信用，则各报即据以登载。吾国于欧洲无发布消息之地，各报馆遇有疑难之事，亦苦于无从研究。故王君此事大为报界所欢迎，开办不久，即已风行。俄、美两国之大报馆，且逐日据以发电。前者□□^①路事起，初时□□人撰一论，以英、法、德等文译登于各国报章。各国人专看一面之词，谓我国不依条约。□□不得已用强横手段，咸直□而曲我。逮王君得此事实情，复撰一文辨正，令社中所延英、法、德各主笔译成各国文字，送之各报。各报纷纷登载，而舆论始有知□之恃强无理者，各报著论訾议□□^②者亦复不少。（中略）此社专为外交而设，从前各省有事，各国报章往往以不得其详之故，不能先行登报，致反为他人所先，甚至曲直倒置。兹特托某常驻北京办理通信之事，如贵省遇有交涉事件，敢请于事起时，即飭所司，将实在情形函告敝处，即当随时转达比京本

① 原文如此，下同。

② 原文如此。

社。至如何交涉，如何结束，亦乞逐节详示，俾不至失真。倘遇重要之件，函寄万恐不及，即请发电详示敝处，亦可即日电达北京，庶得占先登报。此系为便利交涉起见，特行函告，敢望察酌施行，至为祷盼。

附录王君说帖……①

兹又将王君迭次致先生书，摘录数通如左，藉可略见办理之一斑。

宣统元年 月 日来书（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到）：远东通讯社现重新组织，刻已就绪，局势较前略为扩张，交通亦更灵活。陶于俄则离日，交于英则说以利益，于德则诱其野心，于美则激以荣誉，皆分道设法。有效与否虽不敢定，然于日本在欧之外交，必有所牵制，亦未始无涓埃之助。此次西藏事，外部有电来，通讯社为发表，舆论甚赞许中国，尤以派兵一节，为外交上之胜利。

宣统二年二月十八日来书：日来因西藏事，函电甚忙，舆论上大得助力。开平矿事，当择要宣布。

同年西历五月十一日来书：远东社极发达，信用亦日见坚固，现方拟创办一法文杂志，当愈增言论之势力。此时譬之有外交而无甲兵，终不痛快也。英王薨后，英政治更动摇，爱尔兰党势力最大，可以左右两党之间，彼党最反对日英同盟者也。远东社交通爱尔兰党之报最多，此次可以利用矣。法人现发起一最大日报，每日出十六版，当为全欧第一大报，其中有一版专记远东事。陶欲与之联合，而以远东社记者握其记事权，将来可望为完全之机关也。

① <说帖>略。

同年西历五月十一日致熊秉三书：远东社在欧方大发达，势力倍张，欧美各报登载中国事件，几十倍于前。最近西藏问题、粤汉借款问题、锦瓊借款问题、东三省日俄问题、湖南饥民问题，颇收舆论之助。

同年 月 日来书（七月初十日到）：前日英《巴黎时报》访函，毁诋中国太甚，屡次与之辩论，卒得其著论谢过，然其语外仍含微讽，此吾本有可议，讳之不能也。《巴黎时报》在欧陆之声价，实重于《太晤士》，得其篇首之论文，至不容易。此次得其标题，势力大增，转辗抄传，遍于欧陆。

同年西历七月二十四日来书：今岁万国杂志公会开于比都，各国皆有代表到会。陶因法文杂志及通讯社关系，本为其中会员，后复蒙派为国家代表，到会后，会长提议请组织一中国新闻常会，以便接洽。陶即以通讯社各友及法文杂志各主笔组成，而以兄及朱季贞、黄远庸、陈冷血四人介绍入会。此会成立后，可以与万国记者接洽。欧美大国无论矣，如土耳其、波斯以及南美各小国，均有人到会。此会分杂志记者与日报记者二部，今日为杂志记者集议，下星期则日报记者集议也。

附录熊秉三君致先生书：远东通讯社事，王侃叔曾以相托，弟以彼之机关太少，难望敏活，乃函请四川、广东、湖北、吉林、黑龙江、浙江各省督抚资助，得复函已允每年津贴。款项既有所恃，乃设上海、奉天等处通讯社，以与欧洲相接。闻北京系我公办理通信社事，未悉经费果有若干，如其不足，弟可拨助。乞将尊处情况，迅速见示，并拟一预算经费，以便设法拨济。此后各处通讯社统一章程，尚望拟一详章。上海业经派员承办，奉天亦在议设。兹将草拟简章呈阅。弟事太忙，无暇及此，所以求

我公等切实筹画，弟力所能及，无不效劳也。

治年又按：海外通信社之组织，始于何时，无可稽考。观王君宣统元年 月 日来书，有“远东通信社现重新组织”之语，当创始于宣元以前矣。大约至三年，因经费无着，遂即停办。

汪穰卿先生传记卷五

年谱四

弟诒年纂辑

宣统二年庚戌 西历一千九百十年

正月，西藏达赖喇嘛乘夜出奔，降谕革去喇嘛名号。广东新军肇事，与官兵大战，枪毙百余人，阵亡十余人，余众悉解散。二月，汪兆铭谋害摄政王未成被获。三月，湖南省城饥民滋事，焚毁巡抚衙门及教堂、学堂。五月，各省咨议局再请速开国会，降谕不准。七月，浙江铁路总理汤寿潜，奉谕革职，不准干预路事。八月，韩国并于日本，改号朝鲜，韩亡。九月，资政院第一次开院。十月，因各省督抚电请速颁宪法，组织内阁，开设议院。又各省咨议局均呈请速开国会，特降旨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谕飭京外解散请开国会之代表。十一月设立海军部，置大臣、副大臣各一员；裁撤陆军部尚书、侍郎，改设大臣、副大臣各一员。十二月，英国派兵进占云南片马。

先生年五十一岁。十月设《乌言报》于京师，是报月出六纸，撰著编辑校对发行皆一人任之。时先生患膈疾已久，或劝其勿自苦，先生笑谢之曰：吾即以是为疗疾之药耳。兹将是报第一期之小引，附录如次，藉可知先生创刊是报之深意。

闭户养痾，胸历年岁，耳目所触，时复刺心。欲吐之耶，于事何敢；欲嘿之耶，于心何忍。姑藉小纸，抒我寸衷，名曰乌

言，义同献曝，深愧析薪之无力，差异衔碑之不语，若夫知我罪我，吾宁恤焉。

例言 一、本报义取询于刍蕘之意，名曰《刍言报》。一、本报以评论及记载旧闻，供人研究为主，不以登载新闻为职志。一、本报间亦将前数日各报所登最重要及最刺心目之事，摘要登载，以资警告。其新闻情节为各报漏登者，间为补入。一、本报每期报纸分为八小叶，又分为内编、外编。内编之目，有咨告、针诘、评论、辨说、记载，研究，皆关涉时事者也；外编之目，有调查、杂录、事案、文件、掌故、杂考证，则或不尽关时事矣，破碎支离，大雅谅诸。一、本报不登告白，然如有人以家刻私刻书籍，无论旧书及新编译之本，又无论丛书单行及刻板、石印、排印，并不论卖品、非卖品，均可送登告白；惟官局商家所印，则不在此列。一、我国固有及新出之天然品、制造品，各省陈列，略见一斑，惟各处苦未尽知。兹本报定一例，如有以物品及价值函请登报者，即当送登告白，不取分文，惟物以合销为贵，价以实在为贵，至望鉴及为荷。

以上两条所载，如将来汇订成书时，仍编于后，以广流传。一、本报因近来各报立论，或有失之偏宕之处，亦有但言此一面而未言彼一面者，又有因外交及种种因由，当时未便揭载，日后亦未及补正者，然各地研究之人，或因而有误会，甚至滞于闻见，而智识不能增长，心思不能圆活，殊于实际有害，故时因管见所及，随事说明，或并为纠正。窃不自揆，敢附争友之列，阅者谅之。一、阅报诸君，如有时论或以平日有关政治社会之事见贶，则敝报极所盼望。盖敝报虽期疏而纸小，然将来必将逐期所出之报汇订而为书，故记载颇有关系也。一、本报为事既简，需

费无多，故并无筹款之事，亦决不以报之名义与人通函，特为声明。一、世界之事变无穷，一人之精力有限，议论既难免舛误，记载尤不无失实，大雅君子，匡所不逮，则幸甚矣。

诒年按：先生发行《当言报》，其眼光至为远大，其言论初不为一时而发，而于朝野上下各方面，则固有深切之警觉与纠正。彼时清廷秕政，若不恤人言造成皇族内阁也，若政以贿成公然以官为市也，若大借外债不顾其后也，先生固已随事指摘，不稍隐讳矣。彼时士大夫又有一种流行之风气，对于外人率主张用强硬政策也；又由于至深且久之习惯，不尚气节，不重廉耻也；又有如学生不受管束也，军队不服从纪律也。先生尤讼言攻之，不遗余力。至若关于民德之问题，关于民生之问题，则尤至再至三，反复讨论，实为立国根本所关，千古不磨之文字矣。上列诸论，已编入遗著中，¹ 流传犹未广，拟更撷其精粹，勒为一编，公诸当世，垂诸永久焉。

诒年又按：当时章一山君²致书先生云：

现今一班舆论，系随报纸为转移，京朝大老，又以报料为经济。自贵报初出，而所闻议论中有平正通达按切时势者，察其根据所在，皆出贵报。故望贵报多销一分，则我国多一分公论，亦挽回世变之要也。又严又陵君书云：《当言报》出，读其议论，如渴得水，如痒得搔，果社会尚有一隙之明，得贤者苦口药言，略以挽颓波制狂吠，则真四万万黄人之福耳。（中略）速观足下言论，则朝阳鸣凤，出诸羸病之夫，毅然与怒潮恶风相抵拒，又心平气和犁然意尽，故不觉面发赭而首垂地耳。

又林万里^①君书云：近今言论界，较之从前，只见其退化，

^① 林万里即林白水，事迹见本辑《林白水传》。

既不能造健全之舆论，反随不健全舆论之后，相与附和雷同。只思博人欢迎，推己销路，而是非之真，从未顾及。报馆记者既无经验之可言，又无学识之足录，其迎合社会心理，揣摩社会风气，无往而不用其滑，以此而言办报，诚至可哀矣。大报独辟蹊径，为全国报界之明灯，时对同业下其棒喝。下走尝谓世界有专制之政体，则有卢骚、孟德斯鸠以倒之；世界有积非成是专制之舆论，独无卢骚、孟德斯鸠以倒之？今大报可谓报界之卢、孟矣。（下略）

观以上三书，则《当言报》之价值，略可知矣。

宣统三年辛亥 西历一千九百十一年

三月，署广州将军孚琦被革党枪毙。广州革党轰击督署，死者数十人，总督张鸣岐避免。四月，颁布内阁官制。宣布干路国有政策，谕飭度支、邮传两部筹拟收回商办干路办法。以端方充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订立粤汉、川汉两路四国银行借款合同。五月，湖南反抗干路国有政策，并声明湘路力能自办，不甘借债。降旨不准。四川亦反抗干路国有政策，请暂缓接收。严旨不准。咨议局联合会力陈亲贵不宜充内阁总理。置不省。六月，直隶咨议局复力申前议，请另行组织内阁。降旨：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议员不得干预。闰六月，广东水师提督李準被革党枪伤。七月，川民续开保路大会，川督诱拘咨议局局长蒲殿俊多人，将杀之以示儆。川民万余人赴督署请求释放，被轰毙数十人，川省本城及邻县民团数万人围聚城边。电飭川督赵尔丰分别剿办，并严飭新旧各军及时扑灭。又飭端方带队入川，务须申明纪律，并即沿途晓示居民。起用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办理剿抚事宜。八月，湖北革命军起事，推黎元洪为都督。起用袁世凯为湖

广总督，以岑春煊为四川总督。九月，广州将军凤山被革党轰毙。资政院劾奏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违法侵权，激生变乱。降旨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以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各路军队。下诏罪己，取消内阁暂行章程，俟简贤得人，即命组织完全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谕开党禁。自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及犯政治革命嫌疑者，悉赦其既往。准内阁总协理大臣奕劻等辞职。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颁布宪法信条，择期宣誓。袁世凯内阁成立，推举各部大臣。十月，署川督端方行至资州，为军士所杀。监国摄政王辞职。以袁世凯为全权大臣，派代表南下，与民军代表在上海开议和局。十一月，谕克期召集临时国会，公决政体。民军选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

先生年五十二岁。是年清廷有更改中外官制，设立责任内阁之举，先生亦甚注意其事，故《刍言报》中言之不已，又再三言之，至于今日，尚可见此举之甚有关系也。特为择录数则如次：

凡变法必须具决撒手段，方可有成，若敷衍此，又周旋彼，虽万年不能变矣。今欲立责任内阁，而三人骈然并列。欲以内阁总统各部，而各部仍欲直接奏事。欲使各省直隶内阁，而各督抚不欲失向来之威权。清理财政，则但能略减成数，而冗费冗员不肯用辣手淘汰。如此为之，亦何贵变法欤！见宣统三年四月初一日《刍言报》。

今年吾国最重要之事，其在改定官制欤？此事范围至大，内容至复杂，非一时所能尽。惟最要者，则在中央集权及各省分治之说也。太偏于中央集权，则势必不能举，且各省权力顿减，督抚之气概才如道府，不足镇压一切，于内政外交，有无数窒碍之处。太偏于各省分治，必至省自为政，各不相顾，且渐成藩镇之

状态。故欲斟酌二者之间，有其利而去其害，方足巩固吾国之新基础也。见宣统三年正月初六日《乌言报》。

今者改新官制，内阁之于各部，中央之于各省，督抚之于各司之权限，皆极困难问题也。前二者人皆知之，其最后一事，则人或未知者。盖不使督抚得干预各司之事，则一切呼应不灵，且亦无以统率各司，块然居其上，若缀旒然。若各司之事，而皆禀命于督抚，则各司适为督抚指挥之人，与旧日司道之于督抚何异？且如是则各司皆无权，而仍须担承责任，则事必不行，此事亦极宜斟酌也。见宣统三年二月十一日《乌言报》。

内阁总理大臣者，即相也。古则宰相之职至重，且必以一人膺之。春秋时列国必有相。（中略）。政事得失，咸相任其责，国之安危荣辱，咸相肩其任。秦汉以后，君或下侵相之权，又或引词臣小臣以夺相权，又或以外戚宦宦而争相权。惟至本朝，则一切皆皇上亲理军机，但如书记官。近数十年来，虽亦有须参预之处，然弄权则有余，执权则不足，遂致以堂堂大国，而规模反不如春秋之小国，甚可叹矣！

至若亲贵不得干预政事，其说则明著于《中庸》所载孔子对哀公语矣。孔子言治道，莫备于对哀公之言九经。九经一修身，二尊贤、三亲亲。而言亲亲之事，不过曰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绝不言假以事权。盖亲亲之道，不过如是而止，必不能以要职重权烦之，致反于亲亲之道有碍。圣人之言，固推行百世而无弊者也，何今竟并此忘之欤！见宣统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乌言报》。

吾国二千年独立于世界，古昔圣哲，垂训立教，所以植国基跟君权者，其事至多。即如古人有言曰：天下者，天下之天下，

非一人之天下。此语之范围，君上至矣，故天位天禄皆与天下共之，无能自私也。自古及今，无有言权要之官，专归皇族握把者。纵有一二破格为之，然上之则不能垂为法制，下之则不能著为学说。隋文帝怒杨素曰：我是五儿父，若如公意，何不别置天子儿律？以周公之为人，尚诛管、蔡，我诚不及周公远矣，安能亏法乎！以是观之，皇子与庶民盖齐等也，而顷者忽以大权属之贵族，此何说以自解乎！见宣统三年五月十一日《乌言报》。

专制改为立宪，头绪千万，大要必为改良政法也。然以吾观之，则更逊于前。何则？从前军机中无亲贵也。夫军机大臣不过备顾问宣诏令，才抵一书记长，而亲贵尚不得为之。今之责任内阁，则古之相也，而乃以亲贵为之，何欤？从前各省兵事属提镇，财政吏治属之藩司，刑名属之臬司，学务属之学政，虽机关未尽合宜，然督抚仅能总其事，而不能有其权。（中略）今中央集权之说，悉以此诸权收归于部，于疆臣固多不便，且有于势实不可者。而如疆臣之意，则直欲并兵权财权及种权而有之，是直如列国矣。各国联邦尚未有如是者，节宜调剂，吾甚望诸定外官制者。见宣统三年六月十六日《乌言报》。

向之病旧法也，曰凡国之政法，当由中央直达于各省之有司，故一气贯注，一国如一身也。吾国则不然，凡事由县达诸府，由府达道，由道达省之督抚，司道层层节制，而咸足以相牵制。至中央有命令，则下督抚以递及州县，而咸可阻阁。且从前之制，各司由朝廷特简，其不职被劾，朝廷或派人查办，不必尽如其言也。而督抚有大过恶，各司可联名劾之，故督抚诸司无全权，而兵权则尤轻，以有提镇也。今闻新外官制，各司全辖于督抚，如属吏随时可劾罢。每省四面有四道，道之待属官，与督抚

之待各司同。其下为县，县之于属吏，亦同于督抚、道。如此则督抚提挈一省之权，盖与一国无异，较之从前之督抚，殆有甚焉。其于行政之道，果有合欤？其于中外相维之故，果无弊欤？敢以质之议官制者。见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一日《乌言报》。

治年按：彼时宣统冲龄践阼，醇亲王以天子之父，膺监国之任，初无弘济艰难之略，三数亲贵乘机窃位，盘踞要职，造成皇族内阁。其行事则方假借立宪之美名，以涂饰天下之耳目，先生危之久矣。故迭论之如此。

今有一事至要至切近，而又至易，非若定官制、立责任内阁、颁新刑律、开国会之烦难也。是何也？则凡新简督抚及行政长官，不可使因简放要任，而增巨大之债务也。盖债务增，不特筹还有碍于事，且以负债之故，须分心于无益之地，而因债主之多，复须位置其私人，则害于事大矣。此事惟政府能处分之。往者不可谏矣，来者其犹可追。见宣统二年十月二十六日《乌言报》。

治年按：彼时政以贿成，悬价售官，殆已公言不讳。官愈大，则索赂愈多，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皆所不顾矣。故先生特以为言。

治年又按：王君蘧常所撰《沈寐叟先生年谱》，言时疆吏多以贿进，公独未尝有馈遗达权要，故三年署藩不得真除云云。此亦为彼时贿赂公行之证。以治年所闻，则沈谱所言，尚是婉曲之辞，实则某巨公遣人索赂于沈君，许以真除，且诒以如能过于所索，则不久可坐致封疆。沈君拒之甚力，又知既拂其意，必被中伤，故即毅然乞退云。

治年又按：金息侯君梁所著《光宣小纪》有云：“锡文诚

公^①自闻武昌之变，颇自奋发，廷议以公督陕，召见决策，而枢要索贿八万金。公作色曰：生平不以一钱买官，况此时乎？竟改授热河都统，谓备北狩。而公预保张锡銮为晋抚，闻致贿四万，竟先得赴任。值此日此势，当轴犹忍索金，真全无心肝者矣。”读此数语，彼时政府贪婪昏愚之情状，可以想见。宜先生特切实言之也。

二十三日奉谕旨，不许再请短缩国会年限，意喧哗之徒，必且忿忿。顾以吾思之，则朝廷实欲力行宪政，九年预备，已极困难，何况又提早至宣统五年。国民而果有实事求是之心，则方宜休于预备之无实，而不应冀其进行之过骤。何则？天下事至繁赜，断不能一蹴而几〔就〕，若谓国会朝开，国势夕振，此语但可给三尺童子。盖以吾中国现状，非上下皆从实际下手，而持之以五十年之恒心，必不能以见效。而今者上下皆持速化之见，一若侈录章程，改换名目，已可达希望之目的者，是真吾所不解也。

弹劾政府，再弹劾政府，或曰嘻逢怒甚矣，或曰阴阳薄而雷雨作，事其济矣。顾余别以一种眼光观察之，则余忧乃未艾也。夫当国家屯蹇之时，朝廷深以为忧也，而将下交于国民，而志士起而应之，激动国民之爱国心，以济国家之事。若朝廷怠忽其事，而国民奋然而起，志士起而应之以要求朝廷以改政体而振国势，吾国于此二者，不知居何等也。至若忧国之士，奔走号呼，纵不能上下交孚，而非有以喻乎上，即当有以喻乎下，所谓信而后谏，信而后劳其民也。今诸君子于此二者，果占何等欤？若夫政体改易之实际，自皇室至国民，所得之苦乐，今之主持之者，果皆能令其澈底洞悉，不至遇事检章，同于曩者之动查例载欤！至

^① 锡良清末任东三省总督、热河都统，卒谥文诚。

于非常之事，将使摇荡河岳，震动世界，则事中之人，必有平时为天下仰重，身系安危而名徼四远者，揜拄其间。如是不特亿兆倚为轻重，即在位之人，亦不敢稍存忽视之心。今岂已有其人欤？然则今之所争，正不在彼，而在此也。见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刍言报》。

无国会则国虚，无政党则国会虚，此固然矣。然国会之不设，可责诸社会，可争诸政府；若无政党，则必不能号呼以求之也。有党魁斯有政党矣，有声望资格足为党魁之人，斯人奉为党魁矣。党魁之质料不一，然而有必要者数事，忠义奋发不顾其身也，魄力雄厚能包含一切也，至死不变屡蹶不悔也，宗旨一律无更变也，诚实不欺无虚伪也。如此则人皆欲助其成，虽欲不为党魁不可得已。若夫自命魁杰，而以私党之心谋国，以把持之道营业，外清内浊，以所得不正当之金钱起家，而乃以新自标，心迹奇诡，忽则欲以保全政府为目的，忽又乘乱称兵为至计。如此纵以权谄之术，得私人之推戴，而后亦必覆。夫取散漫瘫痪之国家，而欲使之振作，此大事也，非可凭虚架空为之也。不憚时艰，不顾身危，出而任天下事，此实事也。非可点染烘托出之也。从事国会者其审焉。见宣统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刍言报》。

诒年按：其时政府之不可救药，既为人所共知矣，而所谓国民者，又日以速开国会聒于政府，顾既无众所共戴之党魁，即无主持国会之政党，则即使立开国会，其又奚益与政府相争者，殆未之思也。故先生又论之如右。

四月，清廷宣布干路国有政策，一方面议将商办干路收回，一方面即与四国银行订立粤汉、川汉两路借款造路合同，于是粤、鄂、湘、川四省舆论大哗，先后开会，集议起而力争，并以路

亡国亡之说相恐动，势非推翻国有政策，不足以平众忿。顾其势乃不可行，先生有忧之，特于报端发为持平之论，不附和众议以博浮誉，不掩没事实以期补救。今日读之，尚足见先生之苦心也。为类叙之如次：

或曰铁道民有之说，君力持此说乎？余曰：吾无以言也。夫所谓民有者，谓其招股商办也。今各省皆于未招股之前，举绅士为总、协理，而学界中人为之羽翼，后即招集巨股，而前之总、协理盘据如故也。虽有股东会，不能伸其意见也。是则于商办二字不合矣。铁路者商业事也，既云商业，除招股外，无第二策也。顾何以租股、谷捐、米捐之纷纷乎，是又于招股二字不合矣。况各省筹款难不能动工者，其总、协理以下坐耗薪水如故也。筹款易者，则争角剧烈，糜费尤甚。于是七八年之久，集款一、二千万，仅成路一二百里者有之；集款数百万，仅成路数十里者有之。而用人之冗滥，采办之侵蚀，与官办无异。夫如是吾安能主持民有之说乎。曰不主持民有则必主持国有之说矣。曰铁路国有，此于体势应然也。虽然吾亦不敢主持也。盖今之奏铁路国有者，即是改绅办为部办，实则借洋款办也。以路事之要，财政之困，借款造路，孰曰非宜。顾必款无滥支，工无虚旷，行车收入，莫敢侵渔，如是则可以每年溢利归还借款。虽然，此可得之吾国官场乎？官场睹大利所在，必百端谋朘削之，必使大半入己之囊而后已。如是则路之所入，永无馀存，路款无馀，则借款不能还，或别借他款还之，而新旧各债，如塗塗附，而吾国且亡于债，吾故亦不敢主持国有之说也。见宣统三年五月初一日《乌言报》。

干路收为国有，各报所大诟病。然干路国有，本为应然之

事，特于既许商办之后，骤然收回，不能令人无望耳。虽然朝廷于此亦出于不得已也。吾国人惟当注意于收回后之法，哓哓争此，殊无谓矣。且各报于各省用款之虚糜，权利之争竞，成路之无期，何不一详论之，而策其究竟。乃徒以阿徇数十百人之所谓舆论，以为得计，国事其何赖矣。租股、谷捐本非筹款之正当办法，不能不谓之病民，特民不能言耳。皖之米商，哓哓者屡矣，川民之困于此，去年京中各报已书不一书，谓民之乐从，殆不可也。至于民力今已尽矣。浙稍殷富，而竟不能续缴股款，然则情形已至强弩之末矣。综观各省，大率办事之人少，而因以为利者多。即有一二尽心于是者，非为人挤去，即忿急而死。总之归国有借款而办，或有完成之一日，若划省绅办，恐百年无成。以无款则办事人坐糜薪水，款多则人人涎金而起相攘夺也。

借款办路一事，今皆集矢于盛尚书，顾不闻南皮^①之事此已久乎。或曰此草约也，废之易易耳。噫！草约而随意可废，则何必订草约，且草约之订，前后年余，中更数变，磋商校勘，舌敝唇焦，而谓肯一旦弃之乎？此等事不能施之齐民，而谓能施之国际交涉乎！又况若吾国之与英、德、法诸国乎！世人徒知以从前赎回粤汉铁路及山西福公司、安徽铜官山矿为说。抑知七百万也，二百七十万也，二十余万也，吾之受亏损甚矣。吾国人徒知得于此，而不知已失之于彼，亦可谓暗矣。况彼之肯如此以未获利也，假使已获利则彼必不肯矣。吾国人不肯深究事实，而易视一切，吾不知吾国人何如是浅也。

前者格杀勿论之廷寄，大为各报所诟病。夫以表面言之，则国家夺民之利益，而又以严重之语为压制，诚不能无讥。顾试读

^① 张之洞，直隶南皮人。

上文，则固指暴动言也。民争地方之事，而至暴动，若不以强力制之，则将任其撤衙署劫仓库，致酿大乱乎？惟此事本不当入之廷寄中，廷寄但言已定政策，民间不必妄争可矣。若至暴动，则警察自有应当之办法，不必逆亿〔意〕而言之也。至各报摘出此语为诟厉，如出一辙，使不知者见之，类似有意挑激民间，使怨恨国家者，是亦不可以已乎。至某报以朝廷此次对于川人厉，对于湘人平，谓为不敢于强，而敢于弱，一若欲各省皆起与朝廷为难者，良所不解。见宣统三年五月十一日〈乌言报〉。

近来之事有甚不可解者，各报诟国家将干路收为国有及借洋款至矣。顾于各省办理不善，何不一及川之乔湘之余，各报皆大以为诟病也。今乃并不论，岂以前承办者如此，以后决不至如此乎。鄂、湘集股甚微，既不能筹于前，岂转能踊跃于后乎。房捐、租股非民所乐，时见于报，非可掩饰也。粤得股二千余万，善矣，然何以七八年之久，仅成路百余里乎？借款之事起于张文襄，亦出不得已也。草约久订，不能撤废，报馆中人不应不知也，而乃为种种诬蔑之语，非欲激成政府与民间决裂之局乎。假使果因此而起乱端，岂于该报独有利益乎。蒙有猜焉，请辨其惑。见宣统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乌言报〉。

所为商办铁路者，以民间有殷实之商，集资办路也。现已无款矣，则何云商办；若借则何必商人，又何得复名曰商办。按此事吾国上下皆未明白。夫所谓商办云者，乃国家许本国之商人，以此为营业，而路则当以每一路起讫之地，为一公司；所造之路之起讫，而非以省为断，以致东与东面之省割一路，西又与西面之省割一路也。吾国人眼光乃不然，不以此为商业之事，而以为国家赐与本省人之大权利。问其殷实之商人，无有也。问其能集

股之有名望人，无有也。惟全省绅士中有权势手段者，盘踞其中而已，由是生种种误会，种种争竞，种种恶果。今则有因路事而成大乱者，有以借款办路为应然者，继此而往，吾不知尚有若何变幻也。见宣统三年八月十一日《乌言报》。

铁路之干路收为国有，其是非利害，姑别置论，各省绅商，果不谓然，向朝廷直捷辨驳可也。知事已无可挽，则思补救之方，使款不虚糜，将来清还较易，亦可也。且吾极知各商之断断以争再三不舍者，其宗旨固在存吾国，而非在亡吾国也。今如粤之挤大清、交通两银行，湖南之拟停纳租等事，是直欲顷刻致国家于亡，而忘国亡于己亦不利也。且忘如此办法，转与本来宗旨不合也。昔有弟兄相争者，弟不胜而怒遽毁其积聚，而不知兄不得食，己亦从而饥死也。且各省不知草约早定，无法能翻悔；又不知自前年以来，四国至外、邮两部提不，一提皆托故延迟，以至今日，乃反以为旧事重提，遂为此自杀之事，岂不大可怪乎。见宣统三年六月初一日《乌言报》。

近来吾国有至可怖之象焉，则为对于国家显然呈抗拒挟制之象，各国民间不悦其政府，固亦时用强力为要求。顾一方面力争于政府，一方面又以保护国家为心也。今吾国乃不然，例如干路国有一事，各省争之犹有说也，乃百计以求摇动大局，旁溢横出。至如粤省，必求挤倒大清银行然后已，而操言论机关者，方恐其为之不尽，而历举湘、汉大清银行放存款项，嗾使依样轰闹，一若惟恐不即乱者。至政府不许电局递争路之电，以民气莫伸而争之可也。乃如川省因政府将撤换电局委员，而相约抗拒，且以新总办至，必置之死地为恫吓，如此直是叛民矣。此等情态，逐渐加甚，则大乱成矣。见宣统三年六月十一日《乌言

报》。

铁路之干路收为国有，质言之，则是将各省民办铁路之局面，全行改变，而另易一种办法也。各报于此訾论不一。窃谓与其竞空言，不如求实事。实事维何？曰审察合同之办法及减少费用而已。减少费用，以少用冗员为第一要义。吾闻津浦之合同，较京汉为有斟酌，而费用乃大增。是何也，冗人多，冗事多，于是冗费多，其害仍国家受之也。故余以为华官但须使司弹压购地可矣，自馀一责之工程司，如是则工速而费转省也。见宣统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乌言报》。

报载湘人争路，而龙君璋谓须知俄人在东省修路之状，我华民种种痛苦，不胜枚举，财产为其所略，房屋为其所焚，性命为其所杀，尚欲逞其强硬手段，夺我土地。法人承修云南铁路，筑炮台，扎洋兵，著著进行，此可为湘路之榜样者也。云云。按干路收为国有及借款造路一节，其是非利害，姑勿具论。若龙君之举俄、法为说，则不可不辨。盖法于滇，俄于东清，为外人要求而得之路，主权几尽在彼；德之胶济，日本之南满，亦如是，故名为交涉铁路。若其他之借款造路，则主权全在我，若京奉、京汉，何有路权落人手之事，岂可以俄、法为说。余甚恐今者既混为一谈，则始之妄以俄、法为戒，而以畏俄、法者畏之，万一仍用借款，则将误以俄、法为此例，而以让俄、法者让之，是将凭空使借款者为路之主人翁，岂不可虑。见宣统三年五月初六日《乌言报》。

借款自造铁路一事也，借款而即由有债权者造路，又一事也。至若被要求而许其造路，则更不同矣。吾国人乃并为一谈，而路亡国亡之说，譟于全国，不其怪欤？抑尚有打破后壁之言

焉，假使吾国善自为谋，绸缪谨慎，虽借款无害也。若夫上下相猜，政法错乱，虽路矿尺寸不假手外人，而一旦祸发，则一切将全入外人之手，所谓“杀汝璧其焉往者”也。吾国上下，其重思之见。宣统三年六月十一日《乌言报》。

六月，学部招集京外教育家及本部执行教育人员开中央教育会于京师，会员共二百余人，先生预焉。会长为南通张季直君，副会长为海盐张菊生君元济，江安傅沅叔君增湘。部中交议者，有军国民教育咨询案。同时会员提出者有唐蔚芝君文治之提倡军国民教育，有王□□君鸿文之实行军国民教育。先生曾拟一修正案，呈诸会长，其文如次：

读唐君提倡军国民教育议，于全国尚武一层，极为注意。惟康年窃谓此事，在精神不在形式，在根本不在枝叶。小学生注意体育，已足立尚武基础，若又于教科书中备列历代帝王之勋烈，名将之才略，武士之勇敢，游侠之气概，则人人勃发矣。又告以强敌之凭陵，兵气之挫衄，交涉之受困，则人人忿激矣。更惕以强权之日甚，外患之交至，灭亡之惨酷，则人人惕惧矣。夫习闻于武烈之故事，而又加以忿激惕惧，复壮健其身体，练习其筋骸，则人人具雄武之气，一旦使学习武事易易耳。且人之大患，在无内心学问也，政治也，经商也，无不以内心为重。军事何独不然。今吾国之学堂，已甚嫌其喧嚣哗噪，如更令其从事于打靶拳棒等事，则神散而不聚，气泄而不敛，驯至妄动于家庭，哗噪于市府，甚恐利未得而害先见。且乡镇小学堂，必多下等社会人家子弟，习气本不纯良，若更公许习此，则将以佐其私斗。始而两党相斗，继而两村相斗，而掠市店、闹官衙，皆势所必至。且既云普及，则全国相同，将来一片牵连，互相联络，祸患必不可

胜言。大部提倡此事，自宜严定其鹄，预防其弊，否则一发难收，地方官禁之不能，纵之不可，如何处之。康年不敏，实深愚虑。谨议。

会长得先生说帖后，未即宣布也。其后先生复于会中发表其意见，其文如次：

本会员于教育上素少研究，不过对于这个军国民教育上也有个意见要请教大家。方才有人说我们中国现在危急，非如此不足以图存，然而总要在精神上讲究，不能专在事实上讲究。这个议案通共六条，都是办法。本员以为总要归结于精神方能有效。譬如要练将，十年八年才练出来了；要练兵，三个月六个月就练出来了。虽练成了，还要他能用号令，能知团结，方能有条不紊，要动则动，要静则静。现在我们中国的学堂情形，言之真堪痛心，各位试思现在我们中国的学堂，那一个学堂的学生能够遵守堂规，服从命令，这是各位所晓得的。前天这个议案，意思本是不错，不过办法有点不善。

先生又云：这个军国民教育，是与征兵相表里的。征兵之政，到汉朝就很为难。现在英国其人服从长上之性，比中国大得很，而征兵之法，犹且不能行。

先生语未毕，会员中有因先生所言听不清楚，请大声发言者，遂未竟所言而罢。其后先生又自起一稿，携至会中，托人代为朗读。其文如次：

前日在会中因军国民教育事发表意见，惜因病后之气力衰微，不能达其说，今特将欲言之案写出，请人代诵，乞诸君谅之。

本会员衰病之余，本不应预此盛会，但思现在大局急迫，苟

有所见，何敢藏着不说。况当此紧要关头，人人应该划除成见，互相补益，所以扶病来此，一贡所见。

军国民教育，现在自然最要紧，但诸君热心爱国，切须先将各种现象看明，方可下手。军国民教育是医文弱的一种圣药，殊不知我国学生何曾专病文弱，他们的气是浮嚣的，他们的心是骄纵的，总之是庞然自大，不服管束。试问如此性质，若再教以武勇之事，岂非火上加油？药是好的，可惜他们还用不着。此等弊端，皆由十年以来，不能注重小学所致，而管小学之人，一味屈从学生，不在管理上用心，以致全国学堂竟是一般弊病，岂不可叹？所以现在仍须各地管理学堂之人，要用水磨功夫，将学生气质调习好了，方能从事武勇，否则未能学走，先要学跳，恐怕不妥。

前日听见有几位会员说，现在列强相逼日甚，惟有赶紧令全国习武，此是诸君但见外侮之可惧，而未见内地人家子弟之一切情形。况且办事均有一定的层次，不将根基修好，就想用揠苗助长的法子，恐怕还要闹糟。

现在时局固然危极了，然招架此事，还是要仗外交。依本会员之意，则靖内乱尤急于御外侮。盖今日各国所以能不即下手者，以相持不敢先动耳。若果动手，则不特此等稍加练习之学生无所用之，即我新造之陆海军，亦安能一战？但是各国虽不即动手，若我国一有内乱，则伊等借端保护，争先动手，我国将全行糜烂。因此之故，我国各处绅士，一面须作学生之勇气，一面又须防遏乱萌，则所云军国民教育，更不能不出以慎重。

本会员尚有一说，若我国向来办事，果能做一件成一件，即不能十分圆满，却总有七八成的成色，那就再加入军国民教育，

有何不可。所谓底子好了，要如何便可如何。现在各省略涉新政之事，诸君想皆明白，试问以如此杂乱无章之景象，若不量其宜否，骤然又添一种特别之事，宜乎？否乎？

再，教育是各种政务的一部分，军国民教育又是教育中一个题目，所以说到教育，要顾到各种政务，说到军国民教育，又须顾着教育的全体，倘将全体抛荒，而注意一端，岂不是糟极。

诸君须知各处学堂通病，道德懂得少，中文能的少，其余学问亦敷衍而已，只有体操一事，却都高兴。因为此事有趣，又不必用心之故。既然如此，学堂中还须叫此等学生懂教化，肯用心，方可再及其余。

须知本会员亦知军国民教育是急事，但须从根本做起，又要有次序，方能有好结果。

先生又自跋其后曰：按今年学部开教育会，余名列会员中，顾以病后体孱，不能往，后闻会中方主持军国民教育，余以兹事有利有害，万一不慎，一发难收，则为患滋大。乃草修正案送会中，数日未得消息，而初七议及此事，余乃扶疾往，强为演说，累数百语，即有人大呼，宜大其声，方可此说，乃大足窘余。俄而闻会长对众谓：汪君前有修正案在此，与今所言同，其意无他，不过谓不必打靶不必学拳棒而已。噫，此二语而括余之所言，岂不遏抑太甚欤！且不以余之修正案宣布，余固无如会长何。初九复至会，则书所欲言，请人诵之，并诵前之修正案，虽未获谅于人，顾语则已达于同会诸君，余亦慰矣。然各报例于异己之言，概不登录。故登此二文，以质同志。

诒年按：彼时学部及唐、王二君，惕于国难之严要，国民之孱弱，毅然提出军国民教育之议案，其意甚盛，而先生顾不赞成

其办法。

又按：当光绪二十四年时，先生曾撰一论，题曰《宜令全国讲求武事》，刊于《时务报》中，其目有六，其属于士民所能为者：一曰宜速自筹办民团，一曰宜设立联武会，一曰宜设立奖武会。先生之主张尚武以救国，其意固极恳挚也。今于军国民教育之议案，乃持异论，不知者几疑为前后易辙。然使比而见之，则知先生之意，固始终一贯，特不欲使学问未成，血气未定之青年学子，轻于一掷也。

治年又按：唐蔚芝君所撰先生传，末言辛亥之夏，学部广征名流开教育会。维时废经之说已盛行，先生力持正议，谓读经关系世道人心，决不可废，侃侃争辩，众人非之而不顾。云唐君与先生同年至好，且同为会员，语当不诬。且以先生平时之论议及节概言之，其于废止读经一案，当必有争议。顾今阅中央教育会全录于此案赞成、反对两派之言论，载之至详，独先生所言，乃未之见，则不解其故矣。

治年又按：是年闰六月二十六日，《当言报》内有一段云：日前京津时报载刘君廷琛劾中央教育会通过小学堂废读经一节，幸奏入留中，不得逞其奸云云。按读经与不读经，此各执一理，吾不能责该报也。惟该报于此而遽以奸目刘君，则大可商。盖主持不废经，无论如何必不能加以奸字之目。夫开会集议，而剖决其应行与否，固许人之有异同云云。似先生虽反对废读经之议，然于主张不读经者，亦未尝不许为有理，此固心平气和之言也。

治年又按：近人王蘧常所作《严几道年谱》，言严君在中央教育会演说，读经当积极提倡；又谓学校读经，自应别立一科，而所占时间，不宜过多，宁可少读，不宜删节，亦不必悉求领

悟。至于嘉言懿行，可另列修身课本之中，与读经不妨分为两事。盖前者所以严古尊圣，而后者所以达用适时云云。盖亦反对废止读经者。然会议录中，于严君之演说亦未载，知有被其删削者矣。又严谱中载严君答或人之言曰：“寒家子女，少时皆在家塾先治中文经传，古文亦无不读。非不知辞奥义深，非小学生所能了解，然于祖父容颜，总须令其见过，至其人之性情学识，自然须俟年长乃能相喻。四书五经亦然，以皆上流人不可不读之书，此时不妨先教讽诵，能解则解，不能解置之，俟年长学问深时，再行理会，有何不可。若少时不肯读一过，则终身与之枘凿，徐而理之，殆无其事”云云。严君主张读经之意，盖尽于此数语中。先生之意当亦不外乎此。

诒年又按：以今日学校课程之繁多，时间之短促，欲使学生遍读诸经，其势万有不能。然窃谓《孝经》、《论语》、《孟子》及《诗经》之前半部，实不可以不读，卷帙无多，并不多占时间，又大率理深而语浅，但使教习善于讲解，学生亦不难领会。此固民彝物则所寓，不容不恭敬奉持者也。自废经之议实行后，至今二三十年，其为害于人心风俗者，实不为不巨。以诒年所闻见，则有前妻之子，公然向法庭控其父匿其亡母之奁资不肯给彼者；有已嫁之女，控其母霸占家产不分与彼者；又有在外之游子，忽诬其年已五十之母为有外遇，议欲断其奉养者；人心之坏，至斯而极。彼主持废经者恐不能不负一部分之责任也。

诒年又按：是年六月二十六日，《当言报》有一文论试办义务教育事，为列如次：

二十四日京津时报，辨学部试办义务教育议案，谓义务教育即强迫教育，既用强迫教育之法，则绝非用劝导而用强力，今乃

标其题曰义务，而冠其首曰试办，是学部大臣之宗旨恇恍未定也云云。按报中所言，极为正当绳切，学部大臣亦极是。综言之，殆谓学部大臣不能放手办事，而有涉于纤徐躲闪耳。顾其中有一至难之故焉，则无论何处之州县乡镇，其地方公款足取为小学之用，殆无几何，甚有不能得十之一二。试思一面强民间小儿入学，一面无多数学堂可备无数小儿读书之用，则当事者可奈何？况乎吾国入官之途太滥，于是稍见秀异之人，无不庆弹冠而去，冗员盈于京外，而办事之人乃大耗于乡。夫款既难足，人又不敷，则学部即欲用强迫之法，各省官绅悉能按规则办事，而事之无济一也。如此则一面又欲行普及教育，一面又须顾及筹款用人，则使各地方主持教育之人，徐为布置，积渐推广，而不能即时一概施行，此殆有不得不然者欤。

诒年按：右论盖亦作于教育会开会期内，特为类叙如右。

七月，川省骤然起争路之风潮，其后乃愈演愈烈，最先集众开保路大会，散布自保商榷书，商人罢市，学堂停课；未几有纠合数千人聚集督署请电阻督办铁路大臣端方带兵入川之事。同日咨议局正副议长、股东会长、保路会会员有被川督拘系幸免被杀之事。川督又有枪毙廉聚督署内外若干人，复令骑兵冲突人丛，死伤若干人之事。未几则川省城外有聚集数万人四面围攻之事。川督则先有电奏，川人意图独立，并将约期起事，幸先期侦悉，将首要擒获之事。其后则又有电奏剿办民团情形，自言连战七日，擒斩甚多之事。声势甚厉，远近惶骇。此与后来之武昌革命，不相关涉。然人心既已震动，时局实受其影响。先生实预知其可危，故报端论之至详。兹为全录于下，既以见当日之情事，亦以见先生之苦心也。

第一论 川省对待政府干路收为国有之事，近竟酿成罢市，驯致暴动，汹汹之势，未知所止。此事政府不于事前妥密筹备，而猝然发令，以致群情惊疑，及反对之形已成，而不谋晓谕解散之法，而惟以单筒强制数语，而欲使川省乱机，即由此而化为乌有，是犹南辕而北其辙。综而言之，吾国政界中人，既不得不因大势之所趋，而行用新法，然行新法而用旧手段，固未有不愆事者也。近事已急，为政府计，惟有不动声色，速派川省所最信服之大员，驰往慰抚，将朝廷不得已之故，剴切详告，商一妥善办法，是为正理。倘不此之务，而惟思以严重之命令，威吓之举动，或禁止开会，或拘捕首列之人，则必致愈激愈固，且适与反对者以弹毁之资料，又畀匪徒以煽动之机会。即不至此，而皆能如政府之望，而人民屈于力，而心则不服，怨恨之心，愈衍愈广，此在今日人心若离若即之时，尤为可虑。至此事所重，尤在派往之人，而其人未必即为政府所喜，然当此艰棘之时，政府岂可再蓄私怨，滋疑忌，致误大局。政府以救急为上，必不至出此。

尤所切戒者，则当轴之人，万不可不详筹对付之法，而先内自相乱。我国向来习惯于作事谋始之道，初未研究，发言者不深求可否，而辄言之，听言者亦不察其是否而辄行之。若事机稍顺，则必争向人言，自以为功，而此数人之徒，亦各归功其所推戴之人。倘有不顺之处，则必速自脱于指摘，而尽移其咎于人，而人亦互相诿焉。此等情形，不特为局外人所笑，内既疑贰，则对付之法益形松懈，甚至各求见好之方，至此则或反为局外人操纵，而事局益陷于可悲之境。故凡值此事势，则主其事者，必尽弃同事之恶感，而协谋妥办之法。至事已弭平，然后取于事有碍之人，谋一处理之方，此办事之常道也。见宣统三年七月十四日

《乌言报》。

第二论 川中之事，吾辈至断绝意念。何则？欲民气之胜欤，则声势滋长，渐至四方响应，于前途至为危险。欲官之胜欤，则无论如何，至少必杀人千百，是皆不知所云，然而死者冤矣。且民气壅遏过甚，一旦怨毒之发，亦非国家之福。欲其解散而就平和之理处欤，则又处于万不能之势。今乃闻有官兵屡胜之说，此事已成无可奈何之局。惟有一事忠告政府，须知兵胜乱民，已不为荣，若持枪之兵，而击无枪滋事之平民，则尤为不幸。今无他法，惟万不可再开保案，升奖无数文武官员，至万不得已，亦惟将艰苦之下级员弁及兵役略与犒奖可矣。未谕政府诸公以为何如。见宣统三年七月二十一日《乌言报》。

第三论 川中风潮，言人人殊，电信不通，故未由得其真相。各报所载，亦大都得之传闻，固不能据以为实也。即谕旨中言川人散布自保商榷书一端，《国民公报》且言系赵督之诬枉，然吾意则如此大事，赵督当不至以无为有也。况即以该报所言而论，该报不云乎邓孝可要求赵督电阻端^①弗入蜀，以端若来，则川人必至倡独立，情词愤激。赵乃拘留于署中，则独立之说，是否见于自保商榷书，吾尚未窥其原文，不敢臆断。而其出诸邓孝可之口，如该报所言则已无可掩矣。夫邓孝可朝廷之职官，四川之士绅也。苟不幸而身陷于争路旋涡之中，为人民所推举，出而要求长官，其立言应知大体，宜如何审慎而出之，岂可有如是狂悖之言哉！宜乎赵督之拘留之也。人见长官，且有此狂悖之言，则其愤激之时，急不暇择，出署对于人民，势必更甚其辞。而一般无知之人民，见我所推举之人，所言如是，其事必极正当，一

^① 指端方。

呼百和，影响自易；加以乱党之乘机而起，其不酿大风潮者几希。赵督之拘留之也，未为无见。然吾意邓孝可乃朝廷之职官，四川之士绅，当不至此。吾深愿邓君之未有此言也。吾深望该报之所载不实也。见宣统三年七月二十一日〈乌言报〉。

第四论 前日恭读谕旨，宣布赵季帅电奏，知川乱渐即弭平，稍舒目前之祸。惟赵电称为匪乱，并谓官兵力战七昼夜，而各报则多谓抗拒者，实民而非匪，且并未持枪械，虽各报亦有出入，而与官电则大相径庭。窃惟此事民与朝廷争，一省之人与国家争，为吾国千古未有之奇变。若不速查明实在情形，有以平川人之心，而释远近之疑，则后患正未有艾。合川督与各报所言观之，其为在事始终咸良善之民，不过后来愈聚愈多，哄闹不散乎？抑匪徒乘机为乱，与良民不涉，争路者一种人，闹事者又一种人乎？又或川中本已预备乘此而起，彼此混和为一乎？又不然则川人本欲以平和解决，激而横决，遂成暴动，前后遂两概乎？更不然则乱事或全由拘押蒲、罗、邓数人而起，罪全在川督乎？凡此应熟察审处，必不可据赵督一电，遽为处分；尤不可以力战七昼夜为川吏大功，遽与以殊荣异赏也。

虽然吾今者又不能不为吾国言论家抱歉矣。当干路收为国有之时，中外各报，并不审察各省路事实情，且不顾及从前各报已将各路公司极力丑诋，又力言川省路股，非川人所愿，穷人持此路票，无从转售，故益困苦。复不将此次借款缘何根由，有何历史，详加查察。惟见此事足以煽动人，或可借端生发，即极力诋诮，加以捏造。于是盛大臣卖路也，路亡国亡也，九五之扣皆盛所得也。抑知草合同订于张文襄，能忽然抹杀不认乎！凡百借款，咸有折扣，为银行专人管理及印票登告白之需，非订合同之

人所能得也。借款造路，若京汉一路已完全归我，何所为路亡国亡者？此等浅近之理，该报等宁不之知，特以不过甚其词，则不能激动人心，而逞其好乱乐祸之志也。且该报之言，亦大逾界限矣。夫民以不平之故，而出于上下相争，则必有争之之道焉。盖所以争者，为其事之失权利于外人也。倘以逾越界限之故，而公私丧失，乃大逾于所争，则亦无情理之甚矣。如粤之相约不用大清银行钞票，已为大逾界限，而各报反从而扬之，而罢市、罢课、抗租、抗捐之说起。殊不知此事实有万不能中改之势，纵使朝廷畏怯，亦无从屈从舆论。盖事基于七八年以前，即欲悔之而不能悔，今乃为此极点之煽动，假一旦实行，则直与作乱无异，而影响所及，将全国入于危险之域，而吾国立陷于至悲极惨之境。而吾国社会中人，平时本不研究，临事惟有盲从，不知其事之办不到底，又不知假使决裂，则转与从前之意志背驰。今则暴动旬余，无端死者已若干人。此等人孰杀之？盖直接则官吏杀之，间接则不得不谓不担责任之言论家杀之矣。

且谓今之哄闹者，非匪人非乱党可也，而欲以良民待之，则恐有所不能不忆前者饥民抢面粉公司，各报多谓饥民而暴动，即以乱民论，不能责公司以枪械抵御乎？又不忆前此各报盛责张安帅^①，不于饥民初暴动时严办一二人，致酿成昆山杀饥民^②千百之惨祸乎？夫饥民抢掠，谓之乱民，争路而聚千万人，四面团结，抗挠一切，独不得为乱民乎？盖聚集无数人，妨官吏之行动，阻社会之生活，即大乱之道也。

① 张人骏，字千里，号安圃，宣统元年十月至三年任两江总督。

② 据《大公报》载：宣统二年十二月上旬，江苏昆山县陈葛镇一带，有淮、徐南下饥民抢大户。

夫报者主持舆论者也，引导社会者也。善则大局蒙其福，不善则大局受其殃。吾甚愿吾国之言论家，怨于前而有以慎于后也。见宣统三年七月二十六日《乌言报》。

第五论 川中之事，旬日之间，电信不通，风声所播，人心疑骇，而各报亦振其如椽之笔，日日记载可惊可怖可悲可惨之消息。迨至日来，印证其说，似无如此之甚也。然究之争路欤？匪乱欤？攻署围城之举出自民团欤？匪党欤？蒲、罗之号召欤？同志会之鼓动欤？人民之聚集欤？乡团之自来欤？抑争路极守秩序，民人并无暴动，匪党乘其机而起，求逞其欲，大吏张其事以告，思掩其过欤？此至复杂至紧要之问题，非得有真实可据之消息，远处数千里外，曷敢臆断也。

赵尔丰之电奏，各报谓其出于一面之词，吾不敢谓其非也。各报近日所载之消息，与电奏多不符，吾亦不敢谓其是也。总之吾人今日而论川事，此一方面之言固不可尽信，而彼一方面之言亦未必皆确。身未亲历其境，欲求真实之情，持平之论，难矣。然而有言论之责者，固不可不详慎也，不可不公平也。道听途说，其事苟涉可疑，则与其登载而不实，毋宁缺疑之为愈也。尤不可略涉偏袒，而信笔书之，过爱新奇而率臆言之也。

不纳租税，宣告独立，不仅赵督电奏言之，各报亦记之矣。而近日各报，则力指为赵之诬陷，川人之有无此言，吾今未敢言也。即商榷书吾亦未之见，吾深愿赵督之所言有误，而各报之所载不确也。然二十八日之《国风日报》、初一日之《帝国日报》尚有此类之新闻，吾阅之不能无惑焉。

《国风日报》曰：川人确已宣告独立，其所举之首领为金某云。《帝国日报》曰：昨据川人家电云，叙州、嘉定城已破，川

人选出金某为民团长，招兵买马，节节驻防，势甚蔓延。又邮传部得川北官电局来电，亦与此同据。《国风日报》之言，则川人宣告独立，且举有首领，其迹已不可掩矣。据《帝国日报》之言，则选民团长，且招兵买马，节节驻防，岂尚保路之可言。况民团长亦金姓，与《国风日报》合。谅该二报之言，当非无因也。二报所载相合，似尤足徵信，然吾卒不敢信也；即还质之该报，恐亦未能自信也。故吾以为此等大有关系之言，仍应缺疑而不载也。

日前之某人自杀、某人被戕之消息，均已不确矣。吾且深幸其不确也。各报亦当知其误信矣。然《帝国日报》前日尚言李穆勋被杀矣，想亦无其事也。吾深惟各报宜详慎，宜公平，毋轻信道途之言，而有损报之价值也。况事之所关系者匪细耶。

不特此也，尤有关系之大于此者，如二十七日某报所言，某国之照会一节。姑无论此次川事，并不排外，无伤于外人，见于外人之报告。即使外人实有此照会，政府亦必拒绝，似不宜显揭其事，使远近人心愈形惶恐，反足以启人民嫉外之念，陷大局于至危险之境，吾知该报必未暇一计虑也。

夫我国之今年，东西南北，水火匪贼，灾异不绝于书，正民不聊生、人心思乱之秋也。不幸而川中又有此事，正宜靖人心而弭世变，岂可摇唇鼓舌，而以骇人听闻并不确实之消息，布散于社会欤！无益于川人，而有损于大局，吾未见其可也。

抑报纸者代表舆论之机关也，既为舆论之代表，则其一言一语，皆将为社会所信仰。夫以社会所信仰，而不自保其名誉，自尊其资格，自重其价值，而信笔书之，率臆言之，人将不信仰我。乌乎！可吾知各报必不如是也。吾因川事之所关系者，大而

不自觉其言之哓哓也。见宣统三年八月初一日《乌言报》。

第六论 川人自保商榷书必非川人所为也。盖革党乘此散布，以动人心。然此等语，极足惑人，其后面条款办法，固是为乱之具，而前一大段，尤足动人。其文如下：

凡军港、军埠、矿产、关税、边地、轮船、铁道、郵便与制造军械、用人行政，一切国本民命所关之大本，早为政府立约，擅给外人，并将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六省与英国立约，不得让与他国。福建、浙江两省与日本立约，不得让与他国。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省与法国立约，不得让与他国。山东一省与德国立约，不得让与他国。自日俄战争和议以来，又与英国立约，不得以西藏让与他国。满州三省则为日俄暗分。

大率影射捏造，而全国人何知信为实。然则计无复之，惟有自保之一法，此等事流荡于人人之脑中，为祸不细。窃谓政府宜将其谬处，逐条细驳，又须将与外人所订之约，刊一全分，发行各处，另须作一简明之表，载明迭次损失权利之处，不可略为讳饰，并将何事现在如何办法，使全国人得释疑而更起其希望之心，庶足挽救于万一。盖吾国上下之隔绝，民间之误会，全在秘密。彼以为秘密则即有丧失权利之处，人无从知，斯无从攻击。不知即使秘密，而所丧失之权利，仍不免人指责。即并未丧失之权利，亦且为人疑猜，甚至人随意诬捏，亦无从辨白。至今日而恶果见矣。见宣统三年八月十一日《乌言报》。

第七论 吾今者有甚悲焉。何悲乎？尔以吾国之大，而稍明白事理者，竟无有也，而犹且以言语相欺，以意气相凌。呜呼！天其欲速亡吾国乎，不然何产出谬妄狂诞之徒如此众也。吾不怪川中之有自保商榷书，而怪以京师人才荟萃之区，而所谓文明之大

报馆，若犹不知此事宗旨所在，犹竟为之解释，谓非欲为乱，岂以诸君子之识之学，乃并此而不之知也。夫保路则保路耳，何以阑入各种题外之文？官长保护地方者也，何以须该会保护地方？治安，官长责也，何故须该会维持？且不作乱，何以僭收租税，何以欲囤钢铁制枪炮，及各工厂何以须立炮台。其言优给军人饷需，优待军警家庭，所以离军警于国家也。停办捐输，停止协饷，所以离民于国家也。节减办事人员薪水，此一班民人所愿闻也。夫其状昭著如此，而犹曰与谋叛有别，是犹杀人者曰吾但欲使彼首与身相离，非欲杀之。噫！梦欤！吃欤！愚欤！诚使人不解也。抑余更有切告者，书中前段，谓我政府已将各省分订各国，全是凭空捏造，内有数端，闻各国曾有此议，今亦不然。且中国亦未理之也。亦有某某二国约中稍涉及者，我外务部已宣布不认矣。又有数事，虽已大失权利如胶湾旅大，然尚视将来外交之方法为转移，此则在吾国上下一心龟勉以求之，非可以激烈将事也。至谓川有天险，足以自保，此真小儿语。果一旦如彼言，则即日有自印入藏、自藏入川者，有自越入滇、自滇入川者。至由长江用浅水轮入川者，犹不知凡几。至此则不特川省糜烂，各省亦糜烂，是诸人以热心而为敌之依，吾不知各报何苦而犹袒庇之。

且吾疑此不特非川人所为，亦并非革命党所为。革命党宗旨不纯，然亦以存中国为名。今其计划，即使极速，亦须在三年之外，而各国糜至，则不待三月而已大集。是则以此而成全国之惨祸，受千秋之唾骂，革命党人虽愚，必不至此。关心时事者宜审思之。见宣统三年八月十一日《乌言报》。

八月十九日，武昌革命军起事，不数日武汉三镇皆响应，声

勢甚张。先生乃为文以警告政府。其文如次：

今以谋之不臧，致为起事者所利用，然急则治标，惟有以收拾人心为第一要务而已。或曰是宜下罪己之诏，虽然是应参酌时措之宜语，语足入人肺腑，而尤必以实事随其后。若不能开诚布公，而徒用官样文章，则人弗信也。开诚布公矣，而言行不相顾，则人以为诳己也。今日政府正宜吐弃从前一切习惯，而别出手段为之，庶其可也。

警耗四面而至，但言镇定，未足有功也。虽然镇定其最要矣，欲以镇定人也，必先镇定己也。凡在当轴，须自知己之身，即国家之身，不能离中权一步也。岂惟身不能离，即心亦不能离也。夫如是乃能责之诸大臣，乃能责之诸有司百执事，若始则怀倭卸之思，继且存畏怯之志，甚至渐怀退志，规作自全之计，不特弛百僚之体，抑且为外人所哂。意吾公忠自矢之王、大臣，必不出此也。

事急矣。犹在萌动之时，顾虑在事之人智短而意怯，则或有援用戈登、华尔之往例，而以乞师邻邦为请。若果许之，则不特贻患无穷，且大为外人所笑，而种怨于国民益甚；然则处今日之事局，非求诸己不可。

治年按：右论盖载于八月二十六日《当言报》首，而是报即于此日为终止期，不再续出。又越十七日，而先生辞世矣。是则警告政府一文，在《当言报》为最后之论说。在先生亦为生平所撰报论之最后一篇，即谓为先生之绝笔可矣。此文第二段言“凡在当轴须自知己之身，即国家之身”云云，盖阴指摄政王言也。乃不幸适如先生所逆料，进退维谷，仓皇失措，病急而用药愈杂，棋输而下子愈乱，先生盖不幸而言中矣。第三段以“乞师邻邦”

为戒。当年幸无其事。然自入民国以后，内战迭起，每次战争，无论何方，率有受外人扶助之嫌，以是内忧既剧，外势愈张。先生有知，当亦不胜其怨恫矣。

诒年又按：武昌革命军起，于是年八月十九日至十二月二十六日即民国元年二月十三日，清帝遂下诏逊位，先后凡一百二十六日，先生前论距起事时才八日耳，而已知民军之不可侮，清室之将不支，盖自比年以来，朝政之不纲，内衅之迭起。接于耳者，罔非“及汝偕亡”之怨言，入于目者，无非朝不保夕之谬举。足使识微见远之士，咸怀载胥及溺之惧，而先生遂于此绝望，此则至可痛者矣。

九月十三日未时，先生卒于天津。先生自甲辰始即得膈疾，时觉心胸间有气横梗，哆噫作声。是年八月，革命军事既起，九月京师骚然，先生遂避居天津。初无他疾，十二日方晚餐，得京中友人密书，言政府将起用袁世凯。先生太息言，今方主张共和，然是人可为拿破仑，不能为华盛顿也。语毕遂起就枕，至夜半，家人闻有呻吟声，亟起视，则已昏迷不能言。进以参汁，啜少许，仅能下咽，翌日未时遂卒。先生平日绝不主张激烈之行动，以为天下大器，破坏滋易，建设实难。以吾国之人材、财政、内忧外患而论，尤不当虚作一建设之理想，轻言破坏。故平素持论恳恳窅窅，专属望于政府之能自改革，勿自蹈于危亡之域，以致危及天下。然当局迄不能用其言，驯致一旦决裂，不可收拾，此则先生所为抑郁终身没而犹视者矣。呜呼痛哉！先生无子，以诒年之子德蔚为嗣。民国元年夏，葬于西湖桃源岭之叶面山，与元配王宜人同穴。继配陈宜人卒于民国五年，别葬于桃源岭之芦荡口。

治年按：先生歿后，日人所设之《上海日报》曾于报端纪其事，各致惋惜之意。当时曾经译存，兹为照录如次：

昨见《时事新报》广告，知汪康年氏已作古，甚为中国报界惜之。君浙江人，年二十七成进士，富于才识，在浙江甚有名，执学界牛耳。为文简节而有力，以论证精确称，当《时务报》、《昌言报》、《中外日报》时代，君真可谓为报界之权威，《中外日报》读书人尤欢迎之。汪氏未创办《中外日报》以前，尝与康、梁党相提携，大挥其健笔。厥后则别树一帜，以无欲为天民之思想故也。汪氏虽为革进派，祇可谓之渐进派或稳和派，非如康、梁党之急进派。故张文襄深信汪氏，常采用汪氏意见，在武昌兴新学，汪氏亦与有大力焉。汪氏尝与文廷式氏先后至日本游历各处，皆欢迎之，深知日本实情。归国后以日本之进步较之自国现状，大有所愤慨，遂为联日派之人。留日之浙江学生，大为汪氏所奖励，且彼等皆出入于汪氏之门者。又尝为学生筹学费，其奖励后进，诚可谓不遗余力矣。

光绪三十四年，因袁世凯采用新闻政策，《中外日报》亦为官场收买，于是汪氏遂离报界。本年夏复入北京创办《当言报》，每月出报六次，其宗旨在矫正不健全舆论，故专载评论，不载新闻。要之汪氏之投身报界，以文学之光明与优美提倡新政，虽称之为中国现代先觉者，亦无不可。兹闻凶耗，殊深惋惜，用草此文，以表哀悼之意。

附录遗著题辞 按此题辞为沈寐叟君曾植字子培所撰，于先生之志事及境遇，隐括无遗，读之令人感动悲愤，特为移录如次，藉作全谱之结束。

颂毅刻穰卿遗箸将竣，属社者问序于余。余展视不数叶，辄

枵触唏嘘不终篇而止，他日复展亦如之。茫茫然庚辛之际在余前，其事不能忘，其言不忍复也。余识穰卿于童卯之年，亲见其困折；于塾师亲见其困学，见其成业，见其为大秀才，见其为名孝廉，为名进士，为大议论家，日长炎炎不可止。而时势推迁，爱恶攻取，乃困于葛藟、于魇杌，困于纵横、于游侠，纷纭络绎，动心而忍性，名称满人间，志益菸闳，乃困于贞疾。凡兹遗书，则皆穰卿之呻吟语耶？“民之方殿屎”，穰卿之呻吟，噫！有熊氏三千年畏神服教之民之呻吟也。余与穰卿游踪最密，在庚辛之际，壬寅后不复见，迄辛亥而君卒其死乎！其升乎昆仑之虚，叫天而问，有辞乎？有诉乎？其缠绵固结之心，其复来此世而一宣抒乎！秋墳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书至此，怳怳若穰卿婆娑勃窣褰帙入，而有以告语余也。庚申阳月李乡寐叟题。

汪穰卿先生传记卷六

事业汇志

汪诒年 纂辑

诒年按：先生当创办《时务报》时，于社会事业亦兼营并进。凡于人群有利益，于时局有关系，视为不可不办，不可不速办之事，或先生发其议而与诸同志合力办理，或他人发其议，而先生赞其成，皆急起直追，引为一身之责任。不以事务繁难之故而稍有退却，亦不以经济支绌之故而稍有瞻顾。盖真有勇猛精进之毅力，鞠躬尽瘁之志愿焉。当年所举办之事，盖尚有可考者，为详述如次：

一为编译有用书籍

当《时务报》未出时，创议诸君即定议俟经费稍宽裕，即编译有用书籍，以饷当世士林，俾为开风气之先导。先生又以吾国彼时惟制造局有多种译籍出版，大都属于算学汽机诸类；此外则格致书院及教会间亦有辑译，本大都属于格致、医学诸类；至于各国政法及历史地理诸书，鲜有译印者。即有之，译笔亦不雅驯，学者多不欲观。先生乃一面延聘英、法文译员，择译诸要书，一面又访求多种适用之书，次第付印。故两年之间，印成之书已得九种，待印之书复有七种，在编译中之书复有九种。盖先生规画至为闳远，初不以按期出报即视为已足矣。兹将当时各书广告附

列于后，借备异时参考。

《光绪会计录》是书为李亦园秋曹希圣所编，于度支出入胪列最为详明，虽已付刊，而流传不广，特付诸石印，以公同好。

《中国工商业考》是书为日本南溟绪方所撰，中国工商之业，向无专书，此书于中国工商盛衰之源，颇能中肯，留心时务者，不可不考也。故特属古城贞吉为译中文，以公诸世。

《日本学校章程三种》是书一为日本学校制度，一为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章程，皆古城贞吉所译。一为日本华族女学校规则，则驻日钦使署中东文翻译官所译也。中国近日实以开学校培人材为先务，日本近在同洲，足资规仿，故特汇为一帙，以资参考焉。

《随轺游记》是书为吴君挹清与凤君端臣、彦君琴堂所撰，凡法国各部制造船澳、水师天气、炮台形势、学堂，皆亲见而详记之，法人强盛之迹，略见于此，是亦中土反观之一助也。

《俄属游记》是书为英人兰斯德所著，杨星垣观察枢、莫力侯大令镇藩同译，于俄人所蚕食诸部，言之綦详。复经李芍农侍郎、沈子培比部详考史籍，疏通证明，注于眉端，讲求西北舆地者，必有取于斯。

《代数通艺录》是书为阳湖方子可恺所撰，算法理至深赜，虽出以浅语，学者每致望洋。西法渐同，蹊径特异，要其公理，不能悬绝，是编略如屈氏九数通考之意，而精深过之。初学寻绎渐进，不难立臻上乘。近今各书，或互立门户，惑繁简失宜，未有如此书之适用者也。

《气学丛谈》是书为傅兰雅、华若汀两先生所译述，专考明风雨表、寒暑表之各源流，并论各器之利弊及其造法用法，且将

空气压力之理，证以化重几何各学，明白晓畅，讲求格致者不可不读之书也。

已写样未付印各书：《升恭勤公藏印边务录》、《英国印花税则》、《英伦巡捕章程》、《华盛顿传》、《宝星考略》、《中国在欧开办商务节略》、《时务会课文编》。

已译未成各书：《美国政书》、《英国律义》、《法国律例》、《泰西新政史》、《日本新政史》、《万国通商史》、《陆战新法》、《西国陆军制考略》、《几何快读》。

一为搜访讲求实业之人材

先生平日留意人才，而于能仿造外货及创造新器之人，则更尽力推荐，惟恐不及。维时有鄞县王启人君承准，能用中国旧机仿织东洋绉布，专用女工，不藉汽力。先生为荐诸浙抚廖毅似中丞寿丰，经中丞考验得实，大为嘉许，给以奖札。其文如次：“为给奖事：照得洋货充溢，利权被攘，果能有自出心机，制造各货，挽回外洋之利者，呈验既实，允宜特予奖给，以示鼓励。查有鄞县监生王承准，能以华机仿织东洋各布，深堪嘉尚。兹特从优给予五品顶戴，以为能创造兴利者劝。此札。”

治年按：闻王君后得某绅助给资本五千金，因得扩充其业，左近各乡民，咸往习学，为福于乡里甚不浅云。

时又有许某能自以己意创制轧花机器，先生为言诸浙抚幕友吴佩葱君品珩，属其向廖中丞推荐，旋得复言，中丞正思仿造此类机器，以利民用，今许某既能创制，且较东洋机器为佳，甚可嘉尚。（中略）如果利用，可令至萧山、余姚、海宁等州县产花之处，开厂制造发卖，或造成发至各处销售，此诚挽回利权之一道，应当护持，不许群工挟制，并可许其专利。此外尚欲酌量给

奖，以期鼓励云云。

时又有四川人萧履安君开泰精算学，能出新意造火镜。其法为制大玻镜多面，按方装置，摄取日光，聚于一处，能使距离若干里固定之物，或非固定之物，立时着火焚烧净尽。先生闻其名，亲叩其方法，亟随处为之揄扬，议欲筹集巨资，供其设厂制造。顾无人能信其说，且以为数过巨，咸怀疑议，事卒不成。先生为之叹息不置云。

诒年按：萧君创造火镜，曩曾见其说帖，详述造法用法，惜未留存，今相距三十余年，不复能记忆，但能记其大略而已。

诒年又按：萧君之制造火镜，当时非但无人扶助，并且资为笑谈。时务报馆译编载有求在我者所译《无烟直线弹》一篇，其附注中忽涉及萧君火镜事有云：是必与天公约早晚最多烟雾时无得烟雾，又必与敌人约停泊须在烧界内，亦不得移动，致离聚光点；更不得于未被烧前，率尔放炮，致毁我光镜乃可云云。其揶揄可谓备至。然世间发明新器物，类多经过若干次之失败，始有成就之一日，决无仅为短时期之试验，即能圆满之理。使萧君于最初发明之后，有人能假以资财，加以扶助，继续研究，精益求精，安知无达到目的之一日。今求在我者乃于彼初次试验时，即痛加抨击，若有幸其不成之意。此真足令人短气者矣。世人每言吾国不出发明家，实则正由士大夫中祇有忌嫉发明之人，从无扶助发明之人，遂始终不见有发明之人耳。呜呼痛矣！

光绪某年，法人在越南河内开博览会，江宁黄君秀伯中慧，赍其在北京工艺局所制之景泰蓝器具前往与赛，甚为到会观览者所称许，得头等奖凭而归。及抵上海，先生乃倡率上海绅商假味莼园开欢迎会以张之，既以表现提倡工艺之意，又以昭示远近各

工厂，使群知出国预赛之利益。又特邀黄君所率领之工人到会，表演其制造景泰蓝之方法。会毕，复设筵以款黄君及来宾，并令各工人一体列席，以示重工之意云。

一为设立东文学社

设立是校之缘起：一、因自甲午后吾国与日人交接日繁，需用日文译员至多，而吾国人通日文者甚少，觉有种种不便；二、先生本意原欲多译西国要书，以饷遗国民，为变法之先导。然翻译西书耗财既巨，费时尤多，故又拟借径于东文书籍，以为救急之计，而欲翻译多数之东文书籍，非先造成翻译东文之人材，必不足于用。故特商诸农报馆主任罗叔蕴、蒋伯斧二君，设立东文学社，即延请农报日文译员藤田剑峰文学士丰八为教习，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开学，招集诸生肄习日文。且议于毕业后，商诸当道，拨给官款，送往日本留学，是为吾国有日文学校之始。亦即为先生提倡日文之表现。此校成立后，成材日众，后来学界政界著名之士，出于此学社者颇多，而翻译东文书籍，派遣日本留学生，实发轫于此。

一为设立戒缠足会

是会由先生与梁卓如及高安邹殿书凌瀚、长沙张伯纯通典、达县吴铁樵樵、浏阳谭复生嗣同、临桂龙积之泽厚、顺德赖弼彤振寰、南海康幼博广仁、香山张玉涛寿波、顺德麦孺博孟华诸君共同发起，章程二十条，由吴君、梁君二人起草。邹君、谭君、龙君加以增删。其简章第一条曰：此会之设，原为缠足之风，本非人情所乐，徒以习俗既久，苟不如此，即难以择昏。故特创此会，使会中同志可以互通昏姻，无所顾虑，庶几流风渐广，革此浇风。第二条曰：凡入会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第三条曰：凡入会人所

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第四条曰：凡入会人所生女子，其已经缠足者，如在八岁以下，须一律放解；如在九岁以上不能放解者，须于会籍报明，方准其与会中人昏娶。（下略）

是会于二十三年六月初一日，由时务报馆创办。梁君所拟章程既定稿，后南皮张孝达尚书时为两湖总督，特为作序，以重其事。其时各处士流，致函会中，表示赞成，或条列疑义，相与磋商者，几于日有数起。至于开列姓名，请为隶名会籍，或且以劝导为己任，愿列名于会董者，尤不可数计。会务之发达，真有不崇朝而遍远近之概。遂由时务报馆改归大同译书局办理。按此译书局，系梁君与诸同人集资创设。戊戌五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改为译书官局，旋奉旨赏梁君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至二十四年八月，政变后，大同书局被官封闭，不缠足会因之停办，会员册籍，亦遂失散焉。

治年按：上虞经联珊君元善，于戊戌八月后盖尝接办此会，先生曾有书致经君条列接办之事宜。

治年又按：不缠足会未设之前，西人尝设有天足会，因系教会所为，故教外之人颇不受其影响。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也。戊戌之后，又越若干年，鄞县沈仲礼君敦和，亦尝续有开会表演劝戒缠足之举，自彼时至今，约已有三十余年，其在上海及各处大商埠大都会，固已无此痼习。至如西北各省，则近人之游记，固多言其尚有缠足之女子。然如谓东南诸省，僻县穷乡，缠足之风俗，业已革除净尽，则无论何人，恐尚不敢作此武断之语也。春秋左氏传载周任之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是所望于今之士人矣。

治年又按：近年吾国妇女又通行著高跟鞋矣。此风起于欧美，吾国从而效其尤，特未如缠足之束足使尖锐耳，然其矫揉造

作，束之使小，初与缠足无异。至其碍血脉之流通，妨身体之健全，则中外论者，言之已屡，是其为害更无异于缠足矣。而且妇女积习，常乐于后来居上，异时变本加厉，安知不又蹈缠足之覆辙耶！辞而辟之，又乌可已。

一为设立女学堂

此学堂为经联珊君元善所主办，校设高昌庙桂墅里，即经君之私产也，赞其成者为先生，暨梁卓如、康幼博两君及施子英则敬、严小舫信厚、郑陶斋官应、陈敬如季同诸君，其章程之重要者，如第一条云：学堂之设，悉遵吾儒圣，教堂中亦供奉至圣先师神位。办理宗旨，欲复三代妇学宏观，为大开民智张本，必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然后风气可开，名实相副。第十一条云：立学之意义主平等，虽不必严分流品，然此堂之设，为风气之先，为他日师范所自出，故必择良家闺秀，始足仪型海内，凡奴婢娼妓一切不收。二十二条云：沪滨郑卫之风向盛，而租界中桑濮秽迹尤彰明较著，今创女学，各得自有之权，不先从根本上讲究起，恐流弊较男学外孔内杨者更烈。公议凡真正节妇之女，即非醴泉芝草，亦宜破格栽培，勛以专切。师范一门，秉贞母之赋，俾先觉觉后觉，或冀能形端表正，防微杜渐云云。

治年按：此章程为何人所撰，日久无考。惟梁卓如君曾有倡设女学堂启一篇，刊于《时务报》第五十四期内，则此章程当亦为梁君所属草也。

此女学堂于二十四年四月开办，初时学额暂定四十名，然报名者争先恐后，几数倍于定额，咸以不得入门为憾。至次年夏间，刚毅南下至上海时，忽据人言，谓此校与康、梁有关，时赞成之人除先生外，大都介于官商之间，咸以被牵累为虑，遂力迫

经君将校停办。至是冬十二月，经君又以电争立储之故，为清廷所深罪，避地澳门，是校遂为官厅所没收，直至后来□□^①年，始行发还云。

治年按：经君当时既在高昌庙设立女学堂，复于城中设一女塾，盖以便居近城中者可就近肄业也。故庚子三月，经君在澳门有书致先生云：女学事倘吾兄与静涵足能支持数月，弟苟获幸免，此志决不稍懈也。又八月三日来书云：昨接刘松生来函云，女学城塾赖吾兄挹注，而伊仍万难敷衍，欲过中秋节歇手等云。弟复以新政之硕果，仅存止此女学一线绵延，万不可停而中断云云。又□□^②年七月二十五日书云：为公学城塾，弟再四劝勉蒋、王两女史勿尽堕前功，已允竭力续□^③云云。观于以上三书，知当时高昌庙之女学，虽已停办，而城中女塾固犹存在也。

一为设立务农会发行农学报

是会由如皋朱闾樾祖荣、会稽徐仲凡树兰、上虞罗叔蕴振玉、吴县蒋伯斧翰诸君所创设，而先生力为之助。诸君之意，以近年西学大兴，有志之士锐意工商诸政，而于农学绝不讲求，未免导流塞源，治标忘本，因创设务农会，以开风气，以浚利源。先生之意，以农蚕种畜，为我国自有之利，与商务之须求诸人者不同，又但须取材于地，与商务之与人争衡者亦不同。故于诸君创设此会，视为切要之举，尽力提挈。其简章第一条云：本会拟筹集款项，在江、浙两省地方，购田试办，所购之田，即作为会中公产。第三条云：拟聘请化学师一人，辨别土宜，并酌购外洋机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如此。

③ 原文如此。

器农具，为中国所不可少者，以佐人力之不逮。第四条云：农之为义，兼耕牧言，本会除树艺五谷外，博采中外各种植物，一一试种，兼及饲养牲、鱼等事，以广利源。盖创设之始，立愿至为宏大，旋以经费未集，同志未多，旷日持久，殊非善策，因拟先办农会报，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出版，藉以通消息资研究云。

一为设立蒙学公会发行蒙会学报

是会由先生与湘乡曾敬貽广铨、仁和叶浩吾瀚、吴县汪甘卿钟霖三君共同发起。立会之本旨，分四大宗：一曰会合天下心志，使归于群，相与宣明圣教，开通锢蔽。一日报立法广说，新天下之耳目，而为蒙养之表范。一曰书为图器、歌诵、论说，便童蒙之诵习而浚其神智。一曰学端师范，正蒙养造成才必兼该而备具。公议先以书报为起点，以会学为归宿，而蒙学报遂于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发行。其报例第一条曰：本报分两大纲，一为母仪训育之法，其目凡四：一曰养育、一曰劝诵、一曰仪范、一曰演习。一为师教通便之法，其目凡六：一曰字课、一曰数理、一曰方名、一曰智学、一曰史要、一曰时事。第二条曰：本报以启蒙为主，故专取浅明通便之法，以图说歌诀为第一要义，期于演说易晓，玩象可知，其图说问答用白话，歌诀论略用文理，务期先后序进，一意贯承云云。

一为代人办事

自《时务报》开设后，各地官绅之以开辟风气有益公众之事相托者，书札往还，盖时时有之。先生乃以私资延一书记，专司其事，盖几于视时务报馆为办理新事之总汇，先生为主持此总汇之人矣。其故盖有数端，先生交游素广，每至一地，必与其地之贤士大夫，结深交敦情谊。迨报馆既开，即素不相识者，亦闻声相

思，群以为欲延访新人材，研求新事物，殆维先生是赖。于是以事相嘱托者，遂如水之归壑焉。其次则先生又忠于为人谋，凡远近官绅，以事来商者，先生必尽其所知所能，为之筹画处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期于尽善而后止。故人咸乐与先生商焉。又其次则先生又极意延揽人材，既由甲以识乙，复由乙以识丙，转辗延引，无穷无尽，其人之材能学问，无不明瞭于胸次，故各处创办新学书院，欲得一二佳教习，先生辄具姓名以告，殆于取怀而与矣。或欲有所兴作，为民兴利，托先生访求办理之方法，与夫办理其事之人，先生亦必尽心探访，期于不负所托。故来与先生商者，遂源源不绝焉。兹特就积存之各书牍中，择其关于此类事者，择要列表如左，藉可考知一斑。表中诸人，以姓之笔画多寡为次。

发书人姓氏	发书人所在地	事实	附志
王星垣君	浙江黄岩县	拟开办学堂，托延西文格致教习。	
王君延龄	山东诸城县	拟与族众集资设立藏书局，托采购书籍。	
方燮尹君	安 庆	托购日本所造开井机器，并访延教师。	
江叔海君	重 庆	开办渝报，托代购铅字印机，并代招排字印刷工人。	时又有宋芸子、潘季约二君亦有书致先生，商议购办铅字及印机之事，盖皆与江君同办渝报者。
江建霞君	长沙学署	创办《湘学报》，托	

- 为推广销路。
- 何君恩煌 安庆望江县署 拟劝民创种木棉，托代延谙晓种棉新法之农师。
- 吴佩葱君 杭州抚署 拟在省城开办中西学堂，托搜采各处学堂章程。又托代觅日本大学小学各章程。又托开列校中应用之书籍仪器。托探听制茶机器价值及焙制方法。又托招致能仿造轧花机器之许某。
- 按：吴君时在浙抚幕中襄办中外交涉要政，此盖浙抚廖毅似中丞属其托办者。
- 吴君利彬 湖 北 主讲砖砚书院，托代办书籍仪器。
- 按：吴君系两湖书院高材生，为先生所识拔，故知己之感甚深。又按：吴君即吴将军禄贞之父。
- 吴筱村君 浙江山阴县署 托采译研究蚕务之西书，又托查养蚕用之显微镜、器具等之价目。托探访塞门德土之价值及使用之工匠。
- 按：此系代杭府林迪臣太守函托。
- 又 浙江西安县署 托采访出口草帽辫之款式及推销方法，又
- 按：吴君在西安，以彼地物产甚丰

- 托采购各式草帽俾作标本。托探访制造樟脑之机器之价目，并探访造樟脑之日本技师需薪水几何，约几月可学成。
- 托觅洋棉种子并其种法。
- 托采访出口之猪毛如何扎法，每扎长短若何，价值各几何。
- 宋芸子君 成都 创设蜀学会，托代延格致教员。
- 汪建斋君 南昌 托探访种樟熬脑之方法，并访觅熬脑之技师并其薪资数目。
- 周孝怀君 四川泸州 设立经纬中学堂，托延教习。
- 林迪臣太守 杭州府署 议欲招集商人创设公司，将土货运往外洋推广销路，托为筹画办法。此盖代浙抚廖中丞致函商办。
- 洪藻裳君 长沙 议欲采樟木制脑，种萝葡制糖，拟遣人至各地学习，或延技师
- 富，而妇女习于嬉游，终日不作一事，故锐意创兴工业，冀得扩充利源，俾妇女亦得以资生。惜未数年，匪乱猝作，吴君遂以身殉，至可慨也。

- 至湘教授，托为酌拟办法。
- 孙仲容君 浙江瑞安 合邑同人拟开东文学馆，托延教习。
- 高啸桐君 杭州府署 托探访日本派人来华考察饲蚕收茧制丝之深意。按：高君时在杭府林迪臣太守幕中，此盖代太守函托者。
- 张印咨君 吉林 托觅制造塞门德土之技师。又托访延堪胜警察及工程之人材。
- 张子华君 松江 拟设讲求新学之书报馆，托为采购书籍。
- 张味荪君 杭州抚署 托探听派生往日本游学，应行预备各事。按此盖代浙抚廖中丞函托。
- 张菊生君 北京 开办西学堂（后改名通艺学堂），托访延西文教习。
- 章希瑗君 江苏高邮县署 创办致用书院，托延算学教习。
- 张伯纯君 长沙 创办制造公司，托觅熟精制造之技师。托代矿务总局访延在美国习矿学得有优等证书之中国学生。
- 陆勉斋君 杭州 创设求是书院，托访延教习及翻译。按：求是书院创办时，陆君奉派充监

院，故秉承浙抚廖中丞之意，以访延教员相托。

- | | | |
|-------|------|---|
| 梁节庵君 | 武 昌 | 湖北派学生二十名至日本游学，托于过沪时为之照料。 |
| 黄仲弢君 | 浙江瑞安 | 代本县学堂托延英文教习。 |
| 杨仲庄君 | 杭 州 | 设立群学会研究算学，托延教习。 |
| 杨哲子君 | 长 沙 | 湖南派学生至日本学陆军，过上海时托为照料。 |
| 廖毅似中丞 | 杭州抚署 | 属将觅得之水陆师学堂章程从速刊布。又属觅农、工、商、医各项学规。 |
| 熊秉三君 | 长 沙 | 开办湘报，属代办印刷机器及铅字。又托招致印报及排字工人。 |
| 叶伯鸾君 | 广 州 | 办理《南纪日报》，托为推广销路。 |
| 邹沅帆君 | 长 沙 | 代某学堂托访延算学教习。
托代官设书局采购讲求新政新学之书籍，寄湘发售。 |

- 又托代制造局附设之
学堂延访精通汽机之
技师往充教习。
- 刘古愚君 陕西西安 托采购易于仿造之西
洋农具。又托购铅字
为排印书报等之用。
- 欧阳君烜 湖北房县县署 创办学堂，托代延英文
兼体操教习。
- 蔡伯浩君 长沙洋务局 派生十名往日本学师
范，托于过沪时指导
一切。并托致函日本
旧友，为之先容。
- 钱保和君 浙江慈谿 托探听开井机器价目
及延聘日本技师应需
薪水若干。
- 卢木斋君 托办铅字三份，为印
书之用。
- 龙研仙君 江苏如皋县署 创办安定治事学堂，
托代延英文及格致教
习。
- 谢钟英君 常 州 拟公设西文学堂，托
代延西文教习。
- 谢荣光君 檳榔屿副领事 筹建华侨学堂，托办书
籍、图画、器具、报纸。
- 瞿子玖侍郎 江阴学署 托办日本所造垦种收 按：瞿侍郎时为江
获农具各五份。 苏学政，奏请将南
菁书院改为学堂，

并以该书院原有沙田一顷，拟参用西法，树艺五谷、果、蔬、棉、麻等项，故有托先生采购日本农具之举。

罗鹏孙君 湖 北 设立中西通艺学堂，
托延西文教习。

治年按：右表都凡四十一人，其以个人之资格相属托者不预焉。其无书牒可据者，亦不预焉，若并计之，其数盖不止此矣。其年月则大抵起于光绪二十二年秋七月以后，直至二十四年夏秋间（亦有在此后者，然甚少），始终不逾两年，其属办之事，盖不越劝学、务农、通商、惠工数大端。其时上下远近，实有风发泉涌一日千里之概，使其能蒸蒸日上，日进而无疆，则吾国之前途，殆未可量也。不意戊戌八月政变遽作，政府既速下谕旨，停罢中小学堂，裁撤农工商总局，查禁报馆，禁立会社，拿办会员。取八月以前之新政，一例推翻而后快。国内士民，既忧惕于淫威之不测，复苦于展布之无术，于是一线之生机，遂斩焉以俱尽。庚子拳乱以后，又取已推翻者，更次第恢复之，然元气则已大伤矣，是亦不可以已乎！

一为主办湖南矿务分局

湖南矿产极旺，而以安的摩尼为最，沅水流域若辰溪县、若泸溪县；资水流域若益阳县、若安化县、若新化县；湘水流域若浏阳县，彼时均已勘得为安的摩尼最丰富之区。益阳年可出八千吨，而辰、泸所产则更优于益阳。时陈右铭中丞宝箴方巡抚是邦，

锐意欲将各矿次第开采，以开发地方之富源，而为兴学育材之预备。乃特设矿务总局于长沙，使张伯纯^{通典}、邹沅帆^{代钧}两君主其事。又设分局于汉口、上海二处。汉局主转输，使罗邠^峴君运涉任之；申局主推广销路延访技师等事，托先生任之。顾其事乃至难，就推广销路言，先是有美国人傅兰雅愿每岁包销八千吨，顾所许之价，乃不能偿运输之费。旋又有美国商人愿每年包销一万五千吨，并自行派船到汉口装运，彼此已有成议，旋以他故不谐而罢。其时盛杏荪^{府丞}立一公司，拟以十万两为报效，议将湖南全省之锑矿，归彼一人采办，湘省但司抽税之事。陈中丞力拒不许。又就延访技师言，先已延定罗某，订明月薪一百五十两，比至忽睨睨一切，要求无已。先索增薪五十两，许之；次索精美之居室，许之；次又索精美之膳食，自定每日膳费三两，许之；而不即与终，乃又索增薪一百五十两，矿局不能允，遂拂衣而去矣。幸其时尚有邝荣光君在湘，矿事不致坐废，然邝为开平局之矿师，不能久留湘中。后乃物色得唐月池君，又得池贞铨君，皆为矿师中之上选。顾唐君即将往四川，池君正在福州船政局服务，皆不能应湘省之招，最后乃得温务滋君，然矿地至广，非温君一人所能遍及。又议欲添延日本技师至湘炼锑，然彼时湘省仇外之风绝盛，对于日本则尤甚。议在汉口设局试炼，不敢招之至湘。而日人尚欲吾国为保命险始允就事，议遂作罢。又议派人至日本学习炼锑技术，顾非急切所能收效。综此数故，后乃商定两办法：（一）为与汉口亨达利洋行订立合同，由亨达利代销锑砂三万吨，俟由湘运到汉口后，每吨即交银三十两为山本，再由亨达利运往外洋出售。售得之价，在六十六两以内，除去运费、关税等等，矿局与亨达利各得一半；在六十六两以外，矿局得七成，亨

达利得三成，此其大较也。（二）为招致粤人戴笏轩、刘艺林、胡贞甫诸君至湘设立大成公司，与矿局订立合同，在长沙设局提炼，成官商合办之局。兹将俞巽轩中丞廉三奏折附录于下，藉可见此事之原委。

（上略）查锑砂一种，外洋称为安的摩尼，其质在金石之间，湘省各属，所在多有，苗路错碎，不成片段，小仅颗粒，巨则万斤，或一线相连，衰旺各异。采炼可作炸药帽、药字模，并入铁铸造机器，其用甚广，其价较铅为昂，为外洋所必需，为中国所创获。论矿务者，咸以此为可兴之利。前于益阳等处觅获锑砂试筹销路，有汉口亨达利洋行订销出锑五成以上之砂三万吨，每吨先交价银三十两，俟其售出，仍照行规，各分红成。因于汉口设立转运局，过磅交易，计所定吨价，若全数交收，不第前亏可补，惜现产无几，未可期以岁时，复于各处广为搜求，续有所获，而砂质较低。招粤商大成公司来湘就近提炼成锑，分别运销。（下略）。

治年按：先生与张伯纯、邹沅帆诸君办理湘省矿务，各极周折，往返商酌，积牍至夥。今就张、邹两君之书札计之，已有一百数十通之谱。其辛勤可想，故特详记之。

治年又按：矿局与大成订立合同，就张、邹二君来书考之，知在光绪二十三年十月间，其时陈中丞尚在湘抚任也。其后乃由俞中丞出奏，《东华录》载此奏折，于二十五年二月内，相距年余之久，不解其故。

治年又按：大成公司成立后，胡贞甫君即来往申、湘间主持一切。二十五年二月，胡君正自长沙回上海，舟泊洞庭湖，夜半大风骤起，舟既沉没，胡君殁焉。此非特大成公司之损失，抑亦湖

南矿务之重大损失也。兹特将邹沅帆君彼时来书附录于后，藉志悲思。

胡贞甫此次来湘，其返棹也，竟飘没于洞庭，可惨已极！此君具有用才，而如此了局，有志者为之寒心。其舟本有轮船拖带，二月十八日晚泊于洞庭之鹿角，舟子不慎，维舟未稳，更闹风大作，全舟飘去，离岸里许而覆，死者数十人。鄙人前日过洞庭，犹望见覆舟之桅，大成公司有人在鹿角守捞遗骸，竟未得，惨极。

诒年又按：彼时有一异事，则胡君之如夫人居申者，一夜忽闻门外有剥啄声，比启门，则胡君归矣。亟叩起居，默不答视，其面索索，若无生气，意以为风尘辛苦之故，不之疑也。即入厨具磺面水并煎茶以出，则胡君忽不见，大门亦未启，甚为怪讶。及次日得长沙电讯，始知昨夕归来者，固胡君之生魂也。此事近神怪，然是其如夫人于事后泣告吊唁之亲友者，非讻言也。

一为主办译印西文地图分会

按此会由新化邹沅帆君所创办，而先生特于上海设分会以应之。先时邹君随使英、法，购得德意志人所作图本，于世界各国皆备，惟欧洲各国甚详，余皆嫌略。乃锐意搜觅，得俄人所作中亚西亚、西比利亚二图，英人所作印度、缅甸、暹罗及北亚美利加、南阿非利加等图，法人所作越南图，德人所作南洋群岛图、阿非利加洲图，均极详备，足补图本之缺。其于中国舆地，则又搜集中外测定各直省新图，如江苏书局本江宁、江苏两藩司地图，同治五年刊本广东地图，〈湖南通志〉、〈江西通志〉本湖南、江西地图，浙江、湖北新测会典本浙江、湖北地图，光绪十六年本三省黄河图，德意志人所作直隶、盛京、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六

省地图，英吉利海部本盛京、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七省沿海图，及长江、白河、西江等图。因取胡文忠全图为底本，参互考定，误者改之，略者增之，合诸欧美非澳各地图，共得六百幅，镌以铜版，分次出图。邹君独力经营，而先生则与义宁陈伯严、达县吴筱村、华阳王雪城兼恩诸君尽力为之助云。

治年按：公会译绘之地图，初议付诸石印，旋以石印不如铜版之精细，且铜版又可永久留存，随时修改，故第一批图即在日本镌刻，而托王振甫君为监督。第二批图则初拟延一日本刻图技师至汉口镌刻，并招生从之学习，不意为日未久，此技师称疾径归，不得已乃令学生自行学习。时王君适亦在汉，即由王君为之指导云。亦可见当时之艰苦也。

治年又按：邹君于译印地图事，用力至劬，用心亦至专，故将其致先生手书，摘录数通于后，藉可略见一斑。

曩年在鄂，鄙人有志于图，公有志于报，早以图、报相助。某于矿事本非所长，现竭蹶为之，俟稍收成效，便当求义宁^①设西文大学堂，移我作一学堂提调，于愿便足。当今之世，万事都无济，惟学堂报馆为救黄种之根本，君努力于报，鄙人于图外，尚欲造人才也。倘不如意，则专志于图矣，他非所望也。二十二年丙申十月十六日来书。

（上略）总之，此事藉诸股友之力以成图，即藉诸股友之力以成会，获小利则成小公会，获大利则成大公会，鄙人断无丝毫肥私之意，此可质诸天地鬼神而无愧者也。（中略）此版固可源源续印，必须源源修改，如外国出有新图，与今本异者，即当从而改之。至中国内地，此次所出者，仅大略耳。公会果有巨款，

^①陈宝箴，江西义宁人，时任湖南巡抚。

便派人往各处测绘，将版重改之处必多，以此次所成者为底本，以后历年改之，数十百年之后，殆为善本，所贵乎公会者正为此耳。西人成一国精图，必期以数百年，我辈岂可求旦夕之功。迭加修改，则不患其销之不暢，能垂久远，为精本所嘉惠者甚大且远也。我辈任开风气，不任作事，所望来者正无穷耳。二十三年丁酉九月初八日来书。

鄙人去秋回里，本不愿再出，所以重来鄂渚者，为图之未成耳，为图而出岂有不发大力而悠忽置之耶？（中略）若竟不行，则不能不决然而去，专谋图事，当遍去四方，以求有力人成此举耳。二十五年己亥十一月十四日书。

事既繁剧，款又拮据，而所遭复诸多不顺，下怀竟终日为之抑郁，惟此心不因此而少衰，任千磨百折，必将此事作成。二十六年庚子二月二十六日来书。

外间论者，总以鄙图为必不成，然区区之心，不为少懈，却期以必成，惟恐时局不佳，不容我作事，则无法可施也。二十六年庚子五月十七日来书。

治年又按：邹君于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作古，其侄永江有书致先生，略言與地学会股票付图期限已满，而远方尚有函索者，若遽行截止，未免令其向隅，殊非会中之本意，兹拟再展限三个月云云。知公会第二批地图，业于邹君辞世前印出第一批图早于光绪二十三年印出。并志于此。

汪穰卿先生传记卷七

言行杂述

弟诒年纂辑

先生幼遭丧乱，中更家难，中岁以后，休于时世之危迫，思欲有所设施，而迄不获遂其志，不得已始藉报章以发纾其意见。又迭为官吏所夺，故朝喟夕喟恒郁郁不自得，颇以是伤其生。晚年尝戏改古语悬诸座右，其文曰：“臣当此景，惟能说病，口不能言，对之以噫。”盖先生晚年久病呃逆，故改饼为病，改臆为噫。虽是戏语，而抑塞之意，盖可见也。

诒年按：杭县徐仲可君珂所著《呻馀放言》（见康居笔记汇函内）中，有纪先生事一段，若为先生写真，特为移录如次。

曩为汪穰卿同年康年撰家传，有“居恒伤国事，疾首蹙额，常若负重，忧于其身”三句。识穰卿者见之谓为善状其容貌。穰卿生当叔季，闻见日非，宜尔尔。

先生当二十四岁至二十九岁，实为劬学之时，其勤苦殆非人所堪，而精力亦半耗于是。时馆于吴氏，尽日授徒，复于其隙，料量家务。亲友有庆吊事，又须一一躬往酬应，苦无暇专力于学。入夜乃与诒年及季弟洛年围坐一方案，先生中坐，诒年与洛年左右坐，各就灯下治所业。有不解者，即就先生质问，无不披豁尽意。杭城敷文、崇文、紫阳三书院，例于朔望试士子，朔课一

日，望课二日。先生与诒年，或作二卷，或作三四卷不等，随作随写，彻夜不辍。遇诒经精舍考课日，别二人合作一卷，先生任经解，诒年任词赋，时或遇题目不多，期限稍宽，则二人各作一卷，均由洛年为之誊写，亦彻夜不辍。比事毕，即各挟卷趋赴收卷处交纳，虽遇雨亦如是。洎交卷归，天甫黎明，晓风吹人，腹中觉饥，则就道旁豆腐担啜腐浆一盂，以解饥寒，盖数年如一日云。今日记此，犹泪涔涔欲下也。

先生于书无所不览，自群经、诸子、历史、輿地、小学、天算以至古文、骈文、诗词之学，靡不探讨而研究之。三十五岁以后，从事报馆，公私酬应，日不暇给，而就寝之顷，犹必阅书十数页，以为常云。又好抄书，古籍秘本，非力所能蓄者，不惮辗转假借，手自移录。课徒里中时，尝觅得沈氏南北朝輿地表，时方岁暮，例得解课一月，即将原书手录一通，一字不遗。其后往来南北，随时搜购秘籍，又从交好中借抄，故生平所得罕见之书颇夥，屡欲刊刻行世，以绌于财力而止。其后乃编为《振绮堂丛书》初、二两集，兹将其目录列下：

初集：圣祖五幸江南全录一卷不著撰人名字，传抄本。客舍新闻一卷彭孙貽撰，传抄本。克复谅山大略一卷抄本。拳匪闻见录一卷管鹤著，稿本。韩南溪四种稿本，内计：独山平匪日记一卷、遵义平匪日记一卷，均空六居士著；平苗纪略一卷，韩超著；韩南溪年谱一卷，陈昌运著。汉官答问五卷陈树镛著，原刻本。澳门公牍录存一卷抄本。蒙古西域诸国钱谱四卷英文原本，陈其镛笔述，张美翊勘定，稿本。经典释文补续偶存一卷先伯祖讳远孙撰，家藏稿本。借闲随笔一卷同上。

二集：中兴政要文廷式辑。克复谅山大略抄本。烈女传本生六世祖讳宪辑。明史分稿残编方象瑛著。己庚编祁韵士编。西藏纪述张海撰。

章谷屯志略 吴德煦子和甫采辑。万象一原 夏鸾翔演。埃及碑释 陈其镛录。木刺夷补传稿 著人未详。转徙馀生记 方濬颐撰。奉使英伦记 黎庶昌撰。

治年按：初集于宣统二年在北京用活版排印，二集先于光绪二十年在湖北刊行。惟先刊者名二集，后刊者为初集，类于先后倒置。又克复凉山记略两集均刊入，则莫详其故矣。此外又有拟编入丛书而未及排印者三十一种，兹将其目录列后：

骈字分笺 艺海珠尘本新补数十条。音学绪馀 夏鸾翔著，稿本。音学指明 夏曾传著，稿本。明史分稿 方象瑛著，传抄本。宋中兴政要 从永乐大典辑出。崇禎遗录 明王世德著，传抄本。启禎闻见录 不著撰人，传抄本。美生全案 从各署中抄出。溃痈流毒 记鸦片烟事；华夷变态 记道咸间洋务事宜；英人犯境录 记道光中定海事；襄理军务纪略 记咸丰天津事；以上四种皆从日本书库抄出。甲午军务丛存 从刘忠诚军幕抄出；盾鼻闻见录 记洪杨军事；从日本书库抄出。两淮勘乱记 记张洛行、苗沛霖、李世忠三人事。转徙馀生记 记洪军时事。罗壮勇公年谱 从家藏原稿抄出。朱批鄂文端公奏议未刻稿 传抄本，皆刻本奏议所无者。钦定宫中则例 传抄本。宋职源 宋王益之著，日本抄本。元秘书监志 元王士点、商企翁著，抄本。西陲总统事略 汪廷楷原辑，祁韵士编纂，原刻本。振绮堂书录 朱文藻稿本。藏书题识 先曾祖讳诚稿本。振绮堂书目 先祖讳迈孙稿本。振绮堂书目 陈奂编，稿本。振绮堂先后刊板目录 无厂自撰。三十年写书记 无厂自撰。四元玉鉴细草 戴煦著，家藏原稿本。万象一原 夏鸾翔著，原稿本。游仙窟 唐张鷟著，日本抄本。

治年按：宋中兴政要、明史分稿、万象一原、转徙馀生记已刊入丛书二集内，疑先生后来欲将二集木版废弃，故复将此四种列入拟刊之目录内耳。

治年又按：此外尚有覆刊宋本黄帝内经、明堂悉昙字记、帝

范三种，亦在湖北所刊，字极精美，惜版已不存。

诒年又按：先生所著论说，载于《时务报》、《京报》、《当言报》内者，前经诒年汇辑印行名曰《汪穰卿遗著》。又所纪朝政国故，下至闾巷琐闻，歿后掇拾，尚得数巨册，已辑成八卷印行，名曰《汪穰卿笔记》。尚有三巨册，则拟俟续印，并志于此。先生毕生辛勤，所留遗于身后者，仅此而已。

先生于师门及曾被知遇之先辈，风谊至笃。顺德李文诚公文田、衡山陈伯商编修鼎，皆先生己丑乡试受知师也。文诚公卒于光绪二十一年，身前历主文衡，藏书万余卷，不善治生，没后家无余资，并负债巨万，遗榱回南时，先生特纠约同门诸人，集资为贖。伯商编修晚年猝被严谴，极文人薄命之厄，身后眷属流寓常熟，一家数口几于流离失所，先生亦为集资置屋，俾有安身之处。从伯子常府君守正，于诸子侄中待先生至厚，子常府君卒后，其庶出之子女三人，长者十三岁，幼者才六岁耳。先生乃并其生母迎之回杭，又经纪其家事，以教以养，俾无失所，后更为之次第婚嫁云。

先生好客，出于天性，在两湖书院时，凡名流之客于张文襄者皆与纳交。其后设《时务报》于上海，则凡在上海之名人，于政治、学术、艺能、商业负有声誉与夫来上海者，无不踵门投刺求见。先生亦无不迎候访问，夕则设宴以款之，相与谈天下大计，或咨询其所长，或征求其所闻见，故于各地之人情风俗，与其人之性情品行，无不明瞭。尝手辑一书，取平日所见之人，分省隶录，并详著其所长，题曰：曹仓人物志。其留意人材如此。先生好客之名既著，故四方人士无不愿一见先生。日本人亦皆乐从先生游。某君至，举其家藏之宝刀以相赠焉。

治年按：金君锡侯梁所著《光宣小记》内有一则述先生事，亦足见先生之留意人材，为移录如左：

廷试听点，乡友多至殿门送考。朝考日余方与众立谈，见汪伯唐先生大燮送汪穰卿同年康年人，伯唐与余向未识面，问余名。穰卿曰，予昔识金君于广坐尔，亦试觅之稠人中。伯唐四顾，及余趋前，曰昂昂千里，卓立不群，其此君耶。众皆引以为异。穰卿曰：此君自有异人处，不难识也。昔访君西湖，君方品茗三雅园，坐客已满，予觉君小异，执手问讯如故交。及君至海上，予集友宴之，数十人皆一时知名士。文芸阁廷式后至，予亦嘱觅诸坐上，芸阁一顾即得，吴彦复、欧阳石芝继至亦然。金君不凡，故易识也。时闻者皆传为美谈。

先生性好施济，遇人有急难，辄解囊相助，行客有以旅费困乏告者，谗其非虚，即如数与之不少吝。尝见一人仓皇过访，谓有要事将他适，而苦无川资，时先生实无一钱，乃解所著皮裘付质库得钱，悉以畀之。庚子夏秋间，某君仓猝离沪，已登舟矣，犹缺银币三十元，无以为计，密属人商诸先生，先生与某君志趣本不合，至是乃自持银币送诸舟，并慰藉之，郑重而别。至于亲族中之穷困者，更依时协助，以资其生。叔母某氏，于妯娌中与先母至相得，晚年无子，境况甚窘，先生岁时餽问，未尝或缺，此亦足见先生性情之惇挚也。

先生性情外和而内刚，遇不称意事，未尝形诸辞色，有忤之者，纵极人所难堪，初不出一言以相报，待之仍如故，久之其人自愧谢，亦笑解之。盖有古人不藏怒不宿怨之风焉。然遇利害所系，辄侃侃力争，一意孤行，不以府怨为嫌，赴义若渴，如恐不及。有珠宝商信昌号，为美国某商行之总管所给，耗资巨万。总

管既避匿，商行亦不理，讼于美领事不得直，其判辞谓该商行与总管所立合同仅有经理权，并无经理总权，所由请由该会赔偿之说，作为罢论云云。先生大愤，为代拟一广告，欲登诸报端，俾后来者勿蹈其覆辙。顾信昌以此事受亏已巨，若再撻西官之怒，必致更受损失，求勿宣布其事，先生乃罢，然犹引为恨云。庚子上海梵王渡有农夫某，无故被西人用锄击其脑几殒命，初无为之伸诉者，先生闻之，急出巨资延某律师讼于其国之法官，卒得直判，某西人监禁三年。先生之见义勇为，此其一斑矣。

（整理 章伯锋）



陶庐老人随年录

王 树 楫





说明

本书为王树枬自订年谱，上下共二卷。起咸丰元年（1851年）谱主年一岁，止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八十五岁。缺记一年。一九三六年二月卒于北平（今北京市），年八十六岁（见尚秉和撰《故新疆布政使王公行状》）。今据传抄本整理付印。

本谱按年记事，有详有略，凡平生经历，师友交游，著作编次各方面，均可供参考。

先就经历而言，王树枬先后在四川青神及宁夏中卫两县任上，均以兴修水利为主要任务。青神在长江上游成都平原地带，中卫在黄河沙碛区域，皆依江河之水以灌溉。本谱记载了鸿化堰、七星渠的历史沿革及如何修废复旧，引水富民的事迹。王树枬在兰州道台任上，整理甘肃全省税厘，撤消局卡，剔除中饱，使久困的商民得有转机。又设立蒙盐官局，开拓流通渠道，使大青盐行销数省，税入倍增。王树枬在新疆布政使任上，首先裁撤南疆浮征粮草，重订征收新章，并施行各种办法，以缓和民族矛盾。首创官钱局，在新疆发行纸币。设立邮局，禁售沙俄邮票，以挽回利权。本谱的记事，可供治史者采择。

在师友交游方面，有李鸿章、张之洞、陶模、黄彭年、吴汝纶、张裕钊、马其昶、柯劭忞、徐世昌等人，这种社会关系，有助于评价王树枬的一生。

在著作方面，本谱按年记其成书概况，可备参考。王树枬治

学方法，仍沿清人考据道路，因此缺乏创新的著作，不过拾遗补缺，也写了不少有用之书。近人张舜徽说“树柎早岁读书，仍沿乾嘉诸儒蹊径，而尝肆心力治朴学。故于文字、训诂，亦复研绎甚精。”（见《清人文集别录》）对其治学，颇为赞许。至著作则举出“《尔雅郭注佚存补订》、《广雅补疏》，皆甚精邃。斯又并世文家无能为役者也”（同前）。惜张舜徽未能探讨王树柎晚年所撰《尔雅订经》、《尔雅说诗》及《左氏春秋经传义疏》等力作，而有所论定。

史学方面，早年曾著书数种，介绍欧洲历史和哲学，其中《彼得兴俄记》，意主改革，有进步意义。至写当代之事，如《武汉战记》，则立场在清廷，而反对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后，总纂《清史稿》，王锺翰称其“出力最多”（《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篇》）。本谱记修史事甚略。王氏主纂并亲自参加编撰的《新疆图志》是新疆建省后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志书，书中对清代新疆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风土民俗均有详尽记述，其中保存了不少原始文献档案，至今仍是研究清季新疆历史及中俄关系重要参考用书。

世称王树柎与吴汝纶、张裕钊交往，始改骈散体为古文，学桐城派。其实不然，张舜徽说他为文“益浸淫于两汉，而出入昌黎、半山之间。及其有成，乃一扫桐城末流病虚声下之习。其气骨道上，实有得于阳刚之气。吾诵是集（指《陶庐文集》），浩乎沛然，固当时北方之雄也”（见《清人文集别录》）。《陶庐文集》中碑志、墓表、寿序等文为最多，难免颂扬之讥。但张舜徽说集中这类文字，“顾皆有所取义，不徒毛举细事，以贡谀而取悦，异于世俗之作，固已远矣”（见前书）。对王文评价颇高。

陈衍曾为《陶庐诗续集》作序，赞美他游西域诸诗有唐音，称为“步武岑、杜之诗以为诗，固治考据、工古文词者所饶为哉！”（见《石遗诗话》）。钱基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也列有专条，论其诗作。

总之王树枏的古文，纵横捭合，不为桐城派义法所拘束；所作诗歌，力宗汉唐，也不宜以同光体而概论之。

以上经历、交游、著作三端，综括了王树枏的一生，他虽欲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由于思想保守，未能在改革上有大的建树，不过所谓“循吏”而已。在辛亥革命以后，对新的事物有反感，《年谱》中在辛亥后以干支纪年，不书民国，是以遗老自居，忠清自许。但实际与北洋军阀诸显要，藕断丝连，苟活其间，文笔生涯不过帮闲罢了。另将尚秉和撰《故新疆布政使王公行状》附录供参考。

陶庐老人随年录卷上

咸丰元年辛亥一岁

余家世谱断自始迁之祖讳天禄公。明永乐初，自小兴州迁于保定之雄县东洋村。万历时，由东洋再迁新城东十五里邓家庄，绵衍至今三百年余矣。保定、河间二府大半居人皆自小兴州迁往者，然小兴州上往往加洪洞二字。余家世谱亦然。今遍考山西洪洞县实无小兴州地名，盖当时洪洞与小兴州人并迁直隶，而始迁之祖又鲜读书世家，故混载为一地，不复区别也。考诸前史志，小兴州在今承德府直古北口外九十里。汉为鲜卑，唐为奚，辽为利民县，属北安州，金亦为利民县，属兴州。元为兴安县，仍属兴州，故称此为小兴州以别之。（案今之兴州，在今滦平南里许，兴州河即以此得名。或谓小兴州在滦平西北七十五里，金初本兴化县之白檀镇。泰和初置宜兴县属兴州。元升为宜兴州，以旧有兴州，俗呼此为小兴州。《热河志》：小城子即宜兴州故城，所谓小兴州也。《明一统志》谓小兴州在云州堡东四百五十里。《方輿纪要》谓在兴州西青河岭北五十四里皆误）。明有天下，朵颜等部落请内附，因置大宁都司于其地，再置朵颜、泰宁、福余三卫，俾其头目自领其众。建文初，成祖陷大宁，以三卫旷卒三千人人关。永乐元年徙行都司于保定，遂尽割大宁地界兀良哈。族中父老相传始祖自小兴州从龙入关者与明史纪志皆相符合。王凤洲^①谓洪武中，小兴州数被侵

^① 王世贞（1526—1596）字元美，号凤洲，明代太仓（今江苏太仓）人。嘉靖进士，累官至刑部尚书。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等多种传世。

患，诏尽徙其民入内地。明制定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著籍入户，以籍为断。余家粮册旧属涿鹿卫，至今不改，盖军籍也。涿鹿在涿州治西北，永乐七年建，又有左卫在州治西，永乐八年建。涿鹿中卫在左卫西。永乐十二年建直隶后军都督府，与保定五卫隶大宁都司者不相统辖，岂建卫时移之欤？

自始祖天禄公传至十世为吾曾祖考讳懋字景堂，诰封奉政大夫。曾祖妣杜太宜人^①，家贫以耕读为业。奉政公好善，出于天性，数济人之急，乡里称为善士，鼠牙雀角，皆相就质，数十年族党亲戚，无匍匐公堂者。年五十三，偶患寒疾死，一日夜忽苏，自言到阴府，一王者据案呼之曰：谁唤汝来者？命侍者取簿来阅，曰：不误，是今日也。因唤至案前以簿指示曰：汝寿止于今日，因汝好作善事，上帝为汝增寿一纪，已注于册矣，汝好为之，子孙方长盛勿懈。时村人闻公复苏，咸来问视，公指一族人曰：吾见册注汝名于八月某日；又指一乡人曰：吾见册注汝名于十月某日。至期果皆死。公又历十二年，至六十五而终。圣人不语怪，此则吾曾祖母常常为家人言者。曾祖母杜太宜人，为同邑东坞村人，其兄弟姊妹多老寿，年皆八九十岁，此盖关于一家血统也。太宜人生吾祖父讳振纲字重三号竹溪，生于嘉庆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未时，道光辛卯科副榜，丁酉科举人，戊戌科进士第一以知县用，以杜太宜人年高告终养不仕。家居授徒，门弟子数千人，以河工保加同知衔。光绪三年十月初八日酉时终于保定府莲池书院，享寿七十有一。以树枏官晋封光禄大夫。祖妣同里田氏，生于嘉庆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卯时，歿于同治十三年正月十六日辰时，享寿六十八岁，晋封一品夫人，生吾先大夫兄弟五

^① 明清以五品官妻、母封宜人。

人。长先伯父讳鉴，字子铭，号菊农，以举人选宁远州学正。次即先大夫。三讳锡，字子进，花翎补用都司。四讳钰，字子珍，号式如，廩贡生。五讳锜，字子函，号秋颿，乙酉科举人。先大夫讳钰，字子衡，号松舫，乙卯科举人，选授东安县教谕，封光禄大夫。先妣为同邑处士李文明之女，举人李文鼎之侄女，封一品夫人，生吾兄弟五人，妹二人。余次居二，以咸丰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卯时生，生而有文，在右手曰楫，先会元公因赐名树楫，字之曰晋卿，取楚材晋用之义。

是年，粤匪洪秀全潜伪号太平天国于大黄江。

二年壬子二岁

先太夫人生余乏乳食，日屑面粉哺之。

是年，贼由广西趋长沙，犯湖北。十二月四日武昌失守。暹罗以粤匪之乱，贡使不克至京，入贡之事亦从此止，以后遂为自主之国。

三年癸丑三岁

正月粤贼下窜，陷安庆。二月十二日攻金陵，陷之，据为伪都。帝令湖南在籍侍郎曾国藩练乡兵、治水师讨贼。六月贼再陷武昌省城。八月水师克复武昌。四川按察使胡林翼调赴湖北办贼，十二月贼陷安徽庐州府城。

是年，云南回匪乱作，南掌^①贡道遂绝。

四年甲寅四岁

^① 史称老挝为南掌。

五年乙卯五岁

先大夫举顺天乡试。

三月贼三陷武昌，胡林翼署湖北巡抚。四月忠亲王僧格林沁禽北犯匪首李开芳于冯官屯，北军凯撤。

六年丙辰六岁

先大夫素患怔忡之疾，是年会试不第，遂绝意进取，精研医学，随人延诊，无不应手取效，名遂大噪，然不受人一钱餽谢，著有《医药家牀》四卷。

是年五月江南大营失陷，钦差大臣向荣退保丹阳，寻卒于军。十一月克复武昌。

七年丁巳七岁

始入家塾，从同里邓云亭先生彬读，先生亦先大夫门生也。自入塾后，先太夫人每朝予制钱五枚买一烤饼食之，夜二更散学归，以谷米面蒸团（北人俗呼窝窝，亦有用玉黍面者。）一枚，咸菜一撮，置之卧侧，食毕即解衣而寝。如是者十余年，至今晚餐后即睡，犹童时也。三月十六日丑时大妹生。

八年戊午八岁

始学为诗，同邑王子畴年丈洛书与先大夫同年，会元公门生也。一日暑夜与会元公同坐院中，余侍侧，丈曰：现读何书？对曰：《四书》已读毕。丈曰：能属对否？曰：时时学之。丈曰：王豹绵驹。予应声曰：卧龙雏凤。丈曰：虽不甚工而自负不凡。

丈又曰：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余曰：何其声之似我君也。丈拍案叫绝。时闻有雁声，丈曰：风高闻雁唳。命属对。余曰：月黑见萤飞。会元公曰：此子将来必有一隙之明，但恐生逢乱世耳。

是年四月楚军克复江西九江府。

五月与俄人订条约十二款，议准由海路之上海、宁波、福州府、厦门、广州府、台湾、琼州府等七处海口通商。又与英人订续约五十六款、通商章程十款。与法人订条约四十二款，和约章程补遗六款，又订通商章程十款。十月与美人议定条约三十款、通商章程十款。

九年己未九岁

学为八韵诗。十一月二十九日子时三弟树梓生。

是年十月与俄人续约十五款。

十年庚申十岁

学为赋。

是年江南大营复陷，钦差大臣和春、总统张国樑退守丹阳，寻皆战死。四月苏州失守，诏进曾国藩兵部尚书，授两江总督。

英法合犯北京，帝逊热河。九月和议成，与英人订续增条约九款，以天津郡城海口作通商之埠。又与法人订续约十款，均偿费各八百万两。十月与俄人会议西疆未分之界，立中俄续约。

十一年辛酉十一岁

先大夫主讲安肃县凤山书院，携余及四叔父、五叔父在院读书。始学为文，先大夫循循善诱，从游者数十人，多成名以去。

余朝夕随侍，谆谆教诲，虽寝食之顷，不稍宽假，余之力学自此始。是年先伯父宁远公考取选拔贡生。

七月十七日文宗显皇帝崩，穆宗嗣位，两宫皇太后临朝听政，改明年为同治元年。八月曾军克安庆，胡林翼卒于军，始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七月与德人订条约四十二款。通商章程十款。八月与法人续议印花布加长纳税章程。

同治元年壬戌十二岁

在书院。四月十一日巳时四弟树椿生。

是年正月诏授曾国藩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公奏请以金陵军事付曾国荃，苏州军事付李鸿章，浙江军事付左宗棠，于是东南肃清之局大定。

二年癸亥十三岁

在书院。

三月川督骆秉章禽伪翼王石达开，诛之，至是粤贼伪五王皆尽。十月李鸿章克复苏州。

是年五月与丹玛^①人订条约五十五款、通商章程九款。八月与荷兰人订条约十六款。

三年甲子十四岁

先大夫辞讲席，携余归里。四月正值县试，余求应考。先大夫不许，求之再三，因命题扁试，至午两文一诗均缮清呈阅。先大夫曰：诗文皆可观，但未必能冠军耳，仍不许。是年先伯父举

^① 当时译丹麦为丹玛。

于乡。

二月左宗棠克复杭州，六月曾国荃克复江宁伪都。诏封曾国藩一等毅勇侯、浙江巡抚曾国荃一等威毅伯、江苏巡抚李鸿章一等肃毅伯。八月江西军禽伪幼主洪福瑱于石城，诛之，粤匪悉平。闽浙总督左宗棠封一级恪靖伯。布鲁特叛酋肇乱，新疆逆回金相印等攻陷喀什噶尔，蚕食南八城，吐鲁番、乌鲁木齐诸城相继沦陷。

是年九月与日斯巴尼亚^①人订和好贸易条约五十二款。十月议定华工条约十六款。九月与俄人勘办西北界务，立塔尔巴哈台之约，塔什干入于俄，建锡尔达利亚省，布鲁特、哈萨克、安集延、玛尔。噶朗那木干，西域诸属，均为俄所侵略，巴达克山博罗尔悉并于阿富汗。

四年乙丑十五岁

从先伯父在家读书，〈诗〉、〈书〉、〈易〉、〈礼〉、〈左传〉、〈国语〉、〈四书〉均读毕，学为骈体文。

四月二十四日钦差大臣科尔沁忠亲王僧格林沁逐捻阵亡，灵柩回京，所过之处，男女焚香载道，皆痛哭失声。诏授曾国藩钦差大臣督办直隶、山东、河南军务。

是年九月与比利时人订条约四十七款、通商章程九款。

五年丙寅十六岁

县试第六名，府试第一名，院试以第十一名入学。时新城知县为胡公岳，保定府知府为长公启，直隶学政为常熟庞文恪公钟

^① 〈清史稿·邦交志〉：日斯巴尼亚一名西班牙。

璐。胡公最赏识余文，曰清庙明堂器也。先是吾家寒俭，人口又众，男女大小每年人各给钱千枚。先太夫人手中尤艰窘，往往连岁不能易一新衣。自吾入学以后，岁应府、县、书院月课，始稍得膏火奖赏，藉供先太夫人日用之需。

九月特授左宗棠陕甘总督，西征回匪。十一月特授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

是年九月与义加利^①人订条约五十五款、通商章程九款。

六年丁卯十七岁

岁考取第三名补廩膳生。是年直隶学政为蒲圻贺云甫，都御史寿慈，会元公乡举同年也。余喜为温李体诗，尤酷嗜昌谷。先大夫教之曰：从难中入，尚须从易中出。古人诗各有安身立命之处，剧场歌舞摹拟古人，何尝不令人击节，然终非自家面目也。故学古人者，患其不似，而其病则在太似。若李义山、黄山谷七言律诗之学杜，实成为自家面目，乃善于学杜者也。

月 日 时二妹生。

十一月十七日四川总督花县骆文忠公秉章卒，年七十五。

七年戊辰十八岁

正月就婚于雄县之张家庄，原配刘夫人来归，少余一岁，训导刘子和汝梅先生之女，亦会元公门生也。

六月与美利坚人订续约八款。

七月李鸿章设运防制贼，擒匪一律荡平。诏李鸿章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

^① 义加利即意大利。

八年己巳十九岁

科考取第一名，学政贺云甫先生悬牌命余补举优生，向例举优均在岁考之年，此异数也。阖府属同试者五人，余文仍置第一。

是年直隶总督曾文正公礼聘先会元公主讲保定莲池书院。曾公会试同年也。时先会元公掌教易州、涿州、新城三处书院，以就省会讲席道远，不能往来兼顾，力辞之。士子坚请每月送文批阅，恳之至再，始允兼顾。四月余同先五叔父谒见曾公，询问周至，并为指示读书作文之法，谈至两时许，且曰汝祖养亲教子，高尚其志，家庭之乐胜余百倍，真福人也。

是年三月与俄人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二十二款。八月订科布多界约，立牌博二十处。九月与粤人订条约四十五款、通商章程九款。

九年庚午二十岁

七月入都学院，牌示考优诸生报名定期考试，到者一百数十人，余文置第一，正场直隶额取六名，余名列第三。是秋乡试荐而未售。

是年俄人因回乱以兵据我伊犁，饰辞曰代收代守。

十年辛未二十一岁

夏入都朝考，列三等第一名，以教职注册。是秋大水，出京行至长辛店，水阻不能行，雇一驴绕山中行二日，至黄土坡乘船回里。

十月初九日未时长男政敷生。

是年日本来缔约通商。

十一年壬申二十二岁

在家读诗经，考释四家异同，注于简端。

五弟树棠生。

二月四日太傅一等侯大学士湘乡曾文正公国藩卒于两江总督任所。

贵州苗乱平。

十二年癸酉二十三岁

曾祖母杜太宜人卒。太宜人晚年腿疾不能行，终日坐卧榻上，吾祖父母朝夕视寝，食必亲调，未尝贷以他人。昼则使子孙二人舁之以椅，吾祖父扶持左右，巡行园野中；夜则说书或影灯作戏，以娱心目，如是者数十年。太宜人终身不患病，是年忽得噤口痢，百治不效，不食二十余日，至七月十二日申时始卒。距生于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卯时，享寿九十有六。是年乡试荐而未售。先五叔父考取拔贡生，书法最工。明年丁田太夫人忧不能赴朝考，人咸惜之。次男双琴生。

甘肃叛回一律肃清，诏左宗棠以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统筹出关西征诸军事。

云南回匪平。

十三年甲戌二十四岁

正月十六日辰时祖母田太夫人卒，距生于嘉庆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卯时，享寿六十有八。直督李文忠公聘余修畿辅通志。先

是文忠公到直督任，开畿辅通志局于古莲花池，聘贵筑黄子寿师主其事，地为旧岁行宫，与书院仅隔一墙。先会元公俾余与先五叔父同受业于其门，子寿师亦送其子国瑾受业于先祖，余到局任分纂，与桐城劳玉初乃宣同驻藻泳楼下，终岁薪金交家公用，月课所得奖赏银奉先太夫人，每岁约二三百金，先太夫人用度始稍裕。刘夫人随先太夫人同居书院，奉先会元公命也。十二月甲戌穆宗毅皇帝崩，以醇亲王奕譞长子入嗣大统，明年改元光绪。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是年五月与秘鲁人立会议华工专条，订条约十九款。

光绪元年乙亥二十五岁

在志局。是岁恩科乡试不第。是科首题为有德者必有言四句，余科考举优即以此命题，取第一名，场前月课亦是此题，余作三篇，两取超等，一取特第。入场前一夕检点应携之物，月课三篇纳入夹袋中，及题旨下，取阅此文均失所在，知被同人窃去矣。于是力避前作，矜心作意为之，逮至榜发，并未荐，而窃余文者一中式，一荐而未售，以二三艺不称也。文章果有定价乎，抑无定价乎？长女佩箴生。

冬杪庶祖母焦孺人来侍。

二月帝命左宗棠以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办新疆军务。

二年丙子二十六岁

在志局。乡试中试第十一名，房师为上高陈仙楼先生卿云，座师为殷谱经先生兆镛。双琴殇。

是冬李文忠公由津回省院试，诸生以《盐铁论》书后命题，

得余文拍案惊赞，时余以先会元公长院避嫌假他人卷，文忠遍询不得作者主名，久之知为余作，谓先会元公曰：苏长公后不见此等文字矣，名儒名臣拭目俟之。桐城吴挚甫汝纶、湘乡曾栗诚纪鸿、无锡薛叔耘福成、嘉兴朱亮生采、赵桐生铭皆来纳交。是年先兄树芬入邑庠。姑母凤生。次女生而即殇。

是年七月因滇案与英人订烟台会议条约三端，准在湖北宜昌、安徽芜湖、浙江温州、广东北海四处开通商口岸。俄人夺取浩罕建费尔干省。

八月新疆北路肃清。

三年丁丑二十七岁

正月二十九日酉时，先大夫弃世，距生于道光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午时，享寿四十七。余在志局闻患胁痛，驰归延医诊治十余日不效。先大夫素精于医，自拟一方亦不效，盖染时疾兼引发旧症，故不易治也。歿后一月，部选东安县教谕。（《新城县志》载，先大夫性孝友，母病，祷天誓身代，断酒肉三年。兄弟五人怡怡终其身。治诗究心训诂，尝论南风、雅、颂皆古乐也。诗之以雅以南，左传季札之所谓象箛、南、箏，南即周南、召南，与风迥别。素精于医，著有《医药家帐》。主讲安肃凤山书院，门弟子多成名。）十月先会元公患头疽，初八日酉时歿于莲池书院，距生于嘉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未时，享寿七十有一。（《畿辅先哲传》载吾祖养亲不仕，学以程朱为主，博通群籍，治礼尤深，兼通堪舆之术，著有《礼记通义》、《儒先粹语》诸书，历主讲易州、涿州、新城书院，曾文正公督直，聘为畿辅莲池书院山长，门弟子至数千人，人方之郭林宗、陈实云。）

一年之中连遭大故，自愧人子不知医，为大不孝，力辞志局之事回家守制，子寿师再三不允，命满百日来局办事，谓此与服官不

同也。

五月克复吐鲁番诸城堡。十一月克复阿克苏等东四城。

四年戊寅二十八岁

李文忠公聘子寿师兼长书院，创立学古堂于古莲花池，专课士子古学，北方士习，自此一变。季春余回志局。余素喜考订之学，局中若崔芋堂迺鞏、蒋侑石曰豫、袁爽秋昶、方子瑾恮、丁听彝绍基，皆方闻博雅之士，朝夕过从，质疑问难，获益良多。是年成《校正孔氏大戴礼补注》十三卷，王文泉刊入《畿辅丛书》。

佩箴笏。

二月克复喀什噶尔等西四城。

五年己卯二十九岁

在志局，辑《畿辅方言》二卷，子寿师见子曰：即以此作入通志中，以备一门。是冬成《中庸郑朱异同说》一卷，子寿师代为刊行。定州王文泉灏搜采古今名人著述，汇刊《畿辅丛书》，邀余襄办。文泉好谈性理，不喜词章考据之学，应刊之书若通州雷氏父子、河间苗先麓未刻诸作，皆束之高阁，而人所习见若《春秋繁露》、《广雅》、《大戴礼》诸书，既非古本而首先付梓，可谓不善择矣。

是年日本灭我琉球夷为冲绳县，虜其王及世子而去。

六年庚辰三十岁

在志局会试不第，著《尔雅郭注异同考》一卷，《建炎前议》一卷。桐城方存之先生宗诚，评《建炎前议》似刘知几《史

通》。

是年俄人败盟，上命山西巡抚曾忠襄公国荃赴山海关防海，路经保定，聘余入幕。时余方回里，子寿师代为婉辞。忠襄公必欲余来保定面商，师云：“实告公，吾局一日不可少此人，虽面商吾亦绝不放手也。”乃荐劳玉初偕往。

是年七月与德人续约十款，善后章程九款。十月与美人续修条约四款，续补条约四款。

七年辛巳三十一岁

在志局。四月二十九日三女秀生。

是岁成《墨子三家校注补正》三卷。三家者，毕秋帆沅、王怀祖念孙、俞荫甫樾也。

是年俄人交还伊犁，改定条约二十款，偿还代收代守所需诸费共银卢布九百万元，议定专条交纳。复续改陆路通商章程十七款。九月立约勘分界，伊犁建牌博三十三处，阿克苏天山建牌博五处。八月与巴西国订条约十七款。

八年壬午三十二岁

吴挚甫先生知冀州，聘余为主讲。冀州书院以书致子寿师，求其允让，师见之大愠，复书语多讥讽。挚甫再以书请，有“子夏设教西河，正以广传师道之语”，辞极和婉，吾师坚持不允，挚甫立上辞职书于李文忠公，谓某作官一无所长，惟整顿学校为国家造就人才尚堪自信，今求一山长而不得行其志，尚何面目尸此位乎？时文忠方遭母丧，乃请署督张靖达公树声代为和解，遂与吾师议定，保定、冀州各住半月，而二人自此水火矣。是年子寿

师特授湖北襄阳道，余偕同人钱送于二十里外，即赴冀州。州属五县，摯甫选送高材生七人（冀州二人，县一人。），于书院肄业，官给膏火费，余人书院者，皆备资斧。购置书籍数千卷，专讲求经史有用之学，以其间习时文试帖，若赵衡、李谐、刘登瀛、吴镗等皆一时之秀也。摯甫为古文名家，朝夕讨论，余自是专攻古文，不复为骈俪文字矣。

著《夏小正订经》一卷、《夏小正订传》四卷。

是年建设新疆行省。

九年癸未三十三岁

会试不第。十二月二十三日刘夫人歿于里第，年三十二。先是子寿师赴官去，莲池山长一席，文忠公命藩台崧骏函商于余继主此席。余言先祖主讲此席相隔仅四五年，考课之士，大半为余前辈，余以年少后生忝居师位，不惟余心不安，亦必不能孚众望也。崧曰：“只论学问，不在年之老少也。”余坚执不允，乃与摯甫共荐张廉卿先生裕钊来主此席。

著《尚书商谊》三卷。

是年与俄人改订新界，立哈巴河界约。八月立哈巴河口约，建牌博四处。又立迈喀普奇盖界约，建牌博三处、小牌博二处。九月勘分塔尔巴哈台属地界，建牌博二十一处。

十年甲申三十四岁

迎侍太夫人居莲池志局。五月二十一日酉时四弟树椿卒，年二十三。十二月杨夫人来归，少余三岁。夫人为乐陵知县清河杨琴舫先生一鹤第二女。

初王文泉得知不足斋所藏闲闲老人赵秉文^①《滏水集》二十卷，系抄本未刻，余以其诗为金源一代大家，而后人分体编辑，殊嫌繁杂，余改编年为《目录考证》二卷、《年谱》二卷。

五月与俄人勘分克什喀尔天山之约，建牌博二十二处，指山梁为界者七处，是为南路西北界约。

七月 日，东阁大学士恪靖侯浙闽总督湘阴左文襄公宗棠卒于福州，年七十三。

十一年乙酉三十五岁

携杨夫人及弟树棠、儿政敷居冀州。秋间杂患肠痛，门人皆赴都乡试，惟王景逵居忧在侧，朝夕侍汤药，月余未解衣卧。时畿南大水，不辨厓岸，家信阻绝，清河送疡医来治之，久不效。文泉闻信遣人来求余著述，恐死后遗失也。余自拟一方，用神仙活命饮加减金银花半觔、蒲公英半觔、连翘四钱、当归八钱，乳香、没药、去油各三钱，厚朴、枳壳各二钱，生军一两、甘草一钱，煎一大碗，频频服之，夜间大泄二次，色如烂鱼肠，至五更脓血自脐中涌出，衣被皆污湿，自此遂愈。

是秋先五叔父举于乡。

法人侵越南，四月与法人订新约十款，南掌亦折入于法。六月与英人订烟台续约十款，议定洋药税厘章程也。十月英相沙力斯伯里谋代缅甸假判断木商歇业为名，由印度派兵进攻，入蛮得勒，禽其王，流之印度孟买海滨拉得乃奇黎岛。

^① 赵秉文，金代滏阳人，字周臣，大定进士。兴定初累拜礼部尚书。性好学，多著述。

十二年丙戌三十六岁

会试中式五十四名，是科大总裁为吏部尚书锡席卿先生珍，左都御史祁子禾先生世长，户部尚书嵩狹山先生申，工部左侍郎孙莱山先生毓汶。余卷为席卿先生取中，房师为编修唐春卿先生景崇。殿试三甲四十八^①名，朝考二等 名^②，钦点主事分户部广西司。挚甫劝改知县，曰一官一邑尚可为民造福，京官碌碌徒耗岁月耳。冬初遂改知县。

三月与法人会议越南边界通商章程十九款。六月与英人会议缅甸条约五款。

十三年丁亥三十七岁

部选四川青神县知县。八月领凭赴川，乘船至天津，谒见文忠公。公戏余曰：青神为蜀中极苦之缺，吾为汝函告川督刘仲良请汝长省垣尊经书院何如？余应之曰：是为冯妇也。文忠大笑，因言老年伯（先祖与其尊人文安公丁酉同年）积学累行，郁久必发，其在君乎，以君之才之学，非久居人下者也。时先三叔父、五叔父暨同县王鹤田主政毓芝，皆送余至津而返。舟行至道口，换车到西安，见子寿师，时署陕西按察使，住十日，易肩舆而行，十一月至省，谒见列宪交凭。时四川总督为刘仲良秉章，布政使为崧锡侯蕃甫。十月即悬牌饬赴新任。十二月启程，过眉州，谒见本州毛季彤隆恩。初八日到青神接印。当余初入县境，途中呈告讼棍云觀光者十余起，至则先出一硃票，密令差传至县，次日接印后即行提讯，种种属实，责收外监。以后坐堂问案必提出，

① 原文此处空，“四十八”、“三”字系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补。

② “名”前原文即空。

令其在旁跪听，并发给先儒理学诸书在监中阅看，每书阅毕，命作书后一篇，半年之后，痛自悔吝，卒为善士。青邑士绅强而好讼，自是讼庭之上，足迹遂稀。

是年二月与葡萄牙人订条约五十四款。五月与法人续议滇越界务专条五款，商务专条十款。十月会议洋药专条三款。

十四年戊子三十八岁

青神地狭民贫，全县精华在鸿化一堰，灌田二万余亩，旧例掘埝浚沟，每岁由堰户按亩分出钱米，自豪强之家隐田不出，概派之零星小户，费用不敷，堰遂荒废，至今且四十余年。去岁余过眉州，毛公为余言堰废之故。余曰：均则不贫，何不清丈，以复其旧。毛公曰：君到任三四年后，利弊周知，然后着手，庶有把握。余应之曰：某到任两月不成，则无能成之日矣。毛公笑而不言。余于接事后三日，即传上下两堰绅士，案照旧册清查堰户田亩若干，是否如旧，其有隐匿者，速行具报，不究既往，只责将来。迨全册造齐，亩数所差甚夥，乃于是年四月亲督清丈，二十日竣事，隐匿之亩概行清出，比较旧册亩数尤多。于是设堰长、沟长，定通渠夫数、堰差口食、上下堰分水日期，应出钱米比旧减半两，阅月全堰告成。是岁堰水畅流，年岁大熟。清丈堰亩章程票略云：某到任后，查县中有益于民者，莫如鸿化一堰，而害之大者，亦惟鸿化堰为最甚。堰为唐朝张武等所兴，厥后岁久就湮，堰田遂废。逮我朝嘉庆年间，知县事颜谨荏任斯土，相地兴工，筑堤数里，并于上流添筑鱼嘴长坝，斜截江水，疏通沟道，堰工遂成。凡灌田一万九千余亩，每年筹议岁修经费，一亩出钱一百三十文，米八合，立定条规，永远遵守。咸丰十年，遭蓝逆之乱，水册被焚，于是百弊丛生，堰务从兹大坏矣。某查明其弊，约有数端，如每年兴修，堰上向由水户公举八人承充堰长，自行

设局，每亩经收，年满报换，官不与闻。从前户无遗漏，经费充裕，迨后狡猾之徒谋充堰长，一旦得手，不特本人应出钱米，匿不缴纳，并将亲戚故好揽收入己，从中渔利，任意侵吞。此弊一生，于是强豪之家抵隙抗违，不出钱米，岁收堰费不能敷淘沟修埝之用。堰长乃出钱垫办，苟且塞责，至次年更报堰之时，又将底册隐匿，其族邻亲旧，所纳之水亩私心剔除。而黠巧者一柱改为数柱，朦混躲避，使堰长无从查考，现在出费水户，寥寥无几。一充堰长，出钱垫办，往往倾家破产，人人视为畏途。举报者假公复仇，彼此攻讦，连年缠讼，案牍累累，百无一结。查向章一户充当堰长一载，必须过十五年方准报充。近年因堰长受害，遂至一人认充后，私行约集数十家另立一名，名曰朋充，自有朋充之弊，于是殷实之家可充堰长者愈少，而强而有力者，又不敢举充，年年报换，率皆零星小户，贫民鱼肉至此极矣。先年知县侯维楨目击堰务之废弛，欲加整顿，清丈水亩一年有余，而房书舞弊，有宜入水亩而遗漏者，有不宜入水亩而妄行拨入者，其中以多报少，以少报多，种种弊端，不可胜数。当时水册不足为凭，人心亦皆未允，因循含混，以至于今。某以为此事由官办则剔弊为难，由绅办则成功较易。查鸿化沟所溉之田凡四十余沟，每沟酌其长短设立沟长二三人或四五人，即择附近堰田公正可靠者充当斯任沟长，先持草簿分段清查，然后大水户持簿丈量，较其虚实，沟长有弊，则水户禀究，水户与沟长作弊，则众水户禀究。大水户由其详择，凡得二十七人，沟长由水户公举凡得一百二十一人，上下周巡稽察。其法则先清后丈，不扰不遗，一处有事，众处会勘；一人有弊，众人共议；事则一时并举，工则两月可期，先儒所谓功约易成，力多易举者也。兹特将清丈规条及举办情形先行开具清折，禀请宪台俯赐察核。清丈时，遇有绅衿阻挠不服者，准指名详革，严行惩办。七月调取戊子科乡试、帘差，交卸进省派充房官。是科正主考为张文达公百熙，副主考为赵殿撰以炯，本房取中十六名共十二房，以取中八名为定额。若曾继光、李滋然、罗迪楚、胡启心皆卷隶他房由余批荐者。张公鄙赵不知文，卷皆分中，凡名列单数

者皆张所取，双数者皆赵所取。张公每于取中之文必经余改定，始刻入闱墨，惟第六名李滋然卷系赵所取中，亦张公潜属余改正者也。十月十三日檄回青神本任。是年三月二十二日辰时次男禹敷生，小名青生。四月十二日辰时四叔父卒，距生于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十六日丑时，享寿四十六岁。

十五年己丑三十九岁

鸿化堰斜截江水入渠，渠头有山河一道正冲渠身，向筑石坝横截山河，与江水合流入渠。然当山水盛涨之时，每年冲毁石坝，顺流南下，不复入渠，为害甚巨。余相度坝身太高，当山水之冲，万难抵御，岁岁冲决，势所必然，乃将坝筑矮二尺，与渠正平，河水大则从坝上翻过，水小则并江水入渠。又密筑木桩于坝底，桩与桩相间三四寸许，玲珑透水，以缓水势。自筑之后，永无冲决之患。九月九日眉州知州毛公隆恩卒于任所，十六日奉檄兼理州篆，两处往来夫马皆自备，所有应进之款均归毛公，一不闻问。至十二月十八日交卸，其子庆诚奉二千金致谢，余置诸灵前再拜作贖仪而去。六月十五日酉时长孙女存生，政敷长女也。成《广雅补疏》四卷、《尔雅郭注佚存补订》二十卷。

十六年庚寅四十岁

在青神择衙东仓廩隙地辟一花园，颜曰“止园”；建船房五间，颜曰“笈扬补费之庐”。亭一、榭一，园中花木大半皆士民所移植，近百种，未尝告余也。余在任二年，余颇为民所亲爱，园亦任民往来如其家然。今始知孟子所言与民同乐之味。三月二十五日彭山知县孙绍龙母忧去官，本州尹公寿衡详委余兼理，半

年交卸，一如兼理眉州时。五月刘公奏请余与资阳知县施调赓对调，奉部议驳以施令有二参案与对调例不符。刘公太息曰：“补不准，署可也。”遂于十二月初十日檄余调署资阳，周令镛接署青神，余于二十三日卸任。

是岁成《费氏古易订文》十二卷、《离骚注》一卷。

是年二月与英人会议藏印条约八款。

贵筑黄子寿师是年卒。师名彭年，道光癸卯顺天举人，乙巳进士，丁未补行殿试改翰林院庶吉士，庚戌授编修。历充国史馆协修、翰林院撰文、武英殿纂修。咸丰三年，请疾回籍。同治二年，召来京以母丧未葬辞。七年直隶总督李文忠奏派总纂《畿辅通志》，寻起授湖北安襄郢荆兵备道，历湖北、陕西按察使，擢江苏布政使署理江苏巡抚，调湖北布政使，卒官，奏入国史循良列传，著有《陶廑文集》十卷。

十七年辛卯四十一岁

正月初二日赴资阳任，云觀光徒行送至资阳，涕泣而返。余尝谓世无不可感化之人，即此一事可见也。初五日至资阳住廖家公馆，杨夫人年前先至。正月四日午时生三儿勇敷，小名资生。初六日接任。杨夫人于除夜祭祀受风寒大病，余至，延医诊治终不效，二十四日酉时歿于公馆，距生于甲寅十二月十二日亥时，享年三十有八。三月初十日亥时长兄树粉卒，距生于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享年四十三。余每莅任，始至之三四月内皆坐大堂问案，任人观听，书差不能蒙蔽一也，使人知所劝惩二也，可以通上下之情三也，久之人人相信，然后退坐二坐，仍令人随便观听。余每听讼必置城乡保甲册于案旁，原被告两造系何乡之人，

平素作何职业，遇案检视，可以考证其为人。原被到堂，须使之一一尽言，参互质证，必有罅隙可乘之处，讯时宜五官并用，其要尤在察人词色，不但原被及中证，即旁听之人于问之当与不当，意之然与不然，亦无不流露于辞色之间。古者观人之法，无不在是，不第听讼已也。川民好讼，案牍之繁，甲于他省。余初到任，每日问案辄三四十起，两月之后，词讼暂希，日不过二一起而已。有案必讯，有讯必结，除盗案及债账外，无不一二堂了者。我偷一日之闲，则讼者受全家之累，况羈押乎？余生平自誓不敢作此孽也。

是年聘洪雅萧履安先生在署教儿子政敷学算，余听讼之暇亦从学习，成《天元草》五卷，复以天元法推算十月之交日食年代，实为幽王六年十月朔辛卯日，郑康成谓在厉王时者误也。因成《十月之交日食细草》二卷。仲冬并研帅恭人甲君来侍。

十八年壬辰四十二岁

在资阳正月十九日寅时大妹卒，年三十六。四月杨夫人妹来归，先是杨夫人病革时以其妹相托，盖为两儿计，恐遭后母之变也。其妹少余五岁，两目中路失明，余亦为儿计遂许之。资阳城北半里许有凤凰山，其顶平坦，余辟一园，蒔花种竹，名曰章园，取《尔雅》上正章之义。七月二十二日檄回青神本任。

九月刘恭人癸君来侍。十月甲君产一女殇。十二月十八日大计荐卓异。

三月初八日奉檄调署新津。新津向为盗藪，前因徐营官锦堂与知县颜某互相稟请，刘公偏袒营官，将颜某撤任，徐锦堂调回省垣，永不派兵住扎，盗益猖獗，白昼横行街市中，抢劫焚杀，

无敢过问者。实任栗秉终日不敢出署，午后即将城门关闭。大堂设大炮以备非常，久之署中书差、城中绅士多与盗通，官成孤立，不得已告病开缺，当道商委余署理。有谓某文人恐与此缺不宜，刘公曰：某明干有为，不避艰险，非伊不能办此贼也。四月余到任，募堂勇二十名，三日之内，连劫十三家，盗贼所谓送到任礼也。第四日，余派都司黄芾堂带勇四名、乡团十名，巡至城西张场，正值市期遇巨匪何麻子数百名，格斗一时许，亡勇一名，伤团丁三名，枪毙数贼，何麻子受重伤而逸。第六日，邛州贼魁牟花脸遣其族人牟千总（忘其名矣）来谒，愿为调人，每月送贼钱米若干，不使一贼入境，且曰：各州县官多如此办法，顾自己考成。余拍案曰：汝敢以此尝试我耶？可谓自投罗网矣。当即系押署中，曰：汝不指窝家，不获有名巨匪，即以汝当之，不汝贷也。以后抄一窝、获一贼，余即声言系牟某所指，贼闻之衔恨入骨。群谋杀之以泄忿，牟自此不敢出署一步，专为余画策。每获贼即使某当堂质证，不事刑求，无不承认者。余之办贼，颇得此人之力。后余交卸去新，某涕泣曰：余死无日矣。后卒为贼党所害。邛、蒲、新、彭、双流、大邑六属之间，有名巨贼十八支，每支或千余人或数百人，到处抢劫，而邛州、新津尤甚。余初委此缺，幕友、家丁皆托故辞去。到任之始，招堂勇二十名，继又招二十名，城乡共练四团，每团二百人，因据实禀报要求三事：请准某越境拿贼，邻封不得阻拦；请获贼讯明后，即禀委邻封官覆讯，就地正法；请派勇一二哨，住扎城内，看守监狱，以便某时时出城缉捕。如此两月后，地方若不肃清，即请撤任参办。刘制军皆一一批准照行。自是之后，访实贼窝即率勇亲往抄拿，六属之地，周巡殆遍。始而贼犹拒捕，后则闻风逃遁，见余一二堂勇，

贼虽众，无敢聚而相抗者，八月之内共拿获三百余贼，正法者八十余名。邻封盗案皆来就质讯，而新津则自余到任五月之后，地方无一报盗者。余尝谓官不畏贼，则贼必畏官。前此皆官畏贼所致耳。十二月二十八日调委富顺，酬新津之劳也。

是年十月与英人会议藏印续约九款。

二十年甲午四十四岁

正月十六日到富顺接印视事。三月初一日刘公奏余与铜梁知县施鹤龄对调，疏言铜梁地居川东，民多健讼，且多民教交涉之事。青神县知县王某，年强才练，能任劳怨，人地实属相宜云云。奉部议准其对调。六月以钦案调省，钦使为裕德廖寿恒，覆奏以用刑违例，交部议革职。初余署资阳，有举人蓝光第父子兄弟把持衙门，诬财健讼，为人控告，余讯实掌责数十，令其具永不干预公事切结。是年蓝赴京会试，正值御史覆参制军刘公之时（前御史弹劾刘公，公覆奏有何物言官之语，遂激众怒。）于是蓝购买其乡人给事中吴光奎牵连入传，捏告余在资阳杖毙王姓一人，及委员调查并无王姓其人，有土贼黄光恩者笞责收押，因病保出后身故，遂以此实之。（土贼黄光恩尝统痞棍拉夺杜满三船只变卖，又纠痞多人将满三拉去关禁，手执枪刀，吓诈银两。其妻杜邹氏喊控，派差将光恩拿获讯实，正拟照棍徒例票办，旋因患病省释，后因病身故，并非杖毙，有保状在案可查。委员聂时窳意在借此索贿，故入人罪。资阳士民闻之愤懑，随即具禀制军，谓聂本宜宾人氏，冒籍云南永善中式举人，仍回籍服官本省，素行无赖，人所共知。刘公据此严查属实，立予参革，曰免其再害好官也。）部议：王某在资阳任内有案犯因杖责过多，后病故亦属有违定例，即指此事也。（委员聂时窳既以张冠李戴，复捏言杖责四十大板，托银号李雅泉示余索银四千两，余痛詈之，遂据此禀复入奏）。

十二月张文襄公署督两江，电调余赴金陵。进谒刘公，公谓余曰：“诸君因余受累，老夫身任封疆，不能保全一贤属吏，惭愧之至，但一时之得失，不足为君荣辱。张公爱才，此行必有嘉会，扶摇直上，转瞬间事耳，老夫当拭目俟之。”十月初十日子时四儿富官生，癸君出也。

是年正月与英人订滇缅条约二十款，议定两国边界。二月与美人会订华工条约六款。日本侵朝鲜，我兵战败行成。

二十一年乙未四十五岁

四月携眷赴金陵，顾幼耕复初、王冬生咏言、罗济川度、陈衡斋矩、袁玉田启昆，饯于望江楼上，赋诗而别。舟行至宜昌，换江轮抵金陵已六月中旬矣，谒见张文襄公。翼日移居幕府，办理洋务、防务兼办折奏。柯巽庵逢时、梁节庵鼎芬、黄公度遵宪，朝夕过从甚乐。会甘肃回乱，杨石泉制军征军火于上海。十月文襄檄余解赴甘肃，施燮夫焕副之。十二月舟行至金紫关度岁。七月十日辰时五儿奎生生，甲君出也。

是年与法人续议中越商务专条附章九款，界务专条附章五款，中越边界会巡章程六款。四月与日本订马关条约十一款，俾朝鲜独立为自主之国，增开荆州、沙市、重庆、苏州、杭州通商口岸，偿军费二万万两，割台湾省及澎湖列岛。三月英人、俄人私分帕米尔。

二十二年丙申四十六岁

在金紫关换骡驼运省，正月杪到兰州，谒见制军杨石泉官保昌濬。时回起如麻，官保束手无策，如理乱丝，被劾褫职。上命新

疆巡抚陶勤肃公模带兵入关，升授陕甘总督。三月到任，四月聘余入幕，专办折奏。勤肃公只携其次子拙存名葆廉者在署，勤肃自服官以来，不带眷属，拙存新婚未逾月亦只身随伴，父子俱讲理学，拙存尤渊雅嗜学，博通中外，署中清肃异常，诚督抚中所仅见也。十月余由北大通保案开复原官，奏留甘省补用。撰《彼得兴俄记》一卷、《欧洲族类源流略》五卷。五月二十七日酉时五叔父卒，距生于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亥时，享寿四十九岁。十二月帅氏戊君来侍，亦井研人也。

二月初八日五儿殇。六月十九日四儿殇。

是年与日人订通商约行船条约二十九款。

二十三年丁酉四十七岁

正月陕西巡抚魏公光焘奏报全省肃清案内保余，俟补缺后，以直隶州知州补用，经部议行知在案。五月赴京引见，便道回里省母，住一月余，至开封小住。儿子政敷以知县听鼓河南，眷属全居政儿寓所。谒见河南巡抚刘静涵树堂，为订其孔夫人诗稿。

十一月携眷赴甘。

十一月晦日三女秀，年十七，患口疔亡。

是年正月与英人续议缅甸条约十九款。

七月某日太子太傅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高阳李文正公鸿藻卒，年七十有六。

二十四年戊戌四十八岁

正月初八日到甘，仍居幕府。回乱既平，朝廷以董福祥有平

回之功，调卫京畿。余上书高阳李文正公谓：董毫无战功，河州逆回未加剿办，全恃回首马安良调停之力，其用兵全无纪律，到处骚扰甚于贼匪，而恃功骄蹇几于不可向迳。若调至京城，不但不可恃为劲旅，且粗犷无知，必为国家生事。因录呈余丙申纪事诗一首，谓此余所亲见，无一虚语，朝廷万不可为其所欺，而文正不省也。余为陶勤肃公致大学士荣禄、翁同龢诸公书，又剴切陈之。荣禄因受其贿，不以为然，后卒酿成庚子之祸。十二月檄余署理中卫县知县，勤肃公谓余曰：自古黄河富宁夏中卫大小二十余渠，惟七星渠为大，但受山河之害废弛已八九十年，历任以工程大而且难，至今尚未修复，汝到任后，亲身踏勘，究竟能兴复与否，据实告余，此关乎国课民生最大且要者，吾之委汝署理此缺，正为此也。余应之曰：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但患人不为，非必不能为也。勤肃笑而颔之。撰《螽叟》七篇。三月初七日酉时二女寿芝生，甲君出也。五月接家书，二妹亦患唇疔而亡，享年三十二。闰三月十七日丑时三叔父卒，距生于道光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亥时，享寿六十五岁。八月初六日戌君卒于兰州，距生于戊寅正月十五日辰时，年二十一岁。氏嗜读书，《四书》、《诗经》、《左传》均能上口，书法妍秀，侍余仅二十月而歿。

某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因改革政治，有谋危太后之变。

是年与俄人会订条约九款，以旅顺、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国，旅顺、大连湾准俄人建筑炮台，安置防兵。又会订续约六款，允西北利亚铁路通接辽东半岛之枝路，末处在旅顺口及大连湾海口。二月与德人订胶澳租界条约十款，与刚果国议定专章二款。四月与英人会议展括香港界址专条。五月又议租威海卫专

条。

二十五年己亥四十九岁

二月赴中卫接印视事，传七星渠绅士询明兴废之由。四月初余渡黄河赴宁安堡，带同宁安巡检童爱忠查勘渠工，自泉眼山渠口至白马、张恩二堡延长一百七十八里，灌田七八万亩。通渠受山水之害四：一渠口、一小径沟、一丰城沟、一红柳沟。四者惟渠口之南山河水最大，源出平凉固原入县境，即《水经注》之高平川水。其暴发也，挟泥而下，正当渠口之冲，岁为渠患，此处不治则黄水不能入渠，宁安堡四百户（村名）之田均失水，不能承运，遑问下游小径沟。红柳沟，向修暗洞，自道光间被山水冲坏，至今未复，鸣沙洲以下之田三四万亩全行荒废。余上下踏勘，与渠绅议定，渠口修进水闸三座，退水闸三座，接连修筑挑水矮堰，直抵渠口，山水发时则闭进水闸，开退水闸，将山水泄入黄河，不使入渠；山水再大，泄之不及，则从矮堰上翻出以入黄河，盖矮堰即为渠身水平也。小径沟改修飞桥，使渠水从桥上流，山水从桥下流。红柳沟重修暗洞，使山水从洞上流，渠水从洞中流出以灌白南通滩，其丰城沟、双阴洞则略为修补无大工作，约略估工须万余金，由仓粮变价，渠成由领地人口，每亩摊还，不费国家一钱，而国课民生两有裨益。即据此通禀列宪。勤肃公立即批准，拨四旗勇丁帮同修浚。惟已交夏令，正值农田栽种之时，须俟明春工作。

七月初六日申时三女琳生，癸君出也。八月蒙陶公奏补中卫知县。九月初二日奉旨依议。

是年三月与俄人勘分旅大租界专条八款。八月与韩人订条约十五款。十一月与墨西哥人订条约二十款。二月与英人议定坎巨

提为中英两属之国。

二十六年庚子五十岁

四月进退水闸成。六月小径沟飞桥成。自渠口至鸣沙洲渠身八十二里，均照估定深宽尺丈，一律开挖竣工。鸣沙洲中段之田垦四十余顷。最奇者四百户有沙阜三处，土人呼为大沙哥、二沙哥、三沙哥，均长百弓，上下有一沙阜紧靠渠身，随挖随壅，为害数十年，无法改避。余帅绅士告祭，一夜忽迁无迹，岂此沙亦有神耶？

旋奉魏午庄制军函，因拳匪为乱，所有修渠营勇调赴平凉防堵，命暂停工，俟军务稍松再议修渠。是年五月义和拳匪乱作，山西拳匪由包头窜入宁夏，本道府（均旗人）招人署中，令民学习。不数日，窜至中卫，余即示谕通县人民有敢容留学习者，从重惩办。即密禀制军请其通飭全省，遇有拳匪，尽法惩治，以保完善之区。本道府奉到通飭之后，始行遣散，不然者且将余罪矣。是年八月十六日太夫人携五弟树棠避拳匪之乱至中卫。八月十六日丑时六儿卫官生，癸君出也。

七月东西两洋十一国联军入京，两宫西狩长安，命和硕庆亲王、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各国议和。

二十七年辛丑五十一岁

九月红柳沟暗洞成。春间余在红柳沟旁筑室三间住居，四月余即在此办公听讼，稍暇手持一布伞，上下督工，与民同作同息，凡七阅月告成，至是通渠山水之害均已消除，惟以下渠道尚有六七十里，中隔土山，开浚殊为棘手，过此则五十余里，一望平原，

易于工作矣。是岁大计卓异。成《欧洲战事本末》二十二卷。太夫人思念家园甚切，不欲久居署中，八月遣人侍送回里，时五弟以州判分陕候补已到省矣，太夫人至西安住数日，即回新城故里。

是年七月与各国订和约十二款，惩办首祸诸王公大臣，偿费海关银四百五十兆，展宽京都各使馆租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

八月两宫回銮。

九月二十七日，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晋封侯爵直隶总督合肥李文忠公鸿章，卒于京师。

二十八年壬寅五十二岁

白马滩田地荒芜，民户逃亡数十年，无夫可派，崧制军蕃仍饬拨勇兴修，余以派拨兵勇在在需费扰民，又不能尽受地方官呼应，不如即以助饷津贴一项改雇民夫，既无旷日之工，又省无名之费。制军即批准如议办理。于是照七星渠每亩出夫之法，每田二十五亩出户一名，共得夫一千二百名，每夫每日给银一钱以为口食，余住居工所督作。自七月起至八月二十五日毕工，开通大渠八十一里，全渠自此告成，随即稟定渠章，立案永遵。今则渠水畅流，荒废之田尽成沃壤矣。是年四川总督岑云阶春煊奏调四川开缺以道员补用。八月九日亥时五女生，癸君出也。十二月成《希腊学案》四卷。

是年三月与俄订交收东三省条约四款，交还关外铁路条约七款。八月与英人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十六款。

六月两广总督陶勤肃公模卒。模字子方，某科进士，由州县

起家，历官至总督，数十年未尝携眷至署，其廉正为天下第一。余有送公赴两广诗序，莅任三年，以病连疏请开缺，寻卒。余之第一知己上司也。余以“陶庐”名斋，陶即指公言。

二十九年癸卯五十三岁

是年开经济特科，陕甘总督崧蕃、四川总督岑公春煊、工部左侍郎唐春卿夫子均以余名保荐，锡清弼制军良督蜀亦奏调余来川。余以三月交卸请咨赴引陛见，后以道员仍发甘肃补用，不复应特科之试。六月出都回籍省母，住二十余日，迂道赴河南新郑，时儿子政敷署理新郑知县，住数日，八月初到甘，始知四月初八日卫官殇。九月赴陕西兴安查钦案。十二月回省，崧公已奏补余平庆泾固道矣，去交卸知县仅十月耳。

七月二十八日卯时先伯父宁远公卒，距生于道光八年四月十八日卯时，享寿七十六岁。

八月与美人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十七款，与日人订通商行船续约十三款及续议内港行轮章程。俄人夺我浩罕，置费尔干省。

正月十二日余友桐城吴挚甫汝纶卒。汝纶受业于湘乡曾文正公，与武昌张廉卿同授古文义法，为一世大师。同治乙丑进士，累官冀州直隶州知州。廉卿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廉卿去后，挚甫辞官继为山长，教授生徒讲实学，游其门多能为文。庚子乱后，朝廷变法，诏用西国法，立大学于京师，以尚书张文达公百熙为管学大臣，张公荐挚甫于朝，命以五品京堂为大学总教习。挚甫先往日本考求学制，归里即卒，年六十有四。

陶庐老人随年录卷下

三十年甲辰五十四岁

制军檄署巩秦阶道。二月初十日至秦州接任视事。四月二十七日交卸到省，赴平庆泾固道本任衙署，三堂被焚，两年无议修复者，余捐廉重建，复创办中学堂，亲为教习。四月二十三日午时儿敬敷生，癸君出也。

是年三月与英人会订保工条约十五款，与德人会订青岛设关章程。

三十一年乙巳五十五岁

四月陕西巡抚升吉甫允授陕甘总督，到任即调余署理兰州道，七月二十一日到省接印。甘肃全省，厘金归道管辖，每年进款仅四十万两上下，大布一项，其弊尤大，脚夫偷漏，员役乾没，习为固然。余与制军商议，大布向由陕西之三原、凤翔等处入甘，请在三原设立统捐大局，凤翔府城设立分局。（虢川镇、益门镇设分卡，归凤翔分局经理。）征收人口之税。（向来布厘有一、二、三、四道之分，兹定无论色布、白布，道路远近，每布一卷，共收库平纹银一两四钱，统完税一道，不再重征。）盖用戳记，（由大局刊木质戳记各一颗，上刻平列汉文“甘肃”二字，中刻双行篆文“大布统捐大局分局”戳记八字。）入甘之始，照单查验，（如运赴省城销售，即由该局卡按照原票所开，另具清册飞报省局。如运各府、厅、州、县，即由

该局卡清折飞报该处，税局仍一面报明省局，以凭查核。）无论运往何处，只收落地税一道，（厘票查验执照，照章向不缴销，总局无从核对，今除存根贵核二联照旧存贵外，兹令入境局卡于查验执照二联之内，各用篆文某局查验讫戳讫一课、截留查验，一联缴回执照，一联运至落地局卡再行呈缴，由该局换给印收，注明某商运布若干，卷票已缴销字样，听其分销转运，不再查究。该二局各将截留之票，按月申缴省局详细查验，以杜弊混。）以后如再分运，只要不出甘境，不准重征。局员应得薪水而外，准予税金内提扣若干，以为津贴局中员役之费。自此定章之后，信赏必罚。（凡商人发运布匹，倘有漏捐、私运、票货不符，经入境落地局卡查出者，悉数扣留，准照定章六成充公，四成充赏，仍将隐匿不报之布帮、过载店照漏捐银数各半罚赔。如系落地查出，应问入境收捐各局；系入境查出，应向捐局递相根究，分别办理。）

每岁大布一项进款多至二三十万两。（开办大布统捐详文略云：窃惟厘务为甘省饷源，布匹乃厘金大宗。厘金积弊非止一端，其最大者偷漏与中饱而已。偷漏之弊在商人者十仅二三，在脚夫者十居八九。中饱之弊，在委员者剔除尚易，在书巡者杜绝更难。即以布匹一项论之，甘省进口大布每年不下十万卷，白布每卷厘金七钱，色布每卷厘金九钱，由三原进口，分运各路，抽厘三四道不等。约略计算，每年共应收厘金二十余万两，乃统计上年全省收数不过五万金。推原其故，盖由三原发庄之布起运时向不跟人，只将沿途应完厘金全数算给脚夫分起完纳。脚夫视何路可绕越，何局可减让，一任自由自便，玩法渔利，其诡弊非本商所能遥度。至各局卡不肖书巡，蒙蔽局员，弊尤滋甚，是脚夫之偷漏，书巡之卖放，因缘为奸，收数所以短絀也。今拟将进口大布改办统捐，实为最善之策，亦极便之法。当即邀集省城布商八家公司同酌议。据商人等金称，脚夫揽运布匹，包纳厘金，往往绕道行走，濡滞多日，耽误行情，商人暗受亏损，无可如何。如于三原办理统捐，凡入甘省布匹，无论白布、色布，亦无论运往何处销售，每卷统捐税银若干，由商民自行完纳，不经脚夫之手，自无偷漏、

中饱等弊，各布商亦无不从。惟改章以后，脚夫无润可沾，车骡脚价必异常昂贵，请将应纳税银酌量轻减，并请将沿途查验一律宽免，庶不致于留难，亦免格外花销等语。某再三访察，均系实情，拟在陕西三原县地方设立捐局，先行试办，即照商人所议，无分色布、白布，一律抽收，无论发运何处，概不过问，以归简易。惟查自三原以至肃州共有厘卡四道，白布每卷每道抽收银七钱，色布每卷每道抽收银九钱，共应收银三两六钱。如今其照三道四道完纳，在远者固乐从其便，而近者未免吃亏。若径照一道两道抽收，在远近咸乐其便，而公家未免吃亏。窃恐收数不能加增，而更新反不如守旧。今拟酌中定价每布一卷，统收税银一两四钱，无论何处不再抽收。此章一定，商人之沾润或一两、二两不等，运脚虽贵，皆可包括其中，于公私裨益良多。即以每年运销卷数计之，当较往年厘税有加无减，果如此办理，简捷诚于餉项有益，商民无捐。再闻凤翔所运乍子小布卷为数无多，只销秦州一带，向应减半完厘，大都偷漏，商人恳请三卷折一合算，如发远地二卷折一，报近发远者甘心认罚。惟远近不一，恐贻口实，今改为不论远近，概以三卷折一完捐，已经委员换取商人认状矣。夫明大体者不惜小费，凡事皆然，而财政尤要。今改办统捐，在商则化散为整，减去厘金两道有余；在官则化暗为明，增出平费七分以上。若尽提归公款，在当时固无人置喙，而一二年后，必有暗中设法倍取诸商民而贻害于公家者。创办者之怨谤姑无论矣，拟请破格体恤，明定津贴，此外再有需索分文者，系官员司事撤革参办，系书巡丁役枷杖治罪，仍令倍追赃款，并将失察故纵之员分别严议。似此重赏在前，峻法在后，稍有天良必不至营私玩法，实则以出之商人者，还其固有，使人人有招徕企望之思，于公家仍有益无损。）余又请于制军，一切百货均改厘为税，因传集各商议定简捷办法，货物均按上、中、下三色定税，不复一一分别。（如真珠、麝香、燕菜等物税则极重，然自收税以来，全行偷漏，查阅册报无一税者。）但入口之时，局员须抽查一、二件，如下等货中藏有上中货物，则照十倍重罚。并令诸商自定所由路程，不准偷绕别径。所有分卡一概裁

撤，以省糜费，以昭官商大信。入境以后，亦仅收落地税一道，不再重征。商民闻之皆大欢悦。余令各商将所有货物，自己分别上、中、下开单呈阅，其中有不妥不公者代为更定。（开办百货统捐详文略云：查大布统捐既已议定，而进口绸缎、洋布以及京广杂货、玉器、古玩等类，亦由省局议定统捐办法，以后凡进口百货，皆可一律照办，庶事权归一，执简驭繁，厘收当有蒸蒸日上之势。伏查甘肃进口大布以三原为大庄，其次即由凤翔运入秦州一路，至于由陕入甘诸色杂货，系在西安省城为聚庄，又略阳、安边两县，亦为商货入甘要路。前拟于三原县城设统捐大局一所，凤翔府城设统捐分局一所，系专为大布一项而言。今既拟议一切厘税均改统捐，则西安省城及略阳、安边两县均非设局稽查不可。虽据商民声称，西安、汉中、安边等处向无入甘大布，而绕越偷漏之弊不可不防。拟请于西安省城设立百货统捐局一所，略阳、安边两县城各设统捐局一所，并仿各局员兼查大布，以节糜费，而专责成。惟大布百货均改统捐，自应一律酌定津贴数目，俾免偏枯。今拟每收捐银一两提扣平余银三分作为各局卡津贴。三原大局及西安、凤翔、略阳、安边各局每经手收银一两，准划留一分二厘。其由该局填发报单未经收银者，津贴亦照此数。入境第一局卡或截留查验票或于收捐，各局所填报单内加盖查验戳记核记，过货应收银数，每两应得八厘。落地各局卡无论查销捐票，验货收捐，每两应得一分。又各商由川陕运货，径赴入境第一局卡请领报单者，则入境落地两局，每收银一两各应得一分五厘。又由川省运往新疆之货，入境第一局卡填给报单，省局收捐出关，最后局卡截存查验票，每收银一两，三局各应得一分。以上所拟津贴数目，无论何项进口统捐，均照此例办理。嗣后统捐一律办成，局卡即应裁并。现在各省设局，事属创始，必须慎选熟谙商务，心地诚朴，才具优长者，委以斯任，方能联络商情，诸臻妥善。今拟派候补道为三原大局总办，再拣派候补佐班二员分司局事。凤翔府统捐分局，西安省城百货统捐局，略阳、安边统捐局，均拟派委妥员开办。又虢川镇、益门镇两分卡应由凤翔分局自派司巡经理。以上捐局五所，三原、凤翔两局则以大布为

专责，兼查入甘大布。以后开办别项统捐，凡由陕入甘货物均责成各局员认真稽查，倘再有应设局卡之处，应随时随地酌量添改，不扰不遗，以期于官商两有裨益，所有札委各员，分别刊刻关防铃记，即于三十二年正月一律开办。）案自试办之日起至余交卸道篆止，仅八阅月，已征进一百二十余万，较前一岁增至两倍。惜后任彭英甲不尽守吾定章，又复添设局卡，琐琐增税，岁收于是乎大绌矣。升公与余论西北大局，余谓新疆界俄英两大之间，宜密与英立约通商，以为制俄之计，公即属余代拟一疏上之。惜乎枢臣愤愤，留中而已。（奏为新省边防关重，谨就管见所及，预筹布置，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窃闻日俄和议约中大端所载，日人无侵占我国土地之心，而我国且得保全之利，天下臣民论及此事皆以为快心之举，独不思日人所谓租借者何地，允让者何事，接受者何心，事既等于以燕伐燕，祸更深于以暴易暴，名还实取。凡留心国际法者，无不窃抱隐忧。朝廷创巨痛深，惩前毖后，将来收回满州以后，内治之方，外交之策，凡所以杜强邻之覬覦，固中国之主权者，当早在圣谟广运之中。而臣惴惴窃虑者，东封之祸虽纾，西顾之忧方炽，俄人久抱并吞亚洲之志，其所力征经营，注意于朝鲜、印度，而我国与土耳其其实当其冲。黑海一役，制于英法诸邦，锁峡联盟，志不得逞。乃改计东向，筑路鲜卑以为规取朝鲜之策。甲午、庚子以来，乘我国有不虞之乱，巧取豪夺，占据辽东，其意以为朝鲜彼囊中物耳，乃谋之数年，蹶于一旦。日本所要求限制于俄者，视黑海一役尤加剧焉。东方之势力既入于日本之范围，不惟不敢染指于朝鲜，而辽东三省平日所视为机上肉者，忽亦举而屠之他人之口。则积辱成羞，积羞成忿，其不能甘心于我国，别思以所得者偿所失，为桑榆收复之计，盖亦情势之所必然。俄人经略中亚洲诸部，开边拓土，新疆一省久在其囊括之中，其长顾却虑不肯轻于一发者，非有所爱与畏于我国也。以为新疆与印度有唇齿辅车之势，一旦称兵构衅，英必出而干预其间。故专力东方，一则显遏日人之雄略，以收朝鲜；一则阴覆英人之商计，以规印度。且以日本新兴，小而易与，朝鲜一岛，不早为之计，则辽东一入日人之手，

藩篱巩固，后必难图，此盖俄国外交之政策为日人所早臆及者。兵法有云：先人者制人，后人者制于人。辽东之事，日本先之，则此后新疆之役其必谋所以先人而发者，不待智者辨也。新疆自设行省以来，一切财赋皆仰给于腹地诸省，吏治之贪污，兵政之寡情，官与民不相信，汉与回不相能，一旦有事，环顾上下之间，凡所以御外侮而固内封者，一无足恃，土崩瓦解之祸可立而待也。新疆南北路与俄地犬牙相错者几五千余里，虽增十倍之兵，不敷防御，况军中转输之物必运诸内地及滨江沿海各省，道途之间幸而无梗，数月乃达。而俄境铁轨已逾萨玛尔干，兵衅一开，朝发夕至，军机之迟速相悬若此，古人譬之厝火积薪之上，新疆之事何以异此。为今之计，惟有内修政治，以备绸缪未雨之谋，外结强邻，以联休戚相关之谊。新疆之政治既如彼矣，自今厥后，请飭下抚臣改弦更张，选知耻之将，练有用之兵，举不贪之吏，以恩信结土民之心，以诚让弭边人之衅，广开农田水利以及金、铜、铅、铁、盐、皮、棉花、药材固有之物产，次第兴办，以便民用，以裕国储。此虽论治之常谈，而实救时之要务。往古西域土番诸部，据沙磧穷荒不毛之地，类皆割据自雄，陵暴中国，连兵百万，威慑海内。以中国之大，至殚天下全力，丧威损重而莫可如何，夫犹是穷边瘠土、毡裘湮酪之氓，而昔之富强若彼，今之贫弱若此，毋亦操术之异其道也。孟子曰：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此昔人战胜庙堂，百世不易之策，内治之要无先于此者也。俄跨欧亚两洲，近来蚕食回疆，烽火之威，达于印度北境。复遣重臣屯兵霍罕，南窥印度，东觐新疆，英之君臣肝食深谋，如临大敌。往年帕米尔定约，英人尝欲界地结我为并力防俄之举。去岁日俄之战，英人乘机入藏，迫之立约，盖亦为屏藩印度，阻俄人进步起见。俄人处心积虑，以图印度，新疆尤关紧要，万一有变，则剥床及足，英人恐无高枕安居之一日。《诗》所谓“内爨于中国，覃及鬼方”也。臣窃谓与其有事之时，受两国兵争之祸，莫如于无事之时，一面整饬内治，一面结好于英，密订合从摈俄之约。英人虽嗜利无信，然新疆之得失系乎印度之安危，利害较然，彼必无不乐为我助者。以土耳其之暴，波斯之愚，阿富汗之小弱，附俄附英依违

首鼠，英人尚百出其力以相与争之，非为人也，所以自为计也。况我堂堂大国，信义素孚者乎。郑子展之谋晋、楚也，曰亲我无成，鄙我是欲，为不善交邻者言之也。往岁中俄密约，政府受人愚弄，卒貽今日之祸，诚所谓鄙我是欲者。自古外交与内治相辅而行，均为国家之政的，伏乞朝廷惩前车之所以覆，后患之所以弭，东联日本之邦交，西缔英人之密好，速谕派往各国采访政治，诸臣及驻英钦使密与英国政府订立缓急相救、利害相同之私约，权救目前西方大局而急图自立自强之道。此正孟子所言，闲暇之时也。近来日本游历新疆，探访俄人动静者不一而足。新疆有事，则列强哄起相与效尤，天下大势有不堪设想者。臣忝任兼圻，受恩深重，事关军国大计，既有所见，不敢不言，以尽一得之愚，是否有当，谨恭折具陈，伏祈圣鉴。）

是岁成《希腊春秋》八卷。十二月二十日丑时长孙善元生，禹敷长子也。

三十二年丙午五十六岁

二月创设蒙盐官局于中卫、一条山两处。阿拉善王擦汉布鲁克盐池广袤八十余里，行销甘属暨陕西之兴安、汉中、凤翔等处，引地甚广，销路甚宽，往年商人张全兴领帖承销，嗣王历年借贷商人银两为数甚巨，乃于光绪二十二年将擦汉布鲁克盐池租与全兴九千两，以一半抵借款，现已租二年。去岁十二月贝子塔旺布理甲拉来省，余与商议改租与公家，每岁租银一万两，订立合同。贝子大悦，因与候补道杨增新详请制军升公立案，官商合办，设局于中卫、一条山两处。（北盐池庙之蒙古白盐应归中卫官局统办，白墩子土盐应归一条山官局统办，以归划一，而杜朦混。从前省商在一条山公开盐店，曾请蒙员来中条司秤，今拟照旧办理。俟官局开办时，中卫、一条山各来笔帖式一名，专司蒙民盐秤，其薪费即由官局开支供给。）由池至局只准蒙民驼运，厚给脚价，以享此专利。（蒙驼驮盐至中

卫官局交纳每壹百斤除扣斗分银捌分外，实发脚银叁钱捌分；一条山除扣斗分银捌分外，实发银四钱伍分。）汉回商人到局贩运不得私行人池捆盐。（官局派书识一名驻守盐池，并填发票，内地汉回骆驼不准到盐池驮盐，只准在官盐局买盐分售，并领统局大票。凡陕甘地方系属蒙盐引地者任其所之，经过关津厘局验明放行，不得借端阻滞，致碍盐政。如无统捐大票者，即是私盐，拿获究办。）税局与盐局设在一处，互相稽查，但不准以一员兼管两局，税银照定章减半征收。（蒙盐厘金定章每斤收钱八文，近因减让三、四、五成不等，甘南蒙盐落地亦有色规。查甘省蒙盐一项，厘金担头包规等费总计通省收钱五万串之谱，今拟酌中每盐壹百斤，收担头包规等项银四钱，不准再有丝毫私让，违者参办。盐税只准在官局收纳一次，所有省城担头、甘南包规及平庆泾、同化、同心城等处局卡，无论经过本省何地方，不再重收分文。其向收蒙盐税局卡一律裁撤，以节糜费，以便商销。）即以蒙盐运入之数为商人运出之数。（蒙汉互市，率以驮计，商贩转运，率用升斗。今拟两官局收发蒙盐，出入一律过秤，其税银、担头、蒙脚、斗分一切包括在内，每一百斤一条山卖价银一两二钱，中卫一两一钱。）官局资本拟先筹集银十万两，官六商四，以为官督商办之法。盐银数目按月造报，年清年款，官商互相牵制，以杜侵欺，从前私商弊窦划除净尽。至四月间，余适奉钦授新疆布政使之命，核计自开办之日至是仅两月，而收税两万两有余，比较往日一年收数多至一倍。其时有山西王某者，为升公所倚任，余临行告升公此人奸佞贪污，万不可用，公大不以为然，余去后即委伊督办中卫盐局，以有商人监察，不便舞弊，乃借故将商本禀销，专归官办，从此弊窦丛生矣。久之，升公洞悉其奸，并查出其舞弊诸事，即予参撤。善哉！公之能补过也。（创设蒙盐官局详文略云：窃查阿拉善旗擦汉布鲁克池所产蒙盐行销于甘属暨陕西之兴安、汉中、凤翔等处，引地甚广，销路甚宽。无如积久弊生，税厘减色，

若不设法整顿，变通旧章，于税课商民均多不便。去岁与阿拉善王订立合同，承租盐池，以为创办官局地步，已操挈领提纲之要。某等即札飭方令景周前赴盐池接办盐务，并令会同办理一条山盐厘，委员张令孝查察旧日情形妥议办法。兹据禀称，擦汉布鲁克盐池广袤八十余里，盐根凝结，旋捞旋生，如销路畅旺，驮运源源而来，实有取之不竭之势。咸丰初年，商人张全兴领帖承销，每岁额缴课银一万六千两，其盐由蒙民运送至一条山盐店，每百斤给脚银三钱六分，不准蒙民私相售卖，亦不准汉回杂贩私至盐池捆运，散漫行销。所有蒙地各盐池一例封禁。是时蒙民运盐至一条山者，每年十余万驮，少亦八九万驮，盐商大获其利。同治兵燹之后，盐务败坏，商力不支，迨至光绪十二年始追缴张商部帖考章收厘，于一条山设一掣验局，又于中卫开一运道，设局抽厘，自此釐政紊乱，蒙民驮盐各处销售，汉回杂贩亦得至蒙池运盐，偷漏绕越，百弊丛生，税厘因之减色。现在中卫、一条山两处虽有盐店三十余家，皆资本微薄，每于冬令骆驼起厂之时，纷纷运盐到店，既不过戥，又复诸多抑勒，银低平短，脚价受亏。且汉民之运盐者，率以盐店囤积无多，高抬市价，于是纷纷赴池，自行捆运。每届冬令河冰之日，多方绕越，偷漏厘金，厘局委员无可如何，因开减让之门，用广招徕之路，核计运盐驼数，所收厘税不及十之二三，病国、病民、病商，种种弊端不可枚举。某等筹思再四，立一万全之法，惟有就中卫、一条山两处创办蒙盐官局，以为官运商销之计，俾可上利于国，中利于商，下利于民，法无有善于此者。详查此项蒙盐行销虽甚广，其运道要不外中卫、一条山两途，前之驮户可以绕越者，以盐池捆盐漫无稽查，故私贩得以偷漏。今既盐池设立司员督查起运，而又定蒙民运盐至局，汉回私贩不得到池捆盐之法，则绕越偷漏之弊不革自除。往日盐厘旧章，每斤抽厘五文，近因摊派赔款，每斤加抽三文，各局委员以厘金愈重，收数愈艰，于是每驮三百斤者，减收一百五十斤，名抽八文，实只抽厘四文，且有减让驮隻之弊。此次设局重定章程，拟将此项厘金循名核实，减半征收，每斤定章纳厘四文，俾商人闻知厘金减轻，踊跃转运，惟不准再蹈从前积习，任意减让，以绝弊窦，而示大公。至

转购出境之驮户以及该处分销之盐店，应至官局贩运销售，局中预将盐斤、脚费、斗分暨局中一切开支诸费，统寓于盐价之中，通盘合算，实定价目，详情立案，不准增涨跌价，以垂久远。官局资本拟筹集银十万两，官入本银六万两，商人招集股本银四万两，以为官督商办之法，选举商人入有股本、办事公正者总司其事。出入银钱，收发盐斤，均由局中经理委员稽核，出入盐斤、银钱数目，按月造报，年清年款，如此则官商互相牵制，庶免侵蚀欺蒙之弊。至于收厘委员即照官局发盐斤数抽厘给票，两局彼此相为稽核，通报甘省总局以凭查考。盐局、厘局各司其事，永不准委一员兼办，以防他弊，盖亦持久之计也。此次蒙民运盐至局，当由方令景周面与蒙员磋商，拟定每盐百斤驮至中卫局者除斗分外，给脚银三钱八分，驮至一条山局者除斗分外，给脚银四钱五分。方之昔日，既经加多，且严禁汉、回私贩，不准到盐池捆运，蒙民享此专利生计，又不为他人所夺，则催驼运局，不得缺缓，有碍商销。应咨明阿拉善王晓谕蒙旗部众，赶紧驮运，不准中途卸售，有违定章。商人由盐局贩运他往，即由该局委员填给大票，经过各处局卡，查有蒙盐执照，加盖戳记放行，不得留难需索，以顺商情，而资畅销。）

初余在兰州，遣人迎太夫人已至西安五弟树裳寓所，适简授新藩，太夫人以新疆万里，不能远行，余即驰往陕西省亲，五弟亲侍太夫人至咸阳公所相会，恐到省城酬应太繁，母子不能朝夕安静团聚也。住十余日，叩别太夫人，至甘即启行，九十余日，至八月底始抵新疆省城。九月初一日接印视事，具折谢恩。是年三月二十三日子时六女生，癸君出也。

三十三年丁未五十七岁

新疆僻处中国西偏，蒙、哈、缠回种类庞杂，通知汉人文字者甚稀，自开辟以来文献寥寥，无可征信。时桐城方绎民希孟、醴泉宗芝洞伯鲁随长庚将军出关，霍邱裴伯谦景福谪戍新疆，皆

方闻博雅之士。余于是创修《新疆图志》，设局于藩署之西偏，志例皆余手定，分门纂辑。余无他嗜好，公余之暇，借此消遣而已。南疆州县征收粮草任意侵欺，缠民又懦弱，任其刀俎，敢怒而不敢言，今且数十年矣。余改定征收新章，本色粮内酌留二三成仍收本色，以供兵勇，余仿胡文忠征漕之法全收折色，按照各州县市价减二成上纳，本折均加二五私耗，以为地方官办公之用。草则除例价之外，以一半归公，一半津贴地方官，庶免年年稟巢徒饱私囊之弊。每年八月，地方官各按本地粮价报道汇齐，咨抚藩立案，再由藩司委员密查以定赏罚，其仍前苛敛者即行撤参。余到任以来，凡参革四十余员，以后各官始稍知畏法。南疆之民，岁省三四百万，而公家多于往年赋额数倍，当已详抚奏咨立案，度支部已覆准矣。

（重定南疆粮草章程详文云：窃维治民之道，去弊为先，去弊之方持平为要，未有未得其平而能使上下相安，举积弊一扫之者也。新疆自开设行省以经前抚完刘、饶^①，先后奏定章程：南路上地每亩征粮四升，草五斤；中地每亩征粮三升，草三斤；下地每亩征粮二升，草二斤。北路上地每亩征粮七升，中地每亩征粮四升，下地每亩征粮三升，均小麦、包谷各半搭收。其应征折色者，小麦每石应征折色库平银一两，包谷一石折收库平银六钱，草每百斤折银五分，凡纳本色粮一石，随征耗粮一斗五升，折色银一两随征耗银一钱五分，盖以边氓困苦，故原定赋额均较内地为轻。不料积久弊生，日甚一日，其北路州县尚少浮收，而弊窦层见迭出者，惟南路为甚。南路喀什噶尔道属为尤甚。访闻属年征收本色每石浮收六七或八九斗，征收折色每石折收四五两或六七两，此处又有不用官斤，私置升斗，另索样粮，多收地脚，并淋尖、踢斤、压平诸弊。至本色粮不敷支发，则又借名采买，往往短发价

^① 刘锦棠，1884年至1891年任新疆巡抚。饶应祺，1895年至1902年任新疆巡抚。

银，而浮收则与正供无异，甚有春间发价，责令秋后缴粮，户民无力归缴者，仍照私定之价折收，此弊之在征粮者也。额征只有草，而南路州县设柴草局，以柴与草并征，每柴草百斤加收四五倍乃其最轻者。至于折色，阿克苏道属每斤收红钱一二文不等，喀什噶尔道属每斤收红钱三四文不等，甚或先则折价，而浮收银后又采买而浮收草，此弊之在征草者也。其余杂税之纷繁，差徭之苛派，盈千累百，不可胜记。而大小头目，又助官吏为虐，以鱼肉斯民，氓之蚩蚩，何堪受此朘削耶？前抚完潘^①因州县贪黷殃民，漫无限制，于光绪二十九年酌定新章。其喀什噶尔及阿克苏两道属，每本色粮一石连一五耗羨，准收粮一石五斗五升，每折色粮一石连一五耗羨，准收银二两三钱。又草本色百斤准收草一百五十斤，折色百斤准收银五钱。其镇迪、伊塔两道属向无折色，每征粮一石准加耗六升，兹再酌量加增连一五耗羨，不得过一石五斗五升之数，通行在案。此盖为官民兼顾，切防流弊起见。惟是各州县情形不同，微特南路与北路异，即一府厅州县所辖之区，此处与彼处亦异。查向来额粮本色有浮收过一石五斗五升者，亦有不足一石五升者；向来折色有折收过二两三钱，亦有不足二两三钱者，征草亦然，多者宜减以甦民困，少者不宜增以益民累，此一定之理也。且以粮价论之，喀什噶尔各属准市价高于阿克苏道属，而疏勒府之市价又高于喀什噶尔，各属准布价以酌收折色，似亦未可一律而施。乃从前并不酌度地方情形，飭令通省一体照办，而浮收之弊或经发觉，又不立于参撤，以儆效尤。无怪乎不肖州县仍旧浮勒或反倍收于前，向无重敛之各属亦得有所借口，敢明目张胆以增之也。前署抚吴在藩司任内灼知其弊详情，仍照前抚完刘、饶旧章办理。惟弊只去其太甚，事必求其可行，任官吏之横征暴敛，固乖率属之方，责官吏以枵腹从公，亦失养廉之道。若概照旧章，各州县不特无赢余，且有赔累。如汉萧望之所云，人皆有忧父母妻子之心，虽欲洁身为廉，势有不能。所以令出难行，而新省二十余年之蠹弊不能绝其根株者，职是故耳。本司再四筹议新省田赋非清弊之源，酌中另立新章，不足以整吏治而纾民力。查咸丰七年，前湖北

^① 潘效苏，1902年至1905年任新疆巡抚。

抚部院胡^①创议清厘漕弊，遴委道府大员亲诣各州县，查明历届征收完数，传集绅耆，令其公议核减，复细加体察，明定等差。有较前减半者，有减去三四倍者，所有浮费概行禁革，百年宿弊一举而空，而州县书差亦使有以自给。后各直省仿办，皆能著有成效，至今四五十年尚无流弊，洵为官民交便之良规。新省地居边远，小民之生计维艰，应请宪台通飭各道查照前湖北抚部院胡减定漕章办法，令所属府、厅、州、县县丞，传集农官、乡约、保长人等共同商议，博访周咨，将历来浮收数目及一切私立名色和盘托出，据实开陈，再各就地方情形通盘筹算。其粮草所加私耗，重者如何分别核减，轻者应否照旧完纳，抑或稍事变通。小麦、包谷贵贱不同，各处市征折色应否即照原定章程征收，抑或分别道里远近，重为编定，务使一切准情度理，斟酌得中。若一府情形相同，即定以一府相同之制；若一县情形独异，即议以一县独异之规，务使无病于民，无累于官，上下相安，不必拘定通省一律之例。此外牲畜印契、水磨各税如何核定，上下衙门私派各差如何裁革，各城大小头目倚势虐民如何酌量裁并，并严杜州县贿放之弊，亦统由各道破除情面，转飭所属，彻底清查，妥为商榷，限于年内一并详细开折咨司。本司再行悉心核议，因其地之肥饶，视其缺之繁简，酌量轻重，明定章程，务期弊端厘剔，而州县亦办公有资，不至使借口赔贴，别开勒索之门。如蒙俞允，即恳通飭各道率属遵照妥议，以除苛政，而恤边氓。

至厘捐一项亦改办百货统捐，仅收入口、落地两税，余尽革除。凡商货出入，无论车驼、箱包均照章以二百八十斤或二百四十斤为一担，分别上中下货担定税银多寡，局卡收捐即将各色斤数填载票，并于箱面注明，以便沿途查验。如票货吻合，即盖戳放行，倘有不符，照章罚办。南北两路戥秤由省局较准，准库平法码及大秤镌刻总局字样，编列号数通发各局卡，以免畸重畸轻，而抑压勒索中饱偷漏之弊，以予剔除，官商称便。

^① 胡林翼，时任湖北巡抚。

百货统捐章程条规详文略云：窃照新疆地居边徼，饷源奇绌，本省入款除征粮外，以税务为一大宗，近数年来，各局卡偷漏侵蚀，征收减色。本年春间，经本司等会同税务总局，详奉宪台批准，南北两路一律改办统捐等因。税经起落并收一次，后不复重征，在公家可期涓滴之归，而商民得免扰累之苦，自属两便。惟查改办统捐以来，承办各员及司巡人等清洁自好者固不乏人，而或以多报少，以细报粗，及大头小尾私行截留，查验联票，此弊仍属不免。又加运货入口即系落地，中间无局卡，查验者并不出票，鲸吞税款，饱入私囊，以朝廷维正之供，填若辈无穷之壑，若不严加防杜，将来漏卮伊于胡底。查甘肃省廓清厘税章程，始则改办统捐，继复更订担头收数，较往年增至一倍，新疆为甘督兼辖省分，自应仿照办理，藉免一事两歧。本司等督同税务总局提调刘守文龙与省城商人逐细钩稽，区分货品，除不能成担之货，仍按斤件计算。此外精致者以若干斤为一担，粗笨者以若干斤为一担，酌价值之高低，定抽收之多寡，令各商民等按章输纳，皎若划一，无彼此参差之别，该商民等均皆意见相同，谨将所拟章程录呈鉴核，如蒙批准，拟由本总局将一应规则，排印成册，分飭各局卡，一体遵照，俾官商共守，用昭大信。再有请者，南疆各属向征八栅尔，零税与往来商税迥不相同，此次开办担头于地面情形有无窒碍，应飭各地方官会同各局员悉心体查，稟候核办。总期上裨公帑，下恤商艰，仰副我宪台振兴权政之至意。

是岁八月七日丑时甲君生子，值太夫人七十九岁，因名之曰七十九。十二月十一日寅时，二孙女金生生，禹敷长女也。

三十四年戊申五十八岁

新疆每岁协饷二百万，近年腹地诸省自顾不暇，来者日希。窃谓新疆地方二万余里，农田、水利、桑绵、瓜果之盛，牧畜之繁，五金之矿，富甲海内。而岁岁观人朵颐，不谋自立，将来必至坐困。余拟开财之源，次第兴作，然必先筹出三四百万，方能入手进行。于是试办纸币一百万两发行通省，商人不但乐从行

使，且人人居奇，奉为至宝。久之，纸币百两易换实银至一百二十十余两。余上书度支部请再造纸币二三百万，以后可以永不仰给岁协，而司农置之不理。又派监理官梁玉书采督财政，事事掣肘，不顾大局，不第纸币不准增造，且欲将已行有效之币收回，至问伊理财之方，则懵然而不知所措。呜呼！自刚毅搜括各省之财，而各省之财政遂不可支；自载泽奏请各省设官监理各省之财，而国家之财政遂至大坏而不可救；其所谓监理者于外间应兴应革之事毫无知觉，但箝制之使不得动作，日日造表册而已。余所造百万纸币至今仍照常行使，与民国以后所制之币贵贱有天渊之别，其行与不行在乎信与不信，无他术也。

是年学部、宪政编查馆均聘余为咨议官，礼制馆聘余为高等顾问。三月初七日寅时七儿八十生，癸君出也。太夫人年八十，故以命名。四月初六日丑时，五女病喉，三日而殇。

十一月德宗皇帝崩，二十二日孝钦皇太后宴驾，以醇亲王载沣长子入嗣大统，醇亲王摄政，明年改元宣统。

宣统元年己酉五十九岁

设清理财政局，（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度支部载泽奏设。）创办咨议局，余以新疆人民品类不齐，无合选举资格之人，酌拟变通办法，官绅并用。又与臬司荣霈酌改驿站为邮政，此举最为新疆要务。新省距京师万里，交通阻滞，居是邦者率视为异域，内外音问睽绝，而国家所设驿站，岁糜费巨万，与民事毫不相关。自俄人由我北路设立台站，上接铁路以达京师，商民覩其往来之便，费廉而时速，远近函牒争相送输，一岁入邮资至俄银卢布十万以上，于是邮信利权悉入俄人之手。今年二月驻迪化俄领

事复函请增设台站快车，自省城递运信箱及一切货物，并求代售邮票，以广招徕。余与荣公援约驳斥，且告之巡抚联魁，非自设邮政，不能保我固有之权利，杜俄人覬觐之心。联魁始犹坚执不肯，再三言之，乃允试行。因议裁驿站夫马之半，挹其费以兴邮政，二者并行不悖，试之数载，然后权其得失利害而裁并之，于是联魁始据以入奏。即檄洋员毕德生兼程来新，创办一年，而东西路通，二年而北路贯，三年而天山以南诸府、厅、州、县，巨千分支，以次告成。余欲由此创设铁路，先仿俄人台站之法，由蒙古草地试行，已绘图呈部矣，而遽遭谗口去官，至今十余年未有议及此事者。新省西、北两方为俄人铁路所包围，一旦用兵，朝发夕至，腹地之兵，非数月不能至新，而军火粮饷又无一不赖腹地转输，其胜败存亡之数，不待智者决也。英人谓新疆有铁路则西域为中国所有，无则在俄人掌握可预券也。迩年新政繁兴，日不暇给，新疆新设行省，本属特别之区，而事事强与腹地诸省一律设施，其最不适宜者莫如学堂及巡警二事。新疆地广人稀，种族庞杂，衣服、饮食、语言文字无一与汉人相同，汉人除商贾而外，大半皆流氓游勇，既无恒产，又乏识字之人，一州一县之地，往往广有千里，荒山戈壁，居其大半。其有居人之处，或数十里或百余里，始见三四人家，与内地成村成聚，群相萃处者，迥不相同。若设学堂，万无适中之地聚之一处。又本地之人，率皆极贫极苦，专事耕牧为生，若强迫其子弟入校读书，则一家少一劳力之人，一家即有冻馁之患。故一闻入学之令下，多有迁徙俄界以避祸者，甚有持刀赴署自戕者，此所谓章甫适越，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也。朝廷不谙边省情形，乃增设提学使，专管学务，新抚联魁昏庸疲懦，以兴学一事为提学使专政不敢过问，任其所

为。提学使杜彤到任以后，不顾财政之盈绌，地方之宜与不宜，严飭府、厅、州、县多建学堂，规模宏大悉仿内地。为牧令者，稍一抗辨，即予参撤。每季所上表册，必经其署，一一更定，虚额报部，以相欺饰。每改造表册一分，索地方纳费以银三百两为率，其优缺多者，或至千金，官民同受其害。余尝上书学部痛切言之，置之不问。及袁公大化抚新，始大加裁并，另改章程，杜彤惶惧，恐被参褫，始托人关说，告病而去。巡警之设，亦同此弊。惟有于省会及府、厅、州、县城内外及集镇之地酌设而已。西人尝谓余言，新疆既有巡防营勇，已足任缉捕盗贼之责，而又设巡警，是叠床架屋也。国家变法，学步效颦，只慕虚名，不求实效，恐法愈变而国愈敝也。

六月初有土贼王高陞者，夜间聚众放火，延烧肆商数十家，悉成灰烬。次日军民数千，持商票纷纷兑银，几酿大乱。余立牌示，所有商票概由藩库兑还，即召各商各铺，开明出票若干，损失若干，由藩库领取现银，连环保结。并令赶紧修筑房舍，亦由藩库补助具限归还，商民遂相安无事。余命府、县出簿劝捐，联魁捐助万金，余亦捐银万两，学、臬以下皆有捐助。及至联魁交卸，此款翻悔不出，学、臬以下皆相效尤，化为乌有。余乃独将捐款交与商首，而众商谓抚台且不认交，事同一律，不肯收受。余谓以联魁视余，是辱余也，众皆感泣。是年儿政敷署西华知县。闰二月二十九日卯时七十九殇。

是年八月二十一日，太保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湖广总督内召兼管学部、南皮张文襄公之洞卒，年七十有三。

二年庚戌六十岁

正月初五日儿政敷歿于开封，年甫四十。儿自五岁随余外出，老实敦笃如成人，余宦游四川，为儿援例补新都典史不肯就。余罢官后，携眷至开封，因捐升知县，指分河南，两署新郑、西华，皆有政声，复援例捐升道员，甫到省而歿。无子只生一女，年十九，先儿五年而天，余命次儿禹敷之子善元为之后。是年被劾开缺。先是有候补道陈璋者，本湖北无赖，前在奉天造假捐照，并作匿名揭帖，将军程雪楼逐之出境，穷无所之，乃假造桂公一信荐至新疆。联魁素奉京信甚谨，不察虚实，遽行奏调。到省以后即持受业帖拜余，余严辞拒绝，反羞成怒，又因屡求差缺不遂，广造匿名揭帖达之军机处。鹿文端密以其揭帖寄余，命查实严办。陈璋恐事败露，乃与杜彤商议购买言官，遂成钦案。甘督长庚，委员查办，一无实据。时余已开缺，次年遂由俄道赴京，至则革命难作矣。

《新疆图志》开局以来，余自撰成《国界志》八卷、《山脉志》六卷、《兵事志》二卷、《访古录》二卷、《新疆小正》二卷、《礼俗志》一卷、《道路志》四卷、《土壤表》一卷。其《建置志》则余仿汉地志创撰一卷，而属同年宋子顿伯鲁照式续成之。《实业志》则余创撰森林、渔业二门，属门人钟镛笙叔续成，又经余一一改定润色，始成定本。

余初到新，以南关所设机器局水少，只敷半年之用，乃改移东门外水磨沟，水势极旺，隆冬不涸，德人见之，赞美不已，谓此天然水机器，我德全国中求此而不可一得者也。余聘陕西吴某添制枪炮、银元诸厂，然只用水力十分之四。将来扩充诸厂，

绰有余裕。新省南、北疆煤油之旺甲于美洲，俄人覬覦，每欲夥开一厂，时时聒余，余特遣员至俄购置煤油、洋蜡、机器，已到厂矣，余欲先试行销本省，俟铁路告成，再运内地，可以享五洲大利，及余去，而此事遂辍。

是年七月，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吏部尚书定兴鹿文端公传霖卒，年七十有五。自李文正、张文襄及公三人相继没世，而国事遂不可为矣。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可不痛哉！

三年辛亥六十一岁

袁星南大化来抚新疆，始悉余历年所设施及被劾之故，乃谓余曰：吾初闻人言，公作事专横，有难乎为上之势，公之开缺，实余函求长帅所为者。今一见公，实与所闻迥异，失一臂助，后悔无及！因坚留余在新，谓将具疏奏留，余再三不肯，曰：家有八旬余老母，藉此回家团聚，稍尽人子之心，是天假之缘也。余由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回京，八月适逢国变，遂避乱至山西，友人邀住介休迎源堡，买郭家楼房一所。十二月至开封亲移眷口至堡。是月纳姬人何氏，氏扶沟人，年十岁即来余家，杨夫人抚之成立，今年二十矣。

是年八月十九日湖北革党乱作，黎元洪自为都督，各省皆相继蜂起。特诏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统兵南伐，以冯国璋总统第一军，武昌垂克矣，世凯忽下令停战议和，孙文乘势至沪，以其党十七人为四万万人民代表，举伊为临时总统，十一月十二日就职南京。世凯以重金购买王公大臣及宦寺左右，朝夕恫吓太后，讽之退位，建民主共和政体，其逊位之召皆世凯所拟也。十二月二十五日皇帝颁逊位诏，世凯自称临时政府首领，二十六日孙文辞职，

公举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当世凯为内阁时，余连上书请其勿为党人所卖，又致书黄陂^①，皆置之不答。

壬子^② 六十二岁

正月元旦项城派员到迎源堡招余到京，命为宣慰使往陕西劝升吉甫制军罢兵。余以清朝养士近三百年，而怀忠报国至死不变者仅见升公一人。至事之成与不成，则有天命存焉，余不能为乱臣贼子作辞客也，因力辞之。其后袁假太后之旨强使罢兵，功堕垂成，惜哉！三月新疆乱事起，都督杨鼎臣增新派员护送余眷属至甘，余遣五侄到甘迎接。正值甘省大乱，道路不通，暂居兰州省城。袁公电致甘、陕两省都督沿途拨勇护送，到西安住五弟树棠宅中，师长张某复加派兵直送至介休迎源堡，并赠路费，自三月由新启程行八千余里，历半年之久，不损一人，不失一物，真天幸也。是岁成《武汉战记》一卷。

正月十二日北京兵变，或曰此袁世凯之诡计，盖不欲赴南京就职也。二月十四日孙文解临时总统任。是年江南、江西、广东、云南各省乱党以次削平。九月国会开大总统选举会，袁世凯以威劫国会，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十一日甲子就职，取西历十月十日为双十国庆日，又以甲子为日干首也。

癸丑^③ 六十三岁

正月十七日午时七女生，何氏出也。太夫人命之曰长女。余

① 黎元洪，湖北黄陂人。

② 民国元年。

③ 民国二年。

家居奉母，时往来京师、开封、介休三处。

甲寅^① 六十四岁

二月，太夫人迎养京师，时年八十四矣。八月侍回里，五弟歿于西安，不敢使太夫人闻知。十一月十三日亥时十一儿心敷生，何氏出也。是年八月设清史馆，以赵次珊尔巽为馆长，聘余为总纂。徐菊人世昌为国务卿，聘余纂修《大清畿辅先哲传》，设局于畿辅先哲祠，备清史取裁也。

四月六日废国务院官制，设政事堂于总统府。七月十三日俄、德、法、义搆兵，中国宣告独立。十一月十三日定总统任期十年，且得联任。十二月四日，日本公使要求条件二十一事。

乙卯^② 六十五岁

在史馆。三月二十四日午时第二孙嘉亨生，禹敷次子也。

三月二十三日，日政府通谍限四十八小时答复，四月十二日中日条约成立，六月二十五日杨度、严复、孙毓筠、刘师培、胡瑛等创立筹安会，谋复帝制，以媚袁世凯。十一月五日代行立法院决定国体票数，推戴袁世凯为皇帝，改明年为洪宪元年。严复、刘师培素有文学盛名，从此一文不值矣。余上书力劝袁收回成命，不然必召天下之兵，陆军次长徐树铮争之尤力，袁皆不答。参政蔡锷微服出京，驰回滇省起兵相抗，黔、滇、粤、桂各省皆相继独立。

① 民国三年。

② 民国四年。

丙辰^① 六十六岁

在史馆，成《大清畿辅先哲传》四十卷，《畿辅列女传》六卷，《大清畿辅书徵》四十一卷。

二月十九日撤消帝号，废洪宪年号。五月六日袁世凯死。七日黎元洪就大总统任，申令仍遵行民国元年约法。十月四日，公选冯国璋为副总统。

丁巳^②六十七岁

在史馆，国务院聘余为顾问。

二月十七日中国与德绝交宣战。四月十二日安徽督军张勋来京，五月十三日拥护今上复辟。十四日黎元洪避居日本使馆。二十四日段祺瑞誓师马厂，张勋败，退避和兰使馆，以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就国务院总理职。六月十日黎元洪还天津。

戊午^③ 六十八岁

在史馆，成《学记笺证》四卷。

七月二十七日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九月六日就职。十月二十五日举行庆贺战胜德国大会。因人成事可耻也。

己未^④ 六十九岁

在史馆，徐总统聘为顾问，代撰《将吏法言》八卷。十二月

-
- ① 民国五年。
 - ② 民国六年。
 - ③ 民国七年。
 - ④ 民国八年。

十二日第三孙公麒，十三日第四孙公麟孪生，勇敷子也。

是年徐树铮收回库伦充西北边防总司令。民国人才当以徐树铮首屈一指，然不免好大喜功之弊，吴佩孚、张作霖深忌之，恐其不利于己也。

庚申^①七十岁

在史馆，东海开晚晴诗社召集诸遗老选录清诗。十月二十四日寅时甲君卒，距生于甲戌十月二十七日酉时，年四十七。是年成《说文建首释义》四卷、《周易释贞》二卷。

五月十八日曹錕、张作霖逼令总统褫徐树铮职，段祺瑞大忿，亦迫总统褫曹錕、吴佩孚职，直皖遂相搆兵，直军大胜，段祺瑞免职。

辛酉^②七十一岁

在史馆纂成咸同两朝列传。赵次珊馆长再聘余为总纂。是年于西直门内北草厂胡同购房屋一区，何氏置也。成《冀典》二十卷、《法源寺志》八卷。三月初三日亥时第五孙成达生，敬敷长子也。

是年七月十日美国邀请我国参列太平洋会议。十一月二十六日梁士诒为国务院总理，各省皆反对，十一月二十八日托病请假，以颜惠庆代理内阁。

某月日桐乡劳玉初乃宣卒，玉初辛未进士，嗜宋儒性理之书，一言一行矩矱程朱，通算学，与余同修《畿辅通志》于保定

① 民国九年。

② 民国十年。

古莲池。历宰诸县，政声卓然，累官提学使。国变后隐居涑水，上书袁世凯争共和政体，几罹大祸，后居青岛，德人尉礼贤立尊孔文社，从玉初学易，及没，师事之如其生时，卒年七十有九。

二月二十四日门人长寿李滋然卒于京师。滋然字命三，光绪己丑进士，累官广东东莞县知县，宦粤十五年，三授四权县令，政声翕然，以公亏革职。后归京师进呈著书四种，授学部七品小京官检赏主事。一生长于治经，其学宗许、郑，行本程、朱。国变后，帝下逊位诏，每年是日辄痛哭不食，九年如一，坐必北向不面南，仓猝不易，祝发自号采薇僧。庐于父墓，终其身不出户，不见客。庚申之夏入京一觐宣统帝曰：吾事毕矣。逾年遂卒，年七十有五。其妾江氏，尊其夫命，不受奠礼，扶柩归里殉焉。

壬戌^①七十二岁

二月初十日子时太夫人弃养，距生于道光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子时，享寿九十四岁。六月初六日，三儿勇敷感疫，一日暴殁于开封，年三十二。九月初三日次女寿芝亦感疫殁于定兴，年二十五。痛哉！一年之中骨肉凋丧至此，此皆老夫不德所至，又何尤焉！

十二月二十三日卯时第六孙念祖生，敬敷次子也。是年五月直奉两军开战，奉军败绩，总统令张作霖退出关外，褫其职。五月七日吴佩孚逼令徐世昌解职出京赴津，以黎元洪暂行总统职权，五月十六日就职。

① 民国十一年。

癸亥^①七十三岁

在史馆。二月二十六日葬太夫人，祔于先光禄公之墓，志铭则桐城马通伯其昶所撰也。是年成《属国列传》四卷。

十二月政府筹派大选费二百万，举曹锟为大总统，到任后聘余为高等顾问，余置之不理。

是年直隶督军曹锟谋为总统，潜使军警断绝公府支应，黎元洪不得已携印出京。直隶省长王承斌要之京津路上，令其交印，争持一昼夜，始将印交出，宣告辞职，内务部总长高凌霨摄行总统职务。九月一日国会贿选曹锟为大总统，议员各得四千元，民间派大选费二百余万元，其议员之强黠者各分二三万元不等，余归曹收用。四日曹锟就大总统职，以高凌霨为国务院总理。

甲子^②七十四岁

在史馆。正月念祖殇。

八月，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搆兵，吴佩孚所使也。吴又率兵二十万讨奉天张作霖。今年六月以前大旱，六月以后大雨连旬不止，河水涨发，田禾尽没，坏民房屋十之七八。吾直既罹饥馑之灾，复受兵戈之祸，不但无衣无食，而苛敛兵费追呼不已。子路所谓：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不料及吾身而亲见之。此次之战，吴佩孚师出无名，残民以逞，不待智者决其必败也。冯玉祥受张重贿，潜师回京，倒戈相向。既叛主将，复于

① 民国十二年。

② 民国十三年。

十月八日逼令曹錕辞职，幽之瀛台，迎段公祺瑞为临时执政，初十日到京另组政体。而冯已先于初九夜以兵逼皇上出宫移居摄政王府，取消帝号及优待皇室条件。出宫之时，皇上及后妃三人逐身搜检，不准携带一物，狼狈之状，见者陨涕。二百余年宫中一切宝物，均为冯及其党人任意盗取，无敢过问者。高阳李文正公之子李煜瀛尤险贼阴狠，为冯主谋，此等叛乱之子，前既不为其母服丧，今又废除逐故君，不孝不忠，甘为禽兽，不知文正在天之灵痛心否也！皇上寻迁居日本使馆。

夏某月，余友桐城姚叔节永概卒。叔节戊子某科举乡试第一，与其兄仲实永朴同受业于吴挚甫。仲实学问朴实，通经术。叔节则肆力诗古文辞，得挚甫真传，皆一时之杰也。昆弟皆为北京大学教习，循循善诱人，年若干卒。

乙丑①七十五岁

在史馆撰《食货志》。段公聘余为顾问，日本以我国赔款组织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段公举余与柯劭忞凤孙等十人为中国委员。

皇上逊天津，驻蹕张园，前湖北总兵张彪别业也。

是年临时政府召集善后会议国民会议，逐苏督齐燮元，以卢永祥代之，寻以奉军参谋长杨宇霆督苏，奉军驻防至上海。浙督孙传芳不自安，进袭南京，宇霆不战而退。冯玉祥索天津海口，直督李景林拒之，战于杨村，景林败退，与鲁督张宗昌合师。

奉军师长郭松林〔龄〕受玉祥嗾使，自滦州返戈攻奉天，作霖拒战于大凌河，松林〔龄〕败被擒诛之。奉军复入关与宗昌、

① 民国十四年。

景林军合攻天津，玉祥退守京畿。

十一月十五日吾友萧县徐又铮庶〔树〕铮卒。又铮坚苦卓绝，抱经世大略，既补诸生，不治帖括，谒项城袁公，上万言书。袁公奇其才，使合肥段祺瑞留之幕府。后游学日本，学成归国，段公为陆军部总长，任公为次长，一切军政皆出公筹划。寻拜西北筹边使兼总司令，收回库伦独立之权，功高权重，为吴佩孚、曹锟所忌。公自请辞职，避居海上，博览群书，善为诗古文，而词尤工丽。段公执政，命公考察欧美政治，逾年至京复命，居数日返沪，行至廊房遇害，年仅四十有六。余尝谓公为天下才，而所施止此，惜哉！

丙寅^①七十六岁

在史馆，纂成清史《地理志》。是年为重游泮水之岁。十月航海赴日本开文化会，商议纂修《提要》^② 条例。余至东京住日华学舍。吾观其国，实业盛兴，学堂林立。都中只十字街口设一巡兵，仿周礼秋官野庐氏之职，以备车马輶互叙行之事，余则不见一巡兵。风俗严整，凡游玩之处，高下皆有铁路。皇室简朴，不及中国一富室。西京风尚尤古朴，时大修孔庙，建立汉文大学。国中文士皆喜为诗，每日求书求诗者，门外之履常满，几有应接不暇之势。时菊花正开，山尻繁偕余往观，会中诸品多为中国所未见者。

是年春，吴佩孚与张作霖结合，自汉口率师北上会攻北京，玉祥逐段祺瑞，释曹锟，以说佩孚罢兵，不许，冯军退守南口，

① 民国十五年。

② 指《续四库全书提要》一书。

寻退甘肃。北京政府号为恢复法统，曹锟辞职，以国务总理颜惠庆代行大总统职权。夏，革命军自两广出发，连占长沙、岳州。佩孚御之，武汉孙传芳自称苏、皖、赣、浙、闽五省联军总司令，率部御之南浔。未几，佩孚败退，革命军入武汉，设国民政府。

八月十九日同年友固始秦幼衡树声卒于京师。幼衡，丙戌进士，授工部主事。文词华赡，善为骈俪，文光怪陆离，见者咋舌。初学褚书，晚年变化，自成一格。寻改外官，授云南曲靖知府，累迁广东提学使。其为迤东道也，英人勘界图片马。君言于总督锡良，谓疆臣以国土为性命，尺寸不可轻畀人，并为草奏列举不可许者六，必可争者九。英人迫令总督去秦某，案始可议结。其他凡事关国体，侃侃力争，皆类此。君所至，兴利除弊，廉明宏毅，民爱之如父母。国变后，与余同为清史馆总裁十余年。卒年六十有六，临终属余铭其墓。

丁卯^①七十七岁

在国史馆成《度量衡表》，在清史馆成《逸民传》、《叛逆传》。八月八日汉军正蓝旗赵馆长次珊尔巽卒。公同治甲戌进士，累官东三省总督兼盛京将军，公历任封疆，所至廉明正直，为政持大体。国变后，袁世凯聘修清史，为清史馆长，甫成书而歿，年八十有六。

戊辰^②七十八岁

奉天杨麟阁督办，字宇霆，好贤下士，虽系武人，能识大

①民国十六年。

②民国十七年。

体。张学良有举措不当，时驳斥之，为学良所深嫉。一日诳之至署，丛枪击之，死非其罪，人人冤之。

宇霆特立一校，专习中国古学，以挽今日学堂积弊，因就萃草书院旧址，招集生徒，聘余为山长。同聘者为吴向之廷燮、吴北江闾生三人，商定余讲授经学，向之讲授史学，北江讲授词章，分任其事。余先为诸生指示门径，大略云：古人言读书必先识字，字不外形声、训诂两端，惟《说文》、《尔雅》为最要。《说文》为正音正诂，《尔雅》则多古文假借之字，如草字，《说文》作“艸”，从二“艸”，云百艸也。草则云草斗栌实也，而《尔雅》释草则以草假艸，今经典皆通以草为艸矣。罍字，《说文》作罍，云甕也，象耳头足虫地之形。罍则云守备者。而《尔雅》释兽，则以假罍，今经典皆通以兽为罍矣。故读《说文》可以识群书之正字，读《尔雅》可以识群书假借之字。此外若《玉篇》、《广韵》、《释名》、《方言》、《广雅》诸书，皆小学之津梁，而陆元朗《经典释文》汇集汉、魏、晋、唐以上诸家之音义，尤为读经者所必需。唐人凡童蒙入学之初，必令先读《说文》、《字林》，即此意也。汉人读经必守家法为专门之学，盖去古较近，其所传授大抵出于七十二子，为孔子所雅言者。至郑康成始会通今古文诸家之说，而折衷一是，论者谓康成解经多破字，非破字也，盖深明古文假借引申之法，故其所注广博精通，字字皆有根据，能集诸儒之大成，古今一人而已。故不通汉学，则训诂不明，义理从何而出。朱子论贡举治经，谓宜讨论诸家之说，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为主。故宋人善言义理皆熟读注疏之人，若魏文清、吕东莱皆是也。然汉儒之著述传于今者，或隐或现，或传或不传，惟清朝讲习汉学诸儒，读书既多，校书

又极精审，凡其所著诸书，皆能详稽博考，比例旁参，凡汉人一字一言，必求解其纷而通其奥，故讲求汉学，必以清儒为入海之先河。清儒所著之正续《皇清经解》大端已具，于是学者苟将此书，朝夕研究，则既有门径可入，以后或专治一经，或兼治群经，未有不能成家者。总之，读书无论欲成何名，必先博学。孔子之博学无论矣，其教门徒也，颜渊则曰：博我以文。曾子则曰：君子学患其不博。子思则谓：笃行必先之以博学。孟子亦言：博学详说，始能反约，盖古圣贤之成名，未有不由于博学者。譬为买物焉，若只一物则无由辨其美恶矣，设聚多数之物而杂陈之，则美恶不齐，可以供人择取，不致为售物者所欺。今吾略示诸生以传学之法，每日限几时专读一经为主课，余几时为浏览群书之课，日诵十叶，则一年可尽三四千叶，积之十年，则应用之书，可以得其大半矣，况聪颖嗜学之子，其日诵之书有不止此数者乎？学者终身之事，愈学则愈知其不足。今人动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此欺人之语也。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如是而已。

（至治经之法：一、识字。字之变迁，许氏《说文》之序详言之矣。识字以《说文》为正字，有声有义，古之音与今不同，读顾氏《音韵五书》、段氏《音韵表》以及江氏、王氏、孔氏、苗氏诸书，自知义有本义，有假借。假借之字最广，诸经大半假借之字居多，不谙正字、假字即不能通训诂，何以读古书耶？

一、读经。十三经宜通读，但须择其要者，先读《孟子》、《周礼》，最切于经世之用，《左传》次之，《公羊》经后人附会最有流弊，《仪礼》宜于古而不宜于今，然古礼亦不可不知，《仪礼》只十七事，读之亦易。《礼记》事多大半七十二子师徒所传授，最切于身心性命者。《易

经》深奥，所包甚广，学久失传，其所存者，遗文剩义，未窥全体。宋儒又专以空言探索于象数之理，未能尽合易旨，学者不必汲汲于此书可也。《论语》、《孝经》宜终身诵之，圣功王道，全不外此。

一、专治一经。汉儒专以一经传授家法，观《汉书·艺文志》所叙，自知本朝诸儒亦多以经名家者，盖通一经须以全经佐之，所谓六经皆我注脚者也，若不通全经，亦必不能通一经。

一、宜讲汉学。汉人所传经学多出于七十二子之徒，各守家法，语义皆有根据，以其去古尚近也。清朝诸儒讲汉学者，引伸发挥，推阐尽致，最足益后人神智，应将行世之书，正续《皇清经解》置之座右，其余未梓有名之著述，留意购求，见阅既博，自有独得之处，所谓阅一以知十也。

一、校勘。无论读何书，治何经，皆宜自首至尾，用心点勘，点勘易于省记，能得多本校定更好，否则将十三经先点一次，如有疑义，或于古人校定之本最惬意者记之于簿，亦初学者最切实之功也。

一、日记。学者自就性之所近，先择一经研究，作为主课，以他书为附课，治经限定一日几叶，在精不在多，其余时晷，博览他书亦宜限定一日几叶或几卷，记入功课簿中，久之自能博洽群书，但宜有恒，不可进锐退速也。

一、功课。诸生自备一日记簿，每日治经自某叶起至某叶止记于簿上，附课或经或史或子、集，每日看读若干亦记于簿上，三日一交阅，预备考问。其有疑义随时来问，此即讲习之时，亦即古人教学相长之法也。若日日上讲堂，如今近学堂教习，鄙人虽老亦能勉竭绵薄，诲者谆谆，听者藐藐，于诸生无大益处。凡学问之道，宜使其自进，教者示以门径，督其用功，至必须讲衍，有不能不登堂指示者，亦在所必要，但不必拘定日日，缘课经一门，诸生所治，非仅一经，说此遗彼，恐非法也。）

是年为诸生讲授毛诗，随时问答。

七月七日，吾友蒙自杨鼎臣增新歿于新疆省长兼督军任所。鼎臣，光绪己丑进士，以知县分甘肃。一人徒步赴省，回乱，牧河

州有声，余藩新疆，力恳巡抚调之，来新时鼎臣已过班道员，至即补阿克苏道。革党起，新疆大乱，巡抚袁大化辞职，荐鼎臣继其任，乱党以次削平，在任十六年，内政外交无不办治。民皆爱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屡求去，为百姓哀留不得行，民国以来一人而已。惟待下严，树怨甚多，为其属吏樊耀南乘间刺杀之，南北疆商民闻之无不痛哭者。余为撰其《家传》、《神道碑》、《墓铭》。余自新疆去官以来，囊无一钱，一家累重皆鼎臣源源接济之，此尤余所痛心者也。

十月九日，余友吉林成澹堪多禄卒。澹堪以拔贡官绥化府知府，淡于荣禄，三年即辞官去。专力于诗，飘然有出尘之致，如其为人。尤工书，得晋人笔法，名动一时。程德全为江苏巡抚，偕之南下，及德全倡革命，君力争不听，遂不告而去。至上海，两次报书德全，痛诋之，并与绝交。侨局北京与余诗酒往还无虚日，余平生第一知己也。卒年六十有六。病革时，执余手嘱余铭其墓，余并为序其诗而行之。

己巳^①七十九岁

在书院为诸生讲授《周易》，余以奉天隔北京辽远，文化会不能兼顾，力辞出会。

十二月三日，余友桐城马通伯其昶卒。通伯受业于吴挚甫之门，得为文义法，挚甫死后以古文独步于大江南北者一人而已。当时金石文字多出其手。宣统二年入都，吏部考验人才，授学部主事，与余同为清史馆总纂，著有《抱润轩文集》，余为序而行之。年七十五卒，其墓铭亦余所撰也。

^① 民国十八年。

庚午^①八十岁

在书院讲授《左氏春秋经传》，因自为注以示诸生。八月肠溃大病，九死一生，甫愈又跌伤右腿，回京医治，始终不良于行，惟闭户著书，以消遣岁月而已。

是年为重逢考取优贡之岁。为八十自寿诗五古五篇，一时和者甚众。

六月三日，余友崇仁黄申甫维翰卒。申甫，别号稼溪，光绪乙未进士，官黑龙江呼兰知府。国变后，侨居京与余同事国史馆，善为诗古文辞，尤长舆地之学。卒年六十有四，余为撰墓志铭。

八月十六日，长沙章曼仙华卒。曼仙与申甫同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改主事，少年科第，丰姿皎然，美如玉树，学淹文瞻，尤工诗词，善弹琴擷笛，与人交无城府，而有泾渭。累官邮传部郎中、军机章京。国变后，浮沉宦海，为贫而仕，非其志也。著有《倚山阁诗》及《淡月平芳馆词》行世。

六月六日，吾老友正定王聘卿士珍卒。公弘毅有干略，由武备学堂毕业，累官陆军大臣。袁世凯当国，再三招之不出，卒遣其子克定亲往诳之，至京授以重任，虚与委蛇而已。袁谋帝制，幡然不告而去，曰，吾不可以再辱也。然退居林下，国有大事，皆就询谋，都城安危以一身任之，当时各省所号为伟人者，皆其后进，物望所归，人皆倚为长城云。卒年七十。

辛未^②八十一岁

居京师注《春秋经传》。辞奉天书院山长。

① 民国十九年。

② 民国二十年。

八月廿七日己时曾孙女琴姝生，孙善元出也。

余幼学填词，先祖谓词以晓风残月一派为正宗，学之恐流为轻佻，余自是不复填词。余岁感事不平，始填三阙，以志悲愤。

（《金菊对芙蓉》云：烽火连天，鼓鼙动地，霎时城郭都非，问长城消息，风雨凄迷，苍天不管人间事，终日里如醉如痴，最堪怜是破巢卵尽，匝树无依。只闻屋底乌啼，奈达官走避，又陷潢池。讯主人安在，翠绕珠围，一生拼向花间死，娑娑舞并蒂连枝，人行乐耳，江山大好，任付伊谁。

《百字令》云：万红深处，看班红沓翠，一天春色。蓦地东风狂似虎，满地落英狼藉。蝶愿蜂逃，莺愁燕恨，芳思都消灭。楼空人去，好花从此长别。伤心巽二杨威，落千助虐，处处鸣鸚鵡。恼恨东皇浑不事，一任封姨翦却。春事虽阑，欢情未歇，不管今和昔。舞裙歌扇，岁华安肯轻掷。

《水龙吟》云：当年王谢堂前燕，绣阁雕栏住惯，每逢佳日，穿花织柳，芳情缱绻。蝶舞翩跹，莺歌宛转，纷纷来伴。看翠衣颀颀，红襟灿灿。

丹棘馆，青棠院，一夜狂风吹散，怅香闺，柔肠寸断。分飞何处，室亡鸛毁，巢空鳩占。羽尾谁脩，自伤户牖，绸缪已晚。叹机心机事，更看黄雀，又逢挟弹。

十二月，同年友富顺宋芸子育仁卒。芸子为光绪丙戌进士，授翰林院检讨，与余同保荐经济特科。学问淹博，经术湛深，一任出使英、法、义、比参赞，一任广西乡试主考，以湖广道记名简放出使大臣。国变后，挈眷遁迹茅山，后入张勋幕，谋复辟被逮，解回原籍。卒于四川通志局，年七十有四。

壬申^①八十二岁

居京师，注《春秋经传》。

^① 民国二十一年。

六月八日子时孙女娟娟生，心敷出也。

是年五月二日，余老友井研廖平卒。平字季平，光绪己丑进士，以知县用不就，特就龙安府教授。少从湘潭王壬秋读书尊经书院，博通经史百家之书，守《公羊》今文家法，始以《周礼》、《王制》分今古学，言虽创造，尚能自圆其说。其后学说屡变，愈变愈支离穿凿，至五变、六变，益怪诞不可言状。（谓《诗》十五国风皆虚设，并无其国，假此以喻今英、法、德、美诸国而言，他皆类此。）畔道离经，名为尊经，实则诬圣。南皮张文襄公见其以大统说《周礼》，遗书戒之，有风疾马良，去道愈远之讥。余尝谓廖平以《公羊》乱经，康有为以《公羊》乱国，今见后出之书，按律应以疯病禁之终身，免其出而害人也。

七月七日，吾友米脂高劭农增爵卒。劭农孝友诚笃，素讲经世之学。光绪壬辰进士，授内阁中书，保升知府，累官四川巡警道，历两川四府两道，廉明正直，不畏强御，所至有声，民爱之如慈母。凡危疑艰巨诸事，当道必檄君办理，无不应手奏效者，盖其诚信素为人所感服也，吏治为全蜀第一人。年七十卒，余为撰墓志铭。

癸酉^①八十三岁

余注《左氏春秋经传》，至今年二月始告成，凡《经》三十卷，《传》一百二十卷。

二月廿二日，省政府聘余修河北通志，同聘者为高泽畚、华璧臣^{世奎}、贾佩卿^{恩绂}、张远伯^{志潭}、谷九峰^{钟秀}、张乾若^{国淦}，共七人。

^① 民国二十二年。

正月十一日申时孙男德源生，海敷出也。

九月廿二日酉时小孙丙炎生，心敷出也。

是年重修《新城县志》。

十一月廿六日，余友中江王聘三乃徵卒。

甲戌^①八十四岁

乙亥^②八十五岁

今春著有《焦易说诗》四卷。

二月初一日陈公宝琛卒，年八十八岁。歿后赠太师谥文正。

二月十五日钟广生卒。初名鏞字笙叔，后易今名，字逊庵，钱塘人，某科举人，内阁中书，工为诗古文辞，有《湖滨补读书楼文集》，年六十四岁。

① 民国二十三年。

② 民国二十四年。

附录

故新疆布政使王公行状

行唐尚秉和撰

公讳树柟，字晋卿。其先明永乐时，自小兴州迁保定雄县，至万历时，再迁新城。传十五世讳懋者，为公曾祖，家贫好善，多阴德。祖讳振纲，中道光戊戌科第一名贡士、成进士，即用知县，以母老终养。家居授徒，门弟子数千人，学者称为隐斋先生。先生生五子：曰鉴，戊午科举人，宁远学正。曰铨，乙卯科举人，东安县教谕。曰锡，补用都司。曰钰，廩贡生。曰锜，乙酉科举人。兄弟联芳竞秀，名声远播。公为东安公之次子，韶龄颖异，出语惊人。年十六岁，入邑庠。十七，补廩膳生。二十一，举优贡，朝考以教职候选。时直隶总督曾国藩聘隐斋先生都讲省城莲池书院，公随读院中。曾公闻其名，特召见指示读书门径、诗古文义法，训勉奖励，踰两小时，其见重如此。后李鸿章督直，见其文谓为苏长公后第一人，即聘充通志局修纂。未几，中式光绪丙子科举子。

公禀承家学，复得学古堂山长黄编修彭年为师，为文华瞻藻丽，诗出入于韩昌黎、李长吉二家，而博识强记，凡经书滞义，古籍错讹，训诂考订，精赅允当，突过前人。一时名宿睹所著，皆愿订交。而冀州知州吴汝纶，谓公经学海内所罕有也，延请主

讲信都书院，时通志局长黄彭年，方恃公成书，执不允。吴公乃上禀总督，以去就争之，李公乃命公在志局、冀州各半月，以为调解。风声所播，士习丕变，由是冀州文学之盛，甲于畿南。

未几，中式光绪丙戌科进士，用工部主事，叹曰：“京曹碌碌，徒耗岁月，一官一邑，尚可为民造福耳。”乃改知县，选四川青神县知县。自是持其所学，以试之民。青神滨江有鸿化堰，溉田数万亩，为豪强占夺，堰废四十余年莫能兴。知州毛恩隆以为言，而甚难其事。公曰：“某视事两月，堰必成。”果如期而复。清丈地亩，严订章约，抑制豪强，永不得逞。且宣泄得宜，山水暴洪，永免冲决，江流顺轨，连岁丰熟。三年政成，以卓异荐，循声遍川东西。

移署资阳。资阳人好讼，日必数十起。公闻即坐堂皇，纵民观听，摘发明敏，民事无三日不结者。久之，民以其难欺也，讼端几绝。会邛、蒲、新、彭、双流、大邑，盗贼蜂起，大或千人，小亦数百，而新津尤甚。总督刘秉璋曰：“非王某不能办此贼。”司道或以公书生为疑，总督曰：“人患非真书生耳，惟真书生乃能办贼。”即檄公署新津，公以三事要总督，而自克平贼期，总督许之。公即练团勇数百人，每日暮率以出，众莫知所往，视公马首而行。至贼地，始下令捕某贼。贼以其神速无备也，每捕必获，惊散瓦解。八月之内，共捕获三百余贼，诛八十余人，而贼平。实自公莅境，贼闻公名，无犯境者，其所剿皆邻县贼，故邻县盗案，多就公质。公胆识过人，当其未至，幕友门丁，闻赴新津，多托故辞去。及其既至，邛州盗魁牟化连者，遣其族人牟千总来谒曰：愿为调人，每月以钱米若干送贼，即不犯境。并云各县顾考成多如此。公拍案大怒曰：“汝敢以此尝试我

耶!”即械系之。后每获一贼，即曰牟某所指，或令牟与贼当堂质讯，牟亦畏罪，为公耳目，故贼互相猜忌，如期肃清。总督曰：王令劳矣，其少休。即调富顺。会御史台合词奏劾总督，辞连公，朝命尚书裕德、侍郎廖寿恒来川按验，部议冥昧，竟落公职。事为两江总督张之洞所闻，延入幕府。公既去川，资阳、青神绅民深知公冤，谓原奏在资阳杖毙王姓一人，委员调查，并无其事。而钦使原派查办员知县聂时鸾，意在索贿，竟以大盗黄光恩案实之。上书讼于总督，覆勘属实，时鸾论如法，且曰：免汝再害好官也。其为上下所信赖如此。

光绪二十一年甘肃回乱，陕甘总督征军火于两江，以公运行，会总督陶模求人材于张之洞，张公即荐公，由是官甘肃，入幕府主折奏。陶公勇于图治，谓黄河自古富宁夏，中卫大小二十余渠，废弛近百年莫能复，坐失富源，常用忧叹。公曰：“天下事无不可为，但患不为耳。”陶公喜曰：“即以烦公署中卫县。”既视事，召集士绅，逐渠履勘。渠共长一百七十八里，相形度势，修进水闸三，退水闸三；或筑飞桥，使渠水从桥上流，山水从桥下泄；或筑暗洞，使山水从洞上泄，渠水从洞中入。渠身宽狭深浅，随地异形，导流决壅，培旧筑新。而红柳沟为全渠咽喉，工尤巨，即筑室三楹于沟旁，听讼于是，文移于是，著书于是。暇则持炳笠，徒步循视上下游，露憩风餐，^{〰〰〰〰}与民同作息。如是者二年，全渠告成，数十万亩荒田，尽成沃壤，而费只万余金。由仓谷变价借用，渠成由领地者偿还，不贻国家一钱，而国课骤增，县以大富。

初公以修渠功，补中卫知县，大计复荐卓异，以知州在任候补。会朝廷开经济特科，陕甘总督崧寿、四川总督岑春煊、总督锡

良、工部侍郎唐景崇，交章论荐，而岑春煊、锡良更先后奏请，以道员来川候补。二十九年，以道员入京陛见。始公在青神筑鸿化堰，公之去，百姓思其功，为建生祠，春秋祭赛。及去中卫，民念公遗德，仍建生祠，定期和会，求签问卜，至今不衰，川陇皆传为嘉话。

义和拳之起，宁夏道府皆旗员，招入署中，令民学习，不数日蔓延至中卫。公出示严禁，并飞函密禀总督，请通飭全省，遇有拳匪，尽法惩治，以保完善之区，由是宁夏道府始敛迹，全省获安。公既陛见，朝旨允以道员仍回甘肃。行未至道，授平庆泾固化道，署巩秦阶道。光绪三十一年，总督升允，谓甘省贫瘠，固由极边，然每年税入只四十万金，深疑其弊，即奏调公署皋兰道。甘肃全省税厘，归首道统辖，局卡林立，中饱愈多，商民益困。公召集商人，详询货物等色出入途径，及受病之由。并令诸商，自定入口路程，违则重惩。自将百货，指定上、中、下等级，防税局上下为奸。议既定，乃于陕西三原设统税局，凤翔府设分局，在此纳税，通行全省，不复重征。余局卡数十全撤，商民俗困，一旦蠲除，皆大欢悦。行之八月，税收达百二十余万两，较旧入全年，已逾三倍。阿拉善有盐池，所谓大青盐也，行销数省，而每年国课收不过万金。公创设蒙盐官局，官商股各半，互相铃制，宿弊尽除。讫公去只两月，国课已入二万五千金。三十二年四月，超擢新疆布政使。新疆富庶恃南疆，而南疆幅员数千里，去省宵远，官吏承湘军残暴之余，恣为淫虐，其浮征粮草，动逾额征五六倍，或七八倍。且自制权衡，每柴百斤不足二十斤，每银十两不及三四两，而税厘局卡残虐尤甚。羸民不谙汉语，不识汉文，敢怒而不敢言。公既廉，得其情，大惧曰，

“是逼回民再为乱。”乃厘订征收新章，许县官按额征浮收二成，以资事畜外，不得多征。并自制库秤，发各县及卡局遵用。又恐缠民不能家谕也，凡布告皆附回文，并饬官吏学习缠语，以免通事蒙蔽为奸。而税厘局卡之裁撤，一如治甘肃时，新章既定，严密侦察，奉行维谨者不次迁擢，贪墨者立予惩治。行之期年，南疆缠民岁省约三四百万金，而公家赋额增收数倍，税厘亦如之。当是时，新省几不受协而足用。库储既大裕，公乃提银百万两，创设官钱局，推行于各道府，特出纸币，许商民纳税完粮。于是县官税局剥夺商民现银之弊，一扫而空，而纸币百两，反值实银一百二十余两。缠民爱戴公，呼为老大人。公去后，见所出纸币，即曰此老大人币也。迄今数十年，币值仍非他币所可拟。

初俄人附我北边，设台站以与其铁路相衔接，输运迅速，由是我商人邮物，悉付俄人，年收卢布数十万。公至即禁俄人售邮票，聘比人毕德生，创设邮政，挽回利权，新疆之有邮局，自公始也。公居恒谓新疆受协饷年二百万，近以新政繁兴，十不一至。而新省牧畜、羊马、皮毛、煤油、五金矿富甲天下，随举其一，便足自存，乃节浮费，剔中饱，务裕库储，期以生利。而巡抚联魁，专庇墨吏，尚请托，以公之所为，不便其私也，遇事尼之。会会匪王高升纠众为乱，纵火延烧省城，迪化菁华，悉成灰烬。次日军民数千持商票兑银，势凶凶将再乱。公立出示，所有商票，藩库兑还，人见之，乱立已。即召商人，清查损失，由库贷银，限期偿还。未半年，闾阎复兴，库款皆入。初贼之起，公请巡抚调兵镇压，而联魁执不听，后因此褫职，则益恨公，乃嗾满御史劾公，朝命陕甘总督长庚覆劾，无丝毫实。当是时新简新

疆巡抚袁大化行至甘，闻公作事专愎，难为之上，请长庚以嗜好难明，赴京调验奏覆。及大化至新，睹公所为，披沥语公曰：

“实告公，公之开缺，乃大化所为，一时误听，失此臂助，悔如之何！”坚欲奏请留公。时公母年八十有余，急于定省，即只身由西伯利亚驰归，时宣统三年也。归未久，而革命起矣。

凡公所至，以剔弊为先，便民为亟，而公家收入，无不骤增。故所至民喜，所去民思，而官只布政使，未能大用，以尽其所负，世尤惜之。公材力精强，自入仕，终日案牍，仍终日著书。既巡历穷边，凡山川、风俗、草木、鸟兽之奇形诡状，恣为歌咏，发为文章，门户开张，铿訇藻采，望而知为奇伟人也。而小学特精，常以《尔雅》、《广雅》、《夏小正》诸书订证经文，俾还旧字，博通淹贯，如数家珍，皆昔儒所未有。盖自宋元以来，能文章者，笺注训诂或有所不逮，攻考据者，文或拘促龌陋，不副其所学，唯公能兼而有之。

自公东归值国变，隐居僻巷，终日著书。三年，充清史馆总纂，十五年，赴日本文化会，十八年，主讲奉天萃升书院，二十五年二月卒，实废历丙子年正月十五日也，享年八十又六。配刘氏、杨氏、杨氏，子男六：政敷，河南新郑县知县，刘夫人出。禹敷、勇敷，简任职，皆杨夫人出。敬敷、海敷、心敷，侧出。女子几人，孙某某。公宦游归来，清贫如故，而服御简陋，不改其恒。幼从黄子寿学为骈体，后与吴冀州游，顿改古文，洞明义法，其神悟盖由于天授也。所著除《畿辅通志》、《清史稿》外，有《校正孔氏大戴礼记》十三卷，《中庸郑朱异同说》一卷，《尔雅郭注异同考》一卷，《建炎前议》一卷，《墨子三家注补正》二卷，《夏小正订经》一卷，《夏小正订传》四卷，

《尚书商谊》三卷，《赵闲闲诗集目录年谱》十四卷，《广雅补疏》四卷，《尔雅郭注佚存补订》二十卷，《费氏古易订文》十二卷，《离骚注》一卷，《天元草》五卷，《十月之交日食天元草》二卷，《彼得兴俄记》一卷，《欧洲族类源流略》五卷，《蛰叟》七篇，《欧洲战事本末》二十二卷，《希腊学案》四卷，《希腊春秋》八卷，《新疆国界志》八卷，《山脉志》六卷，《兵事志》二卷，《访古录》二卷，《新疆小正》二卷，《礼俗志》一卷，《道路志》四卷，《土壤表》一卷，《建置志》、《实业志》各一卷，《武汉战记》一卷，《大清畿辅先哲传》四十卷，《列女传》六卷，《大清畿辅书征》四十一卷，《学记笺证》四卷，《将吏法言》八卷，《说文建首字义》五卷，《周易释贞》一卷，《冀县志》二十卷，《法源寺志》八卷，《左氏春秋经传义疏》一百五十卷，《新城县志》二十四卷，《左氏春秋伪传辨》八卷，《焦易说诗》四卷，《尔雅订经》二十五卷，《尔雅说诗》二十二卷，《庄子大同注》二十二卷，《文莫室诗集》八卷，《陶庐诗续集》十二卷，《陶庐文内集》三卷，《陶庐文集》二十卷，《陶庐笺牍》四卷，《陶庐骈文》一卷，《陶庐外篇》一卷，《陶庐随笔》若干卷，《诗话》若干卷，《清语林》四十卷，《三食神仙齐杂记》十五卷。公之学，浩博无涯涘，秉和交公数十年，略窥一二。公子禹敷，拜求撰述，乃捡公遗书，及见闻所及，缀录如右，以备史官采择。行唐尚秉和谨状。

（整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



林白水传

林慰君



说 明

林白水(1874—1926)原名獬,又名万里,字少泉,号宣樊,中年自号白水,福建闽侯人。年青时即以文名于乡里,受塾师高啸桐影响,痛恨清廷腐败,向往维新改革。1898年杭州知府林迪臣创办蚕桑学堂,与林纾同被聘执教该校。1901年任杭州求是书院总教习。同年6月,《杭州白话报》创刊(1904年1月停刊,共出八十一期),林白水为编撰之一,以宣樊子笔名在报上发表文章。《杭州白话报》为我国创刊较早的有影响的白话报之一,以“开民智和作名气”为宗旨,宣言“因为是旧风俗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风俗;因为是旧学问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学问;因为是旧知识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知识。千句话并一句话,因为是旧中国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中国。”(见该报1902年6月,第1年第33期《谨告阅报诸公》)。它以鲜明的立场,对当时中国政治及国内外重大事件,发表评论,提倡改造社会的主张,对以后各地白话报的出现,颇有影响。

1901年冬林白水到上海,翌年与蔡元培、蒋观云等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1903年春赴日留学,同年在日参加“拒俄义勇队”,又组织军国民教育会,进行革命活动。因清驻日使馆出面干涉,愤而回国。是年12月在上海与蔡元培、刘师培创办《俄事警闻》(后改为《警钟日报》)。林又独自创办《中国白话报》,宣传革命,署名白话道人发表《论刺客的教育》一文,鼓吹暗杀作为

革命过渡手段。1904年11月，上海发生万福华谋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未遂事件，林与革命党人奔走营救。后又再度自费留学日本。

辛亥革命爆发，福建独立，林白水任都督府政务院法制局长，并任共和党福建支部长。1913年被选为国会众议员。袁世凯统治时期曾任总统府秘书、参议院参政。袁世凯帝制失败后，辞去议员，从事新闻工作。1916年9月与王士澂、黄秋岳、梁鸿志等在北京创办《公言报》，该报为皖系的言论机关，1920年7月停刊。1921年春与胡政之创办《新社会报》，翌年因刊登与直系军阀吴佩孚有关报道及盐馥公债黑幕消息，被勒令停刊三个月。5月1日复刊，改为《社会日报》。1923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林白水撰文揭露贿选，报馆又遭封闭，三个月后始又继续出版。

林白水从清末至民国建立后，经历了从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至民国初年从政为官，依附于袁世凯、段祺瑞等军阀政客，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但由于北洋军阀统治所造成的黑暗政治和动乱的时局，使他对军阀的本质开始有所认识，所以在1921年创办《新社会报》及以后的《社会日报》上，他以白水署名，撰文评论时政，揭露军阀政治的黑幕，文章“尖刻突兀，易于动人”，“涉及权贵私德，形容备至，不留馀地”。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孙中山北上参加善后会议，林白水在《社会日报》连续发表《吾人对中山先生之敬意》、《时局与孙中山》、《欢迎孙中山》等时评。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后，林在报上发表特别启事，拒登英日两国广告。这都反映了他的政治态度。1926年国民军退出北京，段祺瑞执政府垮台，4月21日林在《社会日报》发表时评，略述他与安福系交往的始末，宣布与段祺瑞

决裂，此后林白水文章的笔锋，更是直接指向反动的军阀政客。他在《代小百姓哀告》一文中，指责帝国主义和军阀说：“时至今日，若犹以讨赤为言，兵连祸结，则赤党之洪水猛兽未见，而不赤之洪水猛兽先来”，抨击军阀倒行逆施，言语激烈。他在报上公开宣称：“世间还有公道，读报的还能辨别黑白事非，我就是因文字贾祸，也很值得。”

奉鲁军阀张宗昌进入北京后，疯狂镇压爱国运动，钳制舆论，封闭报社，4月26日又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将《京报》主笔邵飘萍枪杀。林白水没有惧怕，仍撰文揭露奉鲁军阀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的罪行。8月5日林在《社会日报》刊出《官僚运气》一文，讽刺政客潘复攀附军阀张宗昌，官运亨通，文中把潘复与张宗昌的关系比喻为“肾囊之于睾丸”。张宗昌、潘复两人原系赌博场中的朋友，由于潘的介绍，张宗昌受到奉系军阀的提拔。为了酬报旧恩，张宗昌聘潘为山东军署总参议，并且成了他的幕后军师。林白水骂潘，潘为此哭诉于张宗昌之前，一定要置林于死地。因此张宗昌命令北京宪兵司令王琦于8月6日凌晨将林白水逮捕，并立即执行枪决，罪名是“通敌有证”。

本书作者林慰君为林白水之女，早年毕业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现居美国，曾任美国国防语言学院教授，擅长写作，发表作品甚多，散见于国内外报刊。传记原刊于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第十四卷第一、二、三、五期，后于1969年收入《传记文学丛书》。全书除作者所撰传记外，尚收附录五篇，均有关林白水生平小传或记事，可与传记相互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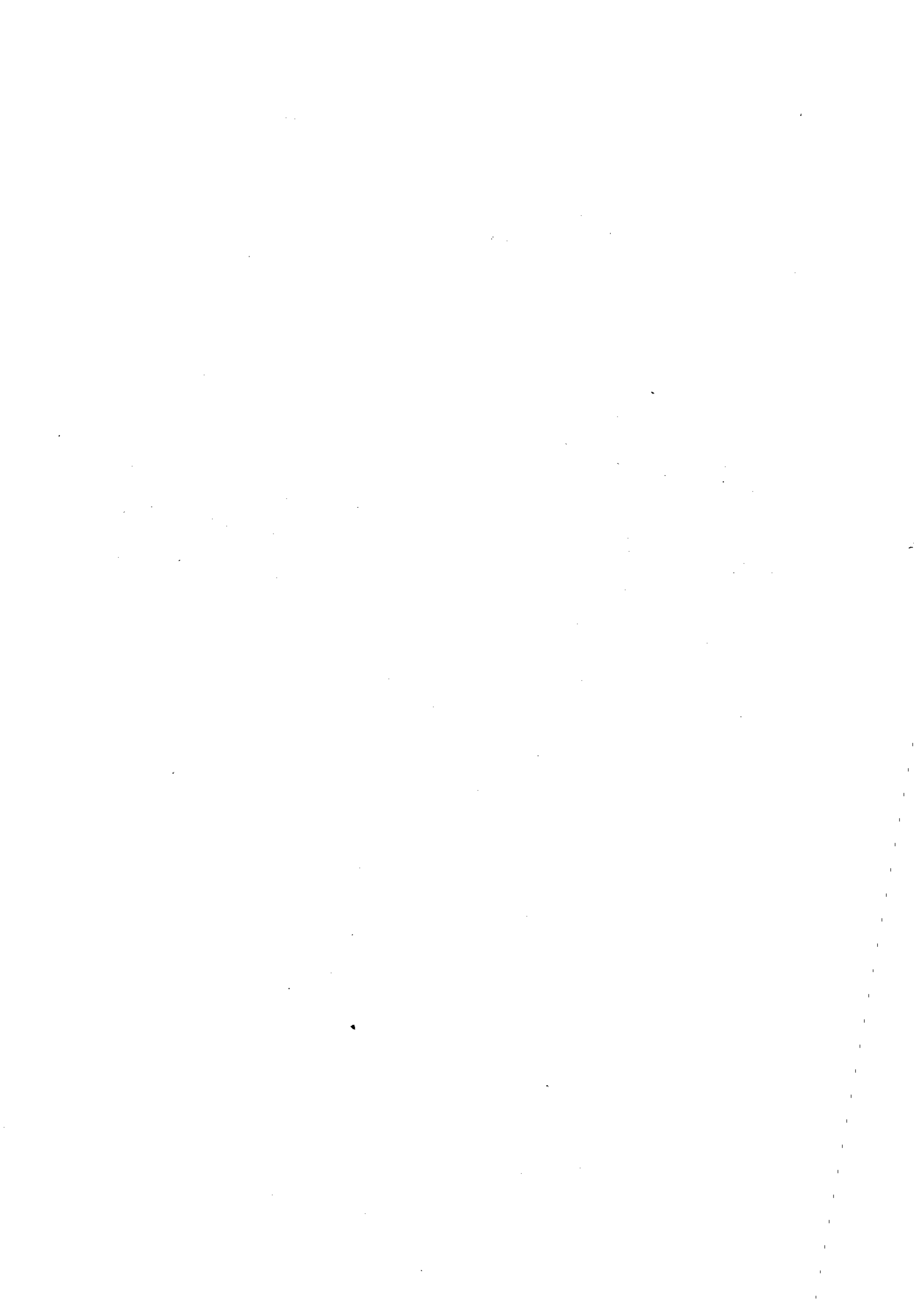
林白水与邵飘萍是民国初年北京报界两位知名人士，均是以抨击和揭露军阀暴政而遇害牺牲的，他们的死在当时成为轰动一

时的大事件，也是民国政治史上一桩重要公案。但有关这方面的史料，多散见于当时报刊，不易搜集，他们的生平事迹，尤为零星片断。《林白水传》较为集中而完整地提供传主的生平事迹，可供研究民国史及近代新闻史之参考。

现据《传记文学丛书》本刊印，文中所涉及的史实及办报时间语焉不详者，以编者所知，略加边注（附于本书每节后之“注一”“注二”，系原书作者所加），以便读者。

林白水传目录

- 先父的一生 (445)
作者最后的几句话 (略)
- 附录一：生春红室金石述记林白水遗著 (508)
 容庚跋 (517)
 陈汉第跋 (519)
- 附录二：哀诔徐佛芬 (520)
- 附录三：闽县林白水先生传略黄翼云 (523)
- 附录四：林白水先生传略陈与龄 (527)
- 附录五：对《林白水先生传》的几点补充
..... 陶英惠 (531)



梁敬惇序

林慰君女士为其父白水先生作传，五万余言，叙事细致，文笔清矫，孝思尤足风世，〈传记文学〉以四期篇幅连载之（〈传记文学〉第十四卷一、二、三、五期）。白水先生与林琴南、林宗孟两先生同时，为民初北京“福州三林”人杰之一。余年辈较次，未能周知先生故实，然春明故都，犹及款接，其最可追记者，又莫如民国十五年秋间金鱼胡同海军联欢社之一宴。盖此即先生遇害之夕，亦即予与先生人天判诀之局也！四十年回首，余痛犹新，谨缀所忆，以补慰君长文之所未尽。

民国十五年八月五日，乡人某假北京东城金鱼胡同海军联欢社宴客，凡四席。夜九时，席罢，客多去，而暑热仍炽，予与王莪孙、陈淮生、李律阁、释戡兄弟，（皆其后白水遗嘱中人物）仍在院中，品茗纳凉，纵谈时事。白水先生御白纱衫，外加青灰色纱长背心，持折扇，拂长髯，从容下阶，顾予等曰：君等清谈，得毋谋馀兴耶？莪孙答曰：公如有兴，我等不敢辞。先生指手表曰：“我今须赴报馆矣。”遍颌予等毕，遂出。

一小时顷，联欢社侍者就莪孙低语，谓有电话，莪孙起入内，数分钟即匆匆披长衫出，谓：“白水出事，吾须回去营救。”

众各惊愕问故。莪孙曰：“吾家来电话言：接林家电话，谓白水在报馆，被军警捕去，不知所往。吾今赴报馆详查究竟，君等如有军警熟人，望分途探听相告。”时山东督办张宗昌方率直鲁联军据北京。海军总长杜锡珪虽居代阁（代颜惠庆兼国务总理）之名，而事权不属。宗昌则日在其石老娘胡同私宅中，淫赌专横，无所不至。有潘复者，字馨航，即谄事宗昌，又夤缘财部，目迎面媚，出入相随，白水深恶之。潘尝以重金托所稔，饷《社会日报》，并请向白水道地，白水曰：“吾秉笔政，为国家正纪纲，为社会揭罪恶。《社会日报》诚需开支，然吾口吾笔，不能因此自封也。”出事前数日，《社会日报》有一短评，以“肾囊”两字，谐音“馨航”，谓其卑贱猥琐，虽遇“房事”，犹随人俯仰以取乐。潘阅报，深衔之。故是夕之变，虽未知所由，而“肾囊作怪”之疑，已交萦于众虑。

其时北京捕人之机关有三：一为步军统领侦缉队，一为京师警察厅，一为宪兵司令部。予戚蒲志中（字子雅）方为警察厅司法处长，其家距金鱼胡同至近，予出金鱼胡同即过蒲宅，欲向子雅询究竟，而子雅外出未归，乃留语阍人，谓有急事，归时无论早晚，必来电话。十二时子雅来电，予告以白水被捕之事，子雅茫然。即云，当立为调查相告。半小时后，子雅再来电谓已查明系宪兵司令部所为，但闻系据石老娘方面之命令，事颇不测，已告莪孙通知李律阁漏夜营救。盖律阁与宗昌方为赌伴，而子雅与白水先生之友谊，固不在予等之下也。

天将曙，子雅第三次电话来，谓白水已遇害，横尸天桥，待家属往收拾！律阁与杜锡珪营救皆不及，予持话筒，对话悲哽不能成声。事后方知潘复以肾囊社评，向宗昌解说，谓：“馨航如

是肾囊，则督办将成何物？”宗昌乃怒，即以通敌（国民党）罪名，指捕白水，中间虽经李律阁、薛大可诸先生跪地乞情，允贷一死，而潘复已暗嗾宪兵司令部王琦速害白水，而以“奉赦不及”报闻。综扣时刻，知金鱼胡同吾侪与白水先生言笑晏晏之时，即石老娘胡同中潘复、王琦唧唧构害白水先生之会。白水先生自受捕而至枪决，前后仅数小时，无一度之传讯，无只纸之供单，牵赴市曹，一弹毕命。当年北洋军阀草菅人命，虐杀名流之凶残，未有如张宗昌之甚者！

白水先生修眉疏髯，风仪甚卓，与人言，若恂恂然，而一主笔政，则诛伐凌厉，无所顾忌，盖其嫉恶如仇不避权贵之生性有以致之。其从父少谷先生，于光绪甲午年（一八九四）以游击率扬威军舰与日军战，死于大东沟之役。自光绪甲午而至民国丙寅（一九二六），前后三十二年，一门叔侄，皆以身殉职分，而先生所遇尤冤酷。先生幼时，文名已噪，深通古文，而首倡白话报。林宗孟^①尊人伯颖老先生任浙江石门县时，尝设东西斋以课子侄，延琴南先生主讲东斋，而以先生主西斋，其见重于世如此。宗孟先生尝以此语予，今能知此事者有几人哉！

先生壮岁译著华盛顿、加里波的、纳尔逊、哥伦布、大彼得、俾士麦各名人小传，皆载商务印书馆《少年丛书》中。慰君传言，其所采之资料，多出自徐佛苏之像赞与黄翼云之传略。徐赞作于民国十五年，黄传作于民国十九年，距先生之歿，为期尚近，所言自皆可信。予尝另见同乡陈与龄先生《林白水先生传略》一文，民国二十三年撰，载《东方杂志》（三十二卷十三

^① 林长民（1876—1925）字宗孟，福建闽侯人。1917年曾任北京政府司法部长。1925年郭松龄起兵反对张作霖，林入郭幕，参加反张，兵败身死。

期)，内容虽稍涵括，但亦可补慰君大作之遗。倘持与徐、黄诸作，合刊问世，似亦可传先生风概于万一。因次陈作于后，以畀慰君，慰君其有意乎？

中华民国五十八年六月梁敬鐔识于纽约

成舍我序

林慰君女士为其尊人所作白水先生传付印之前，要我写几句话，我虽多年来极少写所谓序跋之类的文字，但慰君女士完成这一阐扬先德的新著，多少受我不断敦促与鼓励的影响，则在出版前夕，她一再以“写几句话”相托，我当然深受荣宠，义不容辞。

白水先生是四十三年前，即民国十五年八月六日，在北平军阀统治下，为最凶残也最昏恶的张宗昌所杀害。人非圣贤，无论世间对白水先生，纵有任何评议，终无法否认，他是中国新闻自由斗争史上，以身殉报，罕有的报业烈士之一。

我从民国七年起，与白水先生同在当时的北京，从事新闻工作。我比他小二十四岁，行辈较晚，彼此思想基础，生活环境不同，故平时极少往返，甚至等于不相识。不料这等于不相识的人，他的惨烈成仁，却在我这四十三年来，留下永远最深刻印象。除了他是报业先烈，应受到所有报人崇敬外，尤其在他遇害后不到二十四小时，我也被王琦以同样方式，奉张宗昌命，抓进宪兵司令部，其未追随白水先生于地下，真是相间不能容发，这一史实，也就自然增加了记忆中我和白水先生的特别关联。

民国十五年八月六日凌晨，天刚亮，我在〈世界日报〉宿舍中，就一再被电话唤醒，都是与白水先生有关的朋友，报告他遇害消息，但六日各早报，并无是项新闻刊载，〈世界日报〉亦不

例外。于是我决定将这一不幸消息，以第一条大字标题，加黑边，刊登在下午出版的《世界晚报》上。我曾访问了很多知道遇害情形，及可能知道内幕的人士，他们大致多认定：张宗昌亲信潘复，想做国务总理，白水先生的《社会日报》则全力痛斥潘复庸劣，在最后一篇白水先生亲自撰写的文章中，说潘复自命为张效帅（即张宗昌字效坤）的智囊，实则只是肾囊而已。潘以此文示张，张遂令其爪牙宪兵司令王琦，深夜往捕，并命“就地正法”，旋以薛大可等跪地哭救，张始允暂留一命，但潘暗嗾王，不待张赦令到达，先予枪杀，令到已毕命十数分钟。这些经过，慰君女士在白水先生传中，也有约略相同的叙述。不过当时北京各报，除简短报告遇害外，其余只字未提。《世界晚报》也只能以黑边头条，致其同情的哀悼。在我访问的那些人士中，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侯德山（等于现在的刑警队）告诉我：“当白水先生解往天桥刑场时，行刑兵对白水先生说，‘林先生，你是读书人，我不让你吃苦，一枪就请你马上升天吧！’”因为行刑兵对一般犯人，总喜欢浑身乱射，让死者增加最后挣扎的苦痛，有些家属，甚至须事前贿托行刑兵，始可享受一枪毕命的优待。白水先生家属，并未贿托，而行刑兵竟自动不忍使读书人增加苦痛。在兽性发扬的军阀统治下，还能保留如此一线善良的人性，白水先生虽为万恶军阀所痛恨，但仍为下级小兵所敬重，就这一点说，白水先生地下有知，也值得安慰了！在距白水先生殉报成仁不到二十四小时，当夜王琦奉张宗昌命，以同样方式，到《世界日报》捕我。坐在武装士兵夹持的大卡车中，我曾不期而然，想起侯德山告诉我的话，或许行刑兵给予白水先生的优待，也可同样给我。张宗昌击败冯玉祥，进入北京，首先捕杀的，为《京

报》社长邵飘萍先生。次为白水先生，再次为我。虽然白水先生的遇害，有潘复从中播弄，但主要原因，仍由于我们的报纸，过去均同情国民党及国民军，而痛骂张作霖、张宗昌，他们要报复，才下此毒手。幸我以北洋军阀所崇奉之元老孙宝琦先生，及时竭力营救，得于被捕三日后，免死释放。经过漫长的四十三年，我在今天，尚苟活幸存，得读慰君女士所作白水先生传，这真是民国十五年八月六日深夜，我坐在大卡车上所万想不到的！

在白水先生传中，有三点，是四十三年前许多北京新闻同业，包括我在内，所不曾深知的。第一、白水先生并不如我们所想，仅是当时乌烟瘴气，军阀统治下，一份政治性报纸的主持者，从青年时期进入新闻界起，他就准备彻头彻尾，做一个代表人民说话的前进报人。他办的第一份报，是《杭州白话报》，出版的那年，应是民国前十一年，即光绪二十七年。他所写的发刊词，如译成现代语句，他是曾一再强调报纸属于人民大众，报纸应大众化，报纸应使用大众语言，即白话，而不应咬文嚼字，专供士大夫阶级阅读。这些看法，即在今天，也仍是正确而前进的。我们算计年龄，民前十一年，他尚只二十六岁。《杭州白话报》被迫停刊后，他在上海，又先后或与朋友合办，或独力创办了一连串报纸，如《俄事警闻》、《警钟日报》、《中国白话报》及《和平日报》等，这大概是民前八年至六年间的事。这一段光荣灿烂的历史，在未读慰君女士此传以前，大家虽也有些传闻，但多半总是模糊惆怅的。第二、白水先生又并不如我们所想，仅是当时乌烟瘴气军阀统治下一位政论家，而在慰君女士记述中，他早年实是一位勇敢爱国，百折不挠的革命志士。他与蔡元培、章炳麟先生等，同时参加革命，他办过好几所鼓吹革命的

学校，黄花岗烈士林觉民、方声涛等，都曾是他所办学校的毕业生。他自己并曾与万福华、刘光汉，亲自参与刺杀清吏王之春的工作。民国七年，我离开上海《民国日报》到北京，一面进入北京大学读书，一面受聘担任北京《益世报》总编辑。时北京报纸共约五十余种，其销路较广，受人重视的，除日本人所办《顺天时报》外，仅有《北京日报》、《晨报》、《益世报》、《公言报》等六七家。有人神秘的告诉我，《北京日报》主持人朱淇，《公言报》主持人林白水，他们均曾在满清时期，做过激烈的革命党，但真正知道他们过去事迹的，似乎仍很少。朱淇我曾见过，他已是一位萧然木讷恂谨的老人。《北京日报》销路，仅次于《顺天时报》，消息最多最杂，评论不痛不痒，没有政治色彩，且专以评戏评花（妓女）见长。而白水先生的《公言报》，则政治气氛最浓，言论锋利，当者披靡。二人作风虽不同，但无论如何，白水先生早岁参加革命的丰功伟绩，在未经慰君女士阐扬以前，是极可能会被湮没的。第三、根据慰君女士的记述：

“我们家里用人最多时，整整有十个。厨房有两个厨子，一个大厨子，一个帮厨。门房有一个看门的，两个听差——一个管收拾父亲的客厅、书房、客房等等，一个管研墨、上街买东西、扫院子等等。女用人经常有三个，一个管伺候母亲，另外一个管打杂、洗衣服、做针线等等，还有一个专看着我。此外还有一个车夫，一个花匠和一个护院的……。”这样一村家庭重担，在当时北京绝大多数报纸未进入营业时，白水先生靠着办报来支持，当然是极其艰苦的。当时新闻界同人，有些只羡慕白水先生的生活享受，我们现在同时也读到慰君女士另一段话：“说起来或听起来，我们的生活，很富有似的，其实不然，父亲的生活，经常是

在穷困中，他的债务，永远还不清……。”以上三点，都是四十三年前，大家对白水先生所不能清楚认识的，由于慰君女士的揭发，可以证明白水先生，在他的生命史中，一方面曾是一个卓越报人，革命青年；另一方面，他又极其浓厚地拥有中国文人的传统气习。白水先生的潜德幽光，得此传而为天下后世所共晓，慰君女士的孝思，真可慰白水先生在天之灵了。

慰君女士的记述，就为先人作传的严格程式说，容有可以研讨之处，但叙事忠实，行文流畅，尤其在追忆父女亲情时，刻划真切，天性毕露。慰君女士原是名女作家，从这本传记，可以看出她卓越的文学天才。

民国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间，慰君女士曾执教于我所创办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大陆沦陷，女士侨居美国，担任讲席，三年前，随其夫王渤生先生来台。在留台一年中，每次晤见，谈及白水先生时，我总劝其作传，女士谓在美已写好一部分。我以白水先生殉报成仁，距今已四十三年，不特许多人早已不知有白水先生，即从事报业及尚在大专学校攻读新闻的青年，对白水先生，印象也极模糊，甚至连姓名都弄不清楚。我认为追记白水先生生平事迹，实已不容再缓。慰君女士返美未久，即以本书原稿见寄，我原拟搜集若干白水先生在其所办报刊中发表之文字，及就慰君女士原稿，分别考证，并加注年月，以为补充。人事栗六，迄无暇晷。旋慰君女士应《传记文学》之请，先为发表。兹复另印专册，慰君女士嘱写小文，用述所感，以报慰君女士。

自序

民国五十四年，外子王渤生应美国国务院及美国在华教育基金会之聘，回国讲学。我也携带小女，和他一起回到祖国去住了一年。直至五十五年，才又返美。

在台时，常常和成舍我先生见面，他以长辈的态度，时常鼓励我要为先父写传。老友夏承楹（何凡）、林海音夫妇，也时常问我为什么这几年不常动笔。他们都劝我要继续写作。

我本来应当利用在台北这一年悠闲的时间，来好好的写点东西。可是不知道是应酬太忙还是心情不对，总是写的不满意。后来又因为天气太热，身体很不舒服，所以先父的这篇东西只写了一小半。

回美后又因为工作忙的原故，老是无暇执笔。直到今年，才又继续写。有时一个星期写一点，有时好几个星期也不动笔。

老实说，这篇稿子之所以迟迟完成，最主要的原因，大概还是因为它是关于先父的事情，而不是一篇小说。如果是创作的小说，我相信在三五个星期之内，就可以把它写完了。我是一个重情感的人，提笔写稿后，常因想起先父，感情激动，泪流满面，因此不能继续下去！我想医生们不愿给自己的家人亲属动手术或治病，大概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具有真实的感情，动手时反而恐惧，迟疑，踌躇不决！为别人，反而胆大迅速。

有一位朋友，看了拙稿前面几页，他就对我说：“我觉得你

开头所写关于你祖父和你祖母的事，未免太‘戏剧化’了！有点象旧戏和小说，不象真实的事情！”

我说：“但我写的确是事实，我又有什么办法？这些事都是我小时听我姑母、母亲和其它亲戚们所说的，我不能因为它‘很象旧戏和小说’就另外捏造一段事情啊！况且，戏与小说是根据真实的事情而编而写的，现在不能说有了类似的戏或小说，就断言世界上不会真有其事，你说对不对？”那位朋友只好承认他替我顾虑得太周密了。朋友们替我顾虑，我当然是十二万分高兴的！比没人关心总好得多！

不过现在总算写完了，它很简短，这完全是没有虚构的穿插。

按理说，写传记本来应当把年月日写得清楚一点，但是，先父所做的事，多半是在民国以前，他的朋友们，大多数也已不在了！因此年月日很难写得准确。所以我只好不写。我相信台湾和香港现在还有一些先父的学生、朋友和他们的子侄。如果有人知道先父的事迹，而我所遗漏的，希望能不吝指教！如能再告诉我某些事发生于某年，则更无任感谢！

本书中所搜集的几篇文章——徐佛苏的《哀诔》，是民国十五年先父开吊时所写；黄翼云的《闽县林白水先生传略》是民国十九年，灵柩运回福建安葬时所写的一本小册子。黄展云的《像赞》，也是那时所作。至于容庚和陈汉第的跋，则是在容先生把先父所写《生春红室金石述记》搜集在燕京大学所出的《考古丛书》中后所写。他们都把各人所知道的关于先父的事，写在自己的文里，虽然他们各人说法看法不同，但都是很好的参考资料。同时也可以证明，世界上不只是我一个人说父亲多么伟大，还有

很多别人，也异口同声的赞扬他呢！

最令人惋惜的是：先父一生提倡白话，而我竟没能把他的白话作品搜集在此，这里仅有的几篇小品，竟都是文言的，而且与政治无关！正象容希白先生在他的〈跋〉里所说：“……呜呼！君其仅以是传耶？……”这几篇小文，怎能代表先父一生著作的万分之一！

本书中只有几张像片，先父的遗像，大约是在他被难前八九年（民国六七年）所照。那时他只有四十几岁！此后他就没再照过单人的像！

至于我把与胡适之先生和其他朋友所照的那张像片，也放在书中的原因，则是因为我提到和胡先生谈话的事，恐怕有人以为我也是好以“我的朋友胡适之”自炫的人，因此把它放在这里，以免读者怀疑。

梁敬惇、成舍我两先生在百忙中，为我抽暇看稿并赐序，程沧波先生为本书题字，好友海音也帮忙校对。现在我谨就此机会，向梁先生、成先生、程先生和其他帮忙的朋友们，致最大的谢忱和敬意！

民国五十八年于美国加州

林白水传

林慰君 著

先父的一生

(一)

这是民国前三、四十年的事。

有一位风流潇洒的青年，在一个夏天的傍晚，骑着马在街上闲逛。这个人名叫林剑泉，是在贵州做官的福建人林唐卿的孙子。因为他是独生子，所以他的父母对他可说是“有求必应”，因此把他造成一个从来不识愁滋味的纨绔少年。

他的马走过同乡黄沧洲督学的后墙外，忽然听见里面有女孩子的莺声燕语，于是下了马，爬上墙外的一棵大树，偷偷的往下看。

他看见花园里有好几个女孩子在采花。

她们都很美。不过，其中身材最高的一个，似乎最漂亮。

林剑泉那天回去之后，就把他对黄家大小姐的爱慕之意，间接的对他的父母表示出来。他的父母正希望他早一点结婚，好生个孙子呢！于是就立刻请人到黄家去求亲。（这位小姐是黄督学的侄孙女。）

林、黄两家既是门当户对，而这位少爷和那位小姐又是郎材女貌，这门亲事，自然是一说就成。

那年的冬天，黄大小姐成了林家的少奶奶。林、黄两家因为都是福建人，所以婚礼是回福州举行的。从此他们就定居在福州

老家了。这位少奶奶不但会写诗填词，而且做得一手好女红。因此没有人不羡慕林剑泉的福气的。

在他们结婚的第二年——就是清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廿九日，他们得了个儿子，林剑泉给他取名獬，字少泉。

过了三年，他们又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宗素。这兄妹两个人，生在福州的名门，按理说他们的童年，应当是非常幸福的。可是不幸少泉才三四岁，他的曾祖和祖父母就相继去世。因此庞大的家业，完全落在他父亲林剑泉的手里。据算命的先生说，林剑泉父母的死亡，完全是林少泉的命太硬，把他们克死的。剑泉那时只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青年。他有文才，他风流倜傥，豪爽大方，可是他不善理财。他只整天和朋友们吟诗饮酒或到花街柳巷去取乐，而不知柴米的艰辛。因此不到几年的工夫，他就把承受下来的遗产，差不多用光了！

黄夫人是一位标准的贤妻良母，她不敢管她的丈夫，因此，他们一家，只好由大房子搬到小房子，由小房子再搬到破房子里去住，整天以当卖度日。

生活一天比一天艰难，剑泉的脾气也一天比一天大起来。从前有钱时，他一不高兴，就可以到外面去玩，现在没有钱，不高兴也得在家里闷着，于是更增加了他的烦恼。这些怨气出在谁的身上呢？自然是出在儿子的身上！他不敢打太太，因为太太的娘家——黄府——还是有钱有势的。他舍不得打女儿，因为女儿实在美丽可爱。只有这个儿子最可恨，若不是他的命硬，克死他的祖父母，自己怎么会落得到这步田地！所以每次他一不高兴，就打他的儿子，以泄他的怨恨，父亲打儿子是天经地义，谁管得了！

少泉六七岁时，本该上私塾去念书，但因为家里没钱，竟不能去。幸亏黄夫人是出自书香门第，她的学问不在她丈夫之下，因此教导子女读书的责任，完全由她一人承当下来。她在教完了爱子之后，常常是忍着泪告诉他：“你要好好的念书，将来好恢复我们林家失去的声望和地位！”

当少泉十岁的时候，家里穷得连点灯的油都得省俭了。白天，他得把他母亲做的刺绣和衣服，送到各铺子或定货人的家里，或是到各店各家去取货。因为这是他们家中唯一的收入，而这种丢脸的事，那纨绔公子的父亲是不屑于做的。这个十岁的孩子——林少泉——白天在外面跑，自然不能念书，所以只好晚上念。可是晚上念书念了不久，往往灯里就没有油了！多用油又得多费钱，太不经济，因此他母亲只好用纸搓成捻子，在这暗淡的纸光下来念书写字。

黄夫人那时虽然只是三十几岁，可是因为整天生活在苦闷和恐慌中，所以脸上已有了许多皱纹。她虽有富贵的娘家和亲戚，但她不好意思向他们告贷，每天只有忍气吞声的做针线，来维持一家的生活。

在林少泉童年的记忆里，最不能忘的一件事，是有一次他们母子到外婆家黄府去拜寿。他的舅母、姨母和表兄弟、表姊妹们都穿得五光十色，鲜艳夺目，只有他们母子二人穿得最寒酸，他没好的皮袍或棉袍，仅仅在破旧的棉衣外，罩上一件新做的单长衫。他们的衣服虽不太高贵，但也还整洁，所以在他那幼小的心里，并不觉得太可耻。可是他母亲就感到精神上非常受压迫，她那天寡言笑，老是独自一人躲在没人的地方。吃饭的时候到了，她和她的妹妹们坐在一桌上，还是默默无语。偏偏她这十岁的孩子不

小心，吃饭时把一碗饭，连汤带菜都洒在他母亲和他自己的衣服上。这样一来两人的衣服都脏了！

他们勉强吃了饭，立刻就回到黄老太太的屋子里去。这时黄家的女仆们很快的跑过来，七手八脚的给这十岁的外孙少爷换衣服，他母亲要拦也拦不住，一会儿的工夫，她们已把他那件新做的罩衫脱下来，罩衫下面的棉袍又旧又脏，又破，那些女用人都奇怪得面面相觑，几乎不相信她们的眼睛！

这位黄府的大小姐——羞得真是“无地自容”！她只好把那件脏了的罩衫，再给她的儿子穿上，拉着他，惭愧的离开黄府，回到她那破旧的小房子去了！

后来，她母亲黄老太太——听见了这件事，才知道女儿的生活原来这么苦！于是立刻派人给她送了几十两银子。她无论如何不收，她忍着眼泪告诉来说：“你回去告诉老太太，我们林家虽然境遇不太好，但还不至冻饿，请你替我谢谢她老人家的好意吧！”

黄老太太知道女儿的性情，她虽然穷，但还有她的志气和傲骨，不肯受娘家的周济，情愿自食其力。于是她只好每月派她的小女儿，给林家送些点心、肉、衣料和糖果，说是给外孙和外孙女的。这样，这位倔强的黄大小姐才勉强的收下。

（二）

林少泉十三、四岁时，已经把十三经和许多名家诗文等都念完了。他不但长得漂亮，而且做的诗和文章也都非常得一些文士们的赞扬。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很器重他，只有他的父亲，不但不

以有这样的好儿子为荣，反倒更讨厌他。大概是他儿子的才学，比他自己小时好得多，因此对他儿子又增加了一层忌妒的心。

黄夫人看见自己的儿子整天受他父亲的虐待，实在不忍！于是只好把他送到他大舅舅家去念书。

黄家有自己的家庭老师，孩子们不必到外面去。林少泉住在那生活优裕的环境里，又离开整天虐待他的父亲，精神上应当是很愉快了。可是这十几岁的林少泉，心里还是并不愉快。因为黄家的亲友和仆人们都很看不起这个穷孩子；他们对他非常不客气。

他精神上虽然不大痛快，但他从来没在他舅舅面前透露过。他晓得说出这些小事，不会对自己有利。他深知“小不忍则乱大谋”，因此整天只是埋头苦干——念他的书，希望将来凭自己的力量来作出一番事业。

他个人的经验，使他深深的了解了“寄人篱下”的滋味，又因此使他对私塾制度也起了怀疑和恶感。因为他知道，中国有着千千万万的穷孩子，为了念不起私塾，就不能念书，以致一生流为文盲。他听说北京和上海正在酝酿着要添办许多新学校，他心里想：“我长大以后，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办几个学校，同时提倡由政府在全省各县都开设公立的学校，使所有没钱念书的孩子，都能得到上学的机会。”

林少泉虽然不喜欢私塾的制度，但他对私塾的老师高啸桐先生是非常尊敬的。每天下课以后，他的表兄弟们都离开书斋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去时，他总是留在书斋里，一边写字，一边和先生谈话。有的时候，先生有朋友来谈天，他就给他们倒茶点烟，一面伺候他们，一面听他们谈话。

由他们的谈话里，他知道了中国的近邻——日本——已经有了不少的学校，这学校不但办得很成功，而且日渐普遍。除此以外，日本还有报纸，全国的人都可以从报纸上知道世界上的大事。

“我长大以后，一定也要办报，提倡这个推广知识的工具！”他自己心里默默的想。

林的母亲黄夫人生长在世代为官的家里，当然她所期望于她儿子的，是将来进京应试，然后作官。

当少泉十六七岁时，他的文章已经是很惊人了。他母亲和黄家的一些亲戚们，都劝他去应乡试，以便一步一步的走向他们理想的黄金大路。可是这时的林少泉已经不是一个幼稚的孩子了。他眼看满清政府的贪污、腐化、无能与懦弱，他痛恨已极，绝对不去参加乡试，他不愿作满清的官，他不屑与那些满清官吏为伍。他偷偷的告诉他母亲：“现在有些人在提倡革命，我要和那些与我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去革命，打倒这腐败的政府。”

他母亲吓得脸都白了！“你怎么敢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你怎么竟能冒犯皇上？这话如果让人听见，是要杀头的啊！”说到这里，她的眼泪不禁流下来。她用手帕抹了一下，接着又说：

“快把你那疯狂的主意取消了吧！好好的作一个孝顺的儿子，将来荣宗耀祖，重新把林家过去的声望和地位恢复起来！我这十几年来，辛辛苦苦的教你念书，作女红来支持这个家，受了你父亲多少气，为的是什么呢？当然为的是教养你成人，难道你忍心就让我受一世苦，无光无彩的死去吗？”

“妈妈，请您饶恕我吧！我的确是一个不孝的儿子，现在不能让您得到光荣！可是，请您想想，国家的光荣，是不是比我们

林氏一家的光荣要紧？我们的国，被满清这般无知的官老爷们，弄得这么糟，就是我作了官，也没有什么光荣啊！”他一面说一面跪在他母亲的面前，把头伏在她的膝盖上。

这些话，真好象冷水浇头一样，把他母亲打击得几乎昏倒！十几年来她唯一的希望，一下子象泡沫一样的消失了！她知道她儿子的脾气，他如果认为是对的事情，任何人都不能改变他的主意！

在过去十几年，她的精神上和身体上已受够了折磨，现在再加上这么大的失望和懊丧，使她的身体支持不住了！不到二年，她就得了肺病！

少泉的母亲一病，这全家的生活只好由他来负担。这时他已是快二十岁的人了，由他的老师帮忙，介绍他到杭州知府林伯颖（字迪臣）家里去教家馆。从此以后，他就把每月所有的收入，差不多都汇到福州家里去养家，并给他的母亲治病。（注一）

黄夫人的病一天天的严重，少泉每次接到他妹妹宗素的信，他都是非常恐慌，因为他恐怕里面带来不好的消息。

可是不好的消息终于来了！有一天他妹妹宗素的信里说，她母亲病重，请哥哥立刻回家。

他知道他所最怕的一天到了，他只好请了几天假，连夜赶回福州去。

当他慌忙的回到家里，走到他母亲面前时，她已经是病人膏肓，黄瘦得不象人了！她看见林少泉，立刻拉住他的手，泣不成声！他坐床沿上呜咽着叫了一声“妈”，别的话也说不下去了！过了一会，黄夫人勉强止住她的悲哀，用她那微弱的声音，对儿子说：

“孩子！我不愿意这么早死！你们兄妹两个人这么年青，我实在舍不得离开你们……”刚说到这里，她就咳嗽起来，林少泉看他母亲那么痛苦的咳嗽，恨不得自己替她来咳嗽，他用手扶着他母亲的肩膀，使她靠在他的身上，免得喘气太吃力。她休息了一会儿，接着又对少泉说：

“我死了以后，你得自己珍重你自己的身体了，千万小心，不要太累，多吃点好东西……你也得好好的照应你的妹妹，给她找一个好人家。……你千万不要作什么危险的事，不要参加革命党！你如果做那些危险的事，我在九泉之下也是不放心的……。”

“妈！您别说了！您不会死！”林少泉忍着眼泪勉强的说：

“您放心吧！我答应您，我将来一定不会让您丢脸，我一定要恢复我们林家的声望，让您不白白教养我们兄妹两个人……，我一定给您多雇几个仆人好好的伺候您，就象您在外婆家作小姐时一样……给您雇两三个女仆，专伺候您一个人，您慢慢的等着吧！……”他希望用一幅美好的远景，来挽回这失望、痛苦和疲倦了的慈母的心！希望她能等到那样的一天！

可是她等不及了！她那憔悴了的身心，等不到看她深爱的儿子女儿成家立业了！她听到她儿子说完，就忽然猛烈的咳嗽起来，接着，一大口鲜血，从她喉咙里涌出来；还有些未吐出的血似乎堵住了她的气管，就这样与她心爱的儿子女儿永别了！

（注二）

（注一）：林伯颖家当时有两位教家馆的先生，一位是先父，另一位是林琴南（畏庐）。先父和琴南先生在研究学问方面，是志同道合、非常投机的好朋友，可是在政治思想方面，则完全不同。先父是主张革命，推翻满清政府，改为民主共和政体；琴南则主张君主立宪，仍然效忠满清。因此，他们一辩论政事，两人总是吵得不欢而散。他们两人这种彼此不十分

友好的态度，一直到革命完成以后好几年，才渐渐消失。后来林琴南也常在先父的报上投稿写诗了。先父与梁启超、康有为、陈宝琛这些人的友谊，也和林琴南一样，最初在政见上很不投机，都是到民国以后，才慢慢恢复了友善的态度的。

（注二）：按照黄翼云先生所作的《林白水先生传略》，他说先父是在先祖母过世以后才到杭州去教书，但我记得我姑母——宗素——曾告诉我，先祖母是在先父去杭州以后才去世的。我想我姑母说的话，自然比表舅说的可靠，表舅可能因为事隔多年，记不清了。因此我在这一点上所说的时间，与表舅所说，略有不同。

（三）

少泉把丧事料理完了以后，赶快又回到杭州去。一方面教家馆，一方面读书，充实自己的学问。同时也交了几位和他志同道合的朋友。

杭州那绮丽的风景，英雄美人和文人骚客的古墓，湖光月色，塔影钟声，参天的松竹，壮伟的古刹……处处使他感到锦绣河山的可爱，处处启发他的爱国心，因而更激动他要为这大好的疆土，尽一些应尽的义务。

这时候，上海早已有了报纸，于是林少泉成为上海报纸上的经常投稿人。他所写的都是政治和外交方面的评论。

他的学生们有的比他只小两三岁，有的比他小四五岁。这些青年，对这位老师，本来就非常崇拜，现在老师成为许多人景仰的作家，他们自然更钦佩了！由于他们的宣传，许多他们的亲戚朋友，都来拜林少泉作老师，因此他的门下，渐渐有了许多弟子。这些人中，有的和林少泉岁数差不多，有的甚至于比他还大

两岁。

一年以后，林少泉在西湖上林家的一座别墅里，组织了一个吟诗会。那个别墅就命名为“林社”。因为别墅主人和他自己姓林，他所教的学生——这个吟诗会里的中坚分子——也都姓林。那座房子建在湖中，有许多水上的长廊，幽静雅洁，的确是个吟诗的好地方。不过他组织这个“林社”的目的并不是真为吟诗，而是为宣传革命。他常召集他所有的学生和他们的朋友，对他们演讲国家大事，批评满清政府的腐败。演讲完了，大家再在一起讨论。（注三）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他的学生和听众越来越多。“林社”这个表面吟诗的场所——竟拥有三百多热烈爱国的英勇青年。由于几位热心朋友的协助，林少泉自己创办了一个报纸，名叫《杭州白话报》^①。他的社论完全用白话，自己的笔名叫“白话道人”。

那时上海的报纸都是文言的。所以只有士大夫阶级才看得懂。白话是为高等社会所不齿的，一般读书人自然不屑于用白话来写文章。

在《杭州白话报》第一天出版的启事里，林少泉写了一段话，大意如下：

“……这个报纸是属于普通一般老百姓的，因为我是一个平民，所以我说的话，是一般老百姓的语言，而不是一般士大夫阶

^①《杭州白话报》，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6月创刊，1904年1月停刊，共出八十二期。该报系旬刊，石印本。经理为兼办杭州安定学堂的项兰生，主笔胡修庐，参加编撰的有陈叔通（谠者）、孙翼中（独头山人）、林獬（宣樊子）等，该报是我国创刊较早且有影响的白话报之一。

级的咬文嚼字或八股式的文章。我不谈风花雪月，也不象别的报纸一样，捧戏子或歌颂妓女的美艳风骚。我只是把国内国外发生的大事小事，报告给一般老百姓，同时把我自己对这些事情的意见，表达出来。……”

这个《杭州白话报》每日的“时评”，主要的是鼓吹三件事，一个是革命——打倒满清政府；一个是提倡创办学校普及教育，还有一个是提倡全国各地普遍创立报社，俾使全国人民对国家和世界大事，都能了解并发生兴趣。

两三年后，由于林少泉在报纸上的鼓吹，江南各地象“林社”那样的组织一天一天的崛起了，他们表面上是聚在一起吟诗或读书，实际上都成为革命人士的聚会之所。清朝的大官们，每日沉迷于利禄酒色，本来没把这个穷书生放在眼里。现在看着他一天一天的发生了作用，对他们居然有了不利的影响，就准备下命令捉拿他。

当林少泉的朋友把这不好的消息告诉他时，他没法子，只好把报馆关门，把“林社”交给他的几个弟子来管理，自己立刻跑回福州去。

杭州的知府衙门，觉得这个穷书生既已吓跑，当然不会再有什么兴风作浪的举动，也就不再追究了。

林少泉回到福州以后，办了一个学校，叫福州蒙学堂。那时的小学 and 现在的不同，入学的学生，并不是稚龄的儿童，而都是十八、九甚至二十岁的人。他们多半已是对革命发生了兴趣的爱国青年，不愿参加乡试而要打倒满清政府的。实际上这所学校的学生有很多根本是林少泉的朋友，他们表面上是天天来读书，其实主要的目的，还是大家聚集在一起，讨论怎么推翻满清政府。

当时这所小学里的学生，计有林觉民、方声洞、林盛初等许多人，后来他们都成为黄花岗的烈士，那所学校，不愧为中国早期革命党人的策源地。因为七十二烈士中，有很多福建人，而他们都是那个学校的学生。

（注三）：我在大学毕业以后，曾到杭州去玩过一次，我的主要的目的是要看看“林社”，因为听说这座房子还被保存得很好。但是我所看见的“林社”，是不是先父当初与他的学生们聚集的地方，就不得而知了。我心里希望它是！

“林社”当时已成为一座游人休息和参观的地方。大概原来的主人，已经把它卖掉了。里面的陈设，都是些红木和紫檀雕刻的家具。还有些福建漆的，古色古香，十分清雅。有一间屋子，里面还有一些线装书，书桌上还有纸墨笔砚。

我仿佛能看见当时的先父——一位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他站在许多热血沸腾的年轻学子当中，慷慨激昂的发表他那爱国的革命演说。或是夜深人静，他独自坐在这书桌之前，俯首疾书，作他那洋洋数千言的提倡革命的文章。“这些桌椅，是我父亲挨过的吗？这块地是我父亲站过的不是？这些笔墨，我父亲用过否？这些书籍，他可曾翻阅过？……”我心里暗暗怀疑，我有很多问题，可是向谁过问呢？我多么希望父亲这时能在我的身旁，详细的告诉我！

（四）

林少泉后来又约在上海的朋友蔡元培、章太炎和刘申叔等在上海办学校，于是写信给他们，他们接到信后，自然很兴奋，于是立刻回信答应。他就把福州的这个学校的一切事物，交给他的表兄黄翼云，自己立刻乘船秘密赴杭筹款，然后到上海去。因为上海离杭州比福州离杭州近得多。林少泉这次到上海来，把名字

改为林万里，这样，一方面可避免杭州知县衙门的逮捕，一方面是希望自己“鹏程万里”的意思。

蔡、章、刘和林四个人，一起办了一个女学校，名叫爱国女校，这也是中国首创的女学校。此后不久，他们又创设了“中国教育会”。^①他们的好友秋瑾女士是爱国女校和“中国教育会”这两个组织中唯一的女性。

当时的政局，一天比一天紊乱，外交则软弱无能。清廷屡次与外国作战，均遭失败，订了许多耻辱的条约。这一切使得一般爱国的知识分子简直不能忍受！清廷处于两个凶恶的邻人——大俄帝国与日本帝国——的威胁之下，好象一头驯服的羔羊，他对这两个强邻几乎是有求必应而不敢拒绝！

这时俄国的沙皇，想控制中国的铁路和海口，因此派了一个特使到北京去谈判，他们正在进行订立一个不平等的条约。

林万里为了这件事，与蔡元培、章太炎和刘申叔创办了一个报，名叫《俄事警闻》^②。每日在报上攻击，并唤起全国人民对这件事的注意，希望鼓励全国的人民出来反对清廷与帝俄签定这个辱国的条约。

《俄事警闻》不久改名《警钟日报》，还是继续抨击清廷正在进行的辱国条约。不幸，这个报办了没多久，就又遭到清廷的

^①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4月，由蔡元培、蒋智由、黄宗仰、林獬（白水）等发起，于同年冬正式成立于上海，举蔡为会长，会员共计百余人，曾设爱国学社、爱国女校、《中国白话报》、军事讲习会等，该会于1907年停止活动。

^② 《俄事警闻》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12月25日在上海创刊，蔡元培主办。撰文者有刘师培、陈去病、林獬（白水）等。内容分为社说、要闻、外论、专件、时评等栏，揭露沙俄侵华，评击清政府外交的腐败。出至第七十三期后，改名《警钟日报》，1904年2月25日终刊。

迫害，因此又被封闭了。

中国的“革命党”这时已经成立，上海是中国的第一大都市，市内的革命党员比任何一处都多。这些“革命党”经常分别在许多不同的地点聚会讨论，而林所住的地方——法租界的梅福里便常常是他们聚会处所中之一个。

林万里自己又单独办了一个报，名叫《中国白话报》^①。此时中国全国各地办报和兴学的风气日渐普遍。一般报上的舆论，都同声一致反对政府与帝俄签订条约，而新兴的这些学校，则都成为训练革命人材的基地了。

上海首先秘密的组织了“学生义勇军”，林万里亲自任分队长，一方面训练学生，准备将来革命之用。一方面又以学生为对象，办了一个《和平日报》，与《中国白话报》成为姊妹刊物，彼此呼应。他在《中国白话报》上，曾写过一篇提倡暗杀的文章叫“论刺客”，引用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暗示当时暗杀的需要。

因为那时清廷有一个大臣，名叫王之春，他受了帝俄的贿赂，主张把广东的一条铁路（可能是广九铁路），卖给俄国。清廷派他到广东去实地调查，他去了些日子，声言已经调查完了，准备到北京去签那出卖铁路的条约。他在回京途中，路过上海，打算休息几天。上海的一部分革命党人，痛恨这受贿卖国的王之春，知道他一回京，立刻就要签字，人民只凭舆论是阻止不了他的，事情已经非常危急，于是秘密开会，公推林万里、万福华和

^① 《中国白话报》1903年12月在上海创刊，开始每月出两期，从第十三期改为每月三期。1904年10月出至第二十四期停刊。该报主办人为林獬（白水），林为中国教育会的发起人和主要成员。

刘光汉三个人去暗杀他。①

他们秘密买了一把手枪，跑到野外去对着树试放了好几次。一切都学好了，并且打听到王之春某天要受当地一位大官的招待，到英租界一个有名的饭馆去赴宴。这三个人那天也到那个饭馆去了。

万福华身上藏着手枪，林万里身上则藏着传单，他们进门后，就挑了一张离楼梯最近的桌子坐下。因为他们知道王之春的宴会在楼上，楼梯是他必经之路。

那时晚上六七点钟，饭馆里正是上座最盛的时候，楼下的散座很乱，人声嘈杂，猜拳和干杯的声音震耳欲聋。外面虽然很冷，屋子里空气倒很热，再加上各种菜味，和伙计们往返象穿花一样的跑，使得这三个暗杀者，心里感到非常乱，他们虽然叫了菜和酒，但谁也吃不下。他们的心，跳得象打鼓一样，眼睛则始终望着大门。

他们早已计划好，当王之春上楼梯的时候，刘光汉和万福华同时上去，刘把他拦腰抱住，万福华则对着王的后脑开枪，同时林万里散放传单给所有在饭馆的人，口中大喊：“这就是卖国贼的下场！”这一幕情景，在他们三人的脑海中，不知闪过了多少次，最后已经把所有的举动，都分别暗暗的温习熟了。

墙上的大钟已经八点了，他们三个人勉强吃了一点菜和饭，喝了些酒。在这种情形下，真是“食而不知其味”！只好故作镇静，等待这个王之春的来临。空气一分钟比一分钟紧张，他们的

① 万福华（1865—？），安徽合肥人。1904年夏与吴暘谷等在南京组织暗杀团谋刺铁良未果。后经吴介绍，结识黄兴，时桂抚王之春去官居沪上，“万愤其倡亲俄谬论，又主张借法兵镇压民变，遂刺王于四马路一菜馆，未遂被捕。”（据《龙璋行状》）万福华刺王之春事发生于1904年11月。

眼睛也越来越亮了。最后王之春终于出现在门口，他穿着一件狐皮袍，外面还套着一件貂翎眼的背心，头上带着皮帽，人高马大，威风凛凛的，慢慢走进来，他的后面，跟着三四个随从。

当他大摇大摆的走上楼的时候，刘光汉和万福华同时跑上去，一个抱住他的腰，一个人把枪对准他的后脑用力放射，林万里则跳上一个桌子，大声的嚷：“同胞们请看，这就是卖国贼的下场！”

可是万福华因为紧张过度，忘记拉开手枪的保险机了！他多么用力放射，枪弹也出不来！林万里和刘光汉都叫他快拉保险机，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怎么来得及！这时王的三四个粗壮的随从都已赶上来，他们把这三个“暗杀犯”都捉住了！

幸亏出事的地点是在英国租界，这三个人是被关在英国的巡捕房，而不是满清的衙门里！

(五)

万福华因忍受不了巡捕的毒打，只好把他常到的聚会地点——法租界的梅福里——招认出来了！因此法租界的巡捕房会同英国巡捕，立刻到林万里的住所——梅福里——去搜查，结果又有八个革命党的党员被捕。这八个人是黄兴、章士钊、张继、薛大可、彭义民、徐佛苏、章勤士、郭人漳。①

① 据毛注青《黄兴年谱》：1904年11月20日，黄兴因万福华刺王之春案牵连入狱。谱中引刘揆一《黄兴传记》记此事经过曰：“越日，章士钊私赴捕房唁慰，亦以嫌疑犯被拘，同人均未预知，而西捕因得识党人居址，即至徐庆里搜索证据。于是苏鹏、薛大可、章勤士、周素铨皆被捕去。徐佛苏已逃出矣。后见室空无人，乃乘机入取未曾搜出之违禁物，亦被捕去。张继、赵世暄以郭人漳就江西新军统领之职，路过沪上，邀其入会，中途遇公，张即邀与同一马车归徐庆里，故皆被暗探圈禁，而送入捕房。……旋得赣抚夏时来电，为郭人漳解救，公困与同车，得以随之先期出狱。”又引据龙祖同《龙璋行状》谓：“黄兴等在狱时，蔡锷自沪赴泰兴，向龙璋求援，龙璋筹得千金购物付狱，奔走营救。”

这时那些漏了网的同志们，大为恐慌。他们各处奔走，终于凑了两三千两银子，然后到英国租界，找到了当时最出名、最有力量的英国律师，请他替这些被捕下狱的人辩护。并要求他无论如何不要允许满清政府把这些人引渡过去。

英国律师看见这么多钱，自然愿意办这件案子。他很肯定的告诉革命党人：

“我绝不允许他们把那些被捕的人，引渡给满清政府的。”

“可是，我们还希望他们立刻能把这些人放出来才好。”他们又进一步的要求。

“我敢保除了万福华以外，别人都能很快的被释。万是刺客，死刑恐怕是免不了的！你们一共有十一个被捕，如果能救出十个，只牺牲一个人，也不算吃亏！巡捕房如果连万都放出来，那未免太困难了！”

“请你尽量帮忙吧！我们不能强人所难，不过，请记住，你要多少钱，我们给你多少，只要能把我们的朋友放出来！……”

过了十几天之后，林和刘光汉被释出狱。其余的人，因另有其他证据和嫌疑，仍留在狱中，万福华则已被判死刑。

林万里出狱以后，立刻约集所有的革命党要员到梅福里来开会。他的目的还是要救万福华和其他的朋友。“我们现在是精疲力尽了！那里还有钱再给律师？况且律师已经说过，他是没法子的。”一个同志发言。

“幸亏我们一听说你们被捕，立刻就到这里来，把许多文件和书信烧毁了。要不然，恐怕被捕的人更要多！”另一位同志在抱怨。

“都是万福华自己不好，第一他不该忘记拉保险机，第二，

他不该把开会的地点说出来，以致事后又让八个人被捕。……”

林万里没等他说完，就站起来说：

“我看我们还是不要跟他生气，还是多多原谅他吧！谁也不是天生的暗杀专家，谁也受不了他所受的那些苦刑！我知道各位为了救我们出狱，已经弄得焦头烂额，现在既然大家都已尽了最后的力量，那么让我一个人来想办法吧！”

会后他立刻写信给杭州林迪臣的几个儿子和他们的朋友——这些都是林万里过去的学生，他们多半是富商或官吏家的子姪。同时他又写信到福州去跟几个比较富有的朋友借钱。结果，不到一个月，他和刘光汉两人又凑上两三千两银子。于是他又增聘了一个有名的英国律师，这两个律师把他们所有的看家本领都用尽了，才算是把万福华的一条命救了。他由死刑而减为十年徒刑。其余被捕的朋友们也都由于这两位律师的辩护而陆续出狱。

革命党人这次暗杀虽然失败，但全国人民为之警觉。当时舆论沸腾，一致反对清廷出卖铁路给俄国。结果清廷只有屈服，因此没把铁路卖给俄国。这不能不说是上海革命党的一大成功。

可是自从此次事件之后，上海这几个革命党的中坚分子，时时刻刻都有满清政府的暗探在监视他们，弄得他们寸步不敢离开租界。为了避免影响整个大局起见，他们决定暂时都离开上海，把重要工作交给几个没“犯过案”的同志去负责。于是林又跑回福州去。

满清政府之所以失败，大半是他们没把“革命党”看得太重要。一个“革命党”只要一离开他们的城市，他们就高枕无忧，从此不再追究了。

林万里回到福州不久，因为他过去在福州创办过学校，在上

海又和蔡元培一起创办爱国女校，所以福建的总督就请他起草“福建教育计划”。跟着，福州就成立了四个官立的小学。林被派为所有四个小学的校长。这些学校的学生也都是将近成年或已经成年的人。过去在他创办的小学里读书的学生林觉民等人，又入了他主持的官立小学，至于他自己创办的那座小学，则因经费不足，早已关门了。

他所请的教员，都是福州的革命党，他们还是以鼓吹革命为主，以教学为副。

（以上所述关于行刺王之春和营救万福华等人的事，请参阅黄翼云先生所作：〈闽县林白水先生传略〉，及徐佛苏先生所写〈哀诔〉。）

（六）

中国的强邻——日本，虽为爱国人士所痛恨，但是明治维新，把日本由一个旧式的封建政体，一变而成为一个东亚最先进的文明国家，这不能不让一些知识分子心向往之！

还有一部分留日的学生，则因他们在国内“闹革命”闹得太凶了，到处遭满清政府的通缉，只好逃到日本去。他们在那里一方面计划革命，一方面念书。林的许多朋友，如张继、章士钊、李孟鲁等人都已先后赴日求学。他们有的是公费，有的是自费。

林这时在福州生活比较安定，他的收入，很可以让他的父亲和妹妹过些不必当卖的日子了。可是，仅仅负责宣传和鼓吹的工作，对他是不够的。他要到日本去加入同盟会，以便参加一个全国性的革命行动。

当时全国各省都有留学考试。他因主考的几个大官里，有人对他不利，所以没去参加考试。最后他勉强凑足了旅费，坐着最便宜的统舱，自己一个人到日本去了^①。

到日后，由中国学生会，找到了他的一个日文很好的朋友。于是他就搬到这朋友的住所去和他同住一间小屋。

林既不懂日文又是一贫如洗，当然没法子入学校。他在日本的第一个月，差不多每天都是以豆腐和咸菜下饭。结果弄得他一看见豆腐就害怕。

天气渐渐冷了，在福州和沪杭住惯了的人是没经受过东京那样大风大雪的日子的。他的冬衣不够暖，但又没钱买，于是只好把他最厚的夹西装，一层套一层的勉强穿上。他的屋子里也没有穿衣镜，所以他从来不知这自己是什么样子。

有一天他在街上经过一个有一面长镜的铺子，才看见自己是多么可笑。

他从一个书店经过，看见里面有许多人，都站在书架前头看书。进去以后，发现这些人多半是和他一样的穷学生，他们没钱买，只是装作要买，站在那里看不花钱的书。

林万里也好象很内行似的，大大方方的浏览全室，到处没有目的的随便看书。他知道坐在柜台后面的那位八十多岁的书店老板是多么恨这群穷小子，可是他毫不在乎。

他捡起一本日文的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小说，自己虽不太懂，但看着觉得很有意思，那本书不但有点脏，而且有一两页已经破了。于是他又找了两本又破又脏的书，一本是俾斯麦，一本是彼

^① 林白水赴日留学，据《民国人物传》第三卷《林白水》传所载，前后共为两次。最初在1903年春，不久回国；后又再次自费赴日求学，时间似在1905年。

得大帝，他拿着这三本书，走到柜台去用笔和老板讲价。他问是否可以用半价买这三本旧书。老板居然首肯，于是他就把买米和豆腐、咸菜的钱都买了书。

回家之后，看见他的同屋正在吃咸鱼和茶泡饭，不管同屋许可不许可，自己就坐下大吃起来，他觉得咸鱼真是比豆腐好吃多了！

吃完饭之后，他把那三本书拿出来，要求他的同屋和他合作，一起翻译。他的同屋日文好，他的中文好。两个人都穷得没办法，当然愿意试试。

他们在几天之内就把俾斯麦译完了。林立刻寄到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去。那时该馆的经理是他的好朋友。过了几天，商务印书馆的信和钱都寄来了。信中并且说：“……无论你翻译什么书，我们都要。……”（注四）

从此以后，他不但出版了《彼得大帝》、《法国大革命》，而且还出版了一本《明治教育史》和其他许多书籍。

这样一来，他的学费也有了。于是一面补习日文，一面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兼学新闻。

在这一段时期，他先后成为兴中会和同盟会的会员。

一年暑假，他有了一点富裕钱，于是就回福州去看他的妹妹——宗素和父亲。那时他的父亲已经是年将半百左右了，身体也日渐衰弱。因此家中一切大小事务，都是宗素一个人料理。

他看见他这么年轻而美丽的妹妹，整天在家里操作，想起母亲临终时嘱咐他照顾妹妹的话，不由得眼睛湿润了！

“妹妹，你已经二十多岁，不应当把你的青春牺牲在家里。你应当跟我一起到日本去念书。”他对宗素说。

“我是一个女孩子，怎么可以到日本去？我们福建人没有一个女孩子上过学校啊！……”她很胆怯的回答。

“现在的世界改变了。女孩子不但可以上学，而且有不少女孩子已经到日本去念书了。我的朋友秋瑾就是其中的一个。女人应当和男人同样的受教育，同样的为国家作事——甚至于参加革命。中国早晚是要革命的。革命成功以后，女人的前途是非常光明远大的。”

“可是我如果跟你去，那么谁服侍父亲呢？”宗素还是好象不想去。

“我们找一个人来服侍他就是了。”

“那么我们去跟父亲商量商量吧！他肯不肯还不一定。”

这兄妹两个人立刻走到他们父亲的屋里和他商量宗素赴日求学的这件事。

“找一个仆人来服侍我？”老先生大怒，“男仆太贵，我用不起，用女仆又不方便。况且他们随时可以辞工不做。万一我正有病，他忽然走了，我怎么办？”

“可是妹妹也不能服侍您一生一世啊？她如果结婚了，不是也得离开您吗？”

“如果结婚当然是另作一说。不过现在她还没结婚，我是不许可她离开我的。女孩子家，跑到外国去抛头露面，成什么体统！”老先生意志很坚决。

可是林万里知道他妹妹的一生幸福，都在此一举。她如果老守着父亲，将来不是老处女，就是由他父亲给她找个有钱而不一定有作为有学问的丈夫。这么一来，宗素的一生就毁了！

“无论如何，请您替宗素的一生幸福着想啊！我在日本认识

的朋友，都是有学问有作为的青年，将来我给她介绍一个，她也可以有个好归宿。老在福州这个小地方，将来会有什么好结果？……”

他父亲还没等他说完，就插嘴说：“你如果非叫她离开我不可，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你得在她走以前结婚。你结婚以后，我有儿媳妇伺候，就不必花钱雇用人了。况且我的年岁这么大，也希望早点抱孙子，你们都走了，我连个孙子都没有，也未免太孤单了！”

“父亲，现在和以前不同了，我的朋友们都是自己找女朋友，交了朋友以后再结婚。况且我现在书还没念成，自己的事业还没定，怎么能谈结婚？”

“你这不孝的儿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已经二三十岁了，还不结婚，要等到什么时候？难道要等我死了以后才结婚？难道故意不让我抱孙子？或是故意要断绝我们林家的香烟！”老先生越说越气，几乎要打他的儿子。

“您不要生气！”宗素赶快劝。“我不离开您就是了！”

老先生好像故意要和他儿子为难似的，他还是气忿的说：“不行，你不走他也得结婚，我是你们的父亲，不听父亲的话就是忤逆不孝！……”

他们兄妹自然不敢继续和父亲争辩。中国的传统，没法子一下就改变，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最后林万里只好忍痛牺牲自己，答应他父亲，在两个月以内结婚，他父亲才同意在他结婚以后，可以带着他妹妹到日本去念书。

他的婚姻，完全是由他父亲自己包办的。就这样，在暑假里，他草草的结了婚，然后匆匆的就把宗素带到东京去了。这个

婚姻当然是谈不到爱情的。

不过一年以后，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名叫陆起。

（注四）：据先父的一位朋友说，林琴南和懂英法文的人一起翻译小说，或许是受了先父的影响。这话的可靠性如何，当然我不敢说。

我从前在日本人所作的《支那名人录》、《中国新闻史》、《百科全书》等书中，好象也看见过关于先父的记载，可惜现在没有这些书籍。（书名记不太清，或许有出入。）现在仅将民国廿九年（昭和十五年）十二月，桥川时雄所作《中国文化界人名总鉴》一书中，关于先父的一段影印如下（日文略）①。

他说《大彼得》、《哥伦布》、《毕思迈》、《纳尔逊》、《加里波的》、《华盛顿》这些书②，都是民国四年商务印书馆所出版，我想可能民国四年是再版，据我听说，这些书是民国以前所出版的。如果这些书是民四所出，那么民前所出的，除桥川所说的《日本明治教育史》和《自助论》外，或许还有别的。他唯一的错处是说《杭州白话报》、《警钟日报》与《和平日报》，都是在先父作了议员和参政以后所办的。这几个报我确实知道是在民国以前所办。

（七）

林宗素和当时所有的中国女孩子一样，从小一直被关在家里，没和外面的人来往过。她当然是非常怕羞的。每次一和人说话脸就先红。如有一个男人多看她一眼，她简直更不知如何措手足了。看她这样，心里很着急。于是就和他的朋友秋瑾商量她住在一起。

是一位最前进的女性。所有在日本的革命志士，

之小传。

系日文小传中所列林白水在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译作。

她都认识。每天出入于她的住所的人，不知有多少！林宗素耳濡目染，在几个星期以后，不但大方了许多，而且学会不少新名词。日文也稍微能应付一点了。因此不久就进了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寒假到了。在东京的留日同学，准备开一个盛大的留日学生新年庆祝会。在名义上，虽然是游艺会的性质，但实际上则是借此机会，把所有分散在日本其他各城市的中国同学，都召集到东京来，以便讨论如何从事革命，和召开同盟会全体会员大会的事。在庆祝会开幕的头一天，有两个人被推举在会中发表演说。其中一个林万里，林不但很快的同意了，而且扬言，这次演讲，他如不登台，他妹妹一定会登台。他的朋友们听了这话，都非常惊讶。因为在那个时期，东半球没有一个国家有女人上台演讲过——连最前进的日本，都还没有过。

当林万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妹妹的时候，她吓得几乎哭起来！

“我情愿死也不能上台去演讲！我绝对不去！”

“不要紧，我把稿子给你作好，你只要背出来就行了。”她哥哥尽量安慰她。

“我不行，我不行！万一我忘了，怎么办？”她还是不放心。

“不要紧，我拿着演讲稿，藏在幕后边，万一你忘记，我在那里轻轻的给你提词，就象演戏一样。”

又经过许久的辩论，宗素才答应。那天晚上林把演讲稿写好，交给宗素，叫她背熟。好在离她演讲的时候，还有很多个小时，她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准备。

第二天下午，她已把那篇演讲背得滚瓜烂熟。每一个字都已

经刻在她的脑子里。那天晚上，她由她哥哥陪着一同上了台。

当她哥哥在台上向听众介绍她的时候，她向台下一看，只看见几千只眼睛，个个都睁得又圆又大，在瞪着看她。前排还有几个人在笑着耳语，好象正在评头论足的笑她。远处则漆黑一片，一种无名的恐惧，笼罩了她的全身。她所背熟了的演讲词，一句也想不起来了！她的脑子忽然成了一张白纸！她的脸则又烧又红，吓得她简直快晕倒了！

等到她哥哥说完，该她演讲的时候，她只好偷偷的告诉他：“我全都忘记了！”

“不要紧，我到幕后面去，一句一句的提你，你随着我说好了。”

她没法子，只好这样办。

半个钟头以后，她的演讲很圆满的完成了。听众报以最热烈的掌声。第二天，日本的中国报纸和几个日本报，都登载了这件东亚空前的创举！“女学生登台演说！”从此林宗素变成东京中国女学生中最出风头的人物。

林宗素一年比一年能干，追求的人，也越来越多。因此，来到东京还没有三年，就和她哥哥的一位朋友——汤忠先生——结婚了。

在她的女朋友中，她最钦佩的是比她大几岁的秋瑾，而她最喜欢的，则是一个比她小很多岁的苏州小女孩子叫陈钰。这个女孩子是一个华侨的女儿，那时仅仅是个初中的学生。可是她长得很美，高高的鼻子，圆而大的眼睛，身材比一般和她同年级的同学都高大成熟。智力思想等，也都不错，所以宗素特别喜欢她。

陈姓华侨因太太在国内去世，在日本娶了一位日本太太。而

这日本太太和他这刚从中国来不久的女儿感情很不好。因此陈钰与宗素特别亲近。

林万里因为爱护他的妹妹自然对妹妹的好朋友也特别照顾。

后来他的太太因胃病逝世，剑泉老先生就找了儿媳的一个表妹到家中来帮忙料理家务，并照顾他们老小二人。

由于汤忠和宗素二人的怂恿，林少泉后来就和陈钰结了婚。

很多年以后，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取名玛利，那就是我。

(八)

先父在早稻田毕业以前，就认识了林森先生和孙中山先生。这时国内的革命风潮已经是汹涌澎湃，不可遏止。他的同盟会中的朋友，有的奉孙中山先生的命令，回到上海去进行革命，有的因日本政府应满清政府的要求，取缔留学生的革命行动，于是这些人都纷纷离日。

他毕业后，由于孙先生的建议，回到福建去，组织学生义勇军，并在两年内和他的表弟黄展云编了十几种书。

辛亥年秋，他的朋友赵声和刘光汉在上海约集同志们，到南京去举义，可是需要一千多两银子，这笔款没有出处。只好又叫先父想法子。

他一连三天关在家里，写好了一本书，叫《中国民约》，因恐商务印书馆不愿立刻接受而立刻给钱，于是他只好学古人“刺血作书”的方法，给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写了一封慷慨激昂，满纸血泪的书信，请求他务必帮忙。结果当然是如愿以偿。这笔钱拿到后，他全部交给赵、刘。他们三人一起到南京去会同在该地布置

一切的同志们共同起义，响应武昌和四川。

革命告成后，孙中山先生也由海外启程返国。华中、华南各地同盟会的会员以及其他各界重要人物，都云集江南，选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先生因为袁世凯不但武力强大而且计谋太多，难以相处，于是在元年四月辞去临时大总统职，率领一部人回到广东去。

这时同盟会的其他中坚分子，也都听从孙先生的建议，各自回到他们的本省去从事建设和教育的工作。

先父回到福州后，因为他是福建省唯一在日本学过法律的人，因此立即被任为法制局的局长。他费了不少时日和心血，亲自编了一部法典。但因为其中保护人民的地方太多，以致为官方所忌，因此未被采用。

在家庭方面，这几年之内，他的父亲已去世。他的儿子陆起已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

陆起因从小和父亲不常在一起，而是由祖父和他的姨母所抚养，这两个人对他都非常溺爱，姨母是对他的衣食住行方面，尽量的纵容。祖父则在娱乐方面尽量让他享受。虽然家中常有青黄不接甚至断炊的时候，但一有点钱，老先生就得带着孙子到花街柳巷去打打茶围，或吃吃小馆。

陆起从能记事起到现在为止，所欣赏的娱乐，多半是在花街柳巷中和那些穿漂亮衣服，满脸脂粉香气四溢的姑娘们混在一起吃玩。可是现在祖父去世，他忽然来到父亲的身边，整天还得念书写字，这未免非常不习惯。

民国二年，父亲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因此他就带着全家从福建到北京去了。

袁世凯因为有作皇帝的野心，因此开始注意网罗人才。他知道林某不但文章写得好，而且口才流利，在众议院里，每有辩论，总是气冲词沛，一针见血。因此派人请他作总统府秘书兼直隶省督军署的秘书长。

在这几年内，孙中山先生把他所组织的“国民党”，改为“中华革命党”，父亲在福建的朋友，和他的表兄弟黄翼云、黄展云，都是福建省中华革命党的重要人物。

有一次，不知为什么，军阀李厚基^①出兵福建，把中华革命党内的一个重要人物逮捕了十几个。（李可能是那浙江省的督军）

党里重要人物既已全数被捕，那些次要的人物更是走头无路，不知所措了，他们只好给父亲打了一封电报，请他在北京设法帮忙。

父亲接到这封电报后，立刻去见袁世凯，请他派一个军人一个文人到福建去处理军务善后问题。袁世凯立刻就照计而行，派了一个高级军人作“军务善后督办”，而任命父亲为“帮办”。

他们一到福州，他就向这位“督办”建议，应当把这十几个革命党的党员全部释放出来，“因为这些人都是地方上多年的文化教育和革命工作者，如果政府把他们杀死，一定会激起全省人民的怒潮，这样一来，恐有更大的祸乱。”督办听了这话，也觉得有理，于是下令把这十几个人都释放了。

可是后来，父亲又有许多对福建老百姓有益的建议，他都没采纳，因此父亲与他的意见常常不合，于是父亲辞去“帮办”的

^① 李厚基1913年11月29日任福建福州镇守使，1914年7月任福建护军使，后为福建省督军，至1923年1月为直系军阀孙传芳所取代。本书云“可能是浙江督军”，误。

职务，又回到北京去。他这次回闽，目的本来就是为营救这些朋友，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他又何必久留？

（关于此次营救福建朋友事，请参阅本书附录〈闽县林白水先生传略〉。黄展云也是被救的一个。）

（九）

父亲一生救过的朋友，至少有一二十人。在福建人的眼里，他似乎是一个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人物。因此他们时常怂恿父亲转任参政院的参政。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主持正义，以国家和人民的幸福为前提，所以当议员或是任参政，对他都是无所谓。最后他终于担任了参政院的参政。^①

可是民国刚建立了没几年，袁世凯就觉得作总统还不过瘾，他还要当皇帝！父亲眼看他的朋友和他自己以血汗换来的民国，行将被袁所破坏。

可是他自己一个人势力孤单，又没法子阻止袁世凯的蠢动，因此只好又开始办报。他认为只有以口诛笔伐的方法，来负起监督政府和为老百姓奋斗的责任。

父亲在北京所办的第一个报叫〈公言报〉。自己专写社评，其他的事务，由他的好友胡政之先生负责。那个时候，北京的报纸没有民十以后那么多，〈公言报〉的社论成为知识分子人人必读的文章。父亲的笔名改为白水。他的报纸，完全采用通俗的白话，以求普及。这是北京有史以来第一个用白话出版的报纸^②。现

^① 林1915年10月29日任参政院参政，时林白水用名为林万里。

^② 北京有白话报始于清末。

在世人都认为白话运动是五四以后胡适之先生所提倡，他们不知道早在民国以前，就有人为白话运动而努力了。关于这一点，现在顺便提一下：多年后我在北平《法国政闻报》发行人Monsieur Monestier 家的宴会中，因常遇到胡适之先生，有一次曾以半开玩笑的态度对胡先生说：

“世界上的人，都说您是中国白话运动的领导者，您知道不知道在您提倡白话以前——清末的时候，杭州就有提倡白话的《杭州白话报》了？那个时候的‘白话道人’就是先父。他后来在上海又办了《俄事警闻》、《警钟日报》、《中国白话报》……等等……”我还没说完，胡先生就接下去了：

“我怎么不知道，我对你父亲是非常钦佩的。他在上海办的报，我虽然没看过，可是听说过。后来他在这里办的报，我都看过。我不但佩服他，而且是他的最忠实的读者呢！有一次他到北大来演讲，我见到他，我们谈了很久。……噫！他的死真是太可惜了！”

“您既然承认我父亲提倡白话在您以前，那么您是否将来能写一篇东西，把先父的事说一说！也让世人知道一下他对白话运动的影响呢！”

“好，有机会我一定写！不过，你也是常在报上写东西的人，你自己也得写一篇关于你父亲的事迹啊！他一生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你应当把他写下来，给你父亲作一本传记。”

“是的，我是打算写的，将来我写好后，一定先给您看，并且请您给我写一篇文章，把先父提倡白话的事说一说。”

“好，我一定给你写，你父亲是我最佩服的人。……”说到这里，我们的谈话就被别人打断了。此次会晤后不久，胡先生就

匆匆离开北平。我和他也失去了连络。此后彼此各有所忙，就没通消息。直到一九四九年，我在美国才又和他通了两三次信。可是他鼓励我为先父写传的话，我始终没有忘记！现在我有了时间和精力为先父写传，而胡先生竟已作古！写到这里，不禁怅然！

《公言报》的销路既好，一切编辑和业务方面的事，又有胡政之先生帮忙，父亲只是写写社评，自然在精神方面，比较轻松。因此他一有一点功夫，就到琉璃厂去逛古玩铺。有了闲钱，就买古玩和书画。日子多了，家中的古董书画也越来越多。

第一次欧战开始以后，父亲是中国第一个主张参加联盟对德、奥宣战的人。他在报上时常唤起政府和人民对欧战的注意，并详细说明，我们中国为什么需要参战。

那时政府里有些目光浅近的官僚和议员，极力反对参战。他们认为远在欧洲的战事，与中国毫不相干，为什么我们要出人力和物力去替一群碧眼黄发的洋鬼子打另外一群碧眼黄发的洋鬼子？父亲看到这些“近视眼的人”，简直是不可以理喻，因此常在报上把这些人大骂一顿。后来，中国终于加入了协约国。

果然最后协约国胜利了。关于这件事，在大战结束后，北京的《法国政闻报》（Monsieur Monestier 主编）曾将我父亲极力主张参战的始末详细刊载，并以先父的照片为该期的封面。可惜Monsieur Monestier不肯把那张报给我，现在也没法子找了！

五四运动以后，北京和天津的报纸比较多了。胡政之先生应天津《大公报》之聘，去做他们的经理，乃脱离了《公言报》。从此父亲自己担任总编辑和经理的事。

据说有一次，为了他一篇文章的攻击，而使得三个总长同日

去职。一时华北的读者，都把林某“一日骂倒三总长”的事，传为佳话。但我不知道这三个总长到底为了什么，竟被“骂倒”。也不清楚这件事是否与五四运动有关。有人说，这三个总长就是当时主张和日本签辱国条约的人，但事实究竟如何，我不敢说。希望如果有人知道，能不吝赐教！

民国十年左右，〈公言报〉以揭发政府欠薪、拖饷、中饱、作弊等内幕，被当时的政府所封闭。

可是没有几个月，父亲又以〈新社会报〉的名义，卷土重来，又开始了报馆的营业。

一般人都认为林某虽然卷土重来，他尝过一次苦头，一定不会在再大胆的揭发那些政府要人的黑幕了。谁知道疾恶如仇的林某，对恶势力的斗争，不但没有松懈，反而，变本加厉，常常把他那些总长、次长、督军们的罪状，公诸报端。又把那些曾以裙带关系而升为高官显贵的人；替未成年的子女挂名差事，以饱私囊的人；或与其亲信狼狈为奸，盗窃公款的人；铲除异己，谋害忠良的人……都尽量揭发。从此以后，他成为军阀和政客们的眼中钉了！

(十)

民国十二年，曹锟要做总统，因恐国会不能通过。于是很多国会议员，都得到五百块钱的贿赂。父亲得到了这个消息后，不但立刻在报上把曹锟大骂一顿，而且连那些受贿的议员也攻击了。他说那些只要钱而愿意昧着良心去选曹的人，是一群猪仔。

这个消息和社论公布后，京中一时舆论大哗，曹锟和猪仔，

成为全国茶余酒后谈话的资料。曹知道如果《新社会报》每天这样攻击下去，他这总统就做不成了。因此下令把报馆封闭，并派了好几十便衣侦探到我们家来搜查。

这天父亲是住在报馆里，他常常因为晚上工作得太晚，不愿叫车夫起来送他，所以常常住在报馆里。

那时我虽然是个小孩子，可是这件事记得很清楚。

我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早晨，天还没完全亮，大概只有五六点钟，他们就把我们全家吵醒了。据说他们是奉了上峰的命令，到我们这里来搜查的，并没说要搜查什么。结果搜了一个多钟头，并没搜出什么东西来。他们在报馆里也没搜出任何东西。于是只好很客气的对父亲说：

“对不起，林先生！请您跟我们到侦缉队去回话去吧！”

“有什么话可回？你就说你们要逮捕我就是了！没关系，我立刻跟你走！”说完以后，就跟他们去了。

他们给他预备了一间最好的屋子，卧室外面还有客厅。一日三餐都是从家里送去。他每天可以随便看书、看报、写字，或接见亲友。就是不能写文章。每次有人去看他时，那些侦缉队的“便衣”，都非常客气。父亲一发脾气，他们就象小丑一样，想法子给父亲消气，并劝他好好的“休息”，不要着急。

父亲在侦缉队里“休息”了三个多月，曹锟在这三个月里也被选为总统而就职了。他把总统的座位坐稳了以后，才把父亲送回家。

过了一个月以后，报馆又复业了。但因为按照官方的规定，《新社会报》既已被封闭，它是永远不能复业。如果再要开报，则必须另起个名字。父亲想了不久，就决定把报馆的名字改为

《社会日报》。（慰君按：《社会日报》的前身是《新社会报》，很多人以为是《社会日报》在前，其实不然。）

从民国八年到民国十五年这几年之中，可以说是父亲写文生活中最轰动，最受崇拜的阶段。很多大学生，如北京大学、朝阳大学、燕京大学……都常常请他去演讲或谈话。他和胡适之先生见面，大约就是在这个期间。同时他还常常接到全国各地的来信，鼓励他，赞扬他。他们说他那嘻笑怒骂的文章，充分表现他忌恶如仇的态度和忠诚爱国的思想。可惜这些文章都留在北平，没能带出来！

《社会日报》除了以社论著称外，还出了一种副刊，叫《生春红》。这副刊的读者只是日报读者中的极少数。因为《生春红》是专门研究金石学、甲骨文、钟鼎文一类东西的。此外也登载好的诗词歌赋等等。其中文章，完全是文言的。凡是爱好古玩，对中国固有的旧文学有兴趣的，都喜欢看这个副刊。

父亲创办《生春红》有两个原因，第一是自己爱好古董——尤其是砚台，喜欢诗词，并且精于书法。第二是因为自己一生提倡白话，深恐一般青年因此而忽略了中国固有的文化和文言。他提倡白话的目的是使新闻大众化，而创办《生春红》则是研究学术的专门化。在诗词方面，他极力避免捧戏子和歌颂妓女一类的肉麻作品，因为当时报上的旧诗，多半还是这一类的东西。

提起砚台和《社会日报》的副刊《生春红》，这里不得不把《生春红》这个名字的来由解释一下。

《生春红》本来是一块砚台的名字，它是我父亲好几十块砚台中最好的一块。他费了很大的力量，才把它买到手。

父亲因为喜欢这块砚台，所以把他的书斋就名为《生春红

室》。并又用《生春红》作《社会日报》副刊的名字。砚的背面，有清末藏砚家“十砚老人”黄莘田先生所刻的一首悼亡诗和关于这块砚台命名的始末，原文如下：

余在端州日，室人蓄此砚，戏名生春红。盖取东坡“小窗书幌相妩媚，令君晓梦生春红”之句。室人摩挲不去手。

迩来砚匣尘封，启视，尚墨湫津津欲滴也。而室人逝已兼旬矣！悲何可言！因携一诗云：

端江共汝买归舟，

翠羽明珠汝不收。

只裹生春红一片，

至今墨湫泪交流！

乾隆甲子二月 十砚老人

黄莘田先生大概是我父亲外祖父的哥哥或弟弟。除了砚的背面刻有以上文字外，在它的右侧面并刻有篆文的“生春红”三个字。

黄家的人，对砚台都很有研究。父亲小时在黄家读书，耳濡目染，因此对砚台也有很大的兴趣。

他所藏的古玩里，除砚台外，有玉器、铜器、陶器、鼻烟壶、字画、古墨、瓷器等等……。至于书籍，则不下数万本。父亲每天可以说是生活在书房里。他在看书、作文章、欣赏古董之外，总是练字。钟鼎、甲骨、篆隶、行草，无所不写。每天早晨，我们的用人总得花两个钟头的工夫来研墨，才够父亲一天所用。

我们家用人最多时，整整有十个。厨房有两个厨子，一个大厨子，一个帮厨。门房有一个看门的，两个听差——一个管收

拾父亲的客厅、书房、客房等等，一个管研墨、上街买东西、扫院子等等。女用人经常有三个。一个管伺候母亲，另外一个管“打杂”、洗衣服、做针线等等，还有一个专看着我。此外还有一个车夫，一个花匠和一位“护院的”。

我们自己家里人虽不多，但是亲戚、朋友、同族、同乡、……则不少。他们常到我们这里来吃饭或来住。有的一住就是好几年。此外还有父亲的学生和热心的读者，也常是我们的座上客。他所喜欢的学生，有时甚至出国留学，都得父亲大量资助。我们的房子，总是有三四十间屋子和四五个院子。

堂妹毓秀是二叔继勋的女儿。父亲非常喜欢她，因此叫她到我们家来住，和我一起读书。

我们有好几位家庭教师。一位教四书，一位教唐诗，一位教英文、算术，一位教打拳，还有一位教写篆字。

父亲的主张是让我们先把四书五经念完，然后再上中学，因为这样，国文比较能略有根底。说起来或听起来，我们这样的生活，好象很富有似的。其实不然！父亲的生活，经常是在穷困中。他的债务永远还不清！这也许是他一生过“革命”生活的习惯改不了。一有钱，他不是买心爱的东西，就是帮助同乡同族或学生。没有钱时，家里就得减少用人，节省开支，尽量紧缩。有时为了朋友甚至当卖心爱的古物。他的穷非常有名，但他从不以穷为耻辱。我从前追忆起父亲，总是不了解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后来想起李白的诗“……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句子，才恍然大悟。我的父亲虽不爱喝酒，但他和李白的作风完全一样；为了好朋友或是一个心爱的学生，甚至一个并不认识的青年，只要气味相投，一高兴，就可能卖了东西大

请其客。他的豪爽和慷慨，是人人都知道的。

民国十二年以后，他因为报馆的收入和支出，总是不能平衡，他既不要政府的津贴，又不愿受朋友的帮助，因此为了增加收入，情愿自己卖文卖字。他在报上所登的广告是：“林白水卖文字办报。”记得我曾看见过父亲给人写墓志铭和祝寿的文章，有的是用篆文所写，有的是用隶书和行书所写，此外还常看见他篆字的对联、横匾和挂屏。

他除了为人豪放好客以外，对有学问的人，都十二分的尊敬，不管他岁数的大小或身份的高低。我小时教我写篆字的老师，是容庚（希白）先生。那时他只是刚刚从广东到北京来上北大研究院念书的一个学生，既无地位又非权贵。可是因为他的学问好，曾写过一本关于金石学的书，所以父亲特别尊重他。

每次他教完我和毓秀姐，父亲总是叫我们自己的车夫送他回去。（他总是晚上七八点钟来，到十点左右走。一星期一次。）我们住在西城，他住在东城。有一次，车夫因为容老师从来没赏过他“酒钱”，半路上忽然推说肚子疼，请老师下车，让他另外雇一辆车回去。老师知道这车夫故意捣乱，心里非常生气。回去后立刻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从此再也不来了。父亲看到这信，知道是车夫得罪了老师，立刻就把车夫辞掉。第二天，又叫我和毓秀姐拿着父亲的道歉书，一起到容老师家去叩首请罪。容老师看我们这样尊敬他，自然也把气消了。后来他到我家时，父亲一见他，竟亲自又给他跪下陪礼。容老师看见父亲这么重视他，感动得几乎流下泪来。以年龄来说，父亲比他大二十岁，以地位说，他只是个学生，而父亲已是功成名就的报人，他对容本不必这么谦恭。他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出于他“礼贤下士”的

一贯作风。从此。容老师把父亲认为“知己”。

容老师在北大研究院毕业后，果然因为学问好，立刻被燕京大学聘为国文系的教授。后来他又在广东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当教授，著述的书籍很多，多半是关于金石和小学的。

（以上所述的事，可参阅容庚先生所编《考古学社丛书》〔燕京大学出版〕，其中有我父亲所写“生春红室金石述记”一篇和容先生所写的跋。他以父亲比做祢正平，并论及父亲怎样屈己下人的事。）

（十一）

父亲在报纸上对那些无知的军阀和贪污的官僚，总是骂得体无完肤。因此一般人都以为他是一个脾气很坏的人。其实他是最富于感情的。记得我小时，每次父亲一提起祖母一生怎样受经济的压迫和精神的痛苦，他总是热泪盈眶，后悔他没有好好的孝敬她。

我母亲年轻时很美，但她一生多半是缠绵床褥，不是这里有病，就是那里疼痛。西医中北京的德国医院、山本医院和方石珊医院，母亲都是几出几进的常年照顾。后来，因为西医治不好，改求中医。中医方面，北京的四大名医萧龙友、孙伯华、施今墨、汪蓬春，也都因常来看病，而成为我们家的朋友。这些名医虽然有起死回生之术，但始终没把我母亲的各种病症治好。萧龙友甚至建议她吸鸦片烟，也还不行。她的病包括咳嗽、痰喘、肠胃疼、腿疼、泻肚、失眠、神经衰弱……等等。父亲为了给她医病，不知花费了多少财力和精神。但是母亲因身体不好，脾气自然也不太好，家里的事，也没法管，于是还是请从前照顾我哥

哥的那位姨母来做我们的管家。这位姨母从前给我祖父管家时，只不过十几岁，现在已是中年的寡妇，她自己没有孩子，但非常爱小孩。不过她的脾气也很不好，时常和女仆们吵闹，有时甚至于同母亲也发生口角。这一切，都使父亲在精神上不太愉快。这位姨母唯一的好处是她对我很好。父亲为了爱护我，只好不管她的短处，并且叫我拜她为义母。我可以说是从小由干妈把我带大的。

无论是冬天或是夏天，父亲每天夜里睡觉以前，总要到我屋子里来给盖被，因为我常常把被窝踢开。有时他半夜起来，也得来看我。自从我记事起，他没有一天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他来给我盖被时，常常会把我弄醒，但那时我是小孩，并不会因此而失眠，我醒了几秒钟，一转身又呼呼的睡去了。有时我醒了，叫一声“爹爹”，以表谢意。（现在回想起来，好象我们中国人父母子女之间，从来不好意思说“谢谢”！）他见我叫他，总是轻轻的吻一下我的前额，或亲亲我的手背。然后叫我“好好的睡觉”。这种情形，我一直到现在也忘不了，每半夜如果醒来，还会希望父亲来给我盖被。

夏天的时候，他常常带着我到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去吃晚饭。来今雨轩是一个很好的西餐馆，我最爱吃他们的炸大虾、西红柿、牛尾汤和焖牛肉。

父亲到那里去的目的和我不同，他的目的是去会朋友，找“材料”。每次去时，我们桌子旁，只有我们两个，坐了一会儿，我们桌上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有时加上四五个，有时变为八九个。他们忽而高谈阔论，忽儿低声耳语，都是谈些新闻，对我毫无兴趣！他们谈话时，我总是静静的看我周围的人。我最喜欢看那些

穿得漂亮，长得美丽的小姐们。那时的来今雨轩，是北京时髦人物的聚集之所，也可以说是服装表演的会场。

春天，牡丹和芍药花开时，父亲也是带着我到公园去看花。但那时我才几岁，对花并不感兴趣，对花池附近的几十缸龙井鱼，倒非常恋恋不舍！那些凸眼睛肥肚子和大尾巴的各种鱼，有的是银色与红色的，有的是深蓝，象蓝绒一样的，有的是红色和蓝色的……我觉得比那些花好看多了！

秋天，中央公园总是有菊花展览会，他们多半在旧历九九登高的时候举行。父亲每年也都带着我去，虽然他知道我对菊花，依然是没有对龙井鱼或水榭附近的那只孔雀那么有兴趣。

冬天，没有什么地方可玩，琉璃厂的古玩铺成了我们父女常去的地方。每次一去，父亲总是拉着我的手，一个古玩铺一个古玩铺的走。这家看看，那家谈谈，有时一个下午，什么也没买，有时也许买上两件。要价，还价，彼此都得费很多唇舌。每次我刚走进头两三家时，看着那些奇妙的东西，还觉得有点意思，等到一两个钟头以后就觉得腻了。我不是说走不动，就是说要小便，好早点回家。父亲知道我是不耐烦，于是就说：

“你如果能等我再看两三家的话，我带你去吃馆子。”

我一听可以吃馆子，身体也不累，小便也不急了。

后来毓秀姐到我们家和我一起读书，我有了一起玩的伴侣，父亲逛古玩铺时，就不带我去了。他知道逛古玩铺对他是一种享受，对我几乎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

我的哥哥陆起，在天津南开中学一毕业，父亲就把他送到美国的芝加哥去念书去了。陆起比我大十几岁，他离开家时，我还不太会写信。可是后来我开始读四书，学作文，父亲每次给陆起

写信时，总是叫我也给他写一张信。可是陆起给父亲回信时，从来不给我回信，他只是在给父亲的信里，提一提收到我的信或问一下我念书的情形而已。也许因为我太幼稚，他和我没有什么可谈。

有一次，父亲又叫我给哥哥写信，我很不明白，于是我问：

“为什么我老得给哥哥写信呢？他从来也不回我的信！”

父亲那时还在书房写字，他停住笔，拉着我的手，踌躇了一下，慢慢的看着我说：

“你还小，不懂事。将来你得靠你哥哥帮你很多忙呢。”

“帮我的忙？”我的好奇心不禁使我发问。

“比方说，将来你结婚了，你的丈夫或你的婆家有人想欺负你，你有一个哥哥出来替你说话，人家就不敢欺负你了。”

“如果有人欺负我，爹爹替我骂他们不是更好吗？何必叫哥哥去说话？……”我很天真的又问。

“傻孩子！我不能跟你一世啊！”说到这里父亲的眼圈红了！他赶快低下头去写字，不愿意让我看见。

当时我并不太懂父亲的意思，也不敢问为什么，于是只得回到自己的书房，规规矩矩的给哥哥写了一封信。后来我长大了，才明白父亲的用意。他因为我岁数太小，恐怕将来我结婚时，他已不在人世，因此他要我从小就和哥哥亲近，以便将来不致孤单而受人欺侮！父亲想得多么周到，他对我的爱护，岂是世界上任何人所能比得上的！

我有生以来，就挨过一次打。那次是父亲打的。但是我相信他是出于不得已的！

我的“挨打”，应当完全归咎于“英、日帝国主义”！都是

为了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的起因是：由于青岛一个日本纱厂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于是引起上海一家日本纱厂工人的响应，当然这些工人也要求增加工资。那些请愿的人，有的被日本警察开枪打死，有的受了重伤。

这件事引起全国的公愤。学生、工人、商人以及各等各界的人，都参加了反日的行动。

在五月三十号那天，上海的工人、学生，为那个被日本警察打死的工人开追悼会。因为参加追悼会的群众里，有人扛着“打倒帝国主义”的牌子，在英租界游行示威，并喊口号，英国警察逮捕了好几个为首的学生。这件事引起人们的愤怒！群众跟着英国警察到了他们的巡捕房，要求释放被捕的人。不料英国警察竟开枪打死了十个学生，伤了二三十人！

从此以后，上海更愤怒！所有的学校都罢课，工人罢工，店铺罢市，……所有的活动都停止了。街上只有游行示威的群众。但因此又有一些爱国的青年流血牺牲被惨杀在街头！

全国各地都为上海罢工的同胞捐款，“打倒英日帝国主义”和“抵制日货”的标语，到处可见。

很多学生离开了英国教会所办的学校，仓库里大量的英、日货品，被学生所捣毁。

我从小就有看报的习惯。这次的惨案，燃起我对英、日两帝国主义的怒火，我希望我能有一支大枪，能把那些可恶的英国警察和日本警察打死。

父亲的报馆也为上海罢工的工人捐了一大笔款。我把我历年存下来的压岁钱也都捐在里面了。每次我们到街上去时，看见十

字路口上有许多学生向坐火车和走路的人捐钱，我很羡慕他们能为国出力。我问父亲可以不可以参加他们，作一点爱国的工作。

“你太小，现在不能去，将来等你长大一点再说吧。”父亲敷衍我。

我们家里也时常有各校学生来捐钱。有一天父亲不在家，他们来捐钱，母亲叫女仆拿钱出来给那四个来捐款的大学生，女仆是小脚，她走路很慢，我听说后，立刻飞跑出去，恳求他们也让我参加他们的募捐队，到各处去捐钱。

他们微笑着，婉言把我谢绝了。

可是我仍然坚持要跟 他们 去，我告诉他们我只去几家就回来。

“向人捐钱，要说很多话，你是个小孩子，你怎么行？等你长大一点，我们一定要你和我们一块儿去！”他们还是微笑着。

“我不必说话，我可以替你们拿着这个钱口袋。”

“这个钱口袋太重，里面又是银币又是铜板，你拿不动！”

我不但非常坚持，而且有些微怒，因为我觉得他们有点看不起我！因此为了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对我的看法是多么错误，我立刻从一个人的手里把钱口袋拿过来，以表示我拿得动，谁知道一不小心，钱口袋整个掉在地下，银币和铜板洒了满地！

“你看我说得对不对，我说你拿不动这许多钱，你看不是都洒了吗？”他们一边说，一边弯下身去，各处捡钱。

其实并不是我拿不动那个口袋，只是太兴奋了没有小心而已！我觉得他们冤枉我，同时自己又很不好意思，于是只好含着眼泪，跑回自己的屋子去伏在床上，偷偷地哭了一场！

虽然我这次没能出去捐钱，但是在家里却做了一些“排斥日

货”的爱国行动。

有一天！我把我们家所有的日本瓷器——盘、碗、茶杯之类，都摔碎了。其中有个水果盘，是干妈最喜欢的。一个是玻璃刻丝的，周围有一寸高的栏杆似的白铜边。另外一个果盘是两层玻璃，当中夹着蝴蝶和花草的。周围也有高起来的边。这两个盘子是干妈的亲戚，从前到日本去旅行时买回来给她的。我因为它们都是日本货，所以虽然我也非常喜欢，但是我还是把它们和别的日本东西一起弄坏了！看看那两个好看的盘子被我这两只手亲自毁坏，我非常难过，但是我还是“忍痛”的那么做了！

这件事让干妈很生气！她把我大骂一顿，但她没把这事告诉父亲！

过了几天我也把这事忘了。这时我们家里“日货”是绝迹了。唯一让我看着不顺眼的，就是我们家的香烟，都是英美烟公司出品的“老炮台”或“大炮台”牌子的烟。

有一天，我去跟干妈和其他住在我们家里的亲戚们说：“我们应当排斥英国货，所以我要求您们最好不要吸英美烟公司出的‘老炮台’和‘大炮台’了！换成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的‘大联珠’牌的香烟吧！”她们都答应我，把原有的烟吸完后，就换成“大联珠”。

可是过了好几天，干妈也没换，别的亲戚，有的换了，有的看干妈不换，他们也不换，叫男仆去买烟时，还是吩咐他去买“老炮台”或别的英美烟公司的烟。这件事让我很生气！

一个礼拜天的下午，干妈带着我和毓秀姐，还有几个表哥、表姐和别的亲戚们，一起到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去吃饭。我们坐好以后，干妈一看她自己没带烟，于是立刻叫过伙计来，若无其

事的吩咐他拿一包“老炮台”的烟来。她好象从来没答应过我不买“老炮台”似的！

我真气极了！我什么话也没说，等伙计托着碟子恭恭敬敬的把烟捧来的时候，我立刻站起来，把烟抢过来，三把两把，把每一支都弄碎了。伙计吓得张口结舌，不知说什么好。他直问“小姐是怎么了？小姐，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对着干妈说：“这个烟是英国货，我们应当排斥！”

这个举动对于干妈真是空前的侮辱！她有生以来大概从来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这样丢脸过！当时一桌十来个人，都吓呆了！没有一个敢说话！

“你怎么对我这么没有礼貌！你这小孩子，胆子越来越大了！”最后她才打破沉默。她的嘴唇发抖，脸都气白了！

“您答应我不买英国烟，已经好几天了，可是您一次中国烟也没有买啊！”我只好壮着胆回答。

“我就没那么做，你也不应该这么没礼！我得告诉你父亲！我受不了你这小孩子的气！”她说完立刻又叫伙计拿了一包“老炮台”来，这次我没敢再动，可是我心里想：“爹爹是很爱国的，他绝对不会罚我！”

那天晚上我们刚回家不久，女仆就来告诉，父亲叫我到他的书房里去。我知道一定是干妈在父亲面前告状了。心直跳，但我也得硬着头皮走进去。

干妈坐在父亲书桌的对面，气冲冲的，嘴唇还有点发抖。

“我要你给干妈陪罪，跪下！你跟干妈说，今天在公园里，你的行为错了，请干妈原谅！”

“可是……爹爹……我没错……因为干妈答应我不买英国

货，但是干妈还是老买英国烟……”我一边说，一边眼泪就流下来！

“你的意思对，可是你不应当那么没礼貌！你不该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你干妈那样难堪！”

我虽然自己也觉悟我的行为有点过火，但是有点倔强，还没跪下。我只是站在那里，一边哭一边向干妈说：“我错了！”这时干妈开口了。

“你今天如果不重重的罚她，我就走！我为林家不知花了多少心血，把你两个孩子都照顾大了。留学的留学去了，不会看报的也会看报了。现在就因为报上说有人捣毁日本货，我的最心爱的日本盘子也被她打破了。这件事，我前几天根本没向你提，因为她是小孩，我就让她‘得过且过’了！现在连我抽烟都得受她这小孩子管！而且当着那么多人侮辱我！你如果不罚她，将来她的气我还受得了？我不是林家的用人，我受不了！我非走不可！”她一边说一边也呜呜咽咽的哭起来了！

“跪下！”父亲一边说，一边连拉带推的，把我扯到干妈面前，让我跪下。我刚跪下，就看见父亲从书桌上拿起一个尺来，在我腿上和屁股上乱打了一阵！

我的肉又疼，心里又觉得委屈！只好按照父亲的命令，又说了一声：“我错了！”

我说完立刻就跑回自己的屋子，躺在床上去哭去了！我心里非常怨父亲，我怨他这样无情的打我！毓秀姐很同情我，可是她也是“爱莫能助”！

我在床上哭了约有一两个钟头才睡着，可是刚睡了一会儿，就听见屋门响，接着是熟悉的父亲脚步声。我明知是他来看

我，却故意不说话，假装睡了。

父亲走到我床边，先把我的夹被习惯的给我整理一下，给我盖好，然后又摸一摸我的头，看我是否发烧，大概他觉得我哭得那么厉害，可能会生病！最后又轻轻的把我的手拿起来吻了一下，嘴里不禁说：“好乖！乖乖的睡吧！”

我的眼泪当时就流出来了！可是我还是偷偷的流泪，不让父亲知道！我对父亲的怨气已经消了！我原谅了他，因为我觉得他本来没打算打我，只打算叫我给干妈道歉陪罪而已。他之打我完全是干妈逼出来的！现在我回想来，相信当时父亲打我时，可能比我这挨打的人更难受！我可以大声的哭喊，但是他只能把眼泪咽到肚子里去！他一下一下的打我，不知道是多么心疼呢！

不过从此以后，我们家里没有人再吸任何英美烟公司的香烟了。连干妈也换成吸“大联珠”了！可能是父亲下的命令！

全国由排斥英货日货，而提倡国货，一般大中小学的学生都穿竹布、蓝布或灰布的制服。我虽然没上学，但也要求穿蓝布大褂，不穿那些红红绿绿的绸子缎子衣服了！干妈看我这么“不知好歹”，非常生气，但她也没有什么法子！

现在家里的英货日货都已绝迹，我和毓秀姐两个人越看我们的名字越不顺眼，她的名字太女人气，表示娇弱，我的名字——玛利——则根本是英文名字的译音！我反对英国，自然不能要英国名字，这简直是耻辱！

于是有一天，我和毓秀姐两个人，一同到父亲的书房，请求父亲给我们一个人起一个名字：“要象别人家的姊妹一样，一字相同，而不太俗气的。不要什么‘贞’呀，‘月’呀，‘珠’呀，‘玉’呀一类的字。”父亲想了一会儿，于是给毓秀起名德

君，给我起名慰君。我们两个人从此就以这两个名字作为我们正式的名字了。德君姐现在在台湾，她的先生范诵尧将军，是总统府的国策顾问。

(十二)

在“五卅惨案”以后不久，我的姑母宗素一家都由河南搬到北京来了。她从前在日本时与汤忠先生结婚，生了两个男孩子，一个叫汤飞，一个汤晋。后来她因与汤忠意见不合，协议离婚。过了几年，与张客公先生结婚，又生了一个儿子，并抱养了一个女儿。可是，不幸他的儿子因急病逝世，所以她的精神很痛苦，因此父亲写信叫她全家都搬到北京来，与我们同住。

自从姑母搬来以后，我们家里热闹多了，表姐重华和德君岁数一样大，我们三个人整天在一起。星期日，汤家的两个表哥也来玩，他们一来，我们家更热闹了。

母亲有了姑母时常在一起谈话，精神和身体也稍微好一点。

父亲因为我喜欢金鱼，特意买了好几十条金鱼和龙井鱼，也买了十来个象中央公园里的大缸，摆在院子里。

至于父亲自己，则喜欢花。院子里花木太多，因此得由花匠专司其事。每年冬天父亲的书房里和客厅里，摆许多梅花，过年时，总有水仙花。使人一进去，就感到清香之气扑鼻。秋天时则花瓶经常有桂花，春天有丁香，夏天有晚香玉。

除了鱼和花以外，我们家里的猫和狗也很多。我是从小就喜欢动物，它们也非常喜欢我。我不但爱它们，而且会教它们作各种事情。比如坐起来用两前爪“拜拜”，或举起一只爪子“敬

礼”。此外，还教它们“打滚”或躺着不动……等。

父亲本来也很喜欢狗，可是因为我们家里的猫和狗太多了，它们身上的跳蚤，常常把我全身咬得“体无完肤”，所以父亲总不许狗到我的书房和卧房里去。他一看它们在这两个地方，就要吓唬它们，好象要打它们的，因此我们家的狗一听见父亲的声音，就都夹着尾巴很快的藏起来。

在我小时的生活里，这两年最舒服，无忧无虑，每天除了读书、写字外，有德君姐、表姐一起玩，星期日还有两个表哥来给我们说故事或带着我们作各种游戏。不然，就是由大人们领着我们这一群小将，浩浩荡荡的，到中央公园去。

自从姑母搬来以后，也许是我的生活太忙了，连看报的时间也减少了。

这时候，北京是在绰号“狗肉将军”的张宗昌统治之下。国民党北伐的军队在南方已经节节胜利，但离北京还很远！

张宗昌是一个当兵出身而丝毫知识都没有的老粗。他素以“三不知”自豪。即一、他不知道他有多少兵；二、他不知道他有多少钱；三、他不知道他有多少姨太太。他自己整天赌钱，牌九、麻将是他最喜欢的两种娱乐。他手下的官与兵，则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张宗昌不但不管，反而赞美那些人本事，会替他“弄钱”，或给他抢劫良家妇女来满足他的兽欲。

据说有一次他在某家的大宴会中，看见了两位十几岁的漂亮小姐，于是立刻授意手下的走狗，叫他们设法把这两位小姐“弄来”。果然在两三天之内，他们就把这两个清白的女孩子，送到张的魔掌之中了！她们被蹂躏了好多天，才被释放！回家后，两人都几乎自杀。

至于他赌钱，则是许赢不许输。陪他打牌的人，为了逢迎他，都是想尽方法，把自己的牌故意打坏，好让他和。他自己则乱出花样，蛮不讲理。比方说，打麻将的人，都知道的“麻雀吃饼”，就是张宗昌发明的。他本来和的是单钓一条（鸟形），可是因为牌快完了，他恐怕得不到一条而和不了，于是别人打出来一张一饼，他就硬说和了。及至别人问他一条和一饼并非一对，怎么能和，他却说这叫“麻雀吃饼”。不但和牌，而且要多加一番。陪他玩的人，真是“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忍痛把钱输给他。其蛮横之处，竟能如此！

张是山东人，可是他的兵，驻在山东时，抢劫杀害了不知几千几万人。良家妇女，被他们蹂躏的，也不知凡几！山东老百姓，一提起张宗昌三个字，没有人不咬牙切齿！于是时常有人给父亲写信，把张的罪行，详细的告诉他，希望他能在报上替他们出一口气！

这时期的财政总长是潘复。他是张的心腹和牌友。自从他出任财政总长以后，已经捞了不知多少万的钱财。可是他还贪心不足，还要进一步当国务总理。这个消息，已经酝酿很久。

父亲那一贯“嫉恶如仇”的作风是改不了的，他看张、潘这群无法无天、胡作非为的人，把国家大事，操纵在他们指掌之间，觉得真是忍无可忍！因此，〈社会日报〉的时评，经常有骂张宗昌和潘复的文章。

他骂张是土匪，没知识，奸淫掳掠，伤天害理，无恶不作。骂潘则是逢迎拍马，盗窃公款，虚伪欺诈，丧心病狂。他说潘复，以一个念过圣贤书而有知识的人，为了升官发财，竟昧着良心，恬不知耻，低三下四的去巴结张宗昌，整天陪着他吃喝嫖

赌，实在是最下流，最令人看不起，最给他潘家祖宗丢脸的事！除此以外，潘还有一件忌讳的事，就是父亲说他贪得无厌，作了财政总长还不知足，还要作国务总理，打算捞更多的钱，发更大的财。

他深知，如果《社会日报》经常的这样骂他，他这国务总理是当不成的。过去的曹锟和被林白水骂倒的三个总长，不都是林笔下的败将吗？曹锟如不是用武力把他关起来，也做不成总统！因此，他如果要作国务总理，非得先把《社会日报》和它的主办人去掉不可。

* * *

民国十五年八月五日——一个炎热的夏天下午，我和德君姐正在书房里写篆字，父亲从里头的院子出来，他要到报馆去，经过我的书房，看见一条狗正在门里睡觉，于是走过去用脚轻轻的踢它一下，叫它走开。我看见父亲踢我最心爱的狗，有点不高兴，所以当父亲走到我的书桌旁边来看我的时候，我故意不抬起头来，一边低头写字，一边很埋怨的对他说：“爹爹，真是的！老吓唬我的狗！”父亲没说什么，只是笑着看看我写的字，拍拍我的肩膀就到报馆去了。

谁想到这次和爹爹说话，竟是最后的一次，我多么对不起爹爹！我后悔我不该那么没有礼貌，到现在我每次想起来那天的情景，还使我不禁潸然泪下！

那天晚上，大概有三四点钟的时候，我忽然醒了，怎么也睡不着，过了不知多久，表姐忽然到我的屋子来叫我，她说：

“表妹，我听说舅舅被人逮走了！”

我的心立刻大跳起来！我又怕又慌，不知怎么办！于是立刻

从床上起来，问表姐：

“姑妈和我妈妈知道吗？她们在哪儿呢？”

“她们正在前院四处打电话打听消息呢！看样子，很危险！……”

表姐还没说完，母亲和姑妈从外院进到里院来了，母亲哭着叫我：

“玛利，快起来吧！你爹爹死了！他被张宗昌打死了！”

天刚刚有一点亮，夏日的清晨虽然凉快，但不至冷！可是这时我只觉得全身发抖！我的腿软极了！我似乎相信又似乎不相信。……大家好象也都不太相信这个消息！只有妈妈在哭！

有人建议妈妈应当带着我到杜锡珪——当时的国务总理——家去见他。因为他是福建人，和爹爹也认识。他们说，如果爹爹还没被害，求他去向张宗昌讲情，可能有希望！

我们都希望那个消息不确实，所以立刻叫了一辆汽车，到东城的杜锡珪的家里去。结果刚一进门，就听见他的门房里电话响，过了一会儿，听差出来告诉我们：

“你们赶快回去吧！你们家里来电话，叫你们不必见总理了，说是：有人已经在天桥看见林先生的尸首了！”

我的爹爹已经被他们杀害了！

妈妈悲伤得什么事也不能管，一切的事大半由姑母和族人们、亲戚们负责料理。

那天午前，有人把爹爹的遗嘱送来了！妈妈、姑母和我都不忍看！所以由住在我们家念书的一位族叔念给大家听。原文节录如下：

“余绝命在顷刻……家中之事，无从说起，只好听之。爱女

玛利，好好读书，并善为择婿。……速电陆儿还家，料理后事。
……我平生不做亏心事，天必佑我家人也！

民国十五年八月六日 林万里绝笔”

我听了爹爹的遗嘱，忍不住放声痛哭！他在临死之前，最不放心的就是我！他怕我不念书，他怕我找不到好丈夫而受人的气，他的心里最挂念的，就是他最心爱的女儿！关于钱的事，家里、报馆……他什么也没提，仅在遗嘱中说，如果有要紧的事，可以和王莪孙、黄秋月、陈淮生、李律阁四人商量。这四个人里，王、李两人是表亲，陈、黄两人是父亲的好友。（这遗嘱，我在二十多年前，交给父亲的一位忠实读者——张次溪先生——请他影印，因为他正在替父亲写传记。可是还没出版，我就匆匆离开北平。那时张先生也不在那里。因此连那本书的内容是什么，我都没看见。后来我到了美国，和他失去联络，不知道他在哪儿。民国五十二三年之间，听说他仍在北平，于是托香港的朋友给他写信，求他把父亲的遗嘱还给我。可是他始终不肯，遗嘱原文因此有的地方我记不清了，现在想起来真后悔！）

那天傍晚，父亲的尸体在龙泉寺入殓。他们给他穿了很多新做的寿衣，停在一张木床上。叫我帮着他们把父亲搬到棺材里去。据说这本是儿子的责任，但因为哥哥还没回来，所以一切儿子应做的事务，都得由我去做。

我应当抬着父亲的头，可是好多人告诉我这时候不许哭，因为眼泪如果掉在死者的脸上很不好。我不知道为什么，也没心去问，所以只好忍着悲哀，一口一口的咽下眼泪，把父亲抬到棺材里去！

可是他们也不等我再好好的看看我的父亲，作一次临别纪

念，就把棺材盖上了！接着就用很长的钉子，砰砰的几声，把棺材钉上了！他们多么残忍，每一个钉钉子的声音，都好象会让我爹爹的身体受伤，也会让我的心疼痛！

从此以后，我与父亲被一层木板永久隔离了！我伏在棺材上失声痛哭！我抱着他的棺材叫“我的爹爹”！可是爹爹已经听不见了！他不知道我多么悲哀！他也不知道他这心爱的女儿，从此是多么孤单！我多么希望人死以后，会有灵魂！多么希望他的灵魂会知道我的痛苦……。

父亲才只有五十二岁（实足年龄）！在这短短的五十二年里，他没享过一天福！从小就受祖父的虐待；家中经济状况，也从来没好过！奔走革命时，出生入死不知多少次！结果竟被那野蛮的军阀和政客所杀害！我们这个世界上，哪儿有公理！

从此以后，晚上没有爹爹给我轻轻的盖被窝了！也没有爹爹再轻吻我的前额，叫我好好的睡觉了！

那些人为什么那么残忍！他们为什么要把一个那么忠心爱国，那么仁慈的父亲杀死呢！

我虽有母亲，但是从没得到过母亲的真正的爱。我只知道父亲是世界上最爱护我的人！他无论多么忙，对我的起居饮食都要亲自照顾。即使他没功夫亲自照料，他也得问个清楚，比方说，早上几点钟起来的，吃的什么早饭，都做了些什么事，中午吃了什么，等等。

为了我，他虽然自己经常是债台高筑，还请了那么多家庭教师，给我打根底，为的是将来好上中学——因为他觉得一般小学的国文基础都不够！

父亲从来不骂我，因为我从来不敢作错事。即使偶尔作错了

事，他会知道母亲和干妈的责罚已经足够了！干妈自从五卅事件以后，对我一天不如一天，一点小事，就骂一两个钟头，翻来复去的叨叨不休。有时候晚上我躺在床上，她还特意跑到我屋子里来，坐在我的床边上，没完没了的说。弄得我常常是皱着眉，流着泪，带着一颗痛苦而悲哀的沉重的心慢慢的走入睡乡！

第二天早上起来，父亲如果看见我的眼睛有点红肿，就知道我一定又受了委屈了！他很心疼，可是又有什么办法？他只好等我念完书以后，带我到公园去玩，或带我出去吃一顿我爱吃的东西，来补偿我精神上所受的损失！他对我真是无微不至！天下哪里还有这样爱我的人！（父亲不愿把我交给女仆，所以只好叫我受点委屈。）

（十三）

先父一生交游之广，可以媲美孟尝。家里虽然没有“鸡鸣狗盗之士”，但受过他营救和帮助的人，则比比皆是！据说，民国十五年八月五号午夜，父亲在报馆被宪兵司令王琦带走后，有四位父亲的朋友——其中一位是薛大可先生，曾跑到张宗昌面前去替父亲求情，他们和张很熟，张当时本不想理他们，因为他正在打牌。后来他们四个人都跪到地下不起来，张受不了他们的纠缠，于是下令不要杀害，暂时把他关起来。薛先生等听到这个命令，立刻打电话给宪兵司令王琦，王是潘复的走狗，知道潘复如要当国务总理，非把父亲这个障碍去掉不可，所以很快的就把父亲送到天桥杀害了。

父亲被惨杀的第二天，全国各地的报纸都以头号字登载了这

个消息。宪兵司令王琦出的布告说：“林白水通敌有据。”他们的“敌”，就是正在北伐的国民党。父亲其实并不是国民党的党员，也没受过国民党的津贴。只不过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常说国民党的好处和张宗昌、潘复等人的罪恶而已！他的“证据”是什么？北京的大小报纸，虽不敢正式的质问潘、张，但在登载父亲被害的经过时，异口同声，完全是十二分同情这位反对强权主持正义的报人的！因此又有两三个报馆的主持人相继被捕。幸亏他们只被关了几天就释放了。其中一位就是创办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的成舍我先生。

开吊那天，到我们家来吊祭的人，有一千人以上。我跪在灵前，给所有的人磕头；哥哥没有回来！他不打算回来了。

好几个来向父亲遗像行礼的人，到灵帐后面来看我。有的我认识，有的我不认识。他们对我说：

“将来你长大以后，得给父亲报仇！”

“你得好好的念书，不要辜负了你父亲对你的期望！”

“你将来得给你父亲写一篇传记，他这一生可以说是一位轰轰烈烈的英雄！你不能不把他所做的事情写下来！”

“记住，你的仇人是张宗昌、潘复、王琦。”

对这些善意的劝告，我都含泪接受，并且叩首致谢！我忘不了这三个仇人！也忘不了给父亲写传！即使我自己写不好，我也得请人替我父亲写啊！（因此，后来张次溪自告奋勇，要为父亲写传时，我就把许多资料——如父亲历年所写的时评、遗嘱，和一块血手帕都交给他了。因为我知道张的文章非常好，而且他对父亲是异常忠实和钦佩的。谁知道从此连这些东西也都看不见了。）

开完吊以后，母亲和所有的亲戚商量，怎么搬到小一点的风子里去。他们主张把所有父亲的古物和书籍，先交给李律阁先生，由他替我们找买主。因为这些东西，得慢慢的卖。不能随便卖给铺子里。至于家具，则除一小部分外，其余的，得一次拍卖完，要不然没法子搬到小风子里去。

于是在一个深秋的星期日上午，拍卖行的人把我们所有的家具，除一小部分外，都放在父亲的客厅、书房和前院里，举行拍卖。我们家里的人，都深居在最后的—个院子里。拍卖行的人大声喊叫，我们都听得见。

我听到他嚷着拍卖父亲的大书桌时，心里是多么难过！那是我父亲整天写字的桌子！不知要落到什么样人的手里！我从来没对父亲的桌子、椅子、花瓶或鱼缸特别注意过，可是现在知道它们要被搬送到别人家去了，我竟为这些家具也流下泪来，因为它们都是父亲当初亲手所挑选而且每日所接触的！

我也永远忘不了拍卖的次日，是一个寒意已浓的深秋，我独自站在西风落叶中，看着拍卖行的人，把父亲的东西，一件件的搬走！我禁不住告诉搬运的人：“小心点！”似乎那些东西，也都是有知觉的，而且也不愿离开我们家！

他笑着看看我，“小小姐，东西已经是别人的了，你还管它做什么！碰坏了也不是你们的啊！”我只好惭愧的低下头去！

至于那些古物，都搬到李家去了。我们只留下父亲最心爱的生春红和一些零碎的小东西作为纪念。父亲在“金石述记”—文中所记载的大鱼脑、小鱼脑、青花、双龙等砚台，都得拿走！

李律阁后来把那些东西替我们卖了一万块钱，放在银行里生利，我们家里的生活就靠这利钱来维持。

我们搬到一所小房子里去，与二叔——继勋——全家同住。德君姐就是二叔的女儿。从此以后，家里一个仆人也用不起了。

二叔的父亲——我的叔祖父，名叫履中，是满清的海军舰长。甲午之役，与日本打仗时，他的军舰被日舰大炮打中，他见大势已去，乃跳海自杀，但被邻船救起。他恢复知觉后，立刻就问他的船在哪里。人家告诉他：“你的船已经沉了！”他听了这话，立刻挣脱围在身边的众人，重新跳入海内，并恳求大家不要救他，他说：“我的船已经没有了，我怎么对得起国家？殉船是海军人员的天职！我打不了敌人，还有什么颜面活着？”说完后，自己游至远处，沉入水中。他的英勇和尽忠报国的事迹，在福州的县志里记载得很详尽。二叔除德君外，还有一子，名智敏，是我的弟弟。现在也在台湾。

（十四）

母亲还是有病，许多重事，都是我做。那年冬天，我的两只脚都长了冻疮。因为我得在院子里砸煤，还得生火炉。此外，做饭、洗衣服、上街买菜、买药等等，也都是我。家里没有电话，母亲的病需要请医生的时候，我得走差不多一二里才能借到电话用。

母亲身体好一点的时候，她就起来做饭、扫地、擦擦桌子。有一次我看见她一面扫地一面哭，因为她受不了吸进那些灰尘，我看着这个情景，心里真是悲痛万分！

我第一次煮面的时候，把一大堆面放在凉水里去，结果煮成一锅浆糊了！

第二年春天，我由于父亲的朋友们的建议，入了培华女中。因为我考国文和作文的成绩很好，她们准许我入初中三，不必从初一读起。

民国十七年春天，北伐成功，北京改为北平。

北平第一任的市长是何其巩，他上任没有几天，就为我父亲和邵飘萍开了个追悼会。邵是《京报》的发行人，也是被张杀害的。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时间大概是下午三点，我由德君姐和几位父亲的朋友陪着，到宣武门外一个很大的什么会馆去参加父亲的追悼会。

到会的人又是一两千，其中很少是我所认识的。他们计包括：各大、中、小学校的代表，工会、商会和新闻界、教育以及党政军各界的代表等等。挽联和花圈挂满摆满了会场和院子。

主祭是何其巩，他两旁还有两位陪祭的人，我不记得是谁。他们三个人一同率领着大家向父亲的遗像行三鞠躬礼。并有献祭、读祭文、各界人士发表演说……等等仪式。他们都赞扬父亲是为国牺牲的英雄，又说父亲是“先烈”。

最后由我代表林、邵两位先烈致答谢词，那篇东西是父亲的一位朋友替我预先写好的，我拿着去念而已。可是我看着这么多人来追悼父亲，又听他们称赞父亲的伟大，使我想起父亲，想起一切……忍不住泪如泉涌，我那一篇东西，是一面呜咽，一面勉强读完的。到会的人中，也有很多人流下泪来。我相信这些人，多半是没见过父亲的，他们的泪，是真正的“同情之泪”啊！

第二天，北平的报纸，又是以头号铅字，发表当日追悼会的详细情形。记得有一家报纸上的标题是：

“素车白马，吊者盈门！”并提到我那“泣不成声”的答

词。

民国十九年春，父亲的表哥和表弟黄翼云和黄展云，发起为父亲募款，在福建青浦乡老家的白水山为父亲造墓。因为我记得父亲生前曾提过那个地方风景很好，所以要求他们在白水山建筑墓地。

捐款的人，计有林森先生、张继先生等数十人。墓碑由父亲的好友，曾在上海一起办报和办学校的蔡元培先生所写。林主席不但是同乡，也是父亲的好朋友。

表舅黄翼云和黄展云并为父亲印了一本简短的传略——即《闽县林白水先生传略》——分送给父亲的朋友。

那年冬天，曾在我们家住了四年，由父亲供给上大学的族叔林建书从福建到北平，把父亲的灵柩运回故土。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严冬的晚上，时间大约是将近午夜了。我和妈妈、建书三个人，把父亲的灵柩，从龙泉寺运到火车站上，建书买的是三等票，而父亲的灵柩是放在货车上，那个货车又冷又脏又乱，他们就把我父亲在这样的地方！父亲活着的时候，是多么爱清洁，多么整齐的人，现在让他躺在这么不整洁的地方，我觉得万分的对不起他，我心里默默的对父亲说：

“爹爹！我真对不起你！我真对不起你……请您饶恕我的不孝……”

因为钱不够，妈妈的身体又不好，经不住长途跋涉，所以我也不能亲自陪送父亲的灵柩回去安葬。我让父亲孤孤单单的走了！

火车终于慢慢的离开那黄色灯光照着的站台，驶向黑暗而遥远的南方。从此我连父亲的棺材也无法再见，我的眼泪使我的视

线模糊了！

后来建书和表舅们来信，都说父亲安葬那天，来参加葬礼的人非常多。“很多要人，特意从福州费了好几小时的工夫，赶到乡下来。……”这一切的‘哀荣’，对我爹爹又有什么用？他已经不知道了！

一年后，我们曾在北平地方法院，具状正式控告张宗昌、潘复和王琦谋杀。但因没有钱请律师，竟没得到结果！

民国二十一年九月三日，张宗昌在济南车站，被郑嗣成（一名郑继成）刺杀而死。他身中数枪，跑了很远，才终于倒地。郑也是为给他父亲复仇。他虽被捕，但在狱中时，全国各界，都给济南的法院打电报或写信，请求释放他，因为全国的人都认为张宗昌一生奸淫、掳掠，杀害忠良，死有余辜。我也以被害人家属之一的资格，给济南法院去了一封快邮代电，历数张的罪状，请求释放郑嗣成。连张自己的山东同乡，都联名具状，说他“蹂躏乡里，杀人无数。现遭报复，实为大快人心！”

几个月以后，郑果然被释出狱。

潘复和王琦后来也都死了。我未能亲自杀死这两个凶手，替父亲报仇，实在是一件憾事，希望父亲在天之灵能原谅我！

民国二十四年，我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容庚（字希白）先生在燕京大学的国文系当教授，并主编考古学社所出版的《考古丛书》。他把我父亲在《社会日报》副刊《生春红》上所登的“金石述记”搜集在内，他自己写了一篇跋，并又请陈汉第先生写跋。关于先父一生言行，在两篇短文和黄翼云表舅所写的传略中，可见一斑。

我本不敢以我自己这拙笨的笔，来写先父那可歌可泣的事

迹。可是先父的朋友一天比一天少了，有的人又留在大陆，无法联络，我如不写，谁来写呢？我想他的奋斗——参加革命、兴学、办报，以及提倡白话……等等，对中国都有伟大的贡献，他的“金石述记”，在考古方面也有它的价值。希望我这篇东西，对研究中国报学史和其它史迹的人，有所帮助。

（下略）

附录一

生春红室金石述记

林白水遗著

名砚展览会述记

岁乙丑夏历七月二十六日，日本文学士后藤朝太郎，约集北京藏砚诸家，在东单三条胡同大和俱乐部开名砚展览会，余亦赴会之一人，是日携砚六方，兹记砚名及品质如下：

（一）宋双龙砚 砚为王默斋先生故物，默斋名应凤，即著《困学纪闻》王应麟先生之弟也。端石，修八寸，广四寸余，厚二寸，池中雕双龙，鳞甲细如毫发，生动精绝，非宣和间名手不能办。背刻篆书铭跋及图章，亦极精。砚侧左右各刻隶楷。竟体色泽苍古，一望而知为八百年物。余以千金购取于袁珏生家，为余斋石林领袖。

（二）西洞大鱼脑砚 故友浙江张耕汲，精于鉴古，蓄砚尤富，别择至严，非绝品不收。此砚为张君生平所藏无上上品，视同性命。张君为余物色砚石数年，年必有一二珍品，而余自获睹此砚后，大有登山小鲁之观，必欲得之而后快，而张坚不许让，无可如何，乃相约每间一周，许余至其斋抚砚一次，借以少慰。

时张君卜西长安街大栅栏，余夜访之，方入座，张君躬捧此砚，从卧室出，陈于小几，恣余摩挲。一夕余至其斋，时方二更，张已寝矣，闻余来，知为砚故，因呼女仆启东窗，燃一烛于几。少顷张抱砚出，抚之犹温。张笑告余，此君固夜夜与吾共寝无虚夕，今为君故，顿令破睡冒寒，出而迎客，君得无怜之耶？余亟俛之于怀，略为抚视，匆匆告归。今张君墓草已宿，余每对砚回忆往事，为之怅然，而当时憨态可掬，至今思之，犹有余味。张素病瘵，一日抚砚语余曰，此物终当属君，今暂假我玩之可乎？余讶其言。张曰：君当知余之视息人间，为时至短。吾死，必以砚赠君。盖物必托于真知灼见之人，而君之宝爱是砚，可谓钟情已极，余必为君成此一段姻缘。余闻是语而伤之，自是不敢少露求让之意，盖不忍夺吾友所好也。民国八年，余为南北议和事，随朱桂莘^①南下。陈伏庐以书来，言耕汲病笃，欲余假以五百金医药之用，且云耕汲如不幸竟至不起，大西洞鱼脑砚当以属公。余报书伏庐云，耕汲为余良友，助金之事，义不容辞，但请无复以大西洞为言。及余归，耕汲已没，伏庐果以砚至，且致耕汲遗言，谓以此奉托，君当善视之。砚修四寸许，广如之，厚二寸，通体静穆，气度汪汪，中现鱼脑冻，周以胭脂。左方上端有马尾纹，下端有金钱火捺二，旁有碎点青花，色如云蒸霞蔚，明艳幽茜，真洛阳如花之丽人也。砚背与侧均有槟榔子纹。闻耕汲以三十金得之廊房二条一玉器店中，时砚面布满墨膏，了无所见，即因砚背有槟榔子，定为大西洞佳石。购归，急以木炭头发，洗去夙垢，而倾刻之间，芙蕖出水，杨妃新浴，千态百媚，一时并现矣。足见物之显晦有时，此砚若不逢耕汲，至今犹在市侩手中，

^① 朱启铃，字桂莘，时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

安能辗转入余斋，朝夕与余相伴，以度其安适娇惯之岁月耶！

（三）西洞小鱼脑砚 砚修四寸，广三寸，厚五分，系浙江砚家杨雪渔先生故物，后归其哲嗣仲庄。仲庄亦有砚癖，所蓄佳石至夥，余以陈伏庐作缘，用番佛百尊购得之。砚背有雪渔先生铭词，自为刻写，书法刀法均极精，末署幸草人者，即雪渔先生号也。是砚分量虽不大，而恰中砚材，中涵鱼脑冻，圆如满月，直透至背，四周环以胭脂，明艳如朝霞，皎洁如秋月，握之只有一片，而凝视既久，气象万千，真神品也。

（四）大青花荷叶砚 砚修六寸许，广四寸，厚一寸，上端池之四周，雕成荷钱大小六七，而池下满面青花。正如砚史所云，如墨浦之著湿纸。前人工于状物，于兹益信。青花之外，更有蕉叶白及碎冻，砚背及侧，亦均透出。凡砚面所有者，背皆有之，足见其得天独厚矣。先是伏庐告余以珏生近藏一砚至佳，惟急切不能力取，若有奇特之墨，足以动珏生者，可翹示之，与议交易也。余知珏生蓄墨之精甲海内，王廉生、端陶斋二家所存有名之三十六锭，均为所收，余有何法以欲动之。顾如夺其砚，必予之墨，且尤须为彼所渴思深想，勤求而不得者，非若寻常买砚只须银行有存款，出支票斥数百金者，无不到手之物矣。余以珏生悬例太苛，无法应付，且志在得砚而先求墨，又必须求得珏生所羨之墨，而后方能与讲不可必得之交易，此真事之至难者。乃往问计于伏庐，并叩伏庐曰：“君家之墨，有为珏生所喜者乎！”伏庐曰：“有。”并言张耕汲存其先人塔墨二锭，至奇诡，珏生屡欲得之。耕汲以先人遗物，不忍割爱，至今未许也。余闻伏庐语，知此中已有途径可循。乃奔驰于耕汲、伏庐之间，往返数四，二君均许助成吾事，因约珏生至伏庐斋中，尽出所藏，恣其

选择，复媵以耕汲二塔墨。珏生报可。余斥金三百为购墨奉珏生，珏生始以砚归余。其间展转纡回，议垂成而又中沮者不知数次，盖所耗心力与汗血，不知几斗矣。余每得一砚，均有一段至复杂之历史，而其曲折纠缠，未有如此砚者，故详志之。异日子孙随意以此付之打鼓，易烧饼，或卖得京钱一二十吊者，视兹篇所纪，得无转笑其祖宗之愚妄耶！嘻！

（五）鱼队儿青花砚 砚修四寸，广三寸，厚一寸，雕缕花纹极精，为乾隆水坑绝品。砚面上端偏右，有青花一片，如秋雁横空，成群斜掠而过；又如初生鱼子，结队游行。砚史所谓鱼队儿青花者是也。下端偏左，有金钱捺二，捺之右方，有细如鹅毛之青花结，砚史所谓鹅毛绒青花者是也。青花品类至多，以蚁脚、鹅毛绒、鱼队儿为绝品。今以广才三寸之石，而具鹅毛、鱼队之胜，真异材也。顾青花细者，若落凡夫俗子之手，最易埋没。因具有此胜者，骤视之，绝无所见，必洗涤至净，沉之水盆，照以日光，而后数美争呈，众妍毕露。苟非细心谛审，则春风之面，省识无从，此明妃所以有琵琶之怨也。余自获交张耕汲，辄因存问大鱼脑砚之故，每周必至其斋，遂得纵观耕汲所藏，惟此砚秘不以示。一日与某君谈砚，某君言，耕汲尚有一砚，深闭固拒，不肯示人，君既获睹大鱼脑，必索此小青花一为抚摩，始无遗憾。余颌之。一日过耕汲而诘之曰：吾与君交谊，不可谓不厚，君奈何犹靳一砚而不吾示，得无虑我夺所好乎！第出砚，恣我视，此后或售或赠，或愿与相守一生者，惟君之意，余决不赞一辞，以重君之烦恼也。耕汲闻言，若不胜其惶愧者，乃返身入卧室，风动帘开，余见耕汲自枕底挈砚而出，呼僮具盆水，置几于庭，沉砚水中，目招余曰：“可以观矣。”阳光射

盆，砚与水相为迎受，少顷，水纷渐定，砚面隐然有云霞红紫之气，而青花金钱捺诸胜，乃一一涌现，叹观止矣。耕汲既没，砚为其乡人某君所得。余为踪迹是砚之故，费时良久，始展转侦知之，以五百金新购自沪之董美人（张叔未所藏，名人题跋殆遍），复媵以黄莘田、董玄宰藏砚各一（皆有黄、董自刻之跋极精）与议交换，往返商略，数日不得端绪。最后之一夜，漏三下，而议几中变，幸卒如愿。余之精神唇舌，所费不知几许矣。

（六）刷丝歙砚 余所蓄砚，以端为多，歙石才四方，即金星、银星、刷丝、眉子而已。砚史所载刷丝一类，名号至繁，余此砚为刷丝中无上上品。砚材修四寸，广二寸许，厚不及五分，裁制如琴式，幽雅无伦，砚面刷丝如牛毛纹。顾每一转侧，为状不同，正观之，有枣形之小碎点；稍侧，则现粗缕；再侧之，则细如牛毛，密如蛛网。余初不知其所以然，今年春间，偶读宋人笔记，中载砚说，谓歙石以龙尾溪为最著，然龙尾之胜，无逾刷丝。其述刷丝妙品中，有一段与余此砚一一吻合，不禁狂喜。先是友人林群益，于某年春，为歙宰，余贻书请为物色歙砚，并抄示砚史论歙者数百言，俾略具眼力。群益报书云，歙有某绅，藏砚至夥，中有一刷丝砚，乃歙县署监狱中井底挖出之石，有人审为良材，命琢为砚，距今已百年矣。某绅以知事为其友买石，非重价不愿售，君欲得此，必汇百金来，吾为君办之。余闻信喜极，而急切不能得百金，以旧拓衡方碑，押借数日，乃得如数邮汇。翌月砚至，群益嘱其令弟衡南持来，开缄视之，欣慰本可以状。今衡南没巴西，余每抚砚忆及往事，辄为于〔郁〕悒也。

极大极小之鼎

自宋欧赵王薛著录古器，至近百年而臻绝诣。就鼎类言之，文字之多者，为瘠鼎、芻鼎、孟鼎、善夫克鼎，而以善夫克鼎为特巨，高三尺余，重可数百斤，与孟鼎同藏吴县潘氏攀古楼。从来鼎之大者，未有能若此者也。天下之物，有极大必有极小，余二十年中目睹彝器无虑千百，不特极小者未尝寓目，即稍稍小者亦多窳陋不精，以为古人制器皆关典要，或重大而轻小，不图乃有大谬不然者，益徵夫学问之无止境，而见闻之不可不广也。常州陶北溟自夷门来京师，出其行篋所储以眎余，率非流俗所习见，而尤使余惊喜者，则小鼎是已。鼎新出郟县黄河，骨董家所谓水银泌黑漆古者，遍体如一，莹泽可鉴，与绿绣相掩映。以今尺度之，围径三寸弱，高连耳四寸弱，重才八两有奇。有识款六，名曰：“繇謚德作小鼎”。渊懿宏肆，望而知为周初物，太素不雕，而严重峻整，无欹侧漓薄之状，以视善夫克鼎高十之一，重百之一耳，复乎若不相侔也，而其形制磅礴渊穆，又若吻合而无所差别者，抑不特形制然也。其文字之大小同，书体之茂美同，文字之外有阳文方格亦同，古器之具方格者至罕，多模粘不可辨，独此与善夫克鼎皆明晰，而此又瘦劲旁达，如后世之乌丝阑，此岂偶然者哉，不同者特大小悬殊耳。亟书之以饷世之考宗彝者。

袁珏生之盘爵

珏生侍讲好收藏三代铜器，而悬格最苛，须合五种格始能入

选：一、形制新特；二、铭文奇古；三、铜质精粹（或墨漆浸或水银浸）；四、花纹繁缛；五、锈色斑烂。故历年搜讨，仅得二器，爵一盘一，均属五美毕具。罗叔言^①戏以鹊华秋色拟之。珏生因属周希丁以花青和墨将二器拓一横幅，仿赵文敏画二山染法，属叔言一跋，苏堪^②、子晴各一诗，复自题一诗，以张大之，可谓好事者矣。因录罗、郑诸公题咏如下：

中舟侍讲藏一盘一爵，均极精。爵制尤隽削，与常爵异，予戏拟之以华不注山。侍讲因以两器合樨一纸，属以“鹊华秋色”四字署其端。癸亥十月。上虞罗振玉记。

东坡集有一诗咏爵，而不识爵也。其序云：胡穆秀才遗古铜器，似鼎而小，上有两柱，可以覆而不蹶，以为鼎则不足，疑其饮器也。其诗有四句，状爵形极肖，云：“只耳兽啣环（指板），长唇鹅翮喙（指流），三趾下锐春蒲短（指足），两柱高张秋菌细。”其为爵无疑，而“两柱高张秋菌细”句，似为此器咏者，书博一笑。振玉又记。

举爵愿闻神器复，铭盘待见旧邦新。号呶屡舞宾既醉，天意焉归自有真。孝胥。

小沧浪后谈金石，同直清容足古欢。觚觶礼文多互异，盘杆居处总能安。泰和寒食成追忆，泗水烟云识大观。照我城东旧时月，郁华藏器入凋残。钟羲。

求器冬官抱阙经，载稽爵制释盘铭。千年终化商周碧，两点犹含齐鲁青。光以幽凝成薄浸，盘涑铜极粹入土久蕴作水银浸觚为圆破作奇形。爵板及两耳三足较他器为圆，腰束圆带，亦异常制，殆破觚为圆之义。

^①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一字叔言。

^②郑孝胥（1860—1938）字苏堪，又字太夷。

顛字亦创见。庐陵集录吴兴画，异趣遥遥接古馨。中舟袁励准。

陶北溟新得古兵

武进陶北溟君近在曲阳得一出土古戈，耗资至四百余金，携归洗濯，发现错金鸟篆，奇崛高古，光彩烂然，定为商器。陶君于狂喜之余，承其驰书见告，爰为录示同好，以相庆幸。陶书如下：

白水兄长侍右：前寄片纸，度已达览，久不得复，想因溽暑所致。不佞生平畏热，一入五月，便终日潜伏，无复生气，秋风一起，精神顿旺。今年从军，以为不能偷懒，乃天公巧为解脱，未到端午，即因某事，遂得偷闲，稍理旧业。斜阳欲坠时，时复彳亍于紫河套冷摊之旁，适闻曲阳出一古戈，索值千八百金，计无此力，不如不见，持之匝月，终不能胜好奇之念，姑往一观。乃新出一戈，观其形制尺寸，当在周前，犹有雕镂，仿佛有金光，通体色泽，亦殊佳美。胸中自念，或当有字，乃与议值，舌敝唇焦，始克就范。一无字戈费至四百余金，诚骇人听。挈归以清水徐徐濯之，复以山查肉轻轻附之，凡三夕而见跟肘，五夕而毫发毕现，盖错金鸟篆两字，光彩烂然，玩其书体，决在商初。自宋以还，谈古兵者，殆无有先于此者矣。曩者藏有十四字剑，亦错金鸟篆，断而复继，以为奇缘，旋因穷不克保，每念辄为不殆。今得此戈，以时代论，相距当越千载，以篆体论，亦奇崛高古，不可相提并论，此不仅前憾顿弥，且觉有立地登天之乐。去岁于尊得一商戈，亚形中有弓形，有足形，又旁有象形字二，色如水银，璀璨不可逼视。今乃获此以俪之，天之赐我穷奇者，亦

云厚矣。特此飞告，以当露布。吴大帅夺得南口，想无此欢喜也。淮生如在京，速速告之。今日已买棉连纸，明日便拟推拓，惟须将款识另用青田石章抚刻，方能施墨，稍觉费事，然一拓好当首先奉寄。凡古兵字越少者越古，一有某某作某等文字，便是周物。商尚质，不如此费辞也。若依薛王例，则鸟迹当定为夏器；夏时文字，传世者少，究未确定作何结构，故不如仍以商目之耳。今日微凉，拉杂作此，敬颂撰缓不一。祖光顿首。七月三十日灯下，蚊有声如雷。

容 庚 跋

右《生春红室金石述记》一卷，林万里著，乃从《社会日报》副刊《生春红》中辑录者。君字少泉，号白水，福建闽侯人。民国初元，奔走国事，为众议院议员，参议院参政。历办《杭州白话报》，上海《警钟报》、《和平日报》，北京《公言报》、《新社会报》、《社会日报》。民国十一年夏，余来北平。冬，君诒书定交。越数日相见，请授其侄女毓秀、女慰君以《说文》。余曰：“君女年幼，《说文》未易毕读，盍先之以王筠《文字蒙求》？”自是每星期教授一次，教毕以车送余归。一夕车至半途，车夫托言腹痛，请余下车。盖京中仆役于客人例有需索，而车夫御余独无所得也。余乃寓书与君曰：“吾闻之韩非子曰，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县帜甚高箸，然不售，酒酸。则以狗猛齧人之故。余惧君家之酒酸也，请从此辞。”君得书乃斥去其车夫，而使其女来谢。次日相见，君复叩头谢罪，余以此感君。

君豪迈轩举，人有一艺之长，辄屈己下之，而视权贵蔑如也。其所办日报，抨击军阀，笔锋犀利，如挝渔阳之鼓。曹氏贿选，君讦其隐，被逮系警厅，选成乃纵之。潘氏将长内阁，君著社论攻之，又及张宗昌聚赌事。张氏大恚。潘更媒孽于其间，乃使直鲁联军督战司令部逮君，诬以通敌，逮于民国十五年八月六日寅时杀之于北京天桥。距生于清同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年五十

四。其身世与祢正平略同。

君藏金石甚富，尝见淡墨拓本董美人墓志，斥五百金购之，复以易张耕汲所藏青花砚。其藏砚尤著名。十四年七月，日人后藤朝太郎约集北京藏砚家在太和俱乐部开名砚展览会。君携六砚往，中外翕然推为冠冕。君藏生春红砚乃莘田老人故物。又东坡诗有“小窗书幌相妩媚，令君晓梦生春红”句，遂以生春红名其室，并以名其副刊。

君之没也，友人拟刊君所为文以为纪念，久之莫成。今十年矣，余乃掇拾此数纸冀以传君。呜呼！君其仅以是传耶？君女慰君今夏毕业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而君之元仇复被狙击而死，九京之下，庶几可瞑目矣乎！

民国廿四年五月廿六日容庚跋于燕京大学。

陈 汉 第 跋

余与白水订交于四十年前，时值逊清戊戌、己亥之交，侯官林迪臣先生知杭州府事，创求是书院、养正书塾，召集英才，崇尚实学。余主求是院事，君应养正讲席之聘，暇辄过从。壹意以造就国士相期许。未几，君归里，改革教育，遂久久不得音问。余知君必将有建树。然中经困厄，初未有所闻。民国改元，复于北京相遇，执手歔歔，劳苦如平生。余已厌谭政治，君则始膺议席，颇以策国事自任。继乃独创公言、新社会报，于时政多所论列，其锋不可当，读者为之称快。惜乎积累千万言之大声疾呼，而举国聩聩如故！余规以直道不行，宜危行言逊，不宜妄自菲薄。君忧国之怀，溢于言表。此身许国，匪石可转。卒之竟以冤狱遇害！其志亦可悲矣！

容君希白，与君交最挚，收辑君金石小著，付梓行世，尽后死之责。知余与君有同嗜，属为叙言，深愧不文。爰述吾二人论交始末，归之追忆亡友，正不知涕之何从也！

廿三年十一月伏庐陈汉第跋

附录二：

哀 誄

徐佛苏

闽侯林少泉先生，禀性英异，幼年文学即动长老，超迈士林。弱冠，愤清政腐浊，奋思革命。当时各省英俊，潜萃上海，谋起义。中外当局，合捕新党十余人系狱。少泉幸免，乃竭一人之智术，救营牢友，废寝馈者二阅月。同志赖以脱险。佛苏此时始识少泉，一见如昔，并惊服其胆略轶世，将来之勋誉无限。清末，少泉由东邦归国，为贫而鬻文于某书肆。著作精辟，学子翕然宗之。民国纪元，少泉来京，益肆力于著作。袁项城慕其才，擢授参政，旋又民选为国会议员。先后发抒中外政学道德，精理名言，蔚成巨帙，储为国华。及国会中折，议友盲驰，少泉羞与为伍，割席扬镳，遂专力于报纸。别号曰白水，窃绎其语义，盖欲割少泉之泉字之身首为二字，借示以身殉报之意也。得毋此号即近来被难之讖兆乎？！办报约及十年，文言毋虑百万。谗言刺语，传诵一时。自是，少泉一生文学之价值及历史，集中于此时。而朝野人士，慕仰之者，嫉讪之者，及欲杀之以快心者，亦左右逢源，前后夹击。于此时，漪欤盛哉！此时之林白水，洵文运中之骄儿，舆论中之飞将也。例如侯官严几道先生，中西文学，一时无两，而独于少泉之著作，且奖且佩，赞叹无已，许为

畏友。少泉平昔夸述此事，以为一生之宠荣。每引人生得一知己，死可无恨之言，以自壮自慰。然则少泉文学之名贵，吾侪游夏何敢赞一词乎！但可叹者，当少泉独步文坛之时，即吾侪懦夫代为危惧之时，亦即少泉许身殉国矢志求仁之时！故日昨被难之事，早在佛苏及少泉自身意计之中也。乃日昨噩耗传来，各朋辈中，有为之泣吁于权贵之前者，有为之叹息凄惨及怨怼权贵嗜杀者。岂知就少泉近年之决心言之，则杀之者，适以成其仁，为超度其肉体之扰累耳！而援救之叹息之者，实世俗之见，不知死者近年之决心耳！古人云：视死如归。盖人类至痛苦凄惻呼天吁地之秋，有真欲求速死以解脱一切痛苦者。若他人既不能脱少泉一切之厄境，而徒欲延留其肉体，任其饱受人世无期延期之刺激凌侮，岂死者所乐闻耶？佛苏知少泉较深，今可为少泉下一盖棺之定论曰：少泉生平之最足自豪者，在于文锋之犀利，其最足短气者，在于生计之窘绝。加以国运危急之秋，少泉若偶感国难家愁之交迫，即不能不逞其犀利之笔锋以吐胸中不平之气。及至驷不及舌，言出祸随，而少泉不畏强御之书生故态，又复勃兴。不肯低心认过，甚或笔锋加厉，骂倒一时。故佛苏论定，少泉之死，由于笔锋犀利与国难家愁之交迫也。夫少泉，性行之坚决既如此，然则朋侪中有何知术能使少泉不死于文字狱乎？又何庸代抱不平乎？虽然，人类之友谊私情究无术遏抑也！忆昔闻恶耗时，佛苏即流涕三日，卧病兼旬。迄今眼红如血溅，致昨届友，今因奠期，欲诣灵一奠，而四肢不支。欲恭拟挽章，而有怀莫吐。徬徨浹旬，握笔旋辍，几无一词哀诔，故时愆情迫，只得纵笔所之，略述死者一生之学行，及代白死者晚年矢志求仁之宏愿，以告世之慕少泉罪少泉者。稍知少泉之所以为少泉，并欲使

人知海内博学多才之士，其生平志节最坚，及境遇最苦者，莫少泉若也！佛苏悲天恻友，今何能不濡泪成词，望天遥挽耶！少泉故友若有灵，或将默许佛苏芜陋之诔词，有诚有物，可继严几道先儒之后，为公之第二知己乎？是则敬诔少泉故友之夙谊高风于万一之愚意耳！伏维冥鉴！

民国十五年九月十八日徐佛苏哀诔

附录三：

闽县林白水先生传略

黄翼云

闽县林公万里，一名獬，字少泉，号宣樊。四十以后于所著作，则自署为白水。曾祖清孝廉唐卿先生，官黔中，父钧随宦。因得娶黔督学黄沧洲公犹子黄圣堯公长女，而生公，公少倜傥，负奇气，不妄交游。从舅家读书，喜诵侯朝宗、魏叔子之文，不屑屑于举业。事母至孝，母死后，赴浙依其师高嘯桐公为林伯颖公课子。其时林迪臣杭府，方改求是书院为小学。以公及林畏庐先生并征为教授。年假回闽，同其舅兄黄翼云、展云创设福州蒙学堂。匆匆赴浙，适求是小学为邹容革命军之宣传，激起排满风潮。公出居沪上，约章太炎、蒋智由、蔡子民、刘申叔，办《俄事警闻》，旋改《警钟日报》，主张排满。又以独力办《中国白话报》，署名白话道人。著论刺客一篇，昌言暗杀，更进而为政治革命之工作。所居梅福里，革命党人黄克强诸公，咸集为机关部。公与蓝天蔚议组学生义勇队，自为分队长，以抵抗强权。为清吏王之春潜通俄人，又为主张卖粤路之有力者，因偕刘光汉、万福华，谋刺杀，不遂，万君被逮。公同时与黄兴、章士钊、张继、薛大可、彭义民、徐佛苏、章勤士、郭人漳，俱被捕。诸君旋出狱，各引去。公独与刘光汉集资延律师，为万力争。万因得免死，监禁十年。公此时为嫌疑归匿乡里，张公岱杉，以公才介

学，使姚稷臣为草教育计划，创设府立四城小学，以公总其事。公用严格管理，号称模范小学。时闽督魏光焘资送学生留日，公独以名噪，为绅卿所忌，不得与选，乃自费东渡，入早稻田大学法科，兼习新闻科。

未几，日本取缔风潮陡起，留学生纷纷归国。公回闽，居第一山，同黄展云编书十多种。旋复赴沪。适赵声、刘光汉方约同志入宁举义，需款甚急，窘无以应。公以所著《中国民约》一书，刺血作函，求售于某书局，约值千金，悉斥用之，回家则已断炊三日矣。

自癸卯迄辛亥十年中，为宣传革命，身濒于险，而至无以自存，可谓苦矣！

岁辛亥，闽省光复。公回闽，任法制局长。编法典，未用。而蒋黄事起，公出赴鄂，参与国庆大会。旋入都，充公府秘书，兼直军署秘书长。又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及李厚基以兵压境，大捕党人，公于是时，奉命回闽帮办军务善后。以计脱同党十余人，人皆义之。因事与督办意见不投，辞职入京，转参政院参政。遇事俱主持正义，不能与时俯仰，以此常触权贵之忌，盖非一日矣！民本以后，国会旋仆旋复，选举非法，政局益非。公知乱不旋已，乃毅然辞去议席，退为报馆主笔。在旧京发行《公言报》，专务监督政府，抨击不遗余力。喧传一日骂倒三总长。又办《新社会报》，为指斥贿选，封闭。入狱三月，事解，复理旧业。政府要以强力，改《新社会报》而去一“新”字。公为社论，弁首谓：“报馆何辜，亦遭缙首！”自是言论益主持正义而不挠。人皆为公危之。而公初不以为意也，暇时临池，为钟鼎籀文，搜集金石书画以自遣。常〔尝〕以千金，购得其舅家黄莘田十砚公生

春红砚一方，曰：此吾舅家之遗也，当为谨藏之。其风趣有如此者。

民国十五年八月六日，为《社会日报》披露张宗昌、潘复之言动，突被联军督战司令部逮捕。夜半，宪兵司令王琦，以汽车载至宪兵营，诬以“通敌”，略讯数语，遽驱以出。公神色从容，但乞书遗嘱。其中表李律阁、王莪孙，及其友陈淮生为之料理身后而已。天初明，即于天桥就义。享年五十有四。爱公者俱不及为之拯救！公从弟林建书，仓猝收殓，厝于南下洼之龙泉寺。痛哉！前者国民军退却南口时，军容军纪之整齐，以及将帅士卒之一心一德，《社会报》为纪实之宣扬，而忌者顾认定诬其为通敌也耶！公为革命之先觉，生平为努力革命，几濒于死而不死。乃卒为主持舆论，反抗军阀而丧其元！公之亡也，一时海内外欧美、日本之新闻记者，无不震悼。皆大披露其死难之颠末，以舒其哀。公之名可以不朽矣！公侠烈性成，急人之难如己。前后党人，如万福华、黄汉湘、王莪、陈群、黄展云，皆以公之救援而得生。及公之难，而公之友俱不获一援手，詎不痛哉！公少劬学，老而弥笃。其文章，云驱电掣，如风马之驰。对于时政之观察，尤具巨眼。故发为文章，则嘻笑怒骂，辄言人所不敢言。侯官严几道（作者按：即严复）诵其著作，必击节赞叹，许为畏友，而公亦引为知己。公友徐佛苏，则以公为文运之骄儿，而舆论之飞将，皆笃论也。

公不务生产，身后萧条，只馀砚三十余方及图书金石百橱，归其中表李律阁收藏。子一名陆起，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女一名玛利。以公生平常言：“吾名白水，吾乡青圃白水山是吾他日魂魄之所依也。”；自公之亡，日谋负骨以归葬，致书其中表黄翼

云、展云，由其宗弟林建书，于去冬十一月九日赴平，今春一月二日奉公枢归里，殡于白水山之阳。公之义烈，与公女玛利之孝行，均可以泣鬼神而震动殊俗者也。兹其亲串故人为谋集款造坟，以妥公之灵也。述公生平之事略，以告海内外之爱公哀公者，语焉不详，尚或鉴之！

民国十九年四月一日黄翼云谨述

附录四：

林白水先生传略

陈与龄

（原载民国二十四年上海《东方杂志》第三十二卷第十三号）

白水名獬，又名万里，字少泉，署曰宣樊，号退室学者，晚号白水。甲午中日战事，侯官林少谷游击领扬威军舰，大东沟之役，扬威毁于敌，游击浮沉海中，他舟曳长绳援之，游击出半身推绳，拱揖谢援者，如是三四，终不就援以死；死义之烈，谈者伟之。白水，游击之从子也。

白水少治古文，惟不工制艺，以其行文奔放，绳墨不足以拘之也。清末福州书院，以鳌峰凤池试生童，正谊试举贡；院皆设古学，肄习古文辞赋。白水于古学，所造既邃，试必冠其列，然拙于时文，一衿不能青也，而文名籍甚。敝衣乱发，边幅不修，游名公巨绅间，辄盛气骂座，见者皆重之而莫敢近。

杭州太守林迪臣先生耳其名，延之往，使就蚕业学校讲席。太守幕中多知名之士，如林琴南、高啸桐、梦旦昆季名尤著，皆雅重白水。知石门县事林伯颖明府，聘之使课其子侄，礼数尤优异焉。杭州东城书院，时以策论取士，白水朔望必至，试必高列，士子群趋赴之，置酒高会，名噪钱塘。琴南倡办《杭州白话报》，挽白水主其事，白水自署曰白话道人。

清末，朝政日非，白水奋然以改革自任。及就养正、求是两

书院总教席也，夜集诸生，或十人或二十人，入其卧室，密谈政治，训以改革。养正、求是为浙省文化之所荟萃，诸生化之，恒以举义自勉，亦以此而兴党狱。乃返福州，创立蒙学堂，以革命学说，灌输学生，嗣改为侯官小学；黄花岗之役，福州死难者十人，皆蒙学堂旧生也。福州设学校，实自蒙学堂始。然生徒众而费绌，白水竭力奔走，内外支吾，校事稍定，托其中表黄君鲁贻主其事，己则走海上，与章君士钊等办《苏报》，鼓吹革命；又与黄克强、章太炎、刘光汉、邹容、蔡子民、吴雅暉诸公，设中华教育会于四马路梅福里，兼办爱国女学。

俄罗斯既筑西伯利亚铁路，军运不息，东陲危急；白水创《俄事警闻》，以醒民愤。广西巡抚王之春，方谋以铁路让与法人，入京陈奏。道经上海；白水与万福华、邹容刺之一枝春酒馆，不中，万、邹二公被执，白水脱身疾驰入梅福里告难作，黄克强辈既逸去，白水仓惶从后户出未数武，而捕者至，遂拘入捕房，以无确证乃免。复返福州，上书学务公所提调张君岱杉，极言创办小学之要，草规划书暨章则计数千言，切于事实。张魁之，设小学七，公立三，府立四。知福州府事者程君祖福，与白水素相得，白水代聘知名之士主之；己则往来奔走，以督其成，未尝受值。于时，福州已废书院为校士馆，以策论课士，经月一试，士子膏火之所资，白水衣食之所取给也。然主其事者郑友奇太史，恶白水之以文字鼓吹革命也，卷署林獬，必不录，乃更名万里，而万里之名复著。无已，则假朋辈之名以进，试之日，必典衣被，置美饌佳酿，招学徒数人供缮写，自清晓以迄夜分，手不停挥，口不停啜，缮写者告惫，而白水文兴方酣也。榜发，则前列十数卷，皆白水作也。月得数十金，如是者历年余。

既而东渡日本习政法。学成返上海，鼓吹革命益力，海上诸报，无不以刊白水之文为荣。白水为畅所欲言计，未尝居奇，每篇仅受酬金五元；然必待资尽而后为之，瓮有余粟，犹舍文而嗜也。复好客，客至，辄请少待，临案走笔，顷刻成章，遣急足持投报馆，收稿费设酒食以宴客，其风趣如是。

清社既屋，福建独立，设军政府，白水长法制院。时彭寿松为政务院总裁，虐民甚，意所不善者，辄嗾护卫刺之于市。白水恶之，以中央于闽事素隔膜，欲暴其恶于中央，遂应项城之招，入参枢要，乘间数彭氏罪，彭之去闽，白水与有力焉。时白水兼主《新中国日报》，尝言：“中国今日之政体，民主固善，而封建余威，曾未少杀，欲谋芟除，计须十五年之努力也。”果也，军阀之光焰，至民国十六年乃熠，可谓有先见之明矣。国会成立，被选为众议院议员，旋改任参议院参政，五年与同人合办《公言报》，有声于时。民国八年，南北议和，白水在沪办《和平日刊》，南北代表所主张，皆以《和平日刊》论调为依归焉。迨和议不谐，白水返北平，复办《新社会日报》，以事开罪政府，停刊数日，既复刊，乃曰：“蒙赦，不改不可也。自今伊始，除去《新社会日报》之新字，如斩首级，示所以自刑也。”其感愤而杂以诙谐如此。

白水既长于文言，复精白话，朗畅曲达，信手拈来，皆成妙谛；其见诸报章者，每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于政局，针针见血，物无遁形。北平之中央公园，夏日晚凉，游人手报纸而诵者，皆《社会日报》也；即平日不喜白话文者，亦独于白水之白话文重视之。虽然，誉者毁之媒也，爱者杀之机也；故白水竟死于文字之祸，死之因盖以文字上之讥刺，有人毁于张宗昌而

杀之也。

白水有子曰陆起，留美不返。晚年遗稿散失，然商务印书馆少年丛书，犹有其中年遗著《华盛顿》、《加里波的》、《纳尔逊》、《哥伦布》、《大彼得》、《毕斯麦》六种在也。

与龄曰：世之知白水者，喜其能文章而已，此不足以尽白水也。其刺王之春也，以热烈。其脱黄兴辈并自脱也，以忠实机警。其陶铸黄花岗死难诸烈士也，莫不具有革命之真实力量焉。白水非文章之士也。惜一生脱略，故不能善其死，然至死不劫于权贵势。噫！亦人杰矣哉！

附录五：

对《林白水先生传》的几点补充

陶英惠

（原载民国五十八年《传记文学》杂志第十五卷第四期）

民国十五年，直系将领吴佩孚和奉系张作霖，捐弃两次直奉战争的旧嫌，分而复合，共同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两军径向北京挺进，终于在四月十五日，逼得国民军退出北京。张宗昌以山东督办名义，率领奉军及直鲁联军先行入京。北京秩序大乱，陷入恐怖状态，大学教授及新闻记者多避地离京。这时，新闻界先后遇难的有两位：一是邵飘萍，一是林白水。邵死于四月二十六日，罪名是“宣传赤化”；林死于八月六日，罪名是“通敌有证”。相距仅百余日，故当时有“萍水相逢百日间”之语。在林遇害的第二天（八月七日），世界日晚两报社长成舍我先生，也被宪兵司令部奉张宗昌命拘传质讯，幸亏亲友竭力营救，才获释放。

顷在《传记文学》拜读林慰君女士为其父亲林白水先生所写的传，是这位老报人遇害后四十多年来一篇最完整的传记，文字清新，感人至深。在林先生遇害时，作者只有十四岁，对林先生的事业及活动，不可能有深刻的印象，所以她这篇传记的主要根据，一是得自亲友们的口述，一是亲友们所写的纪念文字。但这些资料，多为事后追记，容有错误之处，林女士未能细考，是美

中不足之处。而一些珍贵的原始资料，因交给了张次溪，未能引用，殊为可惜。再者，林先生及其妹宗素女士，在清末的革命运动中，都是不可忽视的人物，而林女士大作中则语焉不详，当然是史料不足的缘故。近来笔者正为蔡元培先生撰写年谱，蔡先生和林先生在清末共事很久，所以对林先生的事迹也略知一二，现就所知者简述于后，作为林女士传记的一个补充，也可以供研究林先生者作一参考。

一 爱国女学校

林女士说，林先生离开福州到上海去，是应蔡元培、章太炎和刘申叔的邀请，他们四个人“一起办了一个女学校，名叫爱国女校，这也是中国首创的女学校。此后不久，他们又创设了中国教育会。”

爱国女学校的成立，是在光绪二十七年冬天，校舍设在登贤里，发起人为：林少泉（白水）、蔡元培、乌目山僧（黄宗仰）、吴彦复、陈梦坡（范）、蒋观云（智由）等，经费由英籍犹太富商哈同的夫人罗加陵担任。其筹办情形，蒋维乔在“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中曾有记载：

“最初拟办女学者，为上虞经莲三（元善）。适林少泉偕其妻及妹林宗素，自福州来沪，亦提倡女学。蔡子民亦赞成之，因偕其夫人黄仲玉，在白克路登贤里寓所邀集众人，开会讨论。到会者经、林二氏外，尚有吴彦复偕其女亚男、弱男及其妾夏小正，陈梦坡偕其女撝芬及二妾，复有韦增佩、增

英两姊妹。开会时蔡、林、陈三氏，均有演说。……未几，薛锦琴女士到沪，蒋观云设席欢迎，乃请蔡夫人与林氏姑嫂作陪，而自身不敢入席作主人，盖其时男女界限尚严，避嫌如此。”

在这里需要更正的一点：爱国女学校并不是“中国首创的女学校”，光绪二十四年经元善在上海所办的经正女学，比爱国女学校还要早三年。

关于林先生的结婚及回福州接其妹宗素到日本的事，林女士把它放在同盟会成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光绪三十二年，似乎记错了。如果上面所引蒋维乔文没有错的话，林宗素至少在光绪二十七年冬天就到了上海。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二日《苏报》的“学界风潮”栏内，有一条“林女士东游”的消息，可为蒋文的佐证，兹照录于下：

“福建林君少泉之妹宗素女士，慷慨有大志，在上海已两年，上海女杰，有一意向学者，有热心办事者，皆足转移女界，影响大陆。去年薛女士游美，今月十四，林女士复将游日，而上海之女学会，办学报，亦将有臻臻直上之势焉。”

该报既说这时林宗素到上海已两年，足证林女士文中所说的时间有误。林宗素离开福州，并没有直接去日本，是先在上海住了一个阶段。至于林先生是不是在光绪二十七年结的婚，夫人是否同去上海（蒋文说同去上海），其它资料中都没有记载。

二 爱国学社

这时林先生在上海还有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参加爱国学社。林女士文中没有提及。

庚子以后，上海成了国内革命者的汇集所。爱国女学校、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等组织，便是革命志士的大本营。中国教育会是光绪二十八年春天成立的。会所设在英大马路泥城桥外福源里二十一号。当时参加的主要分子有：蔡元培、黄宗仰、叶瀚（浩吾）、蒋观云、钟宪鬯、吴稚晖等，公推蔡先生为会长。这年的十月十五日，上海南洋公学发生了退学风潮，退学的学生，得到中国教育会的帮助，在十月十七日成立了爱国学社。爱国学社成立的时候，林先生也参加了，不但有文字记载可查，而且有照片为证。（见附图）^①

光绪二十九年四月，林白水先生和林宗素女士，均已到了日本。当时，俄人以东三省撤兵事，横肆要挟，颇欲鹊巢鸠占，久假不归。虽各国咸抱不平，而俄人仍迁延不撤，且声言要划入俄国版图。留日学界闻讯大愤，乃于四月三日开会议决组织拒俄义勇队，旋改名为学生军，准备赴敌。学生军设队长一名，由蓝天蔚担任，下分三个区队，每区队分四个分队。甲区队长为龚光明，乙区队长为敖正邦，丙区队长为吴祐贞（吴禄贞的弟弟）。林白水（署名仍为林獬）先生也参加了学生军，担任丙区队第二分队的分队长。当时留日的重要人物如：汤燠（汤尔和）、苏子谷（苏曼殊）、李书城、刘成禺、钮永建、黄軫（黄兴），也都是

^① 图略。

学生军。（详细名单见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苏报》）

当时留日女学生十数人，愤女学之衰败，慨女权之摧折，于同年四月八日，成立“日本留学女学生共爱会”，以拯救吾国二万万之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思想，以得尽女国民之天职为宗旨。林宗素女士便是重要发起人之一。及学生军成立，共爱会亦开会商议协助，决议从军北征，任军中看护死伤事，并电告上海女学校，请求协助。其重要分子有：林宗素、胡彬、方君笄、陈懋懿、华桂、龚圆常、钱丰保、曹汝锦、王莲等。

由此可知，林氏兄妹，在清末的革命运动中，都曾有过不少的贡献。

三 万福华刺王之春案

万福华刺王之春案，发生于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三日。关于此案之记载，除了林女士所举的黄翼云《闽县林白水先生传略》及徐佛苏所写的《哀诔》外，尚有《安徽革命纪实》、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一册、苏鹏《柳溪忆语》（以上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一编第十册转录）、蒋慎吾《同盟会时代上海革命党人的活动》（《逸经》二十六期）以及当时出版的《警钟日报》。《安徽革命纪实》有从英租界会审公堂抄出来的万福华全案，最为可信。《警钟日报》对万案的记载非常详细，可惜当时因为顾虑太多，尤其对被捕者之真实姓名，如黄兴化名李寿芝，即不敢公布。

这几种资料，都是林女士所没有引用的，兹将其与林女士大

作有重要出入者列举如下：

一、王之春赴英租界四马路金谷香番菜馆，系万福华等冒吴葆初名请去的，并不是万等打听到王要去赴宴才准备行刺。在行刺时，林白水先生似乎不在场。

二、苏鹏是被捕者之一，据他的说法，林先生并未被捕，当时林先生是和蔡元培、刘光汉、杨笃生等在外面奔走营救。

三、其他人被捕的地点是余庆里，不是法租界的梅福里。他们的被捕，也不是万福华因忍受不了巡捕的毒打，供出同党，而是由于章士钊的探狱，才被破获。

万福华最后以扰乱租界治安罪监禁十年，并不是由死刑而减为十年徒刑。后因谋越狱，伤印捕一名，又加判十年，直到民国元年年底，经沪督陈其美严厉交涉多次，始行开释。万氏于民国七（待查）年病逝，身后萧条，无以为葬，北京京师总商会会长安迪生等曾为发起募捐。民国九年二月八日，其北京友人在虎坊桥湖广会馆为开追悼会，发起人共有八十一人，林白水、蔡元培、徐佛苏、章士钊、薛大可、刘光汉、杨度等，均列名其中。

四 遇难前后

林女士文中说：这时期的财政总长是潘复，他还要进一步当国务总理，要当国务总理，非先把《社会日报》和它的主办人去掉不可。这段记载与事实不符。

民国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国务总理颜惠庆，因奉系反对而辞职，遗缺由杜锡珪以海军总长代理，在杜氏代阁期间，财政总长是顾维钧，不是潘复。潘复除了在民国十年五月曾以财政次长代

理过部务（总长是李士伟，迄未就任。）外，并未做过财政总长。在杜氏代阁期间，内部裂痕非常严重，主要是为财长问题。这时潘复的最大愿望就是想问鼎财长，而不是国务总理，张宗昌也在竭力助成他做财长，以期要军费方便。七月二十五日的《顺天时报》曾有一段报导：

“财长问题，终须更换，潘复与直奉合作甚有功绩，若不畀以相当位置，张宗昌终觉不安。顾维钧因财政上无办法，确已不愿再干，结果恐为潘复所得。”

但潘复一直没能如愿以偿，原因是杜锡珪对潘之长财部始终持异议。杜想恢复币制局，请潘担任总裁，为潘所拒绝。北京政府乃委潘为河道督办，潘不愿就，张宗昌尤表不满。八月二日的《顺天时报》曾登载此事：

“前日政府下令特派潘复督办京东河道后，有人向潘贺喜，并询其就职日期。潘答称，杜阁此次命令，事前并未征求本人同意，殊不解其用意何在。并谓现政府曾对余为种种羁縻，用心良苦，但余非闲员，现在讨赤全功未竟，诸待擘画，故对政府此种非驴非马之设施，惟有一笑置之，决不就职云。又闻张对此事，尤为不满，曾语人云，为国家论功行赏计，为现局建设求才计，馨航（潘复字）均可大用，今乃以绝不相干之河督畀馨航，事过滑稽云云。”

林白水先生那篇招来杀身之祸的社论——《尿道督办》，就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他所办的《社会日报》上。传闻林向潘函索五千金，潘不予置理，才写出此文，因乏可靠资料，不知真象若何。

林先生遇难后，北京各报都有记载，但笔者现在所能找到的，只有《顺天时报》一种，《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办的，龚德柏先生说他是“最讨厌而最有销路的报纸”，只有它“敢登载一切不利于中国与政府要人的消息”。在八月七日的《顺天时报》中，对林先生被捕、枪决以及善后的情形，记载甚详。兹照录于下，以补林女士大作之不足：

《社会日报》经理林万里昨日上午二时被宪兵司令部逮捕，四时三十分，即押赴天桥枪毙。兹将其经过情形与原因，详志如下：

被捕之经过

《社会日报》社址，在棉花头条一号，林氏家居宣武门内红庙，每日至下午十时许，即亲至社内编纂新闻稿或撰述社论，必至拂晓亲阅大样后，始驰车回寓。昨日上午一时许，《社会日报》附近，即有便衣探员侦察情形。二时，京师宪兵司令王琦氏偕韩副官与弁兵数人，分乘汽车至《社会日报》，投刺谒林，林在客室接谈，逾时，韩语林谓督办有请，林遂与韩同乘汽车出《社会日报》，时该区警士数人至，守卫该报社，禁止出入。王司令亲行命人检视室内。林与韩副官至宪兵营依法审讯定讞后，时正上午四时。《社会日报》内各员役，宪兵待遇，极有礼节，至五时许，始出外。

枪毙之情形

记者于昨晨，闻及林君凶耗后，立即驰往天桥实地调查

时，不料林君尸体，已被其家人收殓而去，仅见行刑地点，留有一片鲜血，尚未泯灭待人凭吊也。旋经记者向天桥附近之一警士，探询林君临刑时状态，某警士言之甚详。据云，本日晨五钟顷，忽有宪兵三十余名，荷枪结队由北向天桥步行而来，并有连长二人殿于队后，复见队中夹有人力车一辆，被宪兵环护簇拥缓缓而行，车上坐有年约五十余岁，面貌清瘦黑胡须之一老人，身穿白夏布大衫，外罩青纱坎肩，双臂缚在背后。行过天桥二三十步电车站地方，宪兵连长忽发止步口号，宪兵等立即停止前进。其连长二人乃派宪兵四五名，将该老人扶扶下车，当将车夫驱往队后，旋将该老人掖使跪在马路中间，该老人意尚倔强不肯下跪，当被宪兵强使跪伏于地，面南背北，有宪兵二人，仍在老人左右扶持，一宪兵持手枪，立在老人背后，以枪口向老人脑后瞄正。旋闻连长高叫行刑口令，即闻砰然一声，该老人已被击毙，尸体向左侧歪倒，而头上流出之血涌有尺余。该连长又呼口号，众宪兵遂排队向后转身，以快步式向北驰行而去。

当时该处警士等，睹其事毕正欲叩询一切，见一连长偕一兵，走入派出所报称，适间枪毙之人，系《社会日报》经理林某，因犯通敌罪，奉张督办令将其枪毙等语。说毕又追附本队向北进城去。军法官当揭出左之布告：

宪兵司令部布告

为布告事：顷奉张督办令，查《社会日报》经理林白水，通敌有证，着即枪毙。等因奉此。合行布告，俾众周知。此布。司令王琦。中华民国十五年八月六日。

家属之成殓

林万里毕命，经军法官检验无讹后，外右五区巡官察悉枪毙者为棉花头条《社会日报》之记者，即电知林之家属，亲视含殓，于是林之家属戚友林鹏南、吴衡如等赶至刑场，准备装殓。林身后萧条，家无长物，急切中无钱购棺，遂用二十元购薄材一具，草草装殓。

停柩龙泉寺

林之遗骸成殓后，即由《社会日报》夫役舁至南下洼龙泉寺内，家属始向戚友处告贷，另购楠木棺一具，并请同仁医院医士洗涤净尽，重行入殓。林有二妾随侍在京，长公子留学美国，女公子年方十四岁，遽遭兹变，均痛哭不止，气息甚微。女公子且欲以身殉父，服铅粉自尽，已送往医院救治。林鹏南等于料理善后诸事外，复悲悼不置，新闻界同人与林之戚友，多往停灵处吊唁，厥状甚为凄惨。

友朋之营救

先是前此直奉联军抵京之时，有人即主张对于林万里之行动应特别注意，前晚林事发生后，杨度、薛大可、文和等亟力营救。张初时颇以军令重大，未便出入为辞，意似难回。最后薛大可鉴势迫情急，竟屈膝跪于张前，涕泗纵横，一再恳吁，求贷其死，并以古名将种种懿行美德，期待张氏。张意始转活动，惟仍以命令即出，不便收回为念。嗣经协商结果，决定根据刑律规定，将“着即枪毙”之罪，改为

“犹豫执行”，其性质盖与清律“斩监候”同出一例也。上项办法决定，乃由杨度当场另草一令，以此代彼，借资救济。令既脱稿，特由张处送往警厅，再由警厅转送宪兵司令部，殊往返周折，经历手续较多，而计林自被捕，三时在司令部过堂，四时四十分即已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此令转到宪兵司令部，业五时有余，相差约两刻钟上下，林已于四时三十分在天桥执行，诸人相与叹息不置。

林氏略历

林万里，字少泉，别署白水，福建闽侯人，现年五十四岁。前清时为闽中名士，出洋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与张继、章太炎奔走革命，组织革命党。回沪后，与蔡子民办理警钟报，又办理上海白话报。民国成立，袁项城聘为总统府秘书，又派帮办福建军务善后事宜；继又派充参议院参政、直隶都督秘书长等职；曾充第一届国会议员，自行辞职。民国六七年办《公言报》，梁众异（鸿志）、黄秋岳（浚）诸名士均依附之。其文章议论，称诵一时，继又创办《新社会报》，为徐东海所封闭，后改名《社会日报》，迄今四年，每厄于经济，辄卖文鬻字以维持之。林身后萧条，室中除古字古画尚值数百金外，并无其它长物。林夫人早死，林有妾二人。

※ ※ ※

在八月八日的《顺天时报》中，又以“林白水君之凶耗”为题，发表一篇社论，对林先生之死，深致哀悼之意。原文云：

曩者《京报》社长邵某，以宣传赤化之故而被枪决，今《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君，亦以通敌有证之故而被枪决矣，至堪痛叹也。夫目下之中国，宪法不存在，法律被蹂躏，拥有武力之军阀，极其跋扈，其状态恰与人民无自由无民权，仅拥有强权之封建诸侯极其专制压迫之欧洲中世纪无所异也。……曩当国民军全盛时代，有枪毙李彦青、逼死曹锐之事，而徐树铮廊房之变，据道路传闻，亦与某军有关，固世人所熟知也。至于三一八案，国务院前被杀及受伤者至百数十名，毫未闻经法律的手续以处断，因日时之经过，世人已渐忘之矣。如斯仅列举近数年来著名之非法案件，已更仆难数矣。可见人民之自由，其受束缚为何如也。

惟此种压制虐政，虽数见不鲜，而此次林君之凶耗，尤使世人为之哀悼者，由于林君居恒操守颇严，社会的信用亦厚，其言论亦常侃侃谔谔，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民之所欲言者痛快言之，及枪决之理由甚为漠然，少足使世之识者为之首肯故也。吾人为战胜殊勋甚高之张督办计，此种行动，殊以为遗憾，并怜文学之士，因文贾祸，深悼林君之英灵也。

※ ※ ※

在林先生遇难的当天晚上，北京日本记者协会通过一项宣言，对这位未经任何法律手续而被军阀枪决的老报人，表示同情，并将所觅得之林先生遗嘱原文，同时在八月八日《顺天时报》中予以披露：

北京日本记者协会，前（六日）晚在大和俱乐部开会，

对中国同业之《社会日报》社长林万里横死事，特表满腔同情，并议决发表宣言书如左：

宣 言

自《京报》社长邵振青惨遭奇祸以来，现复有《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君亦同罹此厄，殊令吾侪不胜扼腕叹息，并对此同业者两君表深厚之同情，且认此类不祥事件之层出不穷，实为至憾也。夫邵、林两君均于被捕后，不出数小时，并未履行任何法律的手续，即予枪决，是纵令其罪果属不赦，而此种暴戾之行，在人道上既难默许，且亦信其为法治国之一大污点也。吾侪固极盼撤销从来各国在华之治外法权，并冀望中国及早整顿出内政法律。乃近来竟迭见此种不祥事件发生，诚以为不特足为收回治外法权之阻碍，且中国军阀此种武断的举措，亦深使在华外侨，对于撤销治外法权，感不安焉。

又林氏在宪兵司令部所书就之遗嘱原文，兹已觅得，爰为照录如左：

“我命在顷刻，爱女教以读书，善为择嫁。小铃、宝玉和好度日。莪孙、秋岳、律阁、淮生代为料理后事，我平生不作亏心事，天必佑我家也。”

※ ※ ※

关于林先生的遗嘱，林女士已交给了张次溪，只得记大意，而不记得原文，高拜石先生在《林白水被杀始末》（《古春风楼琐记》第二集）一文中，也录有一份，与《顺天时报》所登者稍

有出入，因照录于下：

“我命在顷刻，一时无从说起，只好听之。爱女好好读书，以后择婿，须格外慎重。可以电知陆儿回家照应。小林、宝玉（他的两妾）和气过日。所有难决之事，请莪孙、淮生、律阁、秋岳诸友帮忙。我生平不作亏心事，天必佑我家也。丙寅八月七日，夜四时，万里绝笔。”另注：“西斜街宏庙二十号林太太收。外玉器两件，铜印乙颗，又金手表乙个。”

林先生是八月六日晨死的，其中“丙寅八月七日”显然是错误的。今高先生业已作古，不知录自何处，究竟何者可靠，只有请林女士来鉴定了。

慰君按：看到陶先生为先父传记所写的补充文章，不但高兴，而且十分感谢。陶君在编写蔡元培先生年谱的那么繁忙的工作之时，竟不辞辛苦，抽出许多时间，费了许多力量，写出这篇将近万言的著作，他的热心怎不令人钦佩！

诚如陶先生所说，我所知道的关于先父的事情，都是听亲戚朋友口述的，这些人所说的话有时不太吻合，因此我写稿时，只好采取“服从多数”制。那种说法的人多一点，我就认为是对的，虽然有时候“多数”也可能是错的。

关于先父一生所做的事，陶先生有些很宝贵的资料，我未能搜集到，又蒙他指出错误的地方数处（比如爱国女学校并不是上海第一个女学校），不过有的地方我得再向陶先生和读者说明一下：

(一)就以刺王之春事来说吧：按照黄翼云先生所写“……公同时与黄兴、章士钊、张继、薛大可、彭义民、徐佛苏、章勤士、郭人漳俱被捕……”，此外还有一两位先父的朋友，口头上告诉我，也是这么说。

虽然徐佛苏先生在他的哀诔中，曾有这样的话：“……当时各省英俊潜萃上海，谋起义。中外当局合捕新党十余人系狱，少泉倖免，乃竭一人之智述，营救牢友，废寝馈者二阅月，同志赖以脱险。佛苏此时始识少泉，一见如昔……”但是他没说这次的事，是不是为了行刺王之春，而且也没说他自己是不是也曾被捕。只看出他由于这次的事件，才认识先父。因此当我写稿时，我认为徐先生和黄先生所说的，根本不是一件事。我以为徐所写的事在前（但因详细情形，我不清楚，所以就没有提）。而刺王事在后，因为这次被捕的人里，有徐佛苏（依照黄文），而且先父曾在外营救他们。那么，此时的徐先生，一定是早已认识先父，而不会是被救出以后才认识。

我认为这两位先生所记载的事，并不冲突，所以就照“多数”的说法而写下来。究竟当时先父是否被捕，现在我还不敢确定。虽然陶先生所搜集的记载说这次先父并没被捕，但这件事，在我还是一个疑问。

(二)关于先姑母林宗素究竟先到上海还是先到日本这一点，我想陶君所说很对，她一定是先到上海，可能后来她本想到日本去，而因为胆怯，或其他原因，未能成行，因此回闽。及至先父赴日后，（先父是从福州到日本去的，不是从上海）才又接她同去。至于先父与先祖父讨论姑母的对话，和先父被迫结婚事，大概是为了赴沪而不是为赴日。这一点一定是我弄错或听错

了。

有好几个人都告诉我，先姑母初出茅庐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腼腆的人。因此我相信她虽然在上海做过事，可是在日本登台演讲，她还是会怕羞的。记得好象她自己也曾告诉过我，她以背向听众演说的那件事。按我现在的推测，她绝不敢自己一个人单独由上海到日本去。所以我想她当时大概是同先父一起回了福州，后来才赴日。

（三）关于刺王之春时，是万等假冒别人之名，请王赴宴，我相信陶君所说也是对的。但是我想他们行刺时，是在楼梯上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我和张继先生的两位女公子都同过学，好象连她们也曾这样说过。（我在北伐成功后，曾和张先生通过几次信，他那时主张我入“革命先烈遗族子弟学校”，后因先母不让我到南方去，因此没去。）她们当然是听张先生所说。

（四）陶先生文中只有一句话我需要特别解释：他说先父被难时，相传是因为曾向潘复借款不遂，因此才在报上骂他，但因缺乏证据，因此不能证明实有其事……我相信那种传说，是出于痛恨先父的一些军阀和政客或少数流氓之口。他们或因先父曾在报上反对、痛骂，或因借贷不遂，求事不成，因此怀恨。这群无耻之徒，在先父在世的时候，没有办法，只好等他死后，造出这样的谣言，毁坏他的名誉，让他无法答辩，这种举动，实在是最令人不齿的。

总观所有记载先父事迹的各种书报，没有人不同意他是一位伟大的正人君子。对国家，他奔走效劳，不遗余力；对家庭，他是孝子慈父；对朋友，他是宁愿牺牲一切，也要尽量帮忙。一生救过的人，不知有多少。自己虽然总是闹经济恐慌，但有时竟当卖心爱

的古玩，用来救朋友之急……以一个这样一生忠孝仁义的人，忽然竟变成一个勒索敲诈的小人，岂不是笑话！因此我认为这完全是那些恨他的人，故意捏造事实，恶意中伤。这种话不但陶先生不信，任何人也不会信的。我对这种卑鄙的不肖之徒，只有置之不理。

据我所知，先父的为人，适与这个谣言相反。因为常常有政客为了要讨好，打算用钱来收买先父，于是托人把钱送上门来。但每次有这种事，总是被先父拒绝，而且连送钱来的朋友也都痛骂一顿。

说到这里，不能不再提起潘复。据说潘复当时就是怕先父反对他做总长（不是总理），所以曾派人送钱，而遭到拒绝和辱骂。这一点我以前忘记提了。

后来潘在先父开吊时，他假装好人，竟派他的佣人送来一份奠仪和一个蓝缎帐子。大概他怕人知道是他主谋杀害，所以假充若无其事，让人看他还是先父的朋友。这个蓝缎帐子，我们叫佣人当着潘复的送礼人撕毁，掷到厕所里去，并且把那份奠仪——大约是五百元或一千元，原数退回。告诉他我们不要他的“臭钱”。这件事，有的报上也有记载，不过我没搜集在本书中，因为文中只是说我一人极力主张不要这钱，实际上先母也主张不要。我觉得这些小事，与先父传记没有太大关系，所以以前没提。现在既提到钱的事，我就只好顺便也说出来。我相信除我之外，还有不少人会知道这件事的。

（五）关于先父遗嘱，我想一般人一定觉得我记得太不够清楚了。这一点，我自己也颇感惭愧。主要的原因是我自从民国二十四年由王羲孙先生处把先父遗嘱取回来后，就把它和先父的血

手帕放在一起，从来不忍看。我大概一共只看过两三次，每次一看，总是要泪眼模糊，甚至泣不成声！（当时不知为什么先母要把遗嘱存在王处，大概是怕搬家时遗失或不忍看）。

（六）先母，姨母，和我的殉父，这几件事，当时报上多半登的不对，但我们从来没太注意过。因为当先父被难的时候，对我们是天塌地陷的世界末日，谁还管其他的小事！比方说，他们说先母是妾，这个大概因为先母比先父岁数小十几岁。他的名字是陈钰，字晓菱。姨母的名字是葆玉。她照顾我虽不算最好，但也不无功劳。我很同情她的遭遇，因此没把她甘愿为妾的事，写在文中。当然也因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大事。不过我认为先父和她，都没有什么对不起先母，因为先母常年生病，既不能管家，又不能照顾丈夫和女儿，而且因为病，还常住医院或搬到别处去，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是别人，早已离婚了。

至于我的殉父事，我文中未提，有几个原因，第一，我觉得我此举，比起先父的被难，一个是泰山，一个是鸿毛。而且与“先父的一生”没有太大的关系。第二，我要避免“自我宣传”之嫌。我不愿意有人以为我要借这机会，宣扬我自己是多么孝顺。第三，当时报上所说的关于我自杀的事，没有一个是对的。有的说“吞金”，有的说“吞铅粉”，有的说“服毒”……并且还说我被送到医院去“救治”……其实这些传说都不正确。

我当时听人念完先父遗嘱，知道先父确实被害，心如刀割，认为我们全家都应当与先父一起死，他才不会挂念我们。因此跑到书房去触电。那时候我以为只要用手接触插销就会触电而死。没想到手指没到洞里，还是不行。这时我姐姐德君把我阻住而且拖开。后来我们的亲戚朋友，都劝我不应当作这样的傻事，他们

说我应当留着我的生命，将来好为父亲报仇。我想也很对，当时我就决定，我这一生，不管赴汤蹈火，也要报这不共戴天之仇！谁知一直拖延到他们已经都死了也未能如愿！

以上是当时的实情，我虽有意殉父，但并未成功，而且也没“被送到医院去救治”。报上所登，仅仅是揣测而已。由这件事又可以证明：报上的记载，有时候不一定完全可靠。这件事只有现在台北的德君姐知道得最清楚，我自己从来没和别人说过，连外子都不知道。现在回顾当初，只觉得是“愚孝”，并没有提起的必要。不过陶先生所引的《顺天时报》既有记载，我不能不说一说。

最后，让我再向陶先生道谢，可惜从前我在台北时，不知道陶先生也在台湾，那时倘使我能认识陶君，这枝秃笔所写的东西，或者会比较正确些！

（整理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

封面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